俄国在满洲

（1892—1906）

〔苏〕鲍里斯·罗曼诺夫著



商务印书馆

俄国在满洲

（1892—1906年）

专制政体在帝国主义时代的对外政策史纲

〔苏〕鲍里斯·罗曼诺夫 著

陶文钊 李金秋 姚宝珠 译

（新译本）

商务印书馆

1980年·北京

Б. А. Романов

Россия в Маньчжурии

(1892—1906)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самодержавия в эпоху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Изд.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го Восточного Института имени А. С. Енукидзе
Ленинград 1928

俄国在满洲

（1892—1906年）

（专制政体在帝国主义时代的对外政策史纲）

〔苏〕鲍里斯·罗曼诺夫 著

陶文钊 李金秋 姚宝珠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 16⁷/₈印张 1插页 401千字
1980年4月第1版 1980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4,600册
统一书号：11017·459 定价：1.60元

译者前言

《俄国在满洲(1892—1906年)》一书是列宁格勒叶努基杰东方学研究所出版社于1928年出版的。作者鲍里斯·亚历山大罗维奇·罗曼诺夫(1889—1957年)。该书1937年曾由民耿译成中文,商务印书馆出版,书名改作《帝俄侵略满洲史》。1952年由苏珊·威尔伯·琼斯(Susan Wilbur Jones)译成英文(《Russia in Manchuria (1892—1906)》)。本书是根据俄文原书重译的。

本书注释、索引中所用的页码均为原书页码,即译文边码。

原文段落过长,为便于阅读,译文参照英译本重行分了段。

原书有两则附录:(一)俄国采金公司,(二)1897年的辛迪加和蒙古矿业公司。附录(一)列举了俄国采金公司的股东名单,各占股份数额,与本书关系不大,译文从略。附录(二)的有关部分附于书末。

本书翻译过程中得到张振鹍、杨诗浩等同志的帮助,谨此致谢。

1979年1月

目　录

原书出版说明 ……1
原书前言 ……2
导言　俄国远东政策的基本点(1892—1917年) ……7
第一章　满洲问题的由来(1892—1895年)……37
第二章　俄国对满洲的“和平”渗透(1895—1896年)……77
第三章　对中国南满领土的“侵占”(1896—1898年) ……117
第四章　向长城以北对英国的“极有害”的退让
(1898—1899年) ……184
第五章　对满洲全境的“临时”占领(1900—1902年)……209
第六章　战前的最后阶段(1902—1904年)……303
第七章　战争时期俄国的国际财政关系(1904—1906年)……398
第八章　战后满洲的“大型企业” ……460
附录　1897年的辛迪加和蒙古矿业公司 ……484
索　引　1．人名索引 ……489
2．内容和地名索引 ……501

原书出版说明

列宁格勒叶努基杰东方学研究所出版社出版 Б.А.罗曼诺夫 III 的著作《俄国在满洲》，首先是为了对俄国帝国主义的远东政策这一现实问题提供新的、主要是真实的资料。

罗曼诺夫完全达到了从我们极为丰富的档案中吸取新鲜资料的目的，这和出版社的想法是吻合的。这样，就以沙俄东方政策这一最重大的问题为题材，撰写了有丰富的实际内容、并用文献详加阐明的专题著作。

罗曼诺夫分析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并把日俄战争前一时期向满洲输出俄国资本作为自己研究的中心问题。他以帝国主义世界性冲突的加剧作为广阔的背景，研究了由于满洲市场而造成的地方性冲突(不仅是日俄冲突，而且有英俄冲突和美俄冲突)，从而揭示了俄国专制政体的整个中国政策、特别是满洲政策的帝国主义 IV 实质。

这一题材的确定引导作者去研究俄国帝国主义这个总题目，在我们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研究的也是这个问题。

但是，罗曼诺夫没有揭示作为沙俄整个帝国主义政策基础的各阶级力量之间的斗争，而是附和 E.格拉诺夫斯基同志最近在其著作中用别的资料阐述的俄国垄断资本主义的概念，因而明显地高估了个别人物的作用，对于解决俄国帝国主义这个总问题没有提供新的东西。

综上所述，出版社认为，罗曼诺夫的这本著作的出版不仅会引起小范围的东方学专业工作者的兴趣，而且会引起一切马克思主义历史工作者的兴趣。

原书前言

V 我在1923—1926年发表了一些论述俄国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的远东政策的历史论文，本书就是由我原来打算出版的这些论文的集子扩展而成的。本书《序言》和头两章写作时，我尚未放弃出论文集的想法，我将过去发表的文章作了一番修改以付新版，《序言》和头两章就是这样写成的。① 不管这时需要作多大的修改和补充，《序言》和头两章仍未突破原先的计划，只是需要扩充论文集的篇幅。而在第三章的写作过程中，就愈来愈明显地看出，坚持这个计划是行不通的，因为我到那时为止（1927年初）进行的最新研究中所搜集的材料，在原先结构的框框中容纳不下，这就促使我另写详尽的学术著作。而当用作第三章的那部分写成时，则已经超过了原计划出版的篇幅。这样就得或者停止以后的工作，把写到半截的书拿去出版；或者继续工作，进行系统的研究。遗憾的是，由于技术上的原因，为了排印第三章，必须先把头十二印张印出并把它拆版，因此，当我正式决定继续工作时，我已经没有可能再回过头来修改第3—128页了，这些文字却还只是为了出《论
VI 文集》而写作的。② 从第三章到第八章则是另写的。

现在问世的《史纲》就是这样产生的。《史纲》书名表示的主

---

① 《序言》是由一篇名为《俄国远东政策的基本点》的简要述评改写成的。这篇文章发表在《西伯利亚之火》杂志1926年第4期上，第一、二两章是由论述《李鸿章基金》一文的第一到第五部分扩充而成的，这篇文章刊登在列宁格勒出版的《阶级斗争》杂志1924年第1、2期合刊，第77—110页。

② 对于《序言》和第一章，其中包括第一章的第二部分说来，出一本《论文集》是特别理想的。

题，是贯串全书的唯一线索。书中研究的基本课题只是帝俄在总共十五年间对外政策的一个问题。但是，专制政体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和二十世纪初期的进攻性政策正是针对满洲的，并且主要是针对满洲的。这一政策在日俄冲突的发展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它促使了国际形势的复杂化，从而极为有利于用战争来解决问题。这一政策最终使得俄国政府对于当时已显出苗头的帝国主义冲突失去了行动自由，通过战争和 1905 年的革命，它使俄国投入了协约国的怀抱，专制政体也就在这个怀抱中于 1917 年遭到覆亡。因此，我想我对所研究的题目及年代加以限制，并没有破坏本纲要主题的完整性，也没有降低它的意义。

在我们最近的历史研究工作中，关于俄国帝国主义的问题成了中心问题。在此，我希望，本纲要对这个总问题能有所阐述。考虑到这个总问题，我才把帝国主义时代专制政体的对外政策选作研究专题。而在我的研究工作中，我已能依据 M.H.波克罗夫斯基及其学派在著作中提供的有关这一问题的那些定论。我一步一步跟踪俄国的外交活动，并将自己的任务确定为：研究俄国外交活动所采用的方法和手段，它企图实现的纲领，这样或那样影响这一纲领发展的各种动力，最后，研究在专制政体上层机关中所发生 VII
的斗争（更确切地说是解体），离战争愈近，这种斗争或解体便愈演愈烈。资本主义在进入垄断阶段以后，其发展的各种条件与专制政体是互相矛盾的；我是从这种矛盾的角度来进行研究的。我觉得，我对当时俄国政府外交机构留下的资料进行了相当专注的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我愈来愈多和愈来愈确切地观察到，专制政体是如何（徒然地）企图不仅适应这些条件，而且要置身于这种发展之中并占据一定的地位，以便既能保障它在国内的统治，同时还使它不落后于别的大国，而能在帝国主义的国际舞台上应付自如。我在史纲中尽可能确切叙述的主要是我对帝国主义国际舞台远东

部分的满洲地区的考察结果。

我远不以为这些考察已经多少是详尽无遗的了，甚至在我所接触到的材料范围内也是如此。但是每一个利用档案资料从事现代史问题研究工作的人都知道，浩繁案卷的数量和状况使研究工作者面临着多大的困难。本书所用的基本档案是财政部总务司第三处经手处理的文件。当西伯利亚铁路外贝加尔段穿过满洲进行敷设的问题刚一发生时，第三处便于 1895 年成立了，并且很快就起到了似乎是财政部外交司的作用。但此外，我也在别处的档案中找到了一系列最有价值的文件。① 但由于纯粹外部条件的原因，当时我未能如愿地更广泛利用保存在莫斯科的外交部的档案。

在不能同样多地利用外交和财政两部档案的情况下，我恰恰能较多使用后者的档案，这对本书也许是较为有利的。在我所研究的那些年中，几乎完全是由维特执掌的部当权的，财政大臣在俄国远东政策的方针和外交活动中起着指导作用，这是远非偶然的。因此，要研究当时专制政体的经济政策在俄国国际关系中是用哪些方法、在何种程度上确定并解决自己的任务的这个问题，不应当首先从外交部去寻找基本资料。何况外交部用（本部和别部的）文件副本的形式颇为完备地供给财政部总务司以大量的资料。而从 1900 年夏季起，在拉姆斯多尔弗任外交大臣期间，外交部在某种意义上似乎变成了财政部的一个隶属机关，不事先征得财政大臣的同意，它在远东就不能采取任何行动。财政大臣则支配着他在远东的精明强干和机警灵敏的代理人员，并支配着中东铁路公司和华俄道胜银行的一整套机构。

满洲有一段历史与维特的名字是如此紧密相连，因此，我能深

① 本书在以下进行援引时，注解中凡未提档案，只注明案卷号数者（“第几号卷”），即表示案卷属于财政部总务司第三处的档案。在指明档案而无出处者，即表示档案取自列宁格勒中央历史档案馆。凡取自莫斯科的档案必加以说明。

人研究他的远东政策的内在活动，这就为我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使我能进一步确定并论证我在研究中应加以评述的方面。我认为这一方面具有极重要意义是出于下述考虑的。维特是从私人资本主义阵营那边过来的人，这一情况再加上他的经验和天赋条件，造成了他在亚历山大三世政府中的特殊地位，从而使他比别人更适宜于承担使专制政体的政策适应于新环境的使命。维特作为最大的和收益最多的铁路股份公司的巨头，之后又作为全俄范围内统一的铁路运价经济政策的头一个主宰，他在就任大臣的同时，就担负起了详细制订并实现将整个西伯利亚纳入俄国资本主义的版图这 IX
一庞大计划的任务。这一计划的国际政治意义从最初步骤起就把维特引上积极干预国家对外政策的道路，愈到后来愈是这样。而维特"把一切抓在自己手中"的强烈愿望也不单是（如他的同时代人会感觉到的那样）他个人天性的表现，而是由使俄国的内外政策互相符合的客观需要所造成的，对内是力图在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的形势下保障专制政体的领导地位的政策，对外则是在外部帝国主义的包围中为本国取得市场的政策。处于帝国主义九十年代的高涨和在国际范围内前进运动的条件之下，维特的这种干涉能实现的程度，决定了俄国在远东的进攻性政策和金融资本结成紧密联盟的程度。在此所依靠的是圣彼得堡国际银行，并把华俄道胜银行和与其密切相关的中东铁路公司提到了首位，然后是那些私营的工业企业，这些企业答应，在满洲土地上不脱离俄国财政部的控制。国家资金在这一银行—铁路—轮船—矿山联合企业中事实上拥有的股份愈多，在 1900 年及以后各年经济危机的条件下私人资本主义对满洲财富的经营愈是没有前途，这一政策的垄断特性就暴露得愈显著。正是由于这种垄断特性，它对满洲愈来愈具有好战性，直到最后才以战争而告结束。

维特身为财政大臣，作为由他奠基和领导的"托拉斯"的政治

指导者，他是这一政策的鼓吹者。然而，他在生前用尽了千方百计，死后又用他自己的《回忆录》，以利于制造并最广泛地散布一种神话，似乎他的政策纯粹是"和平"性质的。尽管这一神话极为拙劣，但它至今仍颇有市场，因此要粉碎这种神话，就要对这一政策的每一步骤和各种变化用种种方法加以详尽的专题研究。我正是把这种研究作为自己的任务的，并在财政部外交司来往公文的原件中找到了我所需要的最确切的细节材料。我尽可能不放过任何一个这样的细节，并力图在这条研究道路上极鲜明地揭露那种政策的真正性质和实际意义。这种政策是帝国主义时代通过专制政体忠仆之口为专制政体谋划的。

在本书问世的时候，我要感谢把本书纳入出版计划的列宁格勒叶奴基杰东方学研究所委员会。多亏了莫斯科中央档案馆和列宁格勒中央历史档案馆主管人员对我始终不渝的优待，我才能着手利用作为本书基础的档案资料，并把本书撰写完毕。至于本书的最后完稿，我觉得在此要特别感谢 A.E.普列斯尼亚科夫，他欣然承担了校读本书手稿的工作。

本书还附有一张满洲地图，图中标出了书里提到的俄国和他国已成立和拟议中的工业、林业和铁路租让企业。 T.Φ.科佩洛娃绘制了这张地图，从而给了我不可缺少的帮助。

作　　者

1928年9月30日

导　言

俄国远东政策的基本点

(1892—1917 年)

在俄罗斯帝国的国际关系史中，满洲问题在 1895 年已完全作为一个国际问题出现，并且占据了首要的和最急切的地位。它在此后整整十年中，成了俄国对外政策的基本问题。满洲问题的这种地位是直接并仅仅与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的动工兴建有关的。这条铁路对于俄国在日本海沿岸进攻性政策的贯彻速度和规模的改变具有最重要的意义。不论这条铁路的修筑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符合了什么样的需要和利益，它总是这个国家对外政策中的一个基本事实。把辽阔的西伯利亚大地和中部俄罗斯连接起来，这是老早就有的愿望。经过一系列局部工程的动工和拖延以后，这一愿望终于在 1892 年不仅被正式确定下来，而且要立即付诸实施。从此以后，俄国的对外政策随之不断产生了一系列紧密相连的事件，这些事件的更替和连续是异常迅速的，不可遏止的。当时从技术方面，主要是从财政方面，对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建筑计划进行了详细的研究。这是一条横贯西伯利亚、直达符拉迪沃斯托克[①]、全长七千多俄里、打破世界纪录的宽轨大铁路。具有这种形式的这项计划不仅考虑到国内铁路交通干线的简单扩展，也不单单从商业角度考虑把分散在西伯利亚地区的各贸易点有利地断断续续地联系起来，而且似乎具有世界意义。俄国在这条铁路的末

① 即海参崴。——译者

端，进入了太平洋地区国际经济和政治竞争的范围，它希望，由这条铁路所造成的“欧洲和东亚之间交通方向的变化应当对它〔俄国〕有利”。西伯利亚铁路被正式宣布为一项“世界性事件”，“这类事件开创了各民族历史的新纪元，而且常常引起各国之间既定经济关系的根本变革”。这条铁路还被看作是加强俄国太平洋舰队的工具，它将使俄国能“控制太平洋水域的一切国际商业活动”。①

还有一个问题。在1891年，残酷的饥荒以无与伦比的力量蔓延于俄国的欧洲部分，当时的财政大臣维特在他的奏折中吹得天花乱坠的计划，看来是在大饥荒的直接影响下制定的，而实现这一计划的重负在最近若干年中首先正是落到了俄国农民的身上；这条铁路就是由于饥饿和无地，为他们逃难到还是渺无人烟的西伯利亚所敷设的捷径。指望对已经形成的国际经济力量的结合产生革命作用的这项计划，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在国内阶级关系的发展中具有同样的意义，因为铁路就象一条传动带，它如今以最敏感的方式把国家和远东的世界帝国主义机构连接在一起。在这一方面具有决定性的外部事实是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这场战争规模之大，意义之深，对于一个仅有西伯利亚水路和驿路的俄国说来会是不可想象的事。维特在1892年所宣称的“控制太平洋水域的一切国际商业活动”的口号本身包含有一种纲领，这个纲领促使俄国政府把西伯利亚铁路一段长达二千多俄里的路线穿过满洲全境，从而极大地加速了俄日帝国主义冲突的成熟和战争的爆发。

俄国在对日战争中的失败并没有使俄国离开满洲。它只是缩小了俄国在那里的势力范围，这是对日本有利的；而横穿北满通向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中东铁路干线这一传播俄国影响的导线，却仍然留在俄国人的手中。诚然，尼古拉政府直到战争爆发前一直在顽固推行的垄断满洲的纲领，现在遭到了彻底的失败而寿终正寝

① 引自财政大臣1892年11月6日的奏折。见本书第一章，边码第56—60页。

了，在俄国战后和革命[1]以后所处的新的国际局势下，满洲问题也已经失去了本身的尖锐性和直接的军事性质。但是，俄国在北满拥有广阔的铁路租界，即划归铁路使用的地带和一系列正在建立的居民点，以及根据1896年的租让合同俄国对这些居民点享有的行政管理权，因此，不论俄国在战后已变得多么虚弱，它对中国仍然是一种威胁，或迟或早，它总要将北满直接夺去的。而在1907—1916年间继之而来的俄日之间的那些协定，又把这两个不久前的仇敌纳入了一个确实图谋瓜分中国的军事同盟之中。只有俄国的十月革命才使中国完全摆脱了各种或公开的或隐蔽的侵占威胁，这些威胁在过去一个时期是和俄国"和平征服"东亚市场的纲领相联系的，而维特的政策使这一纲领对于整个满洲三省特别富于好战性。

I

6

虽然中国与俄国和欧洲早已有了贸易关系（分别从十七世纪和十六世纪开始），但对当代意义上的外国资本说来，中国本部的"开放"是1842—1844年间的事。当时，"由于鸦片"引起的第一次中英战争（1839—1842年）的结果，中国被迫"开放了"五个口岸与欧洲通商，规定了值百抽五的统一关税率，并且承认了英国人（然后在1844年承认了美国人和法国人）的治外法权。截止1844年，欧洲和中国的贸易额（按整数算）是：输入中国额约为二千八百万美元，由中国输出额约为三千三百万美元。其中各国贸易额的百分比是：输入额中英国占百分之六十八，俄国占百分之十九，美国占百分之七，别的国家（荷兰、葡萄牙、法国、比利时、丹麦、瑞典和德国）占百分之六；输出额中英国占百分之六十，俄国占百分之十六，

① 指1905年的革命。——译者

美国占百分之二十，别的国家占百分之四。[①] 当时俄国的贸易额集中在恰克图，货物主要是沿俄中边界由陆路运送的，加之在随后的十年中又出现了明显的每况愈下的趋势，[②] 如果我们注意到这些情况，那就可以说，“中国本部”（中国本部即长城以内的中国十八个省）当时几乎完全是英国资本的“势力范围”，美国资本暂时还只是一个弱小的伙伴。

因此，后来从经济上和领土、政治上瓜分整个中华帝国的全部历史应当标志着英国实际垄断地位的相对削弱。在 1858—1960 年
7 的第二次战争以后，从 1860 年起，管理中国海关的首领，即海关的总税务司是由英国人罗伯特·赫德担任的，这是英国人实际垄断的有重要意义的标志；而在 1898 年，条约又正式认可了这种地位，只要英国对华贸易额分别超过各国。正是英国开始采用了用战争逼攻中国的办法，从而导致十九世纪下半叶别的大国对远离帝国中心的边陲地区纷纷进行侵吞：俄国 1858 年对阿穆尔[③] 地区、1860 年对滨海地区和 1881 年对伊犁西部地区，法国 1862 年对交趾支那和 1874 年对安南，日本 1879—1881 年对琉球群岛，英国本身 1886 年对缅甸和 1890 年对锡金。这些侵吞暂时还没有引起侵吞国之间的直接冲突，然而各侵吞国以后进一步侵入中国内地的出发地点却已勾画出来了。[④]

到了九十年代，朝鲜便明显成了中国领土上帝国主义国家间

---

① 见《俄中贸易统计资料》，载关税征收司统计科丛刊，圣彼得堡 1909 年版，第 8、21 页。

② 同上，第 11、15 页，从 1851 年到 1890 年每五年的输入中国额为（单位千卢布）：九千二百七十二；八千三百六十六；五千五百八十五；四千六百三十五；三千九百八十四；二千四百八十七；二千一百二十六；二千一百八十六。

③ 即黑龙江。——译者

④ 俄国在占据了滨海地区以后，就在 1867 年以一千四百三十二万卢布的价格将阿拉斯加卖给了美国，并在 1875 年把千岛群岛让给了日本，换取了萨哈林岛（即库页岛。——译者）的南半部（日本却认为千岛群岛历来是属于它的）。

矛盾触发的地点。这个王国很久以来就处于中国附属国的地位，但是中国为了避免与日本可能发生的纠葛和冲突，允许日本在1876年与朝鲜象与一个独立国家一样直接缔结条约。之后，中国确实规避涉及朝鲜的任何交涉，不仅如此，它甚至撺掇朝鲜政府与西方列强签订类似的条约，以此作为使1879年深入汉城王宫的日本政治势力失去作用的手段。

美国人从七十年代初便开始对向朝鲜渗透感到兴趣，他们首先利用了中国的上述立场，1882年的美韩条约引起了别的欧洲国家一系列类似的外交行动(英国和德国在1883年11月，意大利和俄国在1884年6月，法国在1886年6月)。1883年，中国聘请在8德国驻华领事馆任职的官员穆麟德担任朝鲜海关总税务司和经济问题顾问，于是，这种用错综交叉的办法对朝鲜实行国际保险的政策遂宣告完成，而穆麟德则立即着手使自己新的"祖国"的外交政策急剧地转变为联俄。

穆麟德为了提防日本对汉城又一次进行武装干涉的可能性(如1882年事件)，准备聘请俄国人担任朝鲜军队的教官，并向俄国提供不冻港永兴湾。但是，他的这一计划引起了英国方面威胁性的反对。英国人并占据了正位于朝鲜海峡咽喉的巨文岛。当时俄国还无力进行一次海上冲突，它又怕在远东水域再出现一个达达尼尔事件（如1885年），穆麟德的计划这才宣告破产。而1884年，中日两国军队在汉城又发生了一次武装冲突，这就迫使中国在1885年和日本订立临时的（在更为有利的时候到来之前）条约，双方商定不事先通知对方便不得派兵去朝鲜。在此后若干年中，中国依仗着英国的支持（英国通过罗伯特·赫德坚持推行一种要将朝鲜海关隶属于中国海关系统之下的政策)，根本不想放弃它对朝鲜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以在朝鲜的对外贸易额中占据首位为基础，准备将中国人赶出朝鲜，并正式宣布朝鲜

独立。至于美国和俄国，前者根本不承认中国的宗主权，后者完全意识到自己在远东的“历史使命”，正在为将自己滨海的边远地区与中央连接起来（起初即使是采用铁路和水路联运的办法）而采取积极行动，在所有这些情况下，要说 1885 年日中之间的条约即便
9 会在最小程度上解决如此复杂的朝鲜问题，那是连想也不用想的。①

1891 年 2 月 23 日，俄国政府作出了修筑从莫斯科一气直达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铁路的决定，并在 1891 年 3 月 17 日以特别上谕的方式予以宣布。这一决定在当时条件下的意义是，它有使远东力量对比发生急剧改变的直接危险。原来俄国在远东迫于条件只不过一万名士兵，而且远离供应中心，这项决定不仅能使这些地方部队参加远东的角逐，而且能把整个帝国军队中的任何一支力量引入这场竞争，同时还能利用当地愚昧无知的百姓。在整个十九世纪中，俄罗斯帝国在近东、中东和远东连绵不断的大陆上蠢笨地爬行，1878 年，它最后一次在近东遇到阻拦，1885 年，它又在中东受阻。如今在远东，正如 1892 年末的情况所表明的那样，俄国已经找到了以创纪录的速度不可遏止地飞奔向前的办法：西伯利亚铁路的平均建筑速度每年为五百八十七俄里，超越了一切先例，到 1895 年就已修成一千二百五十四俄里。② 这项工程所需的款项是由巴黎交易所贷给的，丝毫没有依赖伦敦和纽约的交易所。而英

① 参见H. B.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H.B.Morse,《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伦敦 1918 年版，第 3 卷，第 6—19 页。参见 1886—1894 年期间（各国）和朝鲜的贸易额变动的情况：中国从四十五万五千三百三十七美元上升到二百二十二万六千五百七十三美元，日本从二百五十万八千八百三十美元上升到五百六十九万七千六百三十三美元。在这些年中俄国的贸易额从一万四千二百四十三美元增长（!）到二十一万八千五百七十二美元（见《朝鲜概况》，财政部办公厅出版社，圣彼得堡 1900 年版，第 3 部分，附录，第 176—179 页）。

② 参见Э. Л. 格里姆：《1895—1914 年的中国问题》（《新东方》杂志，第 6 期，第 50 页）。

国，尤其是美国，他们在本国，尤其是在亚洲的边缘地区，都没有稍微可观的陆上力量，因此，他们都不可能对俄国的这一进展直接给予任何阻挡。只有日本，这个对登上大陆有切身利害关系的国家，10
才有可能企图在陆上对俄国“控制太平洋水域的一切国际商业活动”这一恶梦般的前景进行对抗。而要这样做，为时还不算晚。

八十年代在汉城发生了几次武装冲突，这是1894—1895年的中日战争的演习。这次战争就是日本想抢先登上大陆的一种尝试。[①] 正是这场战争以外在的方式系下了一个国际纽结，过了十年这一纽结才为《朴茨茅斯条约》解开。这场战争最终把远东问题纳入了欧洲列强世界政策问题的范围，并使大家都看清了这一点。在战争过程中出人意料地暴露了下面一些情况：第一，中国完全无力进行任何实际的军事抵抗，甚至在直接邻近本国京城的地方也是如此；第二，派出七万军队的日本具有不容争议的高度的战备；第三，日本政府的计划是极端大国主义的。这些计划的实质在于：(1) 在朝鲜脱离中国取得独立的幌子下，确立对朝鲜的保护权（亦即在将来侵占朝鲜）；(2) 在上海和广州之间的中国中部海岸建立一个大的军事基地，以保护对那里的经济渗透；(3) 通过侵占包括辽东半岛在内的全部南满海岸线来攫取满洲。[②]

日本在1895年春天和谈条件中提出的上述种种要求，把整个 11

① 军事行动是从1894年7月20日开始的。到1894年8月，西伯利亚铁路的临时通车还只能到鄂木斯克。

② 参见《中日马关条约》第一条和第二条〔载《远东事务的条约和外交文件汇编(1895—1905年)》，外交部出版社，圣彼得堡1906年版〕。日本所要求的福摩萨岛（即台湾。——译者）和澎湖列岛正位于福建省的对面。1898年，中国被迫向日本承担义务，保证不割让福建省；在1915年，又承诺不许他国人在福建建造船坞、加煤站、海军基地，并且不利用他国资本进行这些建设（见《外交部公报》，1915年第4册，第70页）。至于说到辽东，日本所要的不是租借，而是永久的割让，并且不仅是要后来租借给俄国的那个范围的辽东半岛，而是从鸭绿江口到凤凰城、海城和营口并包括这三个地方在内的全部土地。其中，如果日本占有了当时满洲的主要港口营口，那就能保证日本对满洲全境的经济控制。

欧洲乐队集合到了中国的"病榻"跟前，破坏了在中日战争开始时预定的列强协同一致进行干涉的前景。

从英国的观点看来，最不能接受的原来是第二项要求，这一条使日本得以进入主要是英国势力范围的中国中部。反之，从俄国的观点看来，日本这种向南和向海上的进展，具有直接的意义，因为它使英日两国相互对抗的利益纠葛远离在北方已粗具规模的俄国势力范围；而英国呢，在明知中国软弱无能的情况下，它在与俄国上述观点完全同样的程度上热衷于把日本阻留在朝鲜，在这里把日本和俄国拴在一起，并以此使日本在南方失去活动能力。至于俄国，它虽然觉得日本关于朝鲜"独立"的第一项要求是无可争议的(这是引起这场战争的最低纲领)，但它得要设法保障朝鲜的真正独立(不依附于日本)，即便是对朝鲜采取俄日双重保护的形式也好，因为特别在当时的国际局势下，朝鲜是不能独立生存的。俄国早已看中了朝鲜湾沿岸的一些合适港口，占领其中的某个口岸，便可能巩固俄国的这种保护权。

最后，日本的第三项(对满洲)要求，成了对英国最有吸引力的东西，因为这一要求将把日本无限期地牵制在北方。预先给日本以有效的手段，使它成为在满洲对抗俄国的不可摧毁的障碍，并且在这里把它喂得过饱，这应当成为英国从下面两个方面进行选择的决定性因素，即：英国是象金伯雷勋爵在战争初期所设想的那样保护中国使之免遭领土侵占呢（这种保护引起了英国在朝鲜主
12 权问题上对中国暗中的支持），还是对日本的强求不加反对；而英国更愿意做的是后者。

反之，对于俄国，正如维特在最后的时刻迫使尼古拉二世承认的那样，日本对南满的占领恰恰是不能容忍的，而且必将引起更大的牺牲。显然，当时维特已经看上了满洲。他把满洲看作是经营殖民事业必不可少的最近区域，它能够：(1)间接地补偿俄国为了

修筑过境铁路而已经负担和正在负担的巨额开支（其中一部分是法国贷款），(2)满足直接引入法国资本的意向。当时，维特大概正想把法国资本吸引到乌拉尔以东，以便繁荣西伯利亚各省，并且加固遭到贫困重压的俄罗斯帝国的欧洲基地，因为在1891年贫困使帝国的欧洲基地产生了新的裂痕。

1895年，列强的集团是这样确定的。美国从一开始就回避和别国共同行动，而只限于根据朝鲜本国的请求对东京和北京提出得体的劝告。英国在起初，当日本的条件尚不清楚时，曾准备与俄国一致行动，现在则明显地转到了日本一边，而只是当其他三大国坚决站在中国一边出面时，突然发生的情况才使英国处于消极的状态。日本的条件刚一宣布，俄国就准备立即对日作战，即使英国站在日本一边。俄国还建议德国和法国，以最后通牒的方式要求日本放弃满洲。德国在此以前只是寻求在远东占据某种地位的可能性，而这时它看出将来侵入远东有了一个方便的借口，于是便如此匆忙地和热心地将其舰队调来帮俄国政府的忙，连俄国政府对此都感到惊讶。法国一直摇摆不定，它观望着英国的动向，并且几乎要在最后时刻劝俄国满足于靠牺牲中国得到补偿，最后，为了不使俄国单独与德国接近，它还是站到了俄国一边。

就这样，俄国在1895年兵不血刃地取得了胜利。这个胜利还有一个反常的、至关重要的情况：为了能使中国偿付对日本的赔款（亦即武装日本反对俄国），俄国帮助中国在法国市场上借了一笔款项，并向法国资本家保证（中国）偿付债务利息。俄国的这一胜利使俄国政界的帝国主义精力异乎寻常地迸发出来了，从而更加深了俄国与日英两国的冲突。俄国在为满洲和朝鲜进行的竞争中挡住了日本，现在它又承认日本是与欧洲列强平等的国家。[①] 如

① 指1895年5月27日（6月8日）的俄日商务条约，条约的第十七条和十八条取消了俄国臣民在日本的治外法权。

同前面指出的，俄国正是在1895年使敷设西伯利亚铁路路基的工程加快到了狂热的程度，设立了华俄道胜银行（其中八分之五是法国资本），并且提出了建造穿越满洲的铁路以便连接伊尔库次克和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方案。1896年5月，正是在霍登惨剧[①]的那些日子里，俄国取得的胜利成果以条约的、法律的形式得到了体现。与中国结成同盟，以分期付款的办法对中国握有实权的官僚头目李鸿章实行个人收买，一系列的条约（这些条约保障了中国已经答应的俄国对中东铁路的所有权），十分显然，所有这一切认可了俄国在满洲的垄断统治，而且在发展前景上，保障了俄国进一步"不可避免地"侵入"中国内地"。[②]

对于朝鲜也是一样。起先按照俄、日均等的原则，在实际上确立了对朝鲜、对其军事和财政设施的保护权。但是到了第二年，
14 即1897年，5月的协定就被破坏了。朝鲜的财政顾问原先是英国人，后来换成了俄国人。俄国通过实际上是朝鲜王国财政大臣的财政顾问，使俄、日对等的保护权变成了俄国势力占优势。在蒙古也有类似的趋势，但没有那样明显的政治形式，其表现是：1897年6月成立了一个与华俄道胜银行具有最密切关系的特别的辛迪加，以经营蒙古的矿产资源。[③]

不论在满洲问题，或是在朝鲜问题上，俄国都力图对所取得的成果作更广泛的解释。政界刚刚通过外交途径阻止了外国在朝鲜建筑窄轨铁路，而坚持要用五英尺宽的轨道（照俄国的标准），就在1897年，政界又已经在讨论把尚未开工兴建的中东铁路干线"与

---

① 1896年5月18日沙皇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典礼时在莫斯科郊外霍登旷地发生的惨剧。沙皇政府以游艺和"御赐礼物"为饵，诱使五十万人聚集到九平方公里的霍登旷地，而又没有采取任何维护秩序、保障安全的措施，致使拥挤不堪，约两千人丧命，几万人变成残废。——译者

② 见本书第二章，边码第99—100页。

③ 1900年改组为蒙古土谢图汗盟和车臣汗盟矿业股份公司（蒙古矿业公司）。

黄海某个港口”连接起来的可能性了(务必用俄式轨道),然后又讨论了是否可能就这条往南的“暂时”只到奉天[①]的支线与中国开始谈判,指望这样自然会在整体上把问题预先确定下来。对于刚才列举的这一切方案和成果,俄国是用这样一种理论来加以掩饰的:由于1896年5月22日的同盟条约,(俄国)必须保护中国提防日本。但这并没有改变所发生的事情的本来性质:把中国瓜分为势力范围和利益范围的风潮开始了,并且迅速发展着,它和帝国主义在世界其余地方的活动交叉进行。英、德、美、法、俄,甚至意大利,正是在1897—1899年这几年中,争先恐后地力图占领据点,夺取合适的人力、原料和商品市场,有的国家是为了日后使用,有的则立即就要经营。[②]

这时,俄国和德国在远东取得了相对而言最大的成就。德国的 15
行动其实是两国皇帝事先已经谈定的(在德国占领胶州前不久,尼古拉二世向威廉二世表示,同意德国在中国沿岸占领某个港口)。德国在发展自己的殖民事业方面是大大落后了,它一上来就用武力闯入中国,并攫取了山东省最富饶的地方(为期九十九年)。[③]俄国的成就在最后的三年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它取得了旅顺口作为自己的海军基地,大连作为商港,还得到了两港所在的辽东半岛的土地。大家都能看到:(1)这意味着俄国已作出在满洲全境确立自己的绝对统治的强硬决定;(2)它使俄国的海军力量处于令人神往的临近北京的地方,并以此来支撑它与中国形

① 即沈阳。——译者

② 1897年,美国从西班牙手中夺取了夏威夷群岛;1898年,又吞并了古巴、波多黎各和菲律宾;1898—1899年英法由于中非的法绍达而发生冲突;1899—1902年,在南非发生了英布战争。对中国的侵占有:1897—1898年,德国占领了胶州和山东;1898年,俄国占领了辽东;同年,法国占领了广东省的广州湾,英国占领了威海卫和九龙半岛;最后,1898年,中国和日本签订了关于不割让福建的条约。

③ 1914年,日本占领了山东,后根据1921—1922年华盛顿会议的决议,山东归还中国。

式上未遭破坏的同盟。由于现已允许修筑从奉天到旅顺口的南满铁路，因此从外贝加尔和滨海地区出发的俄国第一梯队，在不过五、六天的时间内便可到达北京。

日本当时无力对正发生的事情进行阻拦，因此，当俄国（在朝鲜）的财政顾问离开了朝鲜，并且俄国表示同意"不妨碍"日朝之间"贸易和工业往来的发展"时，它就又只好感到满足了。俄国同时要求维持朝鲜的"独立"，双方对朝鲜的内部事务不得单独进行干涉〔1898年4月13日（4月25日）议定书〕。其时英国在很大程度上被非洲的事情缠住了，因此它甚至只好被迫承认整个中国北
16 部（长城以北）都是俄国修建铁路的特权范围，当俄国对扬子江①流域表示了于英国有利的认可时，英国也就心满意足了。最后，法国在总的瓜分中也没有放过自己的一份（广州湾），它只担心别让英国用贷款给中国的方法加强其势力，因此，它在中国事务中首先提出了关于国际贷款的问题。②

美国丝毫没有参加对中国的瓜分。前面已经提到，正是在这些年中，美国资本在本大陆以外为自己寻找出路和据点，暂时还只限于本大洋中的邻近岛屿。③正因为这样，美国为了保卫自己在中国的（商业）利益，对于因在中国划分不对他人开放的势力范围而可能引起的对商业自由和各国间平等权利的限制，这一次它就不能不出面表示反对了。1899年秋季，美国向刚刚捞到了这种"势力范围"的各大国提出建议，宣称，"在所谓势力范围和租借地的界限内"，要保持所有国家（其中也包括它自己在内）的完全平等的权利，从而第一次在实质上宣布了对中国实行的那个"门户开放"原则。此后，美国孜孜不倦地重复这一原则，而实际上，随着美

① 即长江。——译者

② 俄国大使1898年1月14日（26日）发自巴黎的电报，列宁格勒中央历史档案馆，财政部办公厅第51号卷，（2）。

③ 西班牙战争使美国花去了七亿七千六百万卢布。

国在世界范围内经济优势的不断增长，这一原则可能导致把“统一而完整”的中国变为纯粹的美国资本的“势力范围”。①

同年9月19日，美国交给英国政府一份更为坦率的照会，而英国政府，我们已经看到，它是没有可能对自己后起的竞争者的猛攻表示反对的。在这份照会中，美国国务卿海约翰直言不讳地宣称，“不论”根据1898年的各种条约“承认了任何国家在中华帝国 17
的任何省份内享有特权，或是对于任何省份享有控制权”，美国“绝不愿受其束缚”。他表示深信，只有门户开放政策，才能既使英国的、又使美国的资本集团“保持他们在中国市场的地位，并扩大其将来的活动”。②

早在1899年，在（对中国）实行瓜分的直接影响下，中国开始了反对欧洲人的义和团运动。它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聚集在皇太后周围的民族主义分子和反动分子所代表的中国政府的庇护。1900年春天，这一运动已经具有这样的性质，它直接威胁着欧洲人的生命，以及他们在华企业的安全。这就使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暂时联合起来，和共同的危险进行斗争，并且导致了对中国的野蛮镇压。这种镇压以国际间的法律形式在1901年9月7日的著名的《辛丑条约》③中得到反映，其中包括要求中国支付所谓“庚子赔款”④四亿五千万两（约六亿四千万卢布），偿付期限定为三十九年。

其时，俄国除了参加（列强）对北京的共同远征外，还派兵占领了满洲全境以保卫正在修筑中的铁路。它企图掩饰自己进一步

---

① 在前两年（1897—1898年）中，欧洲对美国贸易入超，付给美国十八亿九千七百三十万卢布。

② 见Э. Д. 格里姆：《“门户开放”主义和美国的对华政策（1899年至1921、1922年）》，载《国际生活》杂志，1924年第4、5期合刊，第114—115页。

③ 原文作《最后议定书》。——译者

④ 原文作“义和团赔款”。——译者

的帝国主义计划，并粉饰1900年的军事远征，就反复公开表示，它是在保卫中国政府反对革命运动。在(列强和中国)进行共同谈判的同时，俄国就缔结一项协议问题和李鸿章进行了单独谈判，这项协议将能保障俄国拥有经营满洲自然资源的垄断权，将允许俄国把铁路修到北京，并能使满洲实际上不驻扎中国的一兵一卒。不言而喻，这次谈判需要严守秘密，可是，它居然被对此事感到兴
18 趣的第三者得知了，并遭到了反对，谈判因此进展极慢，弄得很僵，导致了1902年1月英日同盟条约的签订。这时，俄国已经将满洲铁路在1900年所遭到的破坏全部修复，并在西伯利亚铁路全线开始了临时通车(通过贝加尔湖用轮渡，早在1900年的动员中就已证明这一办法是有效的)。英日的这一公开的条约对俄国是一个直接的警告，与此同时，美国又出来反对俄国在满洲的经济企求(1902年2月3日照会)，这两件事联系在一起，就迫使俄国和中国加速缔结关于俄军(在1903年9月前)全部撤离满洲的条约，这一条约于1902年3月26日签订。

1900年，俄国宣布了不寻求任何新的收获和利益的保守政策，1902年3月26日的条约形式上是这一政策胜利的确切体现。但这一条约乃至其附带条件（第二条，即条约只有在“其他大国的行动方式将不予妨碍”的条件下才生效)，事实上是俄国外交的一次失败。在国内陷入深重的社会经济危机的条件下，这一失败不单使满洲这个问题变得尖锐了；正是在1901—1903年间，国内的危机引起了群众性的农民和工人运动的爆发，从而标志着危机已经极端尖锐化。危机还使资产阶级的封建性的政府集团发生了分裂。在政府上层所发生的斗争不可避免地也要在俄国东方政策问题上表现出来，这一政策本来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这种斗争的内容之一，现在，它又成了斗争的舞台。满洲问题的解决，以及解决过程中的动摇，首先就反映了这种斗争(以尼古拉二世、普

列维和别佐勃拉佐夫派为一方反对维特)。从 1903 年初开始，这一斗争明显地倾向于主战派的胜利，在对外政策方面，主战派受到俄德结盟反对英国这一主张的鼓舞，而且看来在这一点上是得到 19
柏林支持的。

与此同时，为了在战前的最后岁月里在远东国际局势中维持外部的均势，整个国家机构内部的绝对稳定是必不可少的。在美国，人们(比如海约翰)清楚懂得，从美国伸给中国的援助之手，"对于可怜的中国人来说，还不如举在他们头上的(俄国的)大棒更有说服力"。但是，他们考虑，"我们(美国人)仍应运用我们的一切手段尽力而为"，在和中国关于开放满洲"口岸"的谈判中与日本携手并进，以便一旦战争爆发，就立即警告德国和法国，如果它们加以干涉，美国将不顾一切帮助日本。① 英国早在 1897 年就向日本提供了四千万卢布的贷款，1902年，英国又用同盟条约向日本保证，日本对俄国的战争将由两国单独进行，并保证保卫日本所有的海岸和交通线，从而千方百计地支持日本进行战争准备。在满洲问题上，英国没有提出令人厌烦的抗议，甚至口头上也不否认与俄国进行协商的主张，它相信，问题将会通过别的途径而得到顺利解决，② 因而采取了一种"观望和评论"的立场。③

德国只是等待有个机会，使俄国的武装力量远离西方边境而调往远东，并动摇法俄双边同盟这堵使其感到压抑的墙垣，以及在对自己更为有利的条件下，与俄国续订 1904 年即将期满的贸易条约。

① 见美国国务卿海约翰 1903 年 5 月 22 日的信，转引自 Э. Л. 格里姆的论文，载《国际生活》杂志，1924 年第 4、5 期合刊，第 118 页，并见泰勒·丹涅特：《罗斯福与日俄战争》(Tyler Dennett,《Roosevelt and the Russo-Japanese War》)，纽约 1925 年版，第 2 页。

② 兰斯多恩在与俄国公使谈话中作了这样的表示，见兰斯多恩 1903 年 8 月 12 日的电报，载英国《蓝皮书(中国，第 2 册)》，第 142 号。

③ 见前引丹涅特的著作，第 137 页。

最后，日本从1895年就开始广泛地、不间歇地进行战争准备。
20 当时，它在预算中还保存有1894年以前积攒起来的战争基金的一些余款，并由于得到中国1895年的赔款而使款项大增。早在1898年，日本就象是竭力想要出动武装力量反对俄国侵占辽东，1900年，日本派往中国参战的部队数量，又比其他各国都多。[①] 从1898年以来，日本始终没能在外交上使俄国承认它在朝鲜的既得地位，而现在，俄国又无拘无束地把辽阔的鸭绿江地区的森林租界变成了"(针对日本的)军事屏障"（正如别佐勃拉佐夫在他的战略方案中所说的)，这就把日本和满洲隔开了。日本清楚懂得，"在满洲确立俄国的最高权力等于日本在生存斗争中的失败"，而将来，随着俄国逐年逐月地深入满洲，俄国的敌人将更难对付它占有优势的抵抗力量。正是1903年夏季，中东铁路终于正式通车了，除了若干零星工程尚未完工外，当时只剩下了一项工程，即用贝加尔湖的环湖铁路来代替西伯利亚铁路的轮渡。这一障碍俄国是在军事行动开始以后才克服的。由于陆上与俄国面对面的仍然只有日本一国，那就必须立即进行战争，如果不整个地、一劳永逸地放弃1895年的纲领，而要为这一纲领去进行战争的话。

而在俄国，在当时既成的内部关系下，人们议论的话题是：经济上已经力不胜任、技术上又为时过早的军事紧张状态，是否会使革命"爆发出来"(维特、拉姆斯多尔弗的意见)，放弃旅顺口和南满全境是否更好一些，如有可能，将其卖给中国(库罗帕特金的意见)或是美国(苏鲍季奇的意见)，以上是一个方面的议论；另一方
21 面，有人则说，俄国是否需要打"一场小规模的胜仗"来为国内的政治危机寻找出路(普列维的意见)，而因此是否需要将1903年7月30日由日本开始的关于满洲和朝鲜问题的谈判拖延下去，同时自

① 参加1900年8月6日对北京的征讨的部队是：日本八千人，俄国四千八百人，英国三千人，美国二千一百人，法国八百人(见前引马士的著作，第268页)。

己则加速武装就绪，以保持在满洲的既得地位(别佐勃拉佐夫的意见)。如果按照3月26日关于撤出俄军的条约，并根据美国、英国和日本都接受的在满洲"门户开放"的纲领（假若俄国在撤兵以前同意这一纲领，或是在撤兵以后被迫同意)，那末，满洲问题的解决实际上就会使俄国在1895—1896年开始实行的计划的两种方案(或者直接吞并满洲，或把满洲变成一国垄断、与世隔绝、用税率来加以保护的市场)一齐化为泡影，并且排除了补偿所耗费的钱财的一切可能性。

别佐勃拉佐夫派说服了尼古拉二世，使他对这种预感到的失败没有善罢甘休。1903年8月，他们取得了彻底的胜利：维特辞职了。于是，他们着手：(1)采取一系列的军事措施，不将俄军撤出满洲，以备可能时吞并它；(2)在外国资本的帮助下组织对满洲的经济开发，以便使满洲脱离国家总的财政预算。1903年夏季，那些始终是沙皇亲信的人们，在重新设置的操纵远东事务的职位中吵吵嚷嚷地各得其所了。但是他们不想，或许是考虑不到直接掌握整个国家机器。然而，他们破坏了国家机构的正常职能，这就只为通过外交途径发动战争正式提供了方便。

日本动员了全付力量和资财，经过异常紧张的努力作好了充分的战争准备，便自然而然地要求实现1895年的整个马关计划；而俄国呢，正如后来战争经验所表明的，它的准备工作落后了两年。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俄国问题只能是：要么全部让出一切可能 22
的战略要地并放弃关于满洲的计划，要么为了满洲在明显不利的条件下接受战争。1903年春季俄国政府中互相冲突的双方在有一点上是一致的，即可能实现一个奇迹：一方认为，俄国"放弃对朝鲜的侵占图谋"，并不再在满洲取得新的特权（毕竟还可以有所添加)，这样就能在较为有利的时候到来以前避免由于满洲问题而发生战争(维特的意见)；另一方认为，只要在满洲和朝鲜的边境上表

示争取胜利、保卫满洲的决心，就能阻止敌人的出动(别佐勃拉佐夫的意见)。

这时，双方又一致认为，如果中国方面不作出补充的让步和保证，那末1902年3月26日的条约是无须履行的，而双方的分歧之点只是确定所希望的补充协定的内容问题(1903年6月在旅顺口举行的会议和同年8月的彼得堡会议)。但是，从阻止中国作出任何让步的英美日同盟的观点看来，[①] 问题却是清楚的：在条约规定的最后撤兵期限1903年9月26日(10月8日)以前，满洲在法律上是在俄国占领下而未归还中国的，而从上述日期起，中国就取得了它的全部权利。这一观点公开表现在下述事实中：就在1903年10月8日这同一天，美日两国分别与中国签订了商务条约，这两个条约为外国人"开放"了南满的两个港口安东[②]、大东沟(均在鸭绿江口)和奉天。而在背地里，日本正是从十月份开始，把它的专门军事基金花在使舰队进入战争状态方面，此事看来瞒过了俄国当局的耳目。

此后，日本继续与俄国进行谈判，没有在十月立即使其破裂，
23 而是在1904年1月才使谈判告吹，这一情况绝不意味着俄国在当时还有可能通过作出让步来防止战争，至于日本这样做的原因，则可以从日本战争动员的技术细节上找到解释。而此后在俄国，别佐勃拉佐夫习气充斥着整个政府机构，使它陷于四分五裂的状态，甚至破坏了它的功能。在这种情况下，对当时"和平"和"侵略"策略的拥护者所提出的主张，是没有可能坚持加以认真区分的。

到1903年11月，库罗帕特金提出了一个方案，即把整个南满卖给中国(!)，以换取将北满割让给俄国，承担实现这一计划的还

① 前引 T. 丹涅特的著作第118、115页，也是这样评述美国在日俄战争前的立场的。

② 即丹东。——译者

有维特；11月，巴拉绍夫又提议将满洲所有的中国官府都换成俄国的；别佐勃拉佐夫则主张剥夺北京政府租让满洲的权利；12月，别佐勃拉佐夫又考虑，必须立即和日本谈判结成同盟，以对抗英国和美国；而在战争已经爆发以后，按照满洲将是俄国的这种设想，根据惯例，在1904年1月至5月举行的伊格那季耶夫会议上，讨论了俄国当前的远东经济政策；到1904年9月，阿巴扎还凭空设想从日本得到赔款以获得财源的可能性，设想挑唆（已在辽阳战役以后）中国违反中立状态的可能手段，并以此劝说尼古拉二世，以便使战后吞并满洲"在外交上"更方便些（9月9日还给总督发出了谕令）。所有这一切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都是不切实际的，它表明俄国政府对已经牢固定形的国际局势既束手无策，又毫不理解，在这种国际局势下，俄国眼看就将在军事上表现出软弱无力；它还证明俄国的国内状况是走投无路的，表现在统治集团上层，热昏的胡话和麻木瘫痪的症状互相交替出现。

1895年，俄国不顾英国的态度，表示反对日本对大陆的渗透。1896年，它又取得了穿越满洲的铁路干线的租让权，同时还与中 24
国签订了针对日本的同盟条约，从而使这条干线的战略意义合法化。1898年，俄国占领了辽东，攫取了整个满洲的钥匙。1899年，它又使自己脱离了英国在中国的铁路竞争。1898—1901年间，俄国在与日本相邻的朝鲜寻求、取得并保持了租让权。1900年，俄国出兵占领了所有能控制满洲的地点，其中包括对外国人"开放"的地点（营口），然后，1901年，它又获得了开发这一地区任何资源的专属垄断权，并达到了以中国军队撤出满洲作为俄军撤离的先决条件的要求。1902年，俄国对在十八个月之内从满洲撤军表示了有条件（"如其他大国的行动方式将不予妨碍"）的同意，同时趁机坚决将一切可能取得的（直接取得或假借别的名义捞到的，得到北京同意或只是地方当局同意的）租让权集中到由国家

资金创办的满洲矿业公司的手中。1903 年，俄国拖延撤兵，并向中国建议谈判撤兵的补充条件；1903 年 9 月，它又和奥地利就巴尔干问题缔结了《缪尔茨士台哥协定》；最后，1903 年 10 月，它中断了和中国已经开始的谈判，停止从满洲撤军，同时把对远东事务的管理权交到了反英亲德的普列维、别佐勃拉佐夫、阿巴扎、阿列克谢耶夫一派的手中，而将维特排挤在外。综上所述，在欧洲本身的局势业已变化的情况下，俄国是在明显地和坚定不移地走向不仅与日本，而且与英国和美国发生冲突的道路。

1895 年，俄国曾与德国、法国在一起，实际上只反对日本一国，在外交上则只反对英国。而如今，日本在军事、财政和外交方面都作好了战争准备，法国在战争前夕坚定地站到了和英国一致行动的道路上，因此，分明谈不上法国会给予任何帮助。俄国在远东开始了战争，它的敌人的联合无比强大，而它的同盟却已陷于瘫痪。法国在1904 年 4 月向俄国提供了三亿五千万卢布的贷款，而就在 4 月，它和英国签订了一项协定，往后它就再也没有供给任何战争经费。俄国靠着德国的贷款又支撑了一些时候，在 1905 年 8 月，即在战争的第十九个月，结束了战争，因为当时它除了自己银行发行票券外，已经没有别的财源了。

II

1904—1905 年的日俄战争，不仅伴随着国内的革命动荡，而且俄国由于战争失败加入了帝国主义列强的一个世界集团。在国内，它使国家机构和政策较为有机地适应于地主资产阶级的需要和利益（6 月 3 日举行的杜马），并对借助于沙皇和部分借助于国务会议而仍然保持着影响的封建集团加以排斥，或实行某种限制。同时，它还导致了农民和工人运动（尽管运动局限于多么狭窄的范围之内）的团结，并把“沙皇的神话”的遗毒这种杂质从运动中肃清

了。早在战争进行过程中，国际间的组合就直接随着俄国在远东和欧洲的明显削弱而显现出来。俄国的削弱几乎两次导致俄德结成攻守同盟（一次在 1904 年 10 月，另一次在 1905 年 7 月）。第一，这种削弱保证了对德国有利的、只有到 1914 年才能修改的关税税则，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它使德国不但能在非洲的殖民区域、还能在近东放手地进行扩张。第二，它是促使 1904 年 4 月签订英法协定的最后动力，并有助于吸引英国的金融市场参加 1906 年对俄国的贷款，以弥补由于战争和革命造成的财政亏损。第三，它有助于俄英两国在 1907 年就波斯事务（关于势力范围问题）达成协定；另一方面，法国占有 1906 年的善后贷款的多半份额本身就巩固了法俄同盟，并立即成了以后协约国结合的基础。最后，从"门户开放"政策（正是为了实现这一政策，美国在 1903 年对满洲问题的解决进行了干预）的观点看来，日本在中国势力的相应加强，实际上在那里已经形成了第二个俄国，所不同的是，日本是个具有更大的现实威胁和更起劲的竞争者。俄国通过与日本的协定而成了协约国，这是俄国在欧洲所处地位的一种派生情况。

俄日两国在朴茨茅斯的谈判是由美国提议和操纵的。举行谈判的时刻的选择，谈判发展方向的确定，都是为了使俄日两国在东方处于一种相互对抗和在陆上紧密接触的状态中。谈判导致了在两国间瓜分萨哈林岛和满洲，俄国在满洲保留了中东铁路的全部干线、铁路沿线的狭长地带，以及南满支线的小段线路（从哈尔滨到宽城子[①]站），而南满支线的其余部分则转归日本所有。

自然，这样也就确定了两国的势力范围。南满是一块大有希望、物产富庶的地方，它有蕴藏丰富的抚顺煤矿和极好的商港大连。如今，南满归了日本，整个满洲的钥匙也就交到了日本手中，并且非同寻常地增加了日本在全中国的良机。俄国分得了北满和铁

① 即长春。——译者

路线。铁路在任何一处都能遭到袭击并被切断，因此，为了经营铁路，每年都要花费几百万的津贴费，同时还要维持人数众多的护路军，并为附属地带的民事管理耗费钱财。加之在这一地带，哈尔滨
27 等一系列地方已由中国“开放”，供外国人自由通商和居住，这些外国人一直到 1914 年都认为自己是享有治外法权的，并坚决拒绝负担管理费用。①

诚然，1907 年的一系列协定使俄日关系转向表面上的亲善，但在初期仍然不能忽视，一旦关系破裂，俄国实际上是无力给予最微小的抵抗的。可以说，俄国舰队在远东已完全不复存在(“太平洋力量”)。战时虽曾组成了约有十三万士兵的陆军部队，但由于 1907 年发现了四千万到五千万的财政赤字（单是抵消赎金一项就是三千五百万卢布），因此只好放弃用以维持那支陆军部队的拨款。符拉迪沃斯托克已经成了东西伯利亚的唯一出海口，可是它的状况也完全没有保障。② 况且和约正式规定，俄国只能将中东铁路用于商业目的。

这样，早在第一届杜马时代，关于在俄国领土上修筑弯曲的阿穆尔铁路的问题自然就提上了日程。这条铁路因有阿穆尔河而能免遭直接的攻击，还能从战略上保障滨海省和阿穆尔省。否则，一旦中东铁路的交通中断，这两个省就会与俄国的其余部分完全隔
28 绝，并且既能遭到中国人从满洲方面的攻击，又会遭到日本人从朝

---

① 1905 年 12 月 9 日（22日）中日条约附约的第一条规定，哈尔滨和满洲其他一些地方对外国人“开放”（«远东事务的条约和外交文件汇编»，外交部出版社，圣彼得堡 1906 年版，第 756 页）。俄英两国之间关于英国臣民在中东铁路的附属地段内遵守俄国的规章和义务的协定订于 1914 年 4 月 17 日(30 日)，并于同年 11 月 20 日(12 月 3 日)生效(见«外交部公报»，1915 年，第 2 册，第 1—10 页。和法国的类似的协定订于 1914 年 1 月 30 日(2 月 12 日)(同上，1914 年，第 3 册，第 39—40 页)。

② 如参阅科科夫佐夫 1906 年 9 月 6 日和 11 月 14 日给斯托雷平的两封信（我发表在名为«俄国财政与欧洲交易所(1904—1906 年)»的资料集中），中央档案馆 1925 年版，第 222 号和 227 号。

鲜方面的侵袭。但是阿穆尔铁路既然是远东军事规划的一个组成部分，根据刚刚结束的战争的经验，也就必然要敷设西伯利亚干线的第二条轨道。1908 年 6 月，在将兴建这条铁路的方案提交杜马审议之前，曾对这项规划作了大致的估计，据计算，截止完成整个规划的最终期限 1912 年，大约共需四亿卢布。

然而，在制订这一规划的 1906 —1908 年间，俄国的经济和财政状况却是困难到了极点。这几年中，国家还没有摆脱工业的萧条，而农业的连年歉收又使国内的货币市场处于紧张状态，这样就必得从别处寻觅新的财源，其中包括在法国市场以外探索基地。因为法国人在最近给了一笔空前巨额（面值八亿卢布）的贷款的同时，责成俄国人至少在两年内不再借债。而 1904 年所借的法国军事贷款这笔三亿五千万卢布的短期债务1909年行将到期，因此，1908 年底俄国势必向法国重新借钱，首先就必须以此来偿付上面这笔债务。由此可见，在一场导致经济破产的战争以后，远东又一次首先以铁路事业的形式成为俄罗斯中部的包袱，并使国家在多年内不能用国库资金在国内建筑任何别的铁路。①

在这种情况下，满洲问题本身在朴茨茅斯条约以后就地域而言回到了 1896—1898 年最初阶段的范围，但这一问题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现在却截然不同了，而且须在大为复杂的形势下予以解决。中东铁路依旧是它的中心问题。但只是在这一点上有形式上的类同。而在别的方面，整个局势根本改变了。铁路作为俄、中结盟对 29
抗日本的工具的战略意义完全丧失了，这不仅是由于《朴茨茅斯条约》第七条正式规定了这一义务，而且同盟本身已经解体了。

中国正在进入民族革命复兴的时期，它对俄国的衰落看得非常清楚，并在寻找借口以便尽可能缩小俄国在满洲的作用。俄国如今正必须和这样的中国打交道。一些广阔的前景，即从铁路干

① 见财政大臣 1908 年 3 月 6 日给国务会议的报告。

线必然分出许多支线“到中国内地”去，并发展铁路的法律地位等，已经烟消云散，而代替这些前景的，却是必须实行完全符合契约和章程字义的保守的和防御的政策。过去议论的是俄国居民将稠密地居住在铁路的附属地带，而现在则不得不考虑那日益高涨的中国人的移民浪潮了，因为一旦发生纠葛，这对于铁路的所有权本身就是一种危险。现在再来谈论恢复过去的“爱好和平”的政策和“独立于其他国家”的政策，那简直是一种空想。①

国内总的政治形势动荡不定（至少在 1907 年 6 月 3 日前），上面指出的财政前景又是那样暗淡（在1909 年预算年度以前），由于要在 1906 年和 1907 年分别与法国和英国签订协定，俄国又必须将衰弱的外交精力全部集中于西线，在这种情况下，在远东就必须回答一个问题：我们“是否留在”那里？如果是，那依靠谁？或是“离开”？“离开”，这并不意味着别的什么，而只是意味着不再继续拥有中东铁路（这是在中国领土上还留在我们手中随时都能引起国际冲突的唯一东西），亦即让中国政府先期将路赎回。现有的材料说明，正是从俄国方面作出的这一建议当然不是针对中国而言的，因为中国毫无赎路的资金。这项建议是 1908 年向美国银行团提出的，1909 年，俄国政府通过美国大使很快得到了正式的回音。美国的方案不仅是为了减轻俄国处境的困难，而且旨在限制“日本的进一步侵占”。美国提议，成立一个国际的银行辛迪加，贷款给中国，使它将所有满洲的铁路都赎归国有，辛迪加则保留有监督与使用权。然后，美国政府又向有关双方发出了一个同样内容的书面备忘录（即所谓《诺克斯方案》）。

1910 年 1 月 8 日，俄国婉言回绝了这个方案，这就意味着，俄

① 见尼古拉二世在璞科第 1906 年 4 月 29 日（5 月 12 日）电报上的批示：“在中国我们不应把自己的利益和西欧国家的利益等同起来。应该力求继续 1898 年以前我们的政策，亦即爱好和平地并独立于其他国家地行动”（莫斯科革命和外交政策档案馆，外交大臣 1906 年的奏折）。

国在美国与日本之间作出了有利于日本的选择。美国早在日俄战争时，就表示愿意对日本的任何“正当”要求给予“一切可能的支持”，同时承认了日本对朝鲜和辽东半岛的权利，但又认为日本必须将满洲归还中国，必须忠实于它的“门户开放”政策。① 但就在当时(1905 年 3 月)，也已经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将来俄国和日本都不能逾越的最好障碍”，是在国际保证下将满洲的铁路交还中国。② 有迹象表明，美国当时就注意到了日本在获胜以后急剧发展的扩张危险。

不久前在罗斯福的手稿中找到的1 905 年 7 月 31 日关于菲律宾问题的备忘录就是一个例证。罗斯福干涉朴茨茅斯谈判、反对 31
日本人勒索赔款的要求，也正具有这种涵义。日本人的要求倘若得到满足，和约确定的相对均势便会急剧改变。美国在和约签订后，于 1905 和 1906 年两次就出售中东铁路南满支线的问题向日本人提出重复的建议，其用意也在于此。③

日本一概拒绝了美国的上述两次建议，并且既在朝鲜、又在南满狂热地、匆忙地进行战略和经济两方面的活动，这就不仅使俄国感到恐慌，而且同样使美国受到震惊。1908 年夏季，美国舰队举行了示威，日本仿佛是作为对这一行动的回答，保证说，它在太平洋地区和在中国的政策原则与美国的政策是完全一致的 (1908 年 11 月 30 日罗得—高平换文)，④ 但这项保证绝没有妨碍日本加速实现其在满洲的铁路和工业规划，它甚至不惜采用以最后通谍威胁中国的手段 (1909 年 8 月达成了关于安奉铁路的协定和抚

① 见前引丹涅特的著作，第 161、178 和 179 页。

② 见同上，第 157 页。这个意思是由美国驻北京公使康格表示的。

③ 同上，第 112—114 页。关于美国提出的赎回南满支线的建议，见佩森·J·特里特：«日本和美国 (1853—1921 年)» (Payson J. Treat,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1851—1921»)，1921 年版，第 190—191 页。

④ 见马克谟：«与中国签订的及有关中国的条约和协定»(Mc. Murray,«Treaties and Agreements»)，第 1 卷，第 769 页。

顺、烟台[1]两煤矿的协定)。上面提到的美国大使致彼得堡的建议[2]是尖锐地正式针对日本的，但是，这一提议总共只在几分钟内就被日本大使的更确定和对俄国更有诱惑力的提议所完全压倒了，此事或许可以表示出日美两国间在满洲问题上产生的全部紧张状态。日本大使的建议从实质上排除了美国关于满洲"商业中立化"的方案，主张以"正式的同盟"来保障双方在满洲的利益，因为在满洲"只有俄国和日本付出了金钱和鲜血"。

俄国这时已经得知，1908 年商定的法国贷款的数额除了偿还
32 旧债以外还有一亿卢布的余额，于是便决定从速修筑阿穆尔铁路，也不再出售中东铁路，而且这时获得了 1905 年以来的第一个丰收年。日本的建议保证了俄日两国在边境全线平安无事，又使俄国可以放手去对付中国，因此对俄国来说，拒绝这样的提议甚至是要冒风险的。于是，1910 年 6 月 21 日(7 月 4 日)俄国就划分在满洲的势力范围和彼此保卫在满洲的利益问题，与日本签订了一项秘密协定。[3]

这就意味着，俄国远不是以一种消极的身份"回到"远东的，而是和一个大国进行了纯属侵略性的结合，这个国家公开宣称，它准备瓜分中国，因为它"不相信中国的复兴"。在《朴茨茅斯条约》签订之后，俄国在蒙古和满洲的条约权利被中国政府轻而易举地破坏了。俄国为了恢复自己的这些权利，并重订 1881 年在彼得堡订立的基本商务条约[4](条约的第二个十年期限将满)，它就对自己

---

① 辽阳东北一矿区，非指山东烟台。——译者。

② 即《诺克斯方案》。——译者

③ 1910 年 6 月 21 日(7 月 4 日)的秘密协定发表在 A．M．扎伊昂奇科夫斯基的《俄国在国际方面对世界战争的准备》，莫斯科 1926 年版，第 370 页。同一天的公开协定见于 A．Д．格里姆：《远东国际关系史的条约和其他文件汇编 (1842—1925 年)》，莫斯科 1927 年版，第 176 页。

④ 即《改订条约》和《改订陆路通商章程》，见《光绪条约》，第 5 卷，第 15 页及以下各页。——译者

的力量作了第一次试验，并获得了成功。1911 年 11 月 30 日，俄国就上述内容向中国提出了最后通牒式的要求，中国人对此被迫作出了令人满意的答复。最后，俄国在 1910 年的协定中找到了国际上解决满洲问题的方式，使俄国在远东的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稳定和明确。

以后，帝国主义列强在世界范围内的关系就愈加复杂，愈加紧张了。这使俄国的上述地位（在俄日之间，在满洲和蒙古明确划分的范围内）变得更确定、更单纯了。英日协定于 1911 年第三次重订，这只是巩固了俄国的这种地位，并证实日本是倒向协约国一边的。这项协定在各种问题上（其中包括完全了结与 1904—1905 年 33
的战争有关的要求），与俄日之间的一系列协定是相吻合的。在 1911 年中国变革的前后，美国试图成立一个银行团来经办给中国的"善后"贷款，并确立对这一"独立"国家行政管理的监督。它企图通过这样的途径在财政方面使全中国"国际化"，并在这一旗号下将监督政策也在满洲加以推行。但是美国的图谋却毫无结果，因为法国和英国由于当时的事态不得不考虑到自己的盟国——日本和俄国的抗议和要求。而鉴于这一情况，美国自己也只好在列强破坏中国的"行政独立"（）的借口下，放弃了自己的图谋，以等待更好的时机。① 尽管 1911 年在中国兴起的民族革命运动非同小可，但在这些年中，帝国主义机体的主轴是在中欧和近东旋转，这一点是清楚的，那里零星爆发的火花正在燃成世界性的烈火。

1910 年 6 月 21 日的秘密协定，还不是 1909 年 11 月本野和伊兹沃利斯基曾经谈到的"正式同盟"。但正是这项协定，而不是

---

① 见前引格里姆的学术著作，载《国际生活》杂志，1924 年第 4、5 期合刊，第 125 页。

《朴茨茅斯条约》，为俄国解决了满洲问题。要解决满洲问题，根据问题的政治、地理性质，要求双方结盟反对第三者，这一点在1895年和现在是一样的。日本为在中国大陆的北部站稳脚跟，并为自己大陆政策的长远发展建立一个基地，已经经营了十五年。在1910年以前，日本不仅正式占有了朝鲜，并且把整个朝鲜都变成了一座军用仓库和军营。这样，从日本列岛上轻装渡海的百万大军，便可指望立即得到安置和装备。

日本在这样的条件下建议与俄国结盟，显然是在为等待一场
34 世界性的冲突而积蓄力量，这场冲突将能使它在中国全境放开手脚去干，对于从贝加尔湖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全线上的可怜的俄国兵力，只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在任何时刻轻而易举地予以"歼灭"（在6月的专约缔结以前，人们便是这样考虑的）。[①] 因此，日本根本没有把它放在心上。可见，和俄国结盟现在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何况，诺克斯方案的失败绝没有使美国放弃渗入俄日两国势力范围的企图，或是用上面提到过的财政监督的方法，或是通过建筑铁路支线（一条是锦州经瑷珲至布拉戈维申斯克[②]另一条是北京经张家口、库伦至恰克图）的途径。美国的这些表示使6月的协定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

中国革命的离心倾向是缔约双方预先估计到了的，这一革命使得作为6月协定基础的那些原则有了进一步发展的理由。1912年，中国变成了共和国，蒙古这时是容易脱离中国而独立的。于是当时立即签订了一项正是关于蒙古的秘密协定，把蒙古西部（或称外蒙古）作为俄国的势力范围，而将蒙古东部（或称内蒙古）归于

---

① 见第178号卷，冯·戈伊叶尔1908年8月19日（9月1日）的报告："在目前形势下，俄日之间不可能有战争，而只可能是俄国军队横遭杀戮。"

② 即海兰泡。——译者

日本。①

1914年的世界大战在政治上，并且很大程度也在经济上，使 35
一切参战的欧洲人在远东都无能为力了，从而让中国落入了日本和美国的摆布之中。日本依仗着自己参国的权利，用武力将德国赶出了山东，并在占领山东后，向中国提出了一系列要求(«二十一条»)，旨在对中国实行进一步瓜分，并破坏了中国的"独立"与"完整"。② 美国对此事的回答是：它向中国和日本表示，对于中国所承担的义务，凡与不侵犯中国的政策和门户开放政策相违背者，美国一概不予承认。但事实上，美国却不能阻止日本去实现新的侵占。③ 日本和俄国缔结了新的秘密协定，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美国这一毕竟具有威胁性的表示的一种答复。这项协定的内容是：对于蓄谋在中国建立"政治统治"、"对俄国和日本抱有敌意的"任何国家，日俄两国互相提供武装援助予以反对。④

就这样，两个大国在世界大战后的一个时期初步形成了一个富有威胁性的同盟，它在中国领土上在军事方面是无可匹敌的。

① 1912年秘密协定的草案条文见西贝特：«战前协约国政策的外交史料» (Siebert,«Diplomatische Aktenstucke zur Geschichte der Ententepolitik der Vorkriegsjahre»),柏林1925年版,第288—289页。1912年10月21日(11月3日)俄国和蒙古的协定(即«俄蒙商务专约»——译者)见于«外交部公报»,1913年,第1册,第46页及以下各页,和第2册,第6页及以下各页。接着,俄中两国于1913年10月23日(11月5日)订立了关于承认外蒙自治权的协定(即«中俄声明文件»——译者)(«外交部公报»,1914年,第1册,第15页及以下各页)。俄中蒙关于该问题的三国协定(即«中俄蒙协约»——译者)签订于1915年5月15日(见同上,1915年,第5册,第6页及以下各页)。1912年8月23日—1913年9月2日关于蒙古事务的外交函件载于«外交部公报»,1914年,第2册附录。1914年9月17日俄国与库伦政府关于蒙古铁路问题的协定载于同上公报,1915年,第1册,第1页及以下各页。

② «二十一条»载于«外交部公报»,1915年,第3册,第95页及以下各页。1915年5月26日中日的一系列协定载于«外交部公报»,1915年,第4册,第57页及以下各页。

③ 见前引格里姆的文章,第126—127页。

④ 1916年6月20日(7月3日)的秘密协定见于人民外交委员部出版的«旧俄外交部档案秘密条约集刊»,第1期,第5页及以下各页。

但在二月革命后，俄日同盟动摇了，临时政府走上了向当时的盟国美国借债的道路。如同所有其他俄国革命前的国际法律关系一样，俄日同盟于 1917 年 10 月宣告解体。

*　　*　　*

1924 年 5 月 31 日，苏中两国签订了政治条约。根据这一条约，苏联放弃了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放弃了在九十年代和二十世纪中所取得的各种租让权以及“庚子赔款”，同意和中国共同管
36 理中东铁路，并撤出驻蒙古的红军。1925 年 1 月 20 日，在日本长期占领滨海地区和萨哈林地区以后，以完全恢复苏联对该两地的领土主权为基础，达成了苏日条约。随着这两个条约的缔结，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已经正式出现在远东的国际斗争舞台上，它坚决反对美国通过银行团使中国“国际化”的政策，也同样反对欧洲、日本的“势力范围”政策。苏联的政策是完全依据中国劳动群众的切身利益的，它和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政策实行了根本的决裂。但这已经是另外一个课题了。

第一章

满洲问题的由来

(1892—1895年)

I

1903年秋季，俄国坚持不愿撤出满洲。这件事看来已经使人毫不怀疑，对日的军事冲突在所难免，迫在眉睫。这时，陆军大臣库罗帕特金提出了一个解决满洲问题的“折衷”方案。这个方案“既能同中国、又能同日本恢复友好关系”，而且“不仅能给俄国事务，还能给全世界事务”带来“安宁”。库罗帕特金在11月23日呈给尼古拉二世的奏疏中建议，“将包括旅顺口和大连的关东还给中国，将中东铁路南满支线交给中国，交换条件是：从中国取得对北满的权利，此外，得到二亿五千万卢布作为偿还俄国建设铁路和旅顺口的费用。”①

这一奏疏的副本除了沙皇外只送给了三个人：当时在旅顺口担任总督职务的阿列克谢耶夫，勉勉强强充任外交大臣的拉姆斯多尔弗和已经失宠四个月，不再管事的维特。这一例行的冗长奏疏在尼古拉那里却似石沉大海，因为关于此事库罗帕特金在日记中丝毫没有提到，而往常碰到这类事情，他总是要确切地记上日记 38
的。关于从满洲撤兵的一切谈判刚刚在公历10月7日与中国破

① 见《库罗帕特金将军关于日俄战争的札记。战争的总结》，柏林，I. 拉迪施尼科夫(Berlin, I. Ladyschnikoff)1909年版，第173和174页。关东即辽东。

裂，如今又要把远东的总督府卖给中国，这样的想法在阿列克谢耶夫看来只能是无稽之谈。库罗帕特金的提议于是归于枉然。据我们所知，库罗帕特金不论在以后的报告中，或是在军事行动开始前两个月不止一次举行的会议上，都没有再寻找机会重提这一建议。

确实，库罗帕特金的建议的作者并不完全是他自己。如果说，关于兼并北满的必要性这一想法他在以前也曾多次阐述过，那末，关于用包括辽东在内的整个南部来进行交换的主张在他这儿还是第一次出现，而且，十分可能，这一主张是从他 1903 年 10 月收到的苏鲍季奇将军的一封信[①] 中借用来的。这封信是一个内容详尽、并且贯穿着内在一致性的方案。苏鲍季奇的这一思想是从他关于俄国在远东，包括在满洲的地位的总概念中有机地引出来的。

他真诚地认为：(1)对满洲和朝鲜天然的殖民压迫来自中国和日本方面，俄国在那里进行殖民统治的可能性相对而言是微不足道的，而要在那里对抗黄种人的殖民化，俄国“简直没有可能”；(2)俄国作为一个大陆国家，“拥有占地球六分之一的连成一片的辽阔土地”，它甚至没有能力再占有殖民地，既然俄国在太平洋已有冻冰期不长于彼得堡港和喀琅施塔得港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港，也就不需要一个“不冻港”作为太平洋的任何特别的“出海口”了；(3)可见，俄国甚至不能希望在此取得海军的什么优势并发展“世
39 界政策”，为了这个政策，在最近十年中已经花费了“不少于十亿卢布”，而如今，在 1903 年 10 月，“战争已迫在眉睫”，为了保持军事力量的战备，每天都要花费二十万卢布的“赔款”；(4)这种状况是在 1895 年形成的。原先，俄国担心乌苏里铁路过于逼近满洲边界，而在 1895 年却发生了急剧的转变，认为可能使铁路“一千五百

① 见Д. И. 苏鲍季奇：《阿穆尔铁路和我们的远东政策》，彼得堡 1908 年版，第 19—32 页。

俄里长的一段在离开阿穆尔河俄国一岸四、五百俄里的满洲土地上笔直地”“没有阻碍地”通过。苏鲍季奇由此为俄国得出了“一个实际的结论”——“结束自己在满洲的事业”。

然而，我们在最近这五、六年中已经走得这样远了，以致“当前已没有可能如愿地完全”实现这种结束，这对苏鲍季奇说来是“遗憾的事”。但苏鲍季奇认为，库罗帕特金这时取之于他的以南满交换北满的主张则是完全可行的。只是苏鲍季奇在此没有提到要给俄国任何补贴。

我们看到，两位将军是从不同的两端接近于同一个想法的。一个为让价过低而遗憾，另一个却满意地认为，所能保持的正是应该保持的东西，甚至还多得了一点差额。但是，在面对战争直接威胁的此刻，他们两人也可算是志同道合了。

秘密奏疏的另外两位读者也完全赞同苏鲍季奇、库罗帕特金的方案，这完全是出乎意料的。奏疏的作者是早就主张吞并北满的，而这两位读者在此刻以前却坚持认为，在占领了辽东半岛以后对中国领土的任何吞并都是既不能容许，又没有可能的事。维特对库罗帕特金说，“要是在一年前(即 1902 年秋季)，他会反对(奏疏中)所建议的解决办法，而如今，在做了种种尝试以后，除了所建议的办法，即用让出南满和关东省的代价来保留俄国对北满的权 40
利，他认为没有别的出路能使我们摆脱业已陷入的困难的、不确定的处境。假如皇上愿意，他维特可以去说服拉姆斯多尔弗伯爵，使他相信这一解决办法是必要的”。① 但是，劝说拉姆斯多尔弗是不必要的。原来，他“欣喜地读完了……奏疏……，这一计划如能采纳，他将感到十分高兴”。② 而维特则“会着手使(奏疏中)所说的偿付南满支线和关东建筑费用的二亿五千万卢布兑现，并且完

① 见《库罗帕特金日记》，1903 年 12 月 3 日所记(《红档》杂志，第 2 卷，第 91 页)。
② 见同上，12 月 11 日所记，第 93 页。

全同意将这笔钱用在远东的建设事业上。那就将会收到巨大的成果”。①

在此不应忘记，维特和拉姆斯多尔弗是作出了双重让步的。他们不仅同意了吞并北满，而且(另一不亚于此的让步是)答应放弃在南满所取得的一切。其实，就在一年前，当这后一种主张看来是在最上层人士中寻求认可时，他们一齐使这一主张归于失败。从满洲撤兵的条约公布后不久，1902 年 5 月，罗津塔利的柏林印书馆就出版了一本题为《满洲问题。奉献给 C.Ю.维特》的小册子，书的纸张很考究，而且总共只印了二十五本。维特得到或搞到了一本，并把书转交给了拉姆斯多尔弗。拉姆斯多尔弗吩咐对该书写出一份反驳书，并将它呈给了沙皇。书的作者以字母 Z 署名，即便不打算揭穿这一笔名，也仍然可以料想，小册子的目的是为了攻击维特、拉姆斯多尔弗的政策，但不是在大庭广众面前，而是在窄小的上层中，同时，作者在这上层中是不乏其靠山的。否则就很难解释，为什么两位与本书有关的被触犯的大臣对小册子如此重视，何况，小册子的实际结论分明是尼古拉所不能接受的。这些实
41 际结论归结为：(1)俄国放弃旅顺口；(2)在斯列坚斯克和布拉戈维申斯克之间敷设西伯利亚铁路的连接线，并且从中国合并被新铁路线截下的满洲最北部分，通过这种办法，“把满洲铁路从战略性的变成纯粹的商业性的铁路”；(3)把中东铁路干线及其南满支线统统卖给中国。那时，俄国“就能一举回到与中国和平、友好相处的传统道路上，……而在存在着满洲问题的情况下，这一道路是不可思议的”。

然而，这本故意写得心平气和、分寸得当的小册子的全部毒素和危险性并不是这些结论，而是在于：(1)作者恰恰不认为这些结论是“绝对正确的”，也不坚持这些结论；(2)他认为自己进行抨击

① 见《库罗帕特金日记》，12 月 11 日所记，第 91 页。

的基本前提具有主要的意义，他认为从这些前提中还可能引出别的“实际”结论。作者指出，1902年3月26日关于从满洲撤兵的条约的基本缺点在于，这一条约本身并没有解决满洲问题，而由于俄中两种政权和两种武装力量在满洲同时并存，从而永远为国际纠葛大开了方便之门，尤其因为两条铁路“与其说是商业性的，不如说是军事—战略性的”，因此俄中两种政权和两种武装力量之间的“不断冲突”是在所难免的。

3月26日的条约机械地使满洲问题回复到了1900年以前的原状。但在实质上，它完全没有考虑到由于英日同盟而发生变化的国际形势，这种形势使中国得到“经常与我们势不两立的敌人的暗中支持”。编写者把自己的小册子奉献给维特，把维特当作“满洲问题的作者”，是他给了“满洲问题以第一个推动力”（“1896年关于满洲铁路问题的合同是阁下个人的事业”）。同时，“如果3月26日的条约是深思熟虑和坚定不移的行动计划的第一步”，那末编写者同意“收回所说的一切”。否则，就只好从下列两种办法中选择一种：要么“从中国得到满洲的大部分，要么放弃修筑穿过别国领土的战略铁路的冒险做法，这些线路是需要有不可胜数的军队来进行保卫的”。

尼古拉觉得拉姆斯多尔弗的反驳书是一个“绝妙的回答”。反驳书是用对匿名作者的无知进行宽容的揭露的文风写成的。官方的声明和照会学究式地、并非总是文题相符地反复宣称俄国政策的大公无私、“它始终不渝的友善态度”以及中国对它的相反态度，这份反驳书无非是这些声明和照会的老调重弹而已。拉姆斯多尔弗关于旅顺口的回答也是这种文体的一个典型。“小册子的作者认为，占领旅顺口是一个轻率的步骤。对此可以这样反驳：如今，在招致牺牲之后再归还旅顺口，这当然会是比对它的占领更其轻率的步骤。‘轻率的步骤’是言之过轻了。在俄国花费了许多百万

卢布而现在取得了收获的情况下再来奉还旅顺口，这简直是丧尽了理智。只有对远东事务状况一无所知的人才会提出这种解决办法”。①

现在，1903 年 11 月，维特也不得不“丧尽理智”地行事了。他就象遇见自己影子一般，总是不可避免地遇到这同一个问题：放弃辽东的主张。这个问题使他想起关于让西伯利亚铁路穿过满洲从而将线路展直的最初决定。维特在 12 月 2 日和库罗帕特金的谈话中，“他当然（对库罗帕特金）表示异议，并且证明，认为占领旅顺口是根据维特的提议修筑穿过北满的铁路干线的结果，这种意见是错误的”。② 仿佛人家不愿听懂他的话，他又以自己特有的尖刻方式解释说：“您想一想，我把自己的客人引到了水族馆，而他们却喝
43 醉了酒，闯进了妓院，并在那里做出了丑事。难道这也是我的过错？我想到水族馆为止。是别人拉着跑远了。”

谈话双方之一的库罗帕特金在 1903 年预计，要在行将爆发的战争中得胜，这桩“丑事”的代价是七亿至八亿卢布的直接军事费用。③ 而维特在 1909 年关于这些费用已能举出二十五亿的数目。④ 据另一个更晚的统计，包括战争期间借款和战后善后借款的偿付在内，这一数目增加到了七十亿卢布。⑤ 但早在战前很久，不管“丑事”如何，交谈双方便已清楚认识到，在“水族馆”散步本身就需要付出巨大的牺牲。早在 1901 年，库罗帕特金就（向波洛夫佐

---

① 见第 105 号卷，外交部草拟的奏疏《对〈满洲问题〉一书的反驳书》。奏疏原件曾由拉姆斯多尔弗送给维特，那本小册子亦同时送还。奏疏上有尼古拉的批语：“绝妙的回答”，所署的日子是 1902 年 7 月 19 日。

② 见《库罗帕特金日记》，1903 年 12 月 3 日所记（《红档》杂志，第 2 卷，第 91 页）。

③ 见 С. Ю. 维特：《不得已的说明（奉答侍从将军库罗帕特金关于对日战争的总结）》，莫斯科 1911 年版，第 48 页。

④ 见同上。维特早在 1909 年就已写好这本小册子，但直到 1911 年才获准付印。

⑤ 见 Г. Д. 杰缅季耶夫：《关于国库在对日战事中的支出情况。根据国家监察机关的报告和财政部的资料所作的统计研究》，彼得堡 1917 年版，第 34 页。

夫)抱怨说,"我们在东方的行动现已使我们花去八亿多卢布,而这种无休无止的开销还远未到头呢"。① 维特在当时也曾说过,"中国问题的复杂化使我们迄今为止花费了十亿卢布","继续这种蠢事已不可能:俄国再朝这条路走下去,那末,不论在财政上还是政治上,它都在走向破产"。② 维特在 1903 年认为,这十亿卢布"削弱了俄国的欧洲部分",但他这时还"不相信,倘若我们不花这笔钱,情况便会好些",然后,他又和库罗帕特金一起,就"缩减在远东的费用"的必要性向沙皇作了报告。③

关于远东不成比例地从帝国其他部分吮吸精华这一点,实质 44
上并没有不同意见。这一思想在维特右边的敌人别佐勃拉佐夫一伙的嘴里,甚至成了反对他的论据。例如,他们在关于远东总督府和远东事务特别委员会的方案的正式理由中,有一条就是:必须使边远地区在财政预算方面独立开来,并对它实行"经济核算制"。正由于这个原故,财政部才应别佐勃拉佐夫的要求在 1903 年编制了《关于远东总督府下辖各省收支情况(1897 年至 1902 年内)》的详细查询材料。这份材料关于普通和特别项目的总计有如下表:

年份	收入	支出	差额	平均年亏损
		(卢布)		
1897	9,601,322	92,726,073	83,124,751	
1898	12,573,550	123,952,316	111,378,766	
1899	15,753,201	201,030,426	185,277,225	
1900	21,914,523	263,592,269	241,677,746	143,900,000
1901	29,846,505	247,647,796	217,801,291	
1902	196,885,609	220,816,797	23,931,188	
共计	286,574,710	1,140,765,677	863,190,967	

① 见《波洛夫佐夫日记》,3 月 30 日所记(《红档》杂志,第 3 卷,第 87 页)。

② 见同上,8 月 19 日所记,第 103 页。

③ 见《库罗帕特金日记》,1908 年 2 月 19 日和 3 月 22 日所记,第 33、39 页。

其中，《查询材料》所表示的单是中东铁路公司在那些年中的支出如下：

年 份	铁 路	海 运	大连港	大连城	共 计
1897	5,000,000	——	——	——	5,000,000
1898	26,300,000	——	——	——	26,300,000
1899	62,700,000	3,500,000	3,000,000	——	69,200,000
1900	76,160,000	4,340,000	2,150,000	1,850,000	84,500,000
1901	64,111,750	3,547,430	3,827,970	1,624,430	73,111,580
1902	67,975,000	942,979	500,000	——	69,417,979
共计	302,246,750	12,330,409	9,477,970	3,474,430	327,529,559①

1903 年 1 月，库罗帕特金手头还没有这些精确的数字。他把中东铁路公司所属各企业的造价当作四亿卢布，而在遥遥无期的没有收入的情况下，他估计每年的亏损是四千万卢布（二千万偿付所花资本的利息，一千万作为护路队的给养，另外一千万卢布是经营方面的亏损。②）这样，那名声不佳的“十亿”便有将近百分之四十花在了所谓“维特的事业”上。成本过高、长期没有收入、并以英雄的“滥用”而广为传闻的这些企业，逐渐变成了对它万能的主人进行不同程度的猛烈和恶毒攻击的对象。

也是在 1903 年，当中东铁路建设工程将近竣工时，关于停止财政部对“各企业”的管理并按正常体制将其分配给主管部门的问题，在政界郑重地提出来了。维特在 3 月 14 日的特别奏折中主张必须保持原有的体制，并对实质上责难这一体制的意见进行了解释。同时他自己也不否认，国库为这些企业所花费用的数目确实是“庞大的”，这些企业最终装备完毕至少还需要三千万卢布，铁路每

① 见第 129 号卷，《关于国库在远东的收支情况》。

② 见《库罗帕特金日记》，1903 年 1 月，第 22，24 页。

俄里的造价"规定得高了"，而且在开始运输业务后的"最初年头"无疑还将有"一些"亏空。①

据维特自己承认，他在这些企业上"所倾注的力气和发自内心的关切"，是"在任何一项委托"给他的国家任务上所没有过的。②在关于"企业"的问题闹得如此厉害的情况下，军事冲突的危险愈临近这个因内部危机而疲惫不堪的国家，库罗帕特金 11 月 23 日（并非第一次）奏疏中所陈述的想法便愈使维特主观上感觉痛苦，这是毫不奇怪的。库罗帕特金在奏疏中说，对辽东的侵占（维特认为这是一个笨拙的错误，并且是对自己的东方政策体系的一种违 46
反），是修筑穿过中国领土的俄国铁路的直接后果。正因为这样，维特才在当时和这种见解进行争辩，也正因为这样，他才想方设法竭力不使这一见解影响他《回忆录》的读者。《回忆录》是在庞大帝国的幻想破灭后，在它的废墟上写成的。须知"各种企业"足有一半建立在旅顺口的周围，是为着旅顺口和直接依附于旅顺口而建立的。这就是说，他维特如今同意交出这一半，从而丢弃自己的亲骨肉？同时，战争表明，日本人打仗不仅是为朝鲜，而且也是为了旅顺口和整个南满。那末，维特是不是别佐勃拉佐夫、阿巴扎、阿列克谢耶夫等人在最后时刻抓住的那根杠杆的主要准备者呢？他在战后是否以这样的身份与上述这些所谓战争的真正"罪魁"落到一伙了呢？

中东铁路干线是维特的亲骨肉。旅顺口则是尼古拉二世的"幼稚的"侵略意图和粗野的"狡诈行径"所产生的、违反一切法律的弃儿。这条干线在有计划的、建筑在两国互利基础之上的传统友谊的和平政策中是一个最重要的环节，它使俄国成为法德俄同盟

① 见 3 月 14 日奏折，载于我的著作《李鸿章基金》（《阶级斗争》杂志，第 1、2 号合刊，第 117—124 页）。

② 同上。

和俄中同盟的那个大陆体系的中心。维特认为，在欧洲以外的强大文明蓬勃发展的形势下，要拯救古老的欧洲，使之在武装的世界中不致精疲力尽，在一旦发生欧洲战争时免于灭亡，这个大陆体系是独一无二的方法。[①] 但是，俄国保证盟国不受侵犯的诺言音犹在耳，就在光天化日之下占领了盟国的港口，因而同盟的整个建筑实质上已被倾覆。

维特竭力以坦率感人，他宣传的这一对比，在构成对日战争
47 前两种互相交错的政策的概念中起了基本的作用。这两种政策就是：他维特的政策是和平的，而尼古拉的政策是侵略性的。尼古拉这一边是：旅顺口、鸭绿江及占领满洲，直至战争。而维特这一边却是：和中国结盟、大铁路、从满洲撤兵及与日本的协定。但是，库罗帕特金在11月的奏疏中却这样刺激了维特的理论，他把这两道平行的行列打乱了，并使旅顺口和铁路干线缠在一起了。而事实上，俄国以结盟、友谊和互利为借口取得了铁路干线的租让权，而整个旅顺口事件也是用同样的说法，并且兵不血刃地发生的，这两者在此有何区别？德国侵占胶州后，俄国舰只随之开进了旅顺口，以便不让英国人和日本人占领该港，然后，俄国就在旅顺口驻扎了下来，仿佛真有可能不仅从陆上，而且从海上起到中国的同盟者和保卫者的作用。

形式上，这里不仅没有和中国敌对的举动；相反，俄国为了过于认真地巩固同盟的力量，却冒了引起国际纠葛的风险。要揭露这一行动的敌对性，证明实质上这里无须讲到中国的善良意愿，证明中国事实上无法抵抗俄国方面可能使用的武力，因而被迫将这一侵占以形式上的同意掩盖起来，要这样做是并不困难的。但这样的回答连维特本人也不能感到满意，因为别人会反驳说，在同意

① 见维特：《回忆录》，第1卷，第98—100页。

建造铁路干线方面，中国要拒绝俄国同样是无能为力的，而上述回答却没有驳倒这种可能的反对意见。于是，维特在可能时采用了这样一种回答，其目的是较为简截和较为直观地评价在此被忽视的区别。

1916年，维特授意撰写的《日俄战争的序幕》一书在维特的《回忆录》之先出版了。在该书中，上述回答是用一个低调的、简洁的句子表述的，即：维特"以他作为财政大臣而所能运用的一切手段对租借旅顺口的谈判进程施加了压力"。① 维特在《回忆录》中已 48
经不受拘束地揭开了这一绝对秘密的行动，极为详尽地讲述了自己对谈判进程的干涉，这就是：维特为了避免在俄国军队强行占领旅顺口时发生流血事件，吩咐答应给中国全权代表以"可观的礼物"，只是到了那时，迟迟不签协定的中国方面谈判全权代表李鸿章和张荫桓才在协定上签了字。② 结果是，只有通过收买，对旅顺口的占领才得以在"和中国友好"的伪装下强使对方接受，而没有引起流血事件；但在中东铁路干线租让权的问题上则根本无贿赂可言。这两个政治举动的本质区别这才显出了本来面目。维特以与此有关的一个意味深长的句子结束了自己的叙述："在我和中国人谈判时，我用贿赂的方法使他们为利益所动，这是绝无仅有的一次。"③ 这就是维特划出的介乎"水族馆"和客人们在那里酒醉失检、胡闹生事的那所宅院之间的界线。

但是，在仔细阅读《回忆录》第1卷第2章关于《与李鸿章的交

---

① 见格林斯基：《日俄战争的序幕》，圣彼得堡1916年版，第56页。关于这一出版物的产生见Б. А. 罗曼诺夫：《日俄战争前夕的维特》，载于论文集《俄国与西方》，彼得格勒1923年版，第162页。

② 见《回忆录》，第1卷，第108—115页。关于此事的部分文件载于《红档》杂志，第2卷，第287—293页。

③ 见《回忆录》，第1卷，第115页，着重体是我用的。

涉及对华条约的签订》这一部分时，一个很不显眼的细节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与李鸿章的谈判是在彼得堡财政大臣的私宅中举行的，谈判的开始和进行均由维特一人独揽。维特对这个中国人阐发了关于俄国建议的协定于双方有利的思想，而李鸿章"当然进行了种种阻难"。"可是通过和他的谈话"维特"了解到，如果他看到我们皇上希望如此，他对此是会表示同意的"。

49 于是沙皇果真单独接见了李鸿章，而且没有声张出去。在这次觐见以后，维特立即在宫里"朝见"，当他和其他前来向沙皇祝寿的人排成一列，走近尼古拉的时候，尼古拉"容光焕发，他几乎用耳语对我说：'李鸿章曾到我处，我对他说了'"。[1] 这位全权大使是为了以中国皇帝的名义向沙皇表示正式祝贺而前来隆重参加加冕典礼的，为什么需要单独接见他呢？为什么"在官方的报刊上对此事缄默不提"？而尼古拉又对他"说了"些什么？

1908年3月7日，当李鸿章安息在坟墓中已将近七年，而维特在赋闲中动笔写作自己的《回忆录》时，财政大臣科科夫佐夫收到尼古拉二世的一个手谕，内容是："从所谓李鸿章基金中提出十七万五千卢布，送来朕处，朕自有用。尼古拉，1908年3月7日。"尼古拉先前已有一个口谕，科科夫佐夫写了一份关于"财政大臣在华俄道胜银行特别立户的所谓李鸿章基金"的现存款额的报告作为答复。尼古拉看来很着急，他在收到这份报告的当天就把手谕发了出去。从这份情况报告中可以看出，到1908年3月7日"基金"的余额是一百二十六万四千五百三十九卢布。

"李鸿章基金"这是最后的俗称。它原先的名称是："抵偿与中东铁路租让权有关的费用的特别基金。"基金的支出是财政大臣

---

① 见《回忆录》，第一卷，第43页，着重体是我用的。

办公室的一项专门业务。在"侵占"旅顺口以前的整整一年内，便已开始从基金中付款给中国人了。在1897—1902年期间，这样的支付一共有五次，旅顺口的那次付款按先后是第二次。除了这五次以外，有几次拟议中的付款由于不同原因而没有兑现。中国人 50
在五次收款中共得到一百七十万另九百四十七卢布七十一戈比①。

现在我们看到，"特别基金"的支出情况把上面强调指出的，维特关于他在中国采取收买的办法总共只有那绝无仅有的一次的表白驳得体无完肤了。无庸置疑，这决不是由于维特的健忘。只能用回忆者的过谦来解释他并不高明的避而不谈的原因，而且所回避的一般必定是各种政治性的收买，这类收买是前财政大臣的职务秘密。就是在维特所讲的那个场合，他的叙述也是拙劣的，别有用心的。他把收买仅仅说成是为了消除别人的"幼稚行为"所引起的后果而迫不得已采取的措施。但是，这一措施是在当时条件下从策略上展开维特本人的宏伟政治计划的不可避免的手段，对此维特却蓄意加以掩盖。这个手段在这里是毫不新奇的，不论在欧洲或非欧洲国家国际关系的全部外交史中，这一手段都是屡见不鲜的，其形式是五花八门的。

维特对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的评价是：在俄罗斯帝国命

---

① 1905年以前，《基金》中支出的款项一般都用于和远东的事务有关的开销，而当时和付款有关的信函也带有政治性质。1905年后，随着俄国势力在远东的极端削弱，基金仍然相当可观的余额似乎成了父母双亡的政治孤儿，被滥用在五花八门的"需要上"了，而关于基金的简单信函几乎只有帐单的性质。1908—1910年期间，向尼古拉二世"呈送"款项共有九次，每次都是应他手谕的要求。这些款项是打包加封后由专人送进宫去的，共计一百零三万卢布。到1914年1月，"基金"总共只剩下了三十七万三千七百十四卢布五十戈比。十六年中竟花去了四百四十九万二千一百五十一卢布五十戈比。见财政部总务司第51号密卷第4部分：《关于特别基金的设立与从中对各种人士的支出》。1914年2月6日编纂的关于从中支付款项的详细的《情况报告》，我在《李鸿章基金》一文中已全文引用，见《阶级斗争》杂志，第1、2号合刊，第124—126页。

运中这是动摇帝国的最重要的因素。他认为尼古拉二世、别佐勃
51 拉佐夫、阿巴扎、阿列克谢耶夫等人，某种程度上甚至包括与他们观点一致的库罗帕特金是“不幸的战争的罪魁”。因此，维特没有任何兴致，也没有任何理由落到他所说的“不幸的战争的罪魁”的集团之中，便是不难理解的了。虽然他在当时和事后① 为了与这伙人及他们的“政策”划清界限作出了巨大的努力，然而，如同他在此刻关于旅顺口的说法一样，他的全部努力并不能从本质上抹杀由他本人倡导和操纵的那种政策对帝国所具有的深刻冲突性和异常冒险性，这是帝国经历过了的。在重新考察这一政策的关键之点时，关于李鸿章基金一事使人能纯粹从外部不止一次地突破那个严实的文学结构，维特在这一结构中灌输了他关于“和平的”和“侵略的”两种政策的理论，似乎一种政策所追求的目的和行动方式都不致使俄国在远东蒙受战争危险，而另一种政策在这两个方面都疯狂地玩火，因而这两种政策是互相排斥的。

II

我们没有任何材料可以证明，维特在 1892 年 2 月被任命为交通大臣以前就已经对远东发生了兴趣，甚至致力于远东事务。但从此时开始，几乎就在他的第一个报告以后，他对修筑西伯利亚大铁路就采取了一种特别的态度。② 此事在技术方面已经完全研究好了，原则上决定下来已将近一年，因此，当它落到维特手中时，可以说已经在进行之中，并且几乎是处于准备就绪的状况了。1858 年阿穆尔边区刚一合并，关于西伯利亚内部分段铁路线的局部计划就开始提了出来。1875 年，这一局部计划在波谢特方案中升级

① 原文为 post factum。——译者
② 见《回忆录》，第 3 卷，第 354 页。

为关于从伏尔加河到阿穆尔河的完整铁路线的设想，但后来却被1877—1878年的战争和财政危机所中断。八十年代初期，由于财政萧条未见起色，这个计划仅被收缩在伏尔加—乌拉尔一段。八十年代下半期，由于在远东国际关系中发生了转折这一直接原因，52
这一方案才重新被提出，并被坚韧不拔地付诸实施了。

俄土战争以后，俄国从近东转向远东，例如，受到亚历山大三世（当时他是太子）庇护的、由波别多诺斯采夫任主席的义勇轮船公司把它所有的汽轮都调到了黑海—太平洋航线上，便是这种转变的一个表现。这一转变恰恰碰到了前面所说的（见边码第7—9页）日中关系中朝鲜问题的尖锐化，当时大国利益集中表现在朝鲜问题上。1885年，由于英国的干涉，俄国占有一个朝鲜港口和向朝鲜派遣教官的企图遭到挫折。这就暴露了俄国在那里是虚弱的，同时，趁着1885年中日关于朝鲜的条约所确立的力量均势尚未破坏，加紧提高自己的作战能力的任务也因此提上了日程。实际上，西西伯利亚和东西伯利亚两位总督在1886年已将托木斯克至伊尔库次克和贝加尔湖至斯列坚斯克一线在战略上的必要性问题提到了首位。本来1887年就要开始对上述区域以及乌苏里地区进行勘查了。但是，尽管两位总督以及陆军和海军大臣反复指明：鉴于中国采取了提高自己作战能力的措施，修筑这些铁路是刻不容缓的事，然而И.А.维什涅格拉茨基却完全忙于增加金属储备量，而固执地拒绝拨款经办此事，直到最后，即1890年7月，获悉中国政府派遣了英国工程师去南满进行勘查，并到了俄朝边界交接处的满洲城市珲春时，修筑乌苏里铁路的问题（即使只这一条）才又重新提交讨论。

这一回事情算是摆脱了僵局。亚历山大三世表示赞成有必要 53
“快些动工修筑这条〔乌苏里〕铁路”。外交大臣基尔斯随之声称，“俄国对华关系的状况促使外交部认为，修筑西伯利亚铁路的问题

对俄国具有头等的重要性”(1890 年 8 月 31 日的信)。最后,大臣会议在通过拨款修筑乌苏里铁路时,鉴于遥遥无期的、零碎的分段铁路的修筑与现已公认的刻不容缓的战略目的不相适应,才根据陆军大臣的提议,一致同意修筑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1891 年 2 月 12—21 日会议)。然而,事实上却不得不受到当时所拥有的用于建筑新铁路的特别拨款这一硬框框的限制。1891 和 1892 两年每年只有七百万卢布的拨款,这些钱只够用作从两端开始建筑工程(1891 年从符拉迪沃斯托克,1892 年从切利亚宾斯克)。使事情遭受挫折已经整整五年的那块绊脚石,在旋风把它猛地刮掉以前,一直压制着旋风的升腾:维什涅格拉茨基对这项他认为有冒险性的事业暗中进行了坚决的抵制,直到他去职为止。然而,旋风既已刮起,它就按照自己的规律不可抑止地越刮越烈了。

俄国政府对财政上是否可能的问题避而不提,就向全世界宣布了修筑“横贯西伯利亚全境的铁路”的决定(1891 年 3 月 17 日致太子的诏书),并在 1891 年 5 月,示威性地隆重地开始了这条铁路乌苏里段的奠基工程。而中国政府对此事的回答却是:在 1891 年 7 月成立了北洋官铁路局,并动手把开平至天津的铁路向北继续延伸到山海关。① 也是在这个 7 月,在俄国,交通大臣丘别涅特
54 提出了分六段、三期建筑西伯利亚铁路的一个准备就绪的计划,预计需要十二年时间和三亿五千万卢布的款项。为了节省起见,这一计划没有采用一系列必要的技术条件,而且公开规定,不久必须将几乎全线的路基彻底重铺。维特接替丘别涅特时,事情的状况就是这样的。如同上述,维特获准从切利亚宾斯克动工铺设路基,为此从七百万卢布拨款中拨出了一百一十万卢布。丘别涅特的计

① 见已出版的璞科第 1895 年为财政大臣编纂的关于中国铁路的《情况报告》。

划不仅没有得到维什涅格拉茨基的支持，而且后者认为造价算得太高(!)了，在这种情况下，看来事情在政治上的成熟性无疑压倒了国家财政和经济方面的可能性，因为国家恰恰是在遭到歉收的那年终止了黄金储备的积累，而歉收不仅可能破坏贸易平衡，甚至会在一个不确定的时期内危及俄国农村的缴纳能力。

但早在饥馑的 1891 年前，维什涅格拉茨基就不仅拒绝从国库支出资财，而且道出了问题的实质。他在 1890 年使修筑乌苏里段铁路的要求落空时，首先，他不认为中国经满洲筑路的意向具有严重的危险性，因为中国政府在铁路建筑事业方面通常是因循保守的(在这一点上他是正确的)；同样，他也不认为单独一条乌苏里铁路能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一般说来，维什涅格拉茨基只同意从铁路的商业收入和经济意义的观点来看待西伯利亚的铁路问题，根据这种观点，他只允许从西边开始筑路，然后听其自然延伸。而当 1891 年，他关于单单一条乌苏里铁路毫无意义的论据变为赞成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的理由时，他只好就"宣布"动工这一点提出告诫，因为工程不可避免需要巨额借款，而单是这一消息便会影响俄国的货币行市。在维什涅格拉茨基的意识中，无时无刻不充满 55
着随这一问题而产生的对冒险的恐惧感，从而使他置身事外，没有被吸引走上冒险和作出突然决定的道路，显然，此人愈来愈不能适应事件的规模和周围政治局势的要求了。①

维特由交通大臣调任财政大臣(1892 年 8 月)，使西伯利亚铁路问题发生了迅速和急剧的转变。想要继续其前任在此推行的那种政策当然是不可思议的了，因为这和新的任命本身的涵义是相矛盾的。这项新任命正是要证明，已经不可变更地决定无论如何要摆脱僵局，要不惜花费资财去从事该项事业，因为它可以使一

① 关于修筑西伯利亚铁路的历史见 A. 库洛姆津编的《西伯利亚铁路的今昔》，圣彼得堡 1903 年版，第 1—128 页。

百四十二万平方俄里物产丰富的辽阔土地又一次并入帝国版图，它可以把西伯利亚的谷物投入世界市场，它能有系统地吸引俄国中部的过剩人口，并能在自己周围形成各式各样的经济运动。俄国欧洲部分严峻的经济画面已经展开，这恰恰应当对大铁路问题起到促进作用，正如围绕着朝鲜问题的国际纠葛和英国侵入中国北部的迹象曾在某个时候起了推动作用一样。

在这里必须注意到，在 1892 年 11 月提出建筑“西伯利亚大铁路”的计划及其畅行无阻的财政方案（它使问题立即摆脱了维什涅格拉茨基使其陷入的僵局）对于维特来说是较为容易的。因为他不仅可以把 1891 年 8 月 9 日至 15 日已经谈定的法俄协定考虑进去，而且还能把 1892 年 8 月 17 日前刚刚商妥的法俄军事专约草案考虑在内。这两项决议书从实质上排除了先前和铁路事业有
56 关的任何财政上的冒险性。这项事业如今获得了坚实的财政基础，并且俨然摆出了自命为具有世界意义的宏伟政治纲领的出发点的架势。①

必须指出，历史学家若要在维特《回忆录》的字里行间寻找关于这一点的任何实质性细节，那将是徒劳的。在此首要的事实是，既定的建筑工程划归了一个权力颇广的特别委员会掌管，由皇太子任委员会主席。我们看到，维特认为这后一情况标志着事情的如意进展，它使委员会实际上具有最高机关的性质，并把未来的沙皇本人吸引到了困难的、旷日持久的事业之中。这是因为，据说只要亚历山大三世在世就不必再为此事担心，而在其继承人的时代这桩事情是容易衰败的。维特在《回忆录》中讲的多半是事情的后一方面，他用尼古拉二世对有计划地把农民移居到西伯利亚这一主

① 维特在初期提出采取某种财政手段，即把应予销毁的九千二百万旧币用作建筑费用。他指望在以后从预算经费中靠借款来弥补这笔款子。见格林斯基：《日俄战争的序幕》，第 15 页及以下各页。

张("几乎是革命性的")所抱的赞许态度为例，来说明他所叙述的步骤是适宜的。① 但是，维特在 1892 年 11 月 6 日呈递了一道«关于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建筑方法以及讨论此事的会议的宗旨» 的奏折，他在自己这个内容极广泛的奏折中，远没有局限于事情的财政和技术方面，而是论述在"考虑"建筑方法时所采取的"指导原则"，力图从问题的全局上来把握问题。在维特监督下撰写成的 «日俄战争的序幕»一书中，对这一奏折的复述几乎仅限于那些关于铁路经济意义(按词的狭义说来)的"原则"，却避而不涉及那些在奏折 57
中津津乐道的更为广泛的观点，这一点未必是偶然的。②

如今，在 1892 年，维特为他面临的任务的世界性规模所吸引。他坚决批驳对这一任务只从财政意义上作狭隘的理解并把财政部分放在最后叙述。况且，"横贯整个西伯利亚的铁路，这是全国性的(按词的广义说来)事业"，它不论对俄国的欧洲部分，还是对西伯利亚都具有"经济、文化和政治利益方面的最大好处"。西伯利亚大铁路正在建立"欧洲与大洋以及东亚不间断的有轨交通"，从而"不仅为俄国，而且为世界贸易"开辟了"新的道路和新的前程"，这样一个事实"将它置于世界性事件之列，这类事件开创了各民族历史的新纪元，而且常常引起各国之间既定经济关系的根本变革"。维特倾向于 1889 年下新城博览会的俄国商界代表在奏疏中所阐述的想法，③ 他十分清楚，在太平洋地区已经具有不可抑止地爆发一场经济斗争的一切迹象，而西伯利亚干线则通过符拉迪沃斯托克把俄国紧紧地推入解决太平洋问题的斗争之中。以前，丝

---

① «回忆录»，第 3 卷，第 354 页及以下各页。

② 见格林斯基：«日俄战争的序幕»，第10页及以下各页。在下面的转述中，我们所用的是 1892 年财政部总务司案卷所存的 1892 年 11 月 6 日那份奏折的第 2 部分："关于建筑西伯利亚大铁路问题的特别会议"。下面奏折引文中的着重体都是我用的。

③ 见我对维特«回忆录»第 3 卷的评论，载于«阶级斗争» 杂志，第 1—2 期合刊，第 342 页。

绸和茶叶全得通过苏伊士运河输入欧洲，加拿大铁路"如今已经"分去了一部分货物。当维特按照西伯利亚铁路的长度和它所通过的辽阔地区的性质来估量这条铁路的价值时，加拿大铁路在他的想象中是"一个有教益的例子"，因为西伯利亚铁路和加拿大铁路
58 有许多类同之处。① 从欧洲到上海经苏伊士运河需要四十五天，加拿大铁路把行程缩短到了三十五天，而西伯利亚铁路则将把行程缩减为十八至二十天。

因此，现已开始的"欧洲与东亚之间交通方向的变革"必将有利于俄国，因为俄国"不仅是东亚和西欧产品贸易的中介人"，而且还是"与东亚各国相距最近的大宗生产者兼消费者"。同时，"中国、日本和朝鲜三国的人口总和不少于四亿六千万，三国的现代国际贸易额不少于五亿金卢布，它们还远未尽可能地发展其同欧洲的贸易关系，甚至不如说在这一方面尚处在初级阶段"。"因此，欧洲文明民族为了控制东亚市场而不惜任何代价，付出巨大的努力，这是不足为怪的"。维特于是考虑，俄国"正由于直接邻近上述东方国家，西伯利亚干线一经修通，它必将在这方面取得"对其他欧洲各国的重大优势"。

59 维特试图以俄中经济关系为例来仔细检查西伯利亚设想的国际意义这个总公式，在俄中经济关系中现在可以明显感觉到针对英国的、暂且是经济性的同盟的基础，这个同盟不仅是防御性

① 原文是："同时，加拿大铁路在最短时间内在以前荒芜的加拿大中部引起了农业的极大发展，这是由于铁路行政当局采取了措施，并往这一地区进行移民。为此，每个愿去的人都分到了面积为一百六十英亩的一个农场。早在1880年（加拿大铁路建筑之前），该广大地区生产的粮食只能使自己不多的居民勉强够吃，而在1891年，铁路通车五年后，在那同一地区，光是小麦的收成便有三千万蒲式耳的剩余可供外运。在现已长达一千二百英里的铁路干线和支线沿线，一批大城市发展起来了，如：布兰登、波特奇、里吉纳、卡尔加里，更有为数众多的次要的村镇。加拿大铁路在它存在的短时期内使它所通过的辽阔荒漠苏醒了，变成了物产丰富的地方，这是花费了大量资金的。然而这项事业现在已经获得了八百多万美元的纯收益，虽然铁路通过的区域的人口不到西伯利亚现有人口的一半。"

的，而且是进攻性的。在从中国港口起运的货物中英国占了三分之二，而且英国船只在中国港口的数量还在经常增加。另一方面，英国同时还力图在茶叶生产方面成为中国的竞争者，英国在亚洲的殖民地印度和锡兰的茶园已经成了整个大不列颠茶叶的主要供应者。同各地的情况一样，又正是东印度的铁路网极为有利于英国把茶叶运到港口，而这些港口离欧洲比中国港口近一半。结果，中国茶叶对伦敦和其他消费国家的输出“不断迅速下降”，这不论“对于极大一部分中国居民”，还是“对于中国国库”（在高额出口税的情况下），都是“一个意义严重的问题”。这就是说，“西伯利亚铁路在这一方面能够对中国茶业给予巨大支持，它能把中国最危险的竞争者从中国茶叶向欧洲国家销售的中介人的地位排挤掉，并能保证使中国茶叶大为迅速地运到欧洲，比从中国通过伦敦的海运，以及较为迅速的东印度茶叶转运都快得多”。维特总结说：“因此，对于俄国取代英国在茶叶运输和向欧洲国家销售中的地位这一点，不仅俄国，而且中国都有切身的利害关系，加之俄国本身就是一个广阔的、而且可以说是日益扩大着的茶叶消费市场。”

当维特预见到，“俄国能够大大增加棉布、毛织品以及金属对中国的销售”时，那个英国的幽灵又出现在他的面前。中国进口这 60
些货物的总额是八千至九千万金卢布，“但并不是从俄国进口的。俄国对中国的全部出口按价值不超过三百万卢布，连同和中国交界的西伯利亚边界的贸易总额一起也不高于一千七百万至一千八百万卢布”。

至于西伯利亚大铁路的“政治和战略”意义，维特觉得那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他对这一问题只写了短短几行。但这几行文字唯其简短，就更显得重要。在东方，“我们的力量”同距离的缩短成正比地增长，在“人们意识到在人类全球经济活动领域内有着可以触摸到的相互利益”的情况下，经济关系的加强将导致与“东方国家

确立"友好的"政治关系。他甚至觉得，正在同时出现的"与北美合众国建立更直接关系的可能性"，将表明俄国与该国"政治利益是一致的"。最后，西伯利亚铁路"将保障俄国舰队得到一切必需品，并将在我们的东方港口中为它提供一个坚固的据点"。"因此，随着铁路的通车，这支舰队可能大大加强，一旦在欧洲或东亚发生政治纠葛，它都将控制太平洋水域的一切国际商业活动，从而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这就是维特要带他的"客人"去的那个"水族馆"的初步概述。当他们"喝醉了酒"后，"丑事"就闹得凶起来了，因为他们自命为"太平洋将军"，而且不想采纳任何意见。在这时(1898年及以后各年)，"拉着"他们的已经是别人了。其中便包括大西洋将军问候太平洋将军的广为流传的名言，这是威廉二世有一次访问尼古拉时轻率出口的，以后一直成为这两个"朋友"的习惯用语。即使在战败后，维特回想起喜欢受人奉承的沙皇的"灾星"玩弄的这种挑拨离间的勾当，他仍不能不勃然大怒。可是，神话般的和富有诱惑力的"俄国舰队""在太平洋水域""对一切国际商业活动的""控制"，却早在 1892 年，当维特招呼他的客人到"水族馆"去时，已经列在"水族馆"的节目单中了。

61

在这里，在俄国远东政治纲领的天花乱坠的最初稿本中，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对于具体外交问题的任何研究，没有，而且也不可能试图去估计在太平洋斗争中将要包括在内的各种国际政治力量的全部总和。但是英国和中国这两股最大的势力却是被清楚地、切实地估计在内的。西伯利亚铁路作为对华政治同盟的工具，并作为破坏英国殖民威力的手段，在维特看来是十分具体的。但是，对于日本和朝鲜他却只勾划出了最一般的轮廓，它们被说成和中国一样，都是远未精耕细作的同一块田地，而有待于俄国在东方的经济活动。至于说到美国，那维特简直大错特错了。

我们看到，纲领的最初稿本提出了许多令人向往的前景，但它却没有包含任何实际的结论以说明实现这些前景的手段。维特感到不能满意的正是在这一方面，这可以从下述情况来加以判断：维特利用臭名远扬的巴德马耶夫的出奇地荒诞无稽和招摇撞骗的方案，极为迅速而轻易地抓住了他所碰到的填补上述空白的第一个可能性。自然，这一回我们在《回忆录》中是找不到叙述此事的片言只字的。维特如何通过乌赫托姆斯基认识了巴德马耶夫（此人在一次出访中国时博得了乌赫托姆斯基的好感），是谁主动的，是乌赫托姆斯基，更可能是巴德马耶夫，或是维特本人（这一点也并不排除），对此我们不得而知。①

不管怎样，巴德马耶夫这个布里亚特的斯拉夫主义者和畜牧家式的政治家，在1893年2月提出自己的方案，根本不是绕过财 62
政大臣的。巴德马耶夫先是伊尔库次克一所中学的学生，接着是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的学生，然后是外交部的一名公务员同时兼任首都一家大学的蒙古语讲师。他在改信东正教时又由亚历山大三世这样的教父做保人。从1875年开始，他直接从语言学的讲席转而从事医生的实践，他混迹彼得堡钻营谋利，但又没有断绝自己的东方关系。1893年2月13日，巴德马耶夫向财政大臣递交了一个关于俄国在远东刻不容缓的历史使命的内容广泛的报告，并请求不仅把这一报告，而且把他在藏医工作（原来沙皇对此感到兴趣）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向亚历山大三世奏明。人们倾向于这样一种看法：巴德马耶夫的这些活动是和维特事先商量好的。维特立即把巴德马耶夫的报告作为自己阐发性奏折的附件上呈亚历山大三世（但对巴德马耶夫要求中有关医学的部分却只字未提），

① 巴德马耶夫的报告以及下面引用的其他文件载于B. П. 谢苗尼科夫的著作：《在沙皇制度的幕后。藏医巴德马耶夫的档案》，列宁格勒1925年版，第49—75页。着重体是我用的。

这就使人有理由认为他们是预先商量好的。①

应当承认，巴德马耶夫是从历史角度来组织其叙述的，他一直从遥远的莫斯科公国时代讲起，这和他思想上的那堆大杂烩以及他的那些具体建议的巨大规模是不相称的。他的报告无疑为亚历山大三世所喜欢并引起了这位沙皇的惊讶："所有这一切都是那样新鲜、奇异和异想天开，使人很难相信有成功的可能。"

巴德马耶夫这些建议的实质简要地可归结为：不仅要将西伯利亚铁路敷设到符拉迪沃斯托克，而且要从贝加尔湖往南修，深入中国内地一千八百俄里，直修到甘肃省的兰州府。在那里事先建立一个藏、蒙、汉各族居民反清暴动的秘密政治中心，暴动以后，由这
63 些民族的绅商贵族向俄国("白人的")沙皇进行请愿，请求接纳他们作他的臣民。巴德马耶夫建议由他本人来承担组织工作，他打算把他所指挥的"几千"边界上的布里亚特人以贩卖日用品和各类武器的行商的身份派往各地，以他们作为先锋，进行这一将"整个蒙、藏、汉的东方"兵不血刃地并入俄国的准备工作。维特"在知道这一报告的内容后"认为，巴德马耶夫"发表了一些十分重大的见解"，这些见解"能在政策的一系列实践问题中确立新的观点，这在现时有特别的意义，因为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建筑……不仅在俄国……与东亚的关系中，而且在与西欧的关系中……都将具有威力巨大的影响"。②

维特以斯拉夫精神向沙皇发挥关于俄国在东西方之间的政治立场特点的思想时，也表示担心："欧洲的政策将试图挑起中国对我们的侵略意图，以便侵占防御薄弱的西伯利亚铁路东段及其邻近地区，包括连同符拉迪沃斯托克在内的滨海地区。"然而，如果

① 维特的奏折见前引谢苗尼科夫的著作第81页。奏折和报告一起呈给沙皇是在2月27日以前，因为沙皇在奏折上的批示署的是这个日子。

② 维特给沙皇的奏折见前引谢苗尼科夫的著作第81页。

巴德马耶夫的事业获得预期的成功，那末，“俄国就将从太平洋之滨和喜马拉雅山之巅主宰亚洲以及欧洲的事务”。但维特觉得“通往中国境内的供给支线的问题”本身是“值得全力注意的”。于是，维特准备立即将巴德马耶夫建议的事业置于实际基础上。他提议，“不打任何官腔”，“寻求适当的物质手段，帮助”该项事业实现。

然而，在西伯利亚干线的政治问题开始实际解决时，上面援引的沙皇表示怀疑的批示一开头就把维特拦住了。但到这年夏天，64
巴德马耶夫本人感兴趣的事业已进行到了设立他“私人企业”的地步，于是这项事业就以“巴德马耶夫公司商务处”的形式出现了。这一“旨在正确组织和经营畜牧业”的企业，要是没有国库的为期十年、数额二百万卢布、利息四厘的贷款，是无论如何也办不起来的。[①] 巴德马耶夫这时保证说，“在我了如指掌的大量企业达到数千万的营业额、并且牢固地建立起来以后”，贷款“必将归还”，他还说，仅从这些企业得到的收益便使他“有可能逐渐接近预定的目标”。[②] 而这时沙皇看来已经和“异想天开的”方案搞熟了，同意发放这笔贷款。[③]

维特在此进行了第一次尝试：借助于用官资经营的“私人企业”，通过和平的途径来达到“隐蔽的政治目的”。应该为他说句公道话，他在最后时刻已经完全意识到他本人应负的责任，完全清楚这笔贷款是有借无还的，因而试图“利用一切借口”来扣住贷款。[④] 但是要反对自己为时已晚，而且，他暂时还拿不出任何东西，可以代替他本人提供的、为沙皇的政治构想所用惯了的饮料。于是，给

① 巴德马耶夫 1893 年 6 月 19 日和 8 月 28 日给维特的两份报告，见前引谢苗尼科夫的著作第 83—85 页。

② 巴德马耶夫 1893 年 7 月 22 日给亚历山大三世的信，见前引谢苗尼科夫的著作第 85 页。

③ 见同上，第 58 页，1893 年 8 月 28 日巴德马耶夫的报告。

④ 见同上，第 87、106 页。

巴德马耶夫的贷款就这样支付了。只是随后不久在远东发生了国际性的重大事件，才迫使人们去认真地重新考虑并坚定不移地解决与西伯利亚干线有关的俄国远东政策的实际问题。

III

65 维特 11 月的计划使得建筑工程立即能在三千多俄里的长距离上动工，而不管明天（按词的直义）如何。[①] 所谓第一期工程估计要花七、八年时间（到 1900 年），将近四千俄里的第二、三期工程的问题则仍悬而未决。1894 年春季，维特参加了西伯利亚委员会，提出了一个更详细阐明上述问题和在整体上加快建筑速度的方案（到 1899 年，除阿穆尔段和贝加尔湖外，全线通车，到 1901 年除贝加尔湖外全线通车），委员会的一次决定性会议是在俄历 5 月 3 日举行的。这真是巧合，恰好这一天，在朝鲜南部开始了以“灭尽夷倭”为口号的暴动。这次暴动先后把中日两国军队引到了那里，并且为日本提供了一个口实，仿佛是为保卫朝鲜独立而开战的。[②]

美、俄、法、英四国共同要求双方军队同时撤出（公历 6 月 25 日），但没有成功。日本人占领了汉城王宫，并对当时的国王实行了摄政（公历 7 月 23 日）。他们击沉了一艘载有中国军队的英国运输船（7 月 25 日），并在 8 月 1 日把事情闹到了正式宣战的地步。[③] 至于说到俄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那末自从 1885 年英俄两国在朝鲜问题上发生暗中冲突后，在日本人在朝鲜取得特殊的经济成就的情况下，俄国首先必须考虑到英国外交对中国所具有的无疑占优势的政治影响，这不单表现在朝鲜事务中，俄国所担心

---

① 维特给第一期工程总预算拨了九千二百七十万卢布的钞票，这是国家银行贷给国库的债款。关于维特计划的详细财政情况见《西伯利亚铁路的今昔》，第 118—122 页。

② 见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 3 卷，第 19 页。

③ 见同上，第 19—25页。

的是在中国东部边界全线上的这种影响。日本现今对朝鲜的入侵 66
迫使俄国设法避免过早地解决朝鲜问题，这是因为，“由于地理和政治条件而作为俄罗斯帝国组成部分的朝鲜的命运，是由我们预先确定了的”。① 但是，日本也是“为自己的前途”和“为自己的独立”“在朝鲜作战”，“一旦朝鲜落到任何一个欧洲国家手里”，这种独立便会遭到破坏。② 因此，英国就又处在坐收渔翁之利③的地位了。劝诱自己的这个敌人和自己共同行动，俄国的全部棘手之处正在于此。

战争一开始，俄国政府自然就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俄国在这场战争中采取何种行动方式，事先应采取何种措施，以防胜利的一方“破坏朝鲜领土完整的企图”。1894—1895 年期间，这一问题在有关大臣的特别会议上讨论过四次，并随着军事行动的进展产生了根本分歧，从随后俄国政策的观点看来，这些意见分歧是有其重要性的。④

英国在关于国际干涉争端的方案中建议，暂将朝鲜划分为两个占领区：南部是日本的，北部是中国的。这个方案本来就要被一致接受了，但正式宣战抢先发生了。因此，基尔斯在 8 月 9 日的会议上认为，有可能和英国一起提出建议，在“维持朝鲜现状⑤”、“不 67
以任何方式偏袒交战国中该国或他国”的基础上，停止军事行动，达成和平协定。这项提议未遭反对，并成了会议各项决定的基础。

---

① 沃加克对于 1902 年 3 月 26 日的条约提出了一份责难书，在 1903 年 5 月 7 日的会议上进行了宣读。拉姆斯多尔弗在他用作回答这份责难书的奏疏中，对于俄国在远东的“历来”使命正是这样表述的。见第 120 号卷。

② 见前引马士的著作，第 29 页

③ 原文为 tertius gaudens。——译者

④ 1894 年 8 月 9 日、1895 年 1 月 20 日和 3 月 30 日的会议记录见第 20 号卷中的副本。关于 1895 年 4 月 4 日的第四次会议见维特：《回忆录》，第 1 卷，第 37 页。以下引文中的着重体是我用的。

⑤ 原文为 status quo。——译者

但后来维特首先指出，战争结束后，“大不列颠可能干预此事，因为它从未放过利用情势的机会，以加强自己在远东的地位”，维特还指出，“这种干涉是不能允许的，因此，一旦英国表现出贪图权势的意图，我们应当准备回击英国”。接着又有瓦诺夫斯基讲到，中国战败后可能和英国结盟，并认为必须“预先”使南乌苏里边区的军队做好“积极行动”的准备，维特则答应为乌苏里部队的动员工作拨款。会议的一项决议又在这一方面进行了补充。

当 1895 年 1 月 20 日的会议正在举行时，战争的命运业已决定，中国参加和谈的第一批全权代表已到神户。[①] 而问题在于：俄国“在朝鲜事务中”是继续保持“与其他大国一致行动”呢，还是“目前我们应当转而采取一种独立自主的行动方式”。局势是相当动荡不定的。一方面，在日本手中已经有了旅顺口和威海卫，日本对自己的和谈条件固执地保守秘密，并且“某些大国向交战国提出自己的要求”也是“十分可能的”。另一方面，日本又保证说，它无意侵犯朝鲜的独立，而英国的表现又是十分“得体的”（外交副大臣希什金的报告）。因此，为了对抗日本的强盛，并防备其他大国进行任何侵占，俄国可能采取哪些保障措施，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是颇
68 具理论性的。外交大臣建议占领朝鲜海峡入口处的巨济岛，但遭到参谋总长的坚决反对，因为这个岛屿远离大陆基地。海军大臣对这个建议的支持也是软弱无力的。他指出，俄国可以占领“满洲的一部分”以对抗日本对旅顺口和威海卫两港的军事占领。陆军大臣则表示反对在西伯利亚铁路建成前占领满洲。

维特第一个提出了切合实际的建议。他的建议似乎是由他早在 8 月作的那项提议发展而来的。他提出，遵循不干涉政策，增强我们在太平洋的海军力量。他“考虑到情况可能复杂化”，指望

① 见前引马士的著作，第 41 页。全权代表于公历 1 月 30 日到达神户。日方认为他们全权不足，战争仍继续进行。

我们舰队的加强会促使英国人本着尽快结束战争的精神行事。同时，维特又一次答应为此事拨出相应的经费。照维特的看法，“除了和英国采取一致行动外，我们暂时别无他法”。亚洲司司长卡普尼斯特伯爵附和维特的意见，他认为，只有通过这种途径“才有某些可能预防中日冲突带来危害极大的后果，并赢得建成西伯利亚铁路所必须的时间，到那时，我们就能以具有充分物质手段的姿态出现，并将在太平洋事务中占据相应的地位”。

关于和英国协商的问题这一回就不象八月份那样顺利地通过了。出面反对的是军人：奇哈切夫（海军大臣）怀疑英国会对保持朝鲜的独立感到兴趣，并反对列强对朝鲜实行共管（这是卡普尼斯特认为可行的一种方案），他指出，俄国军舰必须在朝鲜港口停泊。瓦诺夫斯基表示，“如果可以指望，此事在我们将来的对日关系中不至于引起不良后果”，他才能同意。而奥勃鲁切夫（参谋总长）直截了当地表示，他“特别反对为了遏止日本取得成功而与英国采取共同行动，因为，照他的看法，中国变得愈弱，对俄国就愈有利”，69
这是由于俄国的利益在于改变阿穆尔地区的俄国边界。担任会议主席的阿列克谢大公仍然建议“试图”达成一致意见，于是会议决定：（1）扩大舰队；（2）试图不仅与英国、而且与法国和别的国家就共同对日本施加得体的影响问题达成协议，以保持朝鲜的独立；以及（3）假如结果只能就列强共同保障朝鲜独立这一点达成协议，那就重新对问题进行研究。①

其时，中日之间的和谈一直拖延着，而在探明日本的条件以前，会议交办的与各国的交涉是不能取得任何结果的。② 直到3月

① 见第20号卷，1月20日会议记录。除了本文中提到的人物外，在会议记录上签字的还有海军参谋总长O．克列麦尔。

② 例如，2月22日（3月6日），俄国驻伦敦大使交给金伯雷勋爵一封密信，同他交换意见。关于英国对日本可能提出的领土要求将抱何种态度的问题，金伯雷不能作出“任何肯定的”表示，谈话只涉及“大致”探明列强的各自利益的问题，关于这些利益的保护是应当达成协议的。

13 日(3 月 25 日),条件的文本才在马关交给了李鸿章。[1] 迄今我们认为最重要的那一点,即朝鲜的独立,包括在条件之中。外交部关于其他问题没有任何明确的指令。除了如今拒绝对和谈进程进行任何干涉的英国外,别的大国的立场仍然是暧昧的,但同时继续等待而不当机立断便意味着坐失良机:中日之间的暂时休战到 4 月 8 日(20 日)就满期了。于是,重新被任命(3 月 6 日)为外交大臣的洛巴诺夫公爵于 3 月 25 日向沙皇奏明了所酿成的局势。他并不怀疑,日本对"旅顺口所在半岛"的侵占,"从我们利益的观点
70 看来""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如果我们要求日本人放弃辽东,而日本拒绝,那末,在法国和德国的立场尚未确定,英国对俄国的这一步骤分明是持否定态度的情况下,俄国是否应当"采取强制的手段"呢?

洛巴诺夫承担的最重大的事情是:"以最友好的措词向日本政府指出,对旅顺口的占领将成为恢复中日友好关系的永久障碍,并会成为破坏远东和平的口实",然而,这样做之前先得证实,列强是赞同我们这一步骤的。尼古拉二世"完全同意"洛巴诺夫的想法,答应不要求归还旅顺口。"但是从纯粹的俄国观点看来,是否应当考虑我们占领永兴湾或朝鲜东部的另一港口",尼古拉作了这样的补充,亦即提出了靠损害朝鲜的独立而取得补偿的问题。[2] 按照 1 月 20 日会议的提法,尼古拉确定,俄国要转而采取"独立自主的行动方式"。而在当前的条件下,既然在《马关条约》中列入朝鲜独立这一条是由于日本的要求,那末,要实现尼古拉的想法,就得通过与日本(而不是与中国)的协商。敦促沙皇在中日之间作出这一有利于日本的选择的正是洛巴诺夫本人。

洛巴诺夫还向沙皇呈递了一道特别奏疏作为自己 3 月 25 日

① 见前引马士的著作,第 44 页。

② 见第 20 号卷,洛巴诺夫 3 月 25 日奏折的副本(上有沙皇批语)。

奏折的附件，他在其中直截了当提出的正是关于在中日之间选择“俄国将来的同盟者”的问题。“如果我们满足于我们在远东的现有地位”，并且“只力图为自己保持这种地位”，那末，衰弱的中国就将是俄国最好的盟国。但是，“倘使我们不得不借助于进攻性行动来寻求满足我们在极东方的迫切需要，那末事情的提法就截然不同了”。洛巴诺夫认为这些“需要”是：“(1) 我们在太平洋取得一 71
个不冻港，以及(2) 兼并为便于修筑西伯利亚铁路所必须的那一部分满洲领土”(尼古拉在这几行下划了着重线，并批上：“正是”)。至于中国，(1) 它没有“任何”可以让给俄国的港口，并且(2)“它当然不会自愿放弃满洲的一部分领土”。由于日本“在某些时候大概将需要我们的支持”，以对抗英国在海上占有优势的影响，而英国又是俄国“在亚洲主要的和最危险的对手”，因此，洛巴诺夫认为我们和日本的协商一致“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洛巴诺夫本人不论对这种或那种联合均不表示赞同，他只建议，“对于不问别国态度而单独对日本施加敌对影响的这种做法，应审慎地加以克制，以免日后伤害我们与日本政府的良好关系”。但是尼古拉却坚决赞成满足“迫切的需要”，认为“俄国无疑必须有一个在整年之内可供自由出入的开放港口。该港应在大陆上（朝鲜的东南部），并务必有一条狭长地带与我们原有的属地相连”。我们看到，沙皇尼古拉命令把这两个文件连同他的详尽批示，一起转交给即将召开的大臣会议的主席阿列克谢大公。①

然而，五天过后，3 月 30 日，会议是在急遽改变了的条件下召开的。洛巴诺夫到会时带来了刚刚得到的消息：(1) 德国宣布，“为了敦促日本放弃对包括旅顺口在内的南满、以及澎湖列岛的侵占”，它准备“参加我们认为必须对东京采取的任何行动，(2)法 72

① 洛巴诺夫 3 月 25 日的奏疏副本，以及奏折和 3 月 30 日会议记录的副本，都具有相同的外形，这些副本是在外交部复制的。

国也同意“使自己的行动和我们相适应”。德国政府立场的这一“突然转变”，正如洛巴诺夫所说的，使尼古拉已在实质上解决了的问题又回到了它原先的状况。

然而，阿列克谢大公由于得到了指示却极认真地捍卫了洛巴诺夫奏疏中的论点，甚至还发展了这些论点。他建议，“在西伯利亚铁路竣工之前”，就俄国占领一个朝鲜港口和满洲的阿穆尔河沿岸地带问题与日本达成“秘密”协定。但是，正是瓦诺夫斯基却一反自己在上次会上表述的意见，表示反对日本，并建议，一旦日本不放弃满洲（即使是在朝鲜南部属于日本、一个朝鲜港口归于俄国的条件下），就“诉诸武力”。然后，连确实没有得出任何结论的洛巴诺夫也宣称，日本发动的战争与其说是针对中国，不如说是针对俄国的，又说，“无论如何也不能指望日本的友谊”。

维特最坚决地力排众议，把解决问题的全副重担承当了起来。他声言，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那末为整顿我们的财政而花费了巨大努力所做的一切就有丧失殆尽的危险，在这种时候，他作为财政大臣，有优先发言权。他认为，“日本进行的战争是我们动工建筑西伯利亚铁路的后果。看来，所有欧洲大国，以及日本都意识到，对中国的瓜分在不久的将来定会发生，而一旦发生这种瓜分，西伯利亚铁路将大大增加我们的机缘。日本的敌对行动主要是针对我们的。日本人准备占领南满，这对我们将是一种威胁，而且或许会引起使朝鲜全境并入日本的后果。日本人在得到中国六亿卢布的赔款后，将在他们占领的地区构筑工事，并把非常尚武好斗的蒙人
73 和满人拉到自己一边，而后就将开始新的战争。在这种事态下，日本天皇过几年将成为中国的皇帝，这不是不可能的事。如果现在我们容许日本人到满洲去，那末，为了保卫我们的属地和西伯利亚铁路便需要几十万军队，并需要大大扩充我们的舰队，因为我们或迟或早不可避免地要和日本人发生冲突。由此就产生了一个问

题：或是我们现在容忍日本占领南满，而等西伯利亚铁路完工后再为自己要求补偿，或是现在就决定积极地阻挠这种占领，这两种办法中哪一种对我们较为有利呢？现在就转而采取一种积极的行动方式对我们会较为有利，而为了不使中国和日本同时反对我们，暂时不要力图修改我们的阿穆尔边界，一般说来不要进行任何占领。在对欧洲的关系方面要得体，并坚决声明，我们不能容许日本占领南满，若是我们的要求不予实现，我们就不得不采取相应的措施。当日本以及欧洲大国确信，一旦我们不得不进行战争，我们确实已经做好坚决行动的准备，那事情就不致闹到战争的地步，这种设想是极可能的。倘若事出意料，日本不听从我们外交上的坚决要求，那就应当命令我国舰队对日本舰队采取敌对行动并且炮轰日本港口，但同时不要占领任何地点。在这时，我们就会起到中国的拯救者的作用，中国也会认清我们帮助的价值，然后便会同意通过和平途径修改我们的边界。日本人对中国人的胜利还不足以证明前者的力量。实际上，据悉日本的作战部队不超过七万人，并且分散在朝鲜、满洲和南方。倘若万一事情闹到打仗的地步，那末，或许我们此刻所能拥有的力量从我方说来便已足够了。此外，还 74
可能指望中国人以及朝鲜人的某些协助，他们现在对日本人依然是仇视的。”

维特第二次发言时又一次强调指出，他准备把日本想要的一切都让给日本：台湾，澎湖列岛，①“甚至旅顺口，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甚至朝鲜的南部，只是不让出满洲”。为此，“现在就决定进行战争对我们较为有利，因为否则俄国就不得不在将来付出大得多的牺牲”。阿列克谢大公和奥勃鲁切夫试着提出不要“卷入”战争的警告，洛巴诺夫则预先断言，在这种情况下不打仗是不行的，而海军大臣和陆军大臣又证明已作好了战争准备，并证明，俄国力量

① 原文为 Рыбачьи острова，即我国澎湖列岛。——译者

相对而言是足够的。于是，问题就如同维特所希望的那样决定了。[①] 显然，以这种或那种代价使西伯利亚干线通过满洲的计划在维特头脑中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致他现在不惜为此去冒战争的风险，并准备暂时放弃在满洲的任何兼并。这样，正如阿列克谢大公预言的，他就"树立了"日本这个"永世的强敌"，并且"以局势的力量迫使日本人去和英国人一致行动"。[②]

会议作出了正式的决定，但是，洛巴诺夫只是在四天后才把会议记录呈递给沙皇。洛巴诺夫分明是举棋不定的：他不愿意看到日本占领旅顺口，也不想把它树为敌人，他认为必须去和它结盟，但又不相信可能得到它的友谊。而摆在他面前的道路有两条：一条是尼古拉预先指示的，兼并朝鲜的一个港口；另一条是维特起推
75 动作用的，把日本人赶出大陆，洛巴诺夫觉得这等于立即对日作战。但只是和日本一个国家作战吗？这一问题现在以一种奇特的方式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在会上无论谁也没有涉及到。而在会后，4月2日，法国大使在和洛巴诺夫的谈话中提出了这个问题。大使刚刚从巴黎返回，因此，必须认为他的话不是他个人的观点，而是表明了法国政府的建议已经最后确定。这项建议设想了两种方案：或者采取补偿的办法，其中法国自己打算要"海南岛附近的一个中国小岛"，或者"对日本采取强制措施"。"但是，蒙泰伯洛伯爵指出，同时不应当忘记，这类措施可能促使英国彻底转到日本一边，并且给日本必要的帮助来反对我们"。大使急于作出决定，指出，他的政府已"极端急不可耐了"。4月2日当天，洛巴诺夫

① 瓦诺夫斯基宣称，虽则"此刻"我们能抽调的兵力不超过一万二千至一万五千人，但是日本军队"现在也不能使我们受害"，因为没有足够的辎重和骑兵，他们"是寸步难行的"。经过六个月俄国军队的人数就能达到五万。奇哈切夫表示，我们的舰队"恐怕不用陷入大规模的海战"，便能切断日本的交通线。

② 会议的决定表述为下列两点：(1)"以友善的方式""劝告日本""放弃对满洲的侵占"，如遭拒绝便宣布，我们保留有行动的自由，以及(2)将此事通知各大国，其中包括中国。

就向尼古拉呈递了复述他与法国大使谈话的奏疏，而后才把会议记录呈交他批准，这件事是很能说明洛巴诺夫的立场的。洛巴诺夫的算计成功了。尼古拉第三次批示："同意2日的设想，亦即根据和法国的协商，不反对中日和约的履行，但无论如何要取得一个自由港作为我们所希望的补偿"。① 这就自然使尼古拉从心理上对和这一批示相对立的会议决定难予批准，而洛巴诺夫是直到3日才把会议记录呈给沙皇的。②

大家知道，尼古拉自己"表示愿意听取这次会议参加者的意见"，③ 4月4日，会议参加者中被召进宫去的有四个人，即维特，瓦诺夫斯基，洛巴诺夫和阿列克谢大公。维特"重复了自己的意 76
见"，"别人或者根本没有反对，或者反对得极为不力"，而"最后"，尼古拉采纳了维特的建议并立即批准了会议记录。④ 这一对今后整个事件的发展具有决定意义的场面的参加者中没有一个人留下关于此事的一星半点记载：根本没有作出记录，而我们有的只是维特《回忆录》中的这几行文字。但是，对于这几行的研究，不应当同维特在第1卷第35—37页中所叙述的关于三大国干涉的整个情节割裂开来。现在我们将看到，这几页的记述是不准确的，这些不实的记载构成了某种倾向，歪曲了前景，并将向读者提供虚假的历史情况。

维特所转述的情况是这样的。中日战争时"仅有一个人研究"远东问题，这就是他维特。不仅"我们的社会"，"甚至连最高级的国事活动家"对于这些问题也"是盲然无知的"，其中既包括洛

① 上有沙皇批示的洛巴诺夫和蒙泰伯洛伯爵的谈话的书面复述副本，见第20号卷。

② 4月3日洛巴诺夫奏疏的副本，及同时上呈的3月30日会议记录，见同上案卷。

③ 见洛巴诺夫4月3日的奏疏。

④ 维特：《回忆录》，第1卷，第37页。在3月30日的会议记录上有4月4日的批示："同意。"

巴诺夫，也包括尼古拉。“因此”，正是他在弄清了日本要求的内容后，“不得不全面考虑”应当怎么办。他提出了关于必须阻止这些要求实现的问题，而“为此”沙皇决定召集一次会议（指3月30日的会议）。他维特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一个原则：在许许多多年内俄国的全部利益在于使中国保持现状”。而且他是“极为坚决和坚定地”“提出”这一原则的。“只有瓦诺夫斯基支持”他。“奥勃鲁切夫相当冷淡地对待这个问题”。“而其余与会者则”“没有表示任何明确的意见”。于是，阿列克谢大公只好问道：“为了实现我的愿
77 望应当怎么办呢？”维特便建议向日本发出一项最后通谍。“但是会议却没有作出任何决定，因为没有一个人明确地反对我，同时，许多与会者也没有说，他们同意我的意见”。洛巴诺夫“一直保持沉默”。接下去就是已经援引过的关于4月4日宫廷会议的几行文字了。

在这一说法中有的简直可以当作是叙述者的自负之言。而当我们把《回忆录》的说法和文件的记载进行对比时，我们就看到，尼古拉对问题作出了明确的决定，赞成这样一种企图：通过和日本的协商，把辽东让给日本，以换取在朝鲜的割让。尼古拉在一星期之内三次重复了这一决定，并加以论证，而这项决定在维特这里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这就是为什么在维特这里洛巴诺夫和阿列克谢大公都保持“沉默”的原因，于是结果便成了这样：整个说来只有他维特的一种建议。这也就是为什么早在1月20日就已确定、并由洛巴诺夫在3月25日已经准备就绪的3月30日的会议，结果不是其他一系列会议中的例会，而是根据他维特的建议突然召开的原因。奥勃鲁切夫在1月20日曾表示反对与日本关系的紧张化，3月30日又赞成为了取得阿穆尔河沿岸的满洲地带而与日本进行协商，这两回他都是同样明确的，可是连他也只是落到了“漠不关心者”之列，其原因也在于此。这是必须指出的第一点。

第二点是俄国的“全部利益”和维特在3月30日会议上提出的那个基本“原则”的表达方法。上面我们特地从会议记录中全文照录了维特的发言记录。不难发现，维特的主要论点是：(1) 在西伯利亚铁路完工以前，不应当对日本人开放满洲；(2) 西伯利亚铁路的建成“在不久的将来”对中国的瓜分中将增加我们的机缘；(3) 暂时(在最后通牒事件① 尚未结束时)应当对于修改阿穆尔边界乃至各种占领实行克制；以及 (4) 中国拯救者的作用可能导致通过和平途径修改阿穆尔边界。在这四点中，维特仿佛要求保持中国的“完整和独立”的那“许许多多”年无影无踪了。因为这“许许多多”年出现在维特的《回忆录》中是在1907年以后。那时，维特追溯着往事，上述想法变成了他论战的基本宗旨。而最后，第三点，德国为实现维特为之奋斗的行动纲领坚决提供了帮助，从而引起了国际形势的“突然”变化，维特对此也绝口不提。

78

考虑到这些情况，好象就能看穿维特关于4月4日宫廷会议的简短记述了。照维特的说法当时的情况是：只有一种提案，而别人在进行“不力的”反对时并未提出任何对案，这样在尼古拉面前就只发生了两种互相竞争的观点的争议，而没有两种互相竞争的实际提案的争议，但事情却根本不是这样的。第二，尼古拉不仅是最后仲裁者，他同时还是一个明确的对案的作者，而维特则必须与他进行论争，并寻找许多正是以尼古拉为对象的论据。事实上，对于维特说来，问题不仅是以自己方案的诱人之处吸引沙皇，而且要利用尼古拉“向远东运动并在当地攫取地盘的自发愿望”，使自己方案中不占领朝鲜某个港口这一点容易得到通过。② 如果在此应当对保卫满洲的好战方案所冒的风险有所担心，那末，在法国人动摇不定的情况下，只好依靠无条件准备冒险的德国人了。

---

① 指1895年春俄德法三国出面干涉，日本退还辽东的事件。——译者

② 见维特：《回忆录》，第1卷，第35页。

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我们不得不认为，尼古拉在4月4日“最终”同意进行战争冒险，不单是，多半不是，甚至不如说完全不是由于受到维特在《回忆录》中如此恣意渲染的那些原则的诱惑的缘故。尼古拉同意进行冒险，第一是由于维特全部论据的力量，现在还能根据当时的文件重新举出这些论据；第二是由于前景的价值，若是取得胜利，那么在满洲和朝鲜没有日本人的情况下，在我们的西伯利亚铁路穿过满洲进行敷设并修改阿穆尔边界的情况下，随
79 着“不久的将来”对中国的瓜分中众所“承认的”“我们的机缘的增加”，战争的前景就将展现出来。维特在此是否建议尼古拉永远打消关于俄国“毫无疑问”必须有一个不冻港（在满洲或朝鲜均可）的念头呢？

就这样，维特在4月4日坚持住了自己的主张。俄国担任了“中国拯救者的角色”，并为满洲去和日本作战。同月5日，威廉二世已经通过电报得到了彼得堡发往东京给驻日使节的训令副本，于是，他立即给在中国水域的德国舰队下达了一道命令，令其与俄国舰队取得联系。① 但干涉却和平地结束了，并取得了预期的成功。三大国的联合照会确实是太晚了，而《马关条约》的最初定稿不仅已在4月5日（17日）由全权代表签署，而且已于4月26日（5月8日）获得批准。接着，4月28日，宣布了日本关于把辽东归还中国的决定，并提出了就条约的这一变动与中国缔结一项单独协定的要求。在磋商归还辽东的条件时，又不能没有三大国的干涉，于是协定直到1895年10月27日（11月8日）才签字。② 这样，不仅日本打算在大陆上取得的唯一的领土收获被剥夺了，并且就

① 4月5日（17日）和4月6日（18日）威廉的电报见《威廉二世和尼古拉二世通信集》，莫斯科1923年版，第6页。

② 见《远东事务的条约和外交文件汇编（1895—1905年）》，圣彼得堡1906年版，第1页及以下各页，第63页及以下各页，第89页及以下各页。并见马克谟：《与中国签订的及有关中国的条约和协定》，第1卷，第52页。

连与此相关的外交程序本身也使日本不得不遭到一些形式上的屈辱。

这一回维特的冒险成功了，兵不血刃就把满洲夺了回来。日本被吩咐离开舞台，而等待着穿过满洲的西伯利亚铁路的竣工。"感恩的"中国登上了舞台，并愿意"通过和平途径"修改阿穆尔边界。但是满洲问题已不只是一个边界问题了。在维特的意识中这个问题即使在那时也绝没有归结为只是通向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铁路走廊的问题。俄国不仅没有放弃物色一个不冻港的要求，而且把满洲变成了自己深入中国和朝鲜的帝国主义进攻性政策的出发点，这种进攻事先并没有确定的界限。正如维特早在1900年说过的那样，"不值得因为满洲而围起墙垣"："我们将通过历史的道路走向南方"，"整个中国——它的全部财富主要是在南方"。① 80

这样就产生了"水族馆"节目单的第三个稿本，并在1895年夺回了通向"水族馆"的道路。维特没有一处回忆到（也许是因为当时他没有发现），威廉二世在3月25日到30日之间立场的"突然转变"，对维特促使尼古拉走上这条道路提供了极大的方便。然后，威廉立刻着手去实现自己的"权利"，要求对所给与的帮助表示"感恩"。早在4月14日（26日），威廉在给沙皇的信中对尼古拉为反日的"全欧共同行动"所奠定的"极好的开端"给与了过高的评价，他"有兴趣地"期待着"我们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并建议帮助俄国"妥善解决对俄国可能的领土兼并问题"，以便使尼古拉同样"赞

① 维特在库罗帕特金《论二十世纪俄国军队的任务》的报告上对库罗帕特金的话作了如下批注：俄国"在最近若干年内"必须"避免和欧洲国家在中国发生冲突，为此，应当以中国北部的范围为限，不在长城以南，特别是扬子江流域建设铁路企业"。上有维特批语真迹的报告文本存于中央档案馆的库罗帕特金档案中。应当指出，在存于中央档案馆维特档案（第269号）的报告副本上，维特的所有批注都是抄写员的手笔复写的，但每一条批注都由维特亲笔签字，可是援引于此的一条批注却没有签字，并且被维特签名用的那种墨水抹掉了！！

许地”对待德国“在不使你感到不便的某地”取得“一个港口”的问题。此外，威廉还承诺“保持欧洲的安定并保卫俄国的后方，使得
81 无论谁也不能干扰你在远东的行动”，而且以后每遇合适的机会便不厌其烦地重复这一点。① 这就是说，俄中两国能够缔结关于在中国领土上修筑俄国铁路的“友好协定”之时，恰恰是轮到德国“侵占”中国领土之日，这并非偶然的巧合，同如今在俄国面前展示的在满洲、朝鲜、乃至“整个”中国的前景比较起来，“一个加煤站”（这是尼古拉对威廉要求的理解）绝不是过分的补偿。②

① 见《威廉二世和尼古拉二世通信集》，第7、8、9、15页。

② 见同上，第10页。

第二章

俄国对满洲的“和平”渗透

(1895—1896年)

I

82

使贝加尔以东的西伯利亚铁路穿过中国领土的想法，作为俄国的一项“迫切”需要，是在1895年中日战争的形势下，完全凭经验产生的。大家知道，海军上将科佩托夫在1887—1890年间是始终不渝地坚持这一主张的。起先，他在俄国皇家工程协会作了一篇题为《论横贯全俄的东方大铁路干线的最有利方向》的报告，但在此总共只得到两个人的赞同。后来，他又在1890年4月给丘别涅特写了一封便函。[①] 但是，赞成科佩托夫主张的人却寥寥无几。不论是丘别涅特1891年的方案，还是维特1892年付诸实施的方案，两者都是考虑用完全在俄国境内敷设的铁路把斯列坚斯克和哈巴罗夫斯克[②]连接起来的。诚然，早在1892年，维特就不反对“进入中国境内的支线”这种议论，他甚至觉得，“在最近的将来建筑一条这样的支线，未必会遇到严重的障碍”。但是，当时所指的并不是干线，而是为了“与人口极为稠密的中国内地省份直接进行贸易”的一条供给支线。而到第二年，即1893年，由于巴德马耶夫从伊尔库次克到兰州铁路线的方案，维特已经讲到若干条这样的

① 见《西伯利亚铁路的今昔》，第93—95页。

② 即伯力。——译者

83 支线了。①

哈巴罗夫斯克和斯列坚斯克之间的阿穆尔地段的勘查工作直到1894年夏季才开始，而到本季末即已表明，沿这一方向困难重重，这才使维特想到用穿过满洲的办法来绕开所遇到的障碍。② 无疑，维特在1895年提出这一想法时，是考虑到了中国一筹莫展的处境的，中国在对日战争的头几个月中便已落到这种境地了。但是，这一想法的范围却证明它是由具体的技术原因产生的。阿穆尔轮运和贸易公司经理马克耶夫在他1895年2月10日给财政大臣的报告中，以及维特本人在同年同月早些时候给外交大臣的便函中（便函是为前来祝贺尼古拉二世加冕的中国特别使团到达一事而发的）③，所要求的都是得到中国允许，修筑一条从新祖鲁海图卡伦、经墨尔根④到布拉戈维申斯克的铁路。可见，两者都只限于对俄国边界的最小偏离，在此以前，俄国军界借着"修改我们的阿穆尔边界"的名义，早已主张这样做了。而外交部则认为，这是"只要进行外交公文往来"便能得到的东西。⑤ 它也被包括在洛巴诺夫公爵于1895年3月25日向尼古拉具奏的"迫切需要"的清
84 单之中。只是马克耶夫和维特二人在这里所指的甚至并不是土地的割让，而仅仅是购买建筑铁路的权利。

但是，把困难的阿穆尔弯道部分拉直这一相对谨慎的主张，

---

① 见财政大臣1892年11月13日的报告。这是维特在一次讨论西伯利亚铁路建筑问题的特别会议上作的，见前引财政部总务司二处关于这次会议的案卷。

② 详见《西伯利亚铁路的今昔》，第233—235页，以及格林斯基：《日俄战争的序幕》，第30—33页。关于《在外贝加尔线路第二段和阿穆尔线路所遇到的技术困难》的专题报告，附在财政大臣1896年11月11日对西伯利亚铁路委员会所作的报告（第4250号）之后，报告题为《关于〈中东铁路公司章程〉的批准问题》。

③ 李鸿章使团于1896年4月到达俄国。——译者

④ 即嫩江。——译者

⑤ 见第3号卷，亚洲司司长1895年11月呈外交大臣的条陈。本卷还存有《马克耶夫的情况报告》原件。

直到《马关和约》签字前并未取得外交上的进展。可是在三大国的最后通牒以后，这一好象完全微不足道的想法，却立即发展成了从赤塔直至符拉迪沃斯托克全程笔直的铁路的主张，而且仿佛是自然而然发展起来的。早在1895年5月12日，交通大臣显然完全瞒着其他大臣，① 奏请沙皇批准"对满洲线路进行勘察"。他估计，这条线路与阿穆尔线路相比，可以缩短将近七百俄里的建筑距离，省下三千五百万卢布的费用。② 俄国的某些无法排除的要求现在已经临到满洲头上了，这一点例如甚至一些美国人也察觉到了。首先，是一个名叫布什的美国人，作为美国一个团体的代表，"在《马关条约》签订后立即"来到了北京。他拜访了俄国公使喀西尼伯爵，以便把自己的委托人打算承建穿过满洲的铁路的意图预先公开通知他，并鉴于俄国的利益在那里显然占有优势，来探听俄国政府对于此事的态度。③

俄国人自己也在推动这件事。首先是当地的船主们，他们对使与阿穆尔河平行的铁路离开该河较远一些有切身的利害关系。比如在5月，维特就通过他们获悉，"中国官员"有这样的意向："纵然让俄国把边界推进一千俄里而保有一个古老的邻国，也比让日本人进入大陆强"，他们还认为，"俄国在和谈时给了帮助，这使它完全有权取道满洲敷设一条经过尼科尔斯克④、宁古塔、齐齐哈尔、祖鲁海图的铁路"。这些信息正是那个马克耶夫告知的。他认为，进行购买这种权利的谈判最适宜的时机已经到来，因为中

85

① 见第3号卷。至少早在1895年10月7日，洛巴诺夫在得到关于北京政府对俄国工程人员在满洲的勘查活动表示不安的消息后，就请求维特下令停止这类活动。然而维特对此却一无所知。他怀疑，这是否是巴德马耶夫的那些汉子干的(他在洛巴诺夫的信上批道："是巴德马耶夫吗？")。

② 见同上，希尔柯夫1896年6月28日的奏折。

③ 见同上，喀西尼伯爵1896年4月10日发自北京的报告。

④ 或尼科尔斯克-乌苏里斯克，即双城子。——译者

国正"急需大笔金钱"。[1] 维特当时还没有自己的正式代理人，因此，他乐于和地方的志愿人士进行类似的交往。但他并没有去促进满洲的铁路问题，也没有停止发放阿穆尔地段的勘查活动所需的经费。那时在维特的头脑中，围绕着铁路问题的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而是一项宏伟的政治计划，它的基本准备工作现已成了当务之急。

如上所述，此刻东方的国际局势对于实现那个西伯利亚铁路的基本政治公式确实是异常有利的。在维特心目中，这一公式使铁路成为俄国和平政策的工具。但他是在1892年提出这个公式的，而它所必需的各种条件当时实际上并未具备。在俄中关系方面，1879年的《里瓦几亚条约》[2]遭到了挫折，边界上的误会、争端绵延不断，加上俄国八十年代在朝鲜玩弄的阴谋（这些阴谋使中国人看清了其最终的涵义），所有这些都毒化了当时的气氛；而在英中关系方面情势的特点是：英国在朝鲜问题上支持中国，它在北京又有政治影响——这就是俄中结成主要针对英国的互利的经济同盟这一主张当时所处的形势。

英国对中国的支持早在1894—1895年战争最紧急的关头就达到了顶点，当时英国接连贷给中国两笔巨款，使中国总算能勉勉强强地进行战争，而不立即投降。[3] 但在和谈期间，英国的政策突然发生了急遽的转变，站到了日本一边，而俄国则相应地急剧转变
86 为保护北京，这就使中国的大门如今为俄国所敞开了。在《马关和约》缔结后第二天就首先必须注意到的一个基本的有决定意义的

① 见第3号卷。马克耶夫1895年5月25日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发给维特的电报。马克耶夫会见了天津的商人斯塔尔采夫，使维特的"愿望得以实现"。这些消息是斯塔尔采夫从上海带来的。

② 即《伊犁条约》或《崇厚条约》。条约签订后，清政府拒绝批准。因此条约未批准、交换。——译者

③ 关于债款契约见马克谟：《与中国签订的及有关中国的条约和协定》，第1卷，第11—18页。借款总额为四千五百万卢布左右。

事实是：中国政府刚刚头一回承借了这样庞大的一笔（四千五百万卢布左右）金债券的借款，它又必须在最近六个月内付给日本大约七千万卢布，再过六个月还要付七千万卢布。在七年内，连同年息五厘的利息增殖，还得付出一亿四千万卢布。[①] 这些使中国不寒而慄的款项只有靠借外债才能得到。于是，中国政府立即提出了这项外债的问题，并在俄历4月上半月同时在柏林、伦敦和巴黎的银行界引起了骚动。

在此，令人十分奇怪的是，看来中国人把彼得堡撇在了一边。彼得堡并不是从中国人那里得知此事的，也不是立即得知的。关于银行家们已经开始商议的消息最先是从柏林获悉的。4月14日（26日），恰雷科夫通知外交大臣，中国政府已经就偿付赔款的外债问题开始了谈判，交涉"主要在柏林，但也在伦敦"进行，还说，在柏林银行家们已经举行了两次会商，德国政府对此极感兴趣，它赞成这项贷款，正在向德国银行家"施加压力"。恰雷科夫甚至已经在德国外交部听人作过说明，人们不仅向他证实了上述情况，而且还使他获知了若干细节：事情遇到了美国人的竞争，他们渴望把自己积攒的银子储备抛到中国去；德国人对于中国海关部门作担保尚嫌不足，设想"仿照土耳其和埃及的样子"，在中国建立一个专门 87
的行政机构。[②]

维特当即直接向门德尔松询问详情。原来，"关于成立一个由德、英、法三国银行组成的银行团"的交涉正在进行，但尚未谈妥，而且一般说来，"尚未作出任何决定"。[③] 过后，国际范围内银行家

① 《马关和约》第四条，见《远东事务的条约和外交文件汇编（1895—1905年）》，第4页。

② 见第17号卷（《关于中国外债的议定》），恰雷科夫1895年4月14日（26日）的电报副本。

③ 见同上，维特1895年4月15日给门德尔松的电报和门德尔松4月16日的复电。

之间的谈判就消声匿迹了，事情很快转到了俄国人的手中。5 月初，从巴黎第一次提出了吸收俄国参加拟议中的国际银行团的主张。对华贷款的法国银行团是以巴黎荷兰银行为首的。这家银行认为，俄国可能从政治角度对此事感到兴趣，便建议维特"组织一个俄国银行团，以便与法国银行团同时行动"。表面上，这"可以使管理中国债务的行政机构中俄国代表的席位合法化"，而实际上，巴黎荷兰银行是准备把俄国这一份攫为己有的。① 可见，法国人已经接受了德国人倡导的关于专门"管理中国债务的行政机构"这一主张。这个机构的必要性似乎是由此产生的：中国可能建议用中国海关收入作为偿付债款的担保，但只要中国海关的管理权完全掌握在英国一国手中，这种简单的担保就是靠不住的。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倘若俄国照法国建议的那样参加对华贷款，那首先就表示俄国对拟议中的那个机构是赞许的，而由于这一机构的国际性质，它恰恰不会在政治上给俄国带来任何好处，而只会使俄国成为觊觎中国主权的普通一员。于是，维特只好从下列两者中作出抉择：抑或拒绝参加贷款，把它让给别的国家；抑或自己提出别的担保，以此把中国政府从必须允许实行国际财政监督的状况中解脱出
88 来。但是，就连维特当时也还没有成熟的决定，因此他对巴黎的回答是不置可否的：他"对事情不太熟悉，不能对这一提议给予任何答复"。② 但过了一个月，法俄对华贷款已经议决的消息已为人所共知了。③

我们手头拥有的关于对华贷款谈判过程的资料是零碎不全的，不足以说明问题的。因此，我们至今仍不能确定，维特是在何时、何种情况下接受了法国的建议，并选择了自己参加贷款的这种

① 见第 17 号卷，拉法洛维奇 1895 年 5 月 5 日从巴黎发给维特的电报。

② 见同上，维特 1895 年 5 月 5 日给拉法洛维奇的电报。

③ 6 月 9 日(21 日)《泰晤士报》：6 月 5 日(17 日)发自圣彼得堡的电报。

方式。看来，在此起决定作用的事实是：不论法国人，还是德国人，他们虽然互相没有断绝关系，然而他们是各自单独与中国进行交涉的。而中国从一开始就表示愿意以“分散的”和“无系统的”方式进行交涉，指望从各个财团的竞争中捞到好处。① 例如，据所知，中国在进行巨额借款谈判的同时，还在柏林和伦敦商谈两笔地方需要的小额借款，款项分别为一百万英镑和四十万英镑。② 维特在与德国驻彼得堡大使的多次谈话中“不厌其烦地”说明，“他根本无意参加这一贷款”，可是他却背着德国人“完全出乎意料地”议定了贷款，因此，这时德国人认为，维特方面对他们“耍了花招”。③ 洛巴诺夫为了答复这种非难，指出，俄国之所以单方面与中国洽谈，是因为德国人其时也在单独和中国谈判。而当拉多林对此予以断然否定时，洛巴诺夫就推托说，法国人不愿意让德国人参加。④

另一方面，我们知道，早在俄历 5 月 18 日，奥斯基埃就从巴黎 89
函告维特，“迄今为止尚未就贷款问题与中国政府进行郑重其事的谈判”，他还建议维特为了俄国自己的需要着手安排贷款。⑤ 而到 5 月 29 日至 30 日，罗特什捷英⑥ 已经在巴黎了。他在这两天里结束了和法国银行团的谈判，设想了两种方案：法国银行团“帮助下的”贷款，或是“国际”贷款。⑦ 德国人在这时也没有袖手旁观，这从一份文件（遗憾的是我们不知道文件的日期）中便可明显看出。文件讲到，中国驻巴黎公使通知法国银行团的代表，终止和法国银

① 恰雷科夫在我们前引 4 月 14 日的报告中已经指出了中国人的这种行事方式。

② 见第 17 号卷，恰雷科夫俄历 4 月 20 日发自柏林的急电。

③ 见《德国外交文件》，1871—1914 年，第 9 卷，第 312 页，拉多林 1895 年 8 月 9 日给霍恩洛厄的电报。

④ 见同上，第 313 页。

⑤ 见第 17 号卷，奥斯基埃 5 月 18 日（30 日）的信。

⑥ 旧译作罗启泰等。——译者

⑦ 见同上，罗特什捷英俄历 5 月 29 日从巴黎发给维特的电报。

行团的谈判，因为德国的建议更为可取。文件还说，法国政府从柏林获悉，德国按同英国人平分的原则进行的活动已经结束。[①] 既然这项资料确实反映了德法两国银行团之间的竞争，引起竞争的部分原因是因为当时两国都有丰富的闲置资金，又遇货币贬值，那末，对于恰恰选择了法国银行团这一事实也就不需要作特别的解释了。一般地说，俄国绝不能丝毫损害自己与法国金融市场的关系，在具有政治意义的事件中尤其如此，这是因为，否则俄国首先要冒断绝实现自己宏伟的远东政策的财政供给基地的风险。应当认为，当霍丁格尔、内斯兰和雷内·布勒斯应邀到彼得堡（6月9日），准备在6月14日觐见沙皇时，维特的意图已经不限于只同他们签订一系列关于贷款的文件了。

到6月23日，关于贷款的文件已达成一致意见。由俄国作保、
90 总数为一亿金卢布的对华贷款可以认为是已经定下来了。[②]而在6月24日，贷款合同刚刚签字盖章以后，维特立即在外交大臣办公室里，在洛巴诺夫公爵在场的情况下，向上述三位银行家就建立一个有他们参加的俄国银行的问题提出了“一些确定的建议”，这家银行将得到俄国政府的庇护，“以便以最广泛的方式在东亚诸国开展活动”。[③] 这些确定的建议是在国际官场的环境中提出来的，不仅财政大臣，而且在场的外交大臣都进一步作出了对事情起决定作用的承诺，他们答应，对银行在这一辽阔地区几乎无拘无束的活动给予充分的保护。这一地区可能成为国际斗争的舞台，银行则应

① 这份文件是内斯兰给罗特什捷英的电报的抄件，上有罗特什捷英的签字可资证明。此件装订在第17号卷中，置于罗特什捷英俄历5月30日发自巴黎的两份电报的译文之间。

② 承担年息四厘的对华贷款的辛迪加是由下列银行组成的：巴黎霍丁格尔公司银行，巴黎荷兰银行，里昂信托银行，法国振兴工商业合股公司，巴黎国家贴现银行，工商信托银行，圣彼得堡国际商业银行，圣彼得堡贴现贷款银行，俄罗斯对外贸易银行，沃尔日-卡姆银行。贷款清单载于《远东事务的条约和外交文件汇编（1895—1905年）》，圣彼得堡1906年版，第56—60页。

③ 见第24号卷，维特1899年1月17日给穆拉维约夫的信。

成为这种斗争的工具。与纯粹的商业活动一起为银行提出的另一项任务是："巩固俄国在华的经济势力，以便与英国人主要由于实际攫取了海关管理权而在中国占有的极重要的地位相抗衡。"①

为此目的，银行相应地被赋予广泛的权利：贸易、货运、开展为中国国库服务的任何业务（其中包括征收赋税和发行货币）、获取在全中国范围内建筑铁路和敷设电线的租让权。既然维特向外国银行家作出了这种规模的提议，并用一旦发生国际冲突政府保证支持银行的"诺言"来约束自己，用他自己最后承认的话说，他就使他的国家及其整个财政体制信用的可靠程度都取决于这一"诺言"的履行情况了。② 但是，由于在银行董事会中俄国占有多数席位，维特就能保证自己对于银行工作的大政方针拥有足够的影响，从而取得了实行自己政策的一个得心应手的工具（它是由私营企业和外国股份占优势的信贷企业这样双重的外衣作掩护的），它还使这一政策的未来发展达到了最强大的欧洲国家在华政治方法论的最强音的水平。③ 91

① 见维特 1895 年 7 月 14 日关于财政部总务司的奏折。

② 见第 24 号卷，维特 1899 年 1 月 17 日给穆拉维约夫的信。

③ 银行创建者有：巴黎霍丁格尔公司银行，巴黎荷兰银行，里昂信托银行，国家贴现银行和圣彼得堡国际银行。银行的固定资金为六百万卢布，其中八分之三是俄国股份，八分之五是法国股份。但在总行董事会中只有三席属于法国股东代表，五个席位和董事长都是俄国代表。法国董事是：若泽夫·霍丁格尔，内斯兰和夏布里厄尔。俄国董事是：罗特什捷英，诺特加弗特，财政部办公厅厅长 П. М. 罗曼诺夫和两个在远东的俄国地方商人斯塔尔采夫和弗拉基米罗夫。国家贴现银行上海分行自 1896 年 1 月 1 日起移交给华俄道胜银行，它的行长仍然是法国人武伊勒蒙，另外又增补俄国臣民维尔特为第二行长。财政部的代理人 Л. Л. 璞科第逐渐成了天津分行的主持人。见财政大臣 1895 年 9 月 30 日关于财政部总务司的奏折。罗特什捷英在巴黎和法国人进行了谈判。关于在银行董事会中法国成员占三席的主张遭到了法国人的反对〔见第 1 号卷，第 1 部分，璞科第 1895 年 9 月 19 日（10 月 1 日）发自伦敦的报告〕。璞科第从他和法国驻上海领事吕班的谈话中得到的印象是："法国人指望在银行中起到首要作用"〔见第 1 号卷，第 1 部分，璞科第 1895 年 11 月 9 日（21 日）发自上海的报告〕。看来，法国人的希望并未被认为是合理的。银行创建两年后，法国董事对维尔特在上海分行的活动表示了不满，据称，他"监视银行中的法国人士"，并且妨碍银行的活动。然而，按照俄国的观点，上海分行所取得的成就正应归功于维尔特。因此，璞科第认为有必要"向法国人断然声明，让他们不要再打搅我们，而如果他们不满意华俄道胜银行的活动，那就让他们自己去建一个银行吧"（见第 40 号卷，第 1 部分，璞科第 1897 年 10 月 20 日的电报）。

92 与法国人的谈判到1895年9月30日结束。银行定名为华俄道胜银行，它的章程是在俄国拟就的，并于同年11月23日在巴黎由法国的创办人在俄国使馆内签署。12月10日，银行章程获得批准。

维特在7月14日的报告中，在确定银行"关于巩固俄国在华经济势力方面"的任务时，"其中"指出，"在俄国政府建造与西伯利亚铁路工程的竣工具有最直接关系的最后一批设施时"，银行"可能成为俄国政府手中极其有益的工具"。在关于银行的全部细节于9月30日确定下来之前，在与日本进行的关于把辽东半岛归还中国的极其拖沓的谈判结束之前〔10月7日(19日)换文〕，维特并没有讨论铁路问题。如今，正是维特，而不是洛巴诺夫，把满洲铁路的问题旧事重提。这回铁路已不只是修到布拉戈维申斯克，而是穿过整个满洲直达符拉迪沃斯托克(10月30日的奏折)，维特还承担了草拟建筑铁路的租让方案和具有指导意义的政策性备忘录的任务，这份备忘录将是对俄国驻北京公使进行谈判的指令。

在法国人签署银行章程草案四天后，11月27日，上述两项文件均已准备就绪。维特便把该两项文件附于自己亲笔写的奏折之后呈递给沙皇批准。维特"鉴于此次所追求的目的的重要性"，并考虑到，"在这类情况下对清帝亲信近臣的贿赂(其数额往往是极为巨大的)""对于在中国取得租让权"具有"不小的意义"，于是，他提议允许他拨出"一笔适当的款子"供俄国驻北京公使支配。为了进行这些贿赂，维特已能推荐"华俄道胜银行的一名代表(财政部
93 的一名职员)，此人同时又是俄国铁路公司的代表"。① 尽管沙皇当即批准了这两份文件，可是不知何故在北京却迟迟没有开始谈判。不管怎样，就是在俄国政界当中也有人反对这件事。而且此事在

① 见第51号卷(《关于特别基金的设立与从中对各种人士的支出》)，第1部分，第1、2页，维特11月27日的奏折，上有尼古拉的批示("同意")。

外交程序上也完全不是那末容易办到的。

不应忘记，尽管俄国现在准备向中国提出的要求范围很广，但它和日本人在中国战败后凭着好运气向中国提出的一系列其他类似要求相比，却并不显得突出。法俄原先的方案是：不阻拦日本人，靠牺牲中国为自己寻得补偿即可。在最后时刻才作出了干涉谈判进程的决定，取代了上述方案。但这一决定也没有排除要求补偿的政策，而只是以中国对列强的干涉所给予的帮助表示"感恩"的形式为补偿政策寻找新的理由。法国在决定性时刻虽然没有别的大国那样积极，但接着，早在归还辽东的谈判的初期，它就首先回到了要求补偿的心理状态，当法国驻柏林大使在公历5月4日讲到澎湖列岛时，至少柏林对他是这样理解的。而我们知道，澎湖列岛并没有包括在列强的最后通牒中。① 接着，正是法国人坚持要日本承担一项补充义务："承认福摩萨海峡② 具有公海交通要道的作用"，它在日本"专属监督或利用的""范围之外"。③

然后，法国公使施阿兰在北京达到了签订（对1887年条约的）两项补充条约的目的，从而实质上使法国在中国南部得到了补偿。除了靠损害中国的云南来改变法属东京④ 的边界外，中国还在广西和云南两省对法国开放若干商埠，保证有关云南、广西和广东的开矿事宜首先同法国企业家、工程师商办，并使法国有权在中国领土上不仅续修安南已有的铁路，还能新造计划中的铁路。⑤ 同时，

94

① 见《德国外交文件》，第9卷，第284页，第2260号，马沙尔1895年5月4日给哈茨费尔德的电报。

② 即台湾海峡。——译者

③ 见《远东事务的条约和外交文件汇编》，第64页，俄国驻东京大使和日本外务大臣1895年10月6日—7日（18日—19日）的换文。

④ 法国殖民主义者称越南北部为东京。——译者

⑤ 见《远东事务的条约和外交文件汇编》，第14—27页，1895年6月8日（20日）的补充条约。对这两项条约的评释见 O. 傅兰克：《列强在东亚》（O. Franko: «Die Grossmächte in Ostasien Von 1894 bis 1914»），不伦瑞克1923年版，第109—110页。

法国准备向中国提供贷款。然后，法国资本又对银行[1]进行投资，而这家银行是以支持来自北方的俄国（它带来了在中国规模空前的铁路方案）为己任的。所有这些使法国在当时对中国展开的夹攻中成了欧洲的头号倡导者。维特在贷款问题上对法国的这种动向"下的一着妙棋"，与其说仿佛是对德国人用的心计，不如说是他注意到了不然的话法国人的势不可免的竞争。如今，法国人竟在中国领土上成了俄国的盟友，他们一有机会首先不得不遇到的正是以俄国银行为外壳的法国资本。[2]

如果以为德国现在居然不图谋得到任何补偿，那就大错特错了。德国比法国在时间上稍后了一些。它在 1895 年 10 月在天津和汉口取得了两处租界。它以前在物色一个海港还是同时在北方和南方物色两个海港的问题上犹豫不决，也是在 10 月，它开始就这一让与问题在彼得堡与中国公使（公历 10 月 29 日）、在北京与总理衙门双管齐下地进行谈判。[3]

95 毫不奇怪，俄国关于满洲铁路租让权的要求至少应当考虑到北京当局的警觉心情。北京当局最警惕的就是俄国，因为它迟迟没有提出自己的要求，因而在北京造成了一种捉摸不定的惊恐气氛。据俄国驻北京公使观察（1895 年 12 月 16 日的急电），"中国对我们的感激心情在开始减弱，而代之以某种捉摸不定的恐惧感和不信任感，引起这种心情的是这样一种预感：认为我方在短时期内将提出特殊的要求，关于这些要求的性质和范围现仍瞒着中国"，而"形形色色的外国谋士们"只是在"挑惹"这种担心。"最

① 指华俄道胜银行。——译者

② 见第 25 号卷，第 1 部分，里斯捷列丘别尔的电报可以算是银行联盟在中国事务中发挥作用的一个很早的事例。他按照内斯兰的委托，将费务林公司取得从东京到龙州和南宁的铁路租让权一事通知了罗特什捷英，因为"这可能使你感到兴趣"。

③ 见《德国外交文件》，第 14 卷，第 18—20 页，第 3654 号，拉多林给霍恩洛厄的电报，第 3655 号，申克·冯·施文施贝格给柏林外交部的电报。

近”，公使甚至发现，“中国大臣对于履行我们的一些不大重要的要求，也远不如几个月以前情愿了”。①

看来，公使本人极为不安，他认为需要就“特殊”要求的问题向彼得堡敲敲警钟。举例说，阿穆尔沿岸地区总督和草原总督这时正同铁路问题一起规划着（完全以法国人的风格）这些要求。这就是：（1）兼并斯列坚斯克至布拉戈维申斯克的铁路线以北的那部分中国领土，（2）修改乌苏里边界（松花江口也包括在内），使之有利于我们，（3）修订 1881 年《彼得堡条约》的各项规定，（4）把巴尔里克山割让给俄国，（5）全面更改谢米列奇耶省和塞米巴拉金斯克省的全部边界。在喀西尼看来这些要求显然是不能实现的，于是，他坚决建议集中力量达到一项“主要的”既定目标：修筑满洲铁路。②

但是，问题不仅在于“担心”和“不信任感”正在北京增长，而且 96
还在于，列强在新的贷款问题上在北京重又激烈竞争的时刻已经临近。6 月 24 日合同第十六条规定，中国政府在一个时期内不经法国财团同意不得寻求新的贷款，到 1896 年 1 月 15 日这一规定的最迟期限就满了。同时，那时获得的一亿卢布，远不够抵消战争赔款这一项的数额。中国政府等待着列强在贷款问题上激烈竞争的时刻的到来，它不用担心告贷无门，这就确定了它的立场。在这里，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倒向英德集团对中国从政治上说来较为有利，这样便于恢复力量的均势，现在这种均势遭到了破坏而使法俄方面获益，因而导致了严重的、但远非全部的后果。大家知道，此次贷款是得自汇丰银行和德华银行的。③ 中国人并非不想再向法国人借一笔款子，但事情却因维特拒绝作保而遭到阻挠。他

① 见第 3 号卷，第 29 页，喀西尼伯爵 1895 年 12 月 16 日的第 74 号急件。

② 见同上。原件上有尼古拉二世的批示：“对”。

③ 见马克谟：《与中国签订的及有关中国的条约和协定》，第 1 卷，第 55—59 页，1896 年 3 月 26 日的合同。

认为，用海关收入作为借款担保是靠不住的，他不想“欺骗公众”，不愿意损害自己的信用，“自己把自己借款的路堵塞住了”。在法国大使的压力之下，他勉为其难地答应对贷款给予“道义上的支持”，但有一个条件，这笔贷款“不与先前的贷款相混”，其数目以“实际需要”为限，且年息不低于六厘。① 又一次出面反对“友好的”德国，这也使维特感到为难。② 俄国拒绝再来一次6月那样的贷款，这当然没有减少它与中国政府行将举行的铁路租让权谈判的
97 困难。从中国方面说是这样，从法国方面说可能也是如此。

但是，前面已经提到，修筑直达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满洲铁路的决定即使在俄国政界中也遭到了反对。反对者是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卡普尼斯特和阿穆尔总督杜霍夫斯科伊，他们两人均由于职务的原因，与此事有最直接的牵连。两人都不否定，必须使铁路穿过满洲从而展直，但他们坚决主张，不是通向符拉迪沃斯托克，而是通向布拉戈维申斯克。卡普尼斯特指责维特说，新的方案只是根据降低造价的愿望产生的，它很少考虑到俄国在满洲乃至中国东北部的商业利益，因为这些利益“在现时还只是将来的问题”；这个方案也没有用任何“军事、政治上的设想”来加以充实，而这些设想“在整个西伯利亚铁路的问题中对俄国有着头等的和最重要的意义”。

卡普尼斯特认为，规划中的这条长达一千五百至二千俄里的铁路，作为“建筑在外国领土上这样长距离的军事、兵站式道路”的例子，从军事观点看来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加之铁路“与我国边界又相距甚远”。但就是纯粹从“经营开发”的观点看，“大概”也

① 见第17号卷，第1部分，1896年关于贷款问题的书简。特别是维特1896年2月18日给拉法洛维奇的电报和维特用铅笔亲手写的方针性指示的草稿，看来，这些指示是为回答法国建议而作的。

② 见同上，维特1896年2月22日的奏折。他在奏折中请求与外交大臣一起进行面奏。

需要“把该地区内部一切行政管理机构转到我们手中”，“而这一点没有军事占领是办不到的”。照他的看法，甚至“建筑铁路本身”“也将同样要求武装占领的强制手段”。同时，“我们对满洲全境或者其大部分的攫取”，势必导致对中国的瓜分，其中包括英国“对这些或那些沿海基地”的侵占，“这将能保障英国在黄海享有永久的优势”。因此，即便“不顾战略上和军事上的任何考虑”，他仍觉得维特的建议“带有巨大的政治冒险性”，而“没有提供相应的利益”。98 其实，一旦需要，只要通过外交文书的往来，就能解决对从新祖鲁海图到布拉戈维申斯克的直线划出的满洲最北角实行兼并的问题。①

卡普尼斯特的条陈大概是在维特提出租让方案和给外交大臣的备忘录后匆匆拟就的，并是专为洛巴诺夫个人写的，但它却没有能使洛巴诺夫拒绝接受上述两个方案。我们已经看到，这两个方案后来得到了沙皇的批准。因此维特没有必要就卡普尼斯特反对意见的实质表示看法。

杜霍夫斯科伊的奏疏是在备忘录已经发往北京，而谈判尚未开始之时写成的。它再一次提出了业已决定、但仍可重新审议的问题。② 杜霍夫斯科伊同样认为，“在满洲大量驻扎俄军”是在所难免的，这是因为，不然，一遇最小的政治纠葛，中国“就有许多机会破坏铁路的业务”，而“把西伯利亚大铁路长达二千俄里的一段敷设在很长时期将是我们的异邦的地区”，这件事被杜霍夫斯科伊称作“历史性的大错”。他于是建议：(1)沿着斯列坚斯克—墨尔根—布拉戈维申斯克一线切下满洲的一角，(2)然后沿着阿穆尔河在俄国

① 卡普尼斯特的条陈副本曾由他本人寄给维特，署的日期是：“1895 年 11 月”。条陈援引了备忘录和租让方案。见第 3 号卷。

② 《财政大臣对于阿穆尔总督关于外贝加尔与符拉迪沃斯托克之间西伯利亚干线的未来方向问题的奏疏的几点意见》是对这一奏疏的答复，其中“简要复述”了奏疏。我们援引的就是这一复述。见第 3 号卷。

领土上敷设铁路，并把阿穆尔沿岸地区变为军事基地，(3)取得从尼科尔斯克—乌苏里斯克通往宁古塔①和伯都讷②的铁路租让权，与中国人规划中的山海关—奉天—吉林的铁路相迎，以便将来把这条铁路也纳入我们的租让权范围。杜霍夫斯科伊的这第三点建议与前两点建议小心谨慎、适可而止的精神显然是大相径庭的，这
99 项建议使得争论毫不费力地解决了。维特的反批评书主要也是阐明这种矛盾，同时，他还在某种程度上利用了上面提到的尼古拉在喀西尼 1895 年 12 月 16 日急件上的批示，这项批示不准许此刻获取中国的任何领土。

但问题还不仅在于指出自己两个对手的薄弱方面。卡普尼斯特和杜霍夫斯科伊两人都同样指责维特说，他的方案从中国利益的角度看来是有充分根据的，从纯粹的铁路技术方面看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它忽略了俄国本身的经济、政治和战略利益。不言而喻，在预定作为俄国公使与中国人进行谈判的准则的备忘录中也不可能有任何别的东西。于是现在维特不得不正是以各种各样的俄国利益来为自己大胆的方案提供论据了。

首先，把铁路一直修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将使这个城市对于满洲的大部分说来（直接滨邻黄海的满洲最南部分除外"③）成为一个主要港口，而随着自由港④的闭港，这将使俄国贸易不仅可以在满洲，并"在与其毗邻的中国省份中"得到稳固的发展，因为那时"客观情势本身就将使这条铁路的支线迅即向中国内地敷设"。但是，倘若西伯利亚干线在俄国领土上通过，为什么就不能敷设这些支线呢？这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敷设这些支线的工作会长时间

① 即宁安。——译者
② 即扶余，又作白都讷。——译者
③ 原文此处半边引号。——译者
④ 指符拉迪沃斯托克，参见本书边码第 436 页。——译者。

地、而且压根儿遥遥无期地延宕下去”。再则，各大国(英、法、德、日)当时正都在争先恐后地攫取铁路租让权，并包揽对中国供应铁路器材。[①] 维特认为，俄国“有必要仿效自己经济竞争者的做法”，否则“中国北方各省（包括满洲在内）最重要的铁路线都将落入他 100
们手中”，俄国对此“当然不能允许，因此应当千方百计地力争把中国北部的铁路网抓到俄国手中”。

维特完全相信，一旦俄国手中有了通向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铁路干线，那末，“不经俄国同意在中国北部就建造不了任何铁路或支线，而这就使俄国可以“在满洲巩固自己的经济势力之前”，不允许建筑通往牛庄的支线，从而保卫满洲，以防正在不断增加的通过该港进口的外货深入到满洲内地去。就这样，按照维特的想法，俄国在外在必要性的压力之下，借助于满洲的铁路线，开始了对中国的经济瓜分，而并没有给自己划定满洲这个范围作为与世隔绝的市场。但对于满洲俄国必须立即动手，以便使它“永远”不“处于俄国经济势力之外”。与此同时，关于笔直的穿过满洲的铁路的“政治”和“战略”意义，以及它较之杜霍夫斯科伊主张的通过阿穆尔地区的弯曲铁路所具有的优越性，维特指出，这条铁路能使盛产粮食的外贝加尔地区有可能建成一个军事基地，并可以“在任何时候通过最短的道路”，从那里不仅把武装力量派到符拉迪沃斯托克，而且调到满洲的任何地点，派到“黄海之滨”和“临近中国京城的地方”。既然“客观情势本身”应当“迅即”使若干俄国支线敷向“中国内地”，那末，就是在这方面在俄国面前也展现了广阔的前景，这一点谁还不懂呢？

---

① 日本“计划”在朝鲜湾北岸和辽东修筑铁路，德国通过工程师金达“现已成了”建筑京津铁路的支配者(这是错的，金达是英国人)，法国获得了向云南内地建造铁路的权利，并正在为广西的铁路进行张罗，伦敦正在讨论从仰光通往云南的缅中铁路方案，英国人还在争取参加建筑上海至苏州的铁路。

II

101 1896 年 4 月，关于满洲铁路租让权的谈判在完全不利的时刻和环境中在北京开场了。交涉拖了整整四个月，并以完全失败而告终。喀西尼早在 12 月就察觉到了中国政府的“某种捉摸不定的恐惧心理”，原来，这根本不是“捉摸不定的”。1 月底，直隶总督向清帝呈递奏折称，必须“立即”把几年前动工、业已修到山海关的满洲铁路继续沿伸到锦州。喀西尼报告了此事，并解释说，这是因为中国人想要“赶在行将与我们举行的谈判前面”。① 中国计划的规模是可怜的（三年内预计总共修筑一百九十俄里）。实质上，这样的铁路不会引起竞争，也不排斥俄国的过境铁路，但在形式上，中国人却有了一个反对俄国人意图的严正理由。无论如何，这表示中国人不愿迁就俄国人。我们确知，这时喀西尼手头已经有了 11 月的指令，可是他“打算”等到“2 月底”才开始谈判。② 但到了二月底，即便彼得堡也还在令人难耐地、遥遥无期地等待着，不知“何时才能对今后怎样续修西伯利亚铁路的问题作出决定”，而在是否参加法国对华贷款问题上的踌躇不定导致了英德财团的胜利。③ 谈判再次搁浅，等它重又开始时，中国与英德财团的借款合同已经签订了。

不过，这时的谈判是双管齐下的。在北京，在所有竞争者的众目睽睽之下进行谈判是极为不便的。俄国情报人员从这里发出的
102 报告描绘了中国京城所处的竞争风潮的鲜明图景，欧洲人再次“展开”竞争已经不是为了通商，而是为了工业经营。英国人是自不待言的，他们对山海关铁路方案起了促进作用，后来，大家知道，这条

① 见第 3 号卷，喀西尼 1896 年 1 月 30 日给洛巴诺夫公爵的信。
② 见同上，此事是璞科第在 1896 年 1 月 20 日从北京电告罗曼诺夫的。
③ 见第 17 号卷，第 1 部分，前引维特 1896 年 2 月 22 日的奏折。

铁路落入了他们的控制之中。但是，就连喀西尼在1895年秋季还曾寄予“积极协作”希望的法国人，如今也置身于俄国的直接竞争者之列了。法国驻北京公使施阿兰的全部行为表明，他只抱定一个愿望：“在所期待的中国向外国工业开放中”为本国同胞保住“出众的地位”。他使人猜疑，他把满洲铁路也包括在他那些“使清帝的大臣们感到作难的”“诱人的建议”之中了。①

至于美国人，事情是完全公开的，并且初看起来是十分严重的。就是那个1895年春季曾在北京试图对俄国公使进行试探的美国人布什，现在作为一个拥有二亿五千万美元资金、“由美国最大的铁路公司、轮船公司和银行的代表组成的实力雄厚的辛迪加”的使者出现了，并带来了一个规模异常庞大的准备就绪的方案。据布什说，这个辛迪加成立了一家公司，名为华美启兴公司，② 创业资金为一百万美元，公司的任务是“承担中国现正急待兴建的所有铁路建筑工程”。公司的主要注意力放在北京至汉口和汉口至广州的铁路上，但同时认为必须借助于满洲铁路把中国本部的铁路网和西伯利亚铁路衔接起来。布什对此事的说法是：为了使整个计划得以实现，美国人必须与俄国达成协议，承建满洲铁路，这 103
样就可使中国避免与俄国计划的“政治背景”有关的危险性，并以此使自己容易说动中国，使其全面同意美国的计划。布什直截了当地向璞科第和喀西尼叙述了自己的方案，并建议与俄国政府签订一项“秘密协定”，该协定将向俄国人提供取得美国公司的股票和证券的优先权，他并担保说，“在这项事业中”，美国人“将是俄国最可靠的盟友”。

与此同时，布什当然还同李鸿章的一名幕僚进行了洽谈，并把

① 见第3号卷，璞科第1896年4月17日（29日）给财政大臣的报告和4月13日的电报。

② American China Development Co.，又译作美国合兴公司。——译者

准备就绪的租让条约草案交给了他。但草案中所讲的已不单是把北京至广州的铁路干线和西伯利亚铁路相衔接的问题，而是对整个满洲的和平征服了。铁路应当以辽东湾的“某个”港口为起点，经牛庄、奉天、吉林、齐齐哈尔，直至西伯利亚铁路的“某”站，并从奉天另筑一线通到朝鲜边境，公司应有权在满洲各地和铁路沿线的蒙古各地开发“土地、森林和矿山”，并确立公司对满洲一切铁路建筑为期三十年的垄断权。①

可见，美国人的建议不仅就其政治涵义，而且就其经济涵义说来，都是和维特在对杜霍夫斯科伊的反批评书中拟订的满洲铁路计划的精神针锋相对的。因为按照这个方案，俄国不仅得不到直达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铁路线（这一具体问题或许尚能被列入布什提议的协定），而且只要俄国容许建造能使外货通过南满和朝鲜一些港口直接输入满洲的铁路网，俄国显然便会由于这一协定从此永远不能再在经济上称霸满洲。然而，喀西尼所奉的指令却吩咐
104 他，务使中国政府“将满洲铁路干线及其附加线的租让权无条件地给予俄国公司”，不让任何外国染指。② 于是喀西尼对布什“大泼冷水”。喀西尼并于 4 月 6 日和 18 日两次来到总理衙门，试图“用有力的措词”说动大臣们同意把租让权给予一家俄中公司，他借口说，这样就便于俄国保卫中国，使之“免遭与日本乃至任何大国发生新的冲突的危险”。但是，这时喀西尼本人的境遇同样是没有希望的。

中国人反复考虑了十二天，然后坚决声明，他们“作出了一个永久性的最坚定不移和不可变更的决定，不把这类租让权给予任何外国和任何外国公司”，他们只同意“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借助

① 见第 3 号卷，布什租让合同的英文副本。该卷中还有璞科第 1896 年 4 月 17 日（29 日）的报告和喀西尼同年 4 月 10 日（22 日）的急电。

② 见喀西尼 1896 年 4 月 10 日（22 日）的急件。

俄国工程师的帮助并使用俄国器材建造满洲铁路”。喀西尼反驳说，中国短缺筑路资金。这种说法在当时条件下简直是滑稽可笑的，因为在这方面，“大量的建议正从四面八方”向中国人“纷至沓来”。类似的想法交换了三个小时，尔后，俄国公使别无他法，只得进行威胁了。他说，这种回答将对俄国政府产生“最不愉快的印象”。另一方面，他只好告知彼得堡，“假如俄国政府认为建筑我们自己的铁路不仅是我们的夙愿，而且无疑必须这样做，那末我们只有一个办法：向中国政府坚决表示，中国若拒绝我们筑路，就将直接招致对它说来最严重的后果”。① 由此可见，在北京的外交谈判仿佛因为没有准备就绪，并且没有以“适当的款项”作为后援，而立 105
即使事情陷入了僵局。②

正是在北京只好直接用唇舌进行威胁的那些日子里，在彼得堡已经作好了一切准备，以便通过和平方式使事情得到如愿以偿的结果。4月18日，喀西尼与中国大臣们的三小时会晤遭到了上述挫折。也是在4月18日，乌赫托姆斯基公爵用特别快车把中国皇帝的头等大臣李鸿章从敖德萨接到了彼得堡。李鸿章形式上是清帝祝贺沙皇加冕的特派代表，事实上却是签订最重大的国际条约的全权代表。

李鸿章的俄国之行北京政府早在2月初就已决定。需要解决

① 沙皇1895年11月27日批准的备忘录没有公布。我们是根据另一种出版物里援引的片断转引的，见《中东铁路。中东铁路公司董事会办公厅编纂的史纲》，第1卷（1896—1905年），圣彼得堡1914年版，第4—5页。此后的事见第3号卷内喀西尼1896年4月19日（5月1日）给洛巴诺夫的报告副本。

② 在妥善保存于财政部的文件中，关于为了促成满洲铁路事业的暗中开销问题，没有在此时通过喀西尼或璞科第支出款项的蛛丝马迹。有一种看法认为，北京的谈判“没有以必要的速度并花费必要的精力来进行”，“中国政府……没有下定决心拒绝俄国，但也同样没有下决心表示赞同”，这种见解（见《日俄战争的序幕》，第33页）是不正确的。喀西尼第一次向总理衙门提出铁路问题是在4月6日〔见第3号卷，璞科第同年4月12日（24日）的报告〕，他第二次拜访和中国人的拒绝跟着发生在4月18日（见同上案卷，喀西尼4月19日的报告）。

中俄之间一切酝酿成熟的问题这一情况，是当时决定参加加冕盛典代表人选的公开的、完全半官方的根据。北京看到的这种问题有两个：(1)敷设通过满洲的铁路，(2)向俄国提供一个不冻港供其停泊军舰。[①] 看来，中国政府认为，对于俄国有关铁路的"意图"和关于一个港口的"强求"同时给予坚决拒绝是不可能的，只有在
106 这一意义上才能理解中国政府迈出的半步：1895 年秋季，它准许俄国工程人员在满洲进行勘查，并允许俄国舰队冬季在胶州停泊。[②] 作出对俄国有利的让步是不可避免的了，问题只在于让步的范围和条件。

对于选择李鸿章这样一位在北京政府所有大臣中最有威望的外交专家这件事，只能理解为，中国已经决定在俄国与沙皇的大臣们直接进行谈判。与此相应的是，据了解，俄国公使在北京甚至没有试图同李鸿章谈起铁路问题。[③] 当特别使团从上海动身时，华俄道胜银行代表也只谈到银行通过汇兑业务可以向出访人员提供帮助的问题。[④] 使团行程的安排就是为了在加冕大典开始前留有一些时间用作谈判。[⑤] 因此，大概无须怀疑，在彼得堡产生与李鸿章直接进行谈判的想法，与北京旷日持久而毫无进展的谈判的进程和结果是毫不相干的。但是，随着谈判移到彼得堡，整个事情自然就落到了急切的维特的手中，并立即取得了迅速的进展，得到了虽
107 非全部、却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成功。李鸿章的到来使俄国外交界

① 见第 26 号卷，璞科第 2 月 1 日(13 日)和 2 月 12 日(24 日)发自上海的两份报告。

② 见第 1 号卷，第 1 部分，璞科第在 1895 年 11 月 23 日(12 月 5 日)的报告中指出，对于俄国的这两项要求，"总理衙门欣然而迅速地表示同意"。刊登在《新闻报》上的一位中国官员的奏疏中提出了"意图"和"强求"两词的区别，他还解释了自己拒绝接受特命全权大使称号的理由。转引自璞科第 1896 年 2 月 12 日的报告，见第 26 号卷。

③ 见第 3 号卷，璞科第 1896 年 4 月 13 日(25 日)的电报。

④ 见第 26 号卷，璞科第 1896 年 3 月 4 日和 11 日的两份报告。

⑤ 使团从上海启程的日期定于 3 月 16 日，以便在 4 月中旬经由塞得港到达敖德萨。见财政部总务司二处第 18 号卷，洛巴诺夫 1896 年 3 月 8 日给维特的信。

所面临的就其实质极为复杂、就其范围极为困难的问题大大简单化了。

彼得堡确信，要解决这一任务而不通过收买，那是根本无从考虑的。[①] 但是，在此所涉及的并不是二、三等的小事和二、三流的人物，而是空前巨大的经济和（更为巨大的）政治尝试，中国政府从无这种先例，所涉及到的又是如此高级的政界人士，因此，款项的数额和绝对保密的必要性，都会使事情极难从容不迫地进行。只是由于这一原因，要在北京进行收买，技术上就不那么容易。反之，在彼得堡行将举行的交涉却的确只限于特使一人，他秉性"刚毅果断"，因而有可能"就所有提上日程的问题达成一项最终的协定"。在彼得堡的交涉还能最大限度地保守祕密，在交涉过程中又具有直接的口头谈判的全部灵活性和权威性，而不必采用密码或外交邮件。[②]

中国使团的人员组成是再好不过了。在北京曾经闪现过派两位全权大使出使俄国的想法（有名的张荫桓被指派为第二名全权大使），也曾试图用第三者来代替李鸿章的随员李经方（以贪婪出名的李鸿章的儿子）和罗丰禄（同样贪婪的李鸿章的亲信译员），但二者都没有成功。李鸿章随带的"财政事务代理人"是一个名叫维克托·柯乐德的俄国臣民，他是中国海关的职员，俄国驻北京公 108
使特地把他推荐给维特。[③] 唯一的一个英国人是李鸿章中意的医生伊尔文，一眼看去，他破坏了上述人员配备，但据进一步的调查才知道，他原来是一个酒鬼，没有任何搞阴谋的本事。[④]

---

① 璞科第预先通知说，在北京"外国人争先恐后地力图用贿赂来诱惑中国大臣"〔见第3号卷，(B)，璞科第1896年4月17日(29日)的报告〕。

② 见第26号卷，璞科第1896年2月1日(13日)发自上海的报告。

③ 见同上，璞科第1896年3月11日(23日)的报告和喀西尼同年2月20日给维特的推荐柯乐德的信。

④ 见璞科第3月11日(23日)的那个报告。

然而，俄国方面为了使谈判达到预期的结果，在彼得堡是没有丝毫疏忽之处的。沙皇把谈判交给维特经办。维特有时间来作好准备。把事情委托给他，而不是洛巴诺夫，这本身就是一个行动计划。这一回（如今，在 1896 年）所用的人已经不是巴德马耶夫这个“油头滑脑的骗子手”了，[①] 而是乌赫托姆斯基公爵。他是《圣彼得堡新闻》的出版者，沙皇的高级侍从。他在报上幼稚而狂热地鼓吹俄国在中国的未来。他非常崇拜维特，“当时与国君又十分接近”。[②] 他是不久前才被委派到华俄道胜银行经理处工作的，而随之又委任了 A. Ю. 罗特什捷英，后者才是这家银行业务上的中心人物，是它的真正行长和支配者。乌赫托姆斯基曾就西伯利亚铁路的延伸问题“在 3 月里与维特多次进行磋商和交谈”。他“在 3 月底觐见了沙皇，并且谈到了关于接待”（李鸿章）和“必须在他赴俄国途中与他秘密亲近的问题的”“最重要之点”。[③]

乌赫托姆斯基被派去迎接李鸿章不仅是为了在中国使团通过苏伊士运河后便把它拦住，不让其前往马赛，并且主要不是为此；
109 取道敖德萨前往彼得堡这条路线是早在中国人从上海启程时就已确定了的，并且恐怕用不着当真担心李鸿章会在亚历山大港突然拒绝乘坐俄国为他准备的专船，因为这种拒绝在外交上分明是不

---

① 见维特：《回忆录》，第 1 卷，第 39 页。

② 见同上，第 38 页。

③ 见乌赫托姆斯基 1897 年 10 月 26 日给维特的信。信中包含有 1896 年春天及其他有关同李鸿章谈判的情况的“日记摘录”。此信有意突出了维特个人在事情中的作用，假如没有维特的协助，他乌赫托姆斯基恐怕是办不成此事的，这就是信的调子。“日记摘录”有时形式上象是书信（用“您”这个称呼）。它给人的印象是，这是一份应维特的请求写成的文件。维特为了把他参与的事情的这些或那些他觉得最重要的情节用“文件”形式记载下来，以后又多次采用这种方式。乌赫托姆斯基的信是由别人的手笔代写的，只是由他自己署名。见财政部总务司二处第 18 号卷，除原件外，还有一份抄件。

妥的。[1] 有材料表明，正是乌赫托姆斯基应当首先开始同特使谈判，并应与随员中那些特使的亲信拉好关系，以便日后得以消除某些不可避免的棘手之处。维特“在呈递了关于此事的奏折后”，向乌赫托姆斯基“概要地叙述了与中国特使进行会晤的计划，并且赋予全权，让他在谈判过程中向使团随员中最有影响的人物，或者通过他们向他们在北京的朋友和盟友慷慨许诺”。[2]

乌赫托姆斯基把使团从塞得港一直伴送到俄国。这样，他已能开始同李鸿章进行“必要的秘密亲近”，对此是没有理由表示怀疑的。而当该由金钱对乌赫托姆斯基的“这位私人朋友”起作用时，乌赫托姆斯基以后（直到这个老头子死时为止）凡遇情况需要就和他会面，或者用密码快信与其联系，这些努力都没有白费。当使团抵达彼得堡，维特与李鸿章刚刚开始礼节性会晤时（在《回忆录》中把这些会晤描写得那么突出），罗特什捷英已经为铁路的建筑和经营与柯乐德（原来，罗特什捷英的“上海朋友们”也向他推荐了此公）讨论起“私营公司”的方案来了。罗特什捷英用百万法郎来诱惑对方，他罗特什捷英“早在 1895 年就能向”拟议中的公司的“中国参加者们提供”这笔款子。于是，罗特什捷英的提议为柯乐德“欣然接受了”。[3] 110

固然，柯乐德“企图坚持成立一家中国公司的主张”，而罗特什捷英“讲的是俄国的优惠”，但是，我们在此援引的罗特什捷英的一

① 有一种说法，认为“李鸿章没有取道欧洲，而是经由敖德萨，这全是维特的功劳，而外交大臣对此则是漠不关心的”。这种说法是维特散播的。见《回忆录》，第 1 卷，第 40 页，以及《日俄战争的序幕》，第 35 页。事实上，先到俄国，而后再去欧洲和美国，这是李鸿章早在北京时与外交大臣商定的，与财政大臣毫不相干。直到 3 月中旬，当李鸿章在上海坐上轮船时，他才说起，黑海风浪太大。可是喀西尼打断了他的话，说，现在已经不便改变航线了。见第 26 号卷，喀西尼 1896 年 2 月 29 日、3 月 4 日和 11 日的报告，并见财政部总务司二处第 18 号卷，洛巴诺夫 3 月 8 日的信。

② 见前引乌赫托姆斯基 1897 年 10 月 26 日的信。

③ 见第 3 号卷，(B)，罗特什捷英 1896 年 4 月 22 日（5 月 4 日）给维特的信，信中转述了他和柯乐德晤谈的内容。

封信却使人毫不怀疑，所谈的是关于成立一家俄中混合股份公司的问题，在这家公司中可由真正的私方人士代表中国方面，名额事先不定（当然是在一定的份额之内）。[①] 这和维特在与李鸿章的进一步谈判中所取得的成果不完全一样。他们的谈判很快失去了礼节性质，成为纯粹的事务性会谈。[②] 双方经过整整一个月的谈判达成了一项协议，这就是 1896 年 5 月 22 日的莫斯科条约。看来，这项条约是各自坚持斗争的结果，也是对中国方面进行收买、取得让步的结果。虽然这些让步没有达到预定的程度而有所缩减，但它们仍然超过了刚才提到的罗特什捷英建议所包含的俄国的要求。

表面上，双方基本上都坚持住了各自的立场：中国没有允许俄
111 国政府建造穿过满洲的铁路，俄国政府则没有接受中国提出的用中国政府的设施把西伯利亚干线衔接起来的建议，但双方政府都将或多或少地参加未来铁路的建造和管理工作。维特企图直接用俄国政府的名义取得铁路租让权，但遭到了坚决拒绝。[③] 可是中国人关于成立一个俄中混合铁路股份公司的主张也未实现。租让权毫无保留地授给了华俄道胜银行，建筑与经营铁路的合同也应当同银行签订。双方政府就此事缔结了一项特别条约。在条约中，铁路作为针对日本的俄中防御同盟必不可少的工具而成了同盟的基础。[④] 当日本对俄国在东亚的属地或者中国领土、以及朝鲜

① 罗特什捷英在讲到中国参加者时表示，“所有的人都将在这家辛迪加中各得其所”（见同上）。

② 见《回忆录》，第 1 卷，第 42 页。

③ 见同上，第 44 页。

④ 1896 年 5 月 22 日的莫斯科条约具有秘密性质，我们把它发表在《阶级斗争》杂志第 1、2 期合刊（列宁格勒，1924 年），第 101 页及以下各页（条约近乎全文的英译本见马克谟：《与中国签订的及有关中国的条约和协定》，第 1 卷，第 81 页）。条约有中、法两种文本，其中以法文本为准。在第 20 号卷中有法文原件的一份副本，这是维特委托 И. П. 希波夫抄录的。现将法文本照录如下。

副　本

大俄国皇帝陛下和大清国皇帝陛下，欲巩固有幸恢复的远东和平，防止外国重新

领土发起任何进攻时，这一同盟条约即行生效，同时，在发生军事行动的情况下，中国一切港口均向俄国军舰开放。由华俄道胜银 113
行建筑穿过满洲通往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铁路，其目的正是为了便于俄国军队在战时到达被威胁地点，俄国还有权在和平时期过境

侵犯亚洲大陆，决定缔结两国防御同盟，为此

大俄国皇帝陛下特派外交大臣、内阁大臣、枢密院大臣、实任御前大臣洛巴诺夫公爵暨财政大臣、内阁大臣、御前大臣维特先生；

大清国皇帝陛下特派大学士、派赴俄国皇帝陛下的特命全权代表大臣李鸿章伯爵；

为全权代表。经双方互换全权证书，校验无误，订立条款如下：

第　一　条

凡日本侵略俄国的东亚领土，或中国领土，或朝鲜领土，均将被认为与本条约有关，应将本约立即付诸实施。

在这种情况下，缔约双方应派各自所能调遣的全部陆、海军，互相支援。各方部队所需粮食，亦应互相尽力支援。

第　二　条

缔约双方一经商定共同行动，一方非经另一方同意，不得与敌方单独媾和。

第　三　条

战时遇有紧急情况，俄国军舰可驶入中国任何港口。俄国舰只有何需要，中国地方当局亦应尽力帮助。

第　四　条

为便于俄国陆军到达受威胁地点，并保证其给养供应，中国政府允许建筑一条穿过中国黑龙江省和吉林省，通向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铁路线。该路和俄国铁路的衔接，不得作为侵占中国任何领土和损害大清国皇帝陛下任何最高权力的借口。铁路的建筑和经营应交由华俄道胜银行办理。为此，即将签订的合同条款应由中国驻圣彼得堡公使同华俄道胜银行妥善商订。

第　五　条

双方商定，根据条约第一条，战时俄国有权自由使用本约第四条所述的铁路运兵和运送给养。平时，俄国同样有权运兵和运送给养，但除因运输业务必需停车外，不得借故停留。

运输军队和给养。条约从中国政府与华俄道胜银行的租让合同批准之日起，有效期为十五年。5月18日，李鸿章收到了北京政府批准他签订该条约的指令。22日，由洛巴诺夫拟就的条约文本就在莫斯科签了字。①

114 我们知道，李鸿章在与维特谈判时曾"设置了种种障碍"。②当

第　六　条

本条约自大清国皇帝陛下批准第四条规定的合同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十五年。期满前六个月，缔约双方再行商定本约的展期问题。

1896年俄历5月22日　于莫斯科

洛巴诺夫（签字）
维特（签字）

李鸿章签字处

与原件无误。
财政部总务司司长И. 希波夫

本副本是奉财政大臣之命由财政部总务司司长、四等文官希波夫亲笔抄录的，1897年11月13日，于圣彼得堡。

И. 希波夫

议　定　书

为本条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缔约双方全权代表已就今日俄中两国间订立的条款达成协议，并在条约的中、法文两种文本上签字盖章。

两种文本经过妥善核对，并无差异。本约的解释以法文本为准。

1896年俄历5月22日　于莫斯科

洛巴诺夫（签字）
维特（签字）

李鸿章签字盖章处

与原件无误。
财政部总务司司长И. 希波夫

*　　*　　*

该两文件均系И. П. 希波夫所抄。

① 见财政部总务司二处第18号卷，维特1896年5月18日的奏折。内称，李鸿章获得了相应的全权，条约签字仪式定于22日举行。

② 见《回忆录》，第1卷，第43页。

然，这些障碍与俄国方面建议的同盟本身是毫无关系的。对日战争使清王朝蒙受奇耻大辱。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这一同盟正是中国政府摆脱这种耻辱状况的既有利、又体面的出路。俄国提出了要求作为它所提议的同盟的代价，李鸿章是在满足这些要求的问题上"设置"障碍的。如同上述，中国使团等待着两项基本要求的提出：(1)关于铁路建筑和(2)关于向俄国提供一个港口供其停泊军舰。然而，5月22日的条约对这第二项要求却只字未提，而仿佛根据条约第五条，只有在俄国为了保卫中国反对日本而采取军事行动时，才有权使用中国港口。这是否意味着维特未能迫使李鸿章同意这一点，或者根本没有提出这种要求呢？

如果相信维特的记载，那末，在他与李鸿章的谈判中唯一的失败之处是，未能直接以俄国政府的名义取得铁路租让权。对此，维特也不认为是一个失败，他千方百计把这一失败说成事实上是并不存在的。然而，有文件雄辩地证明，维特当时要求这个中国人同意的不仅是北满干线，而且有从干线"到黄海某一港口"的南满铁路支线。① 看来，维特如此坚决地提出了这一要求，以致没有遭到直接的拒绝，但"李鸿章只同意用窄轨建造该支线"。维特则"断然否定了这一点，他认为支线与干线的轨道毫无疑问必须相同"。于是，"这项谈判没有达成任何结果。"②

根据这个逐字逐句援引的证据还不能断定，当时是否谈到了 115
关于割让一个中国港口给俄国的问题。但是，我们在此有一份最珍贵的材料，它表明，维特在1896年5月不仅考虑到了西伯利亚铁路行程最短的过境铁路问题，而且蓄谋实现用铁路深入南满的第一

① 参见中东铁路公司董事会1897年1月22日特别会议秘密记录中罗曼诺夫关于此事的消息，见第7号卷，第1部分。并见同上案卷，维特1897年8月20日给穆拉维约夫的信。

② 见同上。

个步骤。至少可以说，维特在彼得堡谈判时，把“供俄国军舰停泊的一个港口”的问题立即转换成了关于两件事的问题：(1)把与朝鲜直接接壤的那部分满洲土地划入俄国铁路势力的范围，并不准从朝鲜方面再向大陆继续前进，(2)把黄海的一个不冻港与俄国的铁路系统相衔接(正是使用俄式轨道)，从而使俄国势所必然成为这一港口的实际主人，并以政治上和战略上最审慎的方式解决停泊军舰的问题。

这样，李鸿章就在两点上设置了障碍：关于满洲干线形式上归属俄国的问题，以及南满支线的轨幅问题。在这两点上，他甚至不因金钱而退让。但是，他却在根本上作了让步：他放弃了关于中国铁路公司的主张而同意了俄国方案。作出这种让步确实是为了金钱。他在这个问题上无疑设置了“障碍”，但这些“障碍”被维特的“许诺”排除了。维特答应他，如果建筑铁路一事顺利成功，将付给他李鸿章三百万卢布。① 事情是微妙的。这笔交易是复杂的。它没有用一种与李鸿章有关的可靠方式加以确认。老头子并没有因在5月22日条约上签字而得到分文。款子要在相当遥远的期限
116 内分期付给。第一个一百万将在得到清帝关于把租让权授予华俄道胜银行的上谕、以及确定租让权主要原则的文件时交付。在最终签订租让合同和确定铁路线准确方向时将付给第二个一百万。而第三个一百万则要等到铁路工程全部竣工的时候。除了口头的承诺外，李鸿章没有得到任何付款的担保。这件事只限于维特一人呢，还是在觐见沙皇时这一承诺也得到了批准呢？这一点我们只是间接得知的。1900年，维特提醒沙皇说，“这一承诺是以机密文书罗曼诺夫、乌赫托姆斯基公爵和罗特什捷英签署的议定书的形式”“肯定下来的，我在奏明陛下后在议定书上写了：‘同

① 见第51号卷，第1部分，第30—31页，维特1900年3月30日的奏折。

意'"。① 这样,这一承诺已由华俄道胜银行的董事签字予以正式确认。"为便于进行关于开办中东铁路的谈判,并为便于实现该项事 117
业",银行拨出了三百万卢布的款子。议定书看来是在与俄国政府签订政治条约的第二天匆匆拟就的,以便至少能让李鸿章对于所承诺的款项已正式确定拨付感到放心,虽然在议定书中没有讲到向他李鸿章的付款问题。但李鸿章根据议定书第4款的意思可以相信,"拨款"将立即由银行"作为修建费用"记入正在筹建的中东铁路公司的帐上。可是,议定书在给李鸿章过目后立即被财政部收藏了起来。从银行观点看来,这一文件是虚拟的,它仅具有历史意义,而无须负责履行。维特以华俄道胜银行的名义向李鸿章收买了租让权后,也就确定并保持了进行伴装所必需的外表形式,从而有可能实际上把整个事情抓到政府手中。

---

① 这份议定书的原件保存于第51号卷第1部分内。它是由罗特什捷英亲笔用法文写在一张普通的纸上的,并有维特所作的书法改正,却没有任何机关用笺的印记。也许法文本是给李鸿章的。维特的亲笔批语"同意"也是为他而写的。现将议定书照录如下:

议　定　书

(维特亲笔批语:)"同意"

为便于进行关于开办中东铁路的谈判,并为便于实现该项事业,华俄道胜银行经理处特作如下规定:

(1)拨出一笔总额为三百万卢布的贷款,作为修筑铁路的自由支配费用。

(2)拨出的款项只能在下述期限和条件下支付:(а)在得到清帝恩准将铁路租让合同交给华俄道胜银行的谕旨和李鸿章殿下载明该项租让合同的主要条款的文件后,可自由支配该款项的三分之一,即一百万卢布的贷款;(б)在租让合同签字并完全生效、铁路线完全确定并经中国主管当局认可后,可自由支配一百万卢布;(в)在铁路全部竣工后,可自由支配一百万卢布。

(3)将有关款项交给乌赫托姆斯基公爵和罗特什捷英自由支配。他们应照第2款规定,开具简单收据,但无须承担任何个人责任,即可支配本款。

(4)将预定的拨款总额作为修建费用记入新开设的中东铁路公司的帐目。

1896年俄历5月23日　于莫斯科

(签字人:)乌赫托姆斯基公爵　　罗曼诺夫

罗特什捷英

III

1896 年 8 月 16 日(8 月 28 日)，清帝颁发了关于租让权问题的上谕，同年 8 月 27 日 (9 月 8 日)，签订了建筑铁路的合同。[①]第一次付款的期限到了。罗特什捷英和乌赫托姆斯基都认为“必须”
118 “立即”付款，“否则这些中国人会认为自己上了闻所未闻的大当而从中作梗”。但是，若把钱汇到上海，“指明交给某人”，他们又怕这样会“泄露机密，引起李氏一家惶恐不安，并使盟友们对我们冷淡起来”。于是，乌赫托姆斯基决定亲赴上海，亲手“如数付款”。乌赫托姆斯基打电报到雅尔塔，把上述这一切告诉了维特，并要求“预先从国家银行拨出一百万卢布”。[②] 维特回答说，不要着急，筑路工程还没有开始呢。关于款项的来源问题，维特纠正乌赫托姆斯基说：“付款应由华俄道胜银行负担”，它“可以为此从国家银行得到贷款，但该项贷款以后应同贷款的利息一并从（中东铁路公司的）债券资金中归还”。[③]

我们看到，在中东铁路资金方面的第一个实际场合中，便出现了两种见解的冲突，表现了铁路的两重性。乌赫托姆斯基的观点

---

① 合同草案早在 5 月 26 日就已电告北京，但中国政府却把与银行的谈判交给中国驻柏林公使许景澄经办。虽然一切有利于进行谈判的东西都没有放过，草案的讨论仍进展缓慢。许景澄已与此事有了切身的利害关系，因为中东铁路公司总董（又称总办或督办。——译者）的职位已经提供给他了。柯乐德为与李鸿章联系而留在俄国。不进行威胁是办不成事的。在 7 月里，俄方根据柯乐德的建议，告知中国太后说，如果不签合同，俄方“将探求与别国联合，而与中国的同盟亦将成为一纸空文”〔见第 3 号卷，(B)，柯乐德 1896 年 7 月 3 日(15 日)给乌赫托姆斯基的信〕。

② 见第 51 号卷，第 1 部分，乌赫托姆斯基 1896 年 9 月 2 日发往雅尔塔给维特的电报。

③ 见同上，维特 1896 年 9 月 3 日给乌赫托姆斯基的电报。付款的技术困难在于，维特不同意把钱交给其时正在彼得堡的柯乐德，因为他没有得到李鸿章的特别的全权证书。维特认为，中国人自己应当为得到这笔钱而操心设法，并提出交款的方式。

是从实质上看待事情的，而维特的观点是严格遵守形式的。乌赫托姆斯基把一切都直接归结为从国库支出，维特却办理着需要合法伴装的繁琐会计手续。乌赫托姆斯基很清楚，铁路的“债券资金”就是国库对铁路预算的补贴，维特则在修正这一说法。从银行观点看，无疑应当遵守付款期限。可是从政治上看来，那个签订合同的人现在要从中作梗还无能为力，或者从他那里还得不到什么补充的东西，因此，暂缓时日是较为谨慎的。事实上，5 月 23 日议定书第 4 款完全是虚拟的，而它的其余各款则已按照政治上需要的程度得到实现了。根据财政大臣的吩咐，李鸿章就要得到从俄国国库资金中支出的头一个一百万卢布了。但这已经拖延甚久，而且 119
俄国同时又提出了一项新的要求。另外的两个一百万李鸿章则根本没有收到。

为了把上面提到的与银行、中东铁路公司和国库有关的人为混乱的金钱关系完全弄清楚，必须又一次回到莫斯科谈判的时代。就在霍登惨剧发生那一天，5 月 18 日，维特把俄国政府与华俄道胜银行签订的关于成立中东铁路公司的协定草案呈交尼古拉二世批准。这一协定“能保障政府对修建和经营铁路具有绝对的影响”，“实际上”把租让权交给了“俄国政府支配”。① 协定第四条后来没有写进《中东铁路公司章程》，因而成了秘密条文，该条对政府与银行在未来公司股本方面的关系作了如下规定：

> “华俄道胜银行认购公司的全部股本（共一千股，每股五千卢布）。其中，预定归俄国政府者不少于七百股，这些股份应由华俄道胜银行掌握，代存至转交政府所有时为止。在认股开始后，上述股份将立即由华俄道胜银行转交国家银行。其

① 见财政部总务司二处第 18 号卷，维特 1896 年 5 月 18 日呈递协定草案时的奏折。奏折是维特亲笔写的。尼古拉二世批道：“朕以为卿可以签署此项专约。”协定草拟为十四条。其中十三条（除第四条外）后来均载入《中东铁路公司章程》。

余不超过三百的股份既可在认股时，亦可在认股后半年内置
120 于私人手中。国家银行将向华俄道胜银行发放无息贷款，此项贷款以上述预定属于国家银行的七百份股票、以及其时尚未置于私人手中的股票作为抵押品。贷款数额将与这些股票的实际票面资本相等。因而可以认为，用作贷款抵押品的这部分股票所应分得的红利将成为俄国政府的收入。政府有权随时按照贷款票面价额取得作为贷款抵押品的那部分公司股票，因为股票价值已完全由以它作为抵押品的贷款偿付了。当政府就上述七百份股票归入国库一事与华俄道胜银行结帐时，若华俄道胜银行愿意，政府有义务同时就其余三百份股票中尚未置于私人手中的股票归入国库的问题与华俄道胜银行办理清帐。”

按照这一条的意思，银行有权承购的股票至多不超过三百份，甚至还得将其发放于私人手中。可以猜测，俄国政府考虑到，与银行有联系的法国金融界可能参加企业，因而作出了这一对它没有危险的让步。而且这一让步很可能是罗特什捷英提出的，在这些日子里，法国人正是通过他获悉了“关于与李鸿章谈判的详情”，举例说，甚至得知“罗特什捷英的莫斯科之行‘曾’有何目的”。① 法国人是否愿意享受以备万一而留给他们的权利，这一问题当时尚未
121 确定。倘使法国人拒绝，协定规定：俄国政府有义务把银行总存量中为其保存的三百份股票也承购下来。而当银行与中国政府的谈判结束时，租让合同已经签订，事情已进展到该组成中东铁路公司的地步。关于法国人参加公司的问题已被否决。1896 年 11 月 4 日，华俄道胜银行董事会把公司章程提交财政大臣批准时，告知他说，“把行将获准的中东铁路公司的股票提供给第三者是不必要

① 见第 3 号卷，(B)，瑙科第 1896 年 6 月 3 日(15 日)发自北京的电报，内称，这些情报是法国公使“从莫斯科和彼得堡”获悉的。

的，因此，根据 1896 年 5 月 18 日达成的协定，银行完全可以使全部股本听任俄国政府支配，并归俄国政府所有”。①

12 月 4 日批准了公司章程，12 月 17 日预定为招股的日子。招股广告就刊登在 12 月 17 日的《政府公报》上。由于招股受理的时间定为上午九时，因此局外人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来参加认股的。②在预定的钟点银行里聚集了“很多职员”，而“认股在开始后只过几分钟就结束了”。③这样，公司五百万卢布的股本就列入了“俄国国库在远东的支出”一栏。④

同时，根据公司章程第九款，维特与公司董事会就公司向俄国 122
政府偿付满洲的勘查费用达成了协议，这笔款项确定为四百万卢布。我们已经看到，维特在向李鸿章付款时遇到了一些难处，他想省去此事中的繁琐会计手续，就请准了一道不得公布的谕旨，设置了一项由他自己直接掌握的“特别”基金，它后来被称作“李鸿章”基金。⑤

---

① 见第 3 号卷，华俄道胜银行 1896 年 11 月 4 日给财政大臣的呈文。呈文是由乌赫托姆斯基和罗特什捷英签署的。

② 按照维特的委托，财政部办公厅编纂了《关于 1895 至 1903 年远东事件的历史情况》一书，其中强调指出了这一细节。而在格林斯基的《日俄战争的序幕》（此书是《情况》一书的翻版）中，这一细节被删去了。

③ 见第 7 号卷，第 1 部分，罗特什捷英 12 月 17 日给维特的信。“阁下，今天上午九时聚集了很多职员参加认股仪式，认股在开始后只过几分钟就结束了。我们连公众的影子也没有见到”（引文原系法文。——译者）。

④ 见前面第 44 页所引 1897—1902 年期间国库在远东的收支情况。

⑤ 谕旨全文如下（见第 51 号卷，第 1 部分）：

“谕财政大臣。

根据朕业已批准的《中东铁路公司章程》第九节，并依照卿与该公司已经达成的协议，公司从俄国政府得到四百万卢布的贷款，即交通部在满洲勘查铁路方向之费用。公司应在卿规定的期限偿还该款。

朕最为仁慈地吩咐卿从上述四百万卢布的收款中扣出三百万卢布作为特别基金，以抵补与授给中东铁路租让权有关的费用，而一百万卢布则为国库收入。然后，上述三百万卢布的基金现款应在国家银行或某家私人银行中（由卿酌办）立一特别户头，该项基金的支出每次均须经朕特许，否则不得动用。

此谕不得公布。

尼古拉（签字）

（维特亲笔注有）：1896 年 12 月 20 日于皇村。财政大臣、御前大臣谢尔盖·维特。”

这道谕旨批准的事项的实质在于：以中东铁路公司的股票作为抵押，从国家银行向华俄道胜银行提供了五百万卢布股本的贷款，而其中三百万卢布在华俄道胜银行中应当转为财政大臣的特别活期存款，一百万卢布又变成了国库的收入。于是，留归中东铁
123 路公司董事会支配的股本就只有一百万卢布了。①

正是国库为公司提供了资本，而公司股本的五分之四却在初期就提出归国库支配，这一点要从与中国政府签订租让合同的那些条件中寻求解释。租让合同基本的、也是在所难免的缺陷是，八十年过后铁路将无偿归中国政府所有。但是，中国人坚持要把先期赎路的权利包括在合同之中。于是，合同第十二款规定，从通车之日起三十六年后，中国政府有权赎路。而维特要求把期限延长到五十年。但罗特什捷英看到，中国方面不可能同意如此延长期限，便对维特施加压力。维特这才准备只“在万不得已时”同意三十六年的期限，“但是有一条，进行赎路的原则是，我们将花费的全部款项要无例外地得到偿付，并能获得很大的利润”。② 维特的意思是，这一条的内容是要使赎路的条件“一般地说”“尽可能使人为难”。③

维特想把赎回满洲铁路的条件规定得“比在俄国赎回铁路的
124 条件困难得多，从而使赎回满洲铁路的可能性变得微乎其微”。④ 这就是说，中国政府在赎路时有义务偿还“用于此项事业的全部资

① 1897年1月31日，中东铁路公司董事会下属的财务委员会作出决定：“从与中东铁路公司股票价值相当的应得进款中，首先提取三百万卢布存入华俄道胜银行，供财政大臣支配。”1897年3月15日，该委员会又作出了关于按照股票尚存四百五十万卢布的资金，以及从中提取三百万卢布，开立特别帐户，供财政大臣支配的决定。见第15号卷。

② 见第3号卷，(B)，1896年8月16日罗特什捷英发自柏林的电报，和同年8月18日维特发往柏林的电报。

③ 见同上，维特1896年8月23日发往柏林的电报。

④ 见财政大臣1896年11月11日对西伯利亚铁路委员会所作的报告，第7页，报告题为：《关于〈中东铁路公司章程〉的批准问题》。

本和为此路所欠的全部债款，以及债款增殖的利息”(合同第十二款)。据财政部 1896 年 11 月所作的近似(并且是缩小了的)估计，三十六年后中国政府要赎路就得付出将近七亿卢布。① 但是，倘使中国政府毕竟先期赎回了铁路，那末，刚才指出的把股本的大部分变成“特别基金”(这一基金是以补偿国库用于勘查的费用为理由而设置的)这一措施，便能把分期向李鸿章支付的这笔款项归还俄国国库。而对李鸿章的付款将在某种程度上保障工程的顺利进展和竣工。

大家知道，维特预见到，正是在筑路期间可能发生各种不测事件，这就促使维特把中东铁路公司应在通车之日向中国政府缴还五百万两银子(大约七百万卢布)这一条也列入了租让合同之中。当然，在先期赎路时，就连这笔款项也应包括在赎路费用的总数之中。② 由此种种造成的状况，使先期赎路成为中国政府力不胜任的事情，此外，它还使先期赎路和把一千万卢布归还俄国国库联系起来了，这一千万卢布是国库为建筑与经营铁路的权利本身所花费的。

华俄道胜银行在从财政上参加中东铁路企业的同时，丝毫不用担当伴随而来的风险。然而，因为它成了铁路的大东家，单凭这一条，它就生气勃勃地卷入了铁路利益之中，并且在形式上成了与 125
中国政府签订租让合同的唯一立约者。考虑到这后一情况，就不能不看到那条妙计的作用了。正因为用了妙计，让中国政府以五百万两银子入伙合办银行并按股分得银行红利，才使银行的这种

① 这一计算的基本错误在于，将公司在整个三十六年内作为铁路造价接受的债券资金算成了一亿一千五百万卢布。然而刚到 1901 年，债券资金就已相当于二亿七千二百八十九万五千二百卢布了。事实上，中东铁路在其经营的九年中，公司对俄国政府所欠的债务已达七亿三千三百二十九万七千二百一十二卢布二十四戈比。见第 1 号卷，附件 3，«截止 191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对政府负债情况的报告»。

② 见合同第十二款。

地位得到了巩固。[①] 维特虽然使中国政府与银行事业的广泛发展具有如此重大的利害关系，但他却使中国政府和华俄道胜银行都不能对于铁路事务的管理起到任何作用。[②]

俄国政府既然成了中东铁路公司的唯一股东，公司的一切债券借款，俄国政府皆有权贷给，它还同样承担了补贴经营费用和抵补偿还债务的付款，这样，它在实际上便成了铁路的全权主人，这是自不待言的。[③]8月27日合同又规定，公司章程需与俄国的铁路条例相符，这样，即便在形式上也可以十分广泛地规定俄国政府在铁路事务中的职权范围了。公司章程第二十七款要求把下列问题都提交俄国财政大臣"核准"，诸如：协董的选派，总工程师、各处处长和所有工程师的指派，稽察局稽察员的选派，铁路资本存放办法
126 的确定，所有高级执事人员的权利和义务的确定，铁路管理程序的确定，以及铁路线的方向和筑路技术条件的确定。可以说，维特取得了在满洲修筑和经营（为期八十年）俄国国有铁路的权利，这条铁路在国际关系方面是以私营股份企业这一无可指摘的形式作为保护的，这家私营企业的股票究竟在什么地方，究竟属于谁，这些始终是不可探知的秘密。[④]

难怪连维特也承认，8月27日合同的条件"从俄国利益的观点看是极为有利的"。[⑤] 这些条件是：（1）五英尺的俄式轨道；（2）凡

① 不论建筑铁路的合同，还是与银行签订的专门协定，都确认了中国政府以这些款项入伙合办华俄道胜银行的权利。这一特别协定的引文见前引财政大臣1896年11月11日的《报告》第9页。马克谟在《与中国签订的及有关中国的条约和协定》第1卷第78页上刊载了这一协定的条文，但其确切性是没有把握的。

② 公司的总董是唯一的中国人，他的职权严格地局限于下列两点：（1）考察公司对中国政府应尽义务的履行情况，（2）经办公司与中国中央及地方当局的交涉事宜（见合同第一款）。

③ 见《公司章程》第十一和第十六两款。

④ 1896年5月18日俄国政府和银行所订的协定第四条，以及华俄道胜银行和国家银行所订的协定，对于以股票为抵押品的贷款都始终密而不宣。

⑤ 见前引财政大臣1896年11月11日的报告，第6—10页。

由该路输入或输出的货物照中国海关税则减收三分之一的税金，这和中国海关税则是相违背的；(3)公司在铁路运价问题上享有完全的自由；(4)铁路一概不负担中国的任何捐税。合同固然没有为铁路提供在满洲免税开采煤矿的权利，不过，(1)合同中附有许景澄的书面承诺，他答应在北京为此事作出努力，并且(2)铁路总归可能以运价作为手段迫使中国煤矿把煤廉价卖给铁路。所有这一切实质上保障了对卷入铁路活动范围的整个地区实行经济征服。

但是，合同中有两条并没有把事情仅仅局限于对不确定的广阔中国领土实行经济征服。合同第六款承诺"把建造、经营和防护铁路所确需的土地，以及铁路附近为向铁路供应砂土、石块、石灰等项所必需的土地"转让给公司，官地无偿让予，私地作价出让。这一款还使公司享有"管理公司地段的绝对的专有权"，以及"在这些 127
地段建造各种设施的权利"。合同第五款颇为广泛地规定，"凡铁路地段内的刑事犯罪、诉讼等事应由地方当局依据条约处理"。这两款提出了"铁路地段"的概念，并且提出了对其实行单独管理的问题。在此完全不是讲如何运用条约认可的俄国臣民的治外法权问题，而是作出了具有新的领土组成性质的司法规定。关于这一问题，1896 年 5 月 22 日条约却是保障维护中国的主权的(见第四条)。

合同第五款被转载入了《中东铁路公司章程》(它无须得到中国政府批准)，只是把"地方当局"的概念稍为精确地说成"俄中两国的当地官署"(见《章程》第七款)。① 合同第六款被包括在《章程》第八款中，该款责成公司在铁路地段内组织自己的警察。《〈章程(草案)〉说明书》在论证这一点时指出，铁路地段与"中国各口岸

① 在《〈章程(草案)〉说明书》第 4—7 页中指出，应对铁路地段的司法组织问题进行专门研究。后来，根据与地方当局订立的协定，设立了俄中混合法庭(交涉局)，解决了这一问题。

划归欧洲人居住的、自设警察的地段(租界)"完全相同。①

由于这一租界具有铁路性质,它所伸展的长度是前所未有的。随着铁路的修筑,尤其是铁路经营事业的发展,这个租界不论在扩大直接占有的土地、还是在扩大经济统治的范围方面,都将显示出强有力的趋势。而1896年的一些国际决议书所拟定的这个社会机构,经过八十年的内部发展,其结果,看来排除了在八十年后确实无偿地把中东铁路完全转归中国所有的可能性,而在当时,事业的创始者们却还是多多少少可以具体意识到这种可能性的。唯其如
128 此,维特才呕心沥血,以便首先不让用先期赎路的办法来缩短这一时期;而在赎回铁路的情况下,不仅在财政方面,而且在铁路使用方面都要捍卫俄国政府的利益,因为这条铁路是衔接西伯利亚干线的一个环节,它的经营首先是对俄国有利的。《公司章程》第三款列举了中东铁路公司对于俄国政府应尽的种种义务,这一款是完全基于下述想法的:俄国政府在这里是作为"第三者"出现的,而公司在八十年内对这"第三者"所承担的义务,在另一时期将自动转归中国政府承担。② 这一构想全然不是从8月27日合同的内容本身引出来的,因此,在将其付诸实施的最初尝试中就不可避免会引起冲突。但关于这一点,从那个"幸运的"时代保存下来的文件中找不到任何反映。

① 见《说明书》第7页。

② 见《〈中东铁路公司章程(草案)〉说明书》第2—3页中对第三款的注释。

第三章

对中国南满领土的“侵占”

(1896—1898年)

1896年5月22日的同盟条约和8月27日的铁路合同不可 129
变更地决定了西伯利亚大铁路的问题：铁路按顺序说最末的一千五百俄里应当通过他国领土，根据合同，应在六年期限内，即在1903年以前把符拉迪沃斯托克和莫斯科接通。于是，两地的连接似乎就只是克服技术困难的问题了。早在1895年秋，俄国工程师就在满洲开始了勘察，但是，直至谈判时，这些勘察工作并没有提供确切的肯定的资料，因而俄国方面甚至不可能在合同中即使近似地标出满洲铁路的方向，加之当时已能看出，筑路的技术困难是异常之大的。勘测工作直到1897年夏天才开始，虽则进展极快，铁路方向和筑路计划也直到1898年春天才确定下来。中国政府和俄国的同盟负有如下使命：巩固清王朝的地位，不仅保障中国领土不受来自日本方面的侵犯，而且在长达八千俄里俄中陆路边界全线上保卫和平。为了这个同盟，中国政府表示同意穿过满洲敷设俄国铁路，从那时起，已经过去快两年了。

在这两年里，俄国刚刚来得及在北满线路上开始进行某些最 130
简单的土方工程。北满线路竣工以后，应当在将来发挥同盟主要的和不可抗御的工具的作用。但是，正当建筑工程能全速进行时，1898年春天，修筑通往旅顺口的南满支线这一新的急迫任务出现了，并且提到了首位。发生了一桩“闻所未闻”的事情：俄国自己

"狡诈地"违反了它的同盟者领土不可侵犯的原则，实现了对辽东的"侵占"，"这一致命的步骤所引起的全部长远后果，是以对我国不幸的对日战争而告结束的"，"这种侵占破坏了我国同中国的所有传统关系，并且永远破坏了这种关系"。①

没有必要低估俄国在1898年2月所采取的这一步骤的意义。当时，俄国向中国政府提出，要求把旅顺口和大连湾及其邻近土地租给俄国，这就是说，俄国要在被对马军事基地封锁着的日本海的外边，在北京附近得到两个不冻港，以停泊俄国军舰。俄国在其近几年的预算中纳入了一项九千万卢布的造船补充规划，不少于三千万卢布的装备和加固新港口的费用，以及不少于一亿卢布的建筑九百俄里新铁路的开销。俄国用官资设置了商业性的轮船公司(«中东铁路公司海运局»)。最后，俄国必须顾及它那个步骤的政治后果了。日俄战争的失败恰恰迫使俄国收回了这一步骤，并在领土方面退到了1896年合同的范围。但是由此当然还不应得出这样的结论：旅顺口事件破坏了政治传统，并且与俄国的政治纲
131 领(它的实现刚刚开始，还远未达到最快速度)有着原则性的矛盾。

至于说到日本，那末不应忘记，日本否定了1898年俄国的"侵占"，并把俄国赶回到1896年的界限之内，在此同时，由于1904—1905年的战争，它自己置身其间的已是1895年«马关条约»的最初稿本所勾画的那种地位，而完全不是由于维特的恩典它在1896年所处的那种境地了。至于说到中国，其中包括1896年俄中之间的那些决议书，那就不应否认，两者基本上都经受住了好象是1898年的"侵占"带来的考验：(1)建筑铁路的合同由中国政府履行到底了，铁路也竣工了，尽管中国未能完全保障铁路的安全，使之免遭红胡子的袭击和义和团的破坏；(2)维特亲手拟订的只反对日本一

① 见维特：«回忆录»，第1卷，第116页。

国的同盟条约，确实预防了日本对中国再次发动进攻，而对于朝鲜，俄国也坚定不移地贯彻了同盟条约，直到最后，朝鲜问题才由日本用战争方式加以解决，俄国是在1904—1905年战争之后，被武力所迫才放弃了保卫朝鲜的独立(即使是虚幻的独立)的政策。在中国本身的国际关系史中，旅顺口事件在争夺"势力范围"和租让权这一政策的全部事实中是并不突出的。从1895年起，这一政策就在中国确立了起来，并取代了直接抢夺中国边境领土的政策。维特认为，对中国的瓜分指日可待。俄国为了不失掉自己的一份，按照维特的主张，也赶紧附和了这一政策。①

然而，必须注意到，在维特的《回忆录》中说得如此尖锐的对侵占辽东的评述，在俄国得到了最广泛的传播。几乎令人惊讶的是，132
甚至这次侵占的"罪魁"尼古拉二世本人也间接承认了这种评述。② 同样必须注意到的是：在维特这里我们得到的不仅是回溯往事的评述，因为从沙皇提出讨论对辽东半岛一个港口的占领问题的第一天起，维特就提出了反对，并且没有马上放弃自己的意见。单凭这一点，在下面的研究中就必须对维特亲身参与的那些事情给予足够的注意，维特的亲自参与使我们有可能研究那种自命为"和平的"政策的本质，并对其作用作出评定，这种政策仿佛历来都不图谋侵占，并以保障和平自诩，仿佛它不是无能为力的，也不放弃达到自己的目的。

---

① 参见维特在1895年3月30日会议上的讲话和他对杜霍夫斯科伊奏疏的反驳(见前引《回忆录》第72—74页和99—100页)。并参见O. 傅兰克：《列强在东亚(1894—1914年)》，第104—145页，《1895—1900年的势力范围政策》，以及鲍明钤：《中国的对外关系》，第37—62页，《国际间的租让权之争(1895—1911年)》。

② 1905年7月，尼古拉二世指派国务会议成员里赫捷尔和切列凡斯基"了解各部门中拥有的关于以往对日战争中(从我们占领旅顺口的念头产生时起)政府在远东的活动资料"，并"在这些材料的基础上搞清导致我们走向对日武装冲突的原因"。见我的论文《鸭绿江上的租让权》，载于论文集《俄国的往昔》，第1册，第88—89页。

I

我们如果依据维特本人的《回忆录》，那就会确信：一直到1897年11月14日，当尼古拉二世召集会议，讨论鉴于德国占领胶州俄国应当遵循何种行动方式之时，和在外交大臣穆拉维约夫伯爵宣读了他关于俄国占领大连湾的方案之后，外交部的远东政策并没有引起维特的任何反对。不但如此，维特本人积极参与了这一政策，这项政策总的说来可以记到维特名下。维特正是把侵占胶州作为在俄国方针的"突然"转变中具有首要意义的事件，这是不足为怪的。但是，唯其如此，我们就必须重新回到使我们感到兴
133 趣的政治局势发端的时刻，重新回到1895年春天，维特在那时是起了决定性作用的。

正如前面所指出的，维特十分激烈地主张，必须不让日本在中国北部立足。这一想法是从他关于西伯利亚铁路政治作用的总构想中引出来的，它不仅和许多大臣的反对意见相违背，而且也不符合沙皇本人的看法。1895年春天，尼古拉二世在一星期之内三次表示，要在朝鲜沿岸得到一个不冻港，并准备容忍日本势力在南满确立起来，只要"有一条狭长的地带"把这个朝鲜港口和俄国领土连接起来就好。没有任何理由猜想，维特在打消了尼古拉用朝鲜领土作为补偿的想法，并且撺掇他采用最后通牒的方式禁止日本占领黄海和北直隶湾① 的全部南满海岸时，他就否定了取得一个不冻港作为俄国铁路出海口的主张。反之，不论是谁，甚至中国政府，都不怀疑，俄国除了要求取道满洲从而将西伯利亚铁路展直外，它还将为自己的军舰要求一个合适的停泊场，即使只在冬季停泊也好。这是因为在1895年4月俄国公开出面对日本采取敌对

① 即渤海湾。——译者

行动之后，再为了停泊军舰去使用日本港口就成了困难而危险的事。大家知道，那年秋天俄国已经得到了在不对外国人开放的港口胶州停泊军舰过冬的权利，使用期限是即将来临的1895—1896年的冬季。而1896年春天，维特在和李鸿章谈判时也试着谈到了关于通往"黄海一个港口"的铁路支线问题，只是由于铁轨宽度问题事情才未告成功。维特竭力要加上半英尺，俄国最初的领土计划正是在这半英尺的分歧中向中国方面暴露无遗。在那种富有诱惑力的形势下（1896年的彼得堡谈判和莫斯科谈判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举行的），对于李鸿章在这一关于铁轨尺寸的细节上所表现的固执己见的意义是不能低估的，因为它向俄国表示了一种界线，中 134
国不愿意俄国在满洲超越这一界线，俄国提议的防御同盟的等价物只能是北满，而不能更多了。

事情的技术问题顶多不过涉及到十个人，除了他们，维特和李鸿章当时谈判的内容是十分秘密的，而这些人在自己的这项保密职务中始终保持着绝对的缄默。甚至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那些法国人在这方面有什么有失检点的表现，这些法国人通过罗特什捷英知道了某些细节，不过，那大概不是谈判进程本身，而只是关于谈判的某些事务性结果。如果只一般地可以认为维特《回忆录》的英文版具有某种科学价值的话，那末，就是《回忆录》中叙述的李鸿章也是守口如瓶的。1896年夏天，李鸿章在自己的柏林会晤中，在如今使我们感兴趣的南满铁路支线问题上，同样是守口如瓶的。不但如此，他在那里还肯定地说，尼古拉否决了他关于取得某个朝鲜港口的建议，又说，俄国由于1895年在辽东问题上进行了干涉，而期待从中国得到表示感恩的任何让步，关于这个问题总的说来根本无从谈起。① 可以推测，当时李鸿章在伦敦也是很愿意使英国

① 见《德国外交文件》，第14卷，第1分册，第31页，第3663号。

人对于向俄国作出的让步的性质和范围问题感到放心的。[①]不管怎样，1896 年的三个文件（5 月 22 日的政治专约，5 月 23 日的财政议定书和 8 月 27 日的铁路合同）确实都没有泄密。而这就在国
135 际范围内为感到兴趣的人们提供了广泛的可能性，让他们对于俄国提出的要求，以及所达到的成果去进行猜测。即使在 1896 年12 月 4 日《中东铁路公司章程》公布以后，这些猜测又怎能只限于一个北满，而不涉及关于一个不冻港口的这种或那种说法呢？

在这种情况下，公司章程公布一个半月以前，1896 年 10 月 18 日（30日），在《北华捷报》上披露了《中俄专门条约》的文本，这个条约的抄件是这家报纸驻北京记者从俄国使馆中搞到的，从此以后，在文献资料中就把它称作《喀西尼条约》。不论对条约的来路作何种判断，应当注意到的是：直至 1910 年，当 1896 年 5 月 22 日条约法文本的准确译本（虽然未经证明属实）终于刊出以前，《喀西尼条约》一直是俄中关于满洲的协定的唯一类似文件的说法，要不是正式公布了确实由维特、洛巴诺夫和李鸿章签署的条约，《喀西尼条约》就是无可辩驳的。[②] 同时，如同事件往后的进程所显示的那样，这一说法不仅没有被推翻，而且它基本上和实际情形是颇为相近的，不同的是关于收买经过的具体细节。既然有了 5 月 22 日的条约，那末，即便所披露的条约文本是从俄国驻北京使团 1896 年秋天所拥有的某个未经签署的原件逐字逐句抄来的（在《北华捷报》上未登签名），这项条约也并没有在 1896 年秋天由俄中双方签署，这大概是没有疑问的。但是，不作更多的推论，就把《喀西尼条

① 见第 40 号卷，第 1 部分，璞科第 1897 年 3 月 19 日发自北京的电报。电报中说："李鸿章在英国逗留期间对英国工业界的代表作出了最广泛的承诺，并邀请他们前往中国"。

② 1896 年 5 月 22 日条约的法文本曾刊登在 1910 年 2 月 15 日的《每日电讯报》（《The Daily Telegraph》）上，但没有引言和结尾部分，未署日期，也没有《议定书》。见马克谟：《与中国签订的及有关中国的条约和协定》，第 1 卷，第 81 页。

约»列入纯粹的报馆捏造之列，并把它作为脱离现实局势的彻头彻 136
尾的虚构来加以评述，似乎也是没有直接根据的。

这个颇费猜测的«文件»的内容是这样的。俄国取得两条铁路的修筑权，这两条铁路最终在吉林汇合：(1)从符拉迪沃斯托克经珲春至吉林，以及(2)"从西伯利亚铁路的某站"经瑷珲、齐齐哈尔、伯都讷至吉林。俄国还取得这两条铁路为期三十年的经营权，三十年后铁路可由中国政府赎回，赎路条件留待以后确定。如果将来中国觉得自己不便于把从北京到山海关的铁路继续延伸到奉天、以及再到吉林，那末，俄国有权从北边、从吉林开始修筑这条铁路，而中国则保留有十年以后赎回铁路的权利。从山海关到齐齐哈尔、营口、开平、旅顺口和大连湾的中国铁路支线的各种可能的方案都将采用俄式轨道，以方便两国间的贸易往来。在中国领土上的所有俄国铁路的保护工作，原则上都由中国政府自己承担，但是，鉴于有效实现这种保护的实际困难，允许俄国政府在最重要的车站驻有骑兵和步兵部队。

关于港口问题，«条约»是这样解决的：(1)预见到在亚洲大陆上发生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中国把胶州港租给俄国，租期十五年，但是，为了不引起其他大国的嫉妒或猜疑，俄国只有在面临军事行动的直接危险时，才能直接拥有这个港口，并占据该港的制高点，以及(2)中国负有义务从速将旅顺口和大连湾予以设防，俄国则将为保卫该两港口并不准任何大国占有而提供必要的帮助，中国方 137
面也将不把该两港口让与任何人。如果俄国卷入了战争，并且客观情势有所需要，中国将准许俄国暂时在该两港口集结其陆海军力量，但在此种危险尚未来临时，该两港口的行政管理完全由中国控制。

最后，条约又把黑龙江和吉林两省勘探和经营矿产的权利只提供给俄中两国臣民，每次均无须得到北京政府批准，只要地方

当局同意即可。如果再加上下面一条：在仿照西式改编满洲军队的情况下，全满的军事教练工作均应由俄国负责，那末，确实就象《北华捷报》记者所总结的那样，“这个文件本身已经清楚表明，它把俄国所能希望的一切统统给了俄国”。①

不难发现，《喀西尼条约》勾划了俄国在满洲全境（不仅北满，还有南满）的“势力范围”，而且条约使五英尺宽的俄式轨道成了这种侵占的基本工具，不管这条或那条铁路的建筑者和经营者是谁，是中国还是俄国。北满的那条弯道铁路必定直接归俄国，南满的那些铁路提供给它也只在形式上是有条件的，即假定中国放弃建筑这些铁路。《喀西尼条约》所叙述的铁路规划是下述两项计划的某种混合物：即杜霍夫斯科伊在我们已经知道的那项奏疏中提出的铁路计划，以及早在1896年春天来到俄国驻北京使馆的美国人布什的方案中的部分规划。例如，北满铁路干线为期三十年的租
138 让权，就是布什方案中也有的东西。关于准许俄国使用中国的不冻港问题，则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一旦遇到战争威胁，俄国为保卫中国进行武装干涉的必要性。这一点和5月22日条约中的规定是一样的。

另一方面，《条约》完全排除了第三国对满洲的任何干涉，整个满洲都为着俄国完好无损地保存起来，这和维特早在1895年3月30日会上所表示的要求与信心是完全吻合的。维特在当时说，一旦北满敷设了俄国铁路，那末不征得俄国同意在中国北部就建造不了任何铁路支线。因此，我们所分析的《文件》的内容就其基本特点而言，是与建筑西伯利亚大铁路有关的俄国进攻性计划的具体的、但远非完善的发展。

然而，《喀西尼条约》文本形式上的特点，却使人无论如何也不

① 《喀西尼条约》转载于马克谟：《与中国签订的及有关中国的条约和协定》，第1卷，第79—81页。

能把它当作一份外交文件的最后定稿，因为(1)«喀西尼条约»虽有仔细拟订的引言部分，却根本没有结尾部分(签字、日期等项)；(2)在引言部分没有道出中国方面代表的姓名，然而从俄国方面却举出了喀西尼的名字；(3)抄件所根据的那份«条约»文本本来没有分成条款，分条编款的工作出自英国出版者之手；姑且不说(4)文本在修辞方面也有不少细小的地方不够完美，不够简练。根据这些迹象，«喀西尼条约»只能看作是条约草案的一份详细草稿，当它在1896年秋天从俄国使馆的文件中被窃取出来时，还不是完全准备就绪可供签署的东西。

不管怎样，大概用不着怀疑，喀西尼在1896年4月和总理衙门开始谈判时，他手头至少应当已经准备了一份列举各项让步的确切草案，这些让步是应予载入行将签订的条约的。那位最严格的当代批评家在披露轰动一时的那则英国消息时，很可能是认定 139
了这样一种推测，即以为«喀西尼条约»在实质上确切转达了俄国规划的内容。须知在当时问题就会归结为：俄国从中国实际上获得了哪些它所要求的东西。正如往后事变所表明的，当德国外交界有机会在胶州取得成功时，它正是这样提出问题的。俄国仿佛对胶州有所要求，甚至享有权利，胶州因而受到保护。«喀西尼条约»客观上在国际舞台上建立了一种假设：俄国企求得到整个满洲并进逼直隶省。似乎1896年12月4日章程正式确认的北满干线满足了俄国对远东的扩张要求，即便是在不长时间内满足了这种要求，这种看法由于«喀西尼条约»而毫无市场了。

俄国外交界截止那时在朝鲜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只能使上述观点变得更加坚定，它使人们预感到，俄国在近期内将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在已经划定的满洲地区的范围内也是这样。

II

中日战争是以形式上宣布朝鲜脱离中国实行独立而告结束的〔1895年4月5日(17日)条约第一款〕。这种结局似乎造成了日本在这个国家的实际统治地位。满洲的事业对日本说来变得愈是没有希望，这种地位对它就显得愈加宝贵。为了防止俄国在亚洲沿海地区扩张其属地，日本制订了一个统一的、完整的铁路防御计划，这个计划在《马关条约》签字的第二天就已为人所共知；而随着日本被迫从南满撤离，计划也就破灭了。[1] 这项计划提出：(1)向朝鲜政府提供资金，以便使其能刻不延缓地建筑一条从釜山港(在朝鲜南部)到义州(位于鸭绿江口，在满洲边界上)的铁路；(2)敷设一条从锦州通向牛庄的铁路，并从那里往北通向奉天，以便使其与西伯利亚大铁路衔接起来；(3)说服中国政府在某一确定的期限内建筑一条把朝鲜和日本的铁路与北京衔接起来的铁道；(4)把应从中国得到的全部赔款用于建造这些方案所设想的各条铁路。可见，日本经过十年最紧张的海军准备用第二次战争[2]的代价在大陆上取得的地位，它早在1895年就已经想一举争得了。

三大国1895年4月关于辽东问题的最后通牒使朝鲜问题对于日本说来尖锐到了极点。倘若在丢了满洲以后再把对朝鲜的保护权从自己手中放掉，交到人家手里，那就等于日本在以胜利告终的战争中遭到了完全的失败。而同时，日本外交界也不能不清楚地看到，1895年的国际形势较之十年以前，1885年俄国第一次试图插手朝鲜时，是更加有利于俄国了。在签订和约时，俄国尖锐提出的只有一个辽东问题，但它迟早也要以这种或那种形式，竭力阻挠日本在朝鲜的计划，这是毫无疑问的。这自然就使日本在朝鲜的

① 关于这一计划的消息出现在1895年4月7日(19日)的《北华捷报》上。

② 指日俄战争。——译者

行动具有一种过于敏感和严峻的性质。

从战争一开始，朝鲜政府就被迫和日本订立了同盟条约。这一条约保障向日本军队提供国内的各种帮助和粮食供应，朝鲜政府还从日本接受了一笔三百万元的贷款。朝鲜准许日本敷设电报线，并遭到日军的占领，即使战后这种占领仍要继续下去。中国在 141
朝鲜王宫中的总办的位置如今由日本公使占据了，他使汉城王宫唯命是从，并且急剧地采取了一种从王宫和行政机构中排除一切亲俄派的方针，其结局是举行了一场宫廷政变（1895 年 9 月 26 日），朝鲜王妃也在政变中横遭杀害。到这一年底，国内一伙各色各样的军火商人、包工头一哄而起，由他们肆无忌惮的擅行妄为所煽动起来的反日运动，已经颇为强烈了。运动的目的是为了让俄国驻汉城的代表能从既成的局势中获得看来出乎日本意料的成功。1896 年 1 月 30 日，朝鲜国王逃出宫殿，到了俄国使馆，并在该处驻跸，等待在俄军的保护下建筑新的宫殿。①

随着国王迁跸，俄国取得了绝对的胜利，并有可能从亲俄派中来选择大臣。但也不应夸大这一胜利。不管在此以前还是以后，国家行政管理的基本柱石都是外国影响所触及不到的，因为朝鲜海关的总税务司是英国人柏卓安，国库银钱收入的绝大部分由他支配。但是，如果除掉这一对日俄双方具有同等意义的情况，那就确实可以说，日本的政策在朝鲜如同在满洲一样遭到了“完全的破灭”，胜利的成果有可能从日本手中转到俄国手里。② 1896 年 5 月 2 日（14 日）由俄日两国代表在汉城签署的备忘录是一项协定，其中明确表述了俄国所取得的胜利，而日本的任何优势地位统统无影无踪了。事实上，备忘录四项条款中的头两条包含了如下内 142

① 详见 O. 傅兰克：《列强在东亚》，第 114—115 页。

② 见同上，第 115 页：“可以毫不过份地说，这是日本的朝鲜政策的彻底破产”（原文系德文。——译者）

容：双方互相承认：由于国王在俄国使团保护下迁跸所造成的朝鲜政府的状况是正常的，国王本人何时回宫，由国王"自行斟酌"，但"一俟其人身安全已无可怀疑"（亦即当俄国愿意这样做的时候），双方有义务就其回宫问题提出"忠告"。至于说到当时内阁的（亲俄的）真实组成，第二条直截了当断言，大臣们是由国王"根据自由选择任命的"。备忘录的第三、四两条看起来似乎是对日本的让步，这两条容许日本保持不超过二百名的宪兵以保护电报线，这些宪兵是以小股的队伍散驻于沿线各地的，并保持不超过八百名的士兵以保护日本在釜山、元山和汉城的侨民点。

但是，(1) 俄国也被容许在这里保持同样数量的军队；(2) 对日本说来，这意味着把它当时占领着朝鲜的其余武装力量全部撤走，而俄国却得到了一种新的权利；(3) 对上述所有外国军队则约定，一俟相应的危险"消失"，"国内恢复了安宁"，军队即行撤回。在朝鲜政府当时的状况下，这项规定为俄国保留了政治影响。[①] 关于俄国政府将如何试图加强这种影响并把它巩固下来，这个问题在《汉城备忘录》中还完全是悬而未决的，于是，日本现在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在这一方面从俄国取得某些保证。看来，这就是洛巴诺夫和山县有朋在同年 5 月 28 日 (6 月 9 日) 签订的所谓《莫斯科议定书》的原由。这份议定书是山县在俄皇加冕大典期间建议举行的谈判的结果。山县最初的主张归结为按照北纬三十八度线来
143 瓜分朝鲜，其中，包括京城汉城在内的南半部划归日本，而北半部则划归俄国。但是，"作为俄罗斯帝国未来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朝鲜，由于地理上和政治上的条件，它的命运是由我们预先决定了的"，然而，"倘若根据条约把朝鲜半岛的南端让给日本，俄国就是正式地、一去不复返地放弃了在战略和海军方面朝鲜最重要的一

① 《汉城备忘录》，见《远东事务的条约和外交文件汇编(1895—1905 年)》，圣彼得堡 1906 年版，第 146 页及以下各页。

部分，这样，它也就自愿束缚住了自己将来的行动自由”，① 于是，洛巴诺夫抱着承认朝鲜“独立”的主张拒绝了日本对问题的这种提法。

议定书公开条款的文本正是按这后一种风格拟成的，它赋予双方政府以下列共同承担的义务：(1)建议朝鲜政府调整自己的财政预算；(2)在必须借用外债的情况下，合力向朝鲜提供帮助；(3)完全容许朝鲜组织和保持本地的军队和警察，其数量应在没有外国帮助时足以维持国内的秩序为准；以及(4)不管是现存的日本电报线，还是现在准许俄国敷设的电报线，都容许朝鲜加以赎回。这些义务对于日本的现实意义在于，在财政方面和建立当地军队的事务方面俄国放弃对朝鲜提供单方面的建议和帮助。对于俄国，其意义则在于，在莫斯科议定书的有效期内，“直至俄国在太平洋沿岸在各个方面都稳固地确立起来以前”，朝鲜的“完整和独立的原则”以及双方在维护这一原则中的对等利益得到了承认。② 由于朝鲜政府缺乏武装力量和物质手段，要郑重地谈论其真正独立暂时是不可能的，因此，议定书的秘密条款规定，不经彼此同意，双方 144
不得将本国军队开进朝鲜领土，一旦有此必要，双方将预先约定各自军队的活动区域以及军队之间的中立地带。③ 假如《莫斯科议定书》在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得到信守，那就可以说，它将把朝鲜保持在受到自己两个邻国同等程度的、或联合的影响的国家状况之中，即不以其中一国单方面的压力为转移的国家状况之中，亦即保

① 见拉姆斯多尔弗的奏疏：《关于(沃加克)论1902年3月26日条约在满洲问题发展中的意义的奏疏》，这份奏疏于1903年5月7日后上呈尼古拉。见第120号卷。

② 见第120号卷，前引拉姆斯多尔弗的奏疏。

③ 1898年5月28日(6月9日)的《莫斯科议定书》，载《远东事务的条约和外交文件汇编(1895—1905年)》，圣彼得堡1906年版，第159页及以下各页。在Б. Э. 诺利杰的书中全文刊载了议定书的秘密条款，见他的《对外政策史纲》，彼得堡1915年版，第246—247页的注释；参见第20号卷的秘密条款文本。

持在针尖上的稳定状态之中。

然而毫无疑问，洛巴诺夫在签订5月28日议定书时是决意不顾及自己所承担的义务的。正是在莫斯科和山县进行谈判的那些日子里，在莫斯科还接待了前来求援的朝鲜国王的使团。而奇怪的是，朝鲜所要求的帮助，恰恰与俄日议定书中规定为俄日双方共同行动内容的所有条款纹丝不差。据我们所知，这次俄朝谈判的纪念物并不是一份双方的议定书，而是由洛巴诺夫拟就、经尼古拉赞许的《对朝鲜大使的几点答复》。① 文件的内容（逐字照录）如下：

一、国王在俄国使馆驻跸期间由俄国卫兵保护。只要国
145 王本人认为必要和方便，他可以留住在使馆中。而如国王随后回宫，俄国政府亦可为其人身安全承担道义上的保证。现驻使馆的俄国部队仍将留在使馆由俄国公使调遣，如有必要，部队甚至尚可增加。

二、为解决教官问题，将在最近派遣一名有经验的俄国高级军官前往汉城，俄国政府将委任他就此问题和朝鲜政府进行谈判。该军官将首先奉命从事建立国王卫队的工作。还将从俄国派遣同样有经验的人员前往研究朝鲜的经济状况，并搞清必须采取的财政措施。

三、关于派遣俄国顾问协助朝鲜政府的问题照上条所述予以解决。显而易见，这些顾问将在俄国公使领导下由上述在军事和财政方面的受托人员充任。

四、国家的经济状况和政府的需要一经搞清，便可考虑与朝鲜政府谈定借款。

五、俄国政府同意将其陆上的电报线与朝鲜的电报线衔接起来，并将给此事以决定性的帮助。

① 见第20号卷，附于洛巴诺夫1896年6月16日给维特的送件函之后的《对朝鲜大使的几点答复》的文本，信中告知说，文件“得到了皇上的赞许”。

洛巴诺夫在向朝鲜政府作出这些承诺时，他仿佛以《几点答复》的形式，把背着日本所采取的在朝鲜的单方面的行动计划合法化了。我们看到，这项计划还没有提出在直接意义上"侵占"这个国家的任务，因为在公布《莫斯科议定书》的同时，俄国政府曾用公告宣布了这个国家的"独立性"和"不可侵犯性"。① 但是，预定的 146
"和平征服"朝鲜的方式不可避免要导致俄国不仅与日本、而且与英国发生冲突，因为在俄国财政顾问的前进道路上有英国的海关总税务司这块绊脚石。俄国取得了对国王个人的影响，掌握了现有的陈腐的权力机关，同时也对国家的基本财源插手进行干预，并且真有可能确实在那里建立起自己的政治统治。

就这样，俄国外交界在 1896 年 5 月同时在三个方面进行了工作：(1)在北满寻求通向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过境铁路；(2)在朝鲜寻求取得保护权的迂回途径，以待自己的力量得到充分发展后，能完全吞并朝鲜；以及(3)在南满物色一个不冻港作为出海口。至于第四方面，通往北京的铁路问题，暂时完全搁在一边没有提起，因为这个问题在国际上是最富于爆炸性的。在穿过满洲通向黄海的铁路问题上俄国此刻遭到了挫折。然而在头两点上却取得了巨大的外交成就。其中在朝鲜问题上，这种成就的代价是对日本使用了"前所未闻的狡诈伎俩"，稍后，俄国在辽东问题上又故伎重演。而当时从形式上看，俄国的动机是良好的。从 1895 年 4 月起，俄国就对日本采取了一种势不两立的态势，并决定把它坚持到底，绝不让日本登上大陆。日本原来急于在西伯利亚铁路竣工前在中国和朝鲜领土上都要迎击俄国，结果反被从辽东半岛抛了出去，并在政治上被撵出了朝鲜半岛。

维特自己承认，在 1896 年 5 月关于朝鲜问题的谈判中，他的

① 政府的公告见《远东事务的条约和外交文件汇编》，第 161 页。

147 参加完全是次要的，谈判中的主要作用归功于洛巴诺夫。① 但是，从洛巴诺夫取得外交成就的第二天起，发展这一成就的工作绝大部分就成了维特的责任，因为按照整个计划的设想，征服朝鲜的基本工具是俄国的财政顾问，把他作为"朝鲜国王的财政大臣"，而不作别的考虑的头一个人正是维特。② 维特毫不踌躇地把朝鲜纳入了自己的管辖范围之中，看来，他对自己所采取的方针是否正确是不怀疑的。而最终只落得一通空谈的关于朝鲜问题的这整个片断则受到了《回忆录》作者文笔的保护。维特认为"和日本的条约"(即5月28日议定书)本身是"完全成功的"，再则"日本代表对它表示欣然同意"，也就是说，此次如同往常一样，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他维特所奉行的政策是一种爱好和平的互让政策。在维特的叙述中，根据《莫斯科议定书》"我们可以在朝鲜派有教官"，并"应指派财政方面的顾问"，他说，条约牢固地确立了"俄日各方对朝鲜影响的划分"。对于上述令人发指地违反俄国在《莫斯科议定书》中所作的承诺的行为，日本的回答不仅是用外交公文，而且还扩大了自己的军备计划，可以认为，维特好象不知道这一情况。③ 事隔十年，维特仍然必须在《回忆录》中对朝鲜问题这一片断作出虚伪得滑稽可笑的解释。我们看到，他在那里所表露的是这样一种想法：和平征服朝鲜这一尝试的悲惨结局是俄国侵占旅顺口的直接
148 后果，因为这次侵占在日本激起了这样的愤懑，以致俄国为了避免战争，并使这次侵占得以顺利进行，就不得不牺牲自己在朝鲜的地

① 见《回忆录》，第1卷，第59—60页。

② 见同上，第117页。

③ 见同上，第59—60页。就"直接违反洛巴诺夫协定"问题进行的谈判，日方参加者是林董伯爵。见林董的备忘录，载于《外交部公报》，1913年，第5册，第336页。对于朝鲜事务中使日本不满的转折和军备计划的扩大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俄国外交部自己也曾予以指出。见《1895年以来关于朝鲜事务交涉的述评》，圣彼得堡1906年版，第5页。

位。[1] 看来维特在当时最少提到的问题是如何用国际法评价对于朝鲜的指望，这种指望在当时不用冒任何风险，并在未来的俄日冲突中向俄国提供了至为重要的利益。

但是，俄国在朝鲜没有任何经济方面的根基，只凭这一点，要维持俄国所得到的有利地位就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俄国在那里的商业利益根本是微不足道的，工业企业则是一无所有。在朝鲜经济势力方面的优势无疑是属于日本的，只是在最近才出现了寻求租让权的欧美资本的代表。在这种局势下，俄国政府必须避免采用排他的政策，并在当地的同盟者中寻求支持。[2] 而同时，在发展既得的政治成就方面的任何延缓都有可能使朝鲜政府疏远俄国，并将为他人对孤立无援的国王施加影响打开方便之门。最后，如果不想从最初就借助于某些基本投资（不管其直接的商业利益如何）来奉行自己的朝鲜政策，而想用别的办法，那末，这种想法本身就是荒诞不稽的。假如此刻在俄国外交界面前朝鲜问题是一个孤立的问题，上述种种设想也许就会决定俄国在朝鲜最近采 149
取的步骤。但是，朝鲜事件却有些抢先了（如果可以这样表述的话），它使俄国必须考虑到更为复杂的形势。

我们知道，俄国借款给朝鲜以偿还其欠日本的三百万元债款这一问题，是取决于"搞清国家的经济状况"的。但是借款问题在事实上却是迫不及待了，甚至早在朝鲜使团从莫斯科返回以前，它就在汉城显示了自己的全部政治意义：1896 年 6 月，法国人向朝鲜提出了贷款建议，又将此事瞒过了俄国公使。[3] 洛巴诺夫刚一收

① 见《回忆录》，第 1 卷，第 117—118 页。

② 见第 29 号卷，第 1 部分，(Б)，璞科第 1896 年 3 月 27 日发自上海的电报。璞科第在电报中告知，美国人取得了汉城至济物浦（即仁川——译者）的铁路租让权，并指出，鉴于日本人的经济势力占有优势，俄国是希望别国活动家取得成功的。

③ 见第 5 号卷，第 1 部分，韦贝 1896 年 6 月 19 日发自汉城的电报。电文告知：(1) 费务林公司向朝鲜政府"秘密"提出了数额为五百万的贷款建议；(2) 在汉城正在规划建立一家私人银行，为此，英国在上海的一家银行的一名职员已被招聘。

到这份报告，立即就敲起了警钟，他请维特“加速”派遣财政官员前往朝鲜，而对于朝鲜政府，暂且只劝告它“在俄国财政官员到达之前不要办理大规模的财政交涉，尤其是不要与英国资本家往来”。① 这样，当修筑北满铁路问题还远未顺利解决时，俄国就不得不在朝鲜采取决定性的行动了。而同时，璞科第这位当时在远东尽人皆知的维特和华俄道胜银行的经纪人被派往汉城，单是这一件事就使俄国最近要在朝鲜奉行的政策瞒不住人了。②

璞科第 1896 年 8 月从汉城接二连三发出的情报证明，必须
150 “立即”采取行动：(1)国王本人在和璞科第初次见面时就请求提供三百万的贷款，以还清日本的债务，并可不必再用日本的钱来安葬“被日本人杀害”的王妃，(2)在汉城已有关于开办一家朝鲜国立银行的传闻，并正等待(英国的)汇丰银行的代表前来“商议”。这就难怪璞科第担心英国人会以“可观的资本”向这家银行入股了。于是，他建议立即在汉城开设华俄道胜银行分行，并且提供贷款，照他的看法，这笔贷款可以在朝鲜的海关收入中取得“完全可靠的保障”。③

然而，尽管璞科第在 9、10 两月都发出了一系列催促性的报告，外交部也同样要求，让他能够“就我方可以很快提供的物质帮助在朝鲜作出某种肯定的表示”，维特却绝对禁止在“11 月以前”

---

① 见第 5 号卷，第 1 部分，洛巴诺夫 1896 年 6 月 22 日给维特的信。

② 1896 年 6 月 25 日发往北京给璞科第的电报——命令他以财政部代表的身份“刻不容缓”前往汉城(见第 5 号卷，第 1 部分)。而同时，在七月，如同前述，在拟订满洲干线的合同问题上北京还在进行阻难。见前引柯乐德 1896 年 7 月 3 日(5 日——应为 15 日，译者)给乌赫托姆斯基的信[见第 3 号卷，(B)]。信中说，必须用谈判破裂来威胁北京政府，迫使其同意接受铁路合同的条件。

③ 关于朝鲜政府与英国银行在上海进行谈判的消息早在 6 月份就在北京传开了。见第 5 号卷，第 1 部分，喀西尼和璞科第 6 月22日的电报。璞科第 8 月 2 日抵汉城，在此逗留到 11 月初。这里所指的是他 8 月 9 日、13 日、26 日和 27 日的电报（见同上）。

采取任何行动，而到11月，他也只是“原则上”同意了由华俄道胜银行提供贷款，“当这样做是适宜的时候”。同时，维特提出了这项贷款的一个必要条件，即把朝鲜的海关收入置于“俄国财政代表的直接监督之下”，他还要求外交部“竭尽全力，以便使朝鲜海关的行政管理转由将派往朝鲜的俄国财政代表掌握”。[①] 就这样，俄国对朝外交中从政治上考虑极其紧迫的一项步骤，亦即使朝鲜政府摆脱日本的财政控制，不仅被维特遥遥无期地耽搁了，而且还要以 151
从朝鲜驱逐英国势力作为条件，而诚如所知，英国势力只不过控制了海关的管理而已。

维特把贷款问题和在朝鲜开设一家俄国银行的问题冻结了起来，同时，他却想在这种状况中在朝鲜提出铁路问题。早在八十年代，鉴于朝鲜开放了外贸商埠，英国人和日本人曾经提过在朝鲜建筑铁路的问题，但此事当时却从日程上取消了，看来，其中不无俄国的影响。[②] 在宣布了朝鲜的独立以后，问题重又发生了，这一次看来会摆脱胶着状态，取得进展。上面已经提到，第一项铁路租让权（汉城到济物浦的铁路）是美国人在1896年春天得到的，而国王发布关于朝鲜铁路采用四英尺半的欧式窄轨的上谕（1896年7月3日），也并非没有受到他们的影响。在璞科第到汉城前，在中国赫赫有名的法国费务林公司的代表已到那里了，他们刚刚背着俄国向朝鲜提供了贷款，现在又提出了“从汉城往各个方向的”铁路租让权的建议，其中也包括往俄国边界的铁路，看来该公司还指

---

① 见第5号卷，第1部分，维特1896年9月3日发自雅尔塔给罗曼诺夫的电报，内称，在11月以前一切事情暂停进行；以及璞科第9月16日和10月30日的电报，拉姆斯多尔弗9月24日给财政部的信，维特11月2日给外交部的信。

② 见第29号卷，第1部分，(a)，《穆麟德将军关于朝鲜铁路的意见书》。穆麟德作为朝鲜政府的顾问，在八十年代奉行了亲俄政策。那时他提出报告说，必须把铁路建筑问题搁置起来。

望把汉城到义州的铁路转卖给俄国。[①] 但是，考虑到拟议中的铁路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俄国驻汉城代办没有支持法国的强求，法
152 国大使甚至以此为题在彼得堡同外交部进行了多次会谈，但毫无效果。[②] 然而，法国人还是取得了汉城到义州的铁路租让权。

就在这种情况下，维特提出，必须要求朝鲜政府取消 7 月 3 日关于窄轨的上谕，并且使朝鲜国王颁布了一道必须采用俄式轨道的上谕。[③] 但是，维特连想也没有想过立即着手在朝鲜建筑俄国铁路。举例说，我们知道的穆麟德建议用一家美国辛迪加的资金在半岛上建筑一个完整的铁路网，如果政府担保对所花资金给予五厘利息，这家公司就同意承建。维特对于他获悉的这一建议竟全然置若罔闻。[④] 1897 年初，颁布了一道上谕（不难猜到，它是根据俄国政府的意愿而颁布的），上谕宣布，朝鲜政府拒绝以租让权的方式建筑铁路，已经议决的当不在此例。[⑤] 后来，维特放弃了他对朝鲜事务的消极策略，并发现，美国租让者正在寻求机会出让自己的权利，汉城到济物浦的铁路工程打算铺设窄轨，而且买主是日本人，甚至在这时，维特仍然只是限于要求外交部"强烈抗议"把租让权转让给日本人，和违反关于使用俄式轨道的 11 月上谕的行

① 见璞科第 1896 年 8 月 26 日发自汉城的电报，电文告知了法国工程师格里勒对租让权的强求。并见璞科第 10 月 3 日的电报，电文说，必须取消 7 月 3 日的上谕，这道上谕是由于美国人的影响和我们代办的软弱谦让而颁布的。璞科第此次指责代办"不知为什么"支持美国在朝鲜扩大其影响。所引的电报均见第 29 号卷，第 1 部分，(a)。

② 见第 29 号卷，第 1 部分，(a)，外交副大臣希什金 1896 年 9 月 16 日给财政部的信。

③ 见同上，维特 10 月 10 日给希什金的信和希什金的回信。

④ 见同上，《穆麟德将军关于朝鲜铁路的意见书》。它是由驻中国的军事代表沃加克附在 1896 年 10 月 18 日（30 日）信中转给参谋总部军事学术委员会办公厅主任的。穆麟德建议俄国承当起这种担保，"甚至不惜以收入的一半"作为担保。他还指出：(1)"从政治观点看，美国人是最少危险的"，以及(2)俄国"应有可能毫无障碍地把军队运送到日本海边"。

⑤ 见第 11 号卷，(a)，阿列克谢耶夫 1898 年 1 月 8 日给维特的信。内称，朝鲜政府已经下令，关于禁止租让权的上谕无限期有效。

为，但他自己却“怕遭受损失，不敢参与此事”。① 153

看来，维特在为朝鲜借款所作的安排中，部分是出于财政方面考虑的。璞科第在1896年秋天对朝鲜的财政状况作了细致调查，得出了这样的结论：(1)朝鲜的财政管理组织本身是极其原始和糟糕透顶的，(2)朝鲜政府此刻幸而拥有大约五十万元的闲款，因而可以偿付日本债款的第一期款项，以及(3)有一个问题还没有搞清，即日本人是同意现在就接收这笔款项，还是遵照合同的精确含义，坚持分两次，在1898和1899年进行偿付。

由此从狭义的财政观点出发就得出了正确的结论：(1)把问题搁置到第一次偿付的法定期限；(2)在万不得已时，从容不迫地把事情引向由华俄道胜银行对1898年款项的偿付作出担保；(3)让朝鲜政府自己问明，日本是否可以提前偿付；以及(4)用这段时间来打下基础，以便把朝鲜的全部财政管理转移到俄国财政顾问的监督之下。完全依据这种观点，(1)璞科第的使命被认为已经完成，于是他就在1896年11月初离开了汉城；(2)他在启程前就刚刚指出的意思向国王和财政大臣呈递了一份禀帖，建议把问题推迟六个月，并表示，如有必要，同意提供贷款，但要用田赋和海关收入(亦即几乎国家的全部收入)作为担保；(3)他“在冠冕堂皇的借口下”没有把这份禀帖留给自己的谈话对方，然而他却从财政大臣 154
那里得到了一项表示同意在所述条件基础上接受俄国贷款的书面保证。② 结果是，莫斯科谈判已经过去了五个月，而除了口头的尚且是有条件的承诺以外，朝鲜政府没有从俄国得到任何东西，而且自己还得再过六个月才能处理问题。看来，维特对于这种策略上

① 见第29号卷，第1部分，(Б)：璞科第1897年6月23日发自北京的电报，维特7月1日给穆拉维约夫的信，璞科第7月23日建议购买美国公司全部股份的信（维特批道：“难以决定”），维特7月29日给穆拉维约夫的信，璞科第7月30日关于必须作出坚决回答的信（维特批道：“回答是：我怕遭受损失，不敢参与此事”）。

② 见第5号卷，第1部分，璞科第1896年11月4日发自汉城的报告。

迟缓的政治后果是全然不加考虑的，他已经完全被“怕遭受损失”的心理所支配了。

1897 年 1 月，当邮班终于把关于汉城谈判业已结束的详细报告和上述朝鲜政府的保证书送到外交部时，外交部照例把此事告诉了维特，顺便也就派遣一名财政官员的问题作了提示，而维特却脱口而出说：“谁来负担我们代表的费用，这一点哪里也没有说到，虽然我说过，由朝鲜负担费用”。① 维特在给穆拉维约夫的回信中，主要是大事渲染朝鲜财政管理和经济的恶劣状况，他还声称，“在确定（出任财政顾问）人选和贷款问题的进一步发展以前”，他请求命令俄国驻汉城的外交代表说服国王，使他对俄国财政代表给予一切可能的协助。② 这样，穆拉维约夫就明白了，维特是在把朝鲜问题拖延下去，使他困惑不解的是，为了实现预定的规划，维特到底要干些什么。③

与此同时，1897 年 2 月 8 日（20 日），朝鲜国王离开了俄国使馆，返回宫殿。不久就表明，朝鲜宫廷中的俄国势力经受不了这一
155 考验。在这一方面起决定作用的事情是，日本把 5 月 28 日《莫斯科议定书》连同秘密条款一起告诉了朝鲜政府。这样，在朝鲜政府心目中，俄国规避履行在《对朝鲜大使的几点答复》中所作的承诺这件事，就得到了令人苦恼的解释，即俄国背着朝鲜和日本签订了俄日共管朝鲜的协定。④ 英国人也在日本人之后采取了自己的措施。海关总税务司柏卓安从一开始就把不许俄国提供贷款作为自己的任务，如今他已经说服了朝鲜政府用朝鲜国库的资金来偿付日本的债款。在俄国规定的六个月期限届满前夕，朝鲜向日本银行偿

① 见第 5 号卷，第 1 部分，维特在穆拉维约夫 1897 年 1 月 30 日信上的批语。

② 见同上，维特 1897 年 2 月 12 日给穆拉维约夫的信。

③ 见同上，穆拉维约夫同年 3 月 8 日的信。

④ 见同上，璞科第 3 月 8 日发自北京的电报。根据他的情报，“朝鲜国王离开我们使馆后，我们的地位不如从前了”。

付了一百万元，不久又查明，在 1897 年秋天之前，用同样方法还可以再付一百万元。[①] 国王对俄国承诺的可靠性失望已极，以致在是年 5 月他同时向法国和德国求援，其中可能向法国人提出了派遣登陆队和常驻的百人工兵部队前往济物浦的请求。[②]

当维特终于摆脱了无所作为的状态，并于 1897 年 5 月 9 日向沙皇呈递了一份关于指派一名财政代表前往朝鲜的奏折时，要使这位代表占据朝鲜政府财政事务顾问的地位，要做到这一步已经远不是轻而易举的了。不仅维特本人为了避免列强代表的抗议和倾轧，已经不再为他要求这个正式的称号，只是忙于在朝鲜国王 156
本人那里为他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而且连穆拉维约夫也认为，朝鲜局势的“变化”是如此“之大”，以致“难于对下列问题作出某种结论：朝鲜政府方面是否接受我们的愿望，是否同意让商务代表充当顾问，以及由此决定的他的正式地位如何”。[③] 局势不仅已经不同于“这个问题发生时的去年”，而且和两个月前相比也发生了变化。先前，在北京的璞科第早在 2 月就察觉到了，必须使朝鲜对于俄国的财政帮助具有坚定的信心，而穆拉维约夫在 3 月初就曾告诫维特，要他懂得把对朝鲜财政的控制权及时抓到自己手中的全部政治意义，要他放弃对于此事的狭隘的商业观点，并且不再拖延财政顾问的派遣。[④]

---

① 见第 7 号卷，第 1 部分，璞科第 1897 年 4 月 9 日（21 日）给罗特什捷英的信。内称：“朝鲜事态发生了显著变化”，“朝鲜政府改变了对俄国贷款的看法”，又说，已经拨出一百万元用来偿付日本债务。关于即将偿付第二个一百万元的问题，见第 5 号卷，第 1 部分，璞科第 1897 年 5 月 22 日给财政部的电报。

② 见第 11 号卷，(a)，俄国驻朝鲜财政代表阿列克谢耶夫1898年2月6日的报告。

③ 见同上，维特 1897 年 5 月 9 日关于指派阿列克谢耶夫为驻朝鲜的商务代表的奏折，维特 1897 年 5 月 19 日给穆拉维约夫的信以及穆拉维约夫同年 6 月 3 日给维特的信。

④ 见第 5 号卷，第 1 部分，璞科第 1897 年 2 月 2 日和 17 日发自北京的电报。内称：必须答应向朝鲜提供贷款，以便使它能就先期偿付问题和日本开始谈判；以及穆拉维约夫同年 3 月 8 日的信。

但是，正是最后这个关于顾问的问题，维特又拖了整整两个月未作决定。当他自己认为需要时，他才去促使问题的解决，但对于自己那位同僚的告诫却毫不理睬。① 然而，维特对于自己在北京的那位代表的建议却给予充分注意，并且命令"在罗特什捷英(从国外)回来以后立即解决"向朝鲜提供贷款的问题。② 如果维特这时是出于这样一种想法，即认为没有罗特什捷英便不能解决贷款问题(因为契约是应当和华俄道胜银行订立的)，那末他又打错主意了。原来罗特什捷英宁可把自己的银行搁在一边另设一个机构，
157 在此情况下实际上由国库给予贷款。这一机构是这样的：成立一家特别的俄朝银行，华俄道胜银行投放总数为十万卢布的合股资金，其条件是：俄国政府有权在五年之内赎购百分之五十一的股票，而年息六厘的朝鲜借款所必需的三百万卢布由中东铁路公司从闲款中支出，作为无限期的存款存入银行，年息二厘。这样的机构当然不能使维特感到满意，而罗特什捷英"虽然完全准备迁就(他)"，却不能"忽视华俄道胜银行股东们的利益，因为他(曾)相信，由于俄朝两国之间几乎完全没有贸易往来，俄朝银行头几年的业务将是最微不足道的"，而且令人担心的是，整个事业会停滞不前。③ 于是罗曼诺夫试图劝导维特同意罗特什捷英的建议。他当时是财政部的办公厅主任。作为维特最亲近的助手，他从一开始就熟悉财政部在远东的种种勾当。他是中东铁路公司和华俄道胜银行两个董事会的成员，看来，他对继续拖延的全部责任是很清楚的。他在3月8日的信中以这样的政治观点提出问题：

"我确信，朝鲜对于我们具有头等的重要性。北满对我们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能提供一条通向辽东或朝鲜的道路。

① 在财政部的档案卷中没有维特对穆拉维约夫3月8日来信的复信。

② 在璞科第2月17日电报上的批示。

③ 见第13号卷，罗曼诺夫亲手拟订的银行章程原则的草稿，以及他1897年3月8日和3月27日给财政大臣的报告。

但是中国人在近期内未必允许我们修筑一条铁路到辽东半岛的一个港口，因为他们懂得，这样做就会把北京完全交到我们手里。反之，他们大概不会十分反对修筑一条从伯都讷经吉 158
林通向朝鲜某个港口的铁路，因为这就使他们有了不让日本人侵占朝鲜的保障。但是，我们要朝鲜对此表示认可，首先就应当取得对它财政事务的影响，在这一方面即使要作出财政上的牺牲也在所不惜，因为不久的将来它将使我们得到百倍的补偿”。罗曼诺夫又补充说：“关于俄朝银行的问题无论如何需要尽快加以解决（在肯定的意义上或是在否定的意义上）”。

我们看到，罗曼诺夫建议维特：(1)抛却控制着他的“怕遭受损失”的心理状态，(2)由于北满问题的解决出现了获得一个不冻港的两种方案(辽东的港口和朝鲜的港口)，罗曼诺夫赞成选择后者。其时，没有银行这一必不可少的政治附属物，在远东的任何进攻性政策的可能性在俄国财政部里都是不可思议的。而放弃朝鲜银行也就意味着放弃朝鲜政策，赞成辽东政策。但当时维特哪里有什么实际资料有助于他拒绝罗特什捷英的条件而采取辽东政策呢？于是，维特当天就接受了这些条件。① 不过，如果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认为维特此刻已经完全接受了罗曼诺夫报告中关于远东进攻性政策未来发展问题的提法，亦即要末是朝鲜，要末是南满，而不同时在两个方面采取行动；如果认为因而现在要做的事情只是通过俄朝银行的章程，并赶紧派遣一名顾问前往朝鲜，然后就开始在北京为经伯都讷和吉林、“至朝鲜某个港口（正是哪个呢？）”的铁 159
路进行张罗，那是毫无根据的。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向朝鲜派一名顾问这件事之所以直至那时拖延不决，是因为关于银行和债款的问题没有解决，而这一问

① 见第13号卷，维特在3月8日报告上就这一意思所作的批语。

题从原则上一经解决，将会导致在顾问问题上采取某种实际步骤。上面已经说过，两个月过后，直到是年5月9日，维特才建议派遣阿列克谢耶夫这位俄国海关的要员前往汉城，以便"巩固在朝鲜海关中的俄国势力"。①

"俄国商务代表"的行前准备又拖了一个多月，阿列克谢耶夫是在6月底启程的。他打算在伦敦和上海稍事逗留，于8月底前到达预定地点。他所得到的指令是：审慎从事，从容不迫，完全弄清该国的财政管理和经济生活状况，探明在何种条件下方能创设俄朝的信贷机关，达到使朝鲜政府和俄国电报网建立关系的目的，最终目的是"力求在将来使海关的管理完全转入俄国手中"。② 其实，在阿列克谢耶夫行前人们就已经知道，俄国在朝鲜的前景并不是那样没有希望的，不管怎样，国王本人"对于财政部的代表是赞同的"。③ 但是，谁也没有料到，随着俄国代表于1897年9月抵达汉城，事情会象实际上所发生的那样如此迅速和急遽地转变得有
160 利于俄国。朝鲜的事件当时又有些抢先了，它使俄国外交界必须考虑到更为复杂的局势。只是这一回刹车从维特手中转到了穆拉维约夫手里，他不顾维特的固执坚持，使对朝鲜的图谋又一次半途停车。朝鲜问题两回都和俄国的满洲政策紧密相关，正因为这样，在转到继续考察俄国在满洲的活动之前，必须先谈谈俄朝关系中的若干情节。

III

假设有一个和我们描述的事件同一时代的人，他细心注视俄

① 维特在5月9日的奏折中对自己的选择正是这样解释的：在朝鲜必须有一位通晓"海关"的人员。

② 对商务代表的指令的副本保存于第11号卷(a)，所署的日期是6月10日。

③ 见第11号卷，(a)：韦贝1897年6月5日发自汉城给外交部的电报。韦贝表述了一种设想：阿列克谢耶夫应当从整顿王宫管理的财政事务着手。

国在朝鲜势力的增长的最小迹象，并在 1897 年初拥有《喀西尼条约》和《中东铁路公司章程》这两个文件，那他也未必会预言，中东铁路将沿着经齐齐哈尔、哈尔滨、尼科尔斯克—乌苏里斯克这条直线通过，更不要说他会相信，当时俄国的满洲计划仅限于此。由于 12 月 4 日的章程中根本没有指明所允准的铁路的方向，因此，在《喀西尼条约》中所确切叙述的它的方向就是最权威的了：这一方向使铁路弯到吉林，指望将铁路往南延伸到山海关（《条约》的后面各款已清楚表明了这一点），并使铁路在与俄国边界邻接的珲春如此靠近朝鲜边界，以致使《条约》不仅成了 12 月 4 日的章程的注释，而且成了朝鲜国王 11 月关于使用俄式铁轨的上谕的诠释。因此，如果同时代的观察者预料说，俄国很快就将在两个方向采取更进一步的行动，那完全不是他的胡思乱想。

关于中东铁路租让权谈判所签订的合同并未解决与建筑工程有关的一切问题，其中包括铁路的方向问题。单凭这一点，现在就 161
无从考虑开工问题。根据事先的勘察拟定了两个方向：北线经齐齐哈尔、呼兰城，南线经伯都讷、吉林、宁古塔。第一条线路要短得多。而且如同后来所查明的，将遇到的实际困难也要少些。可是第二条线路离盛京省的一些大都市较近，并且把经济上较为有利的地区包括在铁路区域之中了。① 在进行正式勘测以前，必须在北京就铁路方向这一基本问题进行专门谈判，而且还有别的有关北满铁路建筑的问题同样有待谈判解决。对此维特是不打算撒手不管的。他采取了措施，使行将举行的谈判与答应给李鸿章的三百万卢布中第一个一百万的交付联系起来，以便在最为有利的局势中解决这些问题。在 8 月 27 日的合同签订以后，维特当时毫不犹豫地推迟了这次付款，这正是因为“在这几个月里我们将在原处无

① 见中东铁路公司董事会办公厅出版的史纲：《中东铁路》，第 1 卷（1896—1905 年），圣彼得堡 1914 年版，第 49—50 页。

所事事，就是说（中国人）是不能妨碍我们的”，何况“不经深思熟虑草率行事可能白费金钱”。乌赫托姆斯基当时所建议的中国之行只是专为与李鸿章清帐的，维特在推迟此行时已经有所打算，指望稍待时日此行“可能取得外加的意义”。① 乌赫托姆斯基的中国之行确在1897年春实现了，并且果真取得了“外加的意义”。只是直到不久前它还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而维特不仅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对此事守口如瓶，而且作了关照，以便在我们知道的格林斯
162 基的《日俄战争的序幕》一书中也不提及此事。②

1896年12月27日，中东铁路公司董事会成立了。而董事会的首次会议就讨论了在北京首先必须弄清的那些问题。会议是在1897年1月22日举行的，正是这一天，关于乌赫托姆斯基之行可以认为作了最终决定。这次会议是秘密的。③ 载入会议记录第二点的内容有如下述：

“二、然后，克尔别兹建议会议对下述问题表示意见：中东铁路公司是否应当现在就与中国政府谈判，以获得允许建筑一条从上述铁路到黄海某港的宽轨铁路支线。在此，克尔别兹的观点是，为着公司的利益，尽快建成所述支线是极为可取的，他认为，假如中国方面对支线使用宽轨大加阻挠，在万不得已时可以同意以窄轨建筑该支线。根据克尔别兹的意见，上述支线使用窄轨也不会有什么大的不便之处，因为支线一旦获准，无论路基及各种建筑工程，公司都可照宽轨的标准
163 来进行配置，在此条件下，一旦必需，该支线便可在几天之内

① 见第51号卷，第1部分，维特1896年9月3日从雅尔塔发给乌赫托姆斯基的电报。

② 我在关于《李鸿章基金》的学术著作中曾就乌赫托姆斯基之行阐述了若干看法，见于《阶级斗争》杂志，1924年第1、2期合刊，第109页。

③ 见第7号卷，第1部分，1897年1月22日的《中东铁路公司董事会特别会议记录》。会议由会办克尔别兹主持，出席会议的有董事罗曼诺夫、乌赫托姆斯基公爵、齐格列尔和阿列克谢耶夫、总工程师尤戈维奇及其助手伊格纳齐乌斯。

由窄轨改为宽轨。出席会议的其他工程师也完全同意他的看法。根据克尔别兹的意见，无论如何，应当立即就该问题与中国政府开始谈判，并为此而利用乌赫托姆斯基公爵的北京之行，因为乘李鸿章和皇太后还活着，公司是可以指望从他们方面得到帮助的。因此，并鉴于上述二人已是暮年高龄，把这一问题再搁置若干年便是不审慎的，因为情势可能发生不利于公司的变化。

"伊格纳齐乌斯赞同克尔别兹的上述想法，同时，他补充说，由于现在俄国的名声在东方，特别是在中国享有巨大的威望，目前正是在所研究的事情中取得成就的大好时机。同时应当担心，由于我们政敌的努力，这种威望将来可能减弱，而那时要取得所述的成就，就会困难得多。

"对于上述问题，罗曼诺夫说，关于敷设一条从中东铁路到黄海某个港口的支线问题，已经有一段历史了。去年5月于莫斯科举行会谈时，在财政大臣与李鸿章之间就提起了关于敷设上述支线的问题，而且李鸿章同意建筑这条支线，但须用窄轨。由于财政大臣对此予以坚决拒绝，并认为必须无条件地使该支线与干线具有同样的轨道，这场谈判才没有导致 164
任何结果。有鉴于此，根据罗曼诺夫的意见，现在提出以窄轨建筑上述支线的问题未必合适，这是中国政府原先自己请求过的，并为财政大臣所断然拒绝了的。齐格列尔也同意罗曼诺夫的这一意见。这一做法之所以不可取，是因为在与中国人谈判时应当抱定一种坚定的政策，通过这种途径总是可以较快地达到预期的成功。同时应当注意到，最近朝鲜政府给予法国公司和美国公司的、建筑从汉城到鸭绿江和从汉城到济物浦这两条窄轨铁路的租让权，由于俄国政府的坚持要求，已经作了一点改变，即上述铁路应当使用俄式铁轨进行建筑。

因此，从俄国政府方面同意俄国公司在东方敷设窄轨铁路乃是不合逻辑的事，因为正是根据俄国政府的坚持要求，外国公司也不得不在东方建筑宽轨铁路。

“根据罗曼诺夫的意见，在这种情况下，假如认为提起关于建筑连接中东铁路与黄海的铁路支线的问题是必要的，那就应当进行关于宽轨——而不是窄轨——铁路的谈判。但是，罗曼诺夫自己的看法是，他不认为特别必需立即解决这一问题。反之，照他的意见，似乎有理由担心，目前，当着我们在远东的竞争者由于中东铁路公司成立的消息所产生的激动不安
165 的心情尚未完全平息时，一旦提出这一问题，就只能使公司本来已经过于困难的使命复杂化，从而危害公司企业的成功。至于说到会上表示的担心，即恐怕以后要使中国政府同意我们敷设所希望的支线将困难得多，那末，在这一方面，罗曼诺夫不仅不赞同这种担心，反之他确信，将来当我们建成满洲铁路的时候，我们要取得上述同意，较之目前条件下将无可比拟地容易。

“会议虽然承认，尽快实现从中东铁路到黄海某个港口的铁路支线是极为可取的事，然而，考虑到罗曼诺夫阐述的意见，会议认为，现在提起这一问题，无论从中国政府方面，还是列强代表方面（这是主要的），都可能引起颇大的困难，而这本身可能使公司本来已经困难的使命大大复杂化。有鉴于此，会议得出这样的结论：假如确有把握，与中国政府就此问题的谈判将导致预期的结果，或者假如中国政府在与公司开始谈判后自己提起这一问题，只有在上述情况下，公司才应当在这一方面积极活动。同时，齐格列尔认为，即使公司现在就取得了建筑上述支线的租让权，那末，支线的建筑也不应当与干线同时开始，因为在起初这会使公司的负担过于繁重，他还认

为，在这一方面，即在开工的期限方面，不向中国政府承担任何义务来束缚自己是较为审慎的。其他与会者也赞同他的意 166
见。既要为将来获得预期的成功打下基础，又不要引起任何政治误会，公司现在应采取一些什么措施呢？在进一步讨论这一问题时，会议研究了克尔别兹的下述提议：是否可以向中国政府谋求一项租让权，建筑一条从干线到奉天附近煤矿产地的支线。一方面，会议注意到，建筑所述支线的必要性完全可以用满足中东铁路对煤炭的需要来加以解释，而另一方面，一旦该支线得以建成，将其继续延伸直到黄海某个港口的必要性自然就显而易见了，无论如何，批准该支线的延伸将遇到的困难会要少些。会议于是得出结论：在目前条件下，提出允许公司建筑一条从中东铁路到盛京省煤矿产地的宽轨支线问题是最正确和最审慎的，至于该支线的终点，将在以后根据必要的勘查更准确地测出上述煤矿的地理位置后作出规定。

“同时，会议根据尤戈维奇的意见，认为从中国政府得到对下述问题的某种担保是极为可取的事，即如果中国政府某个时候同意把从中东铁路到黄海某个港口的铁路变成事实，那末，公司将享有建筑该铁路的优先权”。

我们看到，在任何别的行动之前，对于“通向黄海的一条支线” 167
的要求，就由于铁路本身的逻辑性而产生了，它并不依赖于维特方面的任何授意（而如果不是，那末这就更使人感兴趣了！），却与维特早在春天同李鸿章谈判时所表述的那种形式如出一辙：这条支线的终点尚待进一步确定，因为它是通向朝鲜或南满的某个港口，这一点暂且无关紧要。这一主张正是以这种模棱两可的形式不仅没有在官员们的会上遭到反对，而且博得了全体与会者无一例外的赞同。

只是在哪种途径对建成这条支线较为容易和切实可行的问题

上，暴露了意见分歧。其中，讲求实际的工程师们似乎清楚地了解这一主张的政治意义，他们懂得，如果放过了系于一位要人①的千钧一发、千载难逢的良机（而又要避免直接的武力攫取），那末从国际角度看来，这一主张就是没有希望的。而官僚政客们一方面对于当前国际关系中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和在此问题上所花精力的增长估计不足，另一方面，又认为无法应付此刻的困难，他们似乎指望，在自己积聚力量的同时，所有别的人都是目光短浅的，可以在国际局势中把一切都冻结起来。

第二种观点仿佛是代表财政大臣本人作出的声明，因而会议不得不迁就了这种看法，然而，会议也考虑到了此事完全成功的可能性。无论如何，全体与会者认为，即便在将来，也必须谋求取得成功的实际保障，并认为，中国政府现在就批准通往南满到奉天的一条支线便是这种保障。按照这种提法，关于通向“黄海某个港口”的支线的主张，依旧没有预先确定支线终点的位置问题，因为从奉天不仅可将支线通往朝鲜港口，还可通往满洲港口。无怪乎在 1897 年 3 月，由于俄朝银行问题而谈到“黄海某个港口”这一概
168 念的确切含义时，通向朝鲜某个港口的铁路不称作经由奉天的弯路，而称作经由吉林的直路。② 由此看来，作为中东铁路股份公司股东的俄国政府在最近时期内的最低纲领正是要求渗透到南满的心脏。

但这绝不意味着，作为俄国政府经常的正式代表的外交部此刻的计划也是这样。如果根据下述情况来判断，就不得不怀疑简直是一种相反的情形。维特认为，最好将乌赫托姆斯基使团的真实目的瞒着外交大臣，例如，他在将沙皇随后关于乌赫托姆斯基的北京之行所作的命令告诉穆拉维约夫时，仅仅指出了次要的目

① 指李鸿章。——译者

② 见本书边码第 157 页，罗曼诺夫 3 月 8 日的信。

的：向清帝转交沙皇的礼物，并弄清关于在满洲使用的钱币问题和保障铁路的燃料问题。[①] 在这种情况下，在宫殿广场[②]的人们也就不怀疑，就在那幢房子里正对满洲策划着什么图谋，只是这种图谋是来自莫伊卡的。人们天真地把满不在乎的无所事事当作平静无事，徒劳地向财政部就朝鲜问题提出告诫。[③]

然而，财政部完全不顾穆拉维约夫的再三要求，直到3月初，当罗特什捷英从国外回来以后，才研究了朝鲜问题。甚至乌赫托姆斯基应在北京进行谈判的那些问题如何提法，也是到1897年3月14日才呈请尼古拉二世批准，看来，此事也在等着罗特什捷英。正如上面所说，罗特什捷英在朝鲜问题上采取了较为克制的立场。他认为，俄国政府在朝鲜所处的政治局势是复杂的，华俄道胜银行或多或少地正式介入这种政治关系是无利可图的：在从中东铁路 169
资金（其实亦即从国家金库基金）中贷款给朝鲜政府时，正是俄朝银行，而不是华俄道胜银行应成为这种贷款的主要工具。看来，取得黄海的一个朝鲜港口的方针至此已经确定，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中东铁路资本向朝鲜银行投放是正确的。[④] 我们没有直接的根据足以说明罗特什捷英曾参与了讨论给乌赫托姆斯基的指令。但是使得我们产生这一想法的不仅是指令获准的日期，而且还有这样一个事实，即在1月应当就地弄清的问题直拖到他回来后才予讨论。[⑤]

对乌赫托姆斯基的指令包括下列八点：(1)谋求中国人对满洲

---

① 见第7号卷，第1部分，维特1897年1月29日给穆拉维约夫的信。

② 帝俄外交部所在地。——译者

③ 见本书前面，穆拉维约夫1897年3月8日给维特的信。

④ 罗曼诺夫在自己3月8日的报告中，正是以此证明中东铁路这样入股加入俄朝银行是正确的。他建议为此相应增加当时拟议中的中东铁路第一笔债券借款的总额。

⑤ 例如，在1月22日会议上讨论了这样的问题：关于在满洲结帐时应使用何种钱币以及关于第二位北京董事的问题。

干线南线的认可;(2)搞清中国对于敷设一条俄国铁路把中东铁路与中国拟议中的铁路(从天津经山海关往锦州)衔接起来的问题持何种态度,以及中国是否同意敷设一条从干线到朝鲜某个港口的铁路;(3)使中国人保证信守8月27日合同第四款;(4)要求使铁路总工程师的官阶与满洲三位将军相并列,并授予他与将军们直接交涉的权利;(5)允许将钱币从中国内地输入满洲;(6)使华俄道胜银行取得铸造银币的权利,这种银币务必无条件地在满洲范围内
170 的各种支付中通用;(7)同样为银行取得发行纸币的权利;(8)批准在铁路沿线各地设立银行的代理机构。①

在1月22日的会议上,作为中东铁路股份公司一家股东的俄国政府的最低纲领就以上述形式最终确定下来了。这一纲领不仅产生了确立华俄道胜银行在满洲的统治地位的那些要求,而且由于其中化整为零地隐藏了两种意图而明显地得到了好处。这就是对朝鲜的意图和对南满的意图,并且没有任何两者取其一的迹象。但是,在这里所讲的已经不仅是关于取得一个不冻港作为铁路出海口的问题,而且是不在奉天停歇直往中国京城的问题了。在维特的这种转变中并不排除也有罗特什捷英的参与,因为过后华俄道胜银行并没有反对承筑这条南满支线。②指令的拟定者既然决定经过朝鲜出海,他自然就放弃了经过辽东的出海口,但是,我们看到,这与放弃南满以及以朝鲜换取南满毫无共同之处。最近,正是在财政部里这样一种看法占了上风:趁着李鸿章和皇太后还活着,在他们身上下赌注是合算的,而对于由于俄国这种巨

① 见第7号卷,第1部分,《通过乌赫托姆斯基公爵和齐格列尔工程师应在北京搞清的问题清单》,上有维特3月14日关于"皇上照准"的批注。现存有此件经过核对的副本。

② 见第13号卷,事情发生在德国军舰开进胶州湾后的最初日子里。罗特什捷英在得知似乎中国政府意欲动工建筑南满铁路的消息后,就在1897年11月5日(17日)电告璞科第说,如果现在所说的是将铁路从山海关延伸到奉天,则他请璞科第去试一试,能否保证由华俄道胜银行承筑此路。

大的领土企求可能产生的国际后果的担心，则被抛在一边了。

然而，这一扩展了的计划使那一百万卢布经受不住自己的重负，乌赫托姆斯基使团几乎以彻底失败而告终。开头一切进行得 171
都再好不过了。到处都为乌赫托姆斯基准备了“空前的、隆重的、真挚的”欢迎仪式。“由于采取了各种预防措施”，经过中介人十分顺利地“在上海交付了”那一百万元。“老头子（即李鸿章）是等得疲惫不堪了”，“实在不能再继续拖延履行（诺言）了”。起先，乌赫托姆斯基觉得，“随着款子的交付，通过我们的老头子与上海之间的函电往来，进行谈判的基础业已准备成熟”，从老头子所在的北京传来了“种种最好的消息”。① 但是，私人的财务手续一经结束，在北京唱的调子也就变了。乌赫托姆斯基与总理衙门初次会晤时，关于干线的南线问题就碰了钉子，正是李鸿章形象地说明道：“我们让你们进入院里，你们却想闯进我们家小住的内宅”。最终的回答还得待以时日。②

乌赫托姆斯基没有办完这件事，在下一次又谈起了关于干线与山海关铁路相衔接的问题，并以此引起了申斥李鸿章“效忠于俄国利益”的群情激昂的责难，以致乌赫托姆斯基（他通常对于中国事务抱有一种想象得过于美妙的乐观主义）立即认为，“局限于取得一项不向任何人提供这段连接线路的担保”是明智的事。③ 彼得堡没有表示反对，但仍然希望能赢得一条通向某个朝鲜港口的铁路，可是关于这条朝鲜铁路，总理衙门“连听也不想听”。④ 彼得堡认为，关于这条铁路的问题较之连接山海关的铁路更为重要，而且

---

① 见第51号卷，第1部分，乌赫托姆斯基1897年5月3日(15日)发自上海的电报。

② 见第7号卷，第1部分，璞科第1897年5月27日发自北京的电报。

③ 见同上，乌赫托姆斯基1897年6月4日的电报。

④ 见同上，罗曼诺夫6月6日的电报，其中问道，关于通往某个朝鲜港口的支线问题为什么尚未从中国方面得到答复，并命令“再提这个问题”。

容易符合中国的利益，但结果是，“看来，中国人认为”恰恰“这一方案是完全不能实现的，并且可以看出，仅仅暗示可能借助我方的
172 协助来实现这一计划，就对王公大臣们产生了抑郁不欢的印象”。① 在6月7日那次决定性的结束会上，这两个问题被彻底埋葬了。就是关于其他问题，其中包括南线的问题，乌赫托姆斯基也只是得到了口头保证，部分是认可的，部分是有条件的，往后也丝毫没有对这些口头保证加以充实。②

不出所料，这一向北满范围以外的没有成功的外交出击不是没有留下阴影的，它给俄中两国在满洲问题上的未来关系带来了无法弥补的纠葛。早在1月22日，当中东铁路公司董事会开会讨论两条南行支线时，就已经预见到可能产生这些纠葛，然后，俄国驻北京代办也劝乌赫托姆斯基说：“现在，当中国人对我们的满洲计划的不信任感和猜疑感还远未消除，尤其是当外国人正在鼓动这些感觉的时候”，提出“关于将我们的铁路网扩展到北直隶湾沿岸”的问题，“就容易对将来顺利地解决这一问题造成危险”。③ 有一个迹象说明，在最后时刻，在这些劝导的影响之下，乌赫托姆斯基动摇了，于是将代办的意见电告了维特，可是他却得到了维特的指示：“无论如何”遵循指令的准确含义行事。④ 由于最后中国人声明，一般地说，他们不打算把自己的南线筑往锦州
173 以北，他们无论如何不将这项租让权给予任何一个外国人，于是在更为有利的时候到来之前，俄国方面对此也就感到放心了。⑤ 然而，乌赫托姆斯基刚刚启程回国，李鸿章就上了一道奏折，提议以

① 见第7号卷，第1部分，璞科第同年6月8日的报告。关于南线问题，中国方面表示同意命令两省将军在修筑南线时向建筑者提供协助。

② 见上述璞科第1897年6月8日的报告。

③ 见第7号卷，第1部分，穆拉维约夫1897年8月18日给维特的信。

④ 见同上，第253号，穆拉维约夫1897年8月18日给维特的信，并见第10号卷，第1部分，驻北京代办8月10日的报告。

⑤ 见同上，前引璞科第6月8日的报告。

国库资金动工兴建山海关到吉林的铁路。他7月19日的奏折为清帝的一道密旨所认可，而胡燏棻被任命为这条未来铁路的督办。胡燏棻是以"汇丰银行的支持者"著称的，①"无疑受到英国工程师金达的影响"，而金达在中国从事铁路建筑已有十五年多了。②

关于所发生的这件事的含义不可能有两种看法：中国人急于把英国人引入南满，以对抗企图侵夺南满的俄国。彼得堡的印象是如此，俄国驻北京的代表们对于此事也是这样理解的，并且二者都完全没有料到，事情会发生这种转折。穆拉维约夫直截了当地向维特指出，"乌赫托姆斯基不谨慎地、不合时宜地提出了关于向我们提供建筑上述两条连接支线的权利问题"，所有过错都在这里，他认为"英国资本参与修筑满洲铁路事务是极其危险的事"，于是致电北京，要求"阻止将此事交给胡燏棻承办"。③这样在两位大臣之间就发生了并非乏味的通信。对于穆拉维约夫的指责，维特以眼还眼地回答说：问题不在于反对这个中国人，而在于，"要末根本不修南满铁路，要末……除了中东铁路公司外，这些铁路的建筑不交给任何人经办"。

穆拉维约夫责备维特过早地、无缘无故提前了两年来挑动中 174
国与英国接近以对抗俄国，对此，维特实际上是企图借助于十分笨拙的支吾搪塞来加以反驳：(1)"如果认为中国人对我们的满洲计划产生不信任感和猜疑感，与向我们提供敷设一条通往北直隶湾的铁路的权利这一问题的提出有关，那就必须承认，早在去年（即1896年）5月，中国人对我们的信任就应发生动摇了"；(2)由于乌赫托姆斯基"在和中国政府的所有谈判中只是作为华俄道胜银行和中东路铁公司的私人商业利益的一名普通代表"，"乌赫托姆斯

① 见第10号卷，第1部分，维特8月11日给穆拉维约夫的信和驻北京代办8月10日的报告。

② 见第7号卷，第1部分，穆拉维约夫8月18日给维特的信。

③ 见上引穆拉维约夫8月18日给维特的信，着重体是我用的。

基使团完全不带政治性质，因而也就不可能引起中国政府的担心"；以及(3)乌赫托姆斯基"在谈判中是遵循给他的提纲的，在其动身去中国之前"，维特"曾将提纲恭呈"沙皇"御览"，并为后者所赞许。

同时，维特并不否认，"最近，在我们的对华关系中发生了一种变化，下述情况可以作为这种变化的最好证据：关于将中东铁路公司的铁路网向北直隶湾方向扩展这一问题的提出本身，现已成了不谨慎的和不合时宜的事"，其实在 1896 年 5 月，中国自己就曾同意建筑一条窄轨的南满铁路。但是，维特却把"我们在北京政治影响的削弱"的过失，归咎于"我们驻北京的外交使团没有公使已有一年左右了"这一点。① 由于维特援引了"皇上旨意"作为自卫的最后论据，② 穆拉维约夫就根本不能再对上述外交失策作进一步的批评了。但是，他作为对外政策的正式指导者，事前不仅不知道正
175 在采取的事关重大的决定，而且也不知道正在进行的冒险步骤，这样，他的地位愈是不合情理，他也就愈有理由抗议维特在对外事务中的幕后干涉和他推行的双重外交。

穆拉维约夫在自己的复信中向维特指出：(1)如果乌赫托姆斯基遵奉的指令是沙皇批准的，那末，他因此也就不是"私人商业利益的一名普通代表"了；(2) 指令提出的两个铁路问题实际上使指令成了"政治纲领"；以及(3)以"李鸿章的所作所为"作为我们在中国影响的尺度，这"未必是正确的"，因为他"尤其是在某些物质利益的影响下可以向我们许下最郑重和广泛的诺言"，而"回到北京后，由于自己的职位，他处于完全不同的条件之中，这位大臣就可能轻易否认所许下的诺言"。③ 在这里不仅明显地责难维特政治上

① 见第 7 号卷，第 1 部分，维特 1897 年 8 月 20 日的信。

② 原文为 ultima ratio。——译者

③ 见第 10 号卷，第 1 部分，穆拉维约夫 1897 年 8 月 23 日的信。

轻率和外交上轻信，并且揭露了所发生的事情：维特企图在沙皇个人威望的庇护下，并且表面上是为了私人企业家的垄断利益，而开始一项自己的外交赌博。

与此同时，俄国代表们在北京赶忙采取了变通措施，以排除通向北直隶湾的俄国道路上英国势力的加强所造成的直接危险：俄国代办声明，坚决抗议让英国人参加建筑山海关以北的铁路，由于与李鸿章和胡燏棻进行了坚持不懈的会谈，结果问题就归结为由华俄道胜银行为建筑铁路提供一笔不大的债款（但不以铁路作抵押品），并且中方不再向英国银行借款。① 维特同意这项贷款，但同时认为，这种解决问题的办法"是临时性的"，并竭力坚持要求从中 176
国方面得到关于确切履行向乌赫托姆斯基作出的声明的"正式保证"。② 而当外交部向北京发出了这一方面的指令后，维特要求，此外再向中国驻彼得堡公使表示"同样坚决的抗议"。③

维特不仅不打算在英国人对南满的铁路渗透的威胁面前退让，而且，英国资本（"应中国当局的直接邀请"）如今也在向满洲的矿产资源伸手了，因此也就更引起了维特希望巩固乌赫托姆斯基使团所取得的成果的强烈愿望。正是在1897年9月，英国摩根商行的代表美国工程师肖克利从北京前往满洲进行勘查，然而早在是年3月，维特就有了使人放心的情报，这些情报说，普里查德·摩根本人参与的"关于提供开采全中国矿产的最广泛的租让权"的谈判，以总理衙门坚决拒绝给予任何租让权而告终。④ 维特暂时还没有任何正式的理由要求中国承认俄国在满洲的工业垄断权，因而

---

① 见第10号卷，第1部分，璞科第1897年8月11日的报告和代办8月10日的报告，两份报告都讲到中国人请求借二十万两的债款。

② 见同上，维特8月22日给穆拉维约夫的信。

③ 见同上案卷，维特1897年10月11日给拉姆斯多尔弗的信。

④ 见第40号卷，第1部分，璞科第1897年3月19日和9月6日的电报，1896至1897年冬季，摩根曾亲临上海进行谈判。

不得不以私商的手段与摩根的企图进行斗争。① 但是，迫使中国人承认那种门户关闭的政策已成了刻不容缓的任务，因为只有这种
177 政策才能保障俄国将来在整个满洲市场上享有独占的统治地位，而上述北京政府政策的转变已经威胁到了这种地位。只是必须有一项提出这种要求的合适理由。没等多久，就有了这种理由：肖克利那包括辽阳、奉天、凤凰城和通化县之间整个区域的勘查工作尚未结束，在山东便发生了天主教传教士遇害的事件，随后，德国陆战队惩罚性地在胶州登陆，这就使得中国政府必须寻求俄国的帮助，其代价是在满洲作出新的让步。

IV

就在俄国由于南满而与英国利益发生直接接触的那些日子里，与英国利益更为尖锐的冲突在朝鲜发生了。1897 年 9 月初，阿列克谢耶夫到了朝鲜，随之而来的是朝鲜国王重又倒向俄国这一突然转变和亲俄派重掌政权。② 阿列克谢耶夫不失时机地着手熟悉这个国家的经济状况，他在转弯抹角地搞到了海关管理情况的准确资料以后，很快就有可能向国王提出证据，以证明柏卓安对海关收入的使用是自私的。③ 其结果是阿列克谢耶夫被任命为朝鲜政府的财政顾问，然后是柏卓安被免职，这些是在一项特别契约中确定的。④ 在春天要用长时间的、审慎的努力才有可能达到（而

① 见第 40 号卷，第 1 部分，璞科第 1897 年 12 月 3 日(15 日)的报告。璞科第监视着肖克利在南满的行踪，同时，他决定进行威胁，于是建议“肖克利的一位朋友友善地警告他，英国方面企图在满洲经办任何重大事业的任何打算，都可能引起各种不愉快的纠葛，由此引起的后果对于准备创办的企业的发展未必是有利的”。

② 见第 11 号卷，(a)，阿列克谢耶夫 1897 年 9 月 18 日发自汉城的电报。内称，以“忠于俄国的”人物为首的“新内阁”已经组成，并讲到，“暂时的冷淡无疑结束了”。

③ 见同上，阿列克谢耶夫 1897 年 10 月 16 日的报告和他同年 10 月 22 日给罗曼诺夫的私人信件。

④ 见同上，阿列克谢耶夫 10 月 11 日的电报，当时，关于柏卓安免职的谕旨已经发布，契约已于 1897 年 9 月 21 日签订。

且也没有十分的成功把握)的东西，如今在最短时间内，而且似乎 178
是自然而然地就实现了：俄国正在正式成为朝鲜财政的主人，它所要做的只是不停歇地发展自己的成就罢了。

这件事直接意味着实际上掌握海关的管理，即：(1) 达到了把海关管理由柏卓安转交给阿列克谢耶夫的目的；以及(2)使俄国银行得以开张，海关税款便从日本银行转而寄存到俄国银行；而日本银行在釜山、元山和济物浦这三个主要（开放的）口岸设立分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寄存税款。① 在英国代办的支持下，在罗伯特·赫德关于指望其他大国抗议这一提示的鼓励下，柏卓安丝毫没有显示出准备放弃自己职位的迹象，而维特则不疲倦地要求穆拉维约夫"坚决协作"，排挤柏卓安。② 维特自己在获悉任命阿列克谢耶夫的消息后，他就赶忙捡起了春天搁下的设立俄朝银行的事情。这一次银行不是拥有十万卢布资本出现，而是拥有五十万卢布资本了，不仅再也谈不到俄朝贸易微不足道的问题，而且引人注目的是，"俄国的名义和俄国的金钱已经开始参与经营朝鲜的矿产、森林和其他自然资源"，举例说来，图们江和鸭绿江这两条界河整个流域的森林租让权给予了勃里涅尔，后来别佐勃拉佐夫对这项租让权十分赞赏。③ 最后，阿列克谢耶夫与俄国的陆、海军人一起，就地 179

① 见第 13 号卷，财政大臣 1897 年 11 月 11 日关于建立俄朝银行对财政委员会的报告。

② 见第 11 号卷，(a)，璞科第 1897 年 10 月 13 日发自北京的电报，其中讲到英国驻汉城公使的抗议和赫德给柏卓安的电报，赫德电告柏卓安："坚决顶住，可望其他大国干涉"。同上，维特同年 10 月 24 日和 11 月 20 日给穆拉维约夫的信件。

③ 见同上，罗曼诺夫 10 月 17 日给阿列克谢耶夫的电报，并见第 13号卷的一系列文件，从中可以看出，10 月 16 日，维特(与经理乌赫托姆斯基、罗曼诺夫、诺特加弗特、维尔特、璞科第、阿列克谢耶夫和罗特什捷英)赞同了银行章程。10 月20 日，创办人(罗特什捷英、诺特加弗特、比利时人科克斯、乌赫托姆斯基和克尔别兹)呈递了关于批准章程的请求。10 月 31 日，沙皇谕令将章程从速提交财政委员会。11 月 11 日，向该委员会提出了报告，11 月 30 日，财政委员会作出决议，将章程呈递沙皇批准，并于 12 月 5 日获准，而 12 月 11 日，已经送上了关于在汉城开设分行的呈文。

开始“制定明确的行动计划”，以便对义州港及其邻近地区这一“最好的出海口”进行调查。[①] 我们看到，维特如今在促使满洲问题的解决中遇到困难、甚至确信具有危险之后，他却因而更坚定地决定进入朝鲜，并运用他所能用的一切手段在那里顶住，无论遇到与英国，还是与日本的冲突都不退缩。

但是这一次俄国正式的外交机构却断然拒绝在任何方面促进朝鲜问题的解决，因为它正准备在满洲问题中采取一项冒险步骤。早在俄国舰队开进旅顺口之前，11 月底，穆拉维约夫就声明说，“考虑到远东正在发生的政治事件”，“很难向代办发出坚持将朝鲜海关的管理交到阿列克谢耶夫手中这样的命令”，而只要俄国舰只开进这个港口，日本立即就会援引《莫斯科议定书》，提出关于重新审查《柏卓安—阿列克谢耶夫协定》的问题。由于穆拉维约夫相信，“在目前的政治情势下，我们绝对必须保持与日本的友好关系”，因而在朝鲜对它作出让步便是不可避免的了，而首先就是在日本自己指出的关于财政顾问的问题上作出让步。[②] 无论如何，俄国外交界认为在两个方面同时施加压力是不可能的，它选取了一个方面——满洲方面。如果认为俄国外交界作出这一抉择是轻而易举的，没有经过犹豫动摇，也没有作过斗争的尝试，那就错了。

为了正确评价德国在 1897 年 10 月采取的行动，应当记得，它
180 在 1895 年就已积极地出现在远东了，其目的是要在中国取得一个立足点，从而可能在那里与其他大国并驾齐驱。1895 年 4 月，在三大国向日本发出最后通牒以后，威廉就立即向尼古拉二世提出了在中国沿海得到一个港口的问题。在法、俄、英这些大国竞争者

① 见第 11 号卷，(a)，阿列克谢耶夫 1898 年 1 月 18 日的报告。

② 同上，穆拉维约夫 1897 年 11 月 26 日和 29 日给维特的信件，及他同年 11 月 11 日发往汉城给什佩伊耶尔的电报。

的不间断的赶超之下，德国从那时起竟拖了那样长的时间没有出动，这是不得不令人感到奇怪的事。[①] 德国外交部现今公布的文件证明，早在 1895 年 10 月，德国已着手就中国自愿地交给它某个港口以供停泊船舰的问题进行了外交准备工作。12月，事情提到了总理衙门并遭到了拒绝。1896 年夏天，德国又向李鸿章重提自己的坚决要求，也仍无结果。其间，在一番犹豫以后，德国选中了胶州湾，但在 1896 年 8 月，喀西尼伯爵的解释又使它相信，当俄国没有在朝鲜找到合适的港口时，胶州湾是供俄国舰队冬季停泊的唯一较近的港湾，因此在 11 月，德国已经完全准备用武力侵占厦门，鼓励这种侵占的不是别人，正是中国驻德国公使和喀西尼伯爵。但过后，德国的念头又转回到了胶州湾。[②]

1897 年 7 月，在威廉往访彼得高府[③]前夕，拉多林曾试着顺便与穆拉维约夫谈起胶州湾的命运问题，他的尝试得到了否定的结果。拉多林得到的是有礼貌的劝告：(1)等待合适的时机；(2)“再往南点”物色一个港口，因为俄国仍打算本年冬天在胶州湾停泊军舰。[④]

然而，威廉在和尼古拉于彼得高府会晤时，重新进行了这种尝试，并问沙皇，“俄国是否对胶州有所打算”，对此尼古拉回答说，“在俄国占据它物色的较为北边的一个港口以前，它确实有兴趣保

① 根据 1895 年 6 月 20 日的协定，法国在中国南方取得了收获。对此，英国根据 1897 年 1 月 4 日的协定，从中国获得了对缅中边界进行修改的许可和建筑从缅甸到云南的铁路的权利。法国也在 1897 年 3 月 15 日的宣言中取得了中国的一项保证：不将〔在东京湾（即北部湾。——译者）的〕海南岛割让给别国。

② 《德国外交文件(1371—1914 年)》，柏林 1924 年版，第14卷，第 1 分册：第3654、3655、3659、3663、3664、3666、3668、3672 号。

③ 即彼得宫城。——译者

④ 见《德国外交文件(1871—1914 年)》，第 14 卷，第 1 分册，第 3677 号，拉多林 1897 年公历 7 月 8 日发自圣彼得堡给霍恩洛厄的公文。

留获准进入该港的权利”。① 威廉又问，如果“德国船舰遇有需要，并事先征得俄国海军当局的同意，在胶州湾投锚”，沙皇对此是否反对。对于这个问题，尼古拉的回答是否定的。两位皇帝的谈话记录曾交给穆拉维约夫看过。他还指出，俄国无意彻底占据胶州湾，虽然他也说不准，什么时候俄国能够让出该港，而在让出之后，俄国倾向于把胶州湾转交给德国，以便不让英国从中插手。② 就这样，按照德国官方的说法，除了有条件地同意德国船舰临时地中途进入该港外，威廉在彼得高府一无所获；而这个港湾往后仍继续遥遥无期地供俄国使用。但这毕竟是一个空子，柏林决定钻这个空子，在与俄国商妥并预先通知中国以后，不等待“合适的时机”，现在就把德国舰队开进胶州湾去过冬。

同年9月9日(21日)，拉多林告诉穆拉维约夫说，“根据彼得高府谈判”，德国准备通知中国，“一旦需要”，立即把德国舰队开进胶州湾，又说，此事只在征得“当地俄国长官”的同意时才下手，在这时，穆拉维约夫友好地接受了这一通知。他本人没有作什么表
182 示，答应将此事向沙皇转达。③ 不等尼古拉答复，9月19日(10月1日)，德方就向总理衙门作出了这一通知，从而使总理衙门产生了“深刻的印象”。总理衙门之所以印象深刻尤其是因为德国公使还(1)拒绝指明对港湾的占领将持续多久，而且(2)援引了就此问题与俄国的协商结果。④ 尽管李鸿章当时反驳说，俄国与此事毫不相干，而且德国也十分清楚，事实上在胶州没有一个俄国“长官”，在那里也无人可与之协商，但是，为了在当地采取行动时能遵守全

① 见《德国外交文件(1871—1914年)》，第14卷，第1分册，第3679号，比洛1897年公历8月11日从圣彼得堡发往柏林给外交部的电报，其中扼要地讲到了彼得高府的谈判。

② 见同上，第3679号。

③ 见同上，第3682号，拉多林1897年公历9月21日发自圣彼得堡给蒂恩洛厄的公文。

④ 见同上，第3684号，海靖1897年9月19日(10月1日)从北京发往柏林给外交部的公函。

部外交礼节，德国也仍然只好从彼得堡征得某种答复。10月2日(14日)，契尔希基对拉姆斯多尔弗说，已经有了利用胶州湾停泊场的需要。他等着对方作出回答，同时强调指出，德国在彼得堡进行谈判，德国认为它同时也就以此履行着与当地长官协商的那点规定。

俄国方面可以作出三种回答：或者俄国不允许德国利用这个停泊场，但是，在那里没有俄国船舰的情况下，这种回答就是毫无理由地和粗暴地背弃在彼得高府作的承诺；或者允许德国利用这个停泊场，这就意味着对于以后不可能再迫使德国收回的那个步骤在某种程度上承担责任；于是，拉姆斯多尔弗认为最好是给予一个支捂搪塞、但实际上最能使对方满意的回答，这个回答就是：俄国获准在胶州湾过冬只是在1895—96年的冬季，因此俄国不能"支配"这一港湾，何况中国人对该港有"另外的打算"，而对于他拉姆斯多尔弗说来，中国人将以何种态度来对待德国船舰在那里的突然出现，这是一个问题。拉姆斯多尔弗只是使这一回答表现为个人意见的形式，并答应将所有这一切转告穆拉维约夫。① 183

我们看到，当时适逢在山东发生了杀害传教士的事件，但即便没有这件事，德国在胶州出现的外交准备也已经差不多了。如今则有了一个借口，以便利用惩罚性的动机来侵占港口并夺取其附近地区，以便从速进行此事并对彼得堡施加最后的压力，来迫使那里作出正式的答复，这一答复应当解答对于俄国真实立场的疑问。同年10月26日(11月7日)，尼古拉对威廉11月6日的询问作出了答复。这份有名的电报对于不久前拉姆斯多尔弗向契尔希基表示的意见没有增加任何新的内容。尼古拉说："对你派遣德国舰队到胶州去的命令我不能表示赞成或不赞成，因为我不久前才知

① 见《德国外交文件(1871—1914)》，第14卷，第1分册，第3685号，契尔希基1897年10月2日(14日)发自圣彼得堡给霍恩洛厄的公函。

道，这一港湾只在 1895—1896 年间暂时归我们使用”。这就是所要寻求的正式答复，它使德国完全可以放手去干，因为在这一答复中，俄国对德国在中国看中的地方正式放弃了任何权利与要求。就在当天，公历 11 月 7 日，向在中国水域中的德国舰队发出了一道命令，而 11 月 2 日（14 日），海军大将迪德里希斯就已身在胶州了。①

然而，正如最近一些日子表明的，尼古拉的答复不仅没有解决俄国对德国采取的步骤的态度问题，而且与俄国外交部在沙皇电报发出后立即采取的立场是截然相反的。俄国驻北京代表奉命支
184 持德国关于惩办杀人凶手的要求，以便使得“德国舰队派往胶州”，以及“其他大国的干涉”都成为“徒劳无益的事”；然而，假如德国舰队出动，俄国舰队司令官奉命要尾随德国舰队进入该港，“唯一目的是（为俄国）保留优先停泊权”。②

穆拉维约夫就这样直截了当地向契尔希基宣称说，俄国“当时”得到中国的一项担保，无论将胶州交给何国，均保留俄国的优先权，又说，他穆拉维约夫对德国采取的步骤“感到遗憾”。③因为这一步骤的后果将是胶州对各国“开放”。穆拉维约夫这一“无耻之极的”（用威廉的话说）声明首先引起了一种怀疑，他是否与阿诺托事先商量好了的。在这种情况下，德国人如果不想落入圈套，就应当鸣金收兵。④于是，柏林面临着一个严重的问题：撤销已经向德

① 在山东杀害传教士一案发生于 1897 年 10 月 23 日（11 月 4 日）。在柏林获悉此讯的当天，10 月 25 日（11 月 6 日），威廉就准备好了发给海军大将迪德里希斯的开赴胶州的命令。见《德国外交文件（1871—1914 年）》，第 14 卷，第 1 分册，第 3686、3687、3689 号；并见《威廉二世和尼古拉二世通信集》，中央档案馆出版社，莫斯科，1923 年版，第 21 页。

② 见《德国外交文件（1871—1914 年）》，第 14 卷，第 1 分册，第 3693 号，穆拉维约夫 1897 年公历 11 月 8 日和 9 日给俄国驻柏林大使的电报。

③ 原文注有（deplore）。——译者

④ 见《德国外交文件（1871—1914 年）》，第 14 卷，第 1 分册，第 3693 号，契尔希基 1897 年公历 11 月 9 日发自圣彼得堡的电报。

国舰队发布的命令并将其派往中国某个别的港口(例如青岛)。而只有威廉坚持自己的主张,他相信,面临"绝对事实"的俄国不会由于胶州而开战,却会实现妥协。霍恩洛厄试图让俄国大使相信,"在世界历史中从来没有一个政治问题比胶州问题(在两位皇帝之间)讨论得更为坦率和更为真诚",又说,或许穆拉维约夫没有及时获悉沙皇的电报。然而他的尝试却归于枉然,因为穆拉维约夫根据彼得高府谈判的准确含义,坚持自己的主张。① 就连"绝对事实",即无论是德国陆战队 11 月 2 日(14 日)在胶州的登陆,或是霍恩洛厄同日的照会,都不能立即使顽强的穆拉维约夫屈服。而霍恩洛 185
厄在那份照会中说,德国只考虑沙皇的最后一份电报,因为它使所有先前的声明("不管其内容如何")统统失效了。②

11 月 4 日(16 日),穆拉维约夫以尼古拉的名义委托驻柏林大使转告威廉,沙皇因对其电报的解释而"十分惊讶",又说,当着外国船舰开进胶州这个封闭港的时刻,俄国是不能放弃胶州的。而 11 月 6 日(18 日)俄国驻北京代办从彼得堡得到了一份"通知书,内称,我国海军部队已奉命在胶州过冬"。③ 显然,在这条道路上进一步的争吵不仅可能发展成关系的"尖锐化",而且可能变成冲突。有鉴于此,柏林决定到伦敦寻求支持,并且探明,伦敦丝毫不反对德国在中国海岸立足,而且愈往北愈好。④ 伦敦所能希望的莫过于俄德两国在中国发生冲突了,因此,俄国外交界走向冲突也就更显

① 见《德国外交文件(1871—1914 年)》,第 14 卷,第 1 分册,第 3694、3695、3697、3699 号,穆拉维约夫 1897 年 11 月 1 日(13 日)为向柏林外交部转达而发的电报。

② 见同上,第 3700 号。

③ 见同上,第 3706 号,穆拉维约夫 1897 年 11 月 4 日(16 日)的电报,并见我的《维特与鸭绿江上的租让权》,载《纪念 C·Ф·普拉托诺夫的论文集》,彼得格勒 1922 年版,第 434 页;并参见第 9 号卷,璞科第 11 月 11 日(23 日)的报告。

④ 11 月 4 日(16 日),霍恩洛厄讲到了关于俄德关系的"尖锐化",见《德国外交文件(1871—1914 年)》,第 14 号卷,第 1 分册,第 3702 号,赫茨费尔德发往伦敦的电报;并见 3708 号,赫茨费尔德 1897 年 11 月 5 日(17 日)发往柏林的电报。

得荒唐。为了更正沙皇电报中的"不慎之处",为了预防对暂时毫无防备的俄国地区附近的现状[1]的剧烈破坏,俄国外交界已经尽了一切努力。而当穆拉维约夫看到,继续坚持也徒劳无益时,他就开始让步了:11月8日(20日)撤销了向俄国舰队发出的命令,接着,连对胶州的要求也渐渐被忘却了。[2]

186 从德国方面说,整个事件是这样得到缓和的:允许俄国舰队开进胶州湾过冬,早先,当港湾算作是俄国的时候,俄国正是这样答应德国的。[3] 如果说俄国由于一个港口(毕竟中国政府是让俄国使用这一港口的)而同友好的德国的外交关系竟闹得如此不欢,那也就更可以理解如今穆拉维约夫和尼古拉的忧心忡忡了,他们担心,英国可别对旅顺口也来这一手。须知旅顺口不仅是《喀西尼条约》中俄国军事力量可能使用的基地;在俄国财政大臣的规划中,俄国铁路网的不冻港终点有几个可能,旅顺口也是其中之一。

就在维特匆忙将俄朝银行章程提交财政委员会审议的当天,11月11日,穆拉维约夫向尼古拉呈递了一道奏疏,建议不要错过机会,立即解决在黄海取得一个不冻港的问题。胶州事件对他说来是彻底完结了,这不仅由于对抗德国人的侵夺已经没有希望,而且根据海军当局的意见,"在和平时期我们不需要"这一港口,"它既远离符拉迪沃斯托克,又与俄国完全隔断"。与此同时,由中日冲突和我们使中国得益的干涉的后果所造成的远东的整个形势不仅没有变化,而且性质愈来愈确定,这种形势表明,俄国绝对必须

① 原文为 status quo。——译者

② 见我的著作:《维特与鸭绿江上的租让权》,第434页。早在11月10日(22日),海靖已告诉柏林说,俄法两国驻北京代表曾劝总理衙门延宕与德国的谈判,以便迫使它最终撤出胶州。见《德国外交文件(1871—1914年)》,第14号卷,第1分册,第3716号。

③ 见《德国外交文件(1871—1914年)》,第14号卷,第1分册,第3707号,霍恩洛厄1897年11月6日(18日)上呈威廉的奏折,以及3711号,转交给奥斯堡-萨肯的德国外交部11月10日(22日)的照会。

作好准备以防不测，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必须在太平洋保持有相当大的舰队，并完全拥有一个适宜于冬季停泊、装备完善和给养充足的港口。“到哪里物色这个港口……若在朝鲜，在它的东海 187
岸还是西海岸？若在中国的沿海地带，又是在哪里？”对于这一问题，穆拉维约夫没有首先从海军部门得到“完全肯定的回答”。海军部门曾提议在釜山沿岸地带购买一个地段，穆拉维约夫认为这一建议没有解决问题，因为釜山“是日本蓄谋已久的垂涎之地”，而“我们以后旨在更加巩固地立足于釜山的任何尝试，不仅将受到日本的敌视，而且很容易导致与日本的严重冲突”。

一般说来，穆拉维约夫觉得朝鲜港口都不大合适，因为它们与西伯利亚干线相距太远，其中所有东海岸的港口都容易被日本舰队封锁，而成为俄国舰队的陷阱。穆拉维约夫不拒绝考虑海军部门指出的任何“别的港口”，而他自己则建议“用我国舰队的舰只占领”辽东半岛的大连湾。除了大连湾有许多良好的自然条件外，穆拉维约夫指出，“如果注意到以专线将主动脉与吉林和奉天连接起来的设想（我们看到，其实维特在此以前已经提出了这一设想）”，那末大连湾比朝鲜港口距西伯利亚干线较近，同时他还认为，此刻正是在中国海岸取得一个港口的大好时机。

从形式上说，中国自己“请求我们保卫与庇护”，“因此，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将我们对大连湾的占领以这样一种愿望向北京解释，即我们希望使我国舰队拥有一个坚固的基地，以防今后在太平洋发生不利于中国的事件”。而实质上，这种“断然的行动”是由“中国政府在最近整个时期的”全部“行为”所造成的，在这一时期中，俄国的“任何行文与建议”在北京“均未达到目的”，“我们提出的任何要求均未实现”，其中，穆拉维约夫指出：（1）关于经过宁古 188
塔和伯都讷的满洲铁路的南线问题“迄今悬而未决”；（2）“关于我们建筑通往吉林和奉天的连接支线问题，中国政府本已给了我们

保证，现在又想反悔”。[①] 可见，穆拉维约夫的建议与“最近在我国和中国政府关系中的变化”是紧密相连的，这种变化连维特也不否认。1897 年 3 月，维特拟定了俄国的满洲计划，并于 6 月由乌赫托姆斯基向中国政府提出。在实现这一计划的道路上，中国政府设置了许多障碍，而穆拉维约夫的建议正是想以一种急剧的方式将这些障碍一劳永逸地加以清除。

尼古拉认为穆拉维约夫的建议是“完全正确的”，并于 11 月 14 日将其交给四大臣会议讨论。这一建议在会上遭到了维特的激烈反对和海军大臣确有根据的反驳，致使尼古拉“考虑到 1896 年 5 月 22 日与中国在莫斯科订的条约，以及我们在东方的威信”，决定不占领大连湾。[②] 还在这次会议的前一天，11 月13日，维特就向德国大使表示，德国占领胶州将迫使俄国占领更靠北的一个中国港口，而这将使日本有借口或在中国大陆或在朝鲜盘踞下来，从而不可避免导致日俄战争，因此他劝告拉多林离开胶州，到中国南方的某地去。[③] 在 11 月 14 日会上，维特的全部论据也是考虑到：如果不能防止德国的侵占，俄国的侵占便是不可避免的。他还建议，不要“在开罪中国的行动中寻求补偿”，而要“采取反对德国的
189 行动”，即“将我们的舰队派往胶州，并令其停泊下去，直到德国离开该港为止”。而当穆拉维约夫推诿说，“一些特殊的情况”不允许俄国阻碍德国时，维特转而证实说：(1)穆拉维约夫所建议的步骤是要冒风险的，这种步骤为其他大国，其中包括日本(不仅对于中国，而且对于朝鲜)，提供了一个“先例”；(2)这一步骤为时过早，以后可能“由于经济利益”通过协调的途径达到预期的结果。[④] 此后，

① 见第 33 号卷，穆拉维约夫奏疏的副本。

② 见同上，维特在穆拉维约夫 11 月 11 日奏疏上的批语。

③ 见《德国外交文件(1871—1914 年)》，第 14 卷，第 1 分册，第 104 页注，拉多林 11 月 14 日(26 日)给比洛的信。

④ 见第 9 号卷，第 13 面及以下各面，维特 1897 年 11 月 15 日的《亲笔奏疏》。

从维特的观点看来，关于此刻节制任何侵略行动的问题，除了纯粹否定这种行动外，不能作出别的结论，而眼下他也得以使尼古拉同意这一结论了。

此后，关于占领辽东一个港口的问题根本不是取消了，而仅仅推迟了几天。在这一问题上，维特全怪穆拉维约夫一个人，说他用英国人将要进行侵占这种明明白白的虚惊来说动尼古拉。维特对穆拉维约夫的这一行动只用他个人的动机来加以解释，即："在他出任大臣以前，我和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已经在远东政策中取得了这样巨大的成果，这一事实使他于心不甘"，并说，他"立志要做一桩什么事情来显显身手"。[①] 维特是如此不能容忍俄罗斯帝国外交大臣对帝国远东外交政策的干涉，以致在所发生的意见分歧中，除了穆拉维约夫个人的不良动机外，他再也看不到别的什么东西了。在这一纯粹的个人关系方面，维特在这年春天对穆拉维约夫干的那些事情，使他如今得到了回报：当初维特背着穆拉维约夫在满洲采取的又一个步骤没有成功，如今，穆拉维约夫背着维特 190
在进行这一步骤。关于维特当时采取的步骤为时过早的论据，如今由维特以这样的形式还报给了穆拉维约夫，这种形式清楚暴露了在此左右维特的那种本能：俄国将"由于经济利益"而获得太平洋的一个不冻港，并将借助使取得穿越满洲的铁路租让权这一"看来办不到的"事情得以实现的那种办法而得到，换句话说，这件事将由他维特"运用作为财政大臣的他所能用的手段"办成，而办理的时间也将由他确定。[②] 11月14日，穆拉维约夫的图谋看来是被击败了，此后，不惜任何代价收回失落的主动权这件事，便成了维特在事变未来进程中的一项任务。

但是，如果说，"以我国舰队的军舰"去占领中国的一个港口是

① 见《回忆录》，第1卷，第109页。
② 见《日俄战争的序幕》，第49页。

有助于解决中俄两国政府间前此积聚起来的其他问题的一种手段，如果说，这种"占领"当时被防止了，那末这还并不意味着，一般说来就不应当利用总理衙门在德国袭击以后产生的张皇失措来解决这些问题。11月3日，当北京刚一获悉德国登陆的情报，李鸿章就立即跑到俄国使团求援，而且直到他拿到了一份俄国代办发往彼得堡的密码电报，他才离开俄国使馆。但是，璞科第从第一天起就向中国人作了某种表示，即使单凭这一点，他们就不可能幻想所承诺的帮助是无私的。④ 也是璞科第首先同代办讲到，必须利用有利的时刻。② 接着不久，俄国借口彼得堡已为保卫中国开始与柏林谈判，拒绝派遣舰队去胶州，这就应使中国人更加警觉，并促使他
191 们请求日本公使进行调停。③

最后，当占领大连湾一事受到阻碍后，北京还得到了穆拉维约夫的一项承诺："如果最近产生的有关铁路事务和其他事务的一切问题都能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在与德国发生大规模冲突时将给予帮助"。这时，李鸿章坦率声明，"他不敢向我们作任何承诺，因为我们可能不履行自己关于提供帮助反对德国的诺言"。④ 而中国的一些大臣当时在给皇帝的一道奏折中，就指出了"栽进俄国人怀抱"的危险性，并提出，可以不要俄国用干涉提供的帮助。⑤ 经过一阵犹豫之后，当中国人总算同意履行我们的要求时（其条件是"使德国部队撤离"），为时已经晚了：占领旅顺口的决定已为尼古拉采纳，中国已经没有必要再为了避免德国的侵占而自愿地"栽进

① 见第33号卷，璞科第1897年11月4日的电报。内称，他正努力"利用这一时刻来消除中东铁路与吉林将军之间的误会"。

② 见同上，璞科第1897年11月5日的报告。

③ 见同上，璞科第1897年11月16日的电报。

④ 见第20号卷，璞科第1897年11月23日(12月5日)的电报。

⑤ 见《德国外交文件(1871—1914年)》，第14卷，第1分册，第3735号，海靖1897年12月16日发自北京给柏林外交部的电报。

俄国人的怀抱”了。①

但是，就在此刻，那种必要性却“由于经济利益”而完全出乎意料地出现了。12月2日，李鸿章请求维特由俄国对一亿两的新债款提供担保。早从1897年春天起，中国就在国际市场上物色对象洽谈这笔债款，但毫无结果。② 中国之所以必须借这笔债，是因为到1898年5月8日，《马关条约》确定的对日赔款的优待偿付期限就要满了，这种优待偿付把以前支付的利息算作赔款的本金，这样实际上就可少付二千一百万两，同样还因为别的付款（军需品的订 192
货等项）的期限也已临近。③ 然而，在以往的多次谈判中，中国政府必定遇到这样一项要求：不仅以固定的收入作为债务的抵押品而且要容许外国监督这些款项的征收。因此刚有眉目的借款交涉就这样告吹了。1897年6月，当李鸿章通过乌赫托姆斯基向维特提出这一请求时，维特没有为俄国贷款可能产生的政治效果所诱惑，而要求或以监督的形式得到实实在在的保障，或得到“最重大的和对于俄国确有实质意义的利益”，于是中国方面就转而寻求与别国商谈了。④

如今，在12月，维特在同意承担筹措贷款时又提出了许多项完全排他性的条件，这些条件根本不是从他在11月14日会议上以如此绝对的形式所作的声明中引出来的。这一回维特不因为向其他大国提供先例而感到为难了，他要求：（1）俄国在满洲所有三

① 见第33号卷，璞科第1897年11月28日的电报。

② 见第15号卷，第1部分，璞科第1897年12月2日（14日）的电报。

③ 见同上，第2部分，《关于中国政府外债问题的查询报告》。

④ 见同上，第1部分，乌赫托姆斯基6月1日（13日）的电报。内称：“在具备其他许多极好条件的情况下，债款会给予我们完全排他性的优势”，而维特的回电说：“在现时达成这笔借款……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但为了讨论此事就必须知道，将有何种实在的担保，因为由中国人自己征收的款项作抵押品，若不加任何监督，便是一句空话。如果说的是由我们来作出担保，……那末，没有最重大的和对于俄国确有实质意义的利益，我们恐怕不能作出担保”。

省和蒙古享有铁路和工业垄断权；(2)将从干线“到某个港口”的铁路支线租让权给予中东铁路公司，“该港地点将由铁路董事会在营口港以东的黄海岸边进行选择”；以及(3)容许俄国在该港设置码头，凡悬挂俄国旗帜的一切船只皆有权驶入该港。① 维特没有确切
193 指出他要求的港口是哪个，没有以此约束自己，他不仅要将满洲、而且要将蒙古的事情一举办妥，而为了蒙古的工业经营，罗特什捷英前此已经在华俄道胜银行和国际银行的协助下专门成立了一家“辛迪加”。② 而且，在维特看来事情是如此有把握，以致他指示璞科第不仅不要把贷款硬塞给中国，而且要使中国政府主动提出俄国方面企图迫使其接受的条件。③

此外，维特在提出自己要求时，确实也已经知道，占领旅顺口这个问题已经议决，因此，这一蒙、满的外交重负是在两股力量的牵引下移动的：不仅有金钱的需要，而且有战争的威胁。④ 尽管在通知中国政府时，俄国军舰开进旅顺口和大连湾是作为一项权宜措施的（“但等胶州事件结束”），但此事不仅与维特提出的条件的

---

① 见第20号卷，维特1897年12月4日给璞科第的电报。除了本书已援引的外，维特还要求中国：(1)“无条件允准建筑中东铁路的南线”；(2)“永无例外地排除地方当局在拨划地段、筹办建筑材料方面制造的困难”；(3)“凡筑路所必需的官地以及官有材料皆无偿供给……”；(4)对中东铁路船队在松花江及其各条支流中航行不予阻挠。

② 关于建立«中国矿藏勘查公司»(«Syndicat pour l'exploitation des richesses minieres en Chine»)的条约是由创建人于1897年6月14日签订的。这家辛迪加的资本为五十万卢布。参加公司董事会的有：佩特罗科基诺、罗特什捷英、涅尔平、菲利皮耶夫、璞科第和柯乐德。公司红利应按下述比例进行分配：百分之五十按股份数量分给股东，百分之二十二点五归华俄道胜银行，百分之二十二点五归俄国采金公司，百分之五归董事。该公司是根据柯乐德的建议创建的。他以个人的名义取得了在蒙古开采金矿的租让权。1900年，该公司改组为«蒙古土谢图汗盟和车臣汗盟矿业股份公司»(见23号卷，第1部分)。

③ 见第20号卷，维特同年12月11日给璞科第的信。

④ 关于俄国军舰开进旅顺口的消息彼得堡是12月2日获悉的。尼古拉事先将占领旅顺口的决定通知了维特，见«回忆录»，第1卷，第110页。

含义不相矛盾，而且看来是协调一致的行动和不可能予以拒绝的既成事实。维特与穆拉维约夫在此以前争吵不休，从此刻起，他们 194
在中国事务方面是齐心协力了，而他们的意见分歧只是稍后在朝鲜问题上才又爆发出来。

维特的建议和俄国军舰在旅顺口的出现这两件事同时发生时，适逢中国政府在国际关系中处于一个十分微妙的时刻：当时，德国人离开山东的希望尚未丧失，而从英国方面得到财政帮助的希望却由于汇丰银行坚决拒绝提供贷款而在12月1日刚刚破灭。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别无他法，只好以慷慨大度的姿态在旅顺口接待俄国人，把他们作为患难时刻前来相助、并承诺在自己的友好使命一经履行便将离去的朋友，然后中国就向各方面作出令人宽慰的声明说，倘无需要，俄国就将离开那里。① 但关于贷款的条件问题，李鸿章在看到璞科第给他的根据维特12月4日的电报拟就的俄方备忘录时，他在通向黄海的一条支线的问题上一开始就"久久地停步不前"，并且回避立即作答了。璞科第于是威胁说，"无论如何，反正俄国必将达到履行要求的目的……，因此，中国不如立即同意（俄国的）提议为好"。② 中国人对于占领旅顺口一事愈是继续表示信任，璞科第就愈觉得此刻是"通过代办坚决劝告"他们接受12月4日提议的"适宜"时刻。在中国接受了德国关于山东的垄断权的要求之后，璞科第觉得这些提议是"十分自然的了"。③

中国人把他们在旅顺口问题上采取的立场严格坚持了两个星 195

① 见第116号卷，穆拉维约夫1897年12月7日发往北京给帕夫洛夫的电报。电报"对在旅顺口给予我们舰只的十分友好的接待"表示感谢。并见第33号卷，璞科第同年12月10日的电报。

② 见第15号卷，第1部分，璞科第1897年12月7日的电报，并见第20号卷，他同年12月8日关于会晤李鸿章的报告。

③ 见第33号卷，璞科第1897年12月10日和11日的电报。璞科第遵照维特的要求（同上，12月8日的电报），"详细查询了"李鸿章对占领旅顺口一事的"真实"态度，并确信，李鸿章"完全相信"俄国没有侵占意图。

期，例如，英国公使于 12 月 7 日第一次提出警告说，如果中国“向其他大国”提供“各种租让权”，英国也将同样提出自己的要求，这一警告就没有产生任何效果，中国方面依然拒绝英国舰只中途驶入旅顺口。① 只是当英国公使到总理衙门，对俄国贷款提出抗议，答应“竭力协助在英国筹集贷款”，并且提出了“作为债款抵押品的税收受外国监督这一点只是在不能如期偿付时才有效这个条件”；加之英国人在巨文岛，日本人在对马岛又同时集结了各自的舰队时，中国人才改变了调子，要求俄国作出撤离旅顺口的书面保证，反过来保证英国人在那里受到“殷勤的接待”。② 于是以后英俄的冲突就不是集中表现在港口问题上，而是表现在借债问题上了。把英国人扶起来的不是尼古拉的侵略性图谋，而是维特提议的“和平的”经济协定的那些条件。俄国外交界则对维特作了让步，对债款和提供辽东港口这两个问题在一段时间里一前一后进行了办理，首先办了第一桩事，接着又提出了第二个问题。

英国的提议纵然也包含了有利于英国的许多重大让步，但它使中国政府有可能与两位竞争者讨价还价，而向俄国要求关于旅
196 顺口的书面保证看来就是这种讨价还价的开始。璞科第在将中国政府的这一要求通知本国时，建议履行这项要求，交换条件是，中方也作出书面保证，完全满足 12 月 4 日提出的各项要求，这样一来，就把提供贷款变成了纯粹的“恩赐”。③ 穆拉维约夫完全照此建

① 见第 33 号卷，璞科第 1897 年 12 月 7 日（19 日）和 12 月 10 日（22 日）的电报。

② 见同上，璞科第的下列电报：12 月 18 日(30 日）的电报告知了英国的贷款建议，说总理衙门对俄国的态度发生了“急剧变化”，中国政府请求给予书面保证；12 月 17 日的电报讲到英日两国舰队的集结；12 月 21 日的电报谈到了关于书面保证的要求；12 月25 日的电报说到在旅顺口对英国人态度的变化。

③ 见同上，璞科第 1897 年 12 月 21 日的电报。璞科第在此注意到，如果俄国没有事先得到中国关于满足 12 月 4 日要求的书面保证，同时自己也不声明俄国“必将达到”履行这些要求的目的，就作出书面保证，那中国人将把此解释成“对日本的胆怯”。

议于 12 月 23 日电令帕夫洛夫向总理衙门声明:(1)我们从无获取领土的意向,一俟政治局势和俄中两国利益允许,便将离开旅顺口和大连湾",并将就此事向中国驻圣彼得堡公使作出"通知";(2)"鉴于我国与中国的友谊,我们期望,北京政府会把北直隶湾或朝鲜湾某处确有保障的停泊场提供我们使用,使我们不必再在长崎停泊船舰",并要求"就履行有关教官和铁路问题的口头承诺、以及保障一条连接支线的租让权问题作出一项书面保证。"① 可以认为,无论是维特业已开始贷款交涉这一事实本身,或是交涉中提出的要求,穆拉维约夫一概一无所知。因此,穆拉维约夫在当时所提的要求就显得过于菲薄了:在这些条件中既无工业垄断权,也未提到蒙古,而且根本没有利用借债的理由。

尽管如此,中国大臣们 12 月 26 日在与帕夫洛夫的会谈中仍然指出,"唯一严重的困难是建筑一条通向黄海的支线问题,中国政府希望自己来修这条铁路",而李鸿章已经知道,事实上打击会从何而来,于是立即向维特提议,以中国的资金将这条支线敷设到鸭绿江口。② 但是,维特这一次已经不想再以他自己不久前提出的 197
一条通向朝鲜的支线的方案来约束自己了,他断然回绝了任何讨价还价。穆拉维约夫 12 月 30 日下达给帕夫洛夫的指令是逐字逐句照抄维特亲笔写的草稿的,这道指令甚至比 12 月 4 日的条件包括的东西更多:作为贷款抵押品的除了海关收入外,还有"中东铁路沿线乃至满洲各省的厘金以及全部盐税",这样,除了工业和铁路垄断权外,似乎在俄国新殖民地周围又构筑了第三道防线。维特以最后通牒的形式提出了上述条件的贷款建议,并限期在两周

① 见第 116 号卷,穆拉维约夫 1897 年 12 月 23 日给帕夫洛夫的电报。

② 见第 33 号卷,璞科第 12 月 27 日的电报。并见第 20 号卷,他同一天的电报。该电一字不差地转述了李鸿章的回答。

内签订合同。[①] 但是，不到一星期，贷款问题如此狂妄和尖锐的提法的全部荒诞性就暴露无遗了。

已经确切知道，在此以前索尔兹伯里已经同意由英国政府担保筹集贷款，与英国公使的谈判也在北京加紧进行着。[②] 对英国贷款的前景极端嫉妒的俄国人和法国人，都不知道关于英国人的政治条件的确实消息，但是他们一口咬定说，英国人把开放大连湾作为第一个条件，与此并非无关的是，当时在旅顺口每天停着二、三艘英国军舰。[③] 如果以为中国在完全搞清英国条件以前，就会全盘
198 接受俄国要求，这种指望在当时情况下实在是很轻率的，无论如何也应当考虑到，中国是有可能接受英国提议的。[④]

由于对辽东两个港口的"占领"(为了使外国人与满洲和蒙古"隔绝"，俄国曾准备放弃这种占领)实际上只是12月4日至30日俄国全部声明的一部分，而且这些声明并没有说实际上业已占领的这两个港口中的哪一个不属于黄海的港口，因此，为了防止贷款问题万一出现最坏的情况，穆拉维约夫于1月8日向北京发出了新的指令：(1)倘若中国方面愿意讨论俄国条件，则不必限期两星期，以免使谈判破裂；以及(2)鉴于在俄国舰只离开辽东两港后，中

① 见第20号卷，《财政大臣阁下草拟的给帕夫洛夫的电稿》，并见第15号卷，第1部分，穆拉维约夫1897年12月30日给维特的信，信中说，"今天"他就"不作改动地"拍出这份电稿。

② 见第15号卷，第1部分，璞科第1897年12月28日和29日的电报。

③ 见同上，璞科第12月28日电报中关于开放大连湾的文字。关于在广西乌泥江上和在湖南扬子江上开放口岸的传闻，以及关于在扬子江流域除英国人外不对任何人作出让步的担保，见于他12月29日的电报（同上）。1898年1月6日，法国人向总理衙门声明说，如向英国人提供"财政管理和矿产管理方面的特权"，那末法国将对中国的南方省份提出自己的要求(见第15号卷，第1部分，璞科第1月7日的电报)；关于英国舰只在旅顺口的情况是璞科第告知的(如见第33号卷，1898年12月25日和1月4日的电报)。

④ 直到1月3日，穆拉维约夫才鉴于这种可能性，建议帕夫洛夫，在这种情况下要求中国人作出"不将中国国库的任何收入提供给任何人专属使用"的保证（第15号卷第1部分的电报)。

国无力阻止英国人实际上将它们开放，建议中国方面着手缔结关于租借该两辽东港口的书面协定，但要“十分谨慎，以免影响我们的贷款交涉。①就在这一天，俄国人在北京得知，英国人为了实现贷款，“答应给中国大臣们以巨额贿赂”。于是，1月9日，从彼得堡也发出了同样的命令：“为了上述目的”“向中国大臣”“秘密分赠”一百万卢布，而维特担心英国贷款可能“完全破坏我们(与中国)的友谊”，于是又自作主张地紧跟着电告璞科第，“如此数仍嫌少，尚可增加”。②

199

1月12日和13日这两天，北京的天平秤盘似乎开始偏向俄国一方，仿佛只要在贷款的财政条件方面对中国人作出让步就行了。③但是，由于英国如今占据了威胁性的地位，事情又没有成功。1月12日，斯塔阿利从伦敦告知，“从北京传来消息说，为着挫败英国提议的贷款，似乎我们对北京政府施加了压力，这一消息激起了英国社会舆论的公愤”，又说，沃尔斯利勋爵(司令官)公然宣称，英军已作好充分准备，以防“一旦发生战争”。④13日，英国驻北

① 见第51号卷，第2部分，穆拉维约夫1月8日的电报，并见第116号卷，他当天的第2份电报。

② 见同上，穆拉维约夫1898年1月9日发往北京给帕夫洛夫的电报(以电“稿”形式载于《红档》杂志，第2卷，第287页，这一电“稿”与实际发给帕夫洛夫的和作为副本转送到财政部的稍有出入)，以及维特1898年1月10日给璞科第的电报(亲笔稿)。

③ 1月11日，帕夫洛夫和璞科第邀李鸿章到使馆，告诉他，如能使俄国贷款得以实现，将给他五十万两白银的谢礼。李“答应尽力协助”，并“示意说，只要我们认为能按现行行情足数给予贷款(如同英国人建议的那样)，那末，他几乎可以保证成功”(见《红档》杂志，第2卷，第288和289页，帕夫洛夫和璞科第1月12日的那些电报)。1月12日，总理衙门对帕夫洛夫作出了同样声明。但就在当天，在总理衙门与英国公使进行商谈后，“大臣们委托李鸿章请我们驻俄国代办拒绝继续进行贷款交涉”。然而，李“拒不执行这一委托”。13日，俄国人又一次把李请来，并向他承诺说，如果他设法将中东铁路督办许景澄派到彼得堡去办理交涉，那就在一百万卢布之外再增加“酬金”(见第51号卷，第2部分，璞科第1月13日的电报)。

④ 见第116号卷，斯塔阿利1898年1月12日(24日)的电报。

京公使威胁说，如果贷款交涉告吹，英国将重提“原先的各项要求”，并声明，英国将仿效德国采取行动，从而对中国大臣们产生了最强烈的印象。① 14日，李鸿章小心翼翼地提出了英俄两国之间平分贷款的主张，但是法国当即进行干涉，对英国的贷款条件提出
200 抗议。② 21日，中国驻彼得堡公使通知俄国政府说，中国一概拒绝任何外国贷款。③

维特从穆拉维约夫那里收到斯塔阿利的电报副本后，无论如何不愿意承认，此时俄国已经面临着战争的怪影，在他看来，“容易掀起的喧嚣同样容易平息下去”，因为“由于向这国或那国银行家们借款的问题竟能发生严重冲突，这是不可思议的”，“只有侵夺的政策才能引起实际的冲突”。④ 而维特却始终不相信，只要能使满洲和蒙古不与国际的资金周转相隔绝，英国宁愿(1)在威海卫袖手旁观，目睹俄国在与开放港大连湾相邻的旅顺口这一火药库盘踞下来；(2)自己到中国中部和南部获取一系列实质性特权。⑤ 而当

① 见第20号卷，璞科第1898年1月14日的电报。

② 见同上，璞科第1898年1月14日的第1和第2份电报。并参见俄国驻巴黎大使莫连盖姆先生1月14日的下述电报：“阿诺托认为英国对华贷款问题事关重大，通过对北京施加压力反对实现此项贷款是十分重要的事。他认为，任何补偿都不可能与英国所能取得的利益相提并论，他说，倘若帝国政府认为可能赞成这样一种方案，亦即使贷款国际化，一切有关国家均得以参加，必要时甚至包括日本，那末，他将感到满意。他一再请我征求阁下对此意见的看法”(第51号卷，第2部分)。

③ 见同上，维特1898年1月21日给璞科第的电报。

④ 斯塔阿利的电报副本曾由穆拉维约夫送给维特征求意见。维特1月15日的信回答了穆拉维约夫。

⑤ 见《德国外交文件(1871—1914年)》，第14卷，第1分册，第3751和3753号，赫茨费尔德1898年1月10日(22日)和14日(26日)发自伦敦的报告。赫茨费尔德有这样一种印象：伦敦清楚懂得，对于俄国问题根本不在于旅顺口和西伯利亚铁路，而是在于：“插手到中华帝国的极大部分，并将其与世界商业流通完全隔绝”。并参见第147页援引的英国财政大臣希克斯-比奇1月17日的言论：“政府决意不惜任何代价，必要时甚至不惜使用武力以保持中国市场为我开放”。另一方面，索尔兹伯里向赫茨费尔德声明说，他认为“迄今为止”俄国对于旅顺口的行动本身是“得体的”，并以这种观点劝说日本大使。

"不可思议的"事情成了现实，中国正是在俄国或英国提供贷款问题面前害怕地退缩时，维特全然不想再去搞懂问题在哪里，而是 201
到自己的下属中去寻找智囊。他知道，中国在 1898 年 3 月需要钱用，① 错过对日本的优待偿付期限将是一种丧失理智的行为，而这样大一笔款子靠内债对中国来说是一种空想，于是维特问璞科第，据他看来，"此事结果如何？"② 回答是这样的，也只能是这样的：这是中国方面的一个花招，其目的是等待时机，重向英国借款。③

俄国外交界在贷款问题上面对战争威胁后退了，并拒绝将维特的垄断性计划立即全部付诸实施，却转而尝试纵然是部分地去实现这一计划。有资料表明，就在 1898 年 2 月初，穆拉维约夫回到了租借辽东两个港口的方案上，并企图先与英国商妥。至少，在外交部的文件中存有一份 1898 年 2 月 5 日尼古拉批准的、"我们可提的要求"的提纲，从中可以看出，提纲说的是对英国政府的要求。④ 这些要求表述为四点：(1)由中东铁路修一支线通到大连湾，或到营口以东至鸭绿江间濒临黄海的另一港口，若修到大连湾有困难的话；(2)这一港口"若不是完全，至少也应当在绝大程度上掌握在我们手中，但可对别国船舰开放"；(3)"我们将照德国胶州协定的先例与中国缔结协定，将旅顺口租借给俄国，但我国并不拥 202
有最高主权，租期也无须德国那样长，英国不应阻挠此项协定的缔结"；(4)如果大连湾正好被选作"我们铁路的终点，辟作通商口岸"，租借也应包括大连湾在内。2 月 5 日，沙皇批准了这些要求。当天下午一时，外交部等着英国大使前来，以便"奉旨谈判对华贷款问题"。而在前一天，2 月 4 日，拉姆斯多尔弗已有可能将英国大使通知他的英国贷款条件的清单，以及"我们对英国提议的反驳意

① 李鸿章早在 12 月 7 日就告诉维特，中国在 1898 年 3 月需要钱用。
② 见第 20 号卷，前引维特 1898 年 1 月 21 日给璞科第的电报。
③ 见同上，璞科第 1898 年 1 月 21 日的电报。
④ 见第 116 号卷，以此为标题的那份文件的副本，上有沙皇表示同意的批示。

见”草案送交了维特，这些意见“是完全依据”维特在当天对英国提议表示的“那些看法拟就的”。①

暂且还不清楚，是否与英国在上述原则基础上缔结了某项书面协定，但可以推断，在交换了上述文件之后，双方就互相提供了以后的行动自由。不知俄国外交部此时是否知道，与英国贷款的担保有关的关于不割让扬子江地区的中英协定早在俄历1月31日即已签订，并且早在俄历2月1日，中国就作出保证，只要英国在对华贸易中占优势，就把海关总税务司的职位保留给英国人担
203 任；而如今，在与英国大使会谈以后，穆拉维约夫于2月8日与北京就租借两个港口的问题恢复了信函往来，他的出发点是：俄国“愿意帮助中国人摆脱困境”，“对于中国向英国人借款一事，不仅不予阻挠，相反，还将利用自己的影响，使英国减轻它所提出的条件，从而在此事中给中国以种种协助”。②“作为这种重大帮助的交换条件”，俄国打算建议中国与俄国缔结租借旅顺和大连湾的条约，并声明，“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放弃”这些条件。③

在贷款交涉刚刚受挫以后，只有确信英国不会象挫败俄国贷

① 见第20号卷，拉姆斯多尔弗1898年2月4日给维特的信。在他2月9日的信中附有英国贷款条件的文本和俄国的修改意见(2月4日信的附件未存卷中)。俄国方面对英国五项条件中的四项都有意见：(1) 关于英国臣民享有中国内河的航行权——应是指华中和华南；(2)关于有权敷设从缅甸到扬子江流域的英国铁路——应当指出，这将侵犯法国的利益；(3)关于开放南宁、湘潭和大连湾三个口岸——对大连湾应不予提及，在与中国最终签订协定之前我们对大连湾无从谈起；(4)关于将各开放口岸划作免征厘金区域——我们在满洲铁路地区亦应享有此种特权。只有第5个条件，关于不割让扬子江流域这一点，俄国没有意见。

② 见同上，穆拉维约夫1898年2月8日给帕夫洛夫的电报。由英国大使交给俄国外交部的贷款条件，“较之由帕夫洛夫和璞科第最初用电报转达给我们的条件”已经是“大为减轻了”（前引拉姆斯多尔弗2月4日的信）。1898年公历2月11日关于不割让扬子江地区的«声明»和公历2月13日关于由英国人担任海关总税务司的«声明»，见马克谟：«与中国签订的及有关中国的条约和协定»，第1卷，第103—104页。

③ 穆拉维约夫2月8日的电报。

款那样来破坏这件事情，才有可能这样提出问题。而俄国外交部以后所操心的事，就只是如何使所面临的外交程序不超出“由已故的洛巴诺夫公爵和御前大臣维特签署的中俄密约”的提法，顺便说一下，维特“认为”，向中国提出的“理由”“是完全适当的”，并“表示完全支持”。这样，但等帕夫洛夫从北京发来通知，告知在北京“大好时机”已到，便可开始谈判了。①

大家知道，中国刚与汇丰银行和德华银行签订了一项协定，2月19日，就在北京与俄国开始了谈判。谈判直拖到是年3月15日。② 为了防备中国方面在预定的期限内不签订租借合同，一支俄 204
国陆战队曾准备在旅顺口登陆，后来通过金钱收买而得以避免。在此之前，对于借款的条约也曾同样考虑过进行收买。这一回它之所以成了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是因为中国政府虽然千方百计想把英国人和日本人吸引到此事中来，结果却没有成功，落到了与自己纠缠不休的同盟者一对一的境地。③ 那个可憎的幽灵（它从一开始就是俄国政府内部勾心斗角唯一看得见的东西）正是通过收买这种途径得以排除的，而对于辽东两个港口的“侵占”，也被关于整个半岛和通向半岛的长近一千俄里的连接支线的“一项友

① 见第20号卷，帕夫洛夫2月11日的电报，并见第51号卷，第2部分，当时业已拟就准备必要时拍发的电稿。并见第116号卷，拉姆斯多尔弗1898年2月14日的奏疏，以及第51号卷，第2部分，拉姆斯多尔弗2月12日给维特的信。

② 汇丰银行和德华银行与中国政府关于年息四厘半的一千六百万英镑的贷款协定签订于1898年2月17日（3月1日）。见马克谟：《与中国签订的及有关中国的条约和协定》，第107页。

③ 关于租借辽东的谈判详见《日俄战争的序幕》，第53页及以下各页，载于《红档》杂志，第2卷，第287页及以下各页的《关于收买中国大臣的书信》；并见我的著作：《李鸿章基金》（《阶级斗争》杂志，彼得格勒，1924年第1、2期合刊，第111页及以下各页）和《维特与鸭绿江上的租让权》（《纪念C·Φ·普拉托诺夫的论文集》，彼得格勒1922年，第434页及以下各页）。中国人曾要求日本和英国公使向中国作出书面保证，表示日英两国政府将不占领辽东的港口，然后再拿他们的保证书去向俄国交涉。但此事没有成功。璞科第在1898年3月3日（15日）的电报中告知了此事（见第20号卷）。

好协定”掩盖起来了。[1] 维特从穆拉维约夫那里得知中国方面同意签订租借条约后，他“象任何一个俄国人一样”，对此“只能感到欣慰”。穆拉维约夫则赶忙对他的“宝贵共事和协助”报以“衷心的感谢”，“否则，要使如此棘手的事情达到良好的结果是不可能的”。[2]

205 俄国取得一个不冻港作为通向太平洋的出海口这件事成为可能不是在 1895 年春天；也不是如同尼古拉二世按照惯例所希望的那样在朝鲜的东海岸；也不是在 1896 年春天，当时，李鸿章得以回绝了维特的尝试，后者企图借助一条宽轨连接支线保障俄国在黄海岸边取得一个港口。也不是在 1897 年夏天，当时，维特和尼古拉二世瞒着穆拉维约夫终于选定了朝鲜西海岸的一个港口，并且泄漏了俄国的一项计划：修一条从干线直通北京的支线将南满切断，结果使北京政府张皇失措。这个不冻港只是到 1898 年冬[3] 才可能得到，而且恰恰是在与俄国军事基地相距甚远的一个南满地方。它是在法德两国“道义上的”支持下，并与英国协商后取得的。为此所付出的代价是在此刻将俄国的领土、政治纲领大加缩减，这一纲领恰恰当时在维特笔下是表述得十分具体的。[4] 为了避免

① 1898 年 3 月 15 日（27 日）的专约和同年 3 月 17 日的政府通知书见《远东事务的条约和外交文件汇编》，第 331 页及以下各页。

② 见第 18 号卷，维特 1898 年 3 月 13 日和穆拉维约夫 3 月 14 日的信。

③ 《旅（顺）大（连）租地条约》订于 1898 年 3 月 27 日，而非 1898 年冬。——译者

④ 1897 年 12 月 4 日给璞科第的电报全文是维特亲笔起草的。在 1897—1898 年的紧要日子里，不仅在上述山东问题和英国贷款问题中，而且在“侵占”辽东两个港口这整个事件的最后阶段，法国外交界与俄国都是有联系的。在俄国提出了对这两个港口的要求之后，2 月 27 日，法国政府就在它 2 月的最终方案中提出了下列要求：在华南向法国提供一个煤栈，准许在云南动工兴建铁路，并聘请一名法国人为中国邮务总办。然后，当俄国于 3 月 1 日刚刚限期中国政府在两周内（到 3 月 15 日以前）履行其要求时，3 月 2 日，法国立即要求中国在八天之内答复他们的要求。最后，3 月 13 日，法国驻北京公使通知璞科第说，“他已得到指令，要给我们最有力的支持”〔见第 33 号卷，璞科第 1898 年 2 月 27 日（3 月 11 日）的电报和 3 月 2 日（14 日）的电报，并见第 18

与英国冲突，俄国不得不放弃了在满洲和蒙古的垄断地位，并放弃 206
了通过贷款的方法恢复自己与中国的政治关系的可能性，1897 年夏天俄国坐失了这种良机。不仅如此，俄国外交界通过与日本协商在朝鲜也作出了同样的退让，因为日本与英国同时也诉诸战争威胁，并紧随英国提出了自己的协商条件。①

然而，根据某些迹象看来，直到最后维特还抱着这种希望：将他"和平"进攻满洲和朝鲜的计划的两个组成部分结合起来，并将 207
西伯利亚铁路修到满洲朝鲜交界的鸭绿江口，如同他早在 1897 年春确定的那样。1897 年 12 月 27 日，李鸿章请求修一条连接支线通到鸭绿江口右岸的中国港口安东，维特似乎没有听从李鸿章的请求；而他在 12 月 30 日的最后通牒中，却亲笔重申了关于在"营

号卷，他 3 月 13 日(25 日)的电报〕。至于德国，那末，取得旅顺口这件事从一开始就被穆拉维约夫看作是与德国可能达成协议的一个必要条件，"其目的是采取一致行动反对我们在中国的共同敌人英国人"，"并在黄海划分势力范围，其中包括北直隶湾、辽东湾和朝鲜湾的整个黄海北部完全归我们支配，而包括山东沿海地带的黄海南部则属于德国的政治势力范围"(见第 9 号卷，穆拉维约夫 1897 年 12 月 2 日奏折副本。穆拉维约夫认为，德国提议的协议"与我们自己的政治意图并不矛盾"，并认为这种协议"只有在我们尽快占领"两个港口的"条件下才能实现")。由于穆拉维约夫从柏林通过"一个十分秘密的渠道"获悉了德国关于这种协议的想法，因此，他在 1897 年 12 月 2 日就预先通知德国政府，当天将向俄国舰队发布开进旅顺口的命令。他在采取这一行动时已经确信，"俄德两国应当而且可能在远东携手前进"。德国随之回答说：利益的"一致性""必将使两国认为，这些利益在共同的危险面前是一项共同的事业"，如果俄国将在中国政府面前支持德国对于山东的要求，那末，"由于中国政府继续对抗而可能带来的那些危险就将立即避免"。于是，俄国确实支持了德国的要求〔见《德国外交文件(1871—1914 年)》，第 14 卷，第 1 分册，第 3733，3734，3742 号：穆拉维约夫 12 月 5 日(17 日)给奥斯坚-萨肯的电报，拉多林 12 月 17 日(29 日)发自圣彼得堡给德国外交部的电报〕。

① 正是在英国向俄国转告英中贷款条件以供讨论的当天，1898 年 2 月 4 日，日本公使将一份备忘录通知了俄国外交部，日本希望在备忘录所述条件基础上与俄国就朝鲜事务缔结协定。日本提出了下列条件：(1) 日俄两国承担义务保卫朝鲜的独立；(2) 朝鲜军队的教官将由俄国政府指派；(3) 财政顾问将由日本政府指派；(4) 至于商业与工业利益，为了避免任何误会，以后日俄两国如要采取某种新的措施，应事先达成协议(见第 26 号卷的备忘录)。

口港以东到鸭绿江口”之间向俄国提供一个港口的要求。[①] 这与上面所说的维特的希望是毫不矛盾的。维特早在 1897 年 12 月 4 日就已采用的这种有伸缩性的表述方式，可能是对沙皇刚刚坚决表示的关于占领辽东港口这一意图的让步，但这也没有妨碍他在 1898 年 1 月中旬又对“水深的”、“不冻的”朝鲜港口义州发生兴趣。[②] 而当日本于 1898 年 2 月 4 日紧随英国向俄国提出，将朝鲜政府财政顾问的职位转让给日本，以此作为协定条件之一时，维特知道，对华贷款如今转到了英国手中，与此相应的是，自己计划中的满蒙部分已经落空，因此，他正要反对这一项对日本的让步。[③] 正如他 1897 年 11 月 13 日对德国大使和 11 月 14 日对沙皇所说的那样，现在准许日本进入朝鲜，这就意味着日俄战争不可避免；而把朝鲜的财政管理从自己手中放掉，并同时丧失俄国银行在朝鲜享有的特别优待的地位，其含义当然首先就是向日本势力敞开了朝鲜的大门。

在俄日协定中，关于财政顾问的问题形式上是不分胜负的，可是俄国有义务“不阻挠日朝商业和工业往来的发展”。但协定直到 1898 年 4 月 13 日（25 日）才签订。[④]可能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在 3
208 月签署的关于辽东的专约中，还照维特的意思，列入了一项附带条件：连接支线不仅可修到大连湾，而且可修到“营口城与鸭绿江口之间”另一较为合适的地点。[⑤]然而，在 1898 年 4 月 25 日（5 月 7

① 见本书边码第 196 和 197 页。

② 见第 11 号卷，(a)，罗曼诺夫 1898 年 1 月 12 日发往汉城给阿列克谢耶夫的电报。

③ 见第 20 号卷，维特 1898 年 2 月 6 日给拉姆斯多尔弗的信：“既然俄国的财政总顾问已经确定，将其召回将有损于俄国在远东的威望”。

④ 见《远东事务的条约和外交文件汇编（1895—1905 年）》，第 346 页及以下各页。

⑤ 见同上，第 335 页，第 3 款。

日)的所谓补充议定书[①]中，即在朝鲜协定签订之后，这一附带条件就失去了意义，旅顺口和大连湾被定作新铁路的终点站了(第三款强调指出："而非其他港口")。[②]这一回朝鲜是一去不复返地从俄国手中跑掉了，维特也无可挽回地承认了这一事实。而在1898年3月从朝鲜召回阿列克谢耶夫以后，维特对朝鲜采取了一种近乎断交的态度，他拒绝与朝鲜政府进行任何财政交往，并且拒绝对俄国企业家在朝鲜的活动给予任何支持。[③]他的全部注意力如今都集中到了中国，集中到那巨大的建筑工程上了。这一长达二千四百俄里的工程目前刚在满洲全线动工。那个遥远的军港属于俄国所有愈是显得"为时过早"，铁路南段就愈是要尽快完工。

① 见马克谟:《与中国签订的及有关中国的条约和协定》，第1卷，第127页。
② 即《续订旅大租地条约》。——译者
③ 详见《日俄战争的序幕》，第66—70页。

第 四 章

向长城以北对英国的“极有害”的退让

(1898—1899 年)

I

209 1898 年 3 月 15 日和 4 月 25 日俄中之间的文件(专约和补充议定书),为俄国解决了不冻港和通向该港的连接支线问题:这些文件将辽东半岛南端交给俄国“完全独占使用”二十五年,把半岛的其余地区变成了“中立地带”,在这里不经俄国同意不得向外国人提供任何租让权,并把 1896 年 8 月 27 日合同的条件推行到了这条新的铁路支线。但是这些文件没有完全解决满洲问题,租借地的后方没有良好的保障,同时俄国又处在正是北直隶湾入口处的岗哨地位上。俄德协议本应将与德国在山东的势力范围直接毗邻的朝鲜湾、辽东湾和北直隶湾交给俄国“完全支配”,并要把英国完全排除出黄海的势力范围,但这一协议没有达成,英国却紧跟俄国在北直隶湾入口处的威海卫驻扎了下来。[①]诚然,4 月 25 日补充

① “驻扎期限与旅顺口归俄国占有期相同”〔见 1898 年 6 月 19 日(7 月 1 日)中英两国缔结的协定(即《租订威海卫专约》——译者),载于《远东事务的条约和外交文件汇编(1895—1905 年)》,圣彼得堡 1906 年版,第 352 页〕。关于德国提出的在黄海划分势力范围的计划,穆拉维约夫在 1897 年 12 月 2 日的奏折中曾提到过(见本书边码第 206 页注)。正如俄国驻柏林大使奥斯坚-萨肯后来所回忆的,他得到了比洛的一封信和威廉的“亲口许诺”,这封信和这些许诺“应是缔结条约的前奏”,可是穆拉维约夫“不想理解这层意思”,并“对两国政府达成正式协议的必要性提出了异议”〔比洛 1897 年 12 月 17 日的信中提到了这些许诺;见《红档》杂志,第 14 卷,第 43 页,奥斯坚-萨肯 1900 年 12 月 8 日(21 日)给拉姆斯多尔弗的信〕。

议定书第三款规定:“在新的铁路经过的区域内”,不得将任何铁路 210
租让权给予别国人,似乎这样铁路的商业前途和军事安全就有保障了。但这一款的弱点是:俄国同意不“阻挠中国政府将山海关铁路延伸“到新支线的最近地点”。①不要忘记,1897 年 7 月,中国正是在通向直隶省的这一要冲上,向英国人寻求保护以抗御俄国的进逼的。华俄道胜银行通过六十万两(约一百万卢布)的贷款(条件是:今后在以铁路作抵押筹借外债时,需事先归还这笔贷款②)仅仅暂时防止了英国资本参加修筑山海关铁路,因此,1898 年春天在海上发生的威海卫事件,也能随时在陆上,在旅顺口的后方,在“新支线的最近地点”重演。

早在 1898 年 2 月中旬,当对辽东两个港口的占领刚刚在国际范围内得到认可时,彼得堡就获悉,中国人(其中包括李鸿章)又在把英国吸引到这件事情中来,并决定“立即动工续修从山海关到锦 211
州的铁路,并同时开始修筑从营口港到奉天的铁路,为此向汇丰银行借了一笔贷款,还将两条铁路的工程完全委托(英国人)金达承办”,并决定只让俄国人修筑奉天以北的铁路。③ 恰巧在那些日子里,在俄国政府面前又一次(已经是第三次了!)闪现了在满洲与美国资本合作的前景。这一次从华盛顿传来消息说,我们所熟知的那个美国人布什,似乎在 1898 年 1 月初签订了一项合同,其内容为:向中华帝国的铁路主管部门发放一笔贷款,以建筑从山海关到奉天和吉林及从旅顺口到奉天的铁路,贷款条件是聘请美国人修

① 1898 年 4 月 25 日(5 月 7 日)的补充议定书见于马克谟:《与中国签订的及有关中国的条约和协定》,第 1 卷,第 127 页。

② 见本书边码第 175 和 176 页。这笔贷款是分两期支付的:1897 年 8 月付了二十万两,十二月付了四十万两,这是得到银行董事会中的法国董事同意的(见第 10 号卷,第 1 部分,罗曼诺夫 1897 年 11 月 28 日给维特的报告)。这类贷款只能“暂时排除”英国人参加建筑工程,关于这一点,维特早在 1897 年 8 月 22 日的信中就预先告诉了穆拉维约夫(见同上案卷)。

③ 见第 10 号卷,第 1 部分,帕夫洛夫 1898 年 2 月 14 日发自北京的电报。

筑和经营；消息又称，美国人并“不追求”“政治目的”，他们“完全承认俄国在这一地区的势力范围”，“真诚希望与俄国政府合作共事”，甚至可“按俄式铁路规格（宽轨）进行修建”。①

无论是英国的或美国的计谋，都难免要把当时俄国在满洲的事业仅仅归结为使在辽东港口的俄国军舰得到一个孤孤单单的停泊场，因此，英美双方自然都遭到了俄国方面的断然反对，② 这是自不待言的。此后，在4月25日补充议定书中第三款的出现，证明俄国企图通过仅与中国一国政府进行协商的途径，来设法消
212 除从海港到干线的交通线所面临的威胁，然而这是根本不能解决问题的。至于美国人，目前没有任何迹象说明，合众国政府支持他们，因此可以轻易地简直不把他们看作危险的竞争者。可是对英国人，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在旅顺口被占以后，英国不仅不相信，“取得了满洲门户的锁钥、插销和门闩的那个大国将继续开放满洲的门户”，不仅懂得，俄国如今“获得了这种地位，当它关闭门户的时间来到时，英国可能难于与之进行争议”，而且还感到惊恐的是，俄国把满洲“消化以后”，“有可能向直隶进发，而在直隶和扬子江之间又没有天然的屏障”。③ 从这一观点看来，为南满的铁路“屏障”进行斗争，对英国说来就成了为“扬子江流域”而斗争。在这种情况下，随着英中谈判的顺利进展，俄国如继续对中国政府提出抗议，并且规避与英国达成协议（在此问题上英国显然从一开头

① 见第10号卷，第1部分，拉姆斯多尔弗1898年2月12日给维特的信。信中附有布什1898年1月8日（20日）和9日（21日）给俄国驻华盛顿代办的两封信的抄件。

② 见同上，维特1898年2月15日给拉姆斯多尔弗的信，信中说，“容许英国人、美国人或任何其他外国公司在南满建筑铁路”“无疑”不是我们所希望的事；以及拉姆斯多尔弗同年2月16日就这一内容发往北京给帕夫洛夫的电报。

③ 见英国政府在《蓝皮书》中公布的英国的中国协会（China Association）在1898年4月14日（26日）就不列颠政府的对华政策给索尔兹伯里的请愿书（《中国》，第1册，1899年，第23页；这一文件的译文见于格里姆：《远东国际关系史的条约和其他文件汇编（1842—1925年）》，莫斯科1927年版，第123页及以下各页）。

就瞒着中国），那就可能引起类似一月那样的冲突的重演。

确实，没过半年，如同 1898 年 1 月一样，由于山海关铁路的第二次借款要在何种条件下、向哪位银行家告贷的问题，在英国又把战争挂在嘴边了。① 1898 年2月初，英国曾提议在"十分特殊的"条件基础上，"就我国与它利益相关的各点"达成"一项总协议"，当时 213
俄国外交界拒绝了这一建议；而这一回，在 1898 年 7 月，俄国外交界认为自己不得不主动向英国建议，在划分势力范围的基础上，从总体上就中国的铁路问题达成一项协议。② 这可不是一件如此简单的事，于是，英俄的外交角逐延续了整整九个月之久。

II

1898 年 7 月，雷萨尔在伦敦开始了预备性谈判。后来，则由穆拉维约夫在彼得堡继续进行谈判。到是年 9 月，除有一点尚待进一步谈判解决外，可能达成协定的基本各点均已谈明。英国大使九月初在彼得堡提出的草案就是从签订两项协定的考虑出发的。在立即可以签订的那项协定中，英国人提出的条件看来基本上是以往谈判中业已讨论过的各点，即：(1) 有争议的山海关铁路（到牛庄）"如有必要，甚至可向汇丰银行借款修筑"，但铁路"仍应是中国铁路，置于中国政府控制之下，而且不得抵押给任何一家非中国的公司"；(2)俄英两国政府互相担保，英国不在满洲，俄国不在"扬子江地区"，为自己谋求或支持本国臣民谋求铁路租让权；(3)"在上述它们（两国政府）能取得租让权的地区内，在铁路上不

---

① 详见《日俄战争的序幕》，第 80 页及以下各页。俄国抗议英国贷款，致使中国政府向俄国作出一项保证：不以铁路作债款的抵押，并保证不许外国人参与铁路的管理和经营，或对铁路进行财政监督（1898 年 7 月 19 日与俄国驻北京代办的换文）。

② 见中央档案馆出版的《威廉二世和尼古拉二世通信集》，第 26 页，尼古拉给威廉的未署日期的信，并见《日俄战争的序幕》，第 83 页及以下各页。

214 得规定任何优惠的铁路运价或差别税率”①;以及(4)两国政府“将敦促”各自银行“确切依照”本协定“协调其利益”。而另一项“以后的协定”应“根据进一步讨论”来“确定”第一项协定中所说的“两个地区之间的地理界线”。②

在谈判中已经探明，俄国外交部愿意在对英国说来至关重要的两点上作出让步，可以看出，对此，英国政府是急于加以利用的。这两点是：(1) 使一家英国银行参与山海关铁路的财政合法化，虽说这并没有把铁路整个交给英国占有，但这无论如何意味着，俄国不能再对这条南满铁路产生任何影响了；(2) 规定在满洲所有铁路线上，因而就是在整个满洲，在对双方同等的铁路运价和税率的基础上，英俄两国贸易自由竞争，即实际上在满洲实行“门户开放”的原则。

伦敦政府力求在 10 月 12 日国会开会之前巩固在这两点上赢得的胜利，起先准备将关于确切划界的问题留到次要地位。可是这一问题却从俄国方面提了出来，原来俄国想对自己的满洲地区作广义的解释。看来，这后一情况促使英国一星期之后便提出了第二个协定草案，这一次附有一项声明说，必须“在协定签订以
215 前”，对两个地区作出“准确的地理划分”。③于是，缔结协定这件事又拖延了半年以上。

1899 年 4 月 16 日 (28 日) 签订的俄英协定，将位于北京稍北的“长城”确定为俄英两国铁路范围的界线。这比英国原先提出的有所添加：属于长城以北俄国范围的不仅有满洲，而且有蒙古。但这也并非完全是穆拉维约夫在 1898 年夏天开始谈判时意欲取得

① 原文注有(treatement)。——译者

② 见第 24 号卷，(B)，《大不列颠大使提出的俄英协定草案译文》，这是附在拉姆斯多尔弗 1898 年 9 月 9 日的信中送到财政部的。

③ 见同上，第 45 面，《查尔斯·斯科特爵士口头提出的协定草案》译文的抄件，这是附在拉姆斯多尔弗 1898 年 9 月 17 日信中送到财政部的。

的范围：他当时考虑，“分界线可以横过北京划定”。[①] 倘若让穆拉维约夫便宜行事，那就不难料到，在以后的谈判中他会坚持主张北京界线，不让它从北京向北挪到直隶省与满洲交界处的、位于长城脚下的山海关。俄国外交部门认为自己力所能及的至多不过如此。但是，此事在遭到英国反对之先，穆拉维约夫早在收到第一份英国草案前所表示的关于北京界线的主张，却立即在俄国财政部内部引起了反对，于是谈判转到了另一条路上，在那里等待谈判的是彻底的失败。

当财政部刚一得知北京界线的方案时，它首先注意到的就是：外交家们完全忘记了华俄道胜银行的存在，且不说银行章程没有对它规定在中国的任何地域限制，实际上在此以前银行已对远在北京之南的一些企业发生兴趣了。1897 年 12 月，为了建筑柳林 216
铺到太原府（在山西省）的铁路并经营铁路附近的铁矿和煤矿，银行签订了贷款合同，1898 年 5 月，银行又就自己参加修筑天津到济南府和沂州到镇江两条铁路（亦即将北京与扬子江下游连接起来）的贷款问题与德国人开始了谈判，此外，银行最近又谈妥在一家比（比利时）法（法国）辛迪加修筑北京到汉口的铁路的财政事务中充当中介人。即使只考虑到这一些既成事实，“公平而论”，俄国范围的界线也应当“大致”沿着黄河划定。[②] 而在 1898 年 9 月 9 日，当英国草案的文本交付财政部审议时才清楚了，不仅银行面临着威胁，而且俄国最近三年所取得的全部成果与俄国满洲政策的前景，也面临着威胁。

由于维特出国而署理财政大臣职务的罗曼诺夫，当即认为有必要使拉姆斯多尔弗十分详尽地领悟到，英国草案“对俄国在华

① 见第 24 号卷，罗曼诺夫 1898 年 9 月 5 日给璞科第的电报。

② 见同上，罗曼诺夫 9 月 5 日给璞科第的电报，以及罗曼诺夫 8 月 27 日送给穆拉维约夫的《关于华俄道胜银行在中国经济事业中的参与情况》的报告。

已经取得的权益作出了特别限制，而没有给予任何新的利益作为交换，同时却巩固了英国在中国整个长城以内地区（即本部）的经济优势”。他还赶忙“通过急使”将英国条件的文本送交正在柏林的维特。①不久前，法国方面已对银行的俄国经理人员不照顾法
217 国利益（自然绝不仅限于满洲一地）提出过责难，② 即便不考虑这一点，也可以想象到，特别是会使俄国对满洲的出口贸易陷于绝境的“铁路运价和差别税率”这一条，以及拒绝承担在满洲以外支持华俄道胜银行的义务，会对维特产生怎样的印象。维特以一份简短的电报命令：“正式”转告拉姆斯多尔弗，“考虑到我们对法国的银行和华俄道胜银行所承担的义务”，他认为“从经济观点看来”，英国草案是“不可行的”和“极有害的”。③这不意味着别的，而是从根本上否定通过谈判在中国划定势力范围的主张，并要求中止谈判。

在接到维特9月16日的这份电报以前，彼得堡还想继续谈判。罗曼诺夫承担了“拟订对案的工作”，9月14日，拉姆斯多尔弗又转交给他一份英国大使关于“扬子江地区”界线的“补充说明”，对此，俄国方面应当就“满洲的划定”作出回答。④但在9月18日，罗曼诺夫并没有提出俄国的答复草案，相反，他如今根据上司的坚决主张，只是向拉姆斯多尔弗解释说，对华俄道胜银行在全中国范

① 见第24号卷，(B)，罗曼诺夫1898年9月11日交给拉姆斯多尔弗的意见书和9月18日给他的信。9月11日意见书的内容在《日俄战争的序幕》一书第85页上作了复述，标题是“财政大臣的”“想法”。

② 见本书边码第91页注。

③ 见第24号卷，(B)，维特1898年9月16日从柏林发给罗曼诺夫的电报。原文注有：impossible 和 désastreux。——译者

④ 见拉姆斯多尔弗9月14日给罗曼诺夫的信，并附有（“考虑到你殷勤地欣然承担了拟订对案的工作”）英国大使的补充说明。后者“认为至为重要的是达成一项直接协定”，其内容为：(1)关于铁路运价与差别税率；(2)关于确切划分势力范围问题。大使把“与扬子江相邻的省份，以及河南、浙江”确定为扬子江地区，并等待“俄国政府就应载入协定的关于满洲的划定作出通知”。两份文件皆见第24号卷(B)。

围内活动的支持不能取消，这是俄国政府曾向法国人作了承诺的，取消这种支持"将极端不利于俄国在法国市场上的信誉"，而且"完全不符合俄国财政政策的历来传统，以前甚至在国家最困难的时 218
刻，俄国也始终神圣地履行着自己的财政职责"。[①] 而在第二天，即19日，便已通知北京说，英国草案"因其极不利于俄国而将遭否决"，并说，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大使"有可能"迫使中国以山海关到营口的铁路作抵押接受汇丰银行的一笔贷款（因而便控制了铁路），还说，到那时，俄国就将向中国提出补偿要求，但又说，"尚未作出最后答复"。[②]

那时确没有作出最后答复，只是到1898年10月中旬，当两位大臣返回彼得堡后，才又重开了谈判。

III

如同1897年底至1898年初的辽东事件一样，穆拉维约夫和维特两人是双管齐下进行谈判的，而且其意见分歧的微妙之处已为英国大使所察觉。1898年2月初刚刚探明，如果把对华贷款让给英国，并在朝鲜对日本作出让步，便可能避免与英国发生冲突，并取得辽东的租界。这时，穆拉维约夫就坚决抱定了一个主张："现时俄国在远东的使命要求我们有完全的行动自由，并要与日本以及英国均保持友好关系"。[③] 而现在他也决不想放弃与英国的协 219
定，并且直到谈判末尾，他对于理解银行利益中的政治意义，一直

① 见第24号卷(B)，罗曼诺夫1898年9月18日给拉姆斯多尔弗的信。

② 见同上，罗曼诺夫1898年9月19日给璞科第的电报。其中询问璞科第，他认为需要向中国提出哪些补偿要求。璞科第和代办协商后，提出了下列各项作为回答：(1)要求在牛庄得到一处租界；(2)力求在中东铁路每侧五十至一百里的地域内取得经营矿产、建立工业企业和获得不动产的专有权，一切他国人皆无此种权利；(3)力求使俄国人在长城以外的所有地区取得优先于他国人的经营矿产和建立工业企业的权利。见同上案卷，璞科第1898年9月23日的电报。

③ 见第8号卷，穆拉维约夫1898年2月19日发往汉城给什佩伊耶尔的电报。

表现得迟钝。这是因为他"完全意识到,我们在太平洋沿岸的地位尚无保障",而"要实现"与巩固俄国在辽东的地位直接有关的"极为复杂的任务","只有在事件和平进行以及我方完全抑止可能引起任何政治纠葛的断然行动的条件下才有可能"。① 维特依据"俄国的财政和经济利益",不认为毫无疑义必须签订一项协定,而且他认为,一般地和确切地划分势力范围这一主张无论如何是极其有害的。② 在那一次,俄国外交界对维特作了让步,先是通过了一项包括一个不冻港在内的蒙满大规划,接着,在这一规划受挫的情况下,俄国外交界又仅仅对一个港口提出了要求;如今也是这样,维特已有可能去进行保卫"整个中国、它的全部财富"的尝试以免英国政府将其关闭,将俄国银行拒之门外。这样作的目的是,即使此事不成,也好保住满洲一地,使其免遭英国人直接的铁路渗透,虽然在维特看来,由于满洲而"围起墙垣的""价值"是多么的小。③ 但在那时,要折服中国政府的倔强态度(并消除其对英国的恐惧心理),维特还缺少办法,就是现在,他也没能赶过英国外交界。

维特于10月20日与大使进行了"十分秘密的和非正式的"谈话。他一开头就承认说,"在这样一些具体问题上(如中国的铁路事务),他并不认为一项书面的条约就是达到那种坦率的和令人满意的协调一致的最好方式,双方政府显然是希望借助于此种协调一致,来牢固地确立自己的未来关系的",又说,"几乎不可能以这

① 见《红档》杂志,第18卷,第16页,穆拉维约夫1900年1月25日上呈的奏折。穆拉维约夫认为,"只有在旅顺口完全得到巩固,并用铁路线与俄国相连以后,我们才能在远东事务中坚定地提出自己的意愿,倘有需要,并用武力加以支持"。

② 保存有一份未署日期的财政大臣的奏折草稿,它也许就只是一份草稿,其中承认与英国达成协定是"可取的",同时还搜集了从"俄国财政和经济利益"的观点出发反对划分势力范围的论据[见第16号卷夹(C)]。草稿是在维特回国后、十月谈判开始前拟定的,其中援引了与法国和德国的政治活动家的会谈内容。在总务厅财政大臣经过誊清的奏折原件中,没有这一份奏折。同样在关于同英国谈判的原件案卷(第24号卷)中,既没有这份奏折的誊清本,也没有副本。

③ 见本书边码第80页。

样的方法来说明（现今英国建议的）这项条约，以便使规避履行其条款的种种可能性均得以防止”。他“然后声明说，照他的意见，一项总的条约可能为我们的未来关系奠定远为可靠的基础”，在这项总条约中“应阐明在诚挚与友好的协商基础上确立两国关系的坚定意向，并规定，倘使在世界的任何地方产生了这国或那国政府认为可能引起两国利益冲突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两国抱着妥善解决问题的坚定意向，不侵犯双方的法定利益，立即着手对该问题进行诚挚友好的讨论”。①

英国方面没有接受维特关于签订一项总的、不涉及中国的政治协定的主张，于是以后与大使进行的谈判便采取了这样一种形式：由两位大臣对于9月的协定草案各点之所以不能接受的理由 221
进行详细的解释，有时大使与两位大臣一起谈判，有时与他们分别谈。大使愈来愈确信，他们在关于俄国政府与华俄道胜银行的关系问题上存在着意见分歧。② 而在协定中确切划分势力范围的主要的可以察觉到的障碍也正在于此。这种状况大大便利了英国采取对策。既然俄国要求在中国本部对华俄道胜银行实行“门户开放”政策，那英国就应当力求使俄国同意，这一政策同样适用于满洲和蒙古全境（即要使俄国同意关于同等运价和税率这一条款）；如果俄国想保持其在满洲的特殊地位，那它就不能再提出进入中国其他地区的要求。英国大使11月18日就是这样归纳彼得堡的三方谈判的。其中关于华俄道胜银行不得逾越的那条分界线的提议已经撤销了，而起主要作用的是不许俄国在满洲享有运价和关税特惠的条款。

① 从斯科特爵士1898年10月21日(11月2日)给索尔兹伯里信中摘引的这一片断，曾在英国的《蓝皮书》中发表，是违背罗曼诺夫的意见的（“认为以不发表为好”）。见第24号卷，(B)，斯科特寄给外交部审议的预定发表的那些片断副本。

② 如见同上案卷，斯科特1898年公历12月23日的电报和他公历12月25日的信。

大使写道:“虽然我对通过书面协定划分我们的势力范围的主张遭到反对表示遗憾”,但他“却欣喜地获悉,穆拉维约夫伯爵和维特伯爵两人皆倾向于这样一项协定,该协定(1)应承认中国不可侵犯,并承认我们的条约权利,这些权利本身包含有如下意思,即不容许借助铁路租让条约来确定任何特惠的运价或根据不同国籍对货物或乘客征收差别税捐;他们愿意(2)承认和尊重以我们的条约
222 权利为基础的门户开放政策;并且他们(3)不希望为俄国要求专属的势力范围和利益范围;(4)他们也不希望要求比保卫他们穿越满洲的铁路线所必需的更多的东西”。于是大使建议俄国就此作出书面(单方面的[1])保证。① 此外,大使对“两位大臣的愿望”作了让步,表示同意互换照会,“重申我们彼此的信念,即我们双方在中国的财政利益、商业利益和其他利益并无实际的对立,并重申我们通过自由和友好的协商协调这些利益的坚定意向”,大使还同意本着他九月提议的精神签订关于山海关铁路的协定。②

维特对谈判进行干预的结果就是:向俄国提出了永远正式放弃在中国的任何专属利益范围的建议,而没有对英国提出任何类似的东西作为交换条件。维特仍然深信,“在远东事务方面保持完全的行动自由对俄国是最为适宜的”(“尤其是我们已与日本签订了协定,约束了自己”),因此他认为英国11月的提案与9月提案一样都是“不能接受的”。穆拉维约夫却确信,“在当前情况下,不订一项适当的协定,英国是不会甘心的”。维特对穆拉维约夫的这一信念让了步,他没有决心“否决这样一项协定”,而只是提出了自己的草案以代替协定的单方面的稿本。维特在他拟的草案中,(1)把英国人拟定的所有三个文件合并成了一个文件,(2)甚至试

① 原文注有(«engagement»)。——译者

② 见第24号卷,(B),«1898年11月18日(30日)的英国通知»的文本,此件是附在穆拉维约夫11月23日的信中送到财政部的。着重体是我用的。

图删去任何提及“差别税率”的地方，而只保留在铁路运价方面遵 223
守“最惠国”原则的义务。维特的草案包括了下列(双方的)义务：

“(1) 双方承认皆愿保持中华帝国的独立；

“(2) 双方承认必须尊重中国与各方单独订立的各种现行条约；

“(3) 本着现行英俄贸易条约的精神，双方有义务在各自于中国经营的铁路上办理货运、客运时，严格遵守‘最惠国’原则；

“(4) 双方有义务在由于经济或地理依从关系而影响占优势的区域内，不对对方臣民规定各种禁令；

“(5) 双方对涉及中国铁路事务、此方或彼方表示有利害关系的任何个别问题，有义务本着和解的精神，顾全彼此利益，相互研究解决；

“(6) 双方依照第 5 点，可就某一铁路达成某项协定。”

不难发现，维特的草案不只是将英国草案的三个部分机械地结合在一起，也不只是将单方面的“义务”从形式上改换成了彼此的“协定”，他的草案实质上是要排除英国草案中“将来对俄国不利的约束”。① 譬如，俄国草案的第二条就是这样的，它使英国人有义 224
务尊重给予中东铁路公司的权利，其中即有合同第十款和十一款规定的权利：经中东铁路由俄国输出和输入俄国的货物的关税为通常的三分之二，其运费由铁路自定。第三和第四条也是这样，这两条说得过于笼统，不便在以后对其作出合乎愿望的具体解释。然而，对于英国的进一步图谋，诸如现正商谈的山海关铁路问题，或暂时莫须有的摩根企业，维特的草案未给满洲以丝毫防范。于是，穆拉维约夫便草拟了下述补充条文(“以便”与不能使其满意

① 维特的草案见第 24 号卷，(B)。见同上案卷，维特 1898 年 11 月 25 日给穆拉维约夫的信。

的维特草案的第三、四两条"相配合"),这一条虽没有直接道出满洲,却应使满洲免遭英国人的侵夺:

"缔约双方确信,彼此在中国不应存在任何对立,双方均遵循这一愿望:在其利益相接触的问题上避免任何导致冲突的理由,各方有义务保证不对缔约对方利益占优势区域内的金融、贸易、经济、而特别是铁路企业的利益进行干涉,另一方面,双方有义务对于对方在自己利益占优势区域内所拥有或准备开设的这类企业,不加任何阻挠,不予任何损害。俄英两国皆确认各自与中国政府单独缔约所获得的权利,并承诺对此不予侵犯"。①

十分显然,穆拉维约夫的修正意见不单回避了地理名称,使问
225 题回到了英国的九月草案,而且又提出了"利益占优势区域"这一概念,它还把纯粹的铁路协定,扩展到了近乎维特 1897 年 12 月提出的规划的程度。但是,它当然也使英国得到了在扬子江地区防备俄国人的某些保障,于是维特迂腐地否决了这一修正意见,因为它"会在全中国范围给俄国加上沉重的束缚"。②结果,当时没有对英国大使作出任何答复,谈判又一次遇到了阻碍。

IV

几乎一个月过后,当斯科特爵士去向穆拉维约夫打听,他的第二个,即 11 月的提案命运如何时,他得知,此事已经上奏沙皇,"由穆拉维约夫和维特呈递的关于此事的奏折,已经陛下仔细过目,陛下说,由于两位大臣对若干问题的观点尚不完全一致,他须

① 见第 24 号卷,补充条文草案。

② 见同上,维特 1898 年 11 月 25 日给穆拉维约夫的信。维特"并不否认它(补充条文——译者)在保护满洲防范英国人的觊觎方面的重要意义",然而他又认为这一条"一定"不能要,因为"其中不仅谈到了铁路,而且还谈到了各种金融与经济企业,甚至贸易"。

邀集在御前共同讨论"。同时,"穆拉维约夫十分关切地力求"向大使"阐明(华俄道胜)银行的私人性质,从而使"大使"怀疑这一问题与他同维特伯爵之间的观点分歧有着某种关系,而这种分歧正是皇上想弄清和消除的"。①

在沙皇御前有否举行过这样的会议,如果举行了,是否只限于穆拉维约夫和维特二人,对此,我们暂且不得而知。但是,此刻关 226
于协定一事是在支持华俄道胜银行的问题上卡住了,而且在俄国政府内部这是引起意见分歧的主要问题,这是不容置疑的。同样无须怀疑,沙皇并不同意维特的立场,他只是在坚决转向穆拉维约夫一边之前暂作拖延,而穆拉维约夫是被维特所说的"对于法国各银行的义务"和俄国在法国的信誉的命运那些很有份量的话语难住了。又如库罗帕特金(看来维特试图把他拉到自己这一边,并且正是在这些日子里给他送去了关于协定一事的全部信函原件)他当然是了解这场争论的,并且应当知道,尼古拉倾向于哪一边,于是,他坚决、简短和干脆地对此事表示了自己的意见。他的意见是:"仔细阅毕。结论是:华俄道胜银行自去年开始就把它活动的摊子铺得太大了。由于俄国政府对该银行负有责任,我们可能不由自主地卷入关于扬子江中游(到汉口)、扬子江下游(到镇江)的租让权、或正定府和太原府之间的租让权的最不愉快的事件中去。满洲与俄国接壤达数千俄里,保卫俄国在满洲的利益,这一点我明白。然而不得不用俄国人的鲜血去保卫华俄道胜银行在扬子江地区乃至北京以南各地的利益,我觉得这是莫名其妙和对俄国极其有害的事情"。②

① 见第24号卷,(B),斯科特1898年公历12月23日的电报,以及他12月24日的信。斯科特写道:"然而,穆拉维约夫对于这种意见分歧,并没有向我作过任何更为直接的暗示,他显然希望,我把他所说的有关他与维特伯爵之间存在观点分歧的一切都看作绝对机密"。

② 见同上,库罗帕特金1898年12月27日给维特的亲笔信。着重体是我用的。

俄国驻伦敦大使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也大致如此。大使一开始就认为，“华俄道胜银行的那些协议使我们必须在俄国利益实质上不能赢得任何好处的问题上采取强硬态度”，这是“一种不幸”。① 因此在这个争论问题上，维特在政府里恐怕是单枪匹马的。
227 假若问题是关于俄国的一家私人银行，或是关于一般地侵犯银行中法国股东的利益，这是一回事。但是维特所依据的是对法国一些银行的义务，而且外交大臣须就破坏对盟国臣民应尽的种种义务承担责任，这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了。正因为维特持有这样的论据，他虽是单枪匹马，穆拉维约夫却对他毫无办法。

关于签订一项完全必须的协定的事宜陷入了僵局。穆拉维约夫“对我们向法国一些银行承担的义务是一无所知的”，他为了找到摆脱僵局的这种或那种出路，便请维特告诉他这些义务的“实质”是什么。② 维特“十分乐意地”作了回答。原来，这些义务是存在的，随意忽视这些义务是极端冒险的事，因为(1)创立华俄道胜银行是由俄国政府提议的，与法国银行家们进行的关于创立银行谈判的全过程的各个阶段，都是在官方的上层进行的，并有外交部各机构参与；(2)根据章程，银行负有“广泛的使命”，它在全中国进行活动，受到俄国政府的保护，因此，它从一开始就“预示了在将来得到的不是一家小银行的偶然的盈利”；(3)银行有三位董事(不经他们同意便“不能在董事会中解决任何一个重大问题”)“是法国一些极大企业的巨头，这些企业与法国一系列其他企业及银行因有共同的事业而互相联系，它们合起来构成一个实力雄厚的法国财团，大量经营俄国的股票业务，并忠于俄国的利益”；(4)假若它们

① 见第20号卷，驻伦敦大使1898年10月25日(11月6日)寄给拉姆斯多尔弗的私人信的抄件。斯塔阿利警告说，“如果我们在远东与英国人发生纠纷，他们就会比以前更加厉害”，又说，“法英两国将就苏丹事务达成协议，到那时圣詹姆斯内阁将在其他地方趾高气扬”。于是斯塔阿利表示赞成加快达成我们的协定。

② 见第24号卷，(B)，穆拉维约夫1898年1月14日给维特的信。

知道有可能"限制银行的活动范围"，它们就不会例如把国家贴现 228
银行上海分行与华俄道胜银行合并，而"宁肯保留自己的事业"；以及(5)维护所有这一切的有"那些小食利者，他们是俄国股票在国外的主要持有者"，而"对我们不利的传闻""除了会给我们造成道义上的损失外，还将造成巨大的物质损失"。[①] 因此，穆拉维约夫也不得不考虑到这一点。

最后提交给英国人的那份草案不是两方之间，而是三方之间的某种妥协的结果。在1899年俄历1月26日的俄国照会中，这种妥协是这样表述的：(1)穆拉维约夫一开始就主张的分界线被接受了，但这条界线是指长城，亦即不仅满洲，而且蒙古也包括在内，而在穆拉维约夫夏天的提案中却没有蒙古，这曾使维特感到惊讶；[②] (2)按照维特的主张，双方不承担在这样划分的范围内不谋求租让权的义务(因此，其中俄国仍能在扬子江地区自由支持华俄道胜银行)，而只是有义务"不阻挠"对方的铁路企业：英国在长城以北对俄国有这种义务，俄国在扬子江流域对英国有这种义务；(3)俄国草案标定了分界线，从而对英国作出了总的让步，其中，将分界线划在长城而不是北京一线，这又是一种让步，可是俄国草案却完全没有提到俄国关于运价和课税的任何义务。[③]

俄方开始了谈判的第三阶段，即最后阶段，但开始的时日却不 229
是由它选定的，而是由英方的行为所决定的。早在1899年1月12日(25日)，维特听英国大使说，穆拉维约夫居然仍未把"协定的最后草案"交给对方，他向大使表示"极端惊讶"。但是，直到1月

① 见第24号卷，(B)，维特1899年1月17日给穆拉维约夫的信。参见本书边码第90—91页。

② 见同上，(B)，维特在英国9月9日的一份提案上，在提到满洲作为俄国势力范围的几行文字旁用铅笔批道："而蒙古呢？"

③ 在财政部的案卷中没有1月26日照会的文本。但参照英国大使1899年2月22日(3月6日)的复照和穆拉维约夫同年2月25日给维特的信〔见第24号卷，(B)〕，可以很容易设想出这份照会的内容。

25 日，草案竟仍然迟迟未交。当时，维特还没有收到伦敦的一份来电。电报说，1 月 23 日，在伦敦登出了一则广告：从 1 月 25 日起，开始征募修筑牛庄铁路的贷款，该项贷款以铁路“作为抵押”。① 于是汇丰银行开始经营业务了，而早在 9 月，英国政府(1)不仅没有将该项业务与铁路作抵押相联系，而且(2)一般说来是征得俄国同意才予组织的，这样，俄方如今就面临着两桩既成事实。不出所料，当英国对俄国 1 月 26 日的折衷方案作出答复时(俄历 2 月 22 日)，俄国就已经感到它的方案内在的软弱无力了。

英国人有些遗憾地指出，俄国草案范围狭窄，专讲铁路问题。他们表示，完全同意它的出发点，但立即解释说，“这一情况(即英国接受俄国草案)绝不使缔约双方中的一方负有不在对方利益范围内谋求铁路租让权的义务”，又说，他们不希望“俄英各方决定在各自范围内反对上述要求”，其中他们只想在协定中包括“一项附带条件，以便足以保障汇丰银行依据借款合同规定的条件建筑牛庄铁路”。② 穆拉维约夫在把英国照会呈递给沙皇批示同意后，他完全意识到了自己的失败，但他在给维特的信中不无快感地指出，“限制英国在中国北方取得租让权要求的条款”(即穆拉维约夫 11 月 23 日对维特草案提出的修正意见)，是“依据财政部的愿望”从俄国草案中删去的。这样一来，这件事就要由维特来收场了。

看来，维特已经在可能范围内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无论是对于俄国的经济利益“极其有害的”条文(放弃在满洲的运价和关税特权)，还是在“对法国银行负有义务”的情况下“办不到的”条文(放弃在各地支持华俄道胜银行)，所有这些维特坚持不让载入俄

① 见第 24 号卷，(B)，维特 1899 年 1 月 25 日给穆拉维约夫的信。维特提请穆拉维约夫注意，这与英国提出的两个草案都是相矛盾的。并参见第 24 号卷，(a)，查尔斯·斯科特 1899 年公历 1 月 25 日给索尔兹伯里的信。

② 见同上，英国大使 1899 年 2 月 22 日(3 月 6 日)的照会和穆拉维约夫同年 2 月 25 日给维特的信。

英协定的东西，在新的定稿本中是无影无踪了。维特一贯认为“于将来不利的约束”也丝毫没有列进去。但是，现在发生的事情表明，俄国的稿本对英国也没有加以任何约束，不仅在将来，甚至连现在也未加以约束。谈判结束前宣布的汇丰银行的贷款不仅要用于山海关到牛庄的铁路（从1898年7月便开始为这条铁路进行谈判），而且要用于到新民厅（距奉天五十俄里）的铁路，而关于该路彼得堡只是从伦敦的贷款说明中才得知的。正如穆拉维约夫对此事所理解的那样，英国方面对俄国草案的上述解释“使人深信：大不列颠政府力图预先为自己规定在满洲经营铁路企业的权利”。①

结果是：俄国如今有义务以后甚至对于“在中东铁路区域内”建筑英国铁路也不予阻挠；不久前俄国却专用1898年4月25日 231
俄中补充议定书的第三款来防备这种危险。于是，这个臭名昭著的协定仿佛变成了英国为它将来的这类行动“以后进行注册”的凭借。然而，英国对在扬子江流域的俄国铁路所承担的同样义务，此刻恰恰不能给俄国任何实际的东西。维特也别无他法，他只好立即在穆拉维约夫的信上圈掉了“不予阻挠”这个动词，并写上“不谋求”（于是就落入了圈套，维特一直想避免落入这一圈套，而且已经避免了整整半年了），这是因为，他认为草案的这一稿本“是较为明确，同时从俄国利益的观点看来，也是较为有利的”。② 关于在他人区域内不谋求自己的利益，而对方则不予阻挠的所谓1899年4月16日（28日）的《基本照会》的文本就是这样产生的。③

确实，对2月22日英国照会中关于英国人也有权在长城以北建筑铁路这一威胁性的结论，维特还试图装出一付好面孔，他“并

① 见援引的穆拉维约夫1899年2月25日的信。

② 见第24号卷，(B)，维特在穆拉维约夫1899年2月25日信上的铅笔批语和维特同年2月26日给穆拉维约夫的信。

③ 俄英协定（换文）见于《远东事务的条约和外交文件汇编（1895—1905年）》，圣彼得堡1906年版，第358页及以下各页。

不认为实现此条有何特别严重的障碍”，只要符合一项条件，即不违反 1898 年 4 月 25 日补充议定书第三款。他甚至建议仍要反对英国人参加建筑牛庄铁路，这“不是由于该铁路位于长城以北，而仅仅是从违反我们与中国的协定的观点出发的，因为此路通过中东铁路区域”。① 但是，所谓 1899 年 4 月 16 日(28 日)的《补充照会》却把事情弄得很糟，本来，无论是按照英国人 9 月提案、或是
232 11月提案的意思，在《补充照会》中都只应有关于山海关到牛庄的铁路这一项附带条款。如今，在这份照会中却不得不把通向新民厅的支线也包括在内。正如穆拉维约夫当时指责维特的那样，“当我们由于拒绝英国人最初的协定提案，我们与圣詹姆士内阁的谈判有可能彻底失败的时候”，用于这条铁路的英国贷款“已是既成事实了”。另一方面，这时英国人已经知道了维特 11 月对案的内容，这一对案“使英国无须承担不在山海关以北、乃至全满洲范围内谋求铁路租让权的义务”。② 而从通向新民厅的支线中又产生了《补充照会》的第三项附带条件，即俄国有权“支持俄国臣民和企业谋求”“从满洲干线”穿过英国铁路区域“通向西南方的”“铁路租让权的要求”。这一附带条件是维特本人提出和拟定的，其目的不是“在将来”(根据维特的要求，“在将来”③ 几个字已从文本中删去)，而是现在就要排除英国对中东铁路与北京相连接可能的直接反对；同时，维特又建议穆拉维约夫“使得中国政府同意将通向北京的铁路租让权给予中东铁路公司”。④

于是，在兜了一个圈子以后，俄国外交界在 4 月 16 日(28 日)

---

① 见维特 1899 年 2 月 26 日给穆拉维约夫的信。穆拉维约夫回答说：“遗憾的是，我们已经完全不可能在这一方面采取任何对策了，因为中英两国已将此事妥善解决了”(同上，穆拉维约夫 1899 年 2 月 28 日的信)。

② 见第 24 号卷，(B)，穆拉维约夫 1899 年 3 月 16 日给维特的信。

③ 原文为«dans l'avenir»。——译者

④ 见第 10 号卷，维特 1899 年 3 月 28 日和 30 日给穆拉维约夫的信件。

协定中所达到的，几乎就是它自己在1898年7—9月所由开始的
东西。它在关于自己在满洲的条约特惠方面赢得了胜利，而在南 223
满支线问题上遭到了失败。但是，那"极其有害的"和"办不到的"
东西最后还是通过维特的笔尖回到了协定的最后文本中。俄国有
义务"不在扬子江流域自己出资为俄国臣民的利益，或为其他人的
利益谋求任何铁路租让权"；"或为其他人的"这几个字在协定先前
的一切稿本中都是没有的，它最彻底地"杜绝了"俄国"规避履行协
定条款的任何可能性"，不妨提一下，对于华俄道胜银行的法国股
东们也是这样。俄国一干二净地退到了长城以外，然而，它在整
个满洲(和蒙古)的利益范围，也头一次在国际的法律方面得到了
自己最大的敌人的承认。因而，在俄国的对华政策面前不仅树起
了一道栅栏，而且它所面临的任务是受到严格的地域限制的。

1898年1月，俄英两国由于对华贷款引起冲突，俄国遭到挫
折，并随之在当时放弃了在满洲和蒙古的垄断权，但我们看到，这
并没有阻止住维特在全中国范围内再一次与英帝国主义进行较量
的尝试。经过一个短暂的间歇，维特毫不动摇地由执行俄国势力
范围内的垄断政策，转而采取了势力范围以外的门户开放政策。
初看起来，他主观上是要为那家双重国籍的新型银行作出牺牲，但
倘若没有这家银行，俄国如今在中国是无所事事的。现在，维特被
迫在英国面前作第二次退让，而且正是退让到他在1898年1月遭
到失败的那个范围。然而，看来维特仍不想以这一范围来严格约
束自己，他在1899年4月16日(28日)的补充照会中加进了关于
俄国的"西南"满洲支线的一项附带条件之后，旋即于4月17日向
中东铁路驻北京代表下达了一项命令，要他以中东铁路公司的名
义，向中国政府提出关于建筑与经营从干线某地至北京的铁路租 234
让权的要求。①

① 见第24号卷，(a)，维特1899年4月17日发往北京给波兹德涅耶夫的电报。

穆拉维约夫自然认为，“在我们与中国的关系中，任何纠葛都是绝非所愿的，我们对中国的要求愈克制，在当前的政治情势下在各个方面都会愈好一些”，因此，穆拉维约夫不是特别乐于支持这一要求的。这项要求与 1899 年 4 月 16 日的协定结合在一起，使“对华友好”的政策受到了新的、第三次（在三年之内）的考验。① 甚至李鸿章也公开谈起了已经发生的对中国的瓜分。② 可是，如今强加给中国政府的新的铁路要求，既不是作为中国违反对俄国应尽义务的补偿，也不是对中国本身有利的善举；对此要求既没有以军事的手段，也没有以“和平的”手段加以支持，因此，它遭到了中国方面的强硬反对，中国人要求让中国自己操心本身的利益。③ 然而，新的铁路要求并没有收回，它由于如今得到了中国的一项保证（即不让他人建筑“从北京往北或东北方向通向俄国边境”的铁路）而被保留起来了，并被维特作为满洲铁路建筑计划的直接继续纳
235 入俄国的长远规划之中，预定于 1902 年前付诸实施。④

从俄英远东关系的观点看来，4 月 16 日的协定分明仅仅是一个权宜之计，它并没有使双方在直隶省的冲突延缓多久，根据情势交迁原则⑤，这种延缓甚至没有一个十分确定的时期。而对于中

---

① 见第 10 号卷，穆拉维约夫 1899 年 5 月 2 日给维特的信。

② 见《日俄战争的序幕》，第 87 页。

③ 见同上，第 88 页及以下各页。

④ 见《外交部公报》，1914 年，第 4 册附录，第 62 页及以下各页，中国大臣们1899 年 5 月 20 日对俄国驻北京大使（应为公使，下同。——译者）的通知和俄国大使 1899年 6 月 5 日的复照。复照中有这样一个警告：俄国虽然不坚持要求立即修筑铁路，“然而俄国无论如何也不能放弃它所提出的关于这条铁路租让权的要求，因为中国政府无疑直接违反了它在去年 7 月 19 日通知中所承担的那些积极的义务，这项租让权是必不可少的补偿”。维特同意这样延期修路。他在 1899 年 5 月 6 日给穆拉维约夫的信中承认，在中东铁路干线竣工（预计在 1902 年前）以前，将不修筑通往北京的铁路，他还提议说，“坚定地、始终不渝地朝目标前进，择一适宜时机，以便逐步取得中国政府原则上的同意”，并“确定铁路的建筑条件”（见第 10 号卷）。

⑤ 原文为：rebus sic stantibus。——译者

国，它是最后的推动力之一；从 1895 年以来，这些最后的推动力以愈来愈快的速度破坏了中华帝国的“完整性”和“不可侵犯性”，它们与义和团起义一起，使中华帝国政府陷入了反对洋“鬼子”的“隐蔽的”战争状态。

V

诚然，4 月 16 日的协定“给法国（驻北京）公使的印象是极为恶劣的”，可是，与维特的威胁相反，它无论如何也没有影响到俄国在法国市场上的信誉，而且似乎也并没有使俄国在“法国小食利者的”舆论中遭受“道义上的损失”。① 维特在华俄道胜银行问题上所掀起的喧嚣使俄英谈判拖延了整整九个月，引起这种喧嚣的原因，与其说是俄国必须关照银行的法国股东的利益，不如说是因为与俄国自己的股东利害相关。问题在于，正是在穆拉维约夫与伦敦内阁就划分在中国的铁路范围开始谈判之前仅仅几天，维特对华俄道胜银行实施了某项措施。其所以采取这项措施，是鉴于在最近二年半中银行“活动的顺利发展”，以及“它在中国地位的完全巩固”，使它“有可能与他国的银行和辛迪加一起，在中国成功地登上建造铁路的舞台”。1898 年 6 月底，维特“考虑到银行 236
对流通资金的需要不断增长”，批准了银行第二次发放一万二千份股票的决定，并且用国库的资金把这些股票如数包了下来，这样，国库就成了银行总共六万份股票中的一万六千二百份股票（亦即百分之二十五强）的持有者。此外，维特同时还通过银行全体股东会议对章程作了一项补充：银行的全体董事皆由财政大臣批准。

十分明显，在这种情况下银行转而在扬子江与北京之间的区域拨款修筑铁路，如今支持这种做法的并不是法国股东团的倡议，

① 见第 24 号卷，第 2 部分，波兹德涅耶夫 1899 年 4 月 23 日发自北京的电报。

采取这种行动的全副重任都得由俄国政府负担，因为是俄国政府"彻底巩固了财政部对"银行"活动方针的影响"。[①] 看来，维特在这里醉心于自负责任地参加国际利益在华中的竞争，而没有被与这种竞争有关的政治风险所吓住，于是，又象 1897 年那样，他在这一点上又使俄国外交界面临了一个出乎意料的既成事实。因而，1898—1899 年整个谈判的意义，就与维特一直认为的有所不同了，他在谈判过程中表现的顽强性和轻率性（他本人在最后时刻放弃了自己的立场，不仅没有征询银行法国董事的意见，而且此后再也没有想到过他们），看来也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对付英国人，维特只要以银行的"独立性"和政府不能违反它的章程作为论据就足
237 够了；可是我们看到，只有以法国的利益和俄国信誉的命运作为论据，才是维特此刻在俄国政界中的那些对手所攻不破的。因此，维特在其亲身参与的外交道路上的失败，实质上是被他连累的作为银行股东的俄国政府的失败，因为俄国政府为了加强它向北京以南进行扩张的力量，并在那里修筑俄国铁路，刚刚向华俄道胜银行投入了将近三百万卢布的资金。

在中国政界中，对于事情就是这样理解的：根据 4 月 16 日的协定，英国"取得了它所想要的一切，甚至在满洲也是如此，俄国则甚至不能保卫自己的山西铁路"。[②] 如今在俄国政府不能再从外交上给予支持的情况下，倘若继续经办通过银行开创的长城以南的这项企业，那对于俄国政府的领导说来会是何等荒唐的事。有一个迹象表明，恰恰是银行的俄国经理处承担了使银行从这项山西的企业中脱身的工作，而维特则企图将此事办成这样，以便通过一些银行协定，修复在 4 月 16 日协定中为英国人突破的俄国防线的

① 见第 20 号卷，第 213 和 214 面，维特 1898 年 7 月 3 日《关于以国库资金承购华俄道胜银行股票问题的奏折》副本。

② 见第 24 号卷，第 2 部分，波兹德涅耶夫 1899 年 5 月 1 日的电报。

南满地段。

为了探明在新协定形成的条件下对银行和中东铁路发生的一系列问题，璞科第回到了彼得堡。维特的上述企图与璞科第此行是有关的。璞科第和齐格列尔（俩人分别是银行和中东铁路公司的董事）与国际银行董事比利时人科克斯进行了预备性谈判，维特的尝试也不过如此。这位科克斯然后要去与自己的"伦敦朋友们"进行联系。俄国方面提出，由它将汇丰银行 1899 年 1 月提供给中国政府的那笔贷款，连同银行得到的有关南满铁路的全部权利一起赎过来，其条件是俄国政府（1）放弃修筑从满洲直通北京的铁 238
路；（2）定要建成山海关到牛庄的铁路，但不在该路实施差别运价；（3）将从山海关到北京的铁路留归中国管理，该路不敷设宽轨；（4）将山西铁路让与英国人。

铁路企业的这种交换完全符合 4 月 16 日的基本照会，并且又使同日的补充照会完全无效了。按璞科第的计算，俄国政府为这种交换必须付出的钱，不会高于英国贷款的票面总额（二百三十万英镑），这是因为在俄国对北京铁路的要求的影响之下，英国贷款的债券已经从九十七英镑跌到了九十二英镑，而百分之八的补偿金将使债券持有者心满意足。① 可是，对北京铁路的要求（它只被暂时延缓，并由 1899 年 5 月 20 日—6 月 5 日的俄中协议予以保留）也在中国产生了这样的想法：赎回用于南满铁路的英国贷款，作为能使中国避免实际上"将北京交到""俄国政府手中"和避免那些"可怕的补偿"的唯一现实的办法，否则，所有其他大国也会

① 见华俄道胜银行和中东铁路公司董事会驻北京代办处档案，第 14 号封套，在《关于将天津到山海关到牛庄的铁路让与中东铁路公司问题的往来函件》这一标题之下的下列文件：（1）璞科第 1899 年 7 月 1 日就与科克斯的谈判给维特的简要报告；（2）维特用蓝铅笔亲手写的给璞科第的一封便函，他请璞科第与罗特什捷英拟一份《就北京铁路与英国银行进行谈判的原则草案》；（3）璞科第 1899 年 7 月 3 日（15 日）给罗特什捷英的（法文）信的原稿，信中复述了齐格列尔与科克斯商定的方案，以及（4）同年 6 月 21 日璞科第提出的《问题清单》（上有维特的批语）。

"立即"为自己要求"可怕的补偿的"。①

当与科克斯的预备性谈判正在彼得堡极秘密地进行时，我们
239 熟知的柯乐德来到伊什利找罗特什捷英，并"遵照李鸿章的委托就中国人愿以某种方式赎回英国贷款一事与他开始了对话。看来，只要能迫使我们放弃拟议中的直通北京的铁路，中国政府甚至愿意作出金钱上的牺牲，向英国辛迪加支付必须的补偿金" 中国人的这一建议不仅可使俄国那项行动少花许多钱，而且，照罗特什捷英的看法，它还向俄国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在监督和参与铁路的行政管理方面，要求中国人给予较之他们向英国人提供的更为有利的条件"。②但是，这一初具轮廓的俄中双方彼此满意的结合体竟没有实现，看来，是由于英国方面不同意的缘故。英国人宁愿在北直隶湾为自己保留一条通向一个古老的满洲港口（它是从俄国到北京的路上的前哨）的通道。因此，英、俄在将来可能发生冲突的根源仍然没有消除。

义和团暴动在1900年夏天使所有帝国主义大国都闯进了北京宫殿阒无一人的内室。它暴露了英、俄的冲突，也暴露了俄国命中注定的其他的冲突，同时还为俄国异常迅速地转向用战争来解决满洲政策问题创造了条件。

① 见第10号卷，波兹德涅耶夫1899年5月9日(21日)的电报。电报说，他已就俄国的要求与中东铁路公司督办许景澄进行了说明。

② 见华俄道胜银行和中东铁路公司董事会驻北京代办处档案，第14号封套，瑛科第1899年7月3日给维特的简要报告，报告复述了罗特什捷英发自伊什利的电报。

第五章

对满洲全境的“临时”占领

(1900—1902 年)

I

1900 年中国的事件发生时，俄国正在满洲开足马力地进行它 240
在那里业已动工的极其巨大的建设工程。铁路工程是从五个方向同时开工的：由哈尔滨往南，往东和往西，以及由旅顺口往哈尔滨和由尼科尔斯克—乌苏里斯克往哈尔滨。在两年稍多的时间内业已修成了一千三百俄里，站内车道和临时便道还不计算在内。为了使松花江能够通航，以便把建筑材料运送到哈尔滨码头，江上工程也开始了。而哈尔滨码头现在正由一个不大的村落变为大城市中心。筑路工程局在海上设立了海运局，有十三艘轮船。它还开始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牛庄和大连进行基本建设，这三个港口首先正用作建筑物资和笨重的铁路器材堆放、接收的地点。大连新市区大约三十平方俄里的地段规划工程已告结束，对该市有着广泛的考虑，包括将其辟为自由港。在路界里居住的不仅有俄国工人、职员和护路军(三者共达六千人)，而且还有一部分当地居民，一部分外地来的中国人(达六万人)。这种居住情况已发展到要求建立专门的司法行政机构(交涉局)来调整路界内新来的移 241
民与当地居民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些机构的经费由中东铁路公司负担。华俄道胜银行在哈尔滨、吉林、奉天、旅顺口、牛庄开设了分

行，这些分行已经把当地经济生活中的上层组织吸引到了自己的交易之中。为满足铁路的需要，烟台和瓦房店煤矿已开始采掘，并从这两地修筑两条专用支线通往南满干线，等等。总之，一大片广阔的地区有了新的生命，它使俄国在满洲的前景中成功的可能性无可变更地与日俱增着。①

财政部在回顾最近五年(1895—1899 年)走过的道路时，想要知道，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在远东，俄国和有关国家对殖民地的支出达到了什么程度。结果是："从中日战争那时起，俄国在远东的特别费用"，包括 1899 年在内，计为一亿四千四百二十万卢布，而英国投入了三亿七千九百七十六万卢布（其中部分是英德合资），法国对华贷款是二千二百五十五亿六千二百万② 卢布。③ 单就中东铁路公司的那些企业来说，这笔开支还只是全部预算费用
242 的一半。这些费用的收回将是遥远的事，它完全取决于受到复杂国际局势制约的这些企业的经营条件。国际局势首先绝不会让中

① 见中东铁路公司董事会办公厅编纂的史纲《中东铁路》，第 1 卷，第 72,73,75,58,163,299,59—63,131—134,297,43—45, 67 页。在公司的十三艘轮船中，有五艘（载重量共为五千八百一十九吨）是在 1899 年购买的成品，有八艘（载重量共为九千八百五十吨）是在当时定购的。俄中两国关于铁路交涉总局的协议见于《外交部公报》，1916 年，第 3、4 册附录，第 21 页及以下各页，第 26 页及以下各页：《俄中两国关于铁路、邮电和海关问题的协定》。协定是在 1899 年 5 月 19 日(31 日)和同年 11 月 20 日(12 月 2 日)分别同吉林省和黑龙江省签订的。到 1901 年年初用于辽东的总支出已经超过二千万卢布（见第 75 号卷，第 4 部分，维特 1901 年 7 月 23 日给拉姆斯多尔弗的信）。

② 此数字显然有误。作者在另一本书（《日俄战争外交史纲》）中讲到，法国对华贷款是二亿二千五百八十万卢布。此处数字恐系二亿二千五百五十六万二千卢布。——译者

③ 见第 120 号卷，关于这一问题的统计表。根据这次统计，在所述诸年中，在世界范围内，英国花费了十九亿一千七百五十万卢布，法国投入了三亿四千五百三十三万一千卢布，德国（在山东）的投资为一千三百八十八万卢布，比利时为三千七百五十万卢布。西班牙和美国的战争费用分别为七亿二千万卢布和七亿七千六百万卢布，共计十四亿九千六百万卢布。同时在 1897—1898 年间，欧洲由于贸易逆差付给美国十八亿九千七百三十万卢布。

国本身的事态平静发展，而就在这五年的末尾，它又把美国这样一个新的实力充沛的竞争者引进了中国市场。

美利坚合众国以 1898 年 12 月 10 日的《巴黎条约》胜利地结束了与西班牙的战争，从而在菲律宾这个病夫的榻旁占据了自己的地位。1899 年 9 月，它又要求各大国正式承认"门户开放"的原则，这项原则"是合众国和中国所订的一些条约向合众国保证过的"。① 合众国政府自己承认各大国现有的"利益范围"，但它要求有关政府就这些范围作出声明：(1)它们在各自范围内将不"干涉任何条约口岸的权利或既得② 利益"；(2)无论被课税货物属于何国，中国现行关税税则将普遍适用；(3)在这些范围内的铁路运价和船舶费用对于各国一律平等，而不得高于对本国货物征收的运费。其中对于俄国，这些要求意味着侵犯 1896 年 8 月 27 日合同的条款，并将使俄国在满洲范围内的作用缩小到外国货物运输者的角色，而且仅此而已。

同时，正如上面指出的，俄国政府对此种侵犯并非完全没有准备或没有预计到。因为在此以前，美国资本为了谋求铁路租让权在短期内曾经三次试图有礼貌地叩开满洲的大门，美国资本还提出了一个目标：要把整个中国铁路网的建筑垄断在自己手里。美 243
国从这一计划出发，到 1900 年前用于从汉口到广州这条铁路建筑的拨款总共为一千八百万卢布。③ 虽然美国人的要求关系到中国

① 就这一问题与法、德、意、俄、英诸国的换文见于马克谟：《与中国签订的及有关中国的条约和协定》，第 1 卷，第 221—235 页。

② 原文注有(vested)。——译者

③ 见第 120 号卷，前引关于殖民地费用的统计表。参见边码第 84、102—103 以及 211 页。到这时(在 1899—1900 年中)，美国对华贸易额是八千四百八十万卢布(输入中国额为二千六百一十万卢布，输出额为五千八百七十万卢布)。而英国对华贸易额是七千五百五十万卢布，法国是八千七百万卢布，日本是五千九百六十万卢布，俄国是五千一百万卢布。如把对香港的贸易额也算在内，情况就略有不同：英国是一亿一千三百四十万卢布，日本是一亿零七百八十万卢布，美国是一亿零五百三十万卢布(见费奥多罗夫：《在东方贸易利益的竞争》，圣彼得堡 1903 年版，第 84 页)。

全部领土，但由于当时在中国没有其他外国铁路，美国 1899 年 9 月 6 日（18 日）照会的第三点就在事实上暗中包含了首先使满洲铁路“中立化”的建议，并因此具有专门与俄国敌对的意思。

不管是穆拉维约夫，还是俄国驻华盛顿大使喀西尼伯爵都忽略了对美国建议的这一方面作出真实评价，对于在英国之后，有可能从美国方面赢得承认满洲为俄国的“利益范围”一事，他们俩人都抱着赞许的态度。但维特却马上对此事产生了怀疑，他一直拖到弄清了别的大国的答复后，才建议穆拉维约夫作如下回复：“(1)在俄国政府租借使用的区域内，俄国的商业政策事实上是‘门户开放’政策，这一点从把大连市辟为自由港即可看出；(2)如果将来大连市与别的租借区域之间隔有税关，此税关对于所有外国货物应
244 以同等税率征收关税；以及(3)中国政府在俄国租借地以外的中国其他地区开辟的对外通商口岸，关于关税和港口费问题由中国政府作出规定，俄国政府无意在这方面为本国臣民取得优于他国人的任何特惠”。①

我们看到，维特在他给美国人的这份复照草稿中，对铁路运价问题闭口不提，因为维特认为，放弃 1896 年 8 月 27 日合同和 1898 年 3 月 15 日专约为俄国在满洲提供的运价自主权，那就(1)“将使我们丧失对于我们在远东的经济利益具有极重要意义的优惠待遇”；(2)不会由于别的大国在中国本部同样放弃这种权利而

① 见第 20 号卷，维特 1899 年 12 月 14 日给穆拉维约夫的信。参见第 50 号卷的信件：维特 1899 年 10 月 18 日给拉姆斯多尔弗的信；穆拉维约夫 11 月 16 日给维特的信，此信附有喀西尼 11 月 14 日的电报，电报表示希望在下述条件基础上和美国达成协定：俄国在自己范围内享有“建筑并经营铁路及其他工业企业的专属特权”，但铁路运价则一律相等；维特 11 月 18 日给穆拉维约夫的信（不同意运价相等）；以及穆拉维约夫 12 月 18 日给维特的信，内称，在别的大国作出了肯定的答复后，不能“违悖列强一致接受的政治经济原则，破坏俄美之间现存的友好关系，从而为列强在远东结成一个对我们利益极为危险的同盟提供口实”。

得到补偿，因为在中国本部"主要的运输历来多半通过水路"，而在那里"俄国的输入贸易未必会在近期内获得多大发展"。于是，俄国1899年12月18日（30日）对美国的复照几乎是一字不易地重复了维特14日的草案。①维特认为，俄国"在极端必要的情况下"，可以放弃它在满洲的铁路运价和关税的特权，但要有一个条件："凡希望享有为中东铁路公司规定的那些特惠的"大国，"同样要负担俄国为了满洲的所有铁路企业正在负担、并将继续负担的那种巨大的物资耗费"。②

245

这样，面对着美国人的觊觎，维特本人头一个（暂时还纯系理论性地）从实质上道出了满洲商业中立化的问题。而美国是到1909年，当俄国政府准备让中国先期赎路以使自己从中东铁路脱身的时候，才决定提出此事的。因此，在1895—1899年这五年的末尾，俄国在这个问题上迎头遇到了曾经三度出现的危险。那三次都通过订立协定的办法避免了危险，如今，根据维特的要求，俄国外交界决定干脆用沉默来绕开危险。这只不过延缓了冲突，而没有减少危险，俄国外交界往后企图背离严格保守的满洲政策的任何意向都是可能引起危险的。

自不待言，俄国政府是迫于国内经济战线上的动荡才采纳这种政策的。这些动荡是在1899年出现的，到1900年初，财政和工业危机已经发生。在官方的报刊上好象也没有否定危机。1900年1月，俄国政府坚决拒绝任何侵略性地利用英国在布尔战争中的困难，坚决拒绝在"事先确保给予补偿"的情况下拨出专款或增加陆、海军预算，③这大概是间接表示了对财政和工业危机的承认。早在1899年夏天，在俄英协定刚刚签订之后，璞科第就从维

① 见马克谟：《与中国签订的及有关中国的条约和协定》，第1卷，第234页。

② 见维特12月14日的信。

③ 此处系指穆拉维约夫的奏疏及大臣们（特别是维特）1900年1月至2月对该奏疏的答复，载于《红档》杂志，第18卷，第4页及以下各页。

特给他的答复中获得了有关今后中国的铁路和银行政策的方针的明确指示；在维特的这份答复中可以明显看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是
246 受到约束的，并希望不要超越未来事态的进程。①

最后，不能不看到，从1898年下半年起，就是在中国也逐渐变得事事不利于俄国。民间的风潮在1900年春形成为公开的排外暴动，而同时，英国，尤其是日本对北京政府的影响却不断增长。在1895—1898年的打击之下，清皇朝已经陷入了可怜的境地，北京政府正焦燥不安地寻求摆脱这一处境的出路。② 由于李鸿章失宠贬职被撵出中央政府，调任边远的广东总督，③ 俄国（乃至它在满洲的事业）便失掉了在北京的一个可靠支柱；曾经把铁路的命运与慈禧太后的内宫联系起来的那条线也就断了。④ 与此同时，恰恰在1900年初，彼得堡得到了“某些提示”，示意恢复这种联系并偿付1896年5月23日银行议定书第二点规定的第二个一百万卢布的“期限已到”。⑤ 彼得堡当然不打算背弃前诺，但是也不急于去
247 付款，而决定把这次支付推迟到1901年，维特拟在那时亲自出访远东。

---

① 见璞科第1899年6月21日所作的问题统计表，此件存于中东铁路公司和华俄道胜银行董事会驻北京代办处档案第14号封套。维特认为，只有对于满洲，还“应当”继续“在中国人中保持这样一种信念”，即满洲的铁路建筑和矿藏的开采，“只能依靠中国或俄国的资金、借助中国或俄国资本家以及工程师的帮助才能进行。但对于德国企业家在长城这一面的尝试问题，维特仅表示“不要鼓励”他们。至于如何对待英国人提出的长城与扬子江之间的租让要求这个问题，维特把它“挂了起来”，没有作“确切”回答。

② 这些消息搜集在《日俄战争的序幕》第70页及以下各页和第90页及以下各页。通过这些消息，俄国政府这时理应看清楚，它在中国获得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

③ 应为两广总督。——译者

④ 对于李鸿章和慈禧太后皆对俄国抱有特别好感这样一种暗示，不能作别的解释，而只能理解为是有所指的，即那个臭名昭著的一百万卢布与慈禧也有关系。见本书边码第163页，克尔别兹在1897年1月22日会议上的声明。

⑤ 见第51号卷，第1部分：维特1900年3月3日的奏折。参见我的《李鸿章基金》一文，载《阶级斗争》杂志，第1、2期合刊，第113页。

义和团暴动几乎使满洲铁路全线遭到了严重破坏。这次暴动推延了付款，并且正式提供了废除该项承诺的理由。于是，同1897年夏季的第一个一百万一样，如今也打算让这第二个一百万取得"别的意义"。在新的国际政治局势下，维特又想在这一回给第二个一百万增加负荷。但就在这一回，维特的又一次外交图谋遭到了彻底的、而且更惨的失败。直到1900年6月，随着拉姆斯多尔弗接替穆拉维约夫的职务，维特才得以成为正式外交机关的实际指导者，而直到1902年他在外交上遭到彻底失败时为止，他和沙皇很少有什么实质上的分歧。这样，在这两年中，面对着"和平"政策的胜利，掠夺性的本能在彼得堡是应当退缩了。这一回"和平"政策似乎失掉了任何双重外交的特征。

II

1900年5月中旬，各外交使团和旅居北京的不少于一千人的外国侨民，在毫无保护的情况下，受到了义和团、可能甚至还有中国正规军队迫害的直接威胁。5月15日（28日），北京和天津之间的铁路交通断绝了，5月22日(6月4日)，公使们要求各自政府"采取措施解救他们"。而在中国宫廷里，以端郡王为首的拥护义和团的一派明显地占了上风。这时，彼得堡已经不再怀疑："只有一支强有力的部队迅速到达才能拯救在北京的外国人"，"公使们的作用已经结束"，"事情应当转到"停泊在大沽的一些外国军舰上的 248
"海军将领们手中了"。①

① 见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第279、196、201、203页。见《红档》杂志第14卷中关于义和团暴动的文件第12页和14页，以及格尔思1900年5月25日(6月7日)和5月27日(6月9日)发自北京的电报。见《德国外交文件》，第16卷，第4515号，根据德国驻北京公使克林德的报告，5月22日(6月4日)法美两国的海军将领在大沽等待英、俄、日等国海军将领的到来，5月26日(6月8日)德国海军上将抵达大沽。

由英国海军上将西摩在天津匆忙组成的陆战队于5月30日(6月11日)向北京方向进发。这支部队是那样微不足道(大约二千人),而在北京人们又是那样惊慌失措,甚至连那个似乎最不愿意让俄国军队进入北京的英国公使,也"信赖地请求"赶紧从旅顺口派遣俄国陆战队。其时,俄国在旅顺口拥有一万二千人的警备部队。于是,5月25日,穆拉维约夫奏请尼古拉批准派遣四千人的俄国部队前往天津,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避免日本和其他大国派兵前来保护"。① 但不久就弄清楚了,"中国的事件具有极大的危险性",事情不能仅限于"保护帝国使团成员和旅居北京的基督教徒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外国武装干涉所面临的任务将是:"镇压正在扩大的暴动,使用某种暴力并和政府军作战,这几乎等于对中国开战"。于是,6月4日,穆拉维约夫和尼古拉从"俄国在东方的使命完全不同于欧洲各国的政策这一深刻的信念"出发,作出了
249 下列决定:(1)俄国"决"不谋求联军指挥权;以及(2)"在不违反和其他欧洲部队一致行动的同时",四千人的俄军的任务仅限于:"保卫使团的安全,保护俄国臣民的生命和财产",并"支持合法当局同革命进行斗争",指望俄军在场时,"各大国不经我们同意将不得采取任何政治措施"。② 这一公式规定了俄国将在北京军事行动中担任次等的普通参加者和敏锐观察者的角色,它完全为穆拉维约夫的后任拉姆斯多尔弗全盘继承了。俄国外交界无论在哪一方面都不愿"束缚"自己的"行动自由",并从一开始就为自己提出了这样的任务:不论别的大国态度如何,尽快与清朝政府"恢复友好

① 在西摩的部队里有九百一十五名英国兵,五百四十名德国兵,三百一十二名俄国兵,一百五十八名法国兵,一百一十二名美国兵,五十四名日本兵,四十名意大利兵和二十五名奥地利兵(见前引马士的著作,第202页)。并见《红档》杂志,第14卷,第13页,穆拉维约夫1900年5月25日关于派遣四千人的陆战队的奏折。

② 见《红档》杂志,第14卷,第14、15页,穆拉维约夫1900年6月4日(17日)的奏折。

关系”。①

在当时，譬如尼古拉，可以用这样一种想法随心所欲地安慰自己：中国“民众”的仇恨是针对西欧传教士的（“这些先生是万恶之源”），他们“用基督的神圣名义”掩盖“无耻的”“商业压迫”。后来，维特又可以不顾明显的事实而随心所欲地断言，在“我们对北京进行讨伐”之前（讨伐于俄历7月23日开始），“在满洲是平安无事的”（中国军队对铁路决定性的总攻击是在6月21日开始的）。但是，基本的事实从一开始就对俄国政府显示了全部力量。满洲铁路尚未完工，在六万工人中有一半是外地来的中国工人，四千五百人的护路军散布在一千三百俄里的线路上，所以，对于无论如何不能预先确定的在某时和某地的袭击来说，铁路实质上是不设防 250
的。中国行政机关的支持可以预防或者限制义和团破坏铁路的危险这种想法，对于上述俄国政府的立场起着不小的作用。外国军队6月4日（17日）攻占了大沽炮台，这就导致北京政府公开向各国正式宣战〔6月8日（21日）的上谕〕。彼得堡获悉此事不早于6月20日。因此，在一段时间里，彼得堡认为可以实现下述任务：不仅向清朝地方行政当局，而且可向中央政府去寻找门路。②

6月14日，义和团在满洲对辽阳铁路发动第一次大规模进攻。这天，彼得堡竟还希望：尚不致于一切都丧失了。③6月13日（26日），李鸿章从广州电告维特说，清帝降旨召他赴京觐见，并请

---

① 见《红档》杂志，第14卷，第18和16页；拉姆斯多尔弗1900年6月30日（7月13日）的奏折以及他6月15日（28日）给阿列克谢耶夫将军的电报。穆拉维约夫于1900年6月8日暴卒。

② 见《红档》杂志，第14卷，第31页，尼古拉8月24日在给俄国驻巴黎大使的信稿上的批示，并见维特：《回忆录》，第1卷，第146页；关于穆拉维约夫在1900年6月4日的奏折中曾提到六万中国工人的事，见《红档》杂志，第14卷，第15页；关于攻占大沽和宣战问题，见前引马士的著作，第207、220页，并见《日俄战争的序幕》，第103—105页。

③ 见《中东铁路。中东铁路公司董事会办公厅编纂的史纲》，第1卷，第77页。

他“提出高见”，“以便帮助(清帝)摆脱这种困境”。有李鸿章作慈禧“太后最亲近的顾问”，彼得堡所能设想的好事莫过于此了。于是从此时起，俄国外交界就坚决把赌注下在李鸿章身上了。还象以前类似的场合一样，又用上了乌赫托姆斯基。于是当天就向老头子发出了两份电报。维特发的一份说，如果李鸿章能通过中国当局维持满洲的安宁，并采取措施保护在北京的使团和俄国
251 臣民，就保证不对中国宣战，并且俄国政府和俄国军队将全力支持李鸿章。第二份电报是乌赫托姆斯基发的，他答应7月间前往中国进行会晤。① 6月15日，维特“为同中国地方行政当局保持良好关系”，向中东铁路总工程师紧急投放了“满洲三省每省十万两的第一期贷款”，并且授权他象发放定金似地向中国当局“答应，如果当局能使针对铁路及其经理人员的暴乱不再发生，并在已经造成混乱的地方消除混乱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将再付给他们其余款项”。② 最后，6月18日，维特已能拿着李鸿章的回电启奏沙皇说，“把我们的军队开进满洲至少目前（此处原件有着重点）是有害的事”，他还请求说，“没有我的(他维特的)要求”，“军事部门勿把军队派到中东铁路范围之内”。③

自不待言，彼得堡并没有幻想，满洲事态必定会趋向和平，甚至维特本人在6月初也在狂热地加强护路军，使其人数在真正的军事行动开始前达到了一万一千人，组成了附属于护路军的炮兵

① 见第69号卷：李鸿章6月13日(26日)的电报，维特6月14日（27日）的电报，乌赫托姆斯基14日(27日)的电报(密码电文)。案卷中没有乌赫托姆斯基电报的译文。他通常是将自己亲自准备好的密码电文送到财政部办公厅来拍发的。他所建议的出访日期我们是从李鸿章6月16日（29日）给维特的回电中得知的。顺便提一下，他在这份回电中还“恳请”乌赫托姆斯基提前莅临。

② 见第51号卷，第3部分，维特给尤戈维奇的电报。维特急不可耐地于6月15日发出电报，16日才将电报奏明沙皇并得到赞许。

③ 见第69号卷，维特1900年6月18日的奏折。李鸿章在回电中告知说，他已请盛京将军保护铁路。

部队，并使军事部门对他作了让步，任其调用被动员的阿穆尔边区不定期休假的下级军官。① 当着可能用某种办法防止对铁路的袭击这种想法被证明站不住脚时，当中国军队和义和团一起在6月22日至24日对二百多俄里长的南满铁路发动猛攻时，正是维特本 252
人请求派遣正规军进入了路界全境。他时而沉浸在战斗激情中，建议“调集更多军队以防万一”。这一回他认为“主要的不幸”“在于我们没有准备”，在于“西伯利亚铁路既未完工，满洲铁路也还没有完全建成，我们又没有商船”，否则，“假如我们在当地有十万到十五万人的军队，那就会把它（中国）打个粉碎”。② 于是，如同尼古拉此时也希望的那样，“我们的军队”慢慢地（确切时间是到1900年9月底）“从北到南布满了”满洲，并完全占领了满洲全境。③

现在可以确切判明，正是从俄国外交界在穆拉维约夫任职时接受的“和平”公式在满洲遭到明显破产那时起，这一公式在北京舞台上也在极短时间内受到了某种考验。根据维特的请求，6月26日发布了一道把俄军派进满洲的谕旨，而在29日，拉姆斯多尔弗就对库罗帕特金的好战抨击感到吃惊了。库罗帕特金如今说到，“对于俄国重要的是向前推进灭亡北京”，并建议“赋予阿列克 253

① 见《日俄战争的序幕》，第110—111页。

② 见同上，第115页，并见我们在《红档》杂志第18卷中刊登的维特给西皮亚金的一系列信中1900年7月7日的那封信。信中说，中国人对布拉戈维申斯克的炮轰丝毫没有使维特不安，相反，看来倒使他感到满意，因为这件事使俄国人“有机会摧毁瑷珲以示惩戒”(1)。维特并不怀疑，中国战争“将要付出许多金钱和许多生命的代价”，但是他考虑，“与其损失威信，宁可损失金钱”。参见波洛夫佐夫日记中1901年9月8日所记（载《红档》杂志，第3卷，第104页）。日记中写道：维特在中国战争开始时曾对库罗帕特金说过，必须把尽可能多的军队派往中国，他说：“多么不幸呵，他们将要进行一次海上旅行”，库罗帕特金把维特这些话的记录拿给日记作者看了。可是，“责备他不是派五万军队，而是派了十五万军队，致使战争扩大了规模的非难纷至沓来”，现在可以看到，库罗帕特金当时的抱怨是理所当然的。我们看到，维特本人考虑的正是十五万人。

③ 见尼古拉在1900年9月10日给阿列克谢耶夫的电稿上的批示（载《红档》杂志，第14卷，第34页），并见《日俄战争的序幕》，第114—117页。

谢耶夫海军中将以统率各国部队的总指挥权”。[1] 其实，在此以前，库罗帕特金同其他两位大臣是完全步调一致的。举例说，他 6 月 17 日(30 日)对德国驻彼得堡武官的秘密通知，甚至使德国政府感到失望，因为不能再指望俄国军队大批参加对北京的讨伐了。而就在前一天，6 月 16 日(29 日)，威廉还拒绝支持索尔兹伯里关于把三万人的日本军团征召到北京舞台的建议，想以此博得彼得堡内阁的谢意，因此这种失望对柏林说来就尤其令人难受了。[2] 库罗帕特金声明说，俄国无意为他人在直隶省“火中取栗”，于是德国人在此立即觉察到了他们所熟悉的拉姆斯多尔弗和维特的“理由”，加之与武官的会晤是在维特拜访了库罗帕特金以后紧接着举行的。[3]

6 月 18 日，维特具奏沙皇，由于李鸿章上了台，乌赫托姆斯基即将与他举行会晤，在俄国政府面前突然出现了种种机会，因此就不难猜到，维特在前一天(6 月 17 日)拜访的目的，是要使库罗帕特金知道这些新发生的情况，并且在推迟对满洲的军事干涉问题上和他取得一致，关于此事，我们看到，维特在 18 日又奏陈了沙皇。德国政府对库罗帕特金 6 月 22 日 (7 月 4 日) 向其武官所作的声明，实质上正是从这一意义上加以理解的。库罗帕特金这一次显然比较客气，他已经不再提到栗子，而且也没有一概否定俄国
254 向北京进军的可能性，但是他从两个方面强调指出，这一任务尚不合时宜。第一，集中在天津的俄军(以及各国)兵力不足以向北京进军，因此，现在向阿列克谢耶夫提出的任务是占领天津，并恢复大沽到天津的铁路交通。“再过七天”，等从符拉迪沃斯托克派去

① 《红档》杂志，第 14 卷，第 18—19 页，拉姆斯多尔弗 1900 年 6 月 30 日的奏折。

② 见《德国外交文件》，第 16 卷，第 4537、4548、4552 号，并见《红档》杂志，第 14 卷，第 17 页，奥斯坚-萨肯 6 月 17 日(30 日)发自柏林的电报。

③ 见同上，第 4553 号。

的由十六个营组成的增援部队抵达旅顺口以后，“只有到那时，沙皇方可酌情决定派兵与能否进攻北京的问题”。还应当注意到，“我们的利益主要集中在满洲，要保住满洲可能要求我们付出更大的牺牲”。第二，在英、日或美国的指挥下，俄国是不可能参加对北京的军事行动的，“统帅职务的当然承担者最应该”是普鲁士亲王亨利，可他现在又没在当地。①

这意味着：(1)库罗帕特金用冠冕堂皇的借口推迟了对讨伐北京的问题作出决定；(2)他使关于此事的决定完全取决于满洲的军事行动；以及(3)在他本人建议德国人担任统帅职务以后，他自己就不可能再要求任命俄国人当统帅了，这同尼古拉6月4日的初衷是完全吻合的。在这最新的外交行动中表现出来的客气态度，并不能消除德国方面对库罗帕特金的言词所产生的普遍的不良印象，于是，在柏林人们就开始议论起，是否应当回到刚被拒绝的征召日本兵的建议上去。② 无论如何，德国人明白，俄国准备把在北京的公使和外国侨民的命运作为“最高政策”考虑的牺牲品，而这 255
一“最高政策”是：保留自己的“行动自由”，一旦满洲的事态朝有利方向发展，这种“行动自由”就会同拒绝参加讨伐北京一样，表现为俄军在北京战线上断然采取某种单方面的行动。库罗帕特金所说的那些不能打消这样的顾虑。③

为了正确估价上述库罗帕特金的客气态度，应当提到，正是在6月22日(7月4日)这一天，彼得堡正式获悉，德国公使冯·克林德在北京街头被杀、威廉作出了“好战的”表示，要求对中国人进行

① 见《德国外交文件》，第16卷，第4548号。顺便提一下，库罗帕特金讲，在满洲现在(即在6月26日关于俄国军队开进满洲的命令发布之前)已“有六千士兵”。可能这里指的就是早在6月16日之前“财政大臣请陆军大臣建议阿列克谢耶夫派到营口保护铁路财产”的那些部队(参见《日俄战争的序幕》，第112页)。

② 见同上，第35页，劳恩施泰因公历7月4日发自圣彼得堡的电报，以及副大臣里希特霍芬就库罗帕特金的通知发表的评述。

③ 里希特霍芬也表示了这种担心(见上注)。

"惩罚与报复以示儆戒",并为此目的胜利地向北京进军。[①] 库罗帕特金通过武官,拉姆斯多尔弗通过奥斯坚-萨肯,两人用不同的话语同时给德国带来了令人不愉快的事,库罗帕特金关于让普鲁士亲王亨利担任统帅的建议,应当粉刷这件不愉快的事。拉姆斯多尔弗在6月22日(7月4日)当天发往柏林的唁电中没有一个字是对惩罚性地远征北京表示鼓励的,唁电甚至根本没有提到北京,却通篇表示希望,"尽管德皇言论的调子是好战的",德国对中国的政策将"丝毫"不致改变。唁电还告诫说,俄国在确认愿意"与德国完全一致行动"之前,"预先必须确信":(1)威廉将反对"中国现状[②]的任何改变"和"瓜分天朝帝国的任何企图";(2)他将"与俄国一起",为恢复能维持国家秩序的中央政府而作出努力;以及(3)尽管发生了种种无政府状态,不对"无力与暴动作斗争的""合
256 法的"中国政府宣战。[③]

威廉怒不可遏,这是毫不奇怪的。在他看来,库罗帕特金和拉姆斯多尔弗两人同时所作的两项声明结合在一起,是"亘古未有的自相矛盾"[④]"和厚颜无耻",也是毫不奇怪的。因为拉姆斯多尔弗赌咒发誓反对瓜分中国,而库罗帕特金关心的是"保住"满洲(讨伐北京以及在北京被围困者的命运都要以此为转移),这两者之间究竟有什么共同之处呢?[⑤] 威廉并不怀疑,他在这里遇到的并不是由于俄国外交机构职能混乱而引起的自相矛盾,而是一种统一的政策,这种政策坚定地追逐着自己的、而且仅仅是自己的目的。威廉在对局势进行深思熟虑之后,于6月26日(7月8日)仍然确认,

① 见《德国外交文件》,第16卷,第27和28页的注释。

② 原文为 status quo。——译者

③ 见《德国外交文件》,第16卷,第40—41页,拉姆斯多尔弗1900年6月22日(7月4日)的电报。

④ 原文注有 Zweizüngigkeit。——译者

⑤ 见《德国外交文件》,第16卷,第42页,威廉在比洛给他的有关拉姆斯多尔弗唁电的电报上所作的一系列愤慨的批语。

俄国仅忙于满洲事务，并规避对北京的讨伐，这不仅由于兵力不足，而是希望作为中国的救星和平地进入北京。然后，拉多林也在7月5日(18日)从彼得堡证实说，俄国把直隶省和北京看作是自己利益范围的一部份，因此它将全力阻止他国军队对于这一地区即使是临时的占领，只有当它明了，没有它，别国兵力也足以应付时，它才会派兵出征。①

6月29日，库罗帕特金突然声明，"对于俄国重要的是向前推进，灭亡北京"，并且必须把统帅职位抓到自己手中。这不仅"与……在向各国所作的通告中声明的初衷""完全背道而驰"，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尼古拉同意他的声明，那就可能破坏维特已经开始的尝试：通过乌赫托姆斯基和李鸿章，撇开别国单独与北京 257
政府达成协议。在6月30日攻占天津以后，自然就产生了去不去北京的问题，于是俄国政界中的意见分歧就完全具有实际意义了。

恐怕不用怀疑，库罗帕特金是指望得到尼古拉垂青的，他甚至迎合沙皇的意愿。有几天事情几乎闹到拉姆斯多尔弗要辞职的地步。但是维特在7月13日和14日却得以坚持住了延期进军、直到彻底弄清"其余一切办法都不能导致平息"时再讨伐北京的主张。②而在第二天，7月15日，维特已和李鸿章打上交道了，他刚刚收到了李鸿章13日(26日)发的电报。电报说，"乌赫托姆斯基若同意尽快莅临"，他李鸿章"可与之商定挽救局势的方法"。维特于是奏请沙皇向李鸿章提供一艘俄国军舰，以便他前往大沽、北京。③维特在7月16日这个星期日破例向沙皇面奏时，关于乌赫

① 见《德国外交文件》，第16卷，第4558号，威廉公历7月8日给比洛的电报，以及第4573号，比洛由于拉多林公历7月14日的电报而于公历7月18日发的电报。

② 见拉姆斯多尔弗1900年6月30日的奏折(《红档》杂志，第14卷，第19页)，以及维特1900年7月14日给西皮亚金的信（《德国外交文件》，第18卷，第34页)。

③ 见第69号卷，李鸿章1900年7月13日(26日)的电报和维特7月15日的亲笔奏折。

托姆斯基之行向尼古拉说了哪些"口头意见",我们不得而知,但这些意见无疑生效了,到18日,从财政方面已为乌赫托姆斯基启程做好了一切准备。①

第二天,7月19日(8月1日)彼得堡收到了德尔卡塞的一项
258 建议。他提出亲自前往彼得堡,以便讨论"中国问题",并"使巴黎和彼得堡缔结十分牢固的同盟",这一同盟可能"对多数大国的决定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一建议被婉辞谢绝了,说,"等到较为明朗的局势取代目前的暧昧事态时"再加考虑。单凭这一件事也就可以判断俄国外交界单独方针的成效了。正如拉姆斯多尔弗向尼古拉解释的那样,"答应与某大国完全共同行动,以此来预先束缚俄国是不适宜的",因为一方面,据阿列克谢耶夫将军断定,不管怎样,"迅速向北京进军是完全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对于下列问题"甚至难于作出近似的回答":(1)"应李鸿章的坚决请求,派去了乌赫托姆斯基公爵,他将通过公爵对我们提出哪些建议?"(2)"皇上的代表②、俄国臣民和陆战队能否有机会在其他外国人之先顺利离开北京?"③最后,当威廉于7月24日(8月6日)建议任命瓦德西元帅为联军统帅,尼古拉表示同意时,"单独"方针看来是取得了全胜。④这天,尼古拉最后批准任命拉姆斯多尔弗担任外交大臣,并"向库罗帕特金泼了一盆冷水,表示不应急于向北京进军",于是维特总地认为,"发生了良好的转变"。⑤

① 见第6号卷,尼古拉在维特15日的奏折上关于指定"在明日星期日二时"进行面奏的批示,以及希波夫7月18日关于从一千二百万的基金中拨给乌赫托姆斯基二万卢布作为旅费的呈文,上有维特表示同意的批语。

② 指俄国驻北京使团。——译者

③ 见《红档》杂志,第14卷,第19—22页,德尔卡塞7月19日(8月1日)给蒙泰伯洛的电报,俄国当天的回电稿和拉姆斯多尔弗7月20日的奏折。

④ 见同上,第22页,威廉1900年7月24日(8月6日)给尼古拉的电报,并见《德国外交文件》,第16卷,第4602号,尼古拉的回电。

⑤ 见维特1900年7月25日给西皮亚金的信(载《红档》杂志,第18卷,第35—36页)。

一星期过后，8月1日(14日)所发生的事情(二万人的联军部队进入北京)，无论如何也不意味着单独方针的改变，它在客观上也没有破坏维特-拉姆斯多尔弗的计划。首先，他们自己虽然欢迎把统帅职位交给德国，却根本不想使北京的事情拖到瓦德西到来时变成凶残的"暴行"。其次，法国人几乎拒绝承认瓦德西。直 259
到"拉姆斯多尔弗暗地告诉了他们，这个统帅职务是毫无用处的，因为在他率军队到来之前，要末我们已到达北京，要末中国政府已出面开始谈判"，也就是说，俄国外交界甚至宁可提前对北京的讨伐，只要能赶在瓦德西到来之前进行就行;① 只在那时，法国人才作了让步。

最后，没有任何理由认为联军"提前"进军是由于俄国的倡议。② 由于得知攻占北京的消息，尼古拉和库罗帕特金曾经产生了一些侵略性和"掠夺性"情绪的苗头，但维特和拉姆斯多尔弗及时抓住了这些苗头，并在1900年8月12日御前会议上按照他们的愿望作出了决定，从而打消了这些苗头。这些决定是：(1)关于从满洲撤兵的问题："一俟在满洲恢复了稳固的秩序，并采取了保卫"中东铁路的一切必要措施，即从满洲撤兵，"如其他大国的行动方式将不予妨碍"；(2)关于俄国使团和俄国军队撤出北京去天

① 见《红档》杂志，第14卷，第38页，维特8月6日的信，以及39页，8月10日的信("我们不等瓦德西和他的暴行")。法国直到1900年8月1日(14日)才答复柏林，表示同意对瓦德西的任命，见《德国外交文件》，第16卷，第91页。参见《红档》杂志，第14卷，第24—25页，俄国驻巴黎大使7月29日(8月11日)的电报。

② 大家一致确认，由于雨天和兵力不足，九月以前是不可能进攻北京的〔见《红档》杂志，第14卷，第22页，威廉7月24日(8月6日)的电报；第18卷，第39页，维特8月10日给西皮亚金的信；并见前引马士的著作，第265页〕。占领北京对于拉姆斯多尔弗和维特说来完全是出乎意料的事，于是他们指责库罗帕特金背着他们("自己还是奉旨？")向利涅维奇发布了进军北京的指令〔见维特8月10日的信〕。但参见前引马士的著作，第267—268页：7月底，英国司令的倡议得到美国司令谢菲将军的支持，因为根据美国驻北京公使康格的要求，从华盛顿对谢菲将军发布了相应的指令。并且美国人和英国人得以克服了日本人和俄国人的消极性。并参见《德国外交文件》，第16卷，第92页注释。

津的问题，以及“一俟”中国的合法政府“重新掌权”，便立即开始与其进行谈判的问题。[1] 关于中国本部，据所知，在俄国政府中往后再没有发生过意见分歧。8 月底已经开始把军队撤出北京，在瓦德西 1900 年 10 月 4 日(17 日)到来之前，直隶舞台上已经没有参加国际惩伐性远征的俄国军队了，而这种远征却直到 1901 年 4 月才结束。[2]

我们看到，希望乌赫托姆斯基能在驻北京的外国使团被解围以前就与李鸿章举行会晤的打算，同指望由于李鸿章的干预就可避免在满洲发生军事行动的念头一样，原来都是错误的。这一次也是这样，俄国在 1900 年 8 月 12 日的照会中向各大国作出了从北京撤军的建议，其用意仍是指望产生这样的外交效果：使俄国在中国政府心目中不同于其余外国政府。不出所料(而且可能彼得堡也正希望这样)，所有外国政府都表示不同意俄国的建议，连法国人也不除外。[3] 在这一建议以前，8 月 3 日(16 日)，从俄国方面曾提出抗议，反对海军将领们关于如果李鸿章到达大沽，禁止他与岸上进行任何联系的那个众所周知的决定。因此，俄国的建议就更显得可疑了。俄国 8 月 12 日的建议被人理解为是俄国已经
261 与李鸿章达成了某种协议的标志，根据这种协议，俄国为了换取在满洲的行动自由，有义务支持李鸿章的外交把戏，虽然谁也没有承认这位中国政府与列强进行谈判的全权大臣。[4]

① 见维特 8 月 10 日给西皮亚金的信，《日俄战争的序幕》第 118 页及以下各页，及《红档》杂志，第 14 卷，第 28—29 页，俄国政府 1900 年 8 月 12 日给各国的同文照会。

② 见《日俄战争的序幕》，第 110 页，以及前引马士著作，第 315，317 页。法国人参加了惩伐性的远征，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通常是和李鸿章进行了协商的。

③ 前引马士著作，第 306—307 页。参见俄国驻巴黎大使 1900 年 8 月 15 日(28 日)的电报(载《红档》杂志，第 14 卷，第 29 页)，并见《德国外交文件》，第 16 卷，第 4627、4628、4638、4639 号。

④ 见《德国外交文件》，第 16 卷，第 4613 号〔拉姆斯多尔弗 8 月 3 日(16 日)的电文〕，第 4625 号注释(威廉在拉多林公历 8 月 30 日电报上的那些批语)。参见前引马士著作，第 306 页。李鸿章是在 7 月 27 日(8 月 8 日)被任命为谈判的全权大臣的(同上，第 272 页)。

对俄国认为军事行动在中国已告结束的提案，对在惩办流血事件的"肇事者"之前有可能与中国政府开始谈判的问题，对承认李鸿章的问题，对于这三个问题，德国都采取了特别强烈的否定立场。只是到9月下半月，借助于法国人的帮助，才找到了一个公式，以它为基础，然后列强又经过长时间讨论，方拟成了"联衔公书"①。直到1900年12月9日(22日)，列强才将该项照会提交中国政府。②

中国随即于1900年12月13日(26日)无条件地接受了联合照会中提出的条件。但是研究细节和签订所谓《辛丑条约》的程序又拖延了九个月，直到1901年8月25日(9月7日)才结束。③俄国外交界与别国一样参加了这一程序，"与其他大国并无区别"，并且直到最后还保留有"随时提出自己要求的可能性"。对中国说来最基本和最可怕的是赔偿列强的损失这个问题。它也是公使之间商谈最久的问题。它是这样解决的：有关俄国方面，拉姆斯多尔 262
弗以后可以把1900年俄国的军事远征作为"最够本的战争"的罕见例子来谈论。④但这也并不意味着，俄国外交界既然同意了12

① 原文作《联合照会》。——译者

② 见前引马士著作，第330—340页。参见《红档》杂志，第14卷，第25、27、28、29、32、39、40、42、43、44、47、49各号关于义和团暴动的文件；并参见《德国外交文件》，第16卷，第4614号(威廉表示："如果李鸿章在大沽或直隶落入我们手中，我们将扣留他作为人质")，第4615、4618、4622、4623号。在获悉关于扬子江流域义和团的最初消息时，6月6日(19日)，威廉就表示赞成"共同性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以便"把北京夷为平地"，并"乐意"准备让其将领担任统帅的职务，见同上，第4527号。

③ 见同上，第342页。8月25日(9月7日)的辛丑条约见《远东事务的条约和其他外交文件汇编》，第459页及以下各页。

④ 见同上，第343页。参见第120号卷，拉姆斯多尔弗的简要报告。由于沃加克在1903年5月7日的会议上宣读了一份关于1902年3月26日条约在满洲问题发展中的意义的报告，拉姆斯多尔弗才撰写了这份报告。赔款总额是四亿五千万两银子，俄国应得其中的百分之二十八点九七一三六，即一亿三千零三十七万一千一百二十两，或(按市价每两银子兑换一点一四二卢布)一亿八千四百零八万四千零二十一点四四卢布(见第93号卷，第7部分，第30面，1905年7月编纂的应付给俄国的战争赔款统计表)。维特算了一下，1900年军事行动造成的全部损失和费用是一亿七千万卢布(见第12号卷，他1901年5月28日给拉姆斯多尔弗的信)。其中七千万卢布是中东铁路的损失，而一亿是直接的战争费用。

月9日的联衔公书，或者8月25日的辛丑条约，它就再也不想"单独"消除1900年事件在俄中两个盟国(1896年结成的)关系中造成的"困难"了。根据英美两国的倡议，在一段时间内可能要用对中国财政管理实行国际监督的办法来解决赔款这个基本问题；而在此事中，维特从一开始就为俄国保留了隐蔽的行动自由，他在1900年10月11日提出建议，企图与中国政府"单独"缔约，用各种"价值相当的特惠"来抵销赔款(在当时情况下，这笔赔款是会顺顺当当地包括在行将达成的共同协定中的)。① 问题只在于，中国政府可能提出哪些"特惠"。在乌赫托姆斯基到达中国之
263 前，关于北京本身的问题有关大国已共同用"提前的"武装行动加以解决了。此后，就这些特惠达成协议就成了乌赫托姆斯基出使的唯一使命。

III

乌赫托姆斯基是1900年9月16日抵达上海的。当时李鸿章已到天津，但列强暂时还没有开恩承认他的外交全权，于是，他只好坐等进入北京就任直隶总督的机会。② 在上海等候乌赫托姆斯基的是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他曾于1896年到过俄国，并在那时密切参与了有关他父亲达成的那笔交易的谈判。李经方和乌赫托姆斯基初次会见，就照他"父亲的吩咐"，"说，中国将使我们如愿

① 关于英美两国财政监督的图谋，见《红档》杂志，第14卷，第39页，格尔思1900年10月9日(22日)发自北京的电报，以及第75号卷，第1部分，璞科第同年10月21日(11月3日)的电报。维特1900年10月11日《关于行将与中国举行的和谈问题》的奏折，见第75号卷，第1部分。维特列举了"延长铁路租让权的期限、购买关东省等项"作为这些"特惠"的例子。关于财政问题的谈判详见《日俄战争的序幕》，第122—123页和128—131页。

② 见第75号卷，第1部分，璞科第9月16日(29日)发自上海给维特的电报，并见前引马士著作，第251和305页。李鸿章是在公历10月3日进入北京的，而公历7月9日(应为8日——译者)的上谕就已任命他为直隶总督了。

以偿，心满意足，并要付给我们一笔极大的赔款，但要使赔款采取这种形式，以便不增大其他大国的贪欲”。需要俄国做的只是：它“在用武力[1]占领中东铁路时”，宣布“原则上”“慷慨地不把全地区（即满洲）据为己有”，因为“这将在共同的谈判中给中国政府一种支援”。李经方除了答应“向我们分期偿付战争和破坏造成的损失外”，还声明，中国准备“把与我国毗邻的蒙古和喀什噶尔的资源无条件交给我们开发经营，并准许俄国往那里大批移民，用一些虚构的私人公司的招牌把给予俄国政府的租让权掩饰起来”。[2]这样，俄中两国“完全独立的谈判”暂时以纯粹私人的方式开始了，俄国外交界是“绝对”不打算“让其余大国对此进行任何干涉的”。[3] 264

然而，此刻的政治形势还是完全不利于和中国中央政府进行事务性谈判的。当北京街上刚一出现外国军队的时候，朝廷为了躲避外国军队立即跑到了太原府。它不仅不考虑返回北京，而且现正准备从太原继续向西南方跑，到西安府去。它仍“对外国人抱着不可调和的感情，情愿在远处和他们进行谈判，指望在这种条件下，政府以后较为容易拒绝其代表可能承担的义务”。“端王一伙”在朝廷里依然操持着大权，而庆亲王和李鸿章这两位全权大臣的影响则“等于零”。在有经验的人看来，唯一适宜的事情是：“要立即设法保障我们（俄国人）在严格确定的区域内的利益，（通过阿列克谢耶夫将军）直接与各省官员交涉”，以便以后能把这些与各省将军分别订立的地方性协定，“纳入我们将来”和中国中央政府缔结的“条约中”。璞科第也建议说，“不要追赶幽灵般的中国中央政

① 原文为 manu militari。——译者

② 见第75号卷，第1部分，乌赫托姆斯基1900年9月18日（10月1日）发自上海给维特的电报。

③ 尼古拉9月13日批准了一项决定：将涉及各国的共同问题的谈判与涉及“调整将来俄中关系”这一局部问题的谈判同时进行。见《红档》杂志，第14卷，第35页，拉姆斯多尔弗发往北京给格尔思的电报。

府，现在它在各省已威信扫地”，“不要管它”，等着朝廷回銮北京吧。①

无论如何，在这种情况下与根本不担负责任的李经方继续谈
265 下去是绝对不值得的。何况这个中国人已经两次“痛责”乌赫托姆斯基，“没付第二笔款子”（按照 1896 年 5 月 23 日莫斯科议定书）。这就使乌赫托姆斯基想到，“如果和李鸿章的谈判能具有最微小的实际意义”，那末，“为了往他嘴上抹点油，现在就付一点钱，即使是微不足道的一笔款子，也是必须的，② 不然，老头子会不相信，我们打算在某时，即便是逐渐地、按他效劳的程度来履行诺言（三百万卢布如数付清）”。③ 但是，就是李氏的租让建议本身，也有明显的不周到之处，因为它仅仅讲到蒙古和喀什噶尔，而没有涉及满洲。

彼得堡也警觉起来了。在乌赫托姆斯基亲自和李鸿章举行会晤，并“弄清他（李）在行将举行的谈判中担任什么角色，以及总的事态”以前，彼得堡禁止“付给任何巨款”。彼得堡还以“所发生的事件破坏了李鸿章自己的全部承诺并给我们带来了巨大损失”为遁词，急忙改变了原有承诺的条件。维特现在要求，“目前李鸿章应尽力补救已发生的一切，以此挣得由于皇上的恩赐，由我答应的东西”。④“李氏贪婪的儿子”马上表示愿意接受这些新条件，只要能立即抓到钱。李经方“赌咒发誓地”担保，倘若乌赫托姆斯基先给他

---

① 见第 75 号卷，第 1 部分，璞科第 1900 年 9 月 20 日（10 月 3 日）从上海发给维特的电报。

② 原文为 conditio sine qua。——译者

③ 见第 51 号卷，第 1 部分，乌赫托姆斯基 1900 年 9 月 23 日（10 月 6 日）从上海发给维特的电报。

④ 见同上，维特 1900 年 9 月 25 日给乌赫托姆斯基的电报。维特在电文中说：“李氏妄自向我要求，说我没有履行诺言，这是完全不对的。因为所发生的事件破坏了李鸿章本人的全部承诺，并给我们带来了巨大损失。”针对维特的话尼古拉批道：“当然”。

"弄到"五十万，他就拿着钱去向太后的亲信们炫耀，促使太后回銮北京"等待更大的赏赐"，并"在满朝官员面前为有利的谈判奠定基础"。[①] 乌赫托姆斯基已经要开始就款项问题进行讨价还价了，维特却坚持认为，李氏"在目前情况下不可能对朝廷发生大的影响"，266
他只是"在愚弄我们"，于是不让讨价还价，从而使李经方"大失所望"。[②] 时过一月，事情仍毫无进展。

10 月 20 日，当璞科第和李鸿章在北京举行首次会晤时，乌赫托姆斯基才经由旅顺口到了天津，就在这时，编纂《俄国政府监理满洲原则》的工作正在彼得堡全速进行。这些原则应成为璞科第所建议的与各省将军的单独协定的基础，然后再转载入与中央政府的"将来条约"之中，并应在俄国占领的整个时期内有效。

事情是从盛京省开始的。9 月 24 日，库罗帕特金询问阿列克谢耶夫，他以为怎样才能"最可靠和最迅速地恢复盛京省的秩序"。库罗帕特金一开头就指出，"应当重新恢复将军对该省的行政管理，他有权拥有马、步巡捕，而无权拥有军队"。但他在说明自己询问的原由时，已经不是以个人的名义，而是借口说，"现有一种设想，认为不管通过北京进行的谈判如何，开始与各将军分别举行谈判是可能的和可取的"。

日期的对照使人想到，这一倡议是来自维特的。9 月 23 日，维特向尼古拉呈递了璞科第同月 20 日关于刻不容缓地同各省官 267
员进行交涉的电报，沙皇在电报上批道："此处颇多正确主张"，而库罗帕特金打电报给阿列克谢耶夫是在 9 月 24 日。阿列克谢耶

① 见第 51 号卷，乌赫托姆斯基 9 月 29 日给维特的电报。乌赫托姆斯基回答说，他凭良心不能再提起这笔款项，并认为俄国暂将同意的最高数额是二十万。要是李鸿章"本着我们的精神办成交涉"，他可以"指望多给他们（父子俩）一些"。

② 见同上，维特 1900 年 9 月 29 日给乌赫托姆斯基的电报与乌赫托姆斯基同年 10 月 16 日的电报。其中说道："在婉辞拒绝和李经方谈论金钱问题后，他大失所望，李鸿章经常性的问候现在也突然中断了"。

夫回答说，进行这种谈判"完全符合当前局势，并将有助于实现我们在满洲的使命"。他还指出下列三点是可取的：(1)"尽可能保持盛京省的现存行政体制，如无特殊需要，对将军属内行政事务不予干涉"；(2)指定在将军处供职的陆军部和外交部的全权代表；以及(3)根据俄、中双方的相互协商任命将军。阿列克谢耶夫的这一"意见"，既被中东铁路代表认为是"最好的决定"，又为维特所"完全赞同"①。1900年10月27日，盛京将军的代表们与外交官员科罗斯托维茨签订了相应的初步协定，它在11月13日为将军和阿列克谢耶夫所批准。这时，连拉姆斯多尔弗也觉得协定条款是"令人满意的"。②

由此可见，1900年10月27日《初步协定》所包含的内容，废

① 璞科第从北京发第一封电报是在10月21日（见第75号卷，第1部分）。乌赫托姆斯基指望10月17日由旅顺口到达天津，他从北京发的第一封电报署的日子是公历11月6日（见第69号卷，罗曼诺夫10月17日发往雅尔塔给维特的信和乌赫托姆斯基11月6日发自北京的电报）。库罗帕特金9月24日给阿列克谢耶夫将军的电报，阿列克谢耶夫9月29日给库罗帕特金的电报，基尔什曼工程师10月3日发自旅顺口的电报以及维特10月4日给库罗帕特金的信，均见第67号卷，第1部分。

② 见第67号卷，第1部分，拉姆斯多尔弗1900年11月18日给维特的信。在马克谟的《与中国签订的及有关中国的条约和协定》第1卷第329页上载有该协定的文本，但那纯系臆造。我们将外交部1901年1月3日存送财政部办公厅的一份协定副本（见第67号卷第1部分）全文照录如下：

初步协定

国君皇帝愿保持和中国的历来友谊，认为可在帝国军队占领的盛京省恢复以将军为首的原有行政管理，所以国君皇帝欣然授权关东省首席长官阿列克谢耶夫将军，与增祺将军就缔结协定事宜举行谈判。

现因道台周冕、知州瑞安和知县蒋文熙已由将军授予谈判全权，到达旅顺口，阿列克谢耶夫将军亦授权其属下外交官员科罗斯托维茨，与上述官员商定下述初步章程九条，并代替首席长官画押钤印，然后将章程各自呈请阿列克谢耶夫将军和将军双方签字盖印，予以批准。

第一条、将军回原任管理省务后，应负责维持省内治安，务使兴修中东铁路，毫无拦阻损坏。

第二条、盛京省城等处，将由俄军驻防，一为保护修建中之铁路，二为安定地方秩

止了中国在南满的军权(在营口连民政管理权也被废止了)，并把将军变成了向俄国军事指挥官负责、维持地方治安的工具，亦即明显破坏了中华帝国的"独立"与中国中央政府的主权。但是，这一 269
协定作为一种临时性的、而又不定期的措施，在俄国政府中并没有引起不同意见。

1900 年 10 月 31 日，在三大臣会议上，《俄国政府监理原则》同样被一致通过了。这些原则已经涉及到了满洲所有三省。根据这次会议记录的决议判断，会上通过的这项文件具有双重作用：(1)作为"此种监理的条例"，似乎是政府对自己作的一项训令，阐述了在被占领地区俄国政府实际获得的政权的实施界限与方法；(2)形成一个提纲，关于这一提纲，"必须力求使其基本原则""(在

序。将军及地方官等，应与俄军以礼相待，并随时尽力帮助，比如住宿处所及采买粮料等事。

第三条、盛京省华军既参预叛逆，拆毁铁路，应由盛京将军收缴其军械，一律拆散，如不抗缴，前罪免究。至俄军未得之军器库、枪炮及一应军器弹药，统行转交俄军当局处置。

第四条、俄军未经驻扎之盛京省各处，凡有炮台、营垒等工事，应由中国当局偕俄国当局代表前往当面一并拆毁，若俄军当局不用火药库，亦照前法销毁。

第五条、营口等处，暂设俄国民政管理机关，俟俄罗斯帝国政府查得地方确实太平，再许调换中国官署。

第六条、为直接维持盛京省各城镇治安，将军有权设立马、步巡捕，但不得用炮，统归将军直接指挥，其余屯堡，亦一律照办。人数多寡，携带枪械，另立专约商定。

第七条、将军之下应设俄国委员一名，以便办理和关东省首席长官往来交涉事件。凡将军所办要件，该委员应当明晰。

第八条、如将军设立的马、步巡捕，遇保卫水陆边界地区，或保障内部治安，不足于用，将军有权通过上述俄国委员，转请俄罗斯帝国军队长官。

第九条、前八条遇有不同解释，以俄文为准。

以上初步条款，增祺将军回省之日，始能生效。嗣后将军、关东省首席长官，或遇两国政府认为必要，应须添改之事，再行商议酌改。

1900 年 10 月 27 日签订于旅顺口。外交官员科罗斯托维茨和中国全权代表们签字。

(以上为原作者注。参见《清季外交史料》，第一四四卷，第十七页，《暂且章程九条》。——译者)

涉及中国的范围内)载入我们行将与中国缔结的协定"。①

库罗帕特金提出的这份文件草案共有十五条，这些条款是可以原原本本地载入俄、中双边协定的文本中的。其内容如下：第一条、满洲作为"中华帝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应保持原有的行政划分与管理秩序；第二条、"为了确保平安"并"保障中国政府履行其对
270 正在修建中的铁路及通往旅顺口支线应尽的义务"，俄国军队"临时"占领满洲；第三条、"考虑到现时中国军队对建立和维护满洲的秩序并无好处"，中国政府不"在满洲驻扎其军队"；第四条、"除军队指挥权外，保留将军与副都统原有的一切权力"；以及第五条、"在铁路线以外地区"建立不使用大炮并没有外国人参加的巡捕。

库罗帕特金的下列条款表述了俄国在满洲的军事和外交机构的权力与义务：第六条、阿穆尔军区司令在黑龙江与吉林两省，关东省首席长官在盛京省皆有权"监督将军和副都统的活动"，并有义务"协助他们恢复和维持秩序"；第七条、"军队司令官"的监理事项；第八条、军队司令官有义务协助地方当局的一些情况；第九条、将军属下的军务委员的职责(与将军交涉有关俄军的一切事务，并监视不让恢复中国军队与不扩大巡捕，以及第十条、外交代表的职责(就不属于军务委员管理的一切事务与将军办理交涉，保护俄国臣民与俄国企业)。

最后，库罗帕特金草案的其余四条规定：第十一条、设立军事法庭，审判那些因"袭击我军或以行动侮辱我军事长官"而犯罪的"当地百姓"；第十二条、"根据中国政府与我国驻北京公使的协定"委任将军和副都统；第十三条与十四条、军队司令官与将军的交往概不涉及"政治性问题"；以及第十五条、进行监理的"本原则""在整个占领期内"有效。②

① 见第67号卷，第1部分，10月31日会议记录。

② 见同上，库罗帕特金签署的1900年10月30日的草案原件。在《日俄战争的序幕》第139页上总括地复述了《俄国政府监理原则》的定稿。

库罗帕特金的草案没有对中东铁路的合法地位作出任何规 271
定。维特就中东铁路问题对这一基本草案作了补充，这就篡改了草案的外交形式与本质，因为很明显，这些补充不是要确定铁路与重新恢复的中国民政管理机关之间的关系，而是铁路与俄国占领者政权之间的关系。从这些补充条款中，有三条插在库罗帕特金草案的第二、三条之间，这三条内称："中东铁路的建筑与营业在西伯利亚铁路委员会的最高领导下与财政部的监督下进行"（第三条）（按定稿本的编号）；铁路的地方管理当局有权"直接"与中国地方当局，直至将军进行联系，或者请外交代表协助，或通过驻北京的董事向俄国公使求助（第四条）；护路军作为"隶属于其长官的""特别部队"，其关系"将照边防军的独立军团与军事当局间关系的那些原则来确定"，"在此以前"只有在"用于作战"时，它才受军队司令官管辖（第五条）。可见，这三条的用意都是在军事占领的局势下为中东铁路划出一种独立于军事当局的地位。而第四条被维特安插在库罗帕特金草案的第六、七条之间，这一条认为，俄国军事当局有责任"对铁路管理当局给予可能的协助"。① 《原则》的最 272
后定稿是库罗帕特金的全部条款和维特全部条款的机械结合，仅有一点除外：库罗帕特金建议的《原则》的有效期是"在整个占领期内"，而维特建议代之以"与中国政府签订最后协定前"作为期限，维特的提法被采纳了。现在可以确切断定，维特这一替换的用意在于，不使与满洲的军事体制和军事部门领导权相联系的"特殊措施"的有效期延续下去，同时又使对满洲的"临时"占领一有需要即

① 试把财政部办公厅对库罗帕特金原件所作的手写的修改和补充意见与通过的定稿进行比较，此两件均见第67号卷，第1部分。上面没有提到的维特的两项补充条款（最后定稿的第十五与十八条），只是把库罗帕特金的稿本说得更加准确一些：第十五条、关于军事长官与三个省城以外的官员"直至副都统"进行交涉的问题，以及军务委员不在时，在三个省城与将军直接交涉的问题；第十八条、关于将军和副都统与省长和县长地位同等的问题。在关于把当地百姓送交军事法庭这一条中，采纳了维特的补充意见："在认为必须的情况下"。

可延长“多年”。①

因此，就是对于《俄国政府监理原则》（它丝毫没有背离维特感到满意的10月27日《盛京协定》），也未必可以毫无保留地断定，它“是在陆军大臣影响占优势的情况下拟成的”。因为凡是维特想
273 要补充和修改的一切，都毫无例外地载入了原则的内容中。② 只有拉姆斯多尔弗有保留地签署了10月31日的会议记录，他写道：“同意，（在签订最后协定时）至于酌情确定在满洲的中国军队问题，但望能够提出较不绝对的要求”。然而，在拉姆斯多尔弗之后签字的维特不赞同这一保留意见。③

随着彼得堡愈来愈确认这样一种主张，即可以撇开中央政府，通过和将军们的直接谈判，恢复满洲地方当局的民政全权，借此达成某种“临时的协定”，④ 俄国就不急于同中央政府签订“单独”协定了，相反，中国方面却急于签订这样的协定。如果让俄国在满洲三省中把化整为零地侵吞中央政府权力的活动加以发展和扩大，

① 见第67号卷，第1部分，上面提到的在库罗帕特金原件上的手写的修改。并见同上案卷，维特由于阿穆尔总督格罗杰科夫的电报而于1900年10月25日给库罗帕特金的信。阿穆尔总督在电报中建议，以库罗帕特金后来在10月31日提出的措施作为基础，将满洲归于阿穆尔总督管辖。维特表示赞成由关东省首席长官阿列克谢耶夫管辖满洲，并同意只在“与中国政府签订最后协定前”“实施特殊措施”。“因为占领可能延续多年，而在这整个期间内保持特殊措施是不适当的”。库罗帕特金在10月29日给维特的回信中对这两项主张都不同意。我们看到，关于满洲归属问题的意见分歧是折衷解决的（把满洲划分为两部分，分属关东的阿列克谢耶夫和阿穆尔的格罗杰科夫监理）而关于“特殊措施”问题，库罗帕特金的意见被否决了。

② 见《日俄战争的序幕》第139页的论点。在第67号卷第1部分中有一份财政部办公厅撰写的奏疏，它对库罗帕特金草案中的修改之处进行了说明。奏疏中所述的一切细节以后均纳入了补充和修改意见中，并在最后文本中采用。只有奏疏的最后一项要求〔在文件的标题中加上“临时的”（原则）一词〕未被采纳。既然《原则》的临时性质从第二条和最后一条都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标题的这一修改也未必会使事情的本质有所改变。

③ 见第67号卷，第1部分，10月31日会议记录和上面在正文中援引的库罗帕特金草案的第三条。

④ 原文为«временного modus vivendi»。——译者

那就等于丧失了整个地区，因此，无论如何也要使俄国外交界回到与北京进行协商的轨道上来，看来，这就成了李鸿章在当时和乌赫托姆斯基交涉中狂热努力的课题。老头子与格尔思和璞科第分别于10月20日和21日在北京举行首次会晤时，他就清楚了，事情即或不是发展为直接的吞并，也是在向着俄国取得对满洲的政治和经济保护权发展。格尔思直截了当宣称，“他认为必须将满洲原有的将军、副都统一概罢免，一般说必须规定，将来满洲将军、副都 274
统的任命非经俄国政府同意不可”。而璞科第则由于李鸿章的抱怨（李说难于对列强要求的付款作出担保）暗示他，可把中东铁路边界各站的关税收入“让与俄国经管”。李指出，“中国任何时候都不同意”出让“满洲的任何收入”，璞科第以威胁作为回答，说如果这样，“那我们就不得不保障我们认为适宜的我方利益，而不问中国政府的意向如何”。①

况且，就连维特本人（正如中国驻彼得堡公使本来对他了解的那样）原来也根本不打算随便地“在不久的将来撤离满洲”，只有“一切都已安定，并且我方所有的要求都得到履行时”，他才同意退出满洲。对于璞科第提出的中东铁路沿线的税关问题，维特甚至不把这看作是一项要求，因为俄国“从未将其交给中国政府”（！）②现在则通过乌赫托姆斯基向李鸿章作出了声明：俄国在单独谈判中的要求不仅“将归结为”“使铁路获得保障”，而且要“巩固我们在满洲的绝对势力”（正是在满洲，而不是在蒙古或喀什噶尔，我们看到，李鸿章本来想把彼得堡的独占欲望引向这些地方，还为此作了

---

① 见第75号卷，第1部分，璞科第1900年10月21日（11月3日）发自北京的电报。

② 见同上，璞科第1900年10月21日（11月3日）的电报。内称，中国驻彼得堡公使告诉李鸿章，维特声明“准备在近期内的将来撤离满洲”。并见同上案卷，维特10月25日给璞科第的电报。

尝试),并且"李鸿章正应在这里给我们以充分的协助"。[①] 既然如此,李鸿章就只好迅速地尽力把满洲已经开始的地方性谈判抓到
275 自己手中,并让俄国外交界就满洲问题作出正式表示,以此来损害俄国在别人心目中的名誉,并趁联军尚未来得及商妥对中国的"共同"要求时,使"联军"之间的关系复杂化。

在后一方面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建议乌赫托姆斯基作为与中国政府"进行和谈"的全权代表,这一招瞅准了乌赫托姆斯基政治上的低能(他竟准备同意!),可是在别的方面采取的步骤却是那样荒诞,因而仍然毫无结果。[②] 第二个方案是应俄国政府之请把清廷迁往盛京这一"清王朝的发祥地"。这个方案看来是乌赫托姆斯基自己想出来的,并得到维特赞同,但却被李鸿章婉言谢绝了。[③] 第三个方案似乎是直接回答彼得堡关于在满洲"巩固绝对势力"的要求的。李鸿章建议乌赫托姆斯基,"把那项条约(该条约以似乎纯粹的私人企业作掩饰、将蒙古和满洲各种巨大自然资源的开发权给予了俄国政府)交其政府批准"。但是,(1)该"条约"不应由乌赫托姆斯基一人去"交"(虽然他是华俄道胜银行的董事长,但他此时完全是以"私人身份"在中国的),"璞科第"这位俄国政府在北京的正
276 式代表应一起出面;(2)就在这时,"老头子秘密请"乌赫托姆斯基通知维特"一人",说"他本人想去满洲,以便运用他所知道的对将军有直接影响的一切手段来安抚百姓",他指望,"他到那里去将使

---

① 见第69号卷,维特1900年10月20日(11月2日)给乌赫托姆斯基的电报。电报回答了乌赫托姆斯基的询问:他在会晤时应向李鸿章提些什么要求。

② 见同上,乌赫托姆斯基1900年10月21日(11月3日)发自天津的电报,其中说:"由此所赢得的只能是我们双方的利益";以及维特10月23日的回电,维特认为"这可能产生一系列误会","是不可思议的"。尼古拉在乌赫托姆斯基的电报上批道:"可真是乌赫托姆斯基!!!"

③ 见同上,乌赫托姆斯基1900年10月23日(11月5日)发自天津的电报。维特10月30日给乌赫托姆斯基的电报和乌赫托姆斯基11月6日(19日)发自北京的电报。

朝廷相信，俄国没有领土贪欲，它只希望用必须数量的军队来占领铁路和城市；这将彻底消除中国政府的担忧：似乎俄国对满洲莫须有的吞并将引起对中国的瓜分，从而推动和谈"。①

李鸿章的这后一个设想首先被理解为，他企图"从我们和满洲官员那里捞到好处"，并造成一种态势，使俄国外交界"去对付较为刚毅的李鸿章"，"这比对付满洲的所有官员都要困难得多"。② 因此，维特认为李鸿章之行是"多余的"。而关于"各种资源的"开发垄断权的条约，维特起初认为是"十分有利的"，只要它为"清帝上谕批准"就好。在他的心目中这种垄断权不属于"一些"私人公司，而只属于中东铁路公司一家。③ 但到了第二天，维特忽然醒悟过来，这是不是一个圈套。于是他断然电告乌赫托姆斯基说，李鸿章之行是"不能容许的"，"在不知道别的大国将如何动作时，我们不能签订单独条约，否则将束缚自己的双手"。④

李鸿章的别有用心被维特正确地察觉到了，这从以后的事实可以明显看出。李鸿章继续"恳请""公开宣布，璞科第和乌赫托姆斯基奉旨弄清并解决与中东铁路的损失和与开发蒙古、满洲、喀什噶尔的资源等问题有关的……金钱和事务问题，作为对（他的）政府的通知"（"到那时，您所想要的一切，他李鸿章都将迅速办妥"），并务必通过中国驻彼得堡公使进行宣布。⑤ 维特向乌赫托姆斯基重申了自己的决定。为了堵死这条路，他又于 11 月 20 日下 277

① 见第 69 号卷，乌赫托姆斯基 1900 年 11 月 6 日（19 日）发自北京的电报。李鸿章想在城门外用盛大的仪式来欢迎乌赫托姆斯基，但他却已"通过别的城门"骑马进了城。就是没有这种欢迎，乌赫托姆斯基的北京之行也已引起了"外国人的无谓议论"。

② 见第 75 号卷，第 1 部分，璞科第 1900 年 11 月 7 日（20 日）发自北京的电报。

③ 见同上，维特 1900 年 11 月 9 日（22 日）给乌赫托姆斯基的电报。维特在电报中第一次说到，条约拟用中东铁路公司的名义。

④ 见同上，维特 1900 年 11 月 10 日（23 日）给乌赫托姆斯基的电报。两份电报都是维特亲笔写的。

⑤ 见同上，乌赫托姆斯基 1900 年 11 月 13 日（26 日）的电报。

令也向中国公使转告他的决定。这时，李鸿章仍然没有气馁（确实，尤其乌赫托姆斯基是不能把他抑制住的），他在向俄国提供在新"租界"全境内"拥有驻防军"的权利方面（"如果我们保留清帝政府的宗主权"），扩充了自己的建议，并就此问题奏陈了在西安府的朝廷。[①] 但未等那里答复，由于俄国驻北京公使的干预，事态便发生了李鸿章所希望的那种转变。

乌赫托姆斯基在长时间内关于自己和李鸿章谈判的内容既对璞科第保守秘密，也瞒着格尔思。只是在他最后确信，维特准备把他出使的一切成果都化为乌有，他要变成"在北京多余的人"时，他才向旁人求援。格尔思坚决主张，"鉴于庆亲王和李鸿章力图让我们尽早应许他们将满洲事实上归还中国的强烈愿望"，并鉴于俄国政府已经通过"决定"，"现在就在边区实行中国的民政管理、以此部分地实现他们的愿望"（增祺-阿列克谢耶夫 11 月 13 日协定），"现在就"应签订"在满洲"和"我们势力范围所及的全境内""提炼
278 矿产资源和建筑铁路的租让权"协定，"因为很可能以后将较难得到中国的同意"。[②]

格尔思的建议立即被拉姆斯多尔弗提交讨论，这就使"单独协定"问题摆脱了个人交涉的阶段。维特也急剧改变了方针，他表示，正是在列强与中国缔结和约之前，趁着瓦德西推行的"报复与恐怖政策"还在促使中国作出让步时，协定才是"适时的"。库罗帕特金同样没有反对。于是不到十天，单独协定的提纲已在彼得堡

---

① 见第 75 号卷，维特 1900 年 11 月 15 日（28 日）给乌赫托姆斯基的电报和维特 11 月 20 日从雅尔塔发给罗曼诺夫的电报；并见第 69 号卷，乌赫托姆斯基 1900 年 11 月 21 日（12 月 4 日）的电报。

② 见第 69 号卷，乌赫托姆斯基 1900 年 11 月 28 日关于和格尔思协商的电报，他还请求"允许回家"，"如果我对您肯定已毫无用处"。并见第 75 号卷，第 1 部分，格尔思 11 月 28 日给外交大臣的电报。在这份电报到达以前，我们既找不到格尔思、也找不到璞科第就李鸿章关于租让权的建议对彼得堡的任何通知。

准备就绪了。①

拉姆斯多尔弗在这里不得不考虑到某些意见分歧。但如果认为似乎当时在俄国政府里有谁想过、甚至说过关于向中国"事实上归还"满洲的问题，也就是恢复清帝政府的"宗主权"问题，那就大错而特错了。大家都同意满洲不应当并入俄国。② 但是三人也都坚持主张，单独协定应当"巩固"早在10月份就一致通过、现在(12月4日)又为沙皇批准的《俄国政府监理满洲原则》的效力。③ 而这就意味着，不经俄国同意，中国政府不得在满洲任命一名官员，在俄国边防指挥官所允许的巡捕数额之外，不得增加一名巡捕，兵部 279
不得调遣一兵一卒去保卫满洲边界，而在"归还给"中国的这一地区内，将驻扎俄国将军指挥的正规军和边防军这两种形式的俄国武装力量。我们看到，拉姆斯多尔弗早在10月已就中国在满洲有权拥有军队的问题写下了一条不同意见，他曾倾向于不要那么"绝对地"否定这种权力。但现在他不重提这一意见了。现在唯一的不同意见是维特提出的，但他也没有把它发展成原则性的意见，而仍然只是个数量问题。为了保障"俄国与符拉迪沃斯托克和旅顺口的联系"，库罗帕特金认为"保留我们在满洲的驻兵权问题具有首要的意义"，并建议，在1901年春以前把军队数目从二十八个营减少到二十个营，并在铁路"工程竣工后"，在哈尔滨、吉林、齐齐哈尔和奉天保持不少于八个营的军队。

① 见《红档》杂志，第14卷，第41页，库罗帕特金1900年12月3日给拉姆斯多尔弗的信，并见75号卷，第1部分，维特1900年12月5日的信。这封信尼古拉是12月12日在雅尔塔看到的，他没有对其中一字一句提出异议。与中国的单独协定的提纲草案的一份副本附在拉姆斯多尔弗12月21日的信中送到财政部，沙皇在雅尔塔批准这份草案是在12月13日，因而草案发往那里的日子不会晚于9日(第75号卷，第1部分)。

② 甚至库罗帕特金，见前面提到的他12月3日的信。

③ 甚至维特，见前面提到的他12月5日的信。关于尼古拉12月4日批准了《俄国政府监理满洲原则》一事，库罗帕特金是在12月4日的信中通知维特的(见第67号卷，第1部分)。

为了“不使人怀疑我们有征服性的意图”，“维特看不出有必要在满洲范围内保留陆军大臣建议的那个可观数量的军队”。虽然他也“预见到了”，“在一个不确定的长时期内”在满洲“保留我们的军队”（不管其数量多少），会引起这种怀疑，然而他却没有提出从满洲撤出全部军队的问题。而在一个多短的时期内在满洲驻军才不致引起怀疑呢，对此，维特自己也没有答案。① 于是，此刻意见分歧没有发展成争论。只是可以看到，维特所说的不是关于在满洲恢复中国军队问题，也不是要撤退俄国驻在别国领土上的步兵、骑兵
280 和炮兵武装力量问题，而是关于在任何情况下绝不会隶属于他维特（以及任何一位财政大臣）的这些军队在满洲的相对数量问题，而他却是现在和将来满洲的银行、铁路、轮船以及各种工业企业的总首领。看来，库罗帕特金担心文职大臣企图损害业已通过的《俄国政府监理满洲原则》的威望，于是，他急忙于 12 月 4 日将此文件送呈沙皇批准；维特也是这样，他为了设法用另一种武装力量来代替满洲的驻防军，也就在这一天迫不及待地奏请沙皇允准将中东铁路“护路军”从一万一千人扩充到一万六千人，并且电询尤戈维奇，是否还需要增加，他是否认为“需要在一个长时期内驻扎军队”，如果需要，那末“在什么地方？”“需要多少？”② 但是尤戈维奇的答复却不能使他满意。因此，在不把满洲“实际上交还”中国的情况下，怎样才能使人们不“怀疑我们有征服性意图”，维特对这个问题暂且仍不清楚。③

① 见前引库罗帕特金 12 月 3 日的信和维特 12 月 5 日的信。

② 见第 75 号卷，第 1 部分，维特 1900 年 12 月 4 日给尤戈维奇的信。

③ 见第 67 号卷，第 1 部分，克尔别兹、尤戈维奇、伊格纳齐乌斯与格尔恩格罗斯将军 1900 年 12 月 17 日发自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联名电报。照他们的意见，在和列强签订共同的和约以前，在朝廷返回北京、外国军队撤离中国、以及清帝批准满洲三位将军以前，在此后的三、四个月试验时期过去以前，从满洲撤出正规军的问题是无从谈起的。关于前此驻扎在奉天、吉林、齐齐哈尔、宁古塔、宽城子、铁岭、辽阳和松花江沿岸的正规军数目，他们认为“至少”有十二个营，其中有六个炮兵连。

至于说到赔偿俄国因“骚动和军事行动而遭受的损失”问题，那就根本没有什么不同意见。维特建议在单独协定中规定：(1)俄国有权要求赔偿(“与其他大国相当”)战争费用；(2)由中国偿付中东铁路、私人公司和企业以及个人的损失；以及(3)可以全部或部 281
份地抵销行将付给俄国的战争赔款的那些“价值相当的特惠”。而维特出乎我们意料地暂且把这些“特惠”确定得较有节制。维特要求：(1)中国有义务“不经我方同意不得在我们的势力范围所及各地”(即“在满洲、长城以北的中国全部地区、蒙古、伊犁边区与喀什噶尔”)“以本国的资金建筑铁路，不得向他国人提供铁路租让权及其他各种租让权”；(2)将长城以北的山海关铁路区段“交给我们所有”“以便续修和经营”，为此得到的酬金足以使中国政府结清因修筑该路欠汇丰银行的债务；如果这一点办不到，则给予从南满支线到长城的“往北京方向”的铁路租让权；(3)取消金州厅① 的自治，当初租借辽东时该地没有纳入俄国的行政管理系统；(4)将中东铁路边界各站的税关交给中东铁路公司经管；(5) 1895 年债款的偿还和利息的支付不采用半年付款，而采用按月付款的办法。②

我们看到，除了第三和第五两点外，维特说的是，在作为俄国利益范围的中国长城以北地区完全排除外国的租让权(“外国势力”)，他认为不必在单独协定中要求李鸿章建议的任何新的租让权。正如他自己所解释的，如果中国承担义务，在我们的势力范围内不但自己不建造铁路，而且也不让他国人修建铁路，“我们关于铁路租让权的利益”“就将得到充分的保障”。而关于“经营矿产资源的权利”，维特承认，“它只有在遥远的将来才能对我们具有重大 282
意义，因为目前俄国连经营本国的自然资源也感到资本短缺，因此我们恐怕没法筹措资金去开采中国的矿藏”。③

① 即金县。——译者

② 见第 75 号卷，第 1 部分，维特 1900 年 12 月 5 日给拉姆斯多尔弗的信。

③ 见维特 12 月 5 日的信。

这时根据拉姆斯多尔弗的倡议只提出了一项要求：在华北的陆、海军中不得聘用他国教官，这一条在1897—98年的谈判中就已提到过。要是上述那些条款再加上这一点，那就是尼古拉1900年12月13日批准的谈判提纲的全部内容。①

12月9日，驻北京的公使们向中国政府递交了列强的《联衔公书》，同日，格尔思奉命在北京为中国驻彼得堡公使谋求进行单独谈判的"最广泛的全权"。② 我们看到，谈判开始得稍晚了一些，而要在中国与列强共同媾和以前将其结束，谈判就必须从速进行。自然，把满洲"归还"中国同时又不从那里撤出俄军的问题，是俄国外交界在单独谈判中最感棘手的一点，而不商定期限的延期撤兵从一开始就成了它的唯一办法。在这一方面，英国关于"当中国尚
283 未屈从于"列强在《联衔公书》中向它提出的各项要求时，继续占领直隶省的建议，对于俄国外交界说来真是如获至宝。拉姆斯多尔弗12月9日给格尔思写道："稍微延长直隶的占领期"对俄国说来是"继续"占领满洲的"完全合法的根据"，俄国答应"只有当中国完全确立了秩序以后"，才从满洲召回军队；"在中国朝廷尚未返回北京时，就不能认为正常秩序的"恢复"是有保障的，而朝廷返回京城又只有在外国军队离开帝国京城的情况下才有可能"。③

抱着虽不"吞并"满洲，但仍要重新"巩固"俄国在满洲的"绝对势力"的目的，俄国外交界踏上了与中国单独协商的道路，它因此而置身其间的那种处境的主要困难并不是上面说的那些，这一点

① 见第75号卷，第1部分，前引的提纲草案。关于在满洲、直隶省和中国土尔克斯坦（即我国新疆省。——译者）的教官问题，见奥斯坚-萨肯1898年公历1月1日给比洛的《备忘录》，载于《德国外交文件》，第14卷，第1分册，第134—135页。《备忘录》甚至引证说，中国政府似乎"已正式表示承担义务"（dans les termes d'un engagement formel），同意在这一区域不聘用他国教官。

② 见《红档》杂志，第14卷，第46页，拉姆斯多尔弗1900年12月9日给格尔思的第2号电报。

③ 见同上，拉姆斯多尔弗12月9日给格尔思的第1号电报。

不久就清楚了。

IV

沙皇 1900 年 12 月 13 日批准的单独谈判提纲关于“保持俄国在满洲的驻兵权”的决定，对库罗帕特金是不利的。它保留了维特本人在这一问题上的种种含糊不清之处，(“也许是”)审慎地承认，俄国在满洲驻军只“在某个时期内”才是有“充分理由”的。尼古拉本人没有对提纲作出任何补充。而他的唯一问题是：“最好是否延长我们租借关东半岛的期限？”而在“探明有关部门的意见之前”，他也不想“预先决定”这个问题。曾几何时，这一问题作为可向中国要求的“特惠”的一个例子，也是由维特提出来的。同样连拉姆斯多尔弗也不相信，维特会局限于他提出的五项“特惠”的清单，而 12 月 13 日提纲毫不掩饰这样一种可能性：“我国财政部门”“预先”还要对从中国索取(“已被列入计划的”北京铁路除外)“各种租 284
让权”的问题，“加以详尽讨论”。① 确实，12 月 21 日，提纲已通知了大臣们以供审议，在新的一年的 1 月 9 日，中国驻彼得堡公使已有了进行谈判的全权，因而谈判地点问题的解决也使维特如愿以偿了，但谈判却依然不能开始。这是因为维特预期召集的“详尽讨论”需要时间，而在 1 月 9 日以前，拉姆斯多尔弗还没有任何一份准备就绪的、可向杨儒提出的方案。② 然而，详尽讨论的结果并不是一份普通的、“在行将举行的谈判中希望向中国政府协商取得的特惠的清单”，而是一份完全拟妥可供签署的、“由两部分组成的草

① 见第 75 号卷，第 1 部分，前引《单独协定的提纲草案》及尼古拉在草案上的批示。在《草案》中作了附带声明：租让权问题将重新讨论，“以便……只提出确实打算在最近实现的那些租让权要求”。关于获得辽东甚至永久占有的问题，参见本书边码第 262 页注，维特 1900 年 10 月 11 日的奏折。

② 见同上案卷，拉姆斯多尔弗 1900 年 12 月 21 日给维特的信，以及他 1901 年 1 月 9 日的信，维特当天给拉姆斯多尔弗的信。维特早在 1900 年 12 月 5 日给拉姆斯多尔弗的信中，就坚决主张在彼得堡举行谈判。杨儒是中国驻彼得堡公使。

案：(1)两国政府间的单独协定与(2)中国政府和中东铁路公司间的协定”，更确切地说，这是两份独立的、各自按照完备的形式拟定的协定草案，维特分别在1月9日和11日交给了拉姆斯多尔弗。①

285 维特从一开头就打算，要为中国政府提供一种可能性，使其无须直接向俄国政府“补偿”“由于骚动带来的费用”，然而又不是通过向俄国政府提供任何“特惠”的途径，而是采用把这笔债务转让给中东铁路公司的办法，由中东铁路公司负责把这笔款项支付给俄国政府，并把所付款项算在自己的“损失”的数目中(单独协定第九条)。② 但在中国政府与中东铁路公司的协定草案中规定，中国有义务③ 接受公司让其延期支付“损失”的要求。拟加统计的损失不仅有“大段铁路的毁坏”和“对铁路财产的抢劫”，而且还有铁路工程的“耽搁”(第一、二节)；对债务的本金要加算六厘的年息。按照1896年8月27日合同第十二款，在工程竣工以后公司应当付
286 给中国五百万两；这五百万两以及公司为向其提供“特惠”而应付

① 见第75号卷，第1部分：《各种特惠的清单》及其《说明书》，这两个文件是由希波夫和罗曼诺夫拟订的，维特在上面用铅笔写满了批注，作了许多修改，所署的日子是1900年12月28日；以及两份草案，草案的誊清稿附在维特1901年1月9日和11日的两封信中送往外交部。拉姆斯多尔弗在1月9日的信中通知说，中国公使已经得到全权，并请就12月13日提纲“作出决定”。维特在这封信上批道：“必须从速行事，大家等着我们”。维特拒绝把《清单》中的某些东西纳入草案之中，这些是：(1)停止与中东铁路竞争的辽河航运(“未必适宜”)；(2)把中东铁路先期赎路的期限从三十六年推迟为五十四年，把中东铁路无偿交给中国的期限从八十年推迟为一百二十年(“这是以后协定的课题”)；(3)在直隶省开平附近向中东铁路提供一平方俄里的地段以供采煤(“我们闯到那里去未必方便”)。另一方面，维特又“命令”将“在满洲全境实行免税贸易权”这一条纳入清单，但人们向他解释说，与中国接壤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这种权利(见同上案卷，第188面，有关这一问题的材料)。

② 两国政府的《单独协定》草案分为“条”，中国政府和中东铁路公司的协定草案分为节(§§)。下面我们准确地运用这种记号。

③ 当然，这一点在第二节中的正式说法如下：“考虑到中国政府难于一次付款”，公司“同意延期付款，等等”。但草案没有为中国提供任何别的办法。

给中国政府的所有款项，现在都用来抵销这笔债务了。①

对于俄国私人资本向中国的矿产开采、铁路建设与“各种”工业企业进行投资的可能性，维特这一次的估计仍然是悲观的。因此单独协定第十三条仅仅使中国承担义务，不仅在满洲，而且在蒙古以及喀什噶尔、叶尔羌②、和田与于田各地区也不向他国人“提供”此种租让权，并且中国本国也不建筑铁路。但对于中东铁路公司，维特并不因为对一系列这类新企业进行投资和增加对旧有企业的投资需要依靠国库而退缩，他为公司要求以下“特惠”：(1)盛京、吉林两省及黑龙江省小兴安岭南坡“无论官地还是私地的”“所有”金矿的开采权，以及在全满洲所有石油与镍矿的开采权(第三节)；(2)在公司的“铁路区域内”“全部煤矿的”开采权，而且在沿铁路十俄里的地带内与公司矿区五俄里的范围内不许任何其他企业家经营(第四节)；(3)“五年之内”在鸭绿江流域“选择”具有“良好建筑用材”的二千平方俄里地段的权利，并有权在该处敷设铁路、电报与电话线路(第五节)；(4)将中东铁路沿线十俄里地带内的全部土地统统交与公司(私人土地照市价赎购)(第六节)；(5)在秦皇岛、营口，鸭绿江口以及“江口附近的一个岛上”拨给公司地段，以建筑码头、货栈、油站和住宅(第七节)；以及(6)将南满铁路到营口的临时支线改为固定线路(第八节)。而且，在划作建筑中东铁路之用的地区，亦即根据1896年8月27日合同第五与第六两款规定，作为基本的铁路“租界”组成部分的地区属于公司的“全部权利”，也适用于所有上面列举的地段，于是现在铁路“租界”的面积就几乎扩大到了三万平方俄里。③ 287

① 在赎回铁路时，所有尚未偿付的债款连同其增殖的利息应全数付给公司，“在根据此项债款应缴的全部款项尚未付给俄国国家银行之前”，中国将不得占有铁路(第二节)。

② 即莎车。——译者

③ 见本书边码第126页和127页。

这就是中国与中东铁路公司“关于赔偿由于满洲骚动而遭受的损失”的协定。事实上，这一协定的后果是使俄国国家预算在最近数年内承担双倍的重负：(1)放弃了以硬通货直接和有保障地归还俄国的战争费用；(2)维特希望看到自己的中东铁路公司成为一个国家“托拉斯”，目前为了使它飞跃发展，首先就大大增加了支出预算，增加多少，事前无法准确计算。① 这就是采纳了李鸿章 1900 年 11 月 21 日最后提出的有关“各种自然资源”及武装保卫这些资源的建议的后果。然而现在又补充了一项在新租界区域内的“管理”权。从 1899 年遭受挫折那时起，对于修筑一条“往北京方向到长城的”铁路线的要求(拟用中东铁路补充租让权的形式取得)，在维特的头脑中是根深蒂固的。如今它没有纳入与公司的协定草案中，而仅被包括在两国政府的单独协定中(第十四条)，这恐怕不是偶然的事。它不是无害于人的经济“特惠”，而完全是一项“政治”要求，其矛头指向英国是如此显而易见。在单独协定中还重复了其余给予中东铁路公司的“特惠”(第十条)，但恰恰是使这些“特
288 惠”也成为“政治性”要求的东西，周密地隐藏在与中东铁路公司订立的私家协定的有关条款中。这就是使若干新地区脱离中国统一的民政管理，将其变为铁路“租界”组成部分的修正意见。

关于不属于“托拉斯”的武装力量留驻满洲的问题，维特如今也作了十分明确的决定。这就是：他永远绝对禁止在满洲驻扎中国军队，并永远禁止把武器和军需品输入满洲(单独协定第四条)，而俄国正规军则随着托拉斯的基本企业——铁路工程的竣工，随着在下列路段上开始“正常运输业务”分三批撤出满洲，这些路段是：(1)从哈尔滨到边境站，(2)从哈尔滨到旅顺口，以及(3)从哈尔滨到满洲里；“在所有建筑工程全部竣工以后”，俄军也撤出哈尔滨

① 见维特 1903 年 3 月 14 日的奏折，载于我关于《李鸿章基金》的著作(《阶级斗争》杂志，第 1、2 期合刊，第 127 页及以下各页)。

(第二条)。自然,正如维特所解释的那样,这在事实上仅仅是把正规军撤到了满洲可能发生战争的舞台的幕后,因为在通车以后,这些军队可以在"不过一、二昼夜之内",从旅顺口,或赤塔,或符拉迪沃斯托克到达满洲任何地点的舞台上。① 而从国际观点看来,俄军撤出满洲根本没有使俄国政府解除武装,同时它却在一家私人资本主义托拉斯的伪装下,在满洲更深地扎下了根,这家托拉斯如今在自己手中不仅有国家政权的某些正式属性,而且还集中了它的军事与经济基础。把在铁路沿线和松花江沿江"中国政府将要设立的所有税关"交给俄国托拉斯"管理"(因而连收入也由它控制),这一点如今也出现在单独协定的第八条中,而连李鸿章都曾对这 289
项要求叫苦不迭。

第四条规定,只许将军在"已拨给"我们托拉斯"的以外的地方",而不是在满洲全境设立马、步巡捕,维持"治安"。《俄国政府监理原则》第十七条规定,"根据"中国政府与俄国公使的"协商"委任将军和副都统,这是库罗帕特金提出的。这一规定与如今维特单独协定第三条的提法相比就显得逊色了。维特为中国政府确定了一项"职责":根据俄国公使的简单"声明""立即罢免""直至将军在内的"任何官员。维持治安的"责任"现在不仅由将军担负(见增祺-阿列克谢耶夫协定第一条),而且还由副都统与"所有地方官员"承担。但是,有一条完全是新的要求,据我们所知,这是至今在俄国的满洲计划中未曾有过的要求,如今也被列入单独协定的第七条,这就是中国政府有义务(不仅向俄国臣民,而且不限国籍地)"以俄国钱币"征收"一切税收和捐赋"。② 自不待言,库罗帕特金在《原则》中所规定的在将军处供职的军务委员,维特只容许其"在俄

① 见第75号卷,第1部分,维特1901年1月9日给拉姆斯多尔弗的信。

② 1899年夏天,当璞科第问道,鉴于中国可能普遍采用银元,"在满洲即使不用银元,是否也应当千方百计地采用银两"。维特推托说:"此事现在难予决定"(见中东铁路公司董事会驻北京代办处档案第14号封套,《问题统计表》)。

军撤离以前暂时”存在。因此如今只有外交代表是保留在将军处的常设机构，这就使俄国政府有可能撇开北京政府正式与地方当局交涉，其中在是否利用代表帮助的问题上，中东铁路行政管理当
290 局享有完全的自由(第五条)。单独协定草案第六条规定，俄国臣民有权“在满洲各地进行贸易”，并购置必须的不动产，这一条纯粹是维特个人愿望的纪念品，维特想为俄国臣民取得在满洲的免税贸易权，他的这一想法在财政部里就引起了争论（见本书边码第284页注①)。由于“最惠国待遇的”原则，这一主张就意味着把满洲全境变成一个不仅对于俄国人，而且对于他国人也完全“开放的港口”，从而篡改了协定的全部基本意义，而协定的全部基本意义恰恰是要从满洲排除“外国势力”。看来，这是外交上的某种无知的结果，它在协定的后来几种稿本中无影无踪地、无声无息地消失了。① 维特又建议，把所有这一切算作是“在满洲恢复了中国政府的政权，满洲仍归中国版图，俄军占领前之行政体制和管理秩序一应照旧”(第一条)。②

事实上，维特草案中所包括的、旨在“巩固”俄国政府在满洲的“绝对势力”的广泛要求，不是一项恢复战前状态③ 的契约，而是逐渐缩小占领区域，并只从满洲完全撤出属于俄国陆军部管辖的正
291 规军(而不是所有俄国武装力量)的一项条约。维特草案其余部分的内容如下：第一、在垄断与限制北京政府对满洲的“宗主”权

---

① 关于外国人在“开放港口”的贸易权与最惠国待遇的原则，如见格里姆：《远东国际关系史的条约和其他文件汇编》，莫斯科 1927 年版，第 7—16 页。

② 关于在金州厅建立俄国的民政管理机关的要求与第一条是水火不相容的。它以中国政府悄悄“同意”“废止”1898 年 4 月 25 日(5 月 7 日）补充议定书第七条的形式，列在文本的最末尾（第十五条)。上面没有提到的单独协定草案的十一、十二和十六条包括了中国的下列义务：与华俄道胜银行就赔偿银行的损失达成协议，补偿私人的损失，对 1895 年债款的偿付由每半年付款改为每月付款。单独协定草案共十六条。

③ 原文为 status quo。——译者

的原则上巩固中东铁路公司的经济和政治实力；第二、将俄国"利益范围"正式扩大到中国长城外的一切地方。这一草案较之仅在一年前，即义和团暴动前夕穆拉维约夫拟订的远东计划是大大后退了。它所面临的国际局势或者赋予新计划以战斗性，或者使它根本不能实现。①

维特的草案在向中国公使提出之前又作了某些修改和缩减。谈判直到1901年2月7日才开始，而到3月11日已被中国政府中断。在德、英、日、美、甚至意大利的共同压力下，中国政府拒绝签订俄国提议的条约。1901年7月重开谈判，10月又暂停下来，而到1901年12月重又恢复。除了下列两点外，俄国的初衷在1902年3月26日(4月8日)俄中最终签订的协定中已荡然无存。这两点是：(1)关于"恢复中国政府权力"的宣言性的第一条；(2)中国遵守1896年8月27日合同、保护满洲的铁路及俄国臣民的安全的一般性义务，以及俄国分三期(每期六个月)从满洲三省"撤出全部俄军"的具体义务(第二条)。这后一项俄国的义务也只是大致符合于维特的先前意向，即在铁路的"全部建筑工程完工以后"结束占领。如果说这并未使俄国失去自己决定占领的最终时刻的可能的话，其代价也无非是我们熟知的那项履行这一 292
义务的附带条件，即："将不发生骚乱，而且其他大国的行动方式将不予妨碍"。

至于说到中国政府在满洲拥有自己军队的权利，那末，1902年3月26日条约第三条也违背了维特的草案。这一条正是从考虑到这种权利出发的，只是在时间问题上建议："在俄军暂未撤离"时，由俄国军事当局与将军"约定"军队的数目与驻扎地点，"撤军全部结束后"，凡"商讨"扩大或缩减军队数目问题，中国政府务必"及时通知俄国政府"，以避免"增加对两国都绝无好处的军需费

① 见本书边码第245页和219页注①。

用”。最后，条约第四条扼杀了维特关于修建一条“往北京方向的”南满俄国铁路的想法，或以山海关—营口—新民厅铁路的“续建与经营权”来“代替”南满铁路的意图，因为这一条规定，将俄军在战时占领的这条铁路归还中国政府。① 从李鸿章得以用“中国长城外各地的自然资源”为钓饵来诱惑俄国外交界进行单独谈判之日起，在十六个月之内，维特草案中用来“巩固”俄国在满洲的“绝对势力”的其余的一切，都逐渐丧失了。

从1900年6月26日到1902年3月26日，俄军对满洲的占领继续了整整二十一个月，这种占领仅仅基于征服之权利，而并没有为与北京政府签订的任何条约所批准。这种无限期的、自然显
293 得“无休无止的”占领拖延得愈久，满洲问题对于俄国就愈容易变成尖锐的国际冲突的主题，俄国与日本由于满洲而引起的军事冲突的正式准备也就完成得愈快。

V

早在1900年夏天，当维特忙于平息库罗帕特金与尼古拉不仅对中国、甚至对朝鲜的好战本能的激奋时，他最担心的是：可别按照“你们取得满洲，我们就要朝鲜”的公式与日本发生冲突。②占领北京以后，他总算把两位军人限制在8月12日提纲的框框之中了，并且尼古拉也答应，即使日本“闯入朝鲜”，也“按兵不动”。但就在这时，日本还是象“魔影”一样使他担心。他并不害怕“与欧洲列强关系复杂化”，他只怕日本“闯入朝鲜”，这是“从实质上（尽管

① 如同维特在1901年1月16日给拉姆斯多尔弗的信中所解释的（见第75号卷，第1部分），他认为北京铁路的租让权是“协定最重要的目标之一”，“这不是为了利用这一租让权，而是为了以此作保证，达到把山海关—营口—新民厅铁路转归我们所有的目的”。1902年3月26日条约见《远东事务的条约和外交文件汇编（1895—1905年）》，圣彼得堡1906年版，第538页及以下各页。

② 见维特1900年7月14日，8月6日和10日给西皮亚金的信件（《红档》杂志，第18卷）。

尼古拉许诺过'按兵不动')令人不愉快的事",因为它可能"激励我们"。于是,维特当时想出了一个主意:"提出一项关于朝鲜中立化的建议"。[①] 在外交上事情变成这样:中立化问题由朝鲜自己提出,而俄国外交界则利用既成事实,询问日本政府,它是否认为"通过与俄国直接协商的途径"来解决朝鲜问题较好。[②] 如果说拟议中的交易的实质应在于:俄国方面在朝鲜作出某些让步,使它在满 294
洲能在某种程度上放手去干,那末,这恰恰没有得到成功。1901年1月9日,拉姆斯多尔弗收到了日本的复照,内称,在满洲恢复"战前状态"[③] 之前,日本认为朝鲜问题还是稍待时日为好,以便在讨论这一问题时,能"不受与本题无关的考虑的影响"。[④] 这一警告对于彼得堡还是十分及时的。俄国不仅没有同时建议满洲中立化,而且正按维特的办法在满洲驻扎下来,在这时,是不能向日本提出朝鲜中立化的建议的。

第二个警告与德国方面对俄国态度的重大变化有关。俄国外交界在1900年中国事件中采取的单独政策(特别是俄军撤离北京),看来使两位皇帝的"私人协商"受到了一个打击。因此,1900年10月3日(10日)德英两国签订了所谓的《扬子江协定》[⑤],这可以看作是柏林内阁敌视俄国的新方针的征兆。[⑥] 而彼得堡却认

① 见《红档》杂志,第18卷,维特未署日期的第10号信(1900年9月18日左右)。照维特的看法,库罗帕特金的要求"就实质而言"归结为"撤销满洲的中国行省",这种要求是"不能实现的",其所以"危险",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人"将提出他们对朝鲜的要求"(8月6日的信)。

② 见《1895年以来关于朝鲜事务与日本交涉的概述》,外交部出版社,圣彼得堡1906年版,第15页。

③ 原文为 status quo ante。——译者

④ 见同上,附录9,第66页,日本驻彼得堡公使1901年1月9日(21日)的备忘录。

⑤ 原文注有 Jangtse-Abkommen。

⑥ 见奥斯坚-萨肯1900年12月8日(21日)发自柏林给拉姆斯多尔弗的信(《红档》杂志,第14卷,第43页)。参见傅兰克:《列强在东亚》,第149—150页。关于1900年10月3日(16日)协定的文件资料见《德国外交文件》,第16卷,第197页及以下各页。

为，俄德两国在对华事务中政策分歧的扩大，是俄国在同中国的单独谈判中取得成功的必要保证，而且我们知道，维特正因为担心德国会突然放弃在中国的恐怖政策，才急转走上立即开始谈判的道路的。[①] 对于拉多林 1901 年 1 月 3 日(16日)向拉姆斯多尔弗所作
295 的、关于德国对满洲完全不感兴趣的声明，之所以不能作别的理解，而只能理解为请入圈套，其原因就在这里。[②]

最后，第三个警告是和 1901 年公历 1 月 3 日《泰晤士报》上关于增祺-阿列克谢耶夫协定的报导有关的。当时人们可能不知道，这则消息将导致外交干涉，以及哪些大国将参加干涉。然而德、英、日、美各国却接二连三地向中国政府提出了抗议，反对缔结任何"具有领土性质或财政性质的"单独协定。[③] 但是，不能不注意到，《泰晤士报》的报导对 10 月 27 日协定文本的转述是不确切的：(1)它使协定具有永久性；(2)它丝毫没有提到在盛京省留驻俄军的问题，因此它只在下述方面进行解释：在奉天设置俄国驻扎官（即"将军属下的委员"）这样的职位，就如在"印度的土著王侯"处那样，并说，这一协定"事实上"[④] 正在把满洲置于"俄国的保护"之下，"因为依据先前的协定(即 1896 年 8 月 27 日合同)，俄国已有权驻扎为保护铁路所必需的军队"。换句话说，在报刊上掀起的全部喧嚣，以及后来通过外交途径对拉姆斯多尔弗提出的质问，并不是由于延长了俄国正规军对满洲的占领，而是从关于那种正常的永久秩序的概念出发的，这种秩序似乎正凭借撤销中国军队和依靠"先前协定"规定的中东铁路护路军，而在满洲建立起来。因此，

---

① 见第 75 号卷，第 1 部分，维特 1900 年 12 月 5 日给拉姆斯多尔弗的信。

② 见《德国外交文件》，第 16 卷，第 312 页注。

③ 见英国的《蓝皮书》(中国，第 2 册，1904 年)，第 8、9、10、12、13 各号(俄文版见于《关于远东的资料》，远东特别委员会办公厅出版社，圣彼得堡 1904 年版，第 7—12 页)。

④ 原文为 de facto。——译者

由此而提出来的那个警告，其中心问题不在于什么时候取消俄国 296
的占领。

然而，1901 年 1 月 26日三位大臣在私下会商中完全赞同的单独协定草案的基础，就是维特提供的那个文本。考虑到“似乎我们已开始谈判这个传闻”在日本所引起的“惊慌”，考虑到“外国报刊上的错误解释”，拉姆斯多尔弗“认定草案中必须只限于包括基本的原则”，而“事情的各种细节”他认为可以留待中东铁路公司与华俄道胜银行在北京的“私方”谈判，以及俄国地方当局与将军的谈判去解决。总起来说，他“力图”使协定“尽可能具有爱好和平的性质”，指望协定的“公布”“能在国外产生从政治观点看来甚至是十分良好的印象”。① 这样，维特草案中的第二部分（与中东铁路公司的协定）首先就完全（暂时地）不能成立了。两国政府单独协定草案在 1 月 16 日、22 日和 25 日经过三次措词上的修改，于 1901 年 1 月 26 日在三大臣会议上通过了下述最后文本：②

“第一条、全俄罗斯大皇帝陛下愿再次证明与大清国皇帝和睦及友善之情，不顾满洲边境各地对俄国和平居民的袭击，同意在满洲恢复中国政府的权力，该地仍归中国版图，俄国占领前之行政体制和管理秩序一应照旧。

“第二条、依据中国政府与华俄道胜银行 1896 年 8 月 27 日签 297
订的、建筑与经营中东铁路合同第六款，该铁路公司有权独立管理划给该路的地段，因而亦有权为此目的保持护路军。然而注意到，当前满洲事态的秩序尚未巩固，在此情况下，上述护路军不足以

① 见第 75 号卷，第 1 部分，拉姆斯多尔弗 1901 年 1 月 16 日和 22 日给维特的信件。

② 最后定稿与维特文本的所有不同之处皆用重着体排印，维特草案中被纳入定稿的文字皆用普通字体排印。1 月 16 日、22 日和 25 日送到财政部的三份草案，以及 1 月 26 日会上决定的、28 日送到财政部的最后定稿，以及与此有关的通信，见第 75 号卷，第 1 部分。

保障中东铁路以后的建筑，① 因此俄国政府暂将部分军队留驻满洲，直至该地确已安定，并待中国皇帝陛下对本协定第九、十、十一、十二、十三与十四诸条规定皆予履行时为止。②

"第三条、俄军在其留驻满洲的整个期间内，如有必要，将全力协助中国当局维护本地治安。③

"第四条、考虑到中国的满洲驻军非常积极地参与了对俄方的④敌对行动，中国皇帝本着保障未来满洲和平的愿望，有义务在中东铁路建筑工程与铁路正常营业的筹建工作完成之前，不在满洲驻兵。⑤ 随后，满洲中国驻军数目将与俄国政府协商决定。禁止将武器与军需品运入满洲。

"第五条、为维护与俄国毗邻的满洲地方的安定及事态的正常
298 秩序，对于其行为与两国皇帝间建立的友好关系不相符合的将军，及其他中央政府委任的高级行政官员，中国皇帝政府有义务根据俄国政府的行文予以撤换。⑥

"组成直属于各地将军的步、马捕队，作为巡捕之用，维持满洲（划给中东铁路各地段除外）内部秩序。巡捕不得使用大炮，外国臣民亦不得在内供职。

---

① 维特草案中代替本句的句子是这样开始的："不论护路军如何……"。

② 在维特草案中底下还有："随着地方安定与中东铁路建筑工程竣工，俄国政府将逐渐缩减满洲驻军数目。这种缩减业已开始。若秩序不遭破坏，则驻军数目将按如下序列缩减：……"（见本书边码第 288 页）。

③ 《俄国政府监理原则》第九条也使俄军负有此种义务。

④ 维特草案中还有："与中东铁路的"。

⑤ 在拉姆斯多尔弗 1 月 16 日的草案中是："……直至俄国武装力量从该省召回为止"。最后草案是按照维特愿望定稿的（见第 75 号卷，第 1 部分，他 1 月 16 日给拉姆斯多尔弗的信）。

⑥ 在维特草案中也是另一种提法："满洲的将军、副都统及一切地方官员负责维持地方治安，特别要负责保证不对中东铁路、其企业及职员进行袭击。中国政府有义务根据俄国驻华公使声明，凡中国官员，直至将军在内，有与本条不符的行为者，立即将此人罢免"。

“第六条、根据中国政府多次郑重保证，中国政府有义务在华北的陆、海军中皆不聘用外国教官。

“第七条、1898年3月15日专约第五款确定俄国租借的关东省以北地方为中立区。为确保该地治安更臻巩固，缔约双方授权各管辖当局就地就此事彼此达成协议。并为此目的废止1898年4月25日补充议定书第四款授予金州厅的自治权。①

“第八条、在与俄国毗邻的中国各地的全境内，即在满洲、蒙古，以及与俄国接壤的甘肃、新疆地区的塔尔巴哈台、固尔札（伊犁）、喀什噶尔、叶尔羌、和田和于田各地，中国政府不经俄国政府同意，不得向他国及其臣民提供任何建筑铁路、开采矿藏和经营任何工业企业的租让权。在所述各地全境内，中国政府不经俄国政府同意，不得以本国资金修筑铁路，不得把地段提供他国人使用（开放港牛庄不在此例）。

“第九条、中国皇帝陛下政府将赔偿俄国政府因中国的骚动而 299
损失的费用，其数额要与俄国政府的实际支出和对其他大国的赔款相称。对俄国政府的赔款数额，以及支付期限与担保条件，将与有关大国共同讨论决定。②

“第十条、中国政府将与中东铁路公司董事会达成协议，补偿该公司因大段铁路毁坏、公司及其职员财产遭劫以及铁路建筑工程延缓所受的损失。

“第十一条、上条所载对中东铁路公司的补偿，可根据中国政府与公司的协商，部分或全部采用如下办法进行：向公司提供某些特惠，改变现有租让权或提供新的租让权。③

① 维特的草案中只有：“考虑到1898年4月25日(5月7日)圣彼得堡补充议定书第四款难以实施的实际不便，中国政府同意废止该款”。

② 往下在维特草案中还有下列内容：俄国政府“准备”“得到中东铁路公司应缴纳的、由中国政府负担的全部或部分款项”，公司“将中国付给俄国政府的赔款”归入“自己的损失数额中”。

③ 维特草案第十条往下完全被省略了，该条列举了应给予中东铁路公司的租让权。

"第十二条、中国皇帝答应，按照中国政府 1899 年原则上同意的、中东铁路租让权要求的同等条件，授予中东铁路公司一项租让权，以建筑与经营一条由中东铁路或南满支线某地往北京方向到达长城的铁路。①

"第十三条、中国政府将与华俄道胜银行达成协议，赔偿该行及其职员因财产的毁坏，及银行业务的停顿所造成的银行损失。

"第十四条、凡俄国臣民与俄国私人机关、企业要求补偿因中国的骚动而遭受的损失，俄国驻北京使团将予审核，并将情况转告中国政府，中国政府有义务根据审核情况如数偿付。"

300 不难发现，载入最后定稿的"基本原则"，即第三、第六两条，并非取自维特的草案，但与这一草案总的意向是不矛盾的。其中第三条就这样悄然无声地通过了，无论从维特方面，还是从中国人方面，、它都没有遇到任何反对。而关于教官的第六条，维特根据 12 月13日的提纲自然是不能接受的。因为他的草案根本不允许在满洲有中国军队。现在，拉姆斯多尔弗为了削弱维特草案（对中国"宗主权"）的"掠夺性"意向，而在最后定稿中列入了准许中国在中东铁路建筑工程竣工以后在满洲拥有军队这一条款。既然这样，列入第六条就是从维特的观点看来也是必不可少的了。②从第五条也能看出，拉姆斯多尔弗是要削弱这种意向的。这一条即便在文字上也没有过于强调满洲一切大小官员须对中东铁路任何一名职员可能遭受的袭击"负责"。拉姆斯多尔弗甚至想从最后定稿中把有关通往北京方向的铁路这一条完全删掉，大概他还记得，这一要求曾在 1899 年夏天使北京惊恐万状。但是，由于维特的坚

① 往下维特草案中还有如下文字："关于以续修与经营山海关一营口一新民厅的铁路的权利代替此项租让权，并偿清中国政府因上述铁路所欠的债务，可由有关双方随后缔结一项专门协定"。

② 如，见第 75 号卷，第 2 部分，维特 1901 年 2 月 22 日给拉姆斯多尔弗的信。维特承认，不得聘用外国教官有"很大意义"。

持，他不得不把包含这一要求的第十二条重新列入最后定稿。①

由于与中东铁路公司的协定暂时推迟，维特草案中列举的提供给中东铁路的租让权，以及提到关于俄国政府把将来的“庚子赔款”转为中东铁路公司资本(以补充租让权的形式)的文字，在单独协定的最后定稿中自然也就消失了。但是，暴露维特的租让权计划的一个痕迹却依然作为第十一条留在最后定稿中。诚然，它 301
是以可供选择的形式来表述的，但是，中国人却只把这一条理解为事实上是强制性的，于是当然对此提出了抗议。② 上面列举的这些就是拉姆斯多尔弗放入维特草案中的“爱好和平的”佐料，其目的是要使方案具有适合于“公布”的形式。

只是在俄军撤退的期限问题上，拉姆斯多尔弗显然受到了库罗帕特金的压力，他在最后定稿中采用了不象维特那样绝对的措词。维特把全面撤军与铁路工程的全部竣工相联系(固然，“若秩序不遭破坏”)，而最后定稿总的说来却使撤军简单地取决于满洲“确已安定，”其中又取决于第九条至第十四条的履行，亦即取决于中国政府履行俄国各项经济要求的良好意愿。其实，从官方观点看来，就是维特的草案也未必容许这样一种解释，根据这种解释，在中东铁路完工以后，俄国就有义务从满洲撤军，而不管中国对俄国承担的其他各项经济义务的履行情况，这类义务在维特草案中甚至为数更多。无论如何，中国人的反对意见没有涉及撤军的期限问题，而是针对着从维特草案中顺利地载入最后定稿的其他条文的。

彼得堡倒没有想过，“不以某些措施影响”李鸿章，便能使这种

① 在拉姆斯多尔弗1月16日寄给维特审定的草案中，没有关于通往北京的铁路这一条。维特的坚决主张见他1月16日给拉姆斯多尔弗的信(第75号卷，第1部分)。

② 甚至李鸿章也对第十一条表示反对，见第75号卷，第2部分，格尔思1901年2月12日的电报。

"爱好和平"的单独协定为他接受。现在答应给他的还是那一百万卢布(不过又是分期付款),而俄国外交界在谈判中的全部气力也
302 都花在此人身上了。① 但是,反对意见也通过他而来。这些反对意见的根据是:列强坚决反对协定,需要对它加以修改,这首先是为了避免"国际纠葛"。② 彼得堡无论进行"友善劝告",还是使用威胁(永远留驻满洲),对西安府③ 都丝毫不起作用。而当日本在北京声明说,它"准备在任何情况下支持中国",从而取代了列强的表态时,中国方面的反对意见立即增多了,而且变得坚决了。④ 中国人表示:(1)反对第八条中关于除满洲外还把蒙古和其他地区交给俄国人的那一部分;(2)反对按照第十条规定偿付中东铁路因建筑工程"延缓"受到的损失;(3)反对第十一条,中国人并不觉得这一条是可供选择的,却认为是用提供租让权的方式来对中东铁路进行偿付的一种义务;(4)反对关于教官的第六条;(5)反对第四条,以达到在建筑工程竣工前就有权在满洲(即使不在铁路地段)驻扎中国军队的目的;(6)还反对第四条关于禁止把武器运进满洲的规定;(7)反对第十二条部分内容,请求至少删去其中"往北京方向"的字样。

维特认为,不加区分地统统让步,那是行不通的,因为"如果同意了现在提出的反对意见,我们就得不到任何保障,随后也不能再

---

① 见维特 1901 年 2 月 10 日的奏折与附呈的给璞科第的电稿:"我授权您向李鸿章声明:在与我们缔约后,您当即给他,或他授命的某人五十万卢布,以示感激。此外,请转告他,皇上已准我去旅顺,大概九月将到北京,而如果我们的事情进展顺利,就将再给他或他授命的某人一笔相当的款子"(第 51 号卷,第 3 部分)。

② 如见第 75 号卷,第 2 部分,格尔思 1901 年 2 月 8 日和 12 日的电报,以及璞科第 12 日的电报,并见第 51 号卷,第 3 部分,璞科第 2 月 14 日的电报。

③ 指当时出逃在西安府的朝廷。——译者

④ 见第 75 号卷,第 2 部分,伊兹沃利斯基 1901 年 2 月 18 日发自东京的电报,以及喀西尼同日发自华盛顿的电报。

提其他要求了”。① 他的看法是正确的。协定的修正文本几乎包含了中国人所希望的全部更动之处；它于2月28日转给北京，并 303
附有在两周的期限内签订协定的条件，而3月11日，杨儒却接到了西安府来的拒签协定的命令。② 在获悉此讯的当天，3月12日（25日），日本公使便拜访了拉姆斯多尔弗，并“友善地告诫说”，“现在与中国缔结特别协定是危险的”，尤其是“日本认为，该条约中若干条款有损中国的最高权力并破坏其不可侵犯性，也侵犯其他大国的某些条约权利”。于是，在此以后，俄国外交界除了“无论如何”保留自己的“行动自由”外，已经无计可施了。③

对于“中国在星期一之前是否签订协定”的问题，维特在15日还绝望地试图得到某种“最后的答复”，而拉姆斯多尔弗和尼古拉却已用下述想法聊以自慰了：事情的这种变化“从政治观点看”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我们有利的”，“俄国因此丝毫没有受到损失”。④ 北京政府的决定是坚定不移的。李鸿章看样子确实尽了

① 见第75号卷，第2部分，璞科第和格尔思1901年2月12日的电报，维特2月17日与22日给拉姆斯多尔弗的信件；并见第51号卷，第3部分，璞科第同年2月14日的电报。维特同意放弃蒙古，但不同意放弃“盛产黄金的”喀什噶尔、叶尔羌、和田和于田地区(2月17日的信)。

② 根据中方的愿望，在2月28日提出的协定文本中作了下列修改：(1)凡提到蒙古和其他地方的文字一概删去；(2)中国有义务就“中国在满洲驻军的数额与驻扎地点”同俄国“达成协议”，从而不再承担在满洲不驻扎军队的义务；(3)删掉了关于外国教官的第六条；(4)将禁止把军火运入满洲的规定改为“临时”性的，直至与其他大国就把军火输入中国的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同意的”解决办法时为止；(5)从关于“到长城的”铁路这一条中删掉“往北京方向”一词；(6)关于对中东铁路公司赔偿的协定问题，规定将以“列强驻京代表制订的、列强一致批准的关于赔偿问题的共同原则为基础”缔结协定(见第75号卷，第2部分，1901年2月28日草案)。并见第51号卷，第3部分，维特1901年2月28日给璞科第的电报；并见第75号卷，第2部分，璞科第3月11日发自北京的电报(3月12日收到)。

③ 见英国的《蓝皮书》(中国，第2册，1904年)，引自俄文版第28页，斯科特1901年公历3月26日从圣彼得堡发给兰斯多恩的电报，电文告知了日本公使3月12日(25日)与拉姆斯多尔弗会晤的情况。

④ 见75号卷，第3部分，维特1901年3月15日给璞科第的电报与拉姆斯多尔弗3月15日给维特的信，此信告知了尼古拉的旨意。

304 “一切可能，不断上奏，声言尽快与俄国缔约是何等重要”，但“赞成此原则的仅他一人而已，谁也不支持他”。于是，他此时担保说，“当与列强共同媾和时，中国为了永恒的友谊将欣然同意按俄国意愿签订单独协定”。①

俄国要求中有什么东西即使在列强与中国的共同条约缔结以后仍能把各大国都惊动起来，对此，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在他对俄国政府过迟表示的意见中说得比谁都清楚。3月15日，当一切事情都已办完时，海约翰在和喀西尼的谈话中借口说，“我们在满洲力求达成的那些协定威胁了美国在华的商业与工业利益，而他对此却漠不关心”，因而招致“美国公众舆论的激烈批评”，他说：“我们完全承认，俄国有权采取它认为必要和可能的一切措施，以防止去年严重事件的重演。倘若我们确信，我们的贸易将不受损害，并且‘门户’仍将开放，那末，假如俄国在这条路上走得再远一些（到它认为自己的利益和计划所必须的程度），我们甚至也会谅解”。喀西尼以为海约翰的话值得引起“我们极其严重的注意”，就是毫不奇怪的了。当然，海约翰对于“门户开放”和“工业与商业的利益”没有讲什么新的东西。使喀西尼感到惊讶的是海约翰声明中（我们所强调的）那一部分，对此，他不可能作别的理解，而只能理解为是这样一种公开表示：“美国奇怪地改变了自己关于天朝帝国不
305 可侵犯的主张，只要列强保证使美国的贸易得到门户开放的全部好处，它就会轻易牺牲这些主张”。② 这并不意味着，俄国在满洲的其他对手也走得这样远了。但可能有这样一种观点：这对于俄国外交界再次进行把满洲“归还”中国的尝试（第一次尝试碰了钉子），又是一个同样并非无益的警告。

---

① 见第75号卷，第3部分，李鸿章1901年3月22日给乌赫托姆斯基的电报。

② 见同上，喀西尼1901年3月15日给拉姆斯多尔弗的“绝密”信的抄件。着重体是我用的。

VI

2月开始的谈判中断了，当然，这本身并不能造成一种确实可以使俄国政府"静待事态发展"的状况，而它在1901年3月24日的通告中却是这样公开声明的。[①] 俄国在2月提出的这项协定只有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才能签订。然而，俄国外交界对于自己的步骤却失于计算，因为保密绝不取决于李鸿章一个人。但是，当俄方草案文本的准确译文落到英国驻北京公使手中时，他正是在与李秘密谈话之后，才确信文件是可靠的。[②] 早在1月25日（2月6日），拉姆斯多尔弗就对斯科特保证说，轰动一时的增祺-阿列克谢耶夫协定是"临时性的"；如果可以认为他的声明不是指现在搞到的草案，那末，拉姆斯多尔弗在3月12日（25日）对日本公使所作的下述声明就纯粹是赤裸裸的矢口抵赖了。这一声明是：这份草案也是"临时性的"，"无论中国的最高权力，无论中国在满洲的不可侵犯性，无论各大国的条约利益，它都没有触犯"，拉姆斯多 306
尔弗这回是谁也骗不了了。3月30日（4月12日），拉姆斯多尔弗向英、美、德三国驻彼得堡大使正式作了口头保证，声称从来没有存在过"这份协定草案"，他拉姆斯多尔弗也没有签订任何东西的全权。[③] 这一令人难堪的整个事件在外交上可能就这样结束了。可是在政治上，俄国外交界如今却落到了比1月份更为困难的境地。

一个新情况从根本上改变了俄国政府的方针。当时，在1月

① 对1900年以来俄国政府在中国事务中的政策进行评述的冗长的政府通告，载于1901年3月24日的那期《政府公报》上。

② 见《蓝皮书》（中国，第2册，1904年），第25号和30号，萨道义1901年公历3月6日和19日从北京发给兰斯多恩的电报。

③ 同上，第11号和20号，斯科特1901年1月25日（2月6日）给兰斯多恩的报告和兰斯多恩同年公历3月4日给斯科特的电报，并见第34号和39号，斯科特1901年公历3月26日和公历4月12日给兰斯多恩的电报。

初，还有希望与日本就朝鲜和满洲问题签订一项专门协定，通过这种方式，把日本从俄国在满洲的竞争者的行列中排除出去。谈判是在3月结束的。当时，日方不仅坚决拒绝在满洲完全恢复战前状态①以前对俄国作任何让步，而且日本驻彼得堡公使又作了当时日本空前未有的大胆表示，并且确实获悉日本答应中国："在任何情况下""给予协助，以达到在满洲及时清除俄国军队的目的"。②毫不奇怪，3月24日通告中所答应的"静待"，原来只是临时掩饰恐慌心情的词语。由于同日本因为满洲问题发生军事冲突的危险性似乎已迫在眉睫，拉姆斯多尔弗立即又惊慌起来了。

就在1901年5月，拉姆斯多尔弗根据我们一位海军武官的报告，劝其同僚说："在关于俄国的满洲计划的传闻的影响下，日本政
307 界从今年年初就抱有如此好战的心情，假如帝国政府在3月间不发布关于它拒绝与中国缔结一项单独条约的通告，那日本就会毫不迟延地向俄国开战"。而现在，在5月份，日本"主战派"的"势力愈来愈大"，"与日本的冲突很容易由于最无足轻重的事情而爆发，即使日本在此事中不能依靠英国和其他大国的实际协助"。但是，日本的地位"在北京会谈的后期，以及本年(1901年)年底可能更加巩固，其时，日军重新装备的工作也将完成"。拉姆斯多尔弗由此得出了一个简单的实际结论："在估价我们在满洲行将采取的各种措施时"，应当认为，通过与日本的任何外交谈判"防止可能的纠葛希望渺茫，因为在日本政府心目中与俄国的破裂不是一种手段，而更是一个直接的既定目标"。③

① 原文为 status quo。——译者

② 见第75号卷，第2部分，伊兹沃利斯基1901年2月18日发自东京的电报，以及璞科第同年3月11日发自北京的电报。

③ 见博得尼古拉"赞许的"拉姆斯多尔弗1901年5月23日给海军、陆军与财政三大臣的信，载于我的集子：《俄国财政与欧洲交易所(1904—1906年)》，莫斯科中央档案馆，1926年版，第39号文件附录。着重体是我用的。

另外一个情况更可能使俄国人领悟到，俄国在满洲的任何进攻性计划都是绝无希望的。看来，这一情况完全被俄国外交界忽略了。问题不仅在于，日本对俄国的战争准备工作本身已近于完成，而且在于，从 1901 年 1 月起，必要的国际联合的准备工作也正在伦敦、东京与柏林进行着。1 月 25 日(2 月 7 日)，就在彼得堡会商确定俄国有关满洲要求的最后定稿前一天，兰斯多恩在伦敦直截了当向德国大使提出了一个问题：德国是否同意“与英日一起”，308
以武力迫使俄国停止执行其对中国的“独立的与侵略性的”政策。但是，在再次会晤时，兰斯多恩没有重提自己的问题，于是赫茨费尔德当时也就没有作出柏林授予他的下述声明：“为了自己在和平中生活，我们希望保持普遍的和平；倘若这一愿望不能实现，并且英国处于和第三国的战争状态，我们保证对英国保守中立”。①然而不久，德国驻伦敦一等秘书埃卡尔德斯泰因在 2 月 3 日(16 日)答复林董的探询时，在这更有效的联系中，他立即有机会作出了同样的声明。

林董说，倘若日本确信英德两国中立，则一旦俄国企图在朝鲜盘踞，日本就“会干到底”。至于说到满洲，则只有在可以指望得到英国的“确实”支持，并确信德国将“善意地”中立时，日本才会开战。同时林董还指出：“在陆上我们容易对付俄国”，只是海军尚未做好准备。于是这时埃卡尔德斯泰因不等日本人直接提问，就赶紧说：“东京流传着一种说法：似乎德俄两国间有一项关于朝鲜的秘密协定，这是毫无根据的。而且两国间根本没有关于东亚的任何条约”。②这里所说的不是埃卡尔德斯泰因个人的政策，这是毫无疑义的。

---

① 见《德国外交文件》，第 16 卷，第 4008、4812 和 4813 号。

② 见同上，第 4817 号，埃卡尔德斯泰因 1901 年 2 月 3 日(16 日)的报告。

比洛在阅读一等秘书的上述报告时，在林董所说的假使东京不是久已存在着(关于秘密协定的)想法，那日本"早已对俄国采取
309 坚决行动了"这句话旁边批道："为什么不是现在呢？"① 而在2月20日(3月5日)，赫茨费尔德本人在一次便宴后向林董暗示说，德国在东亚"没有任何义务要使德国在俄日冲突或其他冲突中，必须站在日本的敌人一边"，假如日本一国，或日本与英国一起不得不"借助武力在中国阻止俄国"，德国"将绝对保守中立"。由于赫茨费尔德早在2月15日(28日)就已向英国人作出了同样的中立声明，因此，当林董现在告诉他说，日本已向英国请求给予海军帮助，并且兰斯多恩表示可在内阁会议上讨论此事时，赫茨费尔德就毫不感到惊奇了。② 在伦敦的德国人乐于相信外交部③的这一说法：要不是英国人不得不在南非驻扎二十万人的军队，他们早就对俄国人的"侵略图谋"唱截然不同的另一种调子了。但是，同是这些德国人又把自己的疑惑告诉柏林，甚至对柏林说，他们确信索尔兹伯里与自己的同僚不同，他持有另一种看法，他不仅不认为英国在中国北部的利益与英国有切身的利害关系，以致要去冒战争的危险，而且认为把中国北部让给俄国是可能与俄国达成总的协定的一个出发点。关于这个总的协定似乎他早在1900年7月就已在彼得堡谈及了。④

于是从柏林发来了如下指令作为答复：要使英国人相信，正象非洲现在妨碍着他们一样，俄国如今正为财政危机所困扰，一旦发生战争，维特"将预见到"金本位制的崩溃和他本人的垮台(而

---

① 见《德国外交文件》第16卷，第325页。

② 见同上，第4826和4821号，赫茨费尔德1901年2月20日(3月5日)和2月15日(28日)的电报。

③ 原文为 Foreign Office。——译者

④ 见《德国外交文件》，第16卷，第4820号，埃卡尔德斯泰因1901年2月15日(28日)的电报。

维特却是"俄国最有实力的人物"),因此俄国是不会走到战争这一步的。这一论证公开指望能使"不坚决的"英国首相放心。① 事情 310
既已开始,也就在伦敦依次进行下去了,到2月22日(3月7日),兰斯多恩已经询问了赫茨费尔德,一旦发生日俄战争,德国是否同意与英国一起在巴黎作出下述声明:为了防止战争扩大,两国皆保守中立,但若第三国进行干涉,两国一起"将重新审查自己的这种立场"。② 赫茨费尔德支吾搪塞地作了回答,兰斯多恩于是又在3月4月(17日)向埃卡尔德斯泰因重提了这个问题,埃卡尔德斯泰因却反问道,德国能从英国方面得到什么作为交换。于是,兰斯多恩第二天就谈到,"德英两国间"可以缔结"一项防御协定"。③ 柏林立即以一项英国参加三国同盟的反建议作为回答,并要使日本也加入同盟,埃卡尔德斯泰因还承担了就三国同盟与林董进行对话的任务。④ 由此可见,1901年3月12日(25日)日本在彼得堡所作的表示是有所依恃的:不仅三大国将在北京提出对俄国不利的建议(此事俄国政府亦已知悉),也不仅日本相信自己武装力量处于优势地位,而且还有日本外交代表关于"纯属私下的"谈判的报告,在这些谈判中终于连"同盟"这个词也说出口了。

关于三国"防御"同盟的想法是由俄国对满洲的"侵略图谋"引起的。谈判破裂了,俄中双方似乎都放弃了单独协定,但这本身当然丝毫不能妨碍上述想法的进一步成熟。单独协定在3月的紧急日子里搁浅,而俄国政府则在3月24日发表了一项通告,以挑衅 311
性的恶毒口吻和不大高明的坦率语气描述了事件的进程和列强在

① 因而强调指出,不必与俄国订立协定。见《德国外交文件》,第16卷,第4821号,第329页,霍尔斯泰因1901年2月16日(3月1日)给赫茨费尔德的电报。

② 见《德国外交文件》,第16卷,第4829号,赫茨费尔德2月23日(3月8日)的电报。

③ 见傅兰克:《列强在东亚》,第172页。

④ 见同上,第173,174,178,179各页。

整个义和团期间的行径，从而对各大国(俄国除外)豺狼般的胃口产生了不良影响，通告还说，俄国在把满洲归还中国过程中是受人阻碍的。这一通告无论如何也不表明俄国的政治立场有了任何转变。4月初，林董接到了东京的指令，让他先不要开始正式谈判，而只以"试探"的方式恢复中断了的对话，看"将来在解决中国问题时与英国的合作"能走"多远"。[①] 这就是说，东京提出的不是日本参加"三国同盟"的问题，而这一问题德国人是在3月最后提出的。但是林董也询问了德国人，他们是否"与日英两国一起"，就支持"门户开放"政策和中国的不可侵犯性达成协议，协议应使三国承担义务，维护这些原则使之免遭第四国等的破坏，并以此区别于1900年10月3日(16日)的英德条约。

当林董知道，德国人刻板地把满洲排除在10月3日(16日)条约的有效范围之外时，他也把满洲从他现在所建议的新协定中删去了("如把满洲交给俄国也无妨")，然而这却是"为使现存(列强的)条约权利得到尊重"。正如后来所探明的，林董之所以为了德国人而使关于满洲的条约如此"美国化"，是因为英国人已不止一次地指出，"如德国不同时加入协定"，那末，他们便不能以任何关于中国的协定来束缚自己。[②]但是柏林却考虑到，有关东亚的这一"专门"协定，将使英国无须加入欧洲三国同盟，因此柏林坚持认为，在英国加入三国同盟以前，"就让英、日两国满足于我们的中立
312 吧"。[③] 林董对德国人的"试探"到此就结束了。1901年5月，德国拒绝同英国一起在摩洛哥反对法国，看来这在使英国转而主张与日本结成两国同盟的过程中起了不小的作用，如果埃卡尔德斯泰因为达成这种联合所作的努力算不得有什么意义的话。埃卡尔德

① 见《德国外交文件》，第17卷，第5038号，埃卡尔德斯泰因1901年4月4日(17日)的电报。

② 见同上，第5037号，他1901年4月3日(16日)的电报。

③ 见傅兰克：《列强在东亚》，第183页。

斯泰因出于对俄日接近的担心，又自作主张、自担责任地在伦敦继续奔忙了一阵。①

因此，1901 年 5 月底拉姆斯多尔弗敲起了警钟。他问道：俄国在军事和财政方面是否作好了对日作战的准备。但他自己也没有料到，当时正是这样一个时刻：拟议中的反俄联合开始由三国变为两国，随着德国人退出这一联合，留下的双方便无须再保留任何有关满洲的限制性的附带条件了。于是，把满洲归还中国的问题重又提上了日程。自然，关于此事，维特比谁都急切。在经过上述种种事情之后，根本谈不上本着友好和 1896 年 5 月 22 日同盟条约的精神同中国讲任何客套了。但是，正象“可能引起或加速同日本破裂的任何决定性措施”一样，对满洲的占领可能造成“巨大的支出”，这“会给俄国人民，主要是中部各省的大俄罗斯居民带来沉重的负担”，由于这些开支“又不得不使居民们的许多迫切需要暂时得不到满足，在一个经济体制尚未完全成形、许多工业部门正处于装备时期的国家里，这种行动方式可能引起最严重的后果”。因此，在谈判破裂后的现在，“在中国政府与我国目前关系之下”，“我 313
们应该在赔偿损失问题上坚决保卫我们的物质利益”，在任何情况下，“对中国的宽容不应给俄国人民带来损失”（“我个人怜惜中国人，但更怜惜俄国人民”）。“避免对日作战”，这就是现在唯一的任务。

当然，维特也不能容许完全退出满洲的想法。“无论中东铁路的南满支线，无论旅顺口，还是大连，我们都不能也不应当（“听天由命地”）听其自然，但我们也不应当走得更远”。避免战争“最可靠的手段”是：“取消我们的军事管制”，并放弃“对满洲的政治侵

① 见《德国外交文件》，第 17 卷，第 184—192 页。不列颠的政策正是在这时急剧转变为反德的，对此的出色评述见于塔尔列：《帝国主义时代的欧洲》，莫斯科 1927 年版，第 65—66 页和 127 页及以下各页。

占”，“要把中东铁路看作是私人公司的事业，并将我们在满洲的作用仅限于保护这项企业”。倘若这还嫌不够，那末维特往下实质上是建议结束 1896 年的俄中同盟条约，并回到洛巴诺夫所主张的办法上去（而维特在 1895 年春天是如此固执地屡次挫败了这一主张），这就是：假如日本要求得到朝鲜，就试图“把朝鲜的独立问题转到国际基础上”，而“如果日本仍然占领了朝鲜”，那也不认为这是“宣战的理由”。①问题的这种提法与洛巴诺夫的提法一样，它不可避免导致在将来靠牺牲中国利益而与日本达成友好的协定。但是，我们知道，这种协定在满洲恢复原状② 以前是不可能的，于是，着手恢复这种状态便成了目前刻不容缓的任务。

在维特开始执行新计划的首次尝试中就表明，维特当时是多么相信，与日本的这种协定是可以达成的。6 月 11 日，维特提出
314 了从满洲撤军的第一个具体建议，它完全是由维特仔细拟成的。建议在 6 月 28 日的特别会议上顺利通过，而丝毫未遭军方的反对，并在 7 月 5 日为尼古拉认可。维特建议，俄军在南满和直隶省所占的铁路立即归还中国管理，并要求中国(1)补偿俄国用于经营和修理这些铁路的费用(大约一百万卢布)；(2)承担“正式义务”，“切实依据”1899 年 4 月 16 日俄英协定和 1898 年 9 月 28 日与中英公司订立的借款合同建成并经营上述铁路；(3)还要担保：“不经我方同意，不得延长上述铁路，不得敷设支线，不得在营口建造横跨辽河的大桥，并不以营口作为铁路终点站”；(4)上述铁路不得由外国人守卫。但事到最后，维特又突如其来地在这些条件中加了一条“政治性要求”：“向中东铁路公司提供由干线到长城通往北京方向的铁路的租让权”，而这正是在 2 月份李鸿章本人首先加

① 见第 68 号卷，第 4 部分，和第 12 号卷，维特 1901 年 5 月 24 日和 28 日给拉姆斯多尔弗的信件。参见本书边码第 70—74 页。

原文为“casus belli”。——译者

② 原文为 status quo。——译者

以反对的那项条件。[①] 与此同时，根据军方的情报，正是在这一区域英国人和日本人现正着手进行活动，从而引起了一种想法：他们自己也不打算离开这里，而且在他们之间甚至有着"某项与满洲问题有关的共同计划"。[②] 在维特的推动下，俄方现正试图重提未遂 315
的单独协定草案中的一个问题，这种企图由于上述情况而变得更大胆、更带冒险性了。

当俄国关于这种部分撤军的问题在彼得堡终于有了顺利进展时，拉姆斯多尔弗提供了一项新建议，它似乎把问题提得完整了。1901 年 7 月19日，拉姆斯多尔弗申明，使撤军问题"取决于事态的发展"是"不审慎的"，他建议"自己主动"从满洲"逐渐"撤军，此事"将通过政府的特别公告"予以宣布，事先不通知任何人。[③] 库罗帕特金怎么也弄不懂这一姿态的现实政治意义，他坚持要把北满（到中东铁路干线并包括干线在内）留在俄国的保护之下，并企图证明，反正谁也不会相信这种姿态的。他说："实质上，我们将是撤走一部分军队，而代之以另一部分军队……但对于欧洲、美国与日本，问题不在于掩饰，也不在于形式。他们只对下面一点是毫不怀疑的：实际上我们不愿意把满洲完全交还中国，因为铁路还留在我

① 见第 81 号卷，维特 1901 年 6 月 11 日给拉姆斯多尔弗的信，他 6 月 15 日关于召集一次特别会议的奏折，以及 6 月 28 日会议记录。关于北京铁路的建议在 6 月 11 日的信中没有提及，它在会议记录中也是第一次出现的。会议的所有公文均由财政部办公厅处理。关于李鸿章的反对意见，见第 51 号卷，第 1 部分，璞科第 1901 年2月 14 日和 25 日的电报。

② 见列入会议文件的阿列克谢耶夫 1901 年 6 月 17 日发自旅顺口的电报。内称，英国人为了确定适于"登陆"的地点，"在大沽到秦皇岛的沿岸""进行侦察"并"加紧活动"；日本人则为在"天津、山海关、秦皇岛地区"占领"一大片地段"而"进行侦察"，"加紧活动"。电报还称，山海关的英国守军加强了，英国人"坚决要求"把那里多余的一个炮台交给他们。

③ 见第 75 号卷，第 4 部分，拉姆斯多尔弗 1901 年 7 月 19 日给维特的信。"是否希望把我军占领的满洲全境都留归俄国，还是只要其中一省？"拉姆斯多尔弗建议对此问题作出"最终"决定，以后"绝不变更"。拉姆斯多尔弗在信中没有涉及完成撤军的期限问题。

们手中，而在这些铁路线上将驻扎相当多的俄军”。①然而，有迹象说明，尽管维特热烈欢迎拉姆斯多尔弗通过大臣间书信争论提出
316 的建议，但他也还不愿意相信，绝对必须无条件撤离满洲。于是，他避开俄国的职业外交官，试图通过日本驻彼得堡公使恢复在 1901 年 1 月曾一度为日本政府拒绝的谈判。须出从与维特的长时间的会谈中“得出了一个确定的印象：维特千方百计想在俄日两国之间达成一项关于朝鲜的协定”，该协定的基础如下：“朝鲜仍是一个中立区。②然而日本有权保持它在朝鲜政府中的行政和财政顾问、以及保持高级警官及其代表。为此，日本有义务正式承认俄国在满洲的优势地位”。③

如果维特在俄历 7 月初确实提出过这种建议，那恐怕就不用怀疑，“俄国不久前在东京作出的”关于它准备“随时”“帮助日本政府在巴黎得到大宗贷款”的“声明”，是与维特的政治步骤紧密相联的。④朝鲜“中立化”这一显然虚假的建议，甚至照林董的看法，也能使日本的社会舆论感到满意，只要它是郑重的。而林董却不认为它是郑重的，而且建议也提得为时稍晚了，因为：（1）现在不是向“亲俄的”伊藤政府提出这一建议，而是必须向在 7 月初取而代之的好战的桂太郎将军内阁提出建议；以及（2）这项建议应受到下述事件的某种影响：早在 7 月 2 日(15 日)，伦敦就开始向林董坚决提议，不仅“签订一项巩固的长期协定”，而且如同索尔兹

① 见第 75 号卷，第 4 部分，库罗帕特金 1901 年 7 月 30 日给拉姆斯多尔弗的信。对库罗帕特金此信的复述见于«日俄战争的序幕»，第 175 页及以下各页。

② 原文注有 Gebiet。——译者

③ 在«日俄战争的序幕»第 174 页上复述了维特给拉姆斯多尔弗的回信。林董谈及维特建议的那项通知（“绝密的”）见«德国外交文件»，第 17 卷，第 5041 号，埃卡尔德斯泰因公历 1901 年 7 月 26 日的电报。林董表示，须出与维特的会谈“就是不久以前”的事。

原文注有 Vorherrschaft。——译者

④ 见«德国外交文件»，第 17 卷，第 5040 号，埃卡尔德斯泰因 1901 年 7 月 6 日(19 日)的电报。

伯里本人这一次所说的，“要缔结一个同盟，一旦两国或几国的联 317
合力量对某盟国发起进攻，各盟国均有义务提供军事援助”。① 但是，尽管兰斯多恩在7月18日(31日)又一次向林董指出，“就缔结长期同盟事宜进行谈判时机已到”，日本政府仍拖了两个月，最后才正式授予林董参加这一谈判的全权。这大概就是维特的上述建议所能起到的作用了。② 但是，事情还在于，至于俄国往后竟发生了这样的转折，以致拉姆斯多尔弗7月19日建议所作出的慷慨姿态未能变成事实：第二天，7月20日，李鸿章又带着一项诱人的建议出现在北京舞台上，如果这里没有什么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的情况，那么这就是纯粹的巧合了。这一天，李鸿章暂时没有去打搅格尔思，他叫来了波兹德涅耶夫，并“声明：他希望俄国军队尽快撤出满洲，因此愿提出重新审定满洲协定的问题”，但他希望预先知道，维特对此事的态度如何。只是过了一星期，他在得到维特表示同意的答复后，才去找格尔思。③

于是，俄国外交界忘却了一切，又一次受了诱惑，要在与中国政府直接谈判的道路上碰一碰运气。

VII

当李鸿章找自己的一位彼得堡“朋友”重开关于俄军撤出满洲问题的谈判时，他要利用较之1900年远为有利的外交局势为时尚 318
不算晚。他的目的是为了使俄国政府承担义务，“不剥夺中国在满洲的(1)军权，(2)从这一地区得到一切利益的权利，(3)独立地

① 见《外交部公报》，1913年，第5册，第324页，《林董札记》的译文。参见傅兰克：《列强在东亚》，第192页。正如林董所说，这些建议是根据爱德华七世的意愿作出的。

② 见《林董札记》，第324—325页，并见前引傅兰克的著作，第193—194页。

③ 见51号卷，第1部分，波兹德涅耶夫1901年7月20日给维特的电报，并见第75号卷，第4部分，格尔思1901年7月28日的电报。

位”。[1] 波兹德涅耶夫的看法也许是正确的：李鸿章个人并不希望继续拖延从满洲撤军的问题，以便“利用朝廷不在的机会”较为容易地“处理事情”，而这件事使他有可能捞到一笔不小的款子。[2] 格尔思在当时也可能是对的，他相信李鸿章“不会要求对2月草案作任何改动”，他认为他的第一个印象是可靠的：李鸿章恐怕“我们对2月文本还不满足，还想对中国提出新的、更为严厉的要求”，因此，他“准备不经任何预先讨论就签订（旧的）协定”。[3] 但是实际上，李鸿章却以自己的对策把俄国外交界置于接受最后通牒的地位。

拉姆斯多尔弗可能不知道，正如上面所指出的，只是到了这时，索尔兹伯里才在两个协定（靠损害中国利益与俄国达成协定，或与日本达成反俄协定）中作出了抉择。李鸿章可能也没有料到，正是在这时，东京似乎在采纳英国建议或认定可能与俄国基本上达成协议的问题上，已经最终打定了主意。但在客观上，简单拒绝李鸿章建议的谈判将使俄国外交界担很大的风险。经过长期努力拟成的列强与中国的《辛丑条约》草案终于要“在最近期间内”签订了，正如正式通告中国的，公历9月初，联军的第一梯队应从北
319 京撤出。这就意味着，应当料到那时将在国际范围内“把满洲的未来命运问题”提上“日程”。连拉姆斯多尔弗也不怀疑，“无论英国，还是日本，都不会放过对他们极有吸引力的时机”，“就俄国不止一次作出的将满洲归还中国的诺言”对彼得堡或进行“质问”，或加以“提醒”。拉姆斯多尔弗现在自己也承认，俄国“打算”“一俟情况允许”，即从满洲“逐渐召回俄军”的一纸声明，“未必能使社会舆论最终平息”，他认为摆脱所有这些困难的出路是现在建议的“就满洲

① 为与格尔思谈判而发给李鸿章的训令就是这样说的。见第75号卷，第4部分，格尔思1901年8月18日发自北京的电报。

② 见第51号卷，第3部分，波兹德涅耶夫1901年7月20日发自北京的电报。

③ 见第75号卷，第4部分，格尔思1901年7月28日发自北京的电报。

事务(与中国)和睦协商",“尤其”是,不然的话,李鸿章“可能请求别的大国协助,促使俄国尽快把满洲归还中国”。① 彼得堡仿佛真正懂得了,俄国外交界如不想让“俄国的尊严或它的直接利益”遭受损失,它就只好用各种办法,直接或经过列强干涉,为中国所迫去进行谈判。

出乎李鸿章的意料,拉姆斯多尔弗提出的条约草案不是2月草案的重复。这同英国驻北京公使早在8月1日(14日)(当时李鸿章刚刚收到维特表示同意的答复②)从“绝对可靠方面(中国)”获悉的有关情况也不一样。拉姆斯多尔弗和格尔思的意见相反,他认为“协定的原有文本”“根本无从谈起”,他的草案完全是重新拟定的,他的四项条款(代替原先的十一项条款)把下列原则机械拼 320
凑在一起:关于将满洲交还给中国政府(第一条),关于撤出俄军的期限(第二条),在满洲建立中国的武装力量(第三条),以及维特不久前确定的、将中国铁路交还原主的那些条件(第四条)。③ 新草案包括:俄国同意(附带一项公式化的条件:“如不产生任何新的困难,而且其他大国的行动方式将不予妨碍”)“分批按下述数字逐渐从满洲境内撤军:到1902年驻满洲俄军不多于……(此处是数字)千人,到1903年夏天撤出其余俄军”。但是,新草案已不象维特原先所希望的那样将全面撤军与“中东铁路所有建筑工程的完全竣工”联系起来,它也没有顾及库罗帕特金刚刚表示的战略考

---

① 见第75号卷,第4部分,拉姆斯多尔弗1901年8月4日的奏折。

② 见同上,前引格尔思1901年7月28日的电报,并见英国的蓝皮书(中国,第2册,1904年)第40和42号,萨道义1901年公历8月14日和21日给兰斯多恩的报告。在8月21日的报告中,萨道义把俄国三种稿本草案(2月、3月和8月的)作了对比,附在报告中。其中他八月草案的稿本是用原先两种稿本逐字逐句拼成的。

③ 见同上,拉姆斯多尔弗1901年8月14日给格尔思的电报,以及8月6日送到财政部的《俄中满洲协定草案》(维特加注道:“答复吧,我毫无意见”)。

虑:为利于保持俄国对北满的占领,将防线移到伯都讷、珲春一线,从而使其比原先缩短一半以上。①

库罗帕特金企图现在就在条约中列入下列承诺:(1)"在本年(1901年)内撤出""辽河以西的盛京省西南部地区,并将铁路交还给中国";(2)"在明年(1902年)撤出盛京省的其余部分";以及(3)要"到1903年才开始撤出""包括吉林城在内的吉林省南部地区"。这一企图没有成功。而在8月22日,格尔思奉命就撤出全部俄军的协定草案"内容开始与李鸿章进行会谈",这一草案甚至比8月
321 4日的稿本还要宽容一些。② 这份草案确实符合上面提到的对李鸿章的三点指令,甚至超出李鸿章本人的期望。至少,李鸿章在8月18日与格尔思会晤中(当时拉姆斯多尔弗的草案尚未送到北京),在援引自己的三点建议时提出,要在一份秘密照会中向俄国作出担保:(1)"不事先"与俄国"协商","不扩充(在满洲的)中国军队";(2)"在满洲不向他国人提供租让权"。③ 而当格尔思遵照拉姆斯多尔弗的指令,要求李鸿章出示证明其全权、并保证在协定签订前保守谈判秘密的"正式字据"时,他在当天(8月18日)就向格尔思出示了皇帝给他和庆亲王的有关此事的一道上谕。④ 因此,单独协定事宜似乎不应受到中国政府的阻挠了,而且它及时走上了官方途径,免得列强从北京撤军以后再来进行意料之中的"提醒"。

但是,眼看一个月过去了,而李鸿章在对俄国草案作了仔细研

---

① 参见本书边码第288和315页。

② 见第75号卷,第4部分:库罗帕特金1901年8月12日给拉姆斯多尔弗的信,拉姆斯多尔弗8月22日给格尔思的电报,以及协定草案的"新稿本",这份稿本是附在拉姆斯多尔弗1901年8月8日的信中送到财政部的。在"新稿本中"从第四条删去了第五点:关于向中东铁路公司提供租让权,修筑一条"到位于满洲与直隶省交界处的长城"的支线问题。头一个稿本中的这一点显然来自1901年6月28日关于将铁路交还中国的会议的记录(见本书边码第314页)。

③ 见同上,格尔思1901年8月18日的电报。

④ 见同上,波兹德涅耶夫8月19日(9月1日)给维特的电报。

究后，在9月23日却只能对草案提出四点修改意见，并且其中三点纯粹是文字上的，另一点也是如此微不足道，以致俄国人立即就接受了。[①]与此同时，8月25日(9月7日)的《辛丑条约》早已签 322
订，从北京撤军已着手进行，而从满洲则不断传来"以极其悲观的调子"描述"事态"的情报，这种事态有可能使"该地区经济生活完全停滞、使该地荒废、破产"。这些情报使彼得堡想到："必须尽快解决满洲未来的命运问题，抑或恢复中国行政管理的效能与作用，抑或由我们自己来管辖和治理这一地区"。[②]确实，迄今为止谈判是以爬行的速度进行的。但当维特在9月28日援引这些情报，向拉姆斯多尔弗表示他对此事已不耐烦时，谈判已经"近于良好的结局了"。拉姆斯多尔弗为避免责难，就命令雷萨尔"与李鸿章就满洲协定进行最后会谈"。[③]

但是，就在9月30日，正当拉姆斯多尔弗以此宽慰维特时，伊兹沃利斯基从东京告知说："小村从北京获悉，满洲的谈判业已恢复，他对此事极为关注"。于是拉姆斯多尔弗为了赶在他当天发出的宽慰维特的信之前，便打电报告诉维特说："如果李认为能与别的大国商量此事，俄国便不得不立即中断谈判"。[④] 李鸿章仿佛偷听到了彼得堡两位大臣的对话，他于10月2日通知雷萨尔说，关 323
于撤军的协定草案"朝廷业已赞许"，他李鸿章"想立即奏请皇上敕

① 见第75号卷，第4部分，雷萨尔1901年9月23日的电报。除了三点文字上的修改以外，李鸿章又请求：对于第三条中的这个句子：两国政府将缔结"专门协定，确定在满洲的中国军队数额与驻扎地点"，用下列措词予以代替：两国政府"将关注命令俄国军事当局和将军商妥关于确定"……(下同)。参见维特9月26日给拉姆斯多尔弗的电报，内称，这点修改是可以接受的。

② 见同上，维特1901年9月28日给拉姆斯多尔弗的信，信中附有尤戈维奇发自哈尔滨的电报，以及拉姆斯多尔弗同年9月30日给维特的信。从占领满洲一开始，关于俄军无力对付神出鬼没的"红胡子"队伍的报告，就从中东铁路公司的俄国经理人员那里不断传来。

③ 见同上，前引拉姆斯多尔弗1901年9月30日的信。

④ 见同上，拉姆斯多尔弗1901年9月30日给维特的电报。小村是日本外务相。

令签订协定”，这时雷萨尔却“反对说，关于此事根本无从谈起”。① 这样，李鸿章生前就再也没有讨论这一双方均能接受的草案了。在他死后(他死于公历 10 月 21 日)，当由谁充当新的谈判全权代表的问题揭晓时，彼得堡又已经有“理由认为，有利害关系的一些大国目前不仅不会阻挠我们与中国缔结关于满洲事务的协定，看来，甚至还准备劝告中国人尽快结束这一问题”，于是拉姆斯多尔弗本人也在想方设法拖延谈判的恢复了。②

上面叙述的满洲协定的波折，与协定内容本身是毫无关系的，但能从下面一事中得到全面的解释：与上述谈判同时，俄国政府通过华俄道胜银行驻北京代表，在北京平行地开始了并进行着银行与中国政府间的“私方”协定交涉。这一协定的内容便成了俄国外交界的绊脚石。1901 年 7 月 27 日，维特经尼古拉的赞同，刚刚对李鸿章的询问作了如下回答：“中国政府如向华俄道胜银行承担义务，即凡满洲的铁路与工业租让权，中国政府将首先向银行提供，
324 然后再给他人，就可能极有助于”从满洲撤军，拉姆斯多尔弗又通过格尔思要求李鸿章“绝对保密”，这时，波兹德涅耶夫立即告诫维特说，“在这种情况下在北京是不可能保守秘密的”。③ 应当公道地说，波兹德涅耶夫是正确的。但是，最细心的研究者也不能在那些日子的信札中找到任何最细微的迹象，说明这一警告在彼得堡发生了什么作用。维特明确指出，必须与银行签订初步协定。与此相反，李鸿章并无恶意地建议，在关于交还满洲的政府条约中也包

① 见第 75 号卷第 4 部分，雷萨尔 1901 年 10 月 2 日发自北京的电报。

② 见拉姆斯多尔弗 1901 年 10 月 31 日给雷萨尔的电报。为了拖延谈判，拉姆斯多尔弗提出了下述“理由”：“从规定撤军期限时起，已过去将近三个月了，而从满洲的边远地区撤军的困难与日俱增的季节已经到来”，因此，雷萨尔“必须在签订协定之前请准相应的指示，以便为那些在今年(1901 年)就需要离开满洲某些地区的军队确定新的撤离期限”。

③ 见第 51 号卷，第 3 部分，维特已向尼古拉奏明的 1901 年 7 月 27 日给波兹德涅耶夫的电报，以及波兹德涅耶夫 1901 年 7 月 29 日(8 月 11 日)给维特的电报。

括同意银行垄断权的条款，而且，我们已经看到，后来他又悄悄地把同样的建议塞给了格尔思。可是，就连这件事看来也丝毫没有引起维特的猜疑。①

彼得堡只是刻板地坚持认为，华俄道胜银行与中国政府的条约"同关于从满洲撤军的问题"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俄国公使"完全不应参与此事"(除了在类似情况下"对俄国私人企业"给予"种种支持"以外)。彼得堡还认为，得到中国政府绝对保密的承诺也就够了，对李鸿章则甚至不必答应一百万整数，而只须答应三十万卢布，以后的一切也将与 1901 年 2、3 月间截然不同。② 与此同时，拉姆斯多尔弗照旧认为"我们主要关心的"是：不许外国租让者在满洲攫取重要的工业企业"③，正因为这样，维特和拉姆斯多尔弗两人都把银行协定看作是"秘密的"，并认为，它应当"在归还满洲 325
协定之前"缔结。④ 维特与拉姆斯多尔弗完全恢复了原先的外交配合，并指望这一回用保守秘密的办法来掩盖他们玩弄的私方协定和国家协定的花招(但保守秘密分明是"不可能的")，从而不受制裁地把"齐头并进的"有关这两项协定的谈判进行到底。这种指望需要某种非同寻常的乐观主义才行。

8 月 21 日，波兹德涅耶夫与李鸿章就银行协定细节进行了首次对话。通过对话，他"确信"：李鸿章"千方百计力求与总的协定

① 见第 51 号卷，第 3 部分，波兹德涅耶夫 1901 年 7 月 27 日(8 月 9 日)的电报。参见本书边码第 321 页。

② 见同上，维特 1901 年 7 月 27 日的电报（关于给予李鸿章"相应的酬金")，以及他 1901 年 8 月 3 日的电报("可以给他三十万卢布，但须等协定得到最终批准之后")，并见第 75 号卷，第 4 部分：拉姆斯多尔弗 1901 年 8 月 14 日以及 8 月 22 日给格尔思的电报("我们认为交给您的、李鸿章和庆签字的正式通知是可以满意的")。

③ 原文此处只有半边引号。——译者

④ 见第 75 号卷，第 4 部分，拉姆斯多尔弗 1901 年 8 月 18 日给格尔思的电报，维特 8 月 16 日给波兹德涅耶夫的电报，拉姆斯多尔弗 8 月 22 日给格尔思的电报，以及维特 8 月 23 日给拉姆斯多尔弗的信。信中提醒说，银行协定"应当先于撤军协定或与之同时缔结，但决不晚于后一协定"。

同时办理此事，而为使它（即银行协定）先于后一协定缔结，需要来自格尔思方面的压力”。李鸿章方面则“要求确切规定，中国是否有权向他国人提供租让权”，他认为这对他是“头等重要的”问题。① 俄国方面以后的策略是：“以（波兹德涅耶夫）知道的那项承诺影响李鸿章，同时根本不使他有理由认为，我们特别重视协定，或我们急于缔结协定”。② 但是，相比之下，中国人急于把所有可能的租让权都交给华俄道胜银行的理由就更少了，因此直到9月
326 24日（10月7日）李鸿章才建议波兹德涅耶夫向他提出银行协定的草案。③ 9月27日，波兹德涅耶夫在将草案交给李鸿章时，他“不
327 得不经受李鸿章大发雷霆的场面”，最后，李鸿章宣称：“协定把满洲全境交给银行支配”，这“无疑会引起别国人的抗议”，“他从来不敢对这种协定承担责任”，并说，“他只能就矿产资源的租让权进行

① 见第75号卷，第4部分，波兹德涅耶夫1901年8月21日的电报。对话是“以十分友好的口吻”进行的，尽管波兹德涅耶夫直到第二天才提到酬金问题（同李鸿章的次子李经迈，他“立即去向父亲报告此事，并表示几乎完全确信，协定可以签订”），见第51号卷，第3部分，波兹德涅耶夫8月22日的电报。

② 见同上，维特8月23日给波兹德涅耶夫的电报。

③ 见同上，波兹德涅耶夫1901年9月24日的电报。李鸿章要求波兹德涅耶夫出示谈判的全权证书，于是，乌赫托姆斯基就以银行董事长的身份于10月1日用电报转达了全权证书（见同上，乌赫托姆斯基的电报）。“据推测，这项协定将签订”。因为“在上述协定中华俄道胜银行显然只是一个顶替者”，因此，维特认为“必须做到：一俟协定签订，董事会立即向财政部承担义务：凡与本协定有关的一切决定，董事会只在财政部赞同后才予通过，……财政部关于该协定的各种指示，凡不涉及银行支出者，董事会有义务绝对执行”，然后，“在首次全体股东会议上，（董事会的）这一义务应为全体股东会议所确认”。维特委托希波夫草拟这项义务（见同上，维特9月26日给希波夫的信和希波夫拟订的包括七点的《条约》草案）。草案文本引录如下：

“以俄国财政部为一方，以华俄道胜银行为另一方，双方达成内容如下的条约：

全赖俄国政府的协助与保护，华俄道胜银行于本年10月……与中国政府缔结了一项关于银行在满洲享有取得工业租让权的优先权的协定。有鉴于此，华俄道胜银行对俄国政府承担下列义务：

1．华俄道胜银行有义务将中国政府向其提供的一切租让权立即知照财政部。

2．华俄道胜银行有义务将其根据上述与中国政府的协定拟从中国政府得到的一切租让权的方案，呈请财政大臣事先赞同。同样，银行对于其根据上述协定打算与中

谈判”。①大发雷霆的场面以后没有再出现，但在10月2日的下一次会晤中，李鸿章如此固执地否定了他对乌赫托姆斯基的许诺，又如此坚信地断言，“皇帝不会批准这种协定”，“协定还会引起列强的抗议”，以致波兹德涅耶夫只好推测，“中国可能秘密地在满洲问题上对外国承担了某些义务”。② 当然，问题并不在于那些已经确定的义务，而在于这样一种信念：他国人是不会同意“将满洲全境 328
交给银行支配的”。因此，拉姆斯多尔弗是正确的，他先前就曾怀疑，小村9月底曾由于获悉同俄国谈判已经恢复而惊慌，在这种惊慌背后是否隐藏着李鸿章本人同日本人的直接“商量”。几天过后，对李鸿章泄漏谈判秘密的怀疑又两度得到证实：10月9日，在彼得堡透露出了一则来路不明的消息：“李向英日两国政府请求对满洲事务进行干涉，但碰了钉子”。而在10月12日，连李鸿章本

国政府缔结的任何条约草案，也将呈请财政大臣事先赞同。唯有财政大臣同意的那些租让权与条约，银行才有权从中国政府取得，与该政府缔结。

附注：根据皇上批准的章程，华俄道胜银行有权在中国取得修筑铁路和敷设电信线路的租让权。有鉴于此，如根据上述与中国政府的协定，发生把满洲任何别的工业租让权给予华俄道胜银行的问题，则银行在得到此种租让权之前，有义务按照既定程序向俄国政府申请对其章程作相应补充。

3. 华俄道胜银行有义务根据财政大臣的要求，接受中国政府提供的一切租让权，并有义务向中国政府申请财政大臣指出的一切租让权，如若此事无须银行花费资金。

4. 华俄道胜银行有义务根据财政大臣的斟酌，将银行根据与中国政府的上述协定取得的租让权，交与根据俄国法律组成的股份公司或享有声望的个人经营。这类公司的章程由华俄道胜银行根据财政大臣指示制订；在将租让权转交私人时，银行应向其提出财政大臣指示的组织企业的那些条件。

5. 根据与中国政府的上述协定，凡华俄道胜银行放弃的一切租让权，可以转让给个人与机关，但这些个人与机关在经营此种租让权时，只能接受作为银行家的华俄道胜银行的帮助。

6. 凡与银行和中国政府之间的上述协定有这种或那种关系的一切问题，华俄道胜银行皆有义务根据财政大臣的指示采取行动。

7. 本条约免于向国库交纳任何捐税。”

① 见第75号卷，第4部分，波兹德涅耶夫1901年9月26日附有协定全文的电报，以及他9月27日的电报。

② 见同上案卷，波兹德涅耶夫1901年10月2日的电报。

人也向波兹德涅耶夫承认，协定文本“不知何故已为日本政府所获悉”。①然而，外国人暂时并未作“有损俄国尊严的表态”，于是，李鸿章直到死前不得不继续进行毫无结果的关于银行协定的对话。他忽而对协定文本提出一些细微修改，忽而全盘接受，忽而又推托说，必须与庆亲王商量，他的“口是心非的行动方式”，终于使维特（在10月14日）进行了威胁：如果他不老老实实地“在最近数日”签订协定，就“分文不给他”。②

到了最后，看来李鸿章的一切遁词都已用尽了，于是，他作了一下“变换手法”的尝试：在最后一天，他已使波兹德涅耶夫确信，“他和庆亲王已经同意与银行的协定，但它应与总的协定同时签订，至于说到总的协定，他和庆亲王都认为是正确的，但是朝廷担心外国人会提抗议，因此没有准许签订”。于是李鸿章请求波兹德
329 涅耶夫再等两星期，等到庆亲王回来，他是为了面奏必须签订两项协定的问题而前往朝廷的。③老头子死后，维特问波兹德涅耶夫，他现在“考虑怎么办”，是否有可能“象李鸿章那样再使一些有势力的人物具有切身利害关系”，这时才发现，一切都需要从头开始，因为“随着失掉了李鸿章与许景澄（许早在1900年就死了），不仅我们一派已经完全没有台柱子了，而且在中央的最高当局中，看来没有一个人能够勇敢地负责与外国人办理交涉”，而“从物质上使某人具有切身利害关系”暂且“为时尚早”。④

① 见第75号卷，第4部分，财政部秘书1901年10月9日给希波夫的电报，及波兹德涅耶夫同年10月12日的电报。

② 见同上，波兹德涅耶夫1901年9月17日、10月12日和13日的电报，及财政部秘书同年10月10日给希波夫的电报。并见第51号卷，第3部分，维特10月14日给波兹德涅耶夫的电报。

③ 见同上，波兹德涅耶夫1901年10月17日的电报。

④ 见第51号卷，第3部分，维特1901年10月25日给波兹德涅耶夫的电报和波兹德涅耶夫10月26日给维特的电报。波兹德涅耶夫现在还吩咐“我们的代表要与博得王文韶和袁世凯好感的所有新来的官员们建立友好关系，并准许借支五百两（约七百卢布）用作请客和送礼”。维特10月27日的电报批准了这笔开支（见同上案卷）。

随着李鸿章死去，在北京从主观上对俄国外交界形成了一种全新的状况，而实际上已真正走进了死胡同的谈判的命运是应使彼得堡的乐观主义者感到惊慌了，假如他们不觉得他们还没有输光自己的全部王牌的话。

VIII

假如在李鸿章生前谈判只限于撤军和归还铁路这项条约，那末中国政府未必会用那些微不足道的修改来拖延时日。9月24日，中国政府终于确信，不接受与银行的谈判，便不能使总的协定得到进展。9月28日，维特曾经不耐烦地抱怨拉姆斯多尔弗拖延满洲的不确定状态。拉姆斯多尔弗简单地用造成拖延的原因完全 330
公道地驳倒了维特的埋怨：整个事情迟迟不决是由于"波兹德涅耶夫关于巩固华俄道胜银行在满洲的租让权的谈判进展迟缓，而在这项谈判结束以前，我们公使是不可能签订上述（总的）协定的"。① 如果在此没有什么别的事情，那这又是一次巧合：9月24日，李鸿章采取了果断步骤，向波兹德涅耶夫要求银行条约的草案文本和签订该条约的全权证书；第二天，9月25日（10月8日），林董在伦敦收到了东京用电报发来的如下命令：同样采取断然步骤，结束与兰斯多恩的"私人"对话，遵从他的意愿，"正式"进行关于同盟条约的"谈判"，谈判基础是林董和兰斯多恩在比他们的首次会晤更"坦率的对话"中业已商定的那些共同原则，我们知道，他们的首次会晤是由英国方面发起，于7月18日（31日）举行的。林董当时就没有向兰斯多恩隐瞒，他说，"虽然日本在满洲的利益是次要的事情，但俄国在占领满洲后会力图吞并朝鲜，出于此种担心，日本不想让俄国涉足满洲，并希望，一旦日俄之间发生战争（因而不仅由于朝鲜，同时还由于满洲），其他大国将不致帮助

① 见第75号卷，第4部分，前引拉姆斯多尔弗1901年9月30日给维特的信。

俄国”。①

毫无疑问，这一基本事实是在俄国外交界视野之外的。可是，就从俄历9月初起，彼得堡确切获悉，日本前首相伊藤将在最近的将来举行一次出访，他将“不经过英国”，“直接去法国，其秘密计划
331 是探听俄国对通过巴黎提出的俄日结盟的方案持何态度”。②伊藤这个人物如此吸引了俄国外交界的注意力，以致1902年俄历1月30—31日公布了英日同盟条约以后，彼得堡各界中流传着一种固定不变的说法（以后维特还将其广为散布），这种说法是：“彼得堡极为冷淡地接待了伊藤”，他“被看作无足轻重的人物③”，“没有得到我们明确的答复”，他“随后直接前往英国，并受到非常热烈的接待”，于是“随即缔结了英日同盟条约”。④前面已经指出，北京吸引东京和伦敦干预中俄关于满洲的秘密谈判的暗示和直接表示，在1901年9、10月间就已为彼得堡所获知，但彼得堡没有为此而深感不安，这是可以理解的。正在传出这些消息的同时，伊藤已经从东京启程前往东方（经由美国），奔向维特早在1901年7月初就在巴黎投下的贷款的诱饵。而彼得堡又在最后时刻采取了一些措施，使德尔卡塞不对伊藤就贷款问题作出直接答复，而准备“笼统地”回答他，债款有哪些政治条件要等伊藤到俄国去商量。⑤李鸿

① 见《林董札记》，载《外交部公报》，1913年，第5册，第325页。

② 见财政部驻日本代表阿列克谢耶夫1901年9月2日发自横滨的电报，他是从法国领事那里获悉这一情报的。直到10月下半月财政部才得到关于此事的详细报告，并附有法国领事发往巴黎给本国政府的相应报告的副本（见第12号卷）。

③ 原文为 en quantité négligeable。——译者

④ 见维特：《回忆录》，第1卷，第183页及以下各页；莫尔斯科伊：《对真诚调停的失望。罗斯福与朴茨茅斯会议》，莫斯科1911年版，第12页，以及《日俄战争的序幕》，第189页。

⑤ 见第12号卷，拉姆斯多尔弗1901年10月29日给维特的信。信中写道：“今天我交给比蒂龙一份备忘录，以作为德尔卡塞与伊藤侯爵进行谈判的准则。同时，我顺便向他指出，法国在不知道远东的和平有多大保障时，它当然不能促成对日贷款。而和平和安定的维护直接取决于俄日两国的友好关系。我们愿意确立这种关系，我们不要求任何多余的东西，但也不能放弃我已概括指出的我方的权利与某些条件。因此我希望，伊藤将对他在圣彼得堡行将举行的对话做好充分准备，而法国将审慎地等待伊藤在俄国逗留的结果，然后再订贷款契约”。

章在10月初企图使日本和英国干预谈判，他的企图看来没有得逞。332
这就可能导致一种想法，以为银行协定的内容仍然是秘密的，而且李鸿章本人在10月12日向波兹德涅耶夫所承认的，也只是关于撤军的总协定。①

无论如何，在李鸿章死后，10月31日，拉姆斯多尔弗便着手讨论既成状况了。他是从这样一个念头出发的：主要的秘密（关于银行协定的）尚未泄露，而这位前大臣死后，北京政府的新任大臣们目前却可能干出这种令人不愉快的事情。② 但正是当时（10月底到11月初），伊藤已应在巴黎了，因而可以认为，预期中的法、俄与他的谈判已经开始。③ 在这种情况下，北京谈判的被迫暂停甚至为俄国外交界提供了某种方便，它提供了一种形式上的借口，以便在恢复谈判时对以后的一切问题进行选择：要末一成不变，要末完全新提，而这就要看与伊藤会晤的情况而定了。并且事情是这样凑巧，中国人自己也是在中断一个月以后才重开谈判的，其时，伊藤在彼得堡的逗留已经结束，他正在经由柏林前往巴黎的归途中。④

伊藤在彼得堡逗留了十天（从俄历11月11日到21日）。对他的接待表面上是"排场豪华"、"异常友好"和"特别殷勤的"，在他 333
逗留结束前，不仅与拉姆斯多尔弗，而且与维特举行了几次会谈。会谈中，拉姆斯多尔弗"始终彬彬有礼得出奇"，他"自然""只能向伊藤作一些笼统的答复"。而维特"不是一个外交家"，同他就谈得

① 李鸿章对波兹德涅耶夫承认这一点恰恰是在这样的时刻：当时，他已经为拖延银行协定而使尽了种种花招，于是他变换"手法"，仍然不将银行协定电告朝廷，而开始对总的协定进行阻难（见第75号卷，第4部分，波兹德涅耶夫1901年10月12、13、17日的电报）。

② 见第75号卷，第5部分，拉姆斯多尔弗1901年10月31日给雷萨尔的电报。

③ 伊藤于俄历11月1日抵达巴黎。

④ 庆亲王第一次召请波兹德涅耶夫是在11月28日。伊藤是11月21日离开彼得堡的。见第75号卷，第5部分，波兹德涅耶夫1901年11月28日的电报。

"比较坦率和明确"。①

综合我们掌握的有关当时的为数不多的资料，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俄国外交界没有认清事态的真实情况，也就是说，它没有认清，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在当时迫使日本政府放弃它近于准备就绪的因为满洲引起的对俄战争。鉴于当时日本已在伦敦采取了不可挽回的步骤，这一时刻在俄日关系的命运中就未必可以称作决定性的了；但在俄国外交界的心目中这一时刻却应是决定性的，因为它没有料到，英日谈判已经走得这么远了。

11月19日拉姆斯多尔弗与伊藤在"口头交换意见时"已经探明，日本希望"在朝鲜事务中排除其他任何外国势力"，并取得一国"对朝鲜政府提供建议"、"一旦国内发生混乱或与外国发生冲突时甚至以武力""对其进行帮助"的自由，而作为此项的交换条件，日本准备向俄国提供"以后"在中国的行动自由，假如"去年(1900年)的事件""不久的将来"在那里"重演"的话(而这"是极其可能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伊藤现在就已经向俄国提供了在满洲的行动自由，而伊藤恰恰作出了与此有关的暗示：俄国在满洲所拥有的东
334 西(满洲铁路)，是全靠中日战争才取得的。

拉姆斯多尔弗懂得，这一暗示的意思是：满洲铁路暂时(即"以后"，在俄国干涉中国的适当时机到来之前)足以补偿俄国在朝鲜对日本作出的让步。他反驳了这一暗示，指出，"较之俄国"，铁路"更符合于日本的利益"。伊藤于是提出了向日本提供"运价优待"的主张作为对此的回答。同时，他的这一意见(即拉姆斯多尔弗还应当"说服"财政大臣同意此事)却证明，看来伊藤要末已经就中东铁路的运价问题与维特本人试着谈起过，并且碰了钉子，要末他本

① 见德国驻圣彼得堡大使阿尔文斯勒本1901年公历12月4日的报告，载《德国外交文件》，第17卷，第144—145页，并见第97号卷，阿列克谢耶夫1902年3月25日发自横滨的报告，报告叙述了他和伊藤的秘书铃木会晤的情况。铃木根据上司的托付，对于伊藤与两位大臣的会谈作了这种评述。

人也非常清楚，维特是把满洲的俄国铁路国际化问题与最后提到的这一让步联系在一起的，作出这一让步，恰恰不能再从运价方面保护俄国与满洲的贸易了。正如维特以后在他的《回忆录》中所说的，日本准备"容忍""占领关东省的事实"，并容许建筑通往旅顺口的铁路，"但要我们从满洲撤军"，"然后在满洲采取门户开放政策"。①

在第二次会晤（约在20日或21日）中，伊藤以书面形式提出了他的"条件"，在拉姆斯多尔弗看来，这些条件原来"只是一份范围极广的特惠清单，日本希望通过协议来取得这些特惠"。伊藤自然也建议拉姆斯多尔弗本人阐述他的要求，以"足以补偿日本在朝 335
鲜取得的权利"。② 但是，由于某种原因，伊藤没有在彼得堡等待拉姆斯多尔弗的答复，因而俄国的对案不得不紧跟着通过日本驻柏林使团寄去。拉姆斯多尔弗拟定的草案曾于11月27日提交维特审定，维特对草案提出了两点无关紧要的修改（当即为拉姆斯多尔弗不加反对地接受了），而在其余方面，表示赞同拉姆斯多尔弗对伊藤文本所作的那些修改。现将俄方文本与日方文本比较如下：③

"1. 彼此担保朝鲜的独立。

"2. 彼此承担义务（或日本承担义务）④ 不将朝鲜领土的任何部分用于〔互相反对的〕战略目的。

"3. 彼此承担义务（或日本承担义务）④ 不在朝鲜沿岸进

① 见第12号卷，拉姆斯多尔弗1901年11月27日给维特的信，其中叙述了他与伊藤的两次会谈。参见《俄国外交大臣与伊藤侯爵口头交换的意见》（这是上述11月27日给维特的信的一个片断），载于外交部出版的《1895年以来关于朝鲜事务交涉的述评》，圣彼得堡1906年版，第68页及以下各页。并参见维特：《回忆录》，第1卷，第183页。

② 见第12号卷，拉姆斯多尔弗1901年11月27日给维特的信。

③ 见第12号卷，维特1901年11月28日给拉姆斯多尔弗的信（此信载于格林斯基的《日俄战争的序幕》第243页及以下各页，但仿佛是1902年11月写的）。维特建议，对日方文本的第2、3两条不作修改，而只在第2条中删去"互相反对的"这几个字。两个草案相同的文字用一般字体，俄方修改之处用着重体，日方文本原有而俄方文本中删掉的文字用方括弧中稀疏排印的字体。日俄两国的草案见《1895年以来就朝鲜事务与日本交涉的概述》，圣彼得堡1906年版，第67和71页。

④ 俄方提案有两种表述方式供日本人选择：抑或彼此，抑或单方面。

行威胁朝鲜海峡自由通航的任何军事准备。

"4. 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的〔政治方面的〕工业和商业方面的行动自由，并承认日本的下述优先〔独占〕权，即经与俄国协商，但独自以建议〔和行动〕帮助朝鲜，旨在协助朝鲜履行一切组织完善的政府所承担的职责，其中包括为平定暴动
336 和可能威胁日朝和平关系的各种骚乱所必须的军事帮助。

"5. 在上条规定的情况下，日本有义务只将绝对必须数量的军队派到朝鲜，并有义务一俟军队使命完成，即行召回。同时约定，日军永不逾越预先准确划定的、沿俄国边界和邻近俄国边界的那些区域的界线。①

"6. 日方承认俄国在与其边界毗邻的中华帝国若干地区享有优先权，并有义务在各方面皆不限制俄国在这些地区的行动自由。

7. 本协定代替以前的〔一切〕协定。"

把日俄两种文本加以对照，可得出这样的结论：两位大臣均否决了日本在朝鲜的独占的行动自由，并完全否决了政治方面的这种自由，而关于那些与俄国边境毗邻的中国地区（不仅满洲，而且可以理解为早在 1901 年 2 月就为中国否决的、日本人也知道的那项俄国声明所述的范围），他们则为俄国要求在政治方面不加限制的行动自由，不是部分的，而是全部的（"在各方面"），也不是如伊藤口头同意的那样是在中国发生某种新事件时，而是现在就享有。早在 1901 年夏天，维特就担心日方会照这样一个公式行事："你们
337 取得满洲，我们就要朝鲜"。维特和拉姆斯多尔弗的对案显然不是按照这一公式的，而接近于下述公式："我们取得满洲，它全归我

① 十分可能，整个第 5 点全是根据维特的指点而列入的：见林董的《札记》，载于《外交部公报》，1913 年，第 5 册，第 330 页。

们，我们给你们朝鲜，但不全归你们”。

有一个间接的迹象表明，维特不仅赞同拉姆斯多尔弗提案外交上的表述方式，而且他自己和伊藤在彼得堡会晤时（“特别是第二次”），因为他“不是一个外交官”，也“坦率地”和“比较明确地”表示了同样的意思。四个月过后，伊藤对于他和维特的第二次会谈是这样复述的：当维特确切阐述了俄罗斯帝国政府在满洲的全部使命时，伊藤侯爵问他，在这种情况下能使日本在朝鲜得到何种补偿，维特回答说：“既然你们履行我们对满洲的一切要求，那你们想要什么都行”。① 维特读到自己驻日本的代表报告中的这一地方时，在援引的伊藤的话旁边批道：“撒谎”。这就是说，维特关于朝鲜没有答应“想要什么都行”，而他在与伊藤会谈时已曾考虑到了的限制也就被拉姆斯多尔弗列入了俄国的对案之中了，这些限制恐怕不会遭到、事实上也没有遭到维特的反对。②

然而，即便伊藤是确切转述了维特在“坦率的”会谈中可能脱 338
口而出的这一句话，这也并不说明维特当时对朝鲜命运的真正态度。他认为，在拟议的条约中，正是涉及朝鲜的那些条款是没有重大意义的。他把日本在朝鲜的立足完全看作是一个短时期的现

---

① 见第97号卷，阿列克谢耶夫1902年3月25日发自横滨的报告。原文注有tout ce que vous voulez。——译者

② 并参见伊藤与日本报纸《朝日新闻》记者的谈话，载于该报1902年6月22日。伊藤声称，“如承认朝鲜包括在日本独占的利益范围之内，那末，东方的和平无疑将不会再受到威胁”。对此，维特回答说：“完全正确，只要让俄国在朝鲜南部沿岸地区占据一个地点，它就准备立即放弃对朝鲜的任何要求”。伊藤指出，但是，如果这个地点指的是马山浦（即马山——译者），那末，“日本不能同意这种妥协，因为马山浦是朝鲜海峡的直布罗陀；丢掉了它，就等于丢掉了整个朝鲜”（见第12号卷）。海军部门从一开始就指出：旅顺口是不能令人满意的，1899年，在海军部门的坚持要求下，力求在马山浦的沿海地带取得一个地段时，财政部就表示，不仅在马山浦，而且在松珍浦（音），甚至在平壤取得一些地段“都是可取的”，但“特别是在马山浦”。见第55号卷，维特1899年4月22日给穆拉维约夫的信。关于马山浦的条约见《远东事务的条约和外交文件汇编》，圣彼得堡1906年版，第388页及以下各页。

象，它正为俄国的将来造成一个有利的出发点："当着铁路工程完全竣工，并且我们在中国北部的势力业已确立起来时"，日本将因在朝鲜的"巨额耗费""而大为削弱"，从而便于俄国"重新获得朝鲜，如果情势要求这样做的话"。① 德国人对事情也是这样理解的，他们以为，彼得堡"排场豪华的接待"是欺骗不了伊藤的，这种接待只能解释为俄国必须"不使俄日利害关系过早（'在1904年前！'）② 尖锐化"。同时，如今当俄国外交界要求在满洲的"行动自由"时，似乎是郑重地从这样一个想法出发的：日本对期限的算计不如彼得堡和波茨坦，而且，当着在某种程度上满洲将在俄国手中，而朝鲜在日本手中时，俄日之间的争执是不可遏止的，但日本人却不懂得这种争执的全部意义。然而，我们看到，林董早在这年夏天就已经向兰斯多恩指出这种争执的意义了。③

并不奇怪，伊藤在柏林收到这种拙劣的对案后，"坦率地"回答彼得堡说，单凭第4和第6这两点的提法，就已使他"有郑重的理由怀疑"把俄国提案"作为未来谈判的基础推荐"给东京政府"是否
339 合适"。④ 假设伊藤在11月21日离开彼得堡时，关于他在彼得堡的对话内容不是丝毫没有通知东京，那就产生了一个问题：1901年11月25日(12月7日)，在东京天皇亲临的"元老"会议"以绝大多数票"作出了签订英日同盟条约的最终决定，"元老"会议在作出这项决定前，是否已经得知俄国在满洲想要什么呢？若是得知了，那也不是根据拉姆斯多尔弗的谈话，因为他主要谈的是朝鲜；而是根据维特的谈话，如果相信伊藤不便公开的消息的话。维特

① 见第12号卷，维特1901年11月28日给拉姆斯多尔弗的信。

② 见《德国外交文件》，第17卷，第5042号，阿尔文斯勒本1901年公历12月4日发自圣彼得堡的报告，"在1904前！"这几个字是威廉写在页边上的。

③ 见本书边码第330页。

④ 见伊藤1901年12月10日（23日）给拉姆斯多尔弗的信，载于外交部出版的《1895年以来就朝鲜事务与日本交涉的概述》，第74—75页。

在他们的第二次会谈中"坦率"而"确切地"叙述了他在满洲想要什么(既然此后产生了在朝鲜对日本的"补偿"问题,显然维特想要的超过了一般的战前状态)。① 无论如何,伊藤略微提到的日本对满洲的唯一要求只是"门户开放"问题,而维特的外交,在此时以及在伊藤启程以后,都毫不间歇地顽强致力的正是要把门户完全关闭。② 伊藤有礼貌地拒绝了关于协定的主张,但当时彼得堡就是这样不明白伊藤这一回答的意思。俄国外交界没有料到,伊藤于11月21日匆忙离开彼得堡时,他手头已经有了头天收到的与英国的同盟条约的最后草案;而俄国外交界在一段时间内却一直以为,日本政府似乎在等待伊藤的详细报告,因而对中俄重开谈判,表现出 340
一种矜持态度。③

随后(在东京作出决定三天以后),11月28日,当庆亲王把波兹德涅耶夫召去就银行协定进行会谈,俄国外交界因而得以继续与中国谈判时,事情被办理得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以在朝鲜对日本作出不完全让步为代价,换取日本对满洲的完全不干涉,对这种可能性的幻想使俄国外交界陶醉了。"先是银行协定,

---

① 见傅兰克:《列强在东亚》,第198页。林董在自己的《札记》中借伊藤之口肯定地说,他在与拉姆斯多尔弗和维特对话后,"可望与俄国缔结协定",他已将此电告东京。难以设想,伊藤在电报中竟没有指出(即便简要地),彼得堡准备在哪些条件下在朝鲜对日本作出让步。何况,在伊藤启程赴欧洲前夕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东京就打算,"关于俄国在满洲的行动自由这项条件","只在万不得已时才予承认"(见《外交部公报》,1913年,第5册,第330和327页)。

② 还在伊藤回东京前,阿列克谢耶夫就在1902年1月7日从横滨报告说,"已正式向本地政府声明,俄国对于满洲的意向是'坚定不移的'"。

③ 英日条约草案于1901年11月20日(12月3日)由信使送往彼得堡给伊藤审定(见《外交部公报》,1913年,第5册,第329页)。俄国的两位大臣被自己在国外的代理人弄得扑朔迷离,他们忽而告知:日本在巴黎借债是不可能的,忽而解释说:日本由于希望与俄国达成协议,因而在一月初拒绝与英国一起干涉中俄谈判;忽而重又告诉说:日本正在巴黎继续进行借款谈判(见第12号卷,驻巴黎大使1901年12月26日的电报,拉姆斯多尔弗1902年1月7日给维特的信和维特1月10日给拉姆斯多尔弗的信)。

然后总的协定”，这一公式仍然有效。“在满洲不许有任何他国人”，这一条也仍然有效。但往后的谈判依然进展缓慢，这不仅是由于总的协定与银行协定纠缠在一起，而且由于维特拒绝接受中方提出的对总的协定草案的修改意见，从而决定在实质上向中国人挑战。伊藤来访所助长的彼得堡的乐观主义是如此不可动摇，以致从俄国敌人1901年12月明显的外交动向的最初迹象起，直到1902年1月底英日同盟条约宣布时止，伊藤的两位对话人固执地遵循着他们的既定方针。

庆亲王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想在某种程度上去掉财政（即银行）协定的垄断性质”，其中基本的一句是：“如果中国无力自行经营租让企业，则将所有这些租让企业提供给华俄道胜银行”。①庆亲王的这一修改意见是直接根据原先给予李鸿章的指令第二点
341 （中国有权“从满洲得到一切利益”）提出来的，当然它立即为维特所拒绝了。维特担心，“外国人将打着中国政府或中国租让家的旗号出现”。俄国人向庆亲王提议，建立直属于银行的“中国特别分行”来代替他的修改意见。这家分行应负责办理满洲的租让事务，其实，“以后要使”这家分行“成为虚设是不会有多大困难的”。然后，俄国人在整整一个月内（到1月5日）采取了“等待的方式，期望中国人主动提议”，而中国人当然也同样保持沉默。②

与此相反，中国方面与公使恢复了关于总的协定的对话，到12月15日，已向彼得堡提出了对俄国草案的下列修改意见：（1）不是到1903年秋，而是在1902年底以前分三期撤出俄军，每期四个月；（2）只“在俄军尚未撤出时”，中国军队的数额和驻扎地点才须由双方互相协商确定，撤军以后，满洲中国军队的增减无须根据

① 见第75号卷，第5部分，波兹德涅耶夫1901年11月28日的电报，以及雷萨尔同年11月30日的电报。

② 见同上，波兹德涅耶夫1901年11月28日和12月5日的电报，以及维特同年12月1日的电报。

互相协商，而只须“及时知照”俄国即可；(3)删去中国巡捕禁用“大炮”一条；(4)删去中国不使外国军队占领归还给中国的铁路地区这一项“义务”，而以“不允许”列强(不是军队，而是国家)占领这些地区的义务代替之；(5)俄国用于被归还的铁路的全部费用，将由中国(不是如俄国草案中默指的那样，单凭俄国提出的数额，而是)“根据与俄国政府的讨论”给予补偿。①

我们不清楚，这些修改意见是否交给了例如库罗帕特金审定，342
但是单凭下面一条就足以决定其命运了：维特拒不接受其中任何一点，借口是：这是“一份不够明确的稿本，它很容易使他们(中国人)在以后规避履行”条约。② 雷萨尔决定，在庆亲王重开关于银行协定的谈判之前，对中国人的这些修改意见不予回答(即便是完全否定的回答)。他的决定没有遭到彼得堡的反对。12月30日，璞科第久离北京以后刚刚返回北京，立即就去见庆亲王，并劝他说：“在最近签订(银行)协定，这对中国较之我们更要利害悠关”，因为从东京已有消息传到北京，在日、美、英三国之间，正在“交换关于满洲协定的想法”。③ 璞科第的这一次拜访听起来好象是一则双料的海外奇谈，自然也就归于枉然了。

---

① 见第75号卷，第5部分，波兹德涅耶夫12月7日关于中国全权大臣的整套班子(庆亲王，王文韶，联芳和塔克什讷)对公使进行第一次预备性拜访的电报，以及拉姆斯多尔弗12月15日给维特的信，信中附有中国人提议的修改意见的文本。

② 见同上，维特1901年12月17日给拉姆斯多尔弗的信。维特认为：(1)撤军期限的缩短“会带来某些不便之处，因为在此之前我们还来不及将中东铁路装备齐全，并且外阿穆尔边区边防军的人数还达不到预定的名额”(二万五千人)；(2)“尽可能限制中国武装力量的数量”“已作为我们撤出满洲的重要条件之一而提出，而现在放弃这一条件似乎是没有理由的”；(3)如不禁用大炮，巡捕就会变成“炮兵部队”；(4)问题不在于中国政府“允许”“列强”“侵占”铁路，而在于：中国要对在那里出现“外国军队”这一简单的事实负责；(5)费用应在移交铁路“之先”不经任何讨论得到补偿。补偿总额约为一百一十二万卢布，“在中国无钱的情况下”，这是“一项苛刻的条件”(见第75号卷，第5部分，雷萨尔1901年11月3日的电报)。

③ 见同上，璞科第1901年12月26日和30日的电报，以及雷萨尔12月31日的电报。参见第97号卷，阿列克谢耶夫12月29日发自横滨的报告。

拉姆斯多尔弗立即询问华盛顿的喀西尼和东京的伊兹沃利斯基。根据这番探询，彼得堡认为三国勾结的消息是不确实的。伊
343 兹沃利斯基无忧无虑地断言，“日本”“断然拒绝了”关于干涉俄国谈判的“任何协议”，并推诿说：“我们的美国朋友的行动方式并非完全真诚”。而在喀西尼向海约翰“进行试探”时，海约翰“向喀西尼保证说，俄国在此事中肯定可以指望美国的友善态度”。由于同时法国驻东京公使正好从北京得到情报，内称：“日本拒绝参加英国公使建议的……共同干涉满洲问题的计划，这似乎被解释为东京内阁希望与我们就朝鲜问题达成协议”，而根据搜集到的情报，伊藤要到“公历2月底”才能回到东京，告知“详细情况”，于是彼得堡认为英国外交界的建议似乎是空弹射击，是没有意义的，而且对于可以得到更多的东西也信以为真了。① 关于银行协定的谈判在中断了一个月之后又于1月恢复了。这时，无论对银行的垄断权，还是对满洲一切企业中排斥他国人的规定，维特实际上仍不同意作任何让步。他只准备对提法作点修改，以迎合庆亲王的愿望，“在中国臣民面前保全中国政府的面子”。结果，直到1月15
344 日，双方仍各执己见，相持不下。有关草案争议部分的意见分歧如下：②

① 见第75号卷，第5部分，阿列克谢耶夫1902年1月7日发自横滨的报告，以及拉姆斯多尔弗1902年1月5日给维特的信。并见第12号卷，拉姆斯多尔弗1902年1月17日的信。阿列克谢耶夫从横滨警告说，有“一个阴谋”正在伊兹沃利斯基周围进行着，他却错误地以为，似乎日本“断然拒绝了”，然而，日本只是“暂时避而不答，并在伊藤从欧洲返回前保持（在此阿列克谢耶夫也估计错了）一种等待状态”。正因为他相信这后一情况，他没有拍电报，而是邮寄了这一报告。他盘算，这份报告一个月后可送到彼得堡，而伊藤“不会在2月底以前返回”。关于美国人，阿列克谢耶夫同样警告说，他们对英国提议作了肯定的答复，而且他们“总是与英国齐心协力地行动，希望否决俄国的满洲专约”。

② 参见维特1月5日给璞科第的电报，璞科第1月11日的电报，维特1月15日的电报，以及在财政部办公厅署明日期为1902年1月15日的协定草案的综合文本。在转引的草案片断中，用着重体排印的文字是维特坚持、而庆亲王不同意的内容，在圆括弧中稀疏排印的文字是庆亲王主张列入、而维特不同意的内容。

"……以后或中国政府本身以自己的资金(在满洲)进行活动(即外国资本和外国臣民丝毫不参与),或中国人和中国公司独立地以自己资金进行活动(即外国资本和外国臣民丝毫不参与),经中国政府允准在满洲经营各种矿山、铁路和其他工业企业,在此种情况下,对这些事业的资金供给应委托华俄道胜银行这一两国合资经营的机构经办。若无此种中国公司和个人,则将经营优先权提供给华俄道胜银行。若银行不想经营,可让其他个人或公司经营,这些个人与公司只能接受作为银行家的华俄道胜银行的帮助,而且提供这些租让权的条件务须与向银行提供的相同……本条约不涉及与开放口岸的贸易有关的其他商业事务(并毫不损害条约赋予的通商权利)"。

最后,1902年1月18日,被截获的日本驻北京公使1月10日(23日)和11日(24日)发往东京的两份电报送到了彼得堡。电报中说,袁世凯和王文韶两人都通知他,最近将签订俄国的两项协 345
定,又说,他与英美两国公使约定,"今天就"向庆亲王提出禀帖。就在这时,彼得堡还没有丧失"信心",以为璞科第和雷萨尔"还来得及使事情达到预期的结果"。① 维特的确也是这样考虑的。1月21日,他收到璞科第的一份电报,内称,庆亲王准备放弃关于通商那一段,并准备用"仅仅"这一措词使"自己的资金"这一概念更为确切,对此,维特仍然没有同意,他"担心庆亲王力图达成的这份不明确的(!)稿本可能使外国人充斥满洲"。② 不但如此,甚至在1902年1月21日(2月3日)海约翰向俄国政府"非同一般地"提出抗议照会以后,无论拉姆斯多尔弗,无论维特,都不认为关于银行协

① 见第75号卷,第5部分,拉姆斯多尔弗1902年1月18日给雷萨尔的电报。

② 见同上,璞科第1902年1月20日的电报和维特1月22日给璞科第的回电。

定的问题已经完结了。这份照会只专门反对华俄道胜银行在满洲的"垄断权"，俄国政府倘若"接受"垄断权，就是"否定了俄国外交部不止一次向美国作出的、关于俄国政府打算在中国遵循门户开放政策的那些保证"。①

彼得堡立即决定，装出不懂得应和他们谈些什么的样子。俄国外交界在其对海约翰的复照中，(1)声明："没有也无从谈到""对门户开放原则的任何违反"；(2)仅讲到"一些租让权"，华俄道胜银行对这些租让权的要求"在各方面都不超过其他外国公司如此经常提出的要求"；(3)认为"对一些大国开放的门户却要对俄国关
346 闭，(这一要求)是极为奇怪的"；(4)问道："俄国能否确信，一旦华俄道胜银行不再在满洲谋求任何租让权，其他大国是否也将不……在满洲为各自利益向中国谋求类似的让步？"以及(5)不同意"承认美国政府有权独自在天朝帝国全国支配这些或那些租让权的出让"，似乎在美国照会中所说的不是垄断权，而是某些特指的租让权。② 同时，雷萨尔在北京继续向庆亲王施加压力，叫他不要听信外国人。然而庆亲王当然"坚决"并"自信地"回答说，"美国人没有对政治协定提出抗议，而银行协定则与他公使无关"，他还拒绝了雷萨尔关于作出"不许其他大国干涉我们商谈"的"书面保证"这一现今没有意义的请求。③ 1月29日，璞科第得到转告，庆

① 见第75号卷，第5部分，美国大使1902年1月21日(2月3日)的照会。照会于1月23日转交给了拉姆斯多尔弗(见同上案卷，他23日的奏折)。

② 见附于拉姆斯多尔弗1月24日信中送到财政部办公厅的对美国大使复照的草稿，维特当天给拉姆斯多尔弗的回信("完全赞同草稿所述的看法")，特别是拉姆斯多尔弗1902年1月27日给喀西尼的电报；不妨提一下，电报肯定说，部里"尚未确切获悉银行与中国政府协定的全部详情"(见第75号卷，第5部分)。对于美国照会直接而明确的含义是不容作任何其他解释的。照会第二段声称："我受权告诉您，对于中国向一家商务公司提供在它领土范围内经营矿山、以及建筑铁路或享有其他工业权利的独占特权的任何协定，美国政府都不能不表示忧虑"。

③ 见同上，璞科第1902年1月24日的电报和雷萨尔1月25日的电报。美国驻北京公使也"由于华俄道胜银行的满洲协定"而对雷萨尔说："假如俄国不坚持这个协定，那末，谁也不会反对政治专约的"(见同上，雷萨尔1月21日的电报)。海约翰也向喀西尼解释说："他认为，缔结关于逐渐从满洲撤军的专约是完全适宜的"，他只是反对"对外国工业的完全排斥"(见同上，喀西尼1902年1月26日的电报)。

亲王已表示拒绝继续就银行协定进行谈判，这才算结束了维特一厢情愿的“巩固俄国在满洲的绝对势力”这一旷日持久、令人疲惫不堪的尝试。① 而这种尝试的直接后果恰恰在它结束后的第二天 347
就呈现在俄国政府面前：1 月 30 日(2 月 12 日)，日本驻彼得堡公使将早在 1 月 17 日(31 日)于伦敦签订的英日同盟条约文本通知了拉姆斯多尔弗。②

日本公使的通知对俄国外交界是一个晴天霹雳。这也立即使俄国改变了它原先在撤军条约问题上的态度。③ 2 月 12 日，联芳在北京转告雷萨尔，庆亲王要求俄方“全盘接受”对总的协定的12月的修改意见，并暗示，正如雷萨尔所理解的，“如不迅速达成撤军协定，外国将趁此机会加以干涉”。这时，维特立即收回了他对中方要求俄方作出让步的一切反对意见，并表示坚决主张签订协定。这一协定尽管在形式上和部分地在内容上不大完善”，但只要能在一旦列强干涉时，避免出现“使我们民族自尊心遭受屈辱的新的障碍”就好。于是俄国公使当即得到指示，“尽力加快关于撤军条件的谈判”。④ 只是在中国人最后提出的那一点上，俄方试图稍作坚 348

① 见第 75 号卷，第 5 部分，彼得堡 1 月 30 日收到的璞科第 1 月 29 日的电报。庆亲王借口“美、日方面提出了坚决抗议”。

② 见《德国外交文件》，第 17 卷，第 5047 号，阿尔文斯勒本 1902 年 1 月 31 日(2 月 13 日)发自圣彼得堡的电报。

③ 直到英日条约公布前，在东京的伊兹沃利斯基“根本丝毫没有料到”此事，因而“十分尴尬”〔见第 12 号卷，阿列克谢耶夫 1 月 31 日 (2 月 13 日) 发自横滨的电报〕。拉姆斯多尔弗对公使的通知也“感到完全出乎意料”〔令人十分惊讶 (vollständig überrascht)：《德国外交文件》，第 17 卷，第 5047 号〕。

④ 见第 75 号卷，第 5 部分：雷萨尔 1902 年 2 月 12 日的电报，阿列克谢耶夫 2 月 16 日从旅顺口发给陆军大臣的电报，维特 1902 年 2 月 20 日给拉姆斯多尔弗的信，拉姆斯多尔弗同年 2 月 22 日给库罗帕特金的信，以及拉姆斯多尔弗 2 月 25 日给维特的信。在这后一封信中，拉姆斯多尔弗建议，同意中国关于撤军和在 1902 年 9 月 26 日之前将牛庄的民政管理移交给中国的新的补充要求，作为此项的交换条件，中国人同意将撤军期限从十二个月延长到十八个月。并见阿列克谢耶夫将军 2 月 16 日发自旅顺口的电报，内称，在满洲出现了“许多日本臣民”，他们抱着“侦探”的目的，“不受拘束地沿着铁路窜来窜去”，电报还说，在旅顺口的日本商人对于结束营业表现了“出奇的镇静”，又说，盛京将军的行为发生了不利的转变，拉姆斯多尔弗收到这份电报正是在 2 月 25 日。

持。在俄方全盘接受中方要求的各项让步之后，中方就谈到要把那项所谓附带条件从条约中去掉，这项附带条件"以普遍的安定和列强的行动方式作为撤军条件"，(按照中国人的看法)它"把我们关于撤军的承诺化为乌有"，于是，事情日复一日地拖延着，假如最后维特不下令"即便要花很多钱"也要结束此事，事情已经完全有告吹的危险。①3月18日，璞科第"答应付给王文韶二万两，给其他小人物一万两"，于是3月26日，中国人保留了那项条件，签署了撤军协定。而这项条件确实为俄国政府提供了正式的理由，使其能将满洲的俄军一直驻扎到日俄战争的时候。②

由于义和团暴动，俄国在换得辽东以后，在料理好已有的猎物之前，已不能再图谋在远东取得任何新的东西了。从义和团暴动一开始，穆拉维约夫就对中国采取了一种单独政策。这种单独政策，尤其是维特当时对满洲，乃至相机对中国边疆各省重行采取的垄断政策，提高了、并在一年多之中保持了一种政治温度，这种温度对于那个置俄国于死地的远东国际联合体的成熟是极为有利
349 的。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法、英、德各国偏偏都单独寻求过与俄国签订协定。俄国外交界相继拒绝了所有这些束缚其行动自由的协定，并为自己提出了这样的任务：依靠"被收买的"李鸿章，不采用武力，而通过"和平"途径摆脱已经产生的"困难"，如果这一招成功，俄国在对华关系方面就置身于列强的共同行动之外了。然而，为了保卫铁路，又必须派兵进入满洲，并开始直接的军事行动，这

① 见第51号卷，第3部分，维特3月11日给璞科第的电报，璞科第3月16日给维特的电报。

② 见同上，璞科第1902年3月18日和3月29日的电报。俄国共花钱四万零六百五十六卢布。从四百万基金("李鸿章基金")中付出这笔款之后，在财政大臣名下存于华俄道胜银行的还有二百三十四万二千二百二十八卢布二十四戈比(见同上案卷，第63面，财政部办公厅的查询报告)。

就使俄国在外交上无须再拒绝参加对北京的征讨了，而且实际上把俄国引入了与中国的战争状态，使俄国政府置身于共同要求赔偿战争损失的行列之中。

早在1900年初就有这样一个打算：除计划规定在远东进行的工程（这些工程看来本来就与俄国的经济状况不相适应）外，今后暂停一切开支。维特违背这一设想，迎合了正是他自己导致的李鸿章关于政治与经济补偿的提议，这些补偿不仅关系到部分或全部放弃金钱赔偿，而且使俄国国库必须为在满洲经营新的企业准备新的基本投资。并且，维特还提出与根据他的请求予以占领的满洲各省当局同时开始谈判，这些谈判是按照他赞同的、违背中国的"不可侵犯性"、侵犯中国主权的提纲进行的。到1901年1月，这些省级临时协定中的一个已经公诸于众，并成为一系列大国实行外交联合的借口，以反对俄国在列强——"胜利者"与中国缔结共同条约前与中国签订任何"单独"协定。在这一时刻，俄国外交家遂着手与中国中央政府进行基本谈判。

维特迷恋于在满洲"巩固"俄国的"绝对势力"的主张，加之情 350
势又使他重与李鸿章直接接触，于是，他忽略了不能使1895年和1896年的局势在当时重演的种种因素，这些因素是：美国"门户开放"的要求（暴动一开始，美国便与其他大国一致行动，这项要求就得到了各国的支持）；① 日本坚决拒绝在满洲完全恢复原状② 之前与俄国达成任何关于朝鲜的协定（早在单独谈判开始前，彼得堡就已获悉此事）；以及与英国协商从北京到满洲的铁路的尝试碰了钉子。有什么东西没有包括在财政部里炮制的"单独"条约最初草案的侵夺范围之内呢！又是满洲的主权，又是为中东铁路公司霸占大片的土地（其中包括与朝鲜接壤的有名的鸭绿江流域，以及鸭绿

① 见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第228—229页。

② 原文为 status quo。——译者

江口的一个海军基地)，又是在所占的整个地区内扩充俄国的武装护路军和普遍实施俄国管理，又是要求建筑到营口和到北京的铁路线，又要在满洲以及在同俄国接壤的中国所有各省中完全排斥他国人的工业企业，还禁止他国人在那里修筑铁路，如同俄国刚刚(1900 年)在波斯和小亚细亚北部地带所达到的那样，又是到铁路全部竣工前对满洲公开的军事占领的合法化，而铁路完工就将使对满洲的再度占领在一旦需要时几天即可实现。不难理解，甚至被拉姆斯多尔弗修改得温和一些的、在他看来较为“爱好和平的”计划，事实上也丝毫没有涂上“脂粉”，并且由于列强的共同努力，在一片反对的喧嚣声中破产了。

351 俄国外交界虽然确知，日本的战争准备正在进展并近于结束，但是，看来它没有料到柏林、伦敦和东京正在为三国同盟，甚至把欧洲的三国同盟发展为五国同盟所采取的步骤。于是，俄国外交界开始试行新的计划：不与中国签订任何协定，以俄国放弃对满洲的“政治侵占”为基础，靠损害中国的利益，就俄方在朝鲜的让步与日本达成协议(1901 年 7 月)。但在这些日子里，连英国也断然改变了方针，去与日本结成两国同盟，使日本感到拘束的德国没有再参加同盟。此后，北京也采取了相应的步骤。彼得堡经不住中国关于重开单独谈判的要求，而李鸿章 7 月份的出面在客观上是给天平秤英国一边加了砝码。如果东京确实只是在英俄两者的抉择上举棋不定，那末，关于俄国从满洲撤军的新条件的情报便会使日本拿定主意。俄方要求：把“满洲全境”交到“银行手中”，又不允许他国人到满洲去，还要尽快筑完铁路，以及使铁路军队的定额达到预定标准，并在最近一年半之内保持对该地的占领，若仍嫌期限太短，尚可延长一些。俄国外交界继续把它的全部希望建立在李鸿章个人的利害关系上，并想从中得到保障，保守与政府及与银行的双重谈判的秘密。俄国外交界急于在伊藤访华前在手头拥有一份

商定谈妥的对华条约，以便“随后”向日方“进行注册”。

李鸿章之死从主观上打破了这一指望。但彼得堡不知道，正当李鸿章由对话转向行动、要求给他银行协定文本(9月24日)并对俄国的要求提出强硬抗议(9月27日)的时候，东京政府已经不可变更地作出了有利于英国的抉择。是伊藤在彼得堡谈判的对手们(维特和穆拉维约夫)自己把他们对日本的估计建立在这样的基 352
础上：为完成军事和铁路的全部准备工作要赢得时间，日本“已不止一次地占有过朝鲜”，又“不止一次地”“从那里离开了”。但是他们甚至关于朝鲜问题也没有不加反对地全盘接受日方条件。① 与此同时，在俄国作出答复前几天，东京已对英日条约表示赞同，于是，那个国际联合体就生效了。关于它的宗旨日本外交界一开始就声明：一旦俄国企图在朝鲜立足，在英德两国保持中立的情况下，日本“就会干到底”；而只有在德国保持“友善的”中立、英国给予“实际的”援助的情况下，日本才会由于满洲去开战。② 但是，如同在海约翰1901年3月15日提议后彼得堡所获悉的那样，正是在满洲问题上，而不是在谁将负担满洲的军事和民政管理费用问题上，正是在满洲的“门户开放”问题上，日本此时赢得了美国这个新的同路人，有了这个同路人，日本就无须非要寻求德国的“友善的中立”不可了。

可是如今柏林却担心，德国人在英日同盟的准备中不仅没有积极参与、而且没有默许，这一点可别引起俄国人的“任何怀疑”。拉姆斯多尔弗“十分严肃地”看待有关英日同盟的消息，使柏林“感到十分高兴”。而使柏林“更加”高兴的是，又是拉姆斯多尔弗首先而且立即谈起，为了避免目前“随时”可能发生的战争，“其他大国

① 见第12号卷，维特1901年11月28日给拉姆斯多尔弗的信。

② 见本书边码第308页。

353 团结起来”是有必要的。① 的确，现在该是轮到俄国来与德国亲近了。阿尔文斯勒本没有久等，拉姆斯多尔弗就亲自同他谈起了这样的共同“宣言”，在这一宣言中应当阐明，“如果中国或其他国家损害宣言签署国的权利或利益，它们将讨论必须采取的措施”。②

① 见《德国外交文件》，第17卷，第5047号和5048号（驻彼得堡大使将法国大使转告他的拉姆斯多尔弗第一次获悉英日条约时的讲话告知了本国，比洛的注释记述了威廉得知此讯后的印象）。

② 见同上，第5049号，阿尔文斯勒本1902年2月3日（19日）发自圣彼得堡的电报。

第六章

战前的最后阶段

(1902—1904年)

I

根据1902年3月26日(4月8日)条约，俄国应于1903年9 354
月26日(10月9日)前从满洲撤出野战军。这项条约本身就是俄国政府在外交上有目共睹的失败的结果。但维特在签订条约的最后时刻买到了践约的附带条件，因而使该项义务的履行从一开始就变得复杂起来。此外，俄国政府七年来为了在中国追赶和阻拦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力所不及地推行一个庞大的帝国主义计划。假如没有上述这些情况，那末日本为实现1895年的《马关条约》而在这些年里集结兵力要从外交上做的准备工作就会困难得多。但是，限期从中国领土撤兵的问题与俄国今后的满洲政策问题是交织在一起的，因此在远东范围内它的局部的国际意义就增长了。不管这个问题在远东如何解决，都不能排除俄日之间的军事冲突。现在英日同盟已经缔结，俄国从满洲限期撤军的问题尤其在欧洲对俄国来说也处于一种复杂的国际关系中了。它在欧洲也成了一场大角逐中不可替代的好牌。

从1902年3月26日签订从满洲撤军的不幸条约，到1904年 355
1月26日日本军舰"突然"袭击旅顺口的俄国舰队，历时二十二个月

整。其间俄国已撤出多半军队，[①] 尚留在满洲的不得超过四个月。与此同时，欧洲的国际关系发生了急剧的、根本性的、"划时代"的调整。这方面的主要事实有：英国在 1902 年初坚决转为联法反德；德国外交界在 1901 年夏季试图防止英法接近，但它错过了最后一次机会，因此今后必须竭尽全力克服它在欧洲舞台上"孤立"的严重处境，并寻求与俄国接近。现在德国已失掉了意大利这个盟国，与俄国接近可能同时使德国冲破法俄同盟，而从"鹰爪"下挣脱出来。[②] 由此可见，俄国在不久的将来要被卷入英德冲突之中。这种前景使尼古拉二世政府必须从速作出抉择：或改变俄国历来对英政策的既定方针，或为恢复三帝国的传统同盟而破裂同法国的同盟。否则，俄国政府无论在对外政策方面，还是在国民经济管理方面都要作出难以想象的努力，而俄国国民经济是无力摆脱依附于欧洲金融市场"帮助"的状态的。

在行将到来的斗争中，英德两国是同样需要利用沙皇帝国的
356 强大势力的。但在上述情况下，这一任务便变成了另一项任务：迫使俄国政府在主观上和客观上都不能在斗争各方之间永远保持中立立场。这就是说，削弱俄国成了双方在角逐中紧迫的和最可靠的手段。在这一方面也展现了在远东酝酿多年的对俄大战的某种前景。德国外交界不是不知道缔结英日同盟的外交准备，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参与其事的。英国以英日结盟开始了这场角逐，所

① 此处与史实不符，与本书上下文的叙述也明显矛盾。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签订后，沙俄毫无践约诚意。在第一撤兵期内撤出的俄军被调驻于中东铁路沿线。到第二撤兵期时，沙俄公然拒绝撤兵，并节外生枝，提出七项新的要求，作为撤军交换条件。以后随着俄日关系的尖锐化，沙俄又向我国东北大举增兵，重新占领奉天，并占领了南满境内过去未占的一些地方。这些情况在本书中也有所提及，如第五章边码第 348 页就说到：撤军的附带条件"确实为俄国政府提供了正式的理由，使其能将满洲的俄军一直驻扎到日俄战争的时候"。——译者

② 见《德国外交文件》，第 17 卷，第 5186 号。梅特涅 1902 年 1 月 17 日（30 日）发自伦敦的电报；关于意大利和法国 1902 年签订的互不侵犯与互守中立的秘密协定，见扎伊昂奇科夫斯基：《俄国对世界大战的国际准备》，莫斯科，1926 年版，第 116 页。

以连驻东京的伊兹沃利斯基（此公刚治愈自己幼稚的乐观主义毛病不久）现在也明白了，“今后俄日关系中的症结不在东京，而在伦敦。现在我们和日本之间若签订协定，圣詹姆士内阁未必不详知底里，协定未必不经其赞同，它甚至可能在某种程度上直接参与其事”。①

拉姆斯多尔弗建议，以俄德两国为首的大陆国家采取一致行动，反对英日同盟条约（彼得堡的俄国外交界把它看作战争的工具），并以此恢复俄德两国过去在远东的“携手政策”。② 这一建议与两国在两位皇帝的“私人协商”中有过短时期间断（前面已经指出）、而从 1901 年 8 月但泽会晤时起采取的互相迎合的步骤是完 357
全吻合的。③ 当尼古拉政府在单独缔结对华协定一事上感到失望时，威廉于 1901 年 4 月 7 日（20 日）不失时机地巧妙地邀请尼古拉去但泽会晤（尼古拉于 5 月底接受了邀请）。其时，柏林刚刚得知庞德泽克将军 2 月在彼得堡参谋本部谈判的内容，即“法国为今后得到政治上的让步，首次成功地利用了俄国（拮据的）经济状况”（1901 年巴黎贷款的条件是，立即修筑从谢德列茨到博洛哥耶的战略铁路）。因此，但泽会晤本身在客观上就具有了保障欧洲某种均势的意义，它还为在北京业已开始的有关单独协定的第二轮谈判作了外交准备。④

---

① 见第 12 号卷，伊兹沃利斯基 1902 年 5 月 5 日发自东京的急电。

② 原文为“Hand in Hand politik”。——译者

③ 见本书边码第 294 页注②和 209 页注①，以及《德国外交文件》，第 17 卷，第 5049 号；阿尔文斯勒本 1902 年 2 月 3 日电报。但泽会晤于 1901 年 8 月 29—31 日（9 月 11—13 日）举行，见《德国外交文件》，第 18 卷，第 1 分册，第 5385—5396 号。

④ 见《德国外交文件》，第 18 卷，第 1 分册，第 5384、5385 号，威廉和尼古拉 1901 年 4 月 7 日（20 日）和 8 日（21 日）的来往电报；第 5386 号，比洛 1901 年 5 月 29 日（6 月 11 日）关于尼古拉通过海军武官泡利向威廉转告会晤条件的奏疏；第 18 卷，第 2 分册，第 5893、5894 号，阿尔文斯勒本 1901 年 5 月 24 日（6 月 6 日）的电报，其中谈到庞德泽克 2 月在彼得堡的谈判情况（参见前引扎伊昂奇科夫斯基：《俄国对世界大战的国际准备》，莫斯科 1926 年版，第 91 页）。

无论如何不容怀疑，在但泽会晤中曾谈到德国在远东支持俄国的问题，所以拉姆斯多尔弗和维特甚至都作了准备，必要时把他们打算当时在北京严守"秘密"的要求的主要之点原原本本地通知德国政府。① 当然，这时俄国方面也谈到，俄国希望能够实现俄德同盟，谈到大陆集团的主张是遥远的将来的事情，现在尚不成熟，
358 但沙皇一定使其实现。还谈到，俄德两国利益毫无冲突之处，而英国的政策是利己主义的，因此同英国人没有商量的余地。拉姆斯多尔弗甚至两次表示："德俄两国如能缔结同盟，便是最大的幸运，这个目的应该达到。"尽管以后再没有类似的对话，但从第一次会谈看来，已经谈得够深的了。所以也在10月间在斯帕拉拜访过尼古拉的亨利亲王曾警告比洛，不应再"促进"已经开始建立的友谊了，在这两次会晤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最好别再"打扰"尼古拉。② 尼古拉在斯帕拉曾明白表示，他现在最感兴趣的是西伯利亚铁路，期望能在五、六年之内全部筑完，因此，他需要向法国借钱。所以德国人应该懂得，在这个时候要尼古拉同法国断绝关系是完全不可能的，尽管他愈来愈意识到，君主国家面对革命运动，有必要联合起来。③

拉姆斯多尔弗建议就英日同盟发表一个共同宣言，这一建议使柏林感到诧异是毫不奇怪的：柏林把1902年1月17日(30日)的条约看成是对俄国的"严厉惩罚，它对俄国不完全是冤枉的，因

① 见《德国外交文件》，第18卷，第1分册，第5402号，第41页，比洛在阿尔文斯勒本1902年2月14日（27日）信上的批语。奥斯坚-萨肯说："在但泽已向我们表示，在远东将一致行动！"参见外交副大臣奥鲍连斯基1901年9月3日给维特的信："拉姆斯多尔弗请转告"维特，"他对但泽谈判始终是很满意的，同时无须再把我们同中国关于从满洲撤兵的协定草案通知德国了"(见第74号卷，第4部分)。

② 见同上，第5395号，比洛1901年9月1日(14日)关于但泽会晤的奏疏；以及第5399号，比洛1901年10月22日（11月4日）关于亨利亲王与尼古拉在斯帕拉会谈情况的报告。

③ 见同上，第17卷，第5052号，阿尔文斯勒本1902年2月13日(26日)关于他和尼古拉是年1月4日(17日)进行的一次"重要"谈话的电报。

为俄国与英国调情，在布尔战争时态度消极，对德国态度冷淡，对威廉的友好表示麻木不仁”。德国人怀着幸灾乐祸的心情瞧着拉姆斯多尔弗惶惶不可终日，最终他们看出了一个明显的迹象：俄国“特别在远东”暴露了它的一个“致命弱点”。实际上俄国此时正打算从已形成的紧张状态中捞到好处，它所希望的不多不少，正是恢复 1895 年时的亚洲三国同盟。① 这就太过分了。柏林回绝了拉姆 359
斯多尔弗的建议，解释说，德国外交界不会在远东采取任何直接的外交行动，因为这只能使美国公开参加反俄图谋，并使德国在太平洋上的微不足道的舰队首先遭到它的打击。然后，比洛问俄国大使：有什么可以保证俄国今后不会在一定的情势下在欧洲被迫与法国联合共同进攻德国呢？不久前，在义和团暴动中不正是俄国外交界用对华的“温和”政策教训了德国吗？

德国外交界的拒绝刺痛了尼古拉，但没有使俄国止步不前，因为很明显，在世界政治中，在“仇俄情绪增长”的情况下，尼古拉及其刚刚在斯帕拉宣布的远东纲领（即俄国自己不要满洲和朝鲜，但也决不把它们让给其他国家）反正都是走投无路的。同样十分明显，不仅尼古拉，甚至连维特都不愿完全靠一个法国开恩。据彼得堡灵通人士的消息，由于“政治上的”考虑，俄国在很久不贷款以后，1902 年初竟不到法国市场，而到德国市场筹措借款。最后拉姆斯多尔弗又在张罗他那“小小的宣言”了，他首先把这宣言作为恢复个人名誉的手段。而且刚好在 1902 年 1 月柏林得到情报（并通知了彼得堡），内称张伯伦和康邦已开始了英法关于一切殖民地问题的谈判。虽然奥斯坚-萨肯一再断言，“任何一位法国阁员的亲英主义都不会超过俄国所允许的程度”，但尼古拉对威廉的“个人信任”（柏林把它看成是“政治角逐”中的一张“好牌”），在英法已 360

① 见《德国外交文件》，第 17 卷，第 5048 和 5050 号，比洛 1902 年 2 月 9 日（22 日）给阿尔文斯勒本的指令。

开始“互相献媚”的时候，仍是应该得到新的养料的。①

尼古拉完全承认，拉姆斯多尔弗遭到拒绝是有道理的，但他又相信彼此在但泽作出的关于“双方在远东的利益是一致的表示”，因此期望今后总有一天会“团结一致的”。对此威廉嘱咐人转告尼古拉说，“为了从欧洲后方防卫沙皇，使其在欧洲从水陆两方面均能免遭攻击，他② 不应束缚自己的手脚”。结果此事并没有破坏已开场的角逐，它只是削弱了拉姆斯多尔弗的地位，加强了两位君主之间的直接联系。威廉通过同俄国海军武官的谈话很快就相信，这年夏季行将举行的勒维尔会晤将比但泽大大前进一步。他还确信，“对某件事情极感恐惧的气氛”笼罩着彼得堡。泡利在对威廉的坦率谈话中“当面直言”，俄国在“热切地”期待着威廉的同情。③

确实，1902 年 7 月 24 日—26 日在勒维尔举行了会晤。此次会晤的形势不如但泽会晤时那样有利于尼古拉。在西皮亚金遇刺以后，尼古拉怀着“极反动”的情绪到了勒维尔，滔滔不绝地说，必须同无政府主义作斗争，说这是他个人特别感兴趣的事情。尼
361 古拉在和比洛的谈话中公开辱骂托尔斯泰是“俄国可恶的天才”，并不大适时地表示，宪法可能是“俄国的末日”。他和比洛仅就对外政策中的远东问题进行了研究。尼古拉对日本显然大为恼火，他宣称，他认为“巩固和扩大俄国”在远东的“影响正是他在位期间

① 见《德国外交文件》，第 17 卷，第 5050、5051 号，比洛 1902 年 2 月 12 日(25 日)关于他和奥斯坚-萨肯谈话的报告；第 5057 号，阿尔文斯勒本公历 3 月 4 日的电报；第 5052 号，阿尔文斯勒本 2 月 13 日(26 日)的电报；第 5186 号，梅特涅 1902 年 1 月 17 日(30 日)发自伦敦的电报；第 18 卷，第 1 分册，第 5399、5408 号，里希特霍芬 1902 年 3 月 21 日(4 月 3 日)给比洛的关于威廉与泡利会谈情况的报告；第 5404 号，阿尔文斯勒本 1902 年 3 月 2 日(15 日)给比洛的信；第 5409 号，比洛 1902 年 3 月 23 日(4 月 5 日)给威廉的电报。

② 指威廉。——译者

③ 见《德国外交文件》，第 17 卷，第 5057、5408 号(威廉说：“俄国的求爱是十分热烈而动人的，它必定有什么极感恐惧的事情。”)(原文系德文。——译者)

的使命”。[①] 毫无疑问，威廉会再一次答应“防卫俄国的后方”，“黄祸”问题是两位皇帝会谈的题目。威廉早在 1895 年就认为俄国在反对“黄祸”斗争中是走在最先的，他们曾由“黄祸”问题谈到了俄德舰队联合与英日舰队抗衡的问题。[②]

在但泽会晤时，尼古拉的脑际已“萦回着”对维特方针的怀疑和不信任了。尽管如此，满洲对外人关闭的条约尚未签订，俄国外交界仍指望利用在走运的 1896 年和 1898 年通过李鸿章屡试不爽的办法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如今，1902 年 7 月，尼古拉带着中俄协定来到勒维尔，他见到的每个人都可能问他，为什么不在去年 3 月签订这个协定，以避免在远东形成反俄的三国集团？现在尼古拉本人准备怎样防备日本对不设防的旅顺口的突然袭击，防止日本组织中国部队对南满支线进行突然袭击？总之，他今后打算怎么办？（我们前面提到过的柏林小册子[③]也曾向维特提出了这一问题。）尤其是对日本占领朝鲜，并把朝鲜变为日本进攻南满的后方[④]这一问题是怎样考虑的？他是否还一如既往（如 1901 年 10 月在斯帕拉）把此事看作开战的理由[⑤]？根据 1 月 17 日（30 日）英日条约，就严格的字面意义而言只有在两国进攻日本时，英国才有义务出兵。因此，即使德国为了不让英国舰队卷入这场角逐，自己不直接参与远东的斗争，而使俄国把波罗的海舰队全部调到太平 362
洋，并由德国对喀琅施塔特的安全负责，即使这样俄国舰队比起日本舰队来不也仍是力量悬殊的吗？[⑥]

---

① 见《德国外交文件》，第17卷，第 5416 号，比洛 1902 年 7 月 26 日（8 月 8 日）发往伦敦给梅特涅的通知。

② 见《威廉二世和尼古拉二世通信集》，第 7—8、41 页，威廉 1895 年 4 月 13 日（26 日）和 1902 年 9 月 2 日（15 日）给尼古拉的信。

③ 即《满洲问题。奉献给 C.Ю.维特》。见前面边码第 40 页及以下各页。——译者

④ 原文为 Hinterland。——译者

⑤ 原文为 Casus belli。——译者

⑥ 见《红档》杂志，第 18 卷，第 45—46 页，维特 1901 年 7 月 12 日给西皮亚金的

正如双方所希望的，勒维尔会晤是“团结一致”的实际表现，但却不是如俄国一厢情愿的那样，使德国政府就远东事务发表一个“公开宣言”，而是两位皇帝之间交换了私人电报。电报记录了这次会晤的意义，以便有机会时转告英国人。如同德国方面所说的，会晤说明了两个大陆同盟的牢不可破的亲密关系，这种关系反对一切为了战争目的而对同盟进行改组的任何企图。①

1902年3月3日（16日）的法俄宣言可以看作是法俄同盟扩
363 大到远东的表示。这个宣言说明，俄国不打算如此轻易地在英日威胁面前让步。由于这一宣言，在发生了这一切之后，1902年3月26日从满洲撤军的中俄条约的公布，未必会被在远东联合反对维特满洲计划的三国中的任何一国，作为一种令人快慰的征候加以接受。② 这项协定无疑是三国集团外交上的一个表面胜利。但是，

信：“别佐勃拉佐夫每星期至少有两次去见皇上，一坐就是几小时……皇上对我什么也不说。我念完奏疏就完事了……皇上却有些不安，一些想法在他脑际萦回。”参见本书边码第40—42页关于1902年5月柏林小册子的叙述。关于日本占领朝鲜是俄国开战的理由（casus belli），这是尼古拉在1901年秋季在斯帕拉对普鲁士亲王亨利说的（见《德国外交文件》，第18卷，第1分册，第35页）。

① 见《威廉二世和尼古拉二世通信集》，第43页，威廉1902年10月18日（31日）给尼古拉的电报。威廉在电报中“提议”，如爱德华及其大臣们问到勒维尔会晤，就作如下答复：“大俄罗斯大皇帝陛下作为两国同盟的首领，我作为三国同盟的首领，双方均抱有为我们民族和我们朋友保障和平这一伟大目标。因此我们致力于维护和平，并尊重愿巩固和发展各自商业和经济地位的大陆各族人民的利益。”现已查明，尼古拉对“准备作出的答复”“是赞同的”〔见《德国外交文件》，第18卷，第1分册，第5418号，威廉1902年10月19日（11月1日）的电报〕。此后威廉多次运用了这个公式，见《威廉二世和尼古拉二世通信集》，第44页。

② 1902年3月3日（16日）宣言见《远东事务的条约和外交文件汇编》，第533页，拉姆斯多尔弗在1902年2月7日的照会中劝说法国同意这个宣言，并答应“如法国在华南和英国发生任何误会，始终可望得到俄国的支持”。见托姆辛斯基：《论俄国专制政体的社会性质问题》，共产主义大学《通报》，第15卷，第273页。参见《德国外交文件》，第17卷，第5065号，埃卡尔德施泰因1902年3月8日（21日）发自伦敦的电报，内称：英国内阁认为，“法国站在俄国一边进行干预，因而向英国公开实现宣言的条件（casus foederis）是不可能的”。3月3日（16日）宣言立即“打破了这种幻想，并给人造成一种失却信心（unsicherheit）的感觉”。法国驻柏林大使也对法俄联合、反对英国的行动感到“担忧”。见同上，第17卷，第5064号，诺埃莱侯爵与比洛1902年3月7日（20日）的谈话。

在尚未证实俄国在满洲事务中的全部行为确有明显的急剧变化之前，要立即相信俄国外交界这次已不再企图用正面运动或迂回运动的方式实际上关闭满洲门户，是没有任何根据的。3月26日条约的签订丝毫没有缓和远东的紧张空气。而1902年4月10日(23日）拉姆斯多尔弗与斯科特之间就条约进行的针锋相对的谈话只能表明，俄方极其恼怒，这次谈话还是对满洲问题悬而未决的一个警告。如果说英国人此时不准备"用放大镜"来看待不能使他们十分满意的若干"决定"，那末日本却在"令人放心的"中俄条约公布之后，在如今战争必不可免和迫在眉睫之类传闻的喧嚣声中，立即着手实现其海军计划的第三部分了。① 当时，英日同盟使日本处于英国步兵的地位，众所周知，日本从这一同盟中为其正在准备的战争汲取了极大的力量和信心。 364

① 拉姆斯多尔弗和斯科特的唇枪舌战见«蓝皮书»(中国，第2册，1904年)第52和53号，斯科特指出，譬如说，"在中国发生乱事"的情况下，这项尽人皆知的附带条件为俄国解除了它所承担的义务。他问道，"俄国报刊上登载的满洲发生新的乱事的消息又有几分真实性呢"？拉姆斯多尔弗回答说，他"随时都把这项附带条件包括在他的说明中"，他并不认为报刊上的传说有什么意义，比方说，他认为"不必要求雷萨尔正式证实"华南(英国范围内的)乱事的消息是否属实。拉姆斯多尔弗指出，总之，他"对列强付出了如此重大的牺牲才换来的正常秩序的最终结果抱有很大怀疑"。他担忧，"我们不久前所经受的困难会再次重演"。

关于东京的秘密会议和同意山本的第三期海军计划一事，见第12号卷，阿列克谢耶夫1902年5月12日(25日)发自横滨的电报，内称：("在满洲协定签订以后，俄国大力扩充东西伯利亚陆军部队，并不断加强太平洋舰队，日本认为这是示威行动……据可靠消息，最近不止一次召开了有陆海军参谋长参加的各部大臣会议")。并见第79号卷，第1部分，伊兹沃利斯基1902年5月30日发自东京的电报，伊兹沃利斯基否认阿列克谢耶夫的传闻具有"重要意义"。又见同上案卷，阿列克谢耶夫1902年10月13日的报告，内称："日本各大臣会议的结果是，大臣会议同意山本将军关于加强日本舰队的第三期计划草案。"又见同上案卷，璞科第1902年2月27日(3月12日)的电报，内称："关于日俄战争必不可免的令人惊慌的传闻正在上海和旅顺口盛行。"并见第12号卷，什捷英1902年4月17日发自汉城的电报，内称："在朝鲜与满洲交界处有形形色色的为数众多的日本人。日本军官和低级军士正在大城市中教练朝鲜士兵。日本军官到处进行细致的侦察工作……居民中盛传日俄将在5月开战……日本人四出购粮，并运往济物浦和元山。"

后来，甚至当尼古拉得知法国表示不受三月宣言约束时，他仍要保持同法国的同盟。正如战前不久，1903 年 10 月，他在威斯巴登对威廉解释的那样，这是为了使法国不至弄出不幸事情，不至"倒向英国一边"。显然，尼古拉不想在一旦发生英德战争的情况
365 下使俄国必须在两个新形成的集团之间作出抉择。但是，正因为俄国在欧洲采取这种态度，这就要求它现在无论如何要避免在东方对日作战。在英日同盟条约签订后，如果要使避免日俄战争这件事一般说来不至成为一种奇谈空想，那只有通过签订一项公开的全面的协定才可以办到，这项协定首先要允许日本进入大陆，并为日本能在大陆上巩固其地位提供现实的保障，而且不允许把这项协定变成俄国实现缓兵之计的必需的工具，等到俄国力量不久强盛以后，再把日本赶出大陆。然而该项协定本身也要求俄国政府更认真地修订它的整个远东计划。它是同 1891 年—1892 年的铁路计划相联系、相承袭的。从 1895 年起铁路计划已开始实施，并要在以后数年中逐步加以实现，其办法是期望把俄国资本和外国资本（在俄国监督下）输入中国和朝鲜，以便经营两国当时已开始经办的工业企业。除此之外，俄国的铁路计划自始至终无可比拟地增加着对北京政府的军事政治压力，从而威胁着中国。

这两项计划均极其庞大，它至少在十年内使俄国的欧洲部分精疲力尽，而且制订两项计划时的局势是与 1902 年时大不一样的。显然，这些计划是蓄意针对英国的，而其中第二项计划主要针对日本。这两项计划孤立地反对英国，也孤立地反对日本，它们已于 1895 年合而为一。两项计划的满洲部分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要归功于法、德两国的支持。在第一次对计划进行基本投资时，
366 不仅法、德两国根本没有工业危机和财政危机，而且似乎殖民地所属国的经济发展又会从这两项计划的实施中汲取新动力。从 1895 年以来，俄国的远东政策最关心的是俄国的中心企业中东铁路的

利益。全路工程在1902年大体完成，其中二千四百俄里的路段已"临时"通车。然而要到1903年夏季铁路才能交付"经营"，并且还是勉为其难的。尽管1903年夏季后仍不断施工，但到1904年1月甚至还有"未完工程"，还需五千七百万卢布。更不用说预定1902年完工的环贝加尔湖铁路了，这段铁路估计要到1905年才能竣工，而贝加尔湖的轮渡在1902年却使铁路全线停车了十二天。①

不久前发生的国内危机此时已向王朝及其政府全部公开展示了令其惶恐不安的社会政治内容。这样，重新调整欧洲的国际关系以及国内危机这两个基本的事实已为俄国政府看得一清二楚了。但实际上为时已晚，因为领土让步或停修中东铁路都是"不明智的"。②但是加速筑路工程，甚至使工程以飞快的速度进行也无济于事，因为日本一如既往仍保持着已经取得的优势地位，它正注视着即将完成的对它有致命危害的筑路工程，并等待时机，以便用武力迫使俄国止步。同时，恪守3月26日中俄条约规定的期限问题，仍然是联合主张在满洲实行"门户开放"的那三大国的监督对 367
象，这是有目共睹的。而这项条约就是对满洲命运两度实行国际监督的结果。在1月17日(30日)英日签订同盟条约的情况下，恪守撤军期限问题正式成了战争的辅助工具了。

另一方面，关于撤军期限的附带条件包含了极大的危险性，因为3月26日条约中规定的撤军期限，既没有考虑到撤军的技术问题，也没有考虑到与铁路竣工的时间相吻合，以及将二、三万兵力的护路军完全装备起来接替将要撤出的野战军所需要的时间。中

① 见《中东铁路。中东铁路公司董事会办公厅编纂的史纲》，第1卷，第236页，并见维特关于他1902年秋季巡视远东的奏折，内称："1900年—1901年冬贝加尔湖的客运停了十八天，1901年春停了二十九天，1901年—1902年冬停运四天，春季停运八天，货运停的时间更长。"

② 见本书边码第42页。

国方面曾提议撤军期限为十二个月，连维特也认为期限太短，结果双方议定为十八个月。后来证明，要使铁路充分动员起来以供军用，这十八个月也是不够的。[①] 但这一人人皆知的附带条件却无可比拟地增加了战争的可能性，因为它使俄国有可能正式地、无可指责地利用它来对条约作实质性的修改和补充。这项条约不仅是俄国外交上失败的结果，而且在当时的俄国政府中，没有一个人对条约表示满意。公正地说，这次失败的"责任"应由维特承担，因为他
368 自 1900 年以来就是俄国远东外交事务的实际领导者，并且打从 1895 年提出满洲问题的最初时刻起，总的说来"满洲问题是他的创作"。1902 年 3 月 26 日条约正是在这方面使政府的危机异常容易地产生了。当时，在大难临头的气氛中，尼古拉着手为他的专制政体寻找生路，他立意亲自过问当前事务，以改变其政府在这方面的软弱无能的状况。当时的国内外局势似乎均要求政府机关在斗争的各条战线上都无可指责地精确、协调地动作。

II

通过条约把"整个满洲"正式交给华俄道胜银行这件事已经告吹，中国人最终拒绝今后在北京继续就这一问题进行谈判。1902 年 1 月 30 日，彼得堡一得知这个情况，维特马上采取措施，想通过与各省当局签订个别的具体协定的途径，来保障俄国政府在满洲得到所有可能的工业租让权。对维特来说，问题正在于：将此事置于广泛的基础之上，不从自己手中把它放跑，不贸然让私人资本势力来插手此事，否则就很容易使租让权，即"大部分投资

① 见本书边码第 342 页，在中东铁路上的军事行动开始以前，没有制定运送军队的任何计划，兴安岭隧道尚未挖通（它到 1904 年 5 月 24 日才完工）。在九十二个车站中只有四十四个车站能经常供水，铁路工厂也未建成。在外贝加尔路段上一昼夜只能通行四对火车，而在西伯利亚和中东铁路路段上却能通行七对。见《中东铁路。中东铁路公司董事会办公厅编纂的史纲》，第 1 卷，第 236 页及以下各页。

和事业支配权”实际上转到“他国臣民”和“我们不欢迎的人的手中”。① 1901 年 9 月，当维特确信，同中国中央政府签订一项总的条约，就可以杜绝外国工业资本输入满洲时，他甚至对华俄道胜银行都极其谨慎小心，打算订一项专门条约把银行董事会同俄国政 369
府联系起来。在这项专约中要作种种规定，以便在任何情况下银行都不能超出“顶替者”的作用，不能摆脱对财政大臣的绝对服从。②

1902 年 1 月 30 日，维特问拉姆斯多尔弗，是否同意把所有租让交涉都挪到各省去办。维特这时特别强调，这件事情应完全集中到华俄道胜银行手中，又说，今后俄国驻满洲的外交代表不应象从前那样支持“俄国私人（着重体系维特所用）企业主”，而应支持华俄道胜银行的代理人。③ 当然，“已给与俄国臣民”的租让权最初是被置之一旁了。但是，尚无人获得的那些“最重要”和“最巨大的”租让权却又是务须获得的，或以银行名义，或以“银行的可靠代理人”（指的是对银行“有转让权”的人）的名义取得，而且从一开始就要“尽最大努力”“去经办此事”，举例说，这类租让权有：开采金、铁、石油、镍、煤和经营鸭绿江上的森林等等，并且还要取得“其他大企业的租让权。④

有传闻说，“许多外国人在上海从中国人手中买到了满洲的一些租让权”，“去年他们认为自己坐失了良机，现在他们深信，俄国在满洲的事业失败了，因而他们到春季都将奔向满洲获得新的租

---

① 见第 98 号卷，维特 1902 年 2 月 4 日给拉姆斯多尔弗的信。

② 见本书边码第 326 页注。

③ 见第 98 号卷，维特 1902 年 1 月 30 日给拉姆斯多尔弗的信，拉姆斯多尔弗 2 月 2 日的回信和维特 2 月 4 日给拉姆斯多尔弗的信。

④ 见第 51 号卷，第 3 部分，维特 1902 年 2 月 4 日给璞科第的电报，并见第 98 号卷，希波夫同年 2 月 5 日给璞科第的电报。

原文此处无下引号。——译者

让权”，① 单凭这些传闻，也必须抓紧时机。同时，华俄道胜银行的地方分行都很小，主要是它在技术方面简直完全不能适应新的职
370 能，于是维特立即决定吸引中东铁路公司参加此事，所以他让璞科第与尤戈维奇同时活动，根据两人在当地的彼此协商划定权限范围，如有需要，不仅可以吸引“俄国臣民中的可靠人士”，而且可以吸引“掌握在中东铁路公司或华俄道胜银行手中”的中国人参与此事，并要他们“签字画押，不经公司同意不得把他们得到的租让权转让他人，亦不得吸引俄中两国以外的他国臣民参加经营这些租让权，违犯者罚以巨额违约金”。② 但是，以后才弄清，尤戈维奇不愿把摊子铺得太大，他只想继续进行迄今一直进展顺利的有关煤矿和森林的谈判，从经营观点看来，这些是中东铁路直接感兴趣的事情，而在其他方面，他只想对银行给予协助。尤戈维奇想摸摸彼得堡想干什么，便建议铁路公司以高价“广泛”购买（当然是在预算之外）“以后将有商业意义的车站附近的大面积地段”，他不仅用“地价上涨的利润”，而且用未来“我们地段上具有治外法权的中国居民点的”“政治”意义来引诱彼得堡。③ 早在 3 月 26 日撤军条约
371 签订之前，就已制订了一个行动计划，它要求在不久的将来从国库中再提出一笔款子投资于国外的一系列“大型”企业，以便进一步“巩固”俄国在满洲的“绝对势力”。④

① 见第 98 号卷，璞科第 1902 年 2 月 9 日（22 日）和 15 日（28 日）发自北京的电报，内称：“日本人力求得到奉天附近的煤矿租让权。吉林方面通知，美国人已得到了开采吉林附近银矿的租让权。”

② 见同上，维特 1902 年 2 月 13 日发往哈尔滨给尤戈维奇的电报。

③ 见同上，尤戈维奇 1902 年 2 月 24 日发自哈尔滨的电报：尤戈维奇就煤矿事务告知说，早在 1901 年 6 月已从吉林将军处取得了勘探和开采吉林煤矿的优先权，同黑龙江将军有关此种优先权的谈判刚刚顺利结束。尤戈维奇希望在盛京省得到同样的总的租让权。据所知，他此时已经开始的这方面的谈判尚无任何结果。

④ 这项计划于 1902 年 3 月 8 日奏请尼古拉批准（见第 51 号卷，第 3 部分，维特 3 月 8 日的奏折）。维特提出，“为我们利益而运动中国地方当局”的费用从“李鸿章基金”内支出，而购买铁路地段的费用由中东铁路公司支付。

对华俄道胜银行说来，从这时起在满洲开始了一个新时代。根据某些片断资料可以认为，在此之前在俄国占领区的军事当局和外交当局都同样不欢迎[①]华俄道胜银行。1901年2月，当银行还在同吉林将军就该省贷款（三十万两，为期三年）问题进行交涉时，它就指望能在吉林省取得较之“其他企业家”优先的采金权。如果外交代表刘巴不加干涉，取得优先权是毫无疑问的。刘巴“认为，这种优先权将为银行在该地创造一种独有的垄断权，将有损于我们私人企业家的利益，因此不同意（在贷款协定中）包括这一点，而只许银行按照一般原则享有上述权利”。[②]所以在1901年3月2日刘巴与吉林将军签订的开采“金矿与煤矿的”协定中，把这种开采权“只给予了俄国和中国臣民”，“以及”银行。[③]

但是，所有执照（暂时只有勘探执照）的发放须征得“外交部官 372
员的同意”，而到1901年9月，“吉林省所有产金区都被分完了”，银行却一无所得。[④] 1901年9月，这位外交部官员与黑龙江将军还签订了一项这种形式的有关黑龙江省（特指额尔古纳河和阿穆尔河右岸、宽河、都鲁河和呼兰河流域的产金地）的协定，协定中包

---

① 原文为 persona grata。——译者

② 见第29号卷，Е.И. 阿列克谢耶夫案卷，刘巴1901年2月24日从吉林给阿列克谢耶夫的报告。

③ 见第5号卷，刘巴《初步协定》副本，凡俄国臣民申请勘探和开采金矿事务均应向外交部官员刘巴提出。勘探权为期一年。获准开采者应自获准之日起一年内开采，每矿均应由中国官员主办。从出矿金银总量中抽取百分之十五上交中国国库。该协定“于1901年7月得到清帝批准”。

④ 见同上，刘巴1901年9月7日给外交部的报告。获准开矿者有：（1）阿斯塔舍夫合股公司得到松花江上游、珲春和宁古塔（即今宁安——译者）地区的勘探权；（2）俄国采金公司得到敦化县地区（牡丹江上游）的勘探权；（3）贵族特罗伊茨基得到三姓县（即今依兰——译者）南部（牡丹江下游和倭肯河）的勘探权；（4）沙尼亚夫斯基将军得到三姓县北部的勘探权；（5）黑龙江上游金矿公司得到宾州（即今宾县——译者）和阿什河（即今阿城——译者）（从三姓到伯都讷的松花江流域的右岸各地）的勘探权。

括了勘探和开采区域的分配，而银行仍然一无所获。① 由此可见，问题不只是因为银行漠不关心。例如，有一位银行代理人1902年2月在获悉银行负有新的使命时，作出了这样的反应："我认为开发满洲资源的事业是对银行有利的，对政府也是很重要的。但遗憾的是，政府，或不如说是它在东方的代表们仅仅在有关满洲租让权交涉进展不顺利时，才想起华俄道胜银行。去年在吉林和黑龙江两省把许多租让权都分给了那些乌七八糟的人，而银行却什么也未能得到。而就我们与旅顺口长官的关系而言，向他请求点什么，
373 是没有什么特别意义的。"② 而当后来银行已接手经办此事时，俄国驻吉林领事竟试图不"支持"银行，而"赞助别人的请求"，刘巴虽然没有拒绝为银行张罗租让权，但却企图对银行代理人隐瞒他谋求租让权的那些地点。③

但是，如今银行的真正困难不在于俄国当局的所作所为，而在于中国行政当局对开采地下资源的租让方法问题改变了态度。恰在那时，外国企业自发涌入满洲，这个幽灵使维特惊恐万状，他为了挽回局势，不得不指望加快速度，来赶过这个幽灵。北京政府在拒绝同银行签订总协定的同时，又命令满洲各将军，今后不得再向俄国臣民提供任何勘探权。而在1902年3月4日(17日)公布的新的开矿条例④ 中规定，凡地方当局所给的勘探权一律须经北京

① 见第5号卷，1901年9月19日克罗特科夫协定副本，从呼伦池到松花江整个地区分给了五个承租者：黑龙江上游金矿公司，阿斯塔舍夫，阿普拉克辛伯爵、波波夫和叶米里扬诺夫合伙的采金公司，联合股份公司和俄国采金公司。

② 见中东铁路公司董事会和华俄道胜银行董事会北京代办处档案，"关于满洲的租让权"(特档第4号卷)，德列泽麦伊耶尔1902年2月15日(28日)从上海发给璞科第的信，内称：奉天军务委员"借口禁止给私人打密码电报"，竟至要求"将我们(璞科第)的密码的译法告诉他"。并见同上案卷，涅扎贝托夫斯基1902年3月21日从奉天发给璞科第的电报。

③ 见第5号卷，德列泽麦伊耶尔1902年3月11日给璞科第的电报。并见第98号卷，璞科第1902年7月9日(22日)关于银行代理人获取租让权的活动的报告。

④ 参见《皇朝掌故汇编外编》，第24卷，第68页及以下各页，《筹办矿务章程十九条》。——译者

政府批准，并要求租让权申请者必须指出打算开采的确切地点。这就立即使银行代理人无论以自己的名义，或者假冒中国人的名义都不可能得到任何东西，况且他们的开采区是不确定的，又不想以确切指出开采某种矿物这一条件来约束自己。

于是，银行不得不或多或少地盲目依赖中国的中间人，而且仅此一法了。如果真的不加选择地大量购买中国人持有的租让文契，那就要冒"落入狡猾的投机者的圈套"的风险。① 但是，外国人 374
（美国人和英国人）不限于请求中国的经理人帮忙，他们"在有经验的技术人员的参与下"，在盛京省敦化县和鸭绿江流域作了"详细的调查"。这才算明白了，"采取同样方法乃是我们取得成功的唯一保证"，但这时，"以银行在满洲的现有力量"去进行这一活动，当然是"绝不可能的"。② 这样，头三个月的工作清楚表明，没有一个专门的组织，今后的全部工作将是没有意义的，所以璞科第在6月中旬坚决要求"尽快实际解决派遣有经验的矿山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到满洲去"的问题，以便"合理地""获取"租让权。③

当时，华俄道胜银行用它自己的办法取得了一点成绩，到1902年6月底银行在各地的代理人中有二、三人尝试用手工业方式得到了如下结果。在盛京省，情报是通过银行熟知并由银行支付薪水的中国商人、经纪人〔梁显诚，俄国人习惯叫他李华昌（译音）〕得到的；接着对十六处金、银、铁、煤和铜矿的开采权提出了申请，但只获准开采石庙子沟一处金矿，并是以中国公司的名义承租的（采金区的面积为七十五平方俄里）。盛京将军有关开采该省银、铁和煤矿的奏折尚待北京批准，而答应将妈妈伙洛的采金权和懿路的采煤权给予银行的奏折仍然是个草稿。在此事的财务方面，华俄

① 见第98号卷，璞科第1902年5月6日（19日）的报告及1902年6月16日（29日）的信。

② 见同上，璞科第1902年5月6日（19日）从北京发给维特的信。

③ 见同上，璞科第1902年6月16日（29日）给维特的信。

道胜银行在谈判时向中国官员送礼五千两，又向承担石庙子沟的
375 中国公司贷款三千两。此外，银行在 1902 年春季重整了同英俄开拓公司[①] 的业务，该公司早在 1899 年就成立了，与华俄道胜银行（一百股）和英国人（罗斯八百股、吉尔伯特公司二百股）合股开采营口到山海关这一地区的金矿。1902 年初，罗斯把他的八百股转让给了华俄道胜银行，所以银行就占有了公司总资本的百分之九十，而到 1902 年 6 月，为了能用美国人亨特的工程师们来调查拨给公司的采金地，又让这位赫赫有名的朝鲜企业投机家加入了股份公司。[②]

银行的代理人在吉林省花了五个月时间仅得到如下结果：(1)与文道台[③] 口头商定，他同银行"共同"开采吉林省矿产资源"[④]，但是，只有当他得到"预期的批准"时，才能"最终同意"银行"根据所获取地段的地价参加分红"；(2)主管珲春地区矿务并"拥有颇大权力"的中国官员书面答应，"在几个月之内"不经银行同意不将这些权利让与其他任何人。在黑龙江省则由于"没有合适的代理人"，银行在这几个月之中几乎没有在该省取得任何成绩。[⑤]

一方面银行承租活动的成绩是如此之小，同时另一方面又探明，银行应当准备承担已分给俄国私人企业家的那些地区的勘探任务。吉林省的勘探期限在最近几个月内就要到期了，加之中国
376 地方当局并不隐瞒，他们打算根据新的矿务章程把那些原已许可的租让权转让给他人（并且是中国人）。因为在夹皮沟采金的阿斯塔舍夫已死，银行便着手同他的继承人交涉把采金权转到银行名

---

① 原文为«Anglo-Russian Exploration Company»。——译者

② 见第 98 号卷，璞科第 1902 年 7 月 9 日(22 日)的报告，亨特应得英俄公司股票的八分之一。

③ 即交涉局总理候补知府文韫。——译者

④ 原文缺上引号。——译者

⑤ 见第 98 号卷。

下。而且银行也怀疑吉林省的其他申请人，他们是否或者不愿意，或者无力对自己承租的事业进行投资。① 即便银行的这一看法是不正确的，不论怎样，银行都面临着一个严重的贷款任务，或以某种程度入股的方式拨款给这些企业。②

到了1902年夏季，准备从盛京省西部撤军的时刻眼看就到了，维特为使银行在满洲扎根而从事的活动在彼得堡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关于银行适应政府交给它的紧急任务的规模和技术特点的问题。恐怕正是由于这个情况，根据1902年6月22日全体股东会议的决定，需要第三次发行华俄道胜银行股票两万份（计三百七十五万卢布）。股票全部由俄国财政部认购，这就强调了这种联系，因为购买租让权和安排经营租让权的范围，其出发点都不是直接考虑商业利益，而是力图保卫满洲，使其不致因与俄国专制政府毫无关系的外国资本的出现而受到政治影响。因此，这显然多半是一项政治事业，它的经济前景如此明显地具有极大的冒险性。③ 但是，除此之外，可能还由于别的原因，维特才正式取消了银行在 377
租让活动中的领导权，把这种权力交给了为此而专门（在1902年7月5日）成立的满洲矿业公司。这样绝不会使银行少得可能得到的红利，也不会使它在这些活动中丧失实际领导权，但它却使银行免除了一切风险。

实际上，该矿业公司是由财政大臣办公室主任普季洛夫、信贷处特别办公室官员达维多夫和"普鲁士臣民"罗特什捷英这三个股东合伙组成的，目的是"为了进行探矿、为了获取租让权，以及从私

① 见第98号卷，璞科第的工作报告，以及财政部办公厅1902年8月根据璞科第的报告和电报编纂的专门资料。

② 见璞科第1902年7月9日（22日）的工作报告。

③ 见德米特里耶夫—马蒙诺夫：《俄国现有股份企业录》，彼得堡1903年版，第37页，关于政府承购全部股票一事见第134号卷，罗曼诺夫1904年3月编的《查询报告》。因此，在八万份股票中，政府占有三万六千二百份，即约占百分之四十一。

人和公司手中获得已许可的东西，并为了开采满洲的各种矿产资源”。公司的固定资本为一百万卢布。对股东的权限有所限制。① 其实，公司资金是根据需要以公司股票作抵押分批借来的，维特打算“由国家银行发放贷款”，国家银行因而“有权在任何时候拥有这些股票，或将其转卖”，这样一来，俄国政府就全部承担了所有财政上的风险。② 华俄道胜银行有责任“从威信、经验和人员各方面全力协助公司，并办理公司的一切金钱支付事项，从中取得极少的酬金”。根据公司和银行订立的条约，公司利润应由华俄道胜银行和
378 国家银行平分。③

显然，罗特什捷英这时完全不是以“普鲁士臣民”的身份，而是以华俄道胜银行的总裁和“代表”的资格加入满洲矿业公司的。④ 从有关满洲矿业公司的全部公文中可以明显看出，罗特什捷英首先把自己当作“经验”的化身，条约规定华俄道胜银行是有责任以这种经验帮助公司的。⑤ 在这种情况下，罗特什捷英可能又重复了他在成立俄朝银行时的做法，当时他直截了当地声明，“虽然他准备完全同意”维特的主张，但他“不能忽视华俄道胜银行股东们的利益”。⑥ 而这并没有堵死罗特什捷英把华俄道胜银行的资金投入公司各企业的道路，如果这样做会带来商业利益的话。俄国政府对银行合伙资金的新投资和公司组织本身都使银行大有可能

---

① 关于成立满洲矿业公司的奏折于 1902 年 7 月 5 日为尼古拉批准。同年 6 月 26 日各股东签订了公司合同。普季洛夫得三千三百三十四股，其余二人各得三千三百三十股（见蒙古矿业公司档案第 12 号卷，关于成立该公司的条约原件）。

② 见第 2297 号卷，前引 1902 年 7 月 5 日奏折。

③ 见蒙古矿业公司档案第 12 号卷，公司与华俄道胜银行 1902 年 6 月 27 日订的条约和 6 月 27 日股东成立会议记录。

④ 维特在 1902 年 7 月 5 日奏折中就是这样向尼古拉具奏的。

⑤ 见第 106 号卷多处，该卷的九个部分集中了公司的全部来往函件。公司领导权完全操在罗特什捷英手中。

⑥ 见本书边码第 157 页。

向公司投资。①

满洲矿业公司董事会是从组织以矿山工程师为首的三支勘探队开始其活动的。这三支勘探队在1902年秋季对当时已归公司掌握的矿区进行了初步考察，并为今后制订考察计划提供了资料，后来又派了两名总工程师去组织和领导勘探工作。但全部财政组织工作却均由华俄道胜银行负责，在满洲的一名银行经理被指派 379
为公司的全权代表，而银行"在满洲在中国当局面前似乎仍然是独立进行矿业活动的，因为在当地大家认为，满洲矿业公司暂时还是以银行面目进行活动为好"。②但根据现有各种材料看来，维特并不打算当真把满洲矿业永远垄断在国库手中。他只是认为，"在满洲目前事态下，极难吸引私人资本参加该地区的企业"，但是，"不言而喻，以后在较为有利的条件下，便可以把上述租让权全部或部分以适当代价出让给私人或公司，如果这是有利可图的话"，而他在自己的圈子里竟至指望"吸引外国资本""参加矿业经营"。③毫无疑问，在那种场合只要华俄道胜银行愿意，它在获取租让权中将处于优先地位，问题只在于，沙皇政府要在何种条件下，才允许私人（俄国的或外国的）资本参加经营立足已稳的各项企业。同时，罗特什捷英在指导公司的财政工作中立即实行了这样的方针，使满洲矿业公司（以银行面目出现）在准备入股的各公司中力争占有绝大多数股份。④

从满洲矿业公司成立到战争爆发的十九个月中，满洲的实业界局势没有任何好转的迹象。公司在其存在的所有日子里，只能

① 例如曾作过这种设想，把英俄公司变成一个股份公司，满洲矿业公司拟"由本公司和华俄道胜银行共同出钱入股"参加进去。

② 见第106号卷，第1部分—（Б），公司1903年7月的工作总结。

③ 见第2297号卷，维特1902年7月5日的奏折，并见第106号卷，第1部分—（Б），满洲矿业公司1904年1月的工作总结。

④ 例如见第106号卷，第6部分，罗特什捷英和璞科第关于参加盛京将军发起组织的中国公司——义胜鑫公司（奉天矿业公司）的来往信件。

380 靠以股票作抵押从国家银行借来的一百万卢布和包括在这项借款中的华俄道胜银行的有息贷款进行活动。1903 年 7 月公司已经停止收购权利。公司刚接触实际，当试图作近期的经营开支核算和制订工作计划时，已探明最起码必须增加一百万卢布。[①] 除了在 1902 年 12 月以前被勘探队否决或因希望不大而被置于次要地位的那些租让权外，满洲矿业公司从华俄道胜银行继承来的，或在公司成立后通过银行获得的，具有重要实业利益的企业租让权有如下六项（其中一项在黑龙江省，二项在吉林省，三项在盛京省）。[②] 直接以公司名义得到的租让权如下：(1)根据 1902 年 11 月 13 日与阿斯塔舍夫的继承人所订之条约，有权勘探和开采夹皮沟(松花江上游地区)的金矿，公司应负责组织股份公司，中国人必须参加百分之二十的股金；[③](2)俄国采金公司于 1903 年 4 月 1日转让给满洲矿业公司的黑龙江右岸(从乌伊河到与松花江汇合处)和松花江左岸(从都鲁河到与黑龙江汇合处)的观音山地区的采金
381 权；[④](3)特罗伊茨基和库图佐夫于 1903 年 5 月 23 日转给公司的吉林省三姓县(沿牡丹江下游和倭肯河)的采金权。[⑤]

---

① 见第 106 号卷，第 1 部分—(Б)，满洲矿业公司 1903 年 7 月的年度报告中的预算设想，董事会要求拨款二百万卢布。

② 见同上，勘探队 1902 年秋季的行程达三千五百俄里，在吉林省和盛京省调查了十四个地方。

③ 1901 年 8 月 27 日阿斯塔舍夫和吉林将军所订协定规定了这项条件（见蒙古矿业公司档案，第 12 号卷），满洲矿业公司付给阿斯塔舍夫继承人二万五千卢布的权利转让费。

④ 见第 106 号卷，第 9 部分，俄国采金工业公司董事长 1903 年 4 月 1 日给满洲矿业公司的信。转让条件如下：给俄国采金工业公司六万零一百九十八卢布四十四戈比以偿付它的开支，并每年让它提取百分之二十五的纯利（但不参加管理），每采一普特黄金，华俄道胜银行应得二百卢布，工程师 K.E. 普法菲乌斯得一百七十五卢布，黑龙江将军得百分之二的红利(见第 157 号卷，满洲矿业公司的租让权清单)。

⑤ 见同上，转让条件为：旧业主应得百分之二十五的纯利，每一普特砂金，A.E. 坚得三百七十五卢布，卡扎林得三百七十五卢布，工程师 K.E. 普法菲乌斯得二百卢布，A,E 普法菲乌斯得一百五十卢布，纳格利得一百五十卢布。

华俄道胜银行形式上参加了盛京省的三个企业：(1)«华兴利»号中国公司，这是为开采抚顺西部煤矿而成立的，资本为十六万两，其中华俄道胜银行投资六万两，满洲矿业公司通过银行投资五万四千七百两，[①] (2)«义胜鑫»号中国公司(奉天矿业公司)，它是为开采十二个矿区而成立的，资本为四十万两，其中银行投资十五万两，中国股东二十万两，奉天银库五万两，[②] (3)并参加了前面提到过的英俄公司。[③] 到 1903 年 7 月 1 日，满洲矿业公司业已花去四十二万七千卢布，却还没有正规经营其中的任何一项租让企业。据公司董事会估计，其中两项企业为安排工程所需的初步设备和 382
流通资金为：夹皮沟六十万卢布，归英俄公司经营的奉天省铁岭附近的金砂矿和宁远地区的夹山金矿一百万卢布。[④] 满洲矿业公司计划不久以后把这些开采权转给公司自己组织的股份公司：夹皮沟金矿股份公司(资本为一百五十万卢布)和济宝矿业公司(资本为六百万卢布)。1903 年 7 月初甚至确定了第一个公司的章程，并在 8 月 14 日召开了股东成立会议。[⑤] 但满洲矿业公司董事会自己也承认，这家公司是虚设的，因为有一百三十万卢布的股金要作

---

① 但是，满洲矿业公司对这些股票的所有权直等到华俄道胜银行 1906 年 8 月 7 日的信才办妥(见第 106 号卷)，到 1904 年 1 月，满洲矿业公司算了一下，在两千份股票中，它占了一千一百九十份〔见第 106 号卷，第 1 部分一(Б)，满洲矿业公司 1904 年 1 月 4 日的工作报告〕。

② 见第 157 号卷，满洲矿业公司租让权清单。关于希望华俄道胜银行参加奉天公司一事是盛京将军本人提出的〔见第 106 号卷，第 6 部分，璞科第 1902 年 9 月 2 日(15 日)和 3 日(16 日)给普季洛夫的电报〕。但是事情在北京进行得不顺利，因此璞科第需为此事花费三万二千两去运动户部大臣王文韶和庆亲王长子等人(见同上案卷，璞科第 1903 年 4 月 14 日电报)。

③ 华俄道胜银行为经营公司的租让企业而成立股份公司时，“应把自己股票的半数转让给满洲矿业公司”，公司则将银行“所耗费的钱的半数”补偿给银行(见第 157 号卷，财政部所属特别委员会关于将满洲矿业公司权利转让给蒙古矿业公司的会议记录，1906 年 8 月 8 日获准)。

④ 见第 106 号卷，第 1 部分一(Б)，公司 1903 年 7 月的工作报告。

⑤ 见同上，公司董事会 7 月的工作报告。

为租让费付给满洲矿业公司，而其余股金，从股东名单看来，则零星分散在财政大臣的一些亲信手中，而且这也未必不是“虚拟的”。① 股东成立会议是在维特辞职（8月16日）前两天召开的，因此会议记录也就没有去具奏批准，公司也没有成立起来。从这时起，满洲矿业公司立即就瘫痪了，要不是华俄道胜银行给与贷款，那它就只好暂时停止支付一些日常开销了。②

383 维特通过外交途径“和平”征服满洲的政策失败了，他想挽回败局，便贸然组织了满洲矿业公司，作了一次绝望的尝试。满洲矿业公司甚至还没来得及在满洲把自己的华俄道胜银行的“面目”去掉，还没有来得及实际上广泛成立各股份公司，就已经被种种事情纠缠住了。看来，为了保持各股份公司组织的俄罗斯民族性质，满洲矿业公司今后在某种程度上仍应是这些公司的实际股东。这些组织通过铁路、水运、银行和“大型”工业企业的协调工作，使专制政体的俄罗斯有可能参加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瓜分，而无须直接割取它的领土。

III

1902年1月30日，正当维特急于运用华俄道胜银行作为政府的工具，趁俄国的军事占领还有绝对效力之机，广泛攫取满洲的

① 见第106号卷，公司1904年1月的工作报告；并见蒙古矿业公司档案第12号卷，在1903年8月14日股东成立大会前入股的股东名单是：别尔克——五股，博克——四十股，格劳曼——四十股，A.A.达维多夫——四十股，约甘松——五股，利陶耶尔——四十股，瑰科第——四十股，普济洛夫——四十股，罗津费利特——五股，索洛维伊奇克——五股，亚戈金——五股，除有五千二百股用作租让费外还有满洲矿业公司五百三十五股。

② 正如满洲矿业公司董事会在1904年1月14日报告中抱怨的那样，国家银行正是从1903年8月16日起停止发放以股票为抵押的贷款的，至此总共发放了四十万卢布。在撰写此报告前，改进抚顺煤矿开采方法问题是当务之急，华兴利公司在抚顺矿区是“用中国的原始方法”生产的。为了把煤的年产量提高到二千五百万普特，就需要有一百零二万五千卢布的资本，修筑专用线另需一百五十三万三千卢布。

有利地段，并制止俄国的“私人企业家”抢夺满洲租让权的时候，就在这一天，那位并非无名的马丘宁立刻以这种私人企业家的身份出场了。他要求采伐鸭绿江满洲一侧的森林，而这也正是维特本人感到兴趣的事。1月30日，马丘宁以经营鸭绿江左岸“朝鲜森林租让权”的业主身份去见拉姆斯多尔弗，抱怨说，早在1899年7月他就请求穆拉维约夫“制止中国人滥伐”满洲森林，并要求“把被中国人如此乱砍乱伐、无监督地抢夺的这一满洲森林区域的租让优先权留给他”。他又说，“但是”，“滥伐森林的情况”依然存在。马丘宁“认为现在正是开创鸭绿江上林木企业的最适宜的时机”，因 384
此他请求拉姆斯多尔弗“帮他取得鸭绿江右岸各支流的森林租让权”，并“同海军部联系，在今年流送木材的季节里，一等(他的)代理人及所需职员从旅顺口出发去鸭绿江口安排流送木材的哨卡，便派一艘警卫舰前去保护”。①

当时马丘宁还拿出一份准备发给雷萨尔的电稿，据他说“亚历山大·米海洛维奇大公原则上同意这份电稿”。即使没有这份电稿，拉姆斯多尔弗也知道，这位过去他部里的职员在此仅仅是替人出面而已，所以他立即把此事上奏沙皇尼古拉，而沙皇在批准这份给雷萨尔的电稿时又批道：“马丘宁的请求应予照办，并应尽可能协助其事业。”② 因此，维特在指示璞科第以华俄道胜银行的名义力争鸭绿江上的森林租让权，并向拉姆斯多尔弗解释银行同“私人企业家”之间的区别何在时(这两件事均发生于2月4日)，对当时的情况是了如指掌的。③ 通过马丘宁而插手满洲租让权的，正是“我们不欢迎的那些人”。维特先前曾不止一次把他们从鸭绿江上

① 见第98号卷，马丘宁1902年1月30日奏疏的副本。

② 拉姆斯多尔弗1902年1月31日奏折副本，以及尼古拉批准的给雷萨尔的电稿(发于2月1日)：“立即”同盛京将军交涉，将森林租让权给予马丘宁，为期二十五年，扣除百分之二十的纯利归中国政府。

③ 见本书边码第368—369页。

的朝鲜森林事业中排挤出去。现在维特政敌的势力在满洲领土上出现了，任何商业斗争的手段对他们都无可奈何。

大家知道，轰动一时的朝鲜森林租让权事件发生之日，正是维特物色一个不冻港和寻求俄国今后实现铁路扩张的可能性之时。
385 俄国在1896年取得了成功，但当时维特在满洲同中国人的关系却有点僵，而从1897年秋季开始，他就开足马力去实现对朝鲜的“和平”征服，仿佛“俄国人的名字和俄国资本”已经在朝鲜参与“矿产、森林和其他自然资源的开发工作了”。① 最后这句话只是夸大之词，因为维特当时所指的是俄国在朝鲜取得的仅有的一项租让权，即“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一等商人”勃里涅尔1896年所取得的图们江和鸭绿江沿岸森林的开采权。但在1897年秋季，当俄国外交界还在满洲与朝鲜交叉路口徘徊不定，而维特依然对调查鸭绿江口朝鲜沿岸的不冻港感到兴趣时，勃里涅尔表示愿意出让这项唯一的租让权。若不是旺利亚尔利亚尔斯基和别佐勃拉佐夫在沃隆佐夫伯爵和亚历山大·米海洛维奇大公的帮助下，使皇帝秘书厅买下了这项租让权，那么它是很可能通过罗特什捷英（他对这项租让权毫不动心）之手落到外国人手中的。②

① 见本书边码第178页。

② 见波克罗夫斯基：《日俄战争》，载于《1905年革命运动史论文集》，莫斯科1926年版，第1卷，第571页及以下各页，以及罗曼诺夫：《尼古拉二世和鸭绿江上的租让权》（《俄国的往昔》，彼得格勒1923年版，第1卷，第97页及以下各页）。曾任朝鲜北部领事的马丘宁最迟在1897年9月回彼得堡来找新的差使，他在彼得堡直呆到1898年2月初，然后前往朝鲜赴任代办。他在12月1日觐见尼古拉时曾得到了沙皇的口头指令，穆拉维约夫以维特当时在朝鲜实行的计划作为对他的指令。1898年1月1日，马丘宁在和他高等法政学校的同学旺利亚尔利亚尔斯基第一次见面时，就说到了勃里涅尔的租让权。据旺利亚尔利亚尔斯基本人称，只是当他和穆拉维约夫“见过两三次面”之后，他才开始重视开发朝鲜自然资源的股份公司的计划，那时他“才知道，维特不允许在远东出现华俄道胜银行的竞争者（见旺利亚尔利亚尔斯基：《日俄战争起因资料集》，第6页，及所附马丘宁1905年10月25日给阿巴扎的信）。旺利亚尔利亚尔斯基是退伍的近卫军上校，在1877—1878年战争中曾是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的传令官，是诺夫戈罗德的一个大地主。他“经营大宗木材交易”，“是彼得堡的两个纺织厂的总经理”。他是诺夫戈罗德农业暨农村工业协会主席，俄国工商促进协会成员，“乌拉尔金矿”业主（见前引马丘宁给阿巴扎的信，并见《红档》杂志，第18卷，第45页，维特1901年7月12日给西皮亚金的信，以及旺利亚尔利亚尔斯基的《日俄战争起因资料集》，第13、14页。

当购买租让权的手续在1898年5月11日全部办完时，俄国外交界已经放弃了对朝鲜的方针。因为尼古拉对于当时要不要陡 386
然反对自己的亲信大臣并自作主张地恢复"和平"征服朝鲜的政策举棋不定，于是勃里涅尔的租让权也通过假卖给马丘宁而暂时冻结起来了，假卖的条件是：马丘宁要随时遵照弗列杰里克斯男爵（宫廷事务大臣）的指示，把这一租让权出让给第三者或公司。① 人们不仅用林业的商业利润，还用政治上的考虑来诱使尼古拉向皇帝秘书厅的事业投资。这里有两种情况：第一，沿满洲与朝鲜的边境全线的租让面积有五千平方俄里，"我们乔装成伐木工人、护林队员及一般职员的"为数"两万以上的战斗先头部队"可以在这里展开，并可设置"交通联络、给养组织和各种据点"（前面已经指出，维特在1901年正指望为中东铁路在鸭绿江的满洲一侧取得这些权利），否则南满支线将很容易受到日本人从朝鲜方面发起的进攻，旅顺口便会被切断。② 第二，上奏尼古拉时把情况说成是： 387
外国人已经在朝鲜大肆抢购租让权了，如果俄国不去参加，那两年以后俄国将永远失去朝鲜，或者是，在"以武力征服（朝鲜）"以后，也只能摊到"保护他人私产的卫士的义务"。而如果把希望寄托在"个别的俄国人身上"，那俄国就不能实现这种"征服文化落后国家

① 见第213号卷，勃里涅尔给涅拉托夫的委托书副本，内称，废除他和宫廷事务部官员涅波罗日涅夫1898年5月11日所订租让权转让条约，从1899年5月5日起，勃里涅尔以六万五千卢布的代价将该项租让权的"全部权利无例外地"转让给涅波罗日涅夫（根据1898年5月11日的条约，勃里涅尔将自己的租让权作为公司的八万股金出让，见前引旺利亚尔利亚尔斯基的《日俄战争起因资料集》）；并见同上，涅波罗日涅夫1899年6月26日将租让权以三万卢布卖给马丘宁和阿利别尔特的字据副本，和马丘宁与阿利别尔特1899年7月9日给弗列杰里克斯的"字据"副本，它表明："因所述租让权的转让我们需支付的全部款项已根据弗列杰里克斯男爵的特别指示交付，该项租让权的一切权利只是名义上属于我们。"

② 见第278号卷，"根据弗列杰里克斯男爵的奏折，对派赴朝鲜北部的考察队拨了款，此后"，1898年4月30日，"通过亚历山大·米海洛维奇大公呈给了皇上一份十分秘密的奏疏"；并见同上案卷，1898年2月26日"上呈皇上的奏疏"。这两份奏疏及第278号卷中所有其他文件皆为副本。参见本书边码第286页。

的新方法”，甚至维特也认为这种“新方法”对远东是唯一可行的。于是尼古拉被劝说迈出了“第一步”，参加了《东亚公司》以经营朝鲜及东亚的自然资源。

“依据俄国皇帝的宏图大略”，旨在朝鲜实行“俄国原则，甚至灌输俄国思想”的这个公司具有“政治”机构的性质。为要实现这一“十分秘密的使命”，公司必须有“绝对忠于政府”，并甘愿“为俄国沙皇效劳的人”作为自己的创办人，并且不要求“很快获得红利”，也不惜“支出国务意义超过商务意义的必要费用”。① 这个方案从一开始便有神圣团的气味，沃隆佐夫和别佐勃拉佐夫就曾是神圣团的成员。② 神圣团的使命是要把忠于皇上的资金联合在沙皇身边，为远方殖民地的“纯粹俄国的”利益而斗争。为了不落后于时代，要“在经济利益的基础上”获得从前往往通过骑兵突袭和
388 军事占领才能得到的东西，甚至诱使远东殖民地的外国资本服从自己领导，沙皇本人也不得不解囊投资。③ 难道什么俄朝银行能和设想得如此引人入胜的前景相提并论吗？虽然俄朝银行是“官办的”，但它所“追求的”“目的仅仅是牟取物质暴利”。为首的罗特什捷英作为“纯粹俄国的”“极为专门的政治目的”的执行者，甚至不是俄罗斯人，而是犹太人，须知这样的银行“永远不能成为政府手中的”“驯服工具”。④

在四人组成的“参谋部”⑤的再次压力下，尼古拉终于在 1900

---

① 见第 278 号卷，1898 年 2 月 26 日的奏疏。

② 见旺利亚尔利亚尔斯基：《日俄战争起因资料集》，第 12 页，“别佐勃拉佐夫是他（沃隆佐夫在神圣团中）的左右手”。

③ 见同上，第 12 页，“应当始终如一地将产权巧妙地分配给各大国，东亚公司能得到的物质利益应与最友好的追求者分享”。

④ 见同上，在此奏疏中没有提到罗特什捷英的名字。

⑤ 旺利亚尔利亚尔斯基的说法是：“我们是参谋”（见第 278 号卷，他 1899 年春季考察回来后写给亚历山大·米海洛维奇大公的信）。

年3月把东亚公司的计划交付实施。这时立即发现，事情绝不仅限于朝鲜一地，而要在现存政府机构的框框中再塞进一个新的组织却不是那样简单的事情。因为在维特领导下，已形成了一个由华俄道胜银行、中东铁路公司及其下属企业组成的"托拉斯"，东亚公司不愿在这个托拉斯中处于隶属和卑下的地位，而要在这个托拉斯之外另搞一套又是维特所不允许的。别佐勃拉佐夫根据"公司临时经理的特别指示"提出的"东亚工业公司施行方案"包括如下内容：这是一个股份公司，资本为二百万卢布，每股五千卢布。要把"半数以上"的资本"集中""在可靠的人手中"，才能保障皇帝秘书厅的优势地位。以后怎么做，现在尚不清楚，而别佐勃拉佐夫目前关心的是，如何能使皇帝秘书厅"在现时"不必花"一文钱"。389
为此，"在最终考察和检查企业的商业目的是否合适之前"，各股东为每张股票要交一千卢布的股金。有二百张股票转归秘书厅所有，其中有一百股因勃里涅尔将租让权转让东亚公司而不付股金，其余一百股用出卖部分〔达热列特(音)〕租让权所得的十五万卢布交付。

其余二百股在两"组""可靠的"人士中均分。属于第一组的有十五位贵族出身的宫廷亲信人物：沃隆佐夫伯爵、尤苏波夫公爵、旺利亚尔利亚尔斯基上校、根德里科夫伯爵、商务参赞巴拉绍夫、奥尔洛夫-达维多夫伯爵、谢尔巴托夫公爵、诺斯季茨伯爵、达什科夫、谢列勃里亚科夫上校、克里斯季、阿巴扎大尉、苏马罗科夫-埃里斯顿伯爵、科兹洛夫斯基公爵和罗江科。属于第二组的，可说是第二种人，照公司方案的说法，他们应担任"专家"的角色，他们是别利亚耶夫公司商行总经理亚科夫·彼特罗维奇·别利亚耶夫，世袭荣誉公民、高沃洛切克一家锯木厂厂主尼古拉·尼基福罗维奇·费多罗夫，商业顾问、涅瓦造船厂经理马特维·奥西波维奇·阿利别尔特，外交事务顾问尼古拉·加夫利罗维特·马丘宁和"其

余几个必不可少的人物”。①

看来尼古拉犹豫不决。一方面有人反复对他说，现在正是要坚定不移地解决朝鲜命运的时刻，甚至不止于此（“必须决定，是使俄国在远东的事业毁灭，或者相反……现在我们可以用一种巧妙的策略使日俄战争迟迟不发生，使我们能稳固地立足于日本海上”），② 另一方面，弗列杰里克斯担心会“耗费资金”，并以此来吓唬尼古拉。③

390 到了6月初，“绝好的机会来到了”。④ 正如所料，弗列杰里克斯向维特求援了，并向尼古拉奏陈了主张采取妥协的解决办法的详尽的（足以压倒对方的）正式理由。这种妥协的解决办法推翻了“参谋部”的全部计划。(1)如果说到“接近最高政权的政府机关的”“领导问题”，那末皇帝秘书厅“从其组织及使命来说，无疑都无法左右这项事业”。(2)“发起人大概意识到秘书厅不是主管这类问题的，因此他们自己表示，支配权应让给发起人推选出的人员，此人可能是秘书厅素不相识的”。这种公开的捏造是维特的惯伎。因为任何地方都没有谈到“推选”一事，而尼古拉也完全可以深信不疑，不通过维特或不经其同意，不可能发生任何转让支配权的事。(3)“实际上”，“在事业进行中需要秘书厅的资助时”，秘书厅“将降为创建中的公司的一个执行机构”。这也是一个不能成立的理由，因为尼古拉亲自选出的秘书厅股票持有者，只能是他的办事人，而秘书厅正该是沙皇的“执行机构”。(4)秘书厅“白得了”二十

① 见第16号卷，1900年3月28日《方案》副本。

② 见第278号卷，旺利亚尔利亚尔斯基1899年12月25日给亚历山大·米海洛维奇大公的信。

③ 见同上，弗列杰里克斯1900年6月2日上呈尼古拉的未署名的奏疏。1898年对于朝鲜租让权和考察队的一切指示和拨款均由弗列杰里克斯经办，所以他很清楚地知道，“旨在全面了解事态”的考察队“只是提供了一些贫乏的情报，而没有什么确实的调查材料”。

④ 见同上，沃隆佐夫在1900年6月4日给尼古拉的信中正是这样说的。

五万卢布。上面说过，价值五十万卢布的一百张股票无偿交给了秘书厅，而秘书厅总共只花了二十五万卢布。这不仅“在道德上是不能接受的”，而且(在这里我们又看到维特的所作所为)“在法律上也是不能允许的”。这样公司的资本就减少了，而公司的资金“本来就远不能适应它所承担的繁重任务”。(5)说不需要更多的开支，这是假话。因为另外的一百张股票还需要交付四十万卢布的股金。(6)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如果发起人想要巩固政府在此企业中的领导地位(我们马上能看到，他们并不想这样做)，那吸引财政部（奏疏中强调指出）参加这个企业是最靠得住的。无疑，财政部可以请求和获得有关国家给企业的任务的指示”，更不用说它“拥有许许多多手段，可以通过物色绝对可靠的资本家的途径(维特在这里又把那个华俄道胜银行抬了出来，此外又能做什么别的理解呢？)在物质上保证事业顺利成功，又可以对事业进行必要的监督和领导”。① 391

然而，问题的根子正在这里，神圣团除承认尼古拉本人外，不愿承认其他任何领导，它既不愿在同无名望的人的合作中失掉“自己的旗帜”，也不愿意让第三者得益发财。沃隆佐夫在尼古拉面前的声望不亚于弗列杰里克斯，这位前任宫廷事务大臣在经历和经验方面都不亚于弗列杰里克斯。如今，他以整个神圣团的名义，亲自出马反对弗列杰里克斯了。沃隆佐夫直截了当的声明似乎是一项最后通牒。他说：“公司的成立全仗陛下决定。陛下名单上的人员将努力工作，为陛下及俄罗斯效劳。如果我们不清楚我们是在为陛

① 见第278号卷，弗列杰里克斯1900年6月2日上呈尼古拉的未署名的奏折，弗列杰里克斯没有署名，事情就要由财政部绝对负责，这一情况使我们有理由设想，奏疏上呈前已预先同维特达成了交易，因此奏疏没有署名，它是在另一部门撰写的。另一方面，疏文中指出的细节，以及奏疏的整个结构和风格使下述设想是近乎情理的，即奏疏是财政部撰写的。无论如何，如果维特打算批驳别佐勃拉佐夫的方案，他已经难于对此处援引的奏疏内容再作任何补充了。

下工作，并受陛下的保护，那末大概大多数人都要拒绝这项工作，
392 因为大家不愿意在大臣们朝令夕改的情况下，为甲、乙或丙增加资产而付出时间和精力，并因此失掉自己的旗帜。所以陛下的参加……是绝对必须的。”沃隆佐夫还提出了一个期限：“明天”，而“过了明天”他就要动身到马里延巴德去了。于是就形成了一种“绝好的机会”，压力起到了作用，尼古拉同意了。① 因为公司的章程早已印好，同时尼古拉批示声称，“令秘书厅以阿巴扎海军上校的名义购买东亚公司的二百份股票”，所以大臣会议对章程的“审定”仅仅是个形式。但是，正是在6月开初，远东的“事件”已变为对中国公开宣战，因此维特得以推迟审查章程。“当远东事件尚未平静之时，此事暂不交大臣会议审查”。② 于是绝好的机会也就丧失了。

很容易想象“参谋部”里是一种什么情况。别佐勃拉佐夫怒不可遏。“参谋部”提到要维特辞职的问题，提起了他过去的一切。满洲到处都在暴动，维特及其心腹要对此负责。但是，“谢天谢地，暴动及各种有目共睹的乱事现在才开始，因为这是实现如愿以偿
393 的转折的又一个机会，因为使我们受害的不是中国人的大拳头，而是圣彼得堡！”“（关于远东的）整个问题的提法都是错误的。我

---

① 见第278号卷，沃隆佐夫1900年6月4日给尼古拉的信（“弗利杰里克斯不必担心什么。资金应由第一批红利偿还”）。沃隆佐夫打算同尼古拉再见一次面，在5日动身前，“在尼古拉接见玛丽娅·格奥尔基耶夫娜公爵夫人时”“辞行”。也许正因为事情还正在进行之中，沃隆佐夫打算得到、并得到了尼古拉有关公司章程的指示。尼古拉的批示是用黑铅笔写在一张普通的书写纸上的（将章程交“由大臣会议审定”，以及由阿巴扎认购股票）。别佐勃拉佐夫在6月6日从沃隆佐夫那里得到这张条子后，便在纸条的最下边附了一个注：这一“最高批示于1900年6月5日收到，是有关东亚工业公司章程草案的”（见第16号卷/c）。

② 见第16号卷/c，尼古拉的这个“谕旨”是由维特写在同一张纸条上的，所署日期为：“1900年6月，于彼得高府。”实际上，章程和上面所说的3月28日方案在这张纸条上都谈到了。

们不是(修一条到朝鲜义州的铁路)①在中国四周活动，而踏进了中华世界的腹地”，“一切祸水都来源于满洲铁路，特别是奉天支线，以及在那里作威作福的波兰人和犹太人”。“我们没有用我们的精粹力量进行活动，而是把工作交给了犹太人和波兰人，(维特)委托他们打着我们的旗号”。“要是我们现时在朝鲜北部有电信设备和公路交通(这一问题过去曾及时提过)，那末不仅旅顺口能有确有保障的交通线，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就不必再这样呆在中国同欧洲人演戏了”。大家知道，维特把一切过错都“推在”“已故的穆拉维约夫”的政策上，然而“更确切地说，是要责怪穆拉维约夫缺乏手段，而华俄道胜银行和满洲的建设者们却是很积极的”，他们“没有及时给我们提供情报，除了给犹太人以有利可图的机会之外，什么事也没有干。在黄种人中间，仅仅为我们在同其他国际投机者的交往中准备了一个不令人羡慕的位置”。

“今后怎么办呢？”“军事上的胜利往往只是国事成功的一半”。而“有没有一项计划和必要的力量，可以机智地利用我们的刺刀所取得的成绩呢？”唯其“现在要为将来在远东的成功或失败打下基础，这种准备应是坚定不移的。或者是我们能够胜任，俄国的事业从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得以巩固；或者是我们落入那伙犹太人手中，上欧洲外交家的圈套”。这是在远东的情况。而在中央，在彼得堡 394
又如何呢？“投机之风”“盛行”，而“在社会实业界”“道德败坏”，这是“对管辖部门的”正当的“怀疑”所引起的。“维特创立了一套体制，它即便在和平时期都行不通，它严重地压抑了国家的生产力，弄得怨声载道，使许多人生活无着。而在战争时期呢，这一体制不

① 见旺利亚尔利亚尔斯基：《日俄战争起因资料集》，第35页；1899年3月9日以后，他“接到命令，对勘查从吉林到白头山和沿鸭绿江到义州的铁路线作一个预算。参见别佐勃拉佐夫1898年3月2日的奏疏：“到朝鲜湾，然后通过铁路把这一地点同符拉迪沃斯托克连接起来。”“铁路线在吉林和奉天处转弯就必须经过中国人口稠密的地区，要夺取这一地区是比较困难的。”

禁使人们担心国家有破产的危险”。①

而现在连“参谋部”也看得很清楚，远东事件引起的变化，已把满洲问题推到了首要地位，现在只讲朝鲜问题是完全不合适的。根据眼下的条件，他们现在按照东亚公司“对问题的原则提法”，又闪现了一些想法，这些想法是：(1)“占领满洲，但决不占领中国居民稠密的那些地方”；(2)放弃已被破坏的奉天支线，修一条“从吉林到新浦，经朝鲜到旅顺口的支线”；(3)“把日本人打发到厦门去，宣布朝鲜不容侵犯”，为此要倡议达成一项以德国为首的反对英国的“欧洲大陆协定”。② 当时大臣们进行了争论。用我们熟悉的话说就是：库罗帕特金认为，这意味着只有人口稀少的北满“不归还”中国，而维特则建议使朝鲜“中立化”，以避免日本人去占领，正如维特1900年秋天所认为的，日本人占领朝鲜，“实质上”“可能激
395 励我们”。③ 中东铁路沿朝鲜北部边境线延伸，不是基于要征服或合并这一地带，而是根据租让权，这一点光从下述情况即可看出：此后“参谋部”谈论和张罗的始终是关于保住朝鲜森林租让权，而不是合并朝鲜北部的问题。在这些“新条件下”，“有关东亚公司问题的原则提法，在下列三个方面变得明确了：第一，公司的“使命”是在远东，“在帝国境内和境外（即朝鲜与满洲）”进行活动；第二，公司的活动“应该是工业经济性质的，而不是银行投机性的”，因此，它“决不能同尽管挂着俄国旗帜进行活动的另一机构共同工作”。④ 而“在这两个竞争者中间，谁在政治上和道德上更可信赖，谁就必然能获得优势”（除了华俄道胜银行和东亚公司之外

① 见第278号卷，别佐勃拉佐夫1900年7月15日给亚历山大·米海洛维奇大公的信。着重体是我用的。

② 见同上，别佐勃拉佐夫1900年7月23日为尼古拉准备的“备忘录”，以及沃隆佐夫就此备忘录及对此备忘录的修正意见给别佐勃拉佐夫的信件（无日期）。

③ 见本书边码第293页。

④ 这一点不仅是笼统地针对外国资本的，“因为公司应当完全是俄国的，而不光是挂着祖国的旗帜，（一如既往）完全允许外国资本参加，不过绝不能占统治地位”。

还有谁呢?)；第三，由于公司"早在成立之前，就深信有关官方一有机会就会对公司表示反感、讨厌和反对"，因此除"尽垄断权所赋予的义务外"(只在"俄国境外尽这种义务""以避免黄种人看见俄国人之间为经济利益而争斗")，现在，在公司成立之前"必须由将来的负责人员预先进行一次会商"，"会议主席"有权直接向沙皇具奏，并"奉特别谕旨设一御前大臣"，"以便同有关部门联系"。①

我们看到，"参谋部"在碰了钉子之后，立即坚定不移地改变方针，首先同内部敌人进行斗争，并计划成立一个现为防御性，而后 396
为进攻性的组织。他们坚持不懈地谋求成立这个组织，当"某些事情"业已弄清楚，并且"(沙皇)的决定业已成熟"时，这一组织终于成立了。②"在各部门之外任命的""御前大臣"，是为"同各部门"进行斗争而专门设置的主要工具，"当沙皇的决定成熟时"，别佐勃拉佐夫就当上了御前大臣。

由于沙皇的个人禀性，他的决定一般说来"成熟得"不是太快。我们看到，"无所不能的维特""不顾这一点现在又对事情进行了种种阻挠"。维特所提的计划是：用"和平"方法同李鸿章"单独"商量，不仅依靠满洲一处，而是靠中国的一系列产金地区来超过各国。还要把日本卷进这单独进行的密谋，以在朝鲜(可能不止在朝鲜一处?)的让步为代价割断日本同其他任何集团的联系。然而在经过第一阶段的谈判之后，维特的计划就破灭了。日本人没有上钩，中国人直到最后还在当面撒谎。不仅根本谈不到反英的大陆协定，而且无论哪个国家，只要这个国家不怠于外事，都站到了对立面，甚至德国亦不例外。③早在一年之前，就产生了不信任维特整个"体

① 见旺利亚尔利亚尔斯基：《日俄战争起因资料集》，第32页，别佐勃拉佐夫1900年7月26日题为《问题的原则提法草案》的奏疏。

② 见第278号卷，别佐勃拉佐夫1900年7月15日给亚历山大·米海洛维奇大公的信："需要待以时日，方能把事情弄清，决定才能成熟。"

③ 见本书边码第289—305页。

制”的疑云。1901年夏季，尼古拉劝说别佐勃拉佐夫试着依据同维特达成的“协议”为公司章程开放绿灯，而维特又一次（已经是第三次了！）要弄“花招”，使此事受到挫折，这时，尼古拉心中也对维
397 特的“体制”“疑窦丛生了”。① 维特对他当时冒着什么风险，可能为此事付出什么代价这些问题没有去空想。“当时经济情况”“糟糕”透顶，“许多企业倒闭，加之又是个歉收年”。“他们以此为题劝说皇上，说什么应当根本改变财政政策，说什么这些都是我的政策造成的结果。但是如何改变呢？他们当然不知道”。

自然，维特现在也和往常一样深信不疑，认为别佐勃拉佐夫“只想为自己扫清道路（即把他维特赶走），并在浑水摸鱼”，而尼古拉似乎与此完全无关，只不过是牺牲品和工具而已。但是，众所周知，尼古拉坚决否认怀疑有什么“浑水”（其实维特本人也认为别佐勃拉佐夫是“诚实的”），譬如他同意库罗帕特金的这种说法：别佐勃拉佐夫本人就是他用以“激励”自己大臣们的工具。② 现在很清楚，尼古拉还想从企业“倒闭”中以专制政体的方式榨出点油水，譬如，他打心眼里想搞垮波利亚科夫，他感到兴趣的是，能否在清理倒闭的波利亚科夫联合企业时，既保留这些企业，又摧毁“犹太

① 见第278号卷，别佐勃拉佐夫1901年6月17日给尼古拉的信。别佐勃拉佐夫同维特“就若干问题”“达成了协议”，甚至维特还承认了“他个人计划中存在的某些缺陷”。然而别佐勃拉佐夫“力求”在维特“身边”“最简明扼要地确定这些问题的提法，以免发生不良的意外情况”。这次没有将二百张股票让给秘书厅，而给了国库，以抵偿国库将苏昌森林转让给公司的代价。看来，维特的“花招”是，他在最后时刻从发起人名单中删去了任有国家职务的尤苏波夫、根德里科夫、阿巴扎、旺利亚尔利亚尔斯基和谢列勃里亚科夫，而代之以非官方人士阿里别尔特和某个克鲁泽。别佐勃拉佐夫认为这才把“事情”变成了一个“死胎”，这要“怪罪于助产医师”（见同上，别佐勃拉佐夫给亚历山大·米海洛维奇的信）。参见《日俄战争的序幕》，第251—252页，并见罗曼诺夫：《尼古拉二世与鸭绿江上的租让权》，《俄国的往昔》，彼得格勒1923年版，第102页。

② 见维特1901年7月12日给西皮亚金的信，载《红档》杂志，第18卷，第44页；并见维特：《回忆录》，第1卷，第149页；罗曼诺夫：《日俄战争前夕的维特》，载论文集《俄国与西方》，彼得格勒1923年版，第166页；《库罗帕特金日记》，载《红档》杂志，第2卷，第58页。

人在莫斯科的老巢”。① 甚至地方自治机构也成了维特的罪过:“有人说,俄罗斯的主动性是在我的影响下被窒息的,说我希望皇上远 398
离人民,而政权转入官吏们,因而也就是大臣们手中。”② 现在,别佐勃拉佐夫在这次“捣鬼”以后,“每星期至少有两次”,“整小时地”同尼古拉进行谈话,对他讲述“种种鸡毛蒜皮的事和形形色色变化无常的计划”。还说“应当把我从远东完全撵走”,于是沙皇在“一瞬间”甚至动过一些念头,如“是否应当把中东铁路移交给交通部?”等等。说明维特奴颜卑膝地屈服于外国资本的例子是,似乎他“把西伯利亚的全部矿产都卖给了英国人,以便以此为代价取得罗士查尔德的贷款”。在遭逢危机的局势下,维特本人“实际上丝毫未因这种事态而惊慌”。他“深信,如果我们遵循现行的经济政策,那末两年以后,一切都会走上轨道”。但是,尼古拉显然还“处在某种困惑之中”。③

早在1901年春天,大臣们就吓唬尼古拉说,“与俄国决裂”是当前日本“直接的既定目标”,建议他干脆无条件地退出满洲舞台——这是一种主张,而当时尼古拉正处在“困惑”之中。④ 但是,后来逐渐弄清楚了,在远东似乎远非一切都丧失殆尽,而且中国和日本先后主动寻求同俄国达成协定,在这时,尼古拉在此问题上的“困惑”就逐渐减少了。如前所述,维特与拉姆斯多尔弗又开始了他们的外交活动,而且不打算退让。维特仍然主张修筑北京铁路,不考虑将满洲交给外国人。虽然他说过,为了装样子可以暂时允

① 见国家银行档案第124组,第155号卷,尼古拉1901年12月25日在财政委员会会议记录上所作的批示:“讨论一个问题:根据主席和大多数人的意见,可否摒除波利亚科夫,以帮助国家银行。莫斯科若可望摆脱犹太人老巢的控制,内部的(地方的)经济危机便可消弭了。”

② 见维特1901年7月12日给西皮亚金的信。

③ 见罗曼诺夫:《尼古拉与鸭绿江上的租让权》,第102页;以及维特1901年7月12日给西皮亚金的信,载《红档》杂志,第18卷,第45页。

④ 见本书边码第307页。

许日本人到朝鲜去，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因而伊藤空手而回。[①] 尼古拉在斯帕拉宣布的政纲由“各部门”准确而顽强地执行着。所以
399 尼古拉暂时不同各部门发生正面冲突，而是同意通过婉转的办法进行，于是“各部门”又赢得了一些时日。维特对付东亚公司章程的手腕没有失算。他不把专利权交给公司，看来，他还免除了国库的投资，并因为把苏昌森林转让给公司而得到了公司的股票，这样，维特就只使事情进行到在那些“可靠的”私方人士第一次交纳股金时就完了，并使这些人很容易因发起人对他们的不信任而感到沮丧，而实际上这件事情坏在维特身上。[②] 1902 年 2 月，第一次交纳股金期将满，而别佐勃拉佐夫却分文没有收到，于是尼古拉“命令”他“把事情清理一下”。[③]

清理工作是相当特别的。这项工作是：别佐勃拉佐夫“竭力想把它们（企业）确立起来，使之开展业务活动，以便使这些企业能和我脱离”。清理的内容如下：(1)“关于朝鲜半岛的计划……是在朝鲜以秘书厅得到的一项（对各种矿产资源的）重大租让权为中心建立一个联合企业，并以此项租让权来对抗日本的勘探活动”。“如果（驻汉城代办）帕夫洛夫不把金茨布尔格男爵的事情搞乱，联合企业的成功几乎是有保障的”；(2)“我们在朝鲜的森林租让权要同在满洲的森林租让权合起来”，然后“在鸭绿江口设立税卡征收伐木税”，以作营业资金；(3)“现在轮到了满洲的事务和东亚工业公司

① 见本书边码第 314 页及以下各页。

② 当事情发生变化，要把股票转让给国库，而不给秘书厅时，沃隆佐夫从一开始就拒绝作发起人了。其余一些人在自己受到怀疑后也消极怠工了。根据某些迹象看来，在 1901 年下半年“参谋部”似有瓦解之势。例如亚历山大·米海洛维奇大公有一天通过旺利亚尔利亚尔斯基转告别佐勃拉佐夫，让他“不要认为大公会参加”这个公司，并让他“忘记过去事务上的往来”。关于这一点，从别佐勃拉佐夫给亚历山大·米海洛维奇的复信中可以认为，别佐勃拉佐夫为了竭力维持这个四分五裂的股东会，就传言说，亚历山大·米海洛维奇大公“将继续参加这项事业”，还说有人从中“诽谤”（见第 278 号卷，别佐勃拉佐夫给亚历山大·米海洛维奇的信）。

③ 见第 278 号卷，别佐勃拉佐夫 1902 年 1 月 20 日的奏折。

的章程问题”，别佐勃拉佐夫最后一次问道，是否仍试图同维特达 400
成协议寻求一种“暂行办法”。① 但是又过了十天，别佐勃拉佐夫“深信”不可能达成任何协议，因而“十分沮丧”。“我虽然深深痛恨和鄙视维特先生及其体制，但是我应当尽快离开，以免连累与我共事的人”，因为他是“维特—西皮亚金这一伙人的眼中钉”。②

于是别佐勃拉佐夫在临行前又概要地叙述了他所放弃的事业的“原则”。公司的目的是要成为“远东租让权贮存所”。“他本人并不打算经营这些租让权，而只想起一个中介人的作用，把这些租让权分给那些绝对可靠和坚决果断的人”。但是，“直到现在维特一直反对实现这个想法”，他“根本不同意成立一个独立的公司，因为公司可能独自取得情报而成为华俄道胜银行的竞争者”。而华俄道胜银行又是个什么机构呢？这是个“未知数”，“它是一个交易所和银行活动的混合物，具有取得和持有各种各样租让权的垄断权”。它“表面上依赖于”政府，“同外国资本家集团”又有着“密切的财政”依从关系，因此“很难说，究竟哪种势力占主导”。“在权力垄断的情况下，毫无疑问可能有许多营私舞弊的行为”，“当得到可靠消息，我们的银行主要是为外国利益服务的时候，事情已发展到不可改变和无法弥补的地步了”。因此，“把银行纳入纯银行事业的活动范围，将租让权交给另外一个有地地道道的俄国职员和十分可靠的职员的公私合营公司使用是十分可取的事”。③ 我们看到，清 401
理更象是一次布雷。别佐勃拉佐夫认为，由于“维特被任命为农业协会主席”(1 月 18 日)，现在“不可能再(同他)进行任何斗争了”；

---

① 见第 278 号卷，别佐勃拉佐夫 1902 年 1 月 20 日的奏折。“暂行办法”原文为“modus vivendi”。——译者

② 见同上，别佐勃拉佐夫 1902 年 1 月 31 日的奏折。“眼中钉”原文为 bête-noire。——译者

③ 见同上，别佐勃拉佐夫在 1902 年 1 月 31 日信中呈给尼古拉的“备忘录”。

但是他没有料到，1月30日，在他对手方面爆炸了怎样的两枚大水雷，这就是两则消息：华俄道胜银行在满洲垄断权的丧失和英日同盟条约的缔结。

就在这种情况下，马丘宁出面提出了有关满洲森林租让权的要求，这件事证明：维特未能彻底铲除成立下述组织的主张，这一组织准备为君主政体的利益而奋斗，并保护专制政体，使其免受整个"维特体制"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在马丘宁的背后，仍然看得见精明强干的驸马的身影，而尼古拉所作的批示又使各地外交部门的全体人员都要为这位租让权所有者效劳。但是，现在华俄道胜银行无意与他人进行竞争，单凭这一点，无论是在朝鲜的金茨布尔格（维特甚至不知道对他的委任），或是在满洲的马丘宁，现在都不可能直接同华俄道胜银行进行认真的竞争，而满洲矿业公司实际上也没有办法把整个满洲"抓到"自己手中。① 说到马丘宁企业的财政情况，我们没有掌握有关金茨布尔格的任何资料，只知道他在朝鲜的一切指望都寄托在美国人亨特身上，而且根据"事先的保证书"，金茨布尔格答应把他"创办的"那些公司的全部股票的仅仅十分之一提供给马丘宁。②马丘宁在满洲创办的企业，在1902年间就花了秘书厅的十三万卢布。③ 但是，这个企业在当地遇到了无
402 法克服的困难，至少受到了华俄道胜银行的排挤。它除了取得有权在鸭绿江上无人经营的地方砍伐森林的为期一年的"采伐执照"外，没有从盛京将军处得到任何东西，直到1903年别佐勃拉佐夫

① 见本书边码第377页及以下各页。

② 见第213号卷，金茨布尔格1902年5月2日和1902年12月20日给马丘宁的保证书（分别谈到咸镜道和平安道的矿产资源）的副本："意欲取得租让权"，"拟议成立公司"。

③ 见石印论文集（集子无标题，维特在页边作有注）。它同旺利亚尔利亚尔斯基与阿巴扎出的论文集类同，根据某些迹象来看，系马丘宁所作，出版日期为1905年12月。怀疑这一记载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在集子中正确地指出了另外两个数字及其出处，即指出在1898年用去秘书厅二十五万卢布，在1903年动用国库二百二十万卢布。

亲临满洲时为止，这家企业一直是在勉强地维持着。①

同时，维特不仅没有下决心运用华俄道胜银行或中东铁路来阻拦马丘宁的道路，而且还竭力设法不让尼古拉知道，通过筹办由国家银行投资的官办企业满洲矿业公司，华俄道胜银行实际上已经参与了在满洲搜罗租让权的活动，而且起着这家公司发起人的作用。公司谨慎地回避森林问题，只专心于获取地下资源。然而如今，从满洲撤兵的条约签字以后，维特还指望把损失局限于现在和以后在"远东租让权贮存所"这一小问题上作出些让步。维特的这一想法是天真的。维特在远东"把事业输掉了"，而日本又刻不容缓地建议俄国签订一项特别条约，把这一事实固定下来，该条约将只承认俄国在满洲的铁路利益，而使日本在朝鲜享有完全的行动自由，俄国不得对朝鲜事务进行任何干涉，而日本对满洲却不作相应的许诺。②

403

当维特好歹安排妥当并勉强维持住的"秘书厅"（"维特—西皮亚金派"）的统一由于巴尔马绍夫1902年4月2日的攻击而破裂时，这个过去使尼古拉感到"为难"、现在受到祖巴托夫组织的

---

① 见第98号卷，瑰科第1902年3月21日(4月3日)、10月29日和11月20日的电报：盛京将军不负责授予租让权，建议马丘宁的代表利沃夫向北京提出申请。10月间利沃夫还希望"能得到华俄道胜银行的协助"，但"我们这些经理人员"却"再次得到命令说，不得干预此事"。此时盛京将军和华俄道胜银行正开始进行有关奉天矿业公司(义胜鑫公司)问题的重要交涉，他得悉，银行与利沃夫的事情无关。截止10月29日，通过银行汇给马丘宁的代表用的钱已有七万五千卢布。直到11月，利沃夫派到北京去的一名中国人四出张罗仍无结果。

② 见日本1902年7月22日(8月4日)提出的协定草案，载《1895年以来就朝鲜事务与日本交涉的概述》，外交部出版社1906年版，第78页。此书把日本提出的协定草案叫做关于"朝鲜问题"的协定草案。这是对解释日俄战争起因的"朝鲜理论"的一个贡献。协定同时还谈到了"满洲问题"。关于"朝鲜理论"见波克罗夫斯基：《日俄战争》，(载《1905年革命运动史论文集》，莫斯科1926年版，第1卷，第595页)，参见我的文章：《尼古拉二世与鸭绿江上的租让权》，载《俄国的往昔》，第1集，1923年，第107页及以下各页。

控制、并被普列维通过警察厅揭露无遗的维特体制，就必须对国内发生的事情承担责任了。现在正是“取得势力”的时候，但尼古拉却不知如何对付维特“体制”，于是他先动手打倒了这个体制的技术指导者。此人曾尽其所能地用自己的天赋才能和从私人资本主义“阵营”那里汲取来的全部经验为专制政体忠心耿耿地效劳了十余年。

国内资本主义关系的急剧增长，尤其是席卷俄国资本主义上层的国际化和集中化过程，给专制政体带来了种种危险。维特利用专制政体贪婪地积聚财政和经济实力，在自己的“体制”中寻找并暂时找到了抵消这些危险的办法。维特在为维持专制政体的国内统治的斗争中为它选择了这条道路，与此同时，他在与外部帝国主义包围的斗争中也在谋求巩固它的阵地。他把“和平”征服中国的计划建筑在资本输出的基础上：首先是输出在执行国家预算中完全由专制政体支配的那部分资本，其次是俄国的私人资本（虽不指望它）和外国的私人资本，因为外国资本同意在俄国政府的监督下，并遵循俄国政府的政治意图在远东进行活动。但是，这个“体制”实际上使等级农奴制性质的专制政体本身无法消除的
404 内在矛盾更加尖锐化了。正是当时，阶级斗争在国内战线上愈来愈有组织地进行着。帝国主义性质的对外政策计划至少在十年之内需要不断地供给资金，而在危机将临的情况下一切重负又都压在国库身上，因此帝国主义性质的对外政策计划就替代了“和平”征服计划，使专制政体遭到了外交失败的打击，而这些外交失败显然减少了俄国在必将发生的战争中获胜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维特却还在装模作样，似乎这与他毫无关系，似乎没有发生任何不可弥补的事情，甚至仍旧用他的“和平”方法来解决外部危机。这一次如果还有人相信他，那才怪呢。

因此，不必关注尼古拉的决心是怎样“成熟”的，“绝好的机会”

又是如何来临的(无论如何,勒维尔会晤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不是最少的)。但到 1902 年 10 月,当维特从远东返回时,人们恰恰不愿同他谈论远东的问题。尼古拉在 1902 年 11 月"十分信赖地委托"别佐勃拉佐夫前往远东,1903 年 1 月 1 日,他就准备罢免维特了。① 当这次撤职得以避免,没有人再谈论什么秘书厅的款额、某某人的股金、发起人以及什么章程之类时,尼古拉在 1903 年1月 19 日就干脆命令作为财政大臣的维特从旅顺口华俄道胜银行中给别佐勃拉佐夫发放二百万卢布的贷款,由国库出帐。② 实际上现在问题不在于维特是否企图阻挠与现有的远东康采恩毫无关系 405
的新的"租让权贮存所"的成立。别佐勃拉佐夫所掌握的资金已超过满洲矿业公司的两倍,现在他就是不组织任何股份公司也能冒名去搜罗租让权。③ 问题是,维特是否服从沙皇的意志,是否同意

---

① 见维特:《回忆录》,第 1 卷,第 186 页,以及《日俄战争的起因》,第 2 卷,第 533 页;尼古拉 1903 年 1 月 19 日给维特的信(存中央档案馆维特档案);《日俄战争的序幕》,第 260 页,别佐勃拉佐夫关于出巡远东的《奏折概要》;库罗帕特金:《日记》,载《红档》杂志,第 2 卷,第 59 页及以下各页。

② 见前引尼古拉 1903 年 1 月 19 日给维特的信,信的片断见波克罗夫斯基:《日俄战争》,第 578 页。尼古拉信的副本将日期错署为 1902 年。众所周知,别佐勃拉佐夫"为了脱身",在 1902 年 1 月间就"清理了"这些企业(见本书边码第 398 页)。尼古拉的这一命令,是通过宫廷侍卫长格谢转交给别佐勃拉佐夫的。1902 年 10 月维特向璞科第询问关于"马丘宁事业"的状况,璞科第回答说已汇去七万五千卢布给奉天的华俄道胜银行(见第 98 号卷,璞科第 1902 年 10 月 29 日的电报,该电没有说明钱是谁汇的)。从《关于华俄道胜银行付给御前大臣别佐勃拉佐夫的款项的查询资料(此款从皇上允准贷给他的二百万卢布中支付)》(见第 213 号卷)可以看出,这七万五千卢布同那二百万卢布的贷款毫无关系,从 1903 年 2 月到 11 月二百万卢布的贷款已全部付清。

③ 见《日俄战争的序幕》,第 260 页及以下各页,别佐勃拉佐夫关于出巡远东的"奏折提纲"。此处列举了别佐勃拉佐夫转让给巴拉绍夫的"各项事业",这些事业"本着(别佐勃拉佐夫)规定的精神几乎全已办妥",这就是:(1)鸭绿江上的林木事业,"暂以三十二万卢布经营","以后还得花十八万卢布";(2)抚顺煤矿(东部矿区),面积为二百五十平方俄里;(3)"将抚顺铁岭一带"约五百平方俄里的"优良耕地作为俄国居民区";(4)鸭绿江口到旅顺口之间的航运问题;(5)辽河航运问题;(6)盛京和吉林两省的电灯照明与专用线的租让权;(7)汤河子(音)的矿泉水问题。

尼古拉提出的行动纲领，修改3月26日的条约，这也仍是为了"巩固俄国在满洲的绝对势力"。如果同意，那就应该接受"参谋部"的监督和领导，这个"参谋部"早就敲起了警钟，并提出了尼古拉现已提出过的行动纲领。如不同意，他又有什么办法可以摆脱这个危机呢？

起先，维特甚至打算通过满洲矿业公司来停止自己与东亚公司的竞争，只要能使别佐勃拉佐夫上钩离开远东，并使他将业已开始的改变满洲"事态"的工作停止下来。他甚至准备对在北京要求鸭绿江森林租让权一事进行帮助，只要这项使沙皇欢心的成绩能
406 归功于他个人，如他自己所说的，只要沙皇能"了解此事"。① 别佐勃拉佐夫在满洲提出了一些步骤，东一锄头西一棒子毫无顾忌地乱提方案，要"把满洲变为俄国独占的势力范围"，主张干脆撇开中国行政当局，并要借助于红胡子，从肉体上消灭一切涉足满洲的外国企业家，所有这一切，使阿列克谢耶夫也感到为难。当维特一知道这些情况，以及此后当维特刚一察觉到仍然可以在阿列克谢耶夫将军的帮助下整垮别佐勃拉佐夫时，维特几乎觉得自己就是胜利者了。维特正确地认为别佐勃拉佐夫不仅是他个人的主要对手，而且还是一切事情的祸根。他之所以有势力，首先是因为他得到尼古拉的宠爱。现在，维特不仅尝试要用"可恶的三人帮"来反对尼古拉在1903年3月26日会上提出的纲领，而且还避而不谈他自己在困难时刻提出的满洲矿业公司同未来的林业（只是林

① 维特在1903年1、2月间的这种尝试是为了适应得势的"别佐勃拉佐夫派"的。关于此事我有一篇专题论文请读者参阅（见《日俄战争前夕的维特》，载论文集《俄国与西方》，彼得格勒1923年版，第140—167页）。在别佐勃拉佐夫动身去远东后，旺利亚尔利亚尔斯基找到维特，并且援引了沙皇的"谕旨"，这时维特"表示愿"把他为在满洲获取尽可能多的租让权所采取的措施"告诉旺利亚尔利亚尔斯基，并建议将这些租让权转让给旺利亚尔利亚尔斯基，以便"在外国资本的帮助下装备起来"（见第278号卷，旺利亚尔利亚尔斯基1903年2月12日的奏折）。

业[1])公司合并的问题。①

别佐勃拉佐夫派的纲领是在1898年([1])提出的，它已搁置过久，在当时条件下完全是个空想，是一个"颇为幼稚"的纲领。现在，这一纲领指望的是认真履行撤军条约，其内容仅仅是："成立一个公司以开发鸭绿江河谷(两岸)的森林资源"、"寻求保护"这个"俄国企业的办法"、"吸引"美、法资本参加经营活动。这一切是从这样 407
一种考虑出发的："现在随着从满洲撤军，鸭绿江流域的屏障在预防对日冲突这一点上具有特殊重要性，一旦发生冲突，它可以成为阻挠中日联合进攻我们铁路的障碍物"(有一次别佐勃拉佐夫表示自己的希望说，在通过这一地区越过边境时，"就将使日军士气沮丧")。② 此时，尼古拉提议立即"声明"：如果中国不把鸭绿江上的森林租让权提供给俄国，而日本又不采取措施制止日本人在鸭绿江朝鲜一侧"出现"，那末俄国将暂停从满洲撤军。这就使"三人帮"更容易指出方案的全部危险性，及其在军事上的荒谬性了。

三个人在阿列克谢大公的支持下，齐心协力地在下述问题上攻击沙皇，说正是这个方案有可能引起列强的抗议，导致对日战争。他们不撤销有关私人公司的问题，并通过了如下决定：(1)私人公司的活动"仅限于开发鸭绿江上的森林"；(2)为避免国库"过多开支"，允许外国资本参加；(3)"依据纯商业原则"开办公司。③ 这时维特还瞪着双眼象在指骂某人似地声称："帝国对其边远地区

① "可恶的三人帮"是指"大鼻孔"、"野母鸡"和"蝌蚪"三人。别佐勃拉佐夫派内部就是这样称呼维特、库罗帕特金和拉姆斯多尔弗的(见我们发表的别佐勃拉佐夫和阿巴扎1904年的信件，载《红档》杂志，第17卷，第70页及以下各页)。

② 见第120号卷，阿巴扎在1903年3月26日会议上宣读的报告，以及会议记录。参见《库罗帕特金日记》，第38页，以及《日俄战争的序幕》，第277页及以下各页。

③ 3月26日会议决议全文见《日俄战争的序幕》第281—282页。这样，合并满洲所有租让权的方案失败了，尽管普列维在会上支持这一方案。所以满洲矿业公司继续独立存在。见罗曼诺夫：《日俄战争前夕的维特》，载论文集《俄国与西方》，第162页及以下各页。

的资助”应该“有个限度”，一般说来“俄国在满洲的商业企业”“应不花国库的任何费用”（好象满洲矿业公司不曾成立一样！）。但是，
408 照库罗帕特金的说法，维特还在另一方面“达到了目的”。尼古拉“为了制止存在于各部门代表之间的可悲的争执”，提出了“统一远东的国家政权机关的各种职能”的问题。但三人帮却一致表示，各部门代表间的“意见分歧”“从来”“没有表现为各部门各自为政”，因为它们总是遵照沙皇本人的“直接指示”，并在其“直接领导下”行事的。于是，尼古拉所提的问题又落空了。①

因此，事情就形成这样一种状况：在1903年3月26日这个第二阶段撤兵期满的日子，他们似乎使沙皇放弃了暂停撤军的打算，避免了和列强必然会发生的冲突。他们在作了五年的抵制以后，作为对沙皇个人愿望的让步，又同意为他求得一种合法的可能性，运用国库的一笔不大的款项，在公司中同其亲信一起在国际市场中经营林木事业，但他同时不应再在那里经营其他任何企业，换句话说，就是用“皇帝的”政策来压倒“别佐勃拉佐夫”个人的政策。②但是，几星期以后证明，维特一事无成。维特盼望沙皇突然把别佐勃拉佐夫从远东召回，同时，维特的忠实代理人起草的、由阿列克谢耶夫将军签字的一份报告将使别佐勃拉佐夫名誉扫地（但是，报告却没有寄出！），这样，维特在别佐勃拉佐夫回来之后，就可以好意地劝说他放弃他一窍不通的商业活动。③1903年4月初，在库罗帕特金启程赴远东时，沙皇托付他去“消除”“这位”（！）别佐勃拉佐
409 夫的“活动的痕迹”。④

① 见第120号卷，3月26日会议记录，以及《红档》杂志，第2卷，第40页，库罗帕特金的《日记》。库罗帕特金说维特“达到了目的”，似乎只是指3月26日会议决定的第二点，委托维特去交涉获取鸭绿江上满洲森林租让权一事。

② 见库罗帕特金：《日记》，载《红档》杂志，第2卷，第38页。

③ 见罗曼诺夫：《日俄战争前夕的维特》，载论文集《俄国与西方》，彼得格勒1923年版，第145页。

④ 见库罗帕特金：《日记》，载《红档》杂志，第2卷，第41—42页。

但结果是：4月一过，“绝好的机会”又重新出现了。然而这次那些固执己见的大臣们却面临着这样两个既成事实：(1) 方针变了；(2)行政机构改革了，这些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商业游戏。1903年5月2日，尼古拉没有征求大臣们的意见，就电令阿列克谢耶夫准备(“在朕的直接领导下”)实施新方针。其内容是，“鉴于最终决定确切履行1902年3月26日的条约”，“不允许外国势力以任何形式渗入满洲”（其实维特也能在这样的字句下签字！），① 为此必须(1)“允许俄国企业家在满洲(不是在朝鲜？！)……特别是在政治及军事上具有重要意义的那些区域内广泛开展活动”(我们现在将看到，维特正是为此而张罗忙碌的！)；(2)“不惜花费必要的开支，在最短期间内使我们在远东的战备状况能和我们的政治经济任务完全相称，从而明显地向公众表示，我们决心捍卫我们在满洲的独占势力”(这一点可是新消息)。②

当天尼古拉还致电库罗帕特金，内称：“鉴于”根据陆军部意见拟定了“新的措施”，因此他“必须”“尽快”“觐见”沙皇。③ 显然，尼古拉不仅忙于实施新方针，而且还忙于改组行政机构。尼古拉预先通知阿列克谢耶夫，说他应把“负责管理远东各部门的最高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总督府！）。5月2日尼古拉又任命别佐勃拉佐夫为“御前大臣”，5月7日又召集诸大臣，使他们知道，现在 410
他与他们商谈不是通过一个普通的“编外顾问”，而是通过一个负责人员，别佐勃拉佐夫现在已经是这样的负责人员了；并通知他们近来发生的情况，说明了为什么今后不能再让他们执行远东政

① 维特早在1903年3月就担心，由“别佐勃拉佐夫派”管理满洲的“结果”，很可能把满洲“交给外国人”(见库罗帕特金：《日记》，载《红档》杂志，第2卷，第39页)。

② 见第120号卷，尼古拉1903年5月2日给阿列克谢耶夫的电报。

③ 见同上，尼古拉1903年5月2日给库罗帕特金的电报。

策。① 与此同时，关于实质性的事情，即必须加速远东的防务，以及将此事集中于总督手中，大臣们只能聆听，只有“私人公司”问题允许他们发表意见。但现在当“私人公司”已不是沙皇“个人”政策的唯一武器时，它很快就降为第三等的事情了。② 别佐勃拉佐夫在5月7日会上直截了当地提议放弃寻求满洲的森林租让权，甚至建议“全面推迟组建”拟议中的公司。维特不顾尽人皆知的事实，还企图重申什么“根据我国的财政经济原则，国库不应投资加入股份公司”(1)。但是这一次普列维仿佛象是安慰维特似地，不无挖苦地建议“暂缓吸引外国资本参加此项事业”，为的是“当我们在满洲的利益尚未得到确实保证时”“不使外国大规模的经
411 济利益渗入满洲”。然而在这种情况下，除了“根据国家的实际利益（而不是象3月26日那样‘小规模地’）规定国库投入股份公司的资本数额”之外，又有什么别的办法呢。③ 关于这次投资的限额，别佐勃拉佐夫遵嘱仍同维特商量。此事与沙皇在5月2日给阿列克谢耶夫的电报中让他不再同维特，而只同别佐勃拉佐夫商讨远东经济政策的总原则相比，仅仅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让步。

因此，1903年5月2日至7日所发生的事情，决不是当时赫赫有名的麦谢尔斯基公爵散播的、彼得堡的大臣们津津乐道的那

---

① 在5月2日的电报中，别佐勃拉佐夫已被称作御前大臣。据1903年5月7日会议记录（见第120号卷）判断，会上宣读了上述5月2日的电文以及沃加克将军（别佐勃拉佐夫派）的奏疏，题为：«1902年3月26日条约在满洲问题发展中的意义»。这一责备他人的文件的结论是，随着这个条约的“签订”，“在作出巨大牺牲之后”，“俄国现在在满洲问题上的处境比1902年以前还糟”。在“门户开放”的原则下，外国人“很快会把俄国在满洲的工商业幼芽摧残掉”，“铁路和华俄道胜银行将为外国人的利益效劳，而铁路和银行的活动将由于英国人掌握的山海关铁路的竞争，以及很可能要在营口和大连设立的外国银行分行的竞争而受到限制”。

② 参见库罗帕特金：«满洲悲剧的序幕»，载中央档案馆«日俄战争资料集»，列宁格勒1925年版，第24页。

③ 见第120号卷，1903年5月7日特别会议记录，以及«日俄战争的序幕»，第285页，此处叙述了会议的决定，这些决定只与公司问题有关。

种说法所包罗得了的，这种说法是："一个反对皇上及其大臣的阴谋搞成了，为首的是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现在最好说是罗曼诺夫），追随者有别佐勃拉佐夫、阿巴扎等等。"① 其实正好相反，迄今为止"沙皇非正式的"政策和"沙皇的正式"政策"进行了斗争"（如同沃隆佐夫向维特发牢骚时所说的），结果取代了过去"沙皇的正式"政策，而成了真正的"沙皇的正式"政策。② 按照这一政策在5月的这些日子里的表述方式，它给自己规定的任务，就是过去维特执行的"皇帝的"政策所要完成的任务。新方针与旧方针的根本区别在于：现在要把俄国在远东舞台上从实质上保卫旧纲领的军事准备问题提到首位，不是直接合并和"侵占"满洲，而是从经济上征服它，并防止外国人在那里"大批涌现"。③ 当时，新方针的 412
制定是基于以下想法的：过去在满洲耗费了"巨额款项"，但"一切都落空了"（因为，倘使今天日本人想要占领旅顺口和我们的铁路，那我们在陆上是不能予以抵抗的"，"现时我们完全"处于"依从日本的地位"）。④ 而旧方针的代表者们还"深信"，"我们完全有足够的力量防卫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只要我们不再继续进行侵占，日本永远不会触犯我们"。⑤ 直到现在，1903年5月，维特还认为俄

① 见库罗帕特金：《日记》，载《红档》杂志，第2卷，第44页。

② 见第120号卷，沃隆佐夫1903年5月9日给维特的信。在我的《维特与鸭绿江上的租让权》一文中几乎全文援引了这封信，此文载《纪念C·Ф·普拉托诺夫论文集》，彼得格勒1922年版，第439页。

③ 见本书边码第345页。

④ 见前引沃隆佐夫的信。

⑤ "足够的力量"，这是指旅顺口有半年的防御能力，并能在远东调动起十万军队，而"不必求援于欧洲兵力"（见第120号卷，维特1903年5月9日给沃隆佐夫的复信）。至于海军，维特干脆不愿提及。他自己知道，"日本海军比我们强"，沃隆佐夫的信上是这样写的，海军部1902年11月的查询材料也表明了这一点（俄国在太平洋的舰队吨位为十一万四千四百三十六吨，八千五百三十二人；法国为四万五千四百九十九吨，三千八百六十二人；日本是二十一万一千七百零二吨，一万五千八百九十一人；英国为十二万五千五百八十八吨，八千八百五十人。见第79号卷，第1部分，此材料由海军中尉佩特罗夫1902年11月20日签署）。

国外交的任务是非常“简单的”，“只要我们放弃侵占朝鲜的念头”“就行了”。①

然而，当 1903 年 4 月仍然遵循着老方针办事的“皇帝”的外交界在全速进展中第三次在满洲（而不是在朝鲜）无可补救地受挫时，尼古拉旋即于 5 月坚决转向施行新的方针了。

IV

甚至维特也未断言，1902 年 3 月 26 日条约即使仅从“保障”中东铁路“利益”的角度看来，解决了俄中之间的全部问题。譬如，1902 年秋，维特从远东回来以后，亲自提出了关于必须扩大从宽城子到吉林的铁路租让权问题，因为“要在一旦与中国发生政治纠
413 纷时”确保中东铁路安全无恙，就必须“在我们野战军撤离满洲之前”，让我们的边防军“占领满洲的各大城市”。同时，“在从满洲撤军以后，我们在这一地区就只有在保护铁路的借口下在铁路沿线驻扎军队的权力了”。吉林则是“最大的”城市中心，它有“大型的枪械、军需品、弹药仓库”和一个“兵工厂”，假如吉林的车站“座落在能控制全城的制高点上”，并派上“即使不大的炮兵连，那它就能成为可以轰毁全城的一个可怕的阵地”。②

1903 年 3 月，从吉林撤兵的期限已快满了，而通向吉林的铁路支线问题尚未谈妥，隶属于财政部的外阿穆尔边区边防司令官要求准许在俄军撤出的同时占领这个地方，以免让中国人占去，维特当然并不反对。③1902 年 2 月，当尤戈维奇提出广泛收购大站附

① 见第 120 号卷，前引维特 1903 年 5 月 9 日的信。

② 见第 112 号卷，维特 1902 年关于出访远东的奏折，第 55—56 页。在《日俄战争的序幕》一书中几乎全文引用了这道奏折（见第 189—242 页），但本书所引之处却被删掉了。

③ 见第 107 号卷，外阿穆尔边区边防军独立军团司令官 1903 年 3 月 18 日的报告。

近的土地这一主张时，维特轻易地接受了这种“政治上”的考虑，并且把它发展成为一个加宽路界、使之殖民地化的完整的计划，他所指的不仅仅是“工商业阶级人士”，俄国人和中国人居住的地带（不是其他外国人，因为他们是“根本不许在铁路区域内定居的”），而且还考虑由预备役的低级军官来组成“一系列的军人新村”。① 最后，维特考虑到野战军即将撤离，正是这时提出了通过铁路营用 414
“军事力量”经营铁路和铁路上“凡自愿受雇的俄国职员”均应遵守“铁路员工战时守则”的方案。② 但是，维特认为毫无疑问，现在“解决满洲问题的办法”就是“确切履行”3 月 26 日条约。③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维特从此就永远不想直接并吞满洲了。“如果今后在我们归还的满洲境内发生严重纠纷”，那时我们就要第二次“派兵进入满洲”，“我们就有充分理由”着手“在那里组织正规的俄国管理机构了”。④ 显而易见，正因为维特这样提出问题，他就为自己修改 3 月 26 日条约开了一个缺口，而这正是他本人在签订这个文件的最后时刻买到的东西。

大家知道，库罗帕特金在“临时”占领满洲一开始就主张：即使不合并北满，也必须保持俄国对北满的占领，并对其实行早在 1900 年秋季确定的俄国“政府的监理”。⑤ 如果通向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中东铁路干线依然是“一条不难切断的线路”，库罗帕特金现在就干脆拒绝对俄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属地的“对外安全”承担陆军大臣理应承担的责任。他还威胁说，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尽快

① 见本书边码第 370 页，以及前引维特出访远东的奏折第 50—54 页。截至 1903 年 5 月，“为了移民”购下了十四万三千七百俄亩的土地，其中有十万俄亩在车站附近（见第 11 号卷，维特 1903 年 8 月 1 日的奏折），尼古拉于 1903 年 5 月 23 日批准了中东铁路地域内《俄国臣民安居条例》。

② 见维特出访远东的奏折第 49—50 页。

③ 见同上，第 33 页。

④ 见同上，第 32 页。

⑤ 见本书边码第 279 页。

在俄国境内敷设从斯列坚斯克到哈巴罗夫斯克的新轨道”，而到那时“过去所有的支出都成了徒劳无益的了”。① 早在 1902 年 7 月撤
415 军的第一阶段，库罗帕特金就指责签署这项条约。“鉴于撤军，他试图提及，让中国同意“决不聘用日本和其他国家的教官训练满洲的中国军队”的必要性，并提出保留军务委员“以监督中国武装力量的发展”，但拉姆斯多尔弗坚决拒绝以俄国政府的名义提出“对他自己拟订的文件表示不满的问题”。②

但是，当第一阶段撤兵顺利结束，盛京省辽河以西地区随同铁路一起交还中国行政当局时，对 3 月 26 日条约“不满”的问题重又提了出来，而且这次不仅是库罗帕特金一人提出的。现在是最终决定或接受、或否决对北满实行半合并方案的最后一个机会了。条约规定，到 1903 年 3 月 26 日，在撤军的第二阶段中，俄国有义务不仅将盛京省其余地方的军队撤出（关于这一点三人帮没有意见分歧），而且还要撤出吉林全境（对此连维特方面也还没有做好一切准备）。库罗帕特金的意思是要“从嫩江和松花江的汇流处（伯都讷附近）到图们江口”一线划一条界线。③ 在这最不利的时机，即在振作起来的别佐勃拉佐夫派面前，需要极小心地对待“太平洋将军”，④ 并要向其显示被他怀疑的“各部门”的团结一致时，三人帮中的分歧倒实际形成了。在俄中关系方面之所以提出重新
416 考虑满洲问题，还因为在俄日关系方面日本在 1902 年 7 月 22 日

① 见《红档》杂志，第 2 卷，第 22 页，库罗帕特金：《日记》，以及第 107 号卷，第 1 部分，1903 年 1 月 25 日特别会议记录。

② 见第 107 号卷，第 1 部分，库罗帕特金 1902 年 7 月 13 日给拉姆斯多尔弗和拉姆斯多尔弗 7 月 23 日给库罗帕特金的信：拉姆斯多尔弗“不认为俄国政府在协定签字才四个月，皇上批准才几星期时，就要出于某种考虑而向中国政府表示它对协定的不满云云”。

③ 见同上，库罗帕特金在 1903 年 1 月 25 日会议上关于对此线以北地区保持军事占领的建议。

④ 即沙皇尼古拉二世，见本书边码第 60 页。——译者

(8月4日)提出的最后建议提起了这个问题，日本建议中有关朝鲜问题各点促使俄国从整体上提出关于“俄国在远东地区政策的总方针”的问题。①

还有一个新的事实需要考虑进去，这就是中国海关部门的管辖范围已扩大到满洲，满洲各省都发现有“一名或数名”“外国”官员，经同赫德爵士商定后被指派到那里的“常关服务”。② 最后，至于满洲当地的情况，那末那里对于彼得堡今后的政策问题就更不可能有什么明确的概念了，而这就更加深了混乱局面，满洲处于这种局面已为时三年了。③

当着手重新考虑俄国在远东今后政策的一般问题时，拉姆斯多尔弗用尽一切办法把这次重新考虑安排得尽可能隆重些，并且依靠有关的四位大臣（亦即包括海军大臣蒂尔托夫在内），以及驻中国、日本和朝鲜首都的三位使节的威信向尼古拉提出了一个纲领。罗津在1897年—1898年曾驻日本，现在又被派往那里。他和驻朝鲜的帕夫洛夫以及雷萨尔呈递了几份详细的奏疏。1903年1月他们都返回了彼得堡，于1月11日与拉姆斯多尔弗举行了一次预备性的、但却是完全正式的会议，然后又在1月25日同大臣们一起参加了一个同样正式的会议。④ 会上讨论了关于同日本签署协定和从满洲撤军这两个问题，并通过了一致同意的决议。拉姆斯多尔弗的调和无疑是成功的，双方互作让步达成了妥协。原

417

① 拉姆斯多尔弗就是这样说的。见第107号卷，第1部分，1月25日会议记录。

② 见1902年8月23日(9月5日)中英商约(即《续议通商行船条约》——译者)第八款第十、十一两节，载《远东事务的条约和外交文件汇编》，圣彼得堡1906年版，第609—610页。

③ 维特在前引1902年奏折中就抱怨这种情况。

④ 1月11日和25日会议记录副本见第107号卷，第1部分。在《日俄战争的序幕》第245—247页和269—275页上详尽转述了这份记录。罗津1902年9月12日的奏疏和帕夫洛夫9月25日的奏疏见第26号卷，雷萨尔1903年1月4日的奏疏见第107号卷，第1部分。

来罗津在他的奏疏中非常坚决地反对与日签订协定，并主张合并满洲，但他在会上却只谈什么“暂时延长军事占领，或者至少要在铁路沿线留驻大批部队”。①

维特不久前还主张必须“严格履行”撤军条约，但早在开会前他就和赞同雷萨尔的那派人站在一起了。这派人反对合并满洲，而想在取得“必要保证”后再撤军，即“保证在俄军撤离后俄国在满洲的合法利益不会受到中国政府和其他大国的侵犯”。譬如，公使会议一致反对财政大臣的下述建议，即把从满洲撤军的问题同中国答应用黄金偿付的军事赔款（庚子赔款）联系起来。② 因此，维特在1月25日的大臣会议上闭口不提“严格履行”中国条约，而对所讨论的各项保证，就“实质来说”仅仅反对禁止中国人在中东铁路沿线居住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了。③ 库罗帕特金在会议召开以前
418 同样费了很大的劲，为的是使雷萨尔同意哪怕只在铁路沿线地段保留俄国的军事占领这一条。雷萨尔果然没有爽约，他在1月11日会议上提到了可以用“部队”“取代”护路军的问题。④

就这样，大臣会议在合并北满问题上没有同意库罗帕特金的意见，没有通过他提出的关于把禁止中国人在中东铁路沿线居住

① 罗津1902年9月12日奏疏全文上满是维特的批语，见第26号卷。这项奏疏是针对日本1902年7月22日提案而撰写的，但却囊括了与整个国际形势有关的俄国整个远东政策问题，并对过去奉行的“和平”征服满洲和“把满洲变为禁区”的政策进行了激烈的抨击。“由于我们缺乏资金，俄国本身的自然资源在很大程度上由外国人经营开发”，我们在满洲的“努力”“因此就更显得荒唐”。

② 见第107号卷，第1部分，1月11日会议记录。在《日俄战争的序幕》一书中这一情节当然是被删去了。

③ 见同上，1月25日会议记录。在1月25日大臣会议前一星期的“一天晚上”，维特为了解释和“消除”“相互间因公事引起的恼怒”，在库罗帕特金处“坐了很久”。他答应库罗帕特金“在平等基础上办事”，“提高”（陆军部的）“预算的极限”。维特这次开诚布公的解释达到了目的，双方“很友好地分手了”（见库罗帕特金：《日记》，载《红档》杂志，第2卷，第25—26页）。

④ 见库罗帕特金：《日记》，载《红档》杂志，第2卷，第21—22页，以及1月11日会议记录。

作为保证条件之一的建议。后来库罗帕特金自己提出了一个折衷方案，内容为：(1)即使中国人同意我们提出的保证条件，也不向中国人许诺在3月如期撤兵。因为根据技术条件，在1903年3月26日前的撤兵地区仅限于盛京省才是可取的，然后到1903年的"夏季"再撤出吉林省南部的军队，"在南部军队撤出的结果尚未弄清之前"，"暂不决定"今后撤兵期限；(2)当轮到"不仅要撤出黑龙江，还要撤出吉林省北部的俄军时"，"提出在铁路沿线和黑龙江及松花江沿江保留一定数量的军队作为撤兵条件"。① 全体与会者一致表示同意这一方案。关于对日协定问题在这两次会议上就更简易、更方便地通过了。

帕夫洛夫认为日本提案"是难以接受的"，维特认为它"过于苛求"，与会者坚决同意这种看法。罗津在1月11日公使会议上曾反对就朝鲜问题与日本签订协议，那次会议关于这一问题有些踌躇不定。但此后在1月25日会议上则达到了"完全的意见一致"，认为此种协议"是可取的"，甚至还认为，日本提出的条件"可以作为今后谈判的某种基础"。

但是拉姆斯多尔弗提议"暂缓"举行谈判，"以免使日本人有理由认为我们迫切希望同它达成协议"，"而等待东京政府来倡议恢复谈判"，这一点也得到"一致赞同"，② 尽管维特早在1902年12月时就力主立即与日本达成协议，甚至不惜暂时把朝鲜让给日本。③ 于是"皇帝"政策的焕然一新的纲领就此形成了，它维护了"内阁"表面上的一致，实际上它没有解决提交讨论的任何问题。其中在满洲问题上，这一纲领提出如此修改3月26日条约，就必

419

① 见1月25日会议记录。

② 见同上。

③ 例如，见第26号卷，维特1902年12月28日就前面提到的罗津和帕夫洛夫的奏疏上呈的奏疏。

然延长了撤兵期，使其明显地变为不定期的了。至少大家一致同意库罗帕特金的建议，决定延期撤出吉林省的一部分（只是南部），把3月26日改为“1903年夏季”。[①] 但是不难预料（在这方面他们当然清楚地意识到），中国方面很可能全部或部分拒绝接受条约的补充义务，那就将使问题回到它的出发点，即“临时地”，但遥遥无期地占领满洲。满洲问题的这种提法的用意是要赢得时间。显然，在这种情况下，拉姆斯多尔弗关于朝鲜问题就无法提出其他建议了，除非等待日方的新提案，“以便使这项新协定成为现仍有效的各项协定的补充和发展”，并且“不是由”俄国的“让步”“从实质
420 上预先解决朝鲜问题”。[②] 正如日本1904年1月23日（2月5日）在开始军事行动前的最后一个照会中所说的那样，1903年1月25日“皇帝”外交所通过的决议无可改变地使这种外交走上了一条“贻误时机”的道路，这种贻误“多数是无法解释的”。

俄国急于将1月25日会议上所通过的关于保证条件的照会提交给中国。即便它准备一旦中国表示同意就按期撤军，它也没有料到这个照会直到1903年4月5日才交到庆亲王手里，甚至比撤兵的最后期限还晚了一些时日。[③] 当时雷萨尔还没有急于去北京，驻北京的代办并不十分机灵。已通过的保证条件的清单看来只是作为一种依据通知这位代办的。普兰松起草了照会底稿，然后得到彼得堡的完全同意，所提的要求较之原先的清单有所增

---

① 已是1903年1月28日，库罗帕特金接到了尼古拉的“谕旨”，内称：(1)于2月中旬开始撤退驻盛京省军队，一月内撤完；(2)从吉林省南部地区撤军时，要考虑到能使军队在“1903年夏季”到达阿穆尔河沿岸地区（见第107号卷，第1部分，库罗帕特金1903年2月7日给维特的信）。

② 1月11日公使会议的“结论”就是这样的。日方在1902年7月22日再次提出废除过去的一切协定（见本书边码第336页）。

③ 见第107号卷，第1部分，普兰松1903年4月5日发自北京的电报。

加。① 先是阿列克谢耶夫，然后尼古拉本人在3月26日会议上都 421
企图再增加一些条款，但没有成功，于是，这个外交文件的校订工作就完全由三人帮来负责了。②3月19日，普兰松还没有什么照会可供提出时，就以提出要求的腔调把行将发生的事告诉了中国人。③ 而在前些时候他就预先通知彼得堡说，中国人“将把我们的照会交给其他外国代表看”，日本驻天津领事，以及前外相青木“正在同袁世凯进行秘密谈判，准备共同行动的方案，如不履行撤兵条约，他们就会将此方案上呈西太后”，“现在全北京的官方都在议论我们有什么图谋”。④

① 见第107号卷，第1部分，普兰松1903年3月13日的电报，以及拉姆斯多尔弗同年4月2日给普兰松的电报。1月25日会议上研究的给普兰松的“初步指令”的草案只有三项要求：(1) 不改变蒙古的内部体制；(2)“不得用任何形式（如让与、租赁、租让等）”把俄军撤出的“地方”转交给任何国家；(3)在中国聘用外国人管理某些行政部门的情况下，“中国北部事务”应属于“十分特殊的……部门”，应委托俄国人管理。普兰松3月13日提出的草案中删去了第一点，但增加了五点新内容，即：(1)在俄军撤出的地方不得割让领土；(2) 不事先同俄国取得联系，不得在满洲开辟对外贸易的新商埠，不许在那里增设领事；(3)不得聘用外国人参与满洲行政管理；(4) 旅顺口到奉天和营口的电报线路应留归俄国；(5)在俄军撤出营口后，华俄道胜银行营口分行的海关银行职务应予保留；(6)凡俄国人在占领期间所取得的一切权利，在俄军撤离后皆应保留；(7)营口的医生和海关税务司应委派俄国人担任。照会的最后文本见《日俄战争的序幕》，第274页。

② 见同上，拉姆斯多尔弗给阿列克谢耶夫将军的电稿，该电稿于1903年3月24日送往财政部办公厅。根据阿列克谢耶夫的提议，在保证条件中列入了如下两项：(1) 金州厅的自治；(2) 北京政府批准鸭绿江上的满洲森林租让权。拉姆斯多尔弗答道：实际上可以不与中国政府进行任何联系就取消金州厅的自治（见本书边码281和298页）”，关于第二点；他审慎地反问道，这不是将使“本已困难的事情”变得更复杂吗？并见同上，维特1903年3月19日给拉姆斯多尔弗的信，内称，他对普兰松的方案没有不同意见。

③ 见同上，普兰松1903年3月19日的电报。庆亲王正式要求俄国派代表移交所撤出的领土，普兰松对此未作答复。当再次提出这一要求时，普兰松以一项警告作为回答说，正准备提出若干条件。联芳失声叫道：“一切条件都在去年协定中作了规定，还有什么条件啊。”

④ 见同上，普兰松1903年3月12日和璞科第同年3月24日的电报。参见罗曼诺夫：《日俄战争前夕的维特》，载论文集《俄国与西方》，彼得格勒1923年版，第161页。

单凭这一点来看，下述情况对于俄国外交界就未必是多么出乎意料的事：中国政府认为，4月5日提交给它的要求“完全是3月26日协定以外的东西”，这似乎是一项“新的特殊协定”，中国政府的答复是：建议对“满洲的任何问题”“在撤军以后”再行讨论。①

几天以后，当俄国4月5日照会的内容为各国驻北京使团得知时，
422 英、美立即对俄国破坏“条约权利”提出了抗议。当然，关于“开辟商埠”和领事驻满洲这一条引起了特别的麻烦。海约翰觉得这一条是特别有挑衅性的，因为前此不久刚把中美商约草案通知了俄国，草案中规定“开辟”奉天和大孤山作为对外商埠。② 在这些日子里日本驻华盛顿的外交人员展开了起劲的工作纯粹是基于这一点，因为“如果日本想找一有利时机把俄国人从满洲撵走，那末现在，当俄国正图谋反对与远东事务有关的各国的商业利益和其他利益时，正是这样的机会”。③ 不管拉姆斯多尔弗怎样抵赖，如何声明，说什么俄国的这一要求“一看就知道是可笑的”，什么“俄国正在尽最大努力吸引美国资本和美国商业”，但当美国驻北京大使④已从日本人那里拿到俄国所提条件的文本时，拉姆斯多尔弗的任何声明都毫无意义了。而日本人是从庆亲王本人那里得到这份文件的。⑤

这同两年前的情况完全一样，俄国外交企图破坏列强的“条约权利”并关闭满洲的门户，但它却被当场抓获。例如，海约翰只要

---

① 见第107号卷，第1部分，中国驻彼得堡大使（应为公使——译者）1903年4月9日照会。

② 见同上，喀西尼1903年4月23日发自华盛顿的三份急电，尤其是第44号急电。参见《蓝皮书》（中国，第2册，1904年）第74号及以下各号。

③ 见同上，喀西尼1903年4月23日发的第44号急电。喀西尼是通过“一个秘密渠道”得知此事的（日本驻华盛顿使馆正在议论的事情）。

④ 应为公使。——译者

⑤ 见《蓝皮书》（中国，第2册，1904年）第91、92、97号，以及前引喀西尼第44号急电。

引证说，普兰松在北京“同两位公使会谈时已亲口承认”，康格搞到的照会文本“确实是他转交给外务部大臣们的”，那末海约翰就可能使喀西尼处于十分难堪的境地。① 中国人在同美国继续商谈开 423
辟满洲“商埠”问题中的所作所为不过证实了，俄国在这一点上仍在对北京“施加压力”。最后，只是当俄国外交界自己放弃了对此问题的要求时，中国人才“正式答应”，“从满洲撤军一结束”，便可“开放口岸”〔即“(公历) 10 月 8 日签订”包括这项义务的“商约”〕。② 英国政府在和美国共同行动时，仅仅对俄国政府侵犯“条约权利”(即反对开辟商埠和排挤外国人参与满洲行政管理) 表示抗议。与此同时，英国政府又和日本共同进行了以下活动：(1)对于“任何不符合满洲专约的条件”，他们表示“要象谈判满洲专约时(1901 和 1902 年) 那样给中国以支持”；(2) 认为俄国所提的要求是“完全不能接受的”；(3)警告中国人勿在“较为次要的各点上”表示让步，否则将“不可避免地”作出“更为重大的让步”。③ 这就是说，英国从根本上完全反对修改满洲协定，而且它和日本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英国对日本声明：英国“完全了解俄国所提条件的重要性”。而日本方面也答应，在预先通知自己盟国之前，“不采取任何(‘解决’满洲问题的)步骤”。④ 可见，俄国的“旧方针”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在中国初次拒绝之后，“皇帝”的外交界就试图 424
放弃自己的几项要求，但这一尝试仍不能推动事情发展，而中国政

① 见第 107 号卷，第 1 部分，前引喀西尼 1903 年 4 月 23 日的急电。

② 见《蓝皮书》(中国，第 2 册，1904 年) 第 110、114、117、119、120、121、140、141、145 各号。有关商埠和领事问题的要求，在1903 年 6 月底阿列克谢耶夫准备在旅顺口会议上提出的要求中已删去。参见《日俄战争的序幕》，第 306—307 页。

参见中美《通商行船续订条约》，载《海关中外条约》，第 1 卷，第 745—763 页。——译者

③ 见《蓝皮书》(中国，第 2 册，1904 年)，第 79—82 号。

④ 见同上，第 87 和 88 号。在 1903 年 6 月初，庆亲王表示深信，中俄之间将在“最近期间”解决满洲问题，而且丝毫“无损于中国主权”，这使英国驻北京公使对此感到“奇怪”(见同上，第 143 号)。

府则乐于遵循英国的劝告，决不承担任何一项义务，哪怕是“较为次要的”义务。①

早在 1902 年 11 月，维特就撺掇尼古拉说，日本应认为自己“无疑地永远失去了”满洲，但是，“只要日本能给我们以相应的补偿（显然，是在满洲吗？），那我们暂时可以甚至完全放弃朝鲜”。②而且到现在，1903 年 5 月，维特继续固执己见，即不去“占领”朝鲜，日本就会平静无事。然而，现在日本报界不仅说，“俄国在满洲确立最高权力之日，就是闭门政策确定之时”，又说，“这就等于日本在生存斗争中的失败”（载《朝日新闻》），并且根据某些情报判断，日本政府准备向俄国提出有关满洲的某种要求（看来，作为一种非直接的挑衅行为，是不是指在 5 月初拟定的那项要求，即“限制满洲境内的护路军人数”？），而这种要求又是俄国绝对不能接受的，以此来造成日俄“和平关系的破裂”。③

须知，正是中东铁路的这种无限的权力，从一开始就成了 3 月
425 26 日条约起草者运用的唯一法宝，每当既必须使野战军有可能撤离，同时又必须保障铁路安全时，条约作者就使用这个法宝。小村

① 见《日俄战争的序幕》，第 276 页，这次俄方（在 4 月 24 日给雷萨尔的指令中）取消了有关领事、商埠以及华俄道胜银行代办提存营口的海关税款等项要求。

② 见维特 1902 年的奏折，载《日俄战争的序幕》，第 214 页及 216 页。

③ 见《蓝皮书》（中国，第 2 册，1904 年），第 118 号，窦纳乐发自东京的报告，其中谈到日本报界有关满洲的看法；以及第 107 号卷，第 1 部分，阿列克谢耶夫 1903 年 5 月 11 日给维特的信，署有“圣彼得堡”的字样。“我们在日本的一位秘密谍报员”“用密码”“把小村（寿太郎）男爵的意图”告诉了阿列克谢耶夫，说，“M.伯爵召我急速前去，要我尽快把皇上圣意赞许的小村寿太郎男爵的如下计划通知阁下：（1）“首先要了解英国政府的意向，以及一旦日俄和平关系破裂，英国愿在何种程度上帮助日本”；（2）“英国意向一经证实，立即向中俄两国政府提出如下建议：（а）限制满洲境内的护路军人数，（б）一视同仁地对一切外国人开放满洲较重要的商埠，（в）保障日本臣民在满洲的居住自由，以及他们在该地区的人权和财产权”；（3）“如俄国答复不能令人满意，或不履行其撤兵义务，即采取极端手段：认为满洲已恢复到原状，派日本工程师去满洲，如若工程师的生命及行动自由受到危害，即同时配备军队，将现驻华北的日军部队派往满洲”。

寿太郎(或者那些想以这种消息在彼得堡产生作用的人)的要求的目的,是要把那些竭力装作日本的朋友,而实为主要敌人的人弄得走投无路。小村寿太郎不可能知道,维特这个这次在客观上必须遭受抨击的主要对象,在4月9日的中国照会之后,已经同意了库罗帕特金关于"在北满保留九营步兵及相应数量的其他部队"的要求。①

如果这一计划确实在东京讨论过了,那它不经英国内阁同意,是不能付诸实施的。但是,看来目前在伦敦并不是完全不存在可能与俄国达成协议的想法,甚至到1903年7月,克兰伯恩勋爵在上院宣称:"俄国政府非常清楚,如能达成协议我们将喜出望外",426
但是,"必须首先使俄国政府方面作好"达成协议的"准备",然后"要求我方确实弄清,俄国政府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然而恰恰这一点是英国"完全无法理解的"。但是,克兰伯恩这时还不无恶意地指出:"我们不得不怀疑的是,既然俄国是个专制独裁的国家,那末首先② 可能设想的是,俄国政府同样应是一体化的政府,但与此相反,俄国政府内部至少有两派,我们必须同两派打交道"。③

1903年7月15日(28日),日本决定(并没有瞒着英国内阁)向俄国建议"共同研究远东事态,因为两国利益在远东有所摩擦"。

---

① 库罗帕特金在日记中(《红档》杂志,第43页)就是这样记录1903年4月13日的三人帮会议(并有雷萨尔参加)的情形的。会上讨论了"从满洲撤兵问题",说军队要在哈尔滨、齐齐哈尔、富拉尔基、宁古塔、海拉尔、珲春、松花江沿岸和齐齐哈尔到布拉戈维申斯克的大道上留驻。参见第107号卷,第1部分,维特1903年4月11日给拉姆斯多尔弗的信。维特同意,"如果中国政府拒绝我们提出的补充保证条件,就"不履行"3月26日条约,"并在中东铁路沿线以及阿穆尔河和松花江沿岸设立岗哨"。

② 原文为 priori。——译者

③ 此处援引的是1903年7月11日上院报告片断的译文,见第107号卷,第1部分。大概因为克兰伯恩在上院作了这一声明,宾肯多尔弗才企图同兰斯多恩谈及英俄之间"就中国事务""达成更完全的协议的可能性"。见《蓝皮书》(中国,第2册,1904年)第13)号,兰斯多恩1903年7月16日(29日)给斯科特的信:宾肯多尔弗的意思是俄方在扬子江作出某些让步,而兰斯多恩"指出"要在满洲和牛庄作出让步。

7月23日(8月5日)俄国接受了这个建议。最后7月30日(8月12日),栗野把日本的协定方案交给了拉姆斯多尔弗,其内容是:(1)日本根本不认为它已"毫无疑问永远失去了满洲";(2)它希望保障自己以及他人在满洲的利益,而不能预先决定满洲的命运,使之仅对俄国一国有利。这时正是关于(同时就满洲和朝鲜问题)达成协定的这种广泛的立论使日本外交同俄国方针的两种方案发生了冲突。这两种方案无论过去和现在都不仅限于保护俄国在满洲
427 的铁路利益,而日本却只准备承认俄国在"铁路企业中的特殊利益"。①

这两种方案的分歧,完全是沙皇政府中斗争双方主观上造成的。这种分歧在客观上并不象看来他们自己所想象的那样大,也不象旁观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成不变的。

V

三人帮无缘无故地要北京政府承担1902年3月26日条约的某些补充义务,其中有些显然是第三国所不可能接受的,并会使本已紧张到极点的远东国际局势更加复杂化。他们这样做究竟想干什么?即便要设想回答这一问题都不可能。同样,历史学家也无法回答另一个问题:三人帮既然在1903年4月13日会议上通过
428 决议"占领"(即在那里公开保留俄国野战军)象哈尔滨、齐齐哈尔、

① 见《远东资料》,远东特别委员会出版社,圣彼得堡1905年版,第170、173和177页。7月30日(8月12日)日本提出把下列各点载入有关满洲问题的协定:(1)承认中华帝国和朝鲜帝国的独立自主和领土不可侵犯,赞同各国在该两帝国内工商利益均等的原则;(2)"朝鲜铁路可能延伸进入满洲,与中东铁路和山海关至牛庄铁路衔接",对此,俄国政府有义务"不予干涉";(3)另一方面,日本承认"俄国在满洲铁路企业中享有"特殊利益";(4)日本承认俄国有权派兵去满洲,以保护这些权利,或镇压暴乱。也是在那一天,7月30日(8月12日),兰斯多恩在伦敦对宾肯多尔弗强调说,英俄关于中国事务的协定,只有在其中包括"满洲问题"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达成。见《蓝皮书》(中国,第2册,1904年),第142号。

富拉尔基、宁古塔、海拉尔、珲春、松花江流域和齐齐哈尔至布拉戈维申斯克的大道这样一些战略要地，[①] 那末，他们今后如何玩弄他们的外交把戏呢？据说这种把戏的目的还是为了与中、日两国保持持久和平，从 1903 年 5 月 2 日起，历史学家必须和“新方针”打交道了。假如让旧方针的代表们继续工作，他们还会出些什么点子？这已不是历史学家在研究著作中所要猜测的东西了。可是，这些旧人物至今仍没有退出舞台，甚至没有“从远东事务中被排挤走”。正如别佐勃拉佐夫向拉姆斯多尔弗解释 5 月 7 日会议以后对大臣们所形成的新局势时所说的那样，那些旧人物“在皇上的领导下”只变成了“觉悟了的文官”，以至过了许多年以后，他们还认为自己有权利感到骄傲，因为他们是为争取“和平”结局，为反对那些似乎“慑服”了沙皇的新顾问们异想天开的“冒险行为”而斗争到底的。[②]

正如别佐勃拉佐夫所说，尼古拉有他“自己的行动办法”，即“循序渐进的”办法。用这种办法，“就是往蜂蜜里掺焦油，因而把事情弄得更糟”。别佐勃拉佐夫在这里（这时已是 1904 年 7 月）所说的焦油，指的正是那“可恶的地地道道的下流坯三人帮”，他们“闯了许许多多的祸”，别佐勃拉佐夫“在当时曾竭力揭露”他们。甚至在维特本人已被“撤职”，别佐勃拉佐夫认为（三人帮之间的）“协调一致”已“不复存在时”，这些家伙还不断使别佐勃拉佐夫生气恼怒。[③] 这就是说，“这些下流坯”直到最后都没有妥协，不同意“新方针”，不同别佐勃拉佐夫“朋党”携手合作。[④] 现在我们可以看

---

① 见库罗帕特金：《日记》，载《红档》杂志，第 2 卷，第 43 页。

② 见《日俄战争史料集》，列宁格勒出版社 1925 年版，第 143 页，别佐勃拉佐夫 1903 年 5 月 29 日给尼古拉的信；库罗帕特金：《日记》，第 86 页。

③ 见罗曼诺夫：《1904 年夏季的别佐勃拉佐夫派》，载《红档》杂志，第 17 卷，第 79 页；别佐勃拉佐夫 1901 年 7 月 8 日的信，以及库罗帕特金：《日记》，第 60 页。

④ 见同上，第 91 页。

到，他们甚至力图保持他们自己的某种路线。

429 尼古拉看来想在战备方面赶上日本，他在5月2日命令阿列克谢耶夫在“最短期间内”让“一切人看到一个明显的证据，表明我们有决心捍卫我们的权利——在满洲拥有特殊势力”，但三人帮每个成员都很清楚，这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在5月7日会议上，维特就森林租让权问题声明说：“在对别佐勃拉佐夫作了解释之后，他们之间实际上没有什么分歧”，但是，至于扩充“我们在远东的武力”问题，他对此表示反对，因为“国库用于此事的新拨款必将给俄国人民的经济状况带来沉重打击”。① 拉姆斯多尔弗随声附和说：“俄国在占领区内寸步不让是没有物质条件的”，同时他又安慰说，“只要俄国有耐心”，“时间就是俄国的唯一同盟者和忠实助手”。② 库罗帕特金在1903年6月也说“我们的战备不如日本”，在1904年1月战争爆发前夕，他还认为必须把战争推迟一年零四个月，以便完成铁路工程，或者“即使推迟四个月也好”，只要“来得及派遣增援部队”。③ 他们三人由此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应当避免战争。但在5月7日会议上，以及后来直到1903年的深秋，他们当中谁也没有建议立即完全地、不折不扣地履行3月条约，取消撤兵的任何保证条件，尽管一般说来他们不反对谈论一下使别佐勃拉
430 佐夫感到为难的必须“遵守条约”的问题。④ 当时，有关各方共同努力应付了第二撤兵期；而同时，例如甚至前引可能由别佐勃拉佐夫

① 见维特伯爵：《不得已的说明（奉答侍从将军库罗帕特金关于对日战争的总结）》，莫斯科1911年版，第87、89、90—92页，维特在这里发表了有关1903年5月7日会议的部分文件。我们把它同第120号卷中这些文件的副本进行了校对，证明是完全准确的。

② 见第120号卷，拉姆斯多尔弗的奏疏，这是他在5月7日会议之后对沃加克在会上宣读的奏疏的答复。

③ 见《日俄战争的序幕》，第30页，以及库罗帕特金：《日记》，第105页，1904年1月15日所记。

④ 见第120号卷，1903年5月7日会议记录。

起草的、尼古拉5月2日签署的给阿列克谢耶夫的指令(该指令宣布了新的方针)竟也声称:"最终决定确切履行3月26日条约"。因此可以说,"履行"3月26日条约这一概念本身这时在彼得堡也不知怎的被搞乱了。

毫不奇怪,不仅英国人不知道现在彼得堡对满洲打的什么主意,而且首先连沙皇新选的远东事务"负责人"、未来的总督阿列克谢耶夫本人对此也不明白。他一开头就被他所承担的任务的内部矛盾弄糊涂了,这任务是:"确切履行我们同意承担的3月26日条约的义务",同时又要"充分保护我们在满洲的利益"。于是阿列克谢耶夫就渐渐"倾向于""保持军事占领为好"的想法了,因为"允许外国人进入满洲,最终我们将会失去满洲"。由此,阿列克谢耶夫得出了一个今后唯一可行的结论,如同"我国外交界"不成功的尝试(阿列克谢耶夫把它叫做"错误")所提示的,这就是:"现在不是同中国人进行任何谈判的时机,应当不理睬他们,并巩固我们在满洲的地位。"① 实际上,在从满洲撤兵之前,已开始和中国人进行第四次谈判了,前三次尝试均以失败而告终,这至少是很可笑的。维特在远东的一位代理人如此描述他同阿列克谢耶夫谈话的印象,说阿列克谢耶夫"实际上主张合并满洲,但是他出于小心谨慎,看来不打算发表这种极端的见解,如若陆军大臣不同意,那他只主张 431
延长军事占领"。② 按照尼古拉的旨意,阿列克谢耶夫应同前去旅顺口的库罗帕特金、别佐勃拉佐夫等人讨论俄国今后的满洲政策问题。阿列克谢耶夫在等待他们的时候,这位未来的远东总督流露出了并吞满洲的想法。不管怎样,"他的观点"越来越接近于"别佐勃拉佐夫的某些主张"。③6月3日,当别佐勃拉佐夫"借助上帝

① 见第107号卷,第1部分,关东省财政委员普罗塔西耶夫1903年5月24日和6月9日的电报,以及璞科第同年6月7日的电报。

② 见同上,普罗塔西耶夫1903年5月24日发自远东的电报。

③ 见同上,普罗塔西耶夫1903年6月9日的电报。

的帮助”准备从彼得堡动身去旅顺口时，在那里等待他的仿佛是不坏的预兆。

在别佐勃拉佐夫的后方彼得堡，目前“各部门的情况大体上”也“暂且一切顺利”。从5月7日会议以后，到别佐勃拉佐夫动身之前的三个星期中，别佐勃拉佐夫确实干了不少事。第一，最使别佐勃拉佐夫操心的是拉姆斯多尔弗，他打算辞职。但经过别佐勃拉佐夫两次长时间的折磨人的拜访之后，拉姆斯多尔弗最后表白了一番，他说“要是他早就知道那么多，或许他会做得好一些，但是他却不知道，而他是没有什么恶意的”。① 拉姆斯多尔弗不仅留任原职，而且还表现出某种“觉醒”，他和别佐勃拉佐夫商妥，别佐勃拉佐夫把“将向中国提出的最低要求清单”交给他，“外交部是拥有以论据支持这些要求的必要资料的”。② 第二，别佐勃拉佐夫需要同维特进行“商量”，这事原来比较简单易行。维特在5月7日会议上已经假装承认“增强我们在远东的战斗力量”“是可取
432 的”，只是不要超过4月2日刚刚批准的“预算的极限”（二亿一千万卢布分五年使用）。③

会后当别佐勃拉佐夫去找维特“商谈”用于此事的“款子”时，维特不是如别佐勃拉佐夫预料的加以反对，而是立即去迎合这位新“御前大臣”。他撺掇别佐勃拉佐夫缩减西线防御费用，指出已给鲍勃尔—那累夫战略铁路拨出了二千二百万卢布，用透露这一军事机密的办法向他谄媚。④ 别佐勃拉佐夫在启程前夕和旺

① 见别佐勃拉佐夫1903年5月8日、5月11日和6月2日给尼古拉的信，以及5月29日给尼古拉的两封信，载《日俄战争史料集》，列宁格勒出版社1925年版，第136、137、141—144页。

② 见前引别佐勃拉佐夫1903年6月2日给尼古拉的信。

③ 见维特：《不得已的说明（奉答侍从将军库罗帕特金关于对日战争的总结）》，莫斯科1911年版，第92页。

④ 见别佐勃拉佐夫1903年5月23日给尼古拉的信，载《日俄战争史料集》，第139页。参见库罗帕特金：《日记》，载《红档》杂志，第2卷，第47页；“最大的秘密已在街上传开了”；以及萨哈罗夫给库罗帕特金的信，同上，第62页。

利亚尔利亚尔斯基一起同维特“谈妥了”有关在满洲业已开始经营的新企业，其中包括“在经营抚顺煤矿中协调一致”，正如我们所知，该矿部分矿区是属于满洲矿业公司的。[①] 第三，别佐勃拉佐夫还同维特“谈妥了”“重新开办一家公司”的事，1903 年 5 月 31 日在有公证人在场的情况下就此签署了合同，而且旺利亚尔利亚尔斯基和巴拉绍夫分别作为在彼得堡和远东的代理人的手续也办妥了。[②] 第四，在这些问题上阿巴扎和别佐勃拉佐夫束手无策，因而他们立即把研究管理远东的新机构的问题交给普列维去办。当时，我们知道，尼古拉在 5 月 7 日会议记录上批示，“需要各部门共同讨论的远东问题”“以后应在此种特别会议上进行讨论”，批示还将这些会议的“安排事宜”交给阿巴扎经办。[③] 最后，第五，别佐勃 433
拉佐夫背着陆军大臣使尼古拉同意了增派两旅军队到远东去。[④] 办完这一切之后，别佐勃拉佐夫就只有“祈祷上帝”“帮”他“尽力在当地实现吾皇圣意了”，为此，看来只要赶在库罗帕特金之先到旅顺口对阿列克谢耶夫做些相应的工作就够了。阿列克谢耶夫在别佐勃拉佐夫派中是以“始终看重私利”著称的，弄不好很可能倒向库罗帕特金那边。[⑤]

如果说，“随着别佐勃拉佐夫动身去旅顺口”，“所提出的有关远东的问题已平息下来，只等陆军大臣、阿列克谢耶夫将军和御前大臣到当地会商解决”，[⑥] 那也不能说，现在在彼得堡已根本不再

---

① 见别佐勃拉佐夫 1903 年 6 月 2 日给尼古拉的信，载《日俄战争史料集》。

② 关于成立《俄国远东木材公司》的合同见《日俄战争的序幕》，第 290 页，这时没有收到分文股金，国库拨下的二百万卢布远未用完。

③ 见第 120 号卷，5 月 7 日会议记录副本，上有尼古拉的批示，以及前引别佐勃拉佐夫 1903 年 6 月 2 日给尼古拉的信。

④ 见《红档》杂志，第 2 卷，第 47、62 页。

⑤ 见阿巴扎 1904 年 6 月 21 日的信，载《红档》杂志，第 17 卷，第 78 页。

⑥ 见萨哈罗夫 1903 年 6 月 12 日给库罗帕特金的信，载《红档》杂志，第 2 卷，第 61 页。

讨论这些问题了。诚然，没有召开过任何会议，但阿巴扎遵照尼古拉的嘱咐找阿列克谢公爵、维特和拉姆斯多尔弗进行了商谈，而拉姆斯多尔弗也用电报与我们驻东京和北京的代表进行了联系。根据我们所掌握的不完全资料可以判断，在各个方面都悬着一个问题，今后如何避免同各大国发生纠葛，各国正极为警惕地监视着俄国在东方的每一个行动，对此在彼得堡不管谁也不会表示怀疑。拉姆斯多尔弗直接向雷萨尔提出："准确弄清，外国人对满洲的哪些要求是应在行将研究最后保证条件时要加以拒绝的"。于是，雷萨尔企图直接从他在北京的"同僚"（指各国驻北京的公使——译
434 者）中间弄清楚，他们要求俄国遵守的"门户开放"原则究竟是哪些内容。[①] 结果发现，"关于应该如何理解这一名词"，他的"同僚们""并没有一个完全确定的见解"，所以雷萨尔便就"外国人在满洲活动"问题向彼得堡提出了他个人的想法。

雷萨尔是这样分析问题的：俄国是否愿意外国人在满洲(1)进行商业活动，(2)开办外国工业企业？是否可能和怎样才可能分别从商业方面和工业方面阻止这些活动？雷萨尔认为在满洲的外国商业活动是"绝不适宜的"，但只有一个办法可以阻止它，这就是合并满洲，把它纳入俄国海关范围；但雷萨尔同样认为这是行不通的。反之，由于俄国本身缺乏资金，雷萨尔认为，"即使在合并满洲的情况下"，为了"发展边区经济"，吸收外国资本参加满洲工业也是可取的。加之他担心在满洲会有"很多困难"，因为"大家对满洲议论纷纷，说俄国之所以不许外国人到满洲去，其原因就是那里有特殊的财富"。"假如(那里)可以自由经营企业，就会很少有人愿意去了"，因为"实际上那儿并不比中国的其他地方富"。[②] 但

① 见第 11 号卷，拉姆斯多尔弗 1903 年 6 月 11 日给维特的信，以及第 107 号卷，第 1 部分，雷萨尔 1903 年 6 月 3 日给拉姆斯多尔弗的第一份电报。

② 见前引雷萨尔 1903 年 6 月 3 日的第一份电报。

麻烦的是，“外国人”在满洲的“工业活动”必然“带有政治色彩”，“必将削弱我们现在依据条约享受的地位”，结果雷萨尔提议“要以继续占领满洲的全部或部分为满足，哪怕满洲在名义上归中国皇帝”，并提议签订一个“特别条约”，中国有义务“在所述地区之内不向外国人开辟新商埠，不许建立租界，并根据俄国的利益调整有关 435
工业租让权的问题”。①

拉姆斯多尔弗也询问了罗津的意见，当时罗津从东京提出了更“勇敢”、更“冒险”得多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关于朝鲜问题，他建议同日本签订一个“补充协定”，“划定双方在朝鲜的利益范围，我们取得朝鲜北部，日本取得包括京城在内的南部，日本并有权给朝鲜政府派遣顾问。当然如阁下(拉姆斯多尔弗)电报中指出的，对修筑工事要加以限制”。罗津指望日本会同意在朝鲜问题上作这种“妥协”，他十分奇怪地把这种希望建筑在彻底解决满洲问题所带来的效果上，即象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那样，“把满洲全境置于我们保护之下”，并向列强“宣布”，“我们在满洲全境为外国贸易和外国资本大开方便之门，外国贸易和外国资本享有如同在俄罗斯帝国本土那样的自由”，并负责在满洲实施“低于中国税率”的税则，营口不属保护区之内。② 我们不知道拉姆斯多尔弗怎样对待这两项提议，但是维特私下说出了他对罗津方案的看法，认为这是一个“勇敢的”，“极其片面”又“十分冒险的”方案。对雷萨尔的“设想”，他说他“大体上”“同意”，但在阿列克谢耶夫在旅顺口召开会议研究保证条件的方案之前，他暂不详细阐述他的见解。③ 然而，

① 第107号卷，第1部分，雷萨尔1903年6月3日的第二份（续第一份）电报，以及维特1903年6月23日对雷萨尔两份电报的回信。维特在信中正是这样归纳雷萨尔的意见的，而雷萨尔的电报却说得有些紊乱，文字冗长，内容上甚至可能有问题。维特如何理解雷萨尔的电报，这一点对于我们往下的叙述是很重要的。

② 见同上，罗津1903年6月13日给拉姆斯多尔弗的电报。

③ 见同上，维特在罗津的电文和拉姆斯多尔弗1903年6月11日给维特的信上的按语。拉姆斯多尔弗并把雷萨尔6月3日的两份电报附寄给了维特。

436 这两位大臣现在就不得不十分明确地对另一问题表示他们的意见了。

现已清楚，就在这些日子中，尼古拉也由于同样的关系，在其身边的阿巴扎的参与下，在解决同样的问题。首先这里有一个对日协定问题。说到这个问题，尼古拉主张“把朝鲜交给日本人”。因为尼古拉一如从前“打算履行3月26日条约”，因此阿巴扎担心“我们可能陷入困境，无法对朝鲜进行包围”。他在草拟“我们未来对日关系的原则”时，把俄国在满洲“在经济方面稳固立足”的问题，以及有关俄国在图们江和鸭绿江上的租让权问题也列进去了。日期也已拟定，到时候不待日方提出动议，“但等增派的两旅部队一到外贝加尔地区”，就可以“开始同日本商谈朝鲜问题”。① 我们看到，尼古拉已不梦想得到朝鲜了，他准备照维特在这方面的多次劝告去做，还准备放弃三人帮在1903年1月决定采取的等待策略。②

暂时没有迹象说明尼古拉已将他个人的决定告诉了各大臣。但是，有迹象说明拉姆斯多尔弗不反对“把朝鲜奉送给日本人”，并“宣布，我们今后仍留在满洲”。③ 阿巴扎根据沙皇谕令，将维特和拉姆斯多尔弗两人请去，要他们对是否把符拉迪沃斯托克恢复为自由港这一问题发表意见。他们一致答道，这个问题与满州问题直接有关，并就满洲问题表示了自己的看法。拉姆斯多尔弗（“自己
437 主动地”）说，“他三年以来一直认为应当把满洲抓过来，认为现在

① 见阿巴扎1903年6月14日给尼古拉的信，载《日俄战争史料集》，第144页及以下各页。

② 在阿巴扎就尼古拉关于朝鲜问题的决定与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大公取得一致意见的两星期之后，6月28日尼古拉想要知道：“罗津为什么不就俄国给日本在朝鲜的行动自由问题继续……进行谈判？”（见波克罗夫斯基：《日俄战争》，第599页）。

③ 见阿巴扎1903年6月14日给尼古拉的信，载《日俄战争史料集》，第144页及以下各页。

需要作出坚决而明确的决定”，“如果决定把满洲抓过来，就向日本宣布这一决定，并及时地把朝鲜奉送给它”。维特说，“最好坚决而明确地说，俄国想在满洲得到什么”，“外国货物免税输入阿穆尔地区和满洲可能堵死俄国货物的销路”，“一般说来，允许外国资本输入较之允许外国货物输入为好”；又说“最好关闭满洲港口”。① 如果说维特确实“大体上”“同意”“雷萨尔的下述设想”，即：如不合并满洲并将其纳入俄国海关范围，就不可能使满洲对外国货物关门，那末他对阿巴扎提的建议又意味着什么呢？

如果说在彼得堡在别佐勃拉佐夫背后人们议论纷纷，那末 6 月间在旅顺口的一系列会议上，对别佐勃拉佐夫说来，事情也不会象预料的那样“顺利”。他在旅顺口在任何方面都没有得到阿列克谢耶夫的支持。阿列克谢耶夫不仅闭口不提合并满洲的问题，而且原来他比库罗帕特金还要温和些。这就是：(1)甚至在象“鸭绿江上的活动”这种朝思暮想的问题上，阿列克谢耶夫也与别佐勃拉佐夫持不同意见，认为这种活动“仅具有商业性质”；(2)不顾库罗帕特金的意见，甚至对只合并北满一地也表示反对；(3)阿列克谢耶夫是头一个建议“履行”3 月 26 日条约的(当然是在有保证条件的情况下)；(4)他不赞成库罗帕特金的十七点保证条件，认为条件应“减少到最低限度”，否则就会使人得出结论，说“我们掐住了中国的咽喉”，而中国“却丝毫没有得罪我们”。他甚至计划让中国政府“派一特使去觐见皇上，请求在从满洲撤军时不向中国提出苛 438
刻的条件”；(5)最后，他还提出了一种完全反对别佐勃拉佐夫的异端想法，即对满洲的经济企业，“国库不予投资”。② 结果别佐勃拉

① 见阿巴扎 1903 年 6 月 16 日给尼古拉的两封信，载《日俄战争史料集》，第 146 页及以下各页。

② 见《日俄战争的序幕》，第 293 页及以下各页，那里详细叙述了旅顺口会议的过程。参见第 120 号卷，1902 年 6 月 18 日关于满洲问题的会议记录第 1 号，以及第 107 号卷，第 2 部分，璞科第 1903 年 6 月 25 日的电报。

佐夫感到会议的决定“毫无实际意义”，而将自己的“个人意见”电告了沙皇。①

当然，在旅顺口（如在彼得堡一样）谁也没有再提立即从满洲完全撤军的问题，但是，这十六次会议却一直处在外国“阻挠”的怪影之中。关于新派军队到满洲去一事也绝口不提了。看来，由于要加强战备，部分军队（两个步兵团，两个炮兵连和一个工兵营）不是从满洲撤到阿穆尔地区，而是开到关东去了，以二百五十万卢布的款子加强了旅顺口要塞的修筑工程，军事占领期拟延长三年，同时“沿中东铁路”驻扎军队。为避免惹怒外国人，从保证条件中删去了关于领事、不增开新商埠和俄国臣民有权优先取得工业租让权等项要求（这里删去的要求，恰恰是维特刚在彼得堡“大体”“同意”认为可行的东西）。② 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之下，如同最初
439 设想的那样，由别佐勃拉佐夫同阿列克谢耶夫在旅顺口制订俄国在远东“政治经济任务的”“合理提法的提纲”，是完全不可能的。就军事问题和政治问题所通过的决定，（“在陆军大臣回彼得堡以前”）仅是初步性质的，而且显然有可加批评之处。

维特与拉姆斯多尔弗两人一得到有关旅顺口会商的最初消息，就立即以书面形式向尼古拉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拉姆斯多尔弗只是把旅顺口的保证条件，同中国人春季拒绝讨论普兰松所提要求后最近（4月24日）交给雷萨尔的指令作了比较，他在奏疏中指出了旧保证条件胜于新条件之处，因此，他老老实实地认为应该重提雷萨尔交涉无效的那些条件。③ 维特在准备奏折时，尚不知道

① 见别佐勃拉佐夫1903年8月2日给尼古拉的信，载《日俄战争史料集》，第157页。

② 在旅顺口通过的保证条件的全文载《日俄战争的序幕》，第306至307页，要求共有十项，关于优先取得工业租让权一条，当时决定，只要雷萨尔认为可行，便可提出。

③ 见第120号卷，拉姆斯多尔弗1903年7月6日给尼古拉的“关于旅顺口会议制订的保证条件的奏疏”，尼古拉在奏疏上批道：“这一切须待陆军大臣回来后再行研究。外交部的反对意见和修正意见值得严重注意。”参见《蓝皮书》（中国，1904年，第2册），第138号。

旅顺口会议制订的保证条件的确切内容，因此他提出了他所知道的可能解决满洲问题的各种方法以供选择，这些方法有：(1)正式合并满洲，他反对这一办法；(2)不采用任何正式文件，“不顾中国政府的意愿”，而无限期地加以占领，并保留俄国行政管理体制，此法他也不同意；(3)从满洲撤军，这就是他的主张。但是，这种主张的直接含义远不是要“履行”俄国根据3月26日条约承担的那些义务。第一，拟从满洲“撤出”的俄军，不仅要集中到阿穆尔地区和关东省，而且还要集中到“中东铁路区域”；第二，拟“事先”“由中国政府承担若干义务”，这就是(逐字照引)：“在满洲从军事方面 440
对中国政府加以一系列限制，对于允许外国代表问题同样提出限制条件，要求使俄国对满洲的关税系统具有重大影响，而且尽可能使俄国臣民享有在该地区经营铁路和其他工业企业的优先权。”

当然，维特是绝对正确的，这样解决问题是“最符合俄国政府迄今为止对满洲奉行的政策的”。本书读者无疑会很容易从这些“义务”中认出满洲纲领中的基本各点，维特从义和团暴动以来就以此纲领作为其对华政策的目标。但简直不能令人相信，维特下述说法是经过认真考虑的：这样解决问题现在也“未必会在与中国政府的关系中引起麻烦，中国政府很可能不经特别争议就同意承担上述义务”，“这也不会引起同其他大国的严重纠葛”。维特其实是要用这些想法来论证下面主张：正如尼古拉所希望的，现在仍可能“充分保护我们在满洲的利益”。① 这里我们碰到的不单是一种花言巧语，实际上，维特认为可以在满洲问题上实行旧的“皇帝路线”，这一点从8月1日三人帮全体会议上作为正式决议向尼古拉提出的那些具体的实际步骤中即可看出。

三位大臣决定：(1)不合并满洲；(2)不认为“在满洲问题上仍能原原本本地遵循3月26日条约的含义”，主张“把必要数量的” 441

① 见第107号卷，第2部分，维特奏折的底稿，所署日子为1903年6月27日。

军队“部署在中东铁路路界”，并“继续占领”珲春；(3)在这样“履行”3月条约之前，“要求”中国遵守五项“实质性的条件”，因为“我们在路界内和关东省拥有相当的兵力”，“我们认为对保护我们的权利和利益必需的东西，便可坚决地、不容变更地向中国宣布”；(4)作为对上述条件的“交换”条件，向中国宣布，俄国“将立即”从盛京省“撤出驻防军”，“在四个月之内”从吉林省部分地区“撤军”，“在一年之内”从吉林省其他地区和黑龙江省全境“撤军”。① 用8月1日会议记录的话说，如果对俄方来说，“问题的实质”“不在于我们究竟对中国提出些什么”，而在于，“倘若中国人企图反对我们的某些要求”，“我们也能采取适当措施达到自己的目的”；那末对中方来说，事情的实质也就不在于，由于阿列克谢耶夫的压力，对中国人提出的要求与上述三大臣拟定的五项要求不完全相同，而在于，中国人比春天时更勇敢了，他们现在在日本的“怂恿”下可以拒绝俄国的要求。现在快到秋季了，据悉日本“国内的两项主要财源丝和大米，今年可获久未有过的大丰收”。② 日本人“非常”明白，
442 “每延迟一天，甚至一个小时，都会增加有利于俄国的机会”。③ 尽管8月1日三大臣确定的要求中那项对列强条约权利带有挑衅性质的要求尚未向中国提出，可是中国人仍重复了自己春季的答

① 见第107号卷，第2部分，1903年8月1日会议记录。五项条件是：(1)退还之领土不得让与外国人；(2)俄国沿松花江和阿穆尔河设立兵站；(3)在齐齐哈尔至布拉戈维申斯克一线设立兵站；(4)外国人不得经管中国北部事务；(5)保障中东铁路的商业利益。

② 加之每担丝的收入达到一千一百至一千一百五十日元，而平均价格只有每担九百至九百五十日元。见第79号卷，第2部分，俄国驻日本的财政代表拉斯波波夫1903年8月28日的报告。

③ 见同上，俄国驻日本海军武官鲁辛校官1903年8月20日报告的副本。从1903年4月到6月，在日本对“几乎全部陆军”进行了考查和教练动员。海军也是这样〔1903年6月5日(18日)的报告〕。1903年整个夏季，日本的武装力量一直处于“紧张的战备状态中”，“对即将发生的战争作如此认真的全面准备，是鲁辛驻日本整个期间未曾有过和未曾见过的事情”〔1903年8月8日(31日)的报告〕。

复。[1] 但即使没有这一情况，早在俄国提出要求和中国加以拒绝之前，"三大臣同盟"的命运也早已决定了，因此，8月1日会议的决定实际上成了三人帮的挽歌。

别佐勃拉佐夫在7月中旬和库罗帕特金同时回到彼得堡。他当然不会猜不到他作为御前大臣在旅顺口刚刚遭到的失败是同彼得堡尼古拉那里发生的事情直接有关的。正如阿巴扎早在6月11日急忙通知他的那样，在这里（彼得堡）"最后"通过了"允许日本完全占有朝鲜的决议"。而在那里（旅顺口）别佐勃拉佐夫逐渐形成的"鸭绿江上的战略屏障"的狂妄念头遭到了一致的否决，并同样 443
一致要求把森林企业降级为商业企业。由于所有这一切，似乎刚刚在彼得堡和大臣们"商妥"的别佐勃拉佐夫不难感到，这仍然是那个该死的"三大臣同盟首脑"的阴谋。如果不把5月间提出的改革进行到底，不把仍在尼古拉周围活动的"各部门"的影响铲除干净，新方针是绝无保障的，事业可能"被断送"，至少是"不受重视"。[2] 不然现在别佐勃拉佐夫不会把"各部门"当作"敌人营垒"看待，并赶忙向尼古拉揭露这种狡猾的手段。三人帮竭力通过这种手段来颠覆"新方针"，造成一种"不健康的公务气氛"，这种气氛甚

① 见《日俄战争的序幕》，第346页；《蓝皮书》（中国，1904年，第2册），第147—151和156各号；库罗帕特金：《日记》，第52和54页；第107号卷，第2部分，阿列克谢耶夫1903年8月23日（9月5日）发自旅顺口的电报。尼古拉想知道阿列克谢耶夫对8月1日大臣会议决议的意见。阿列克谢耶夫对修改旅顺口会议通过的保证条件表示抗议。结果直拖到8月24日（9月6日）才向中国提出要求（共有五点）。在8月1日会议通过的要求中保留了前三点，第二点和第三点合为一项。关于不许外国人经管中国北部事务的第四点被删去。补充了两项实质上无关紧要的要求，即要中国军队保护华俄道胜银行分行和一名俄国医生加入营口的卫生委员会。一切都是在与外国的不断联系中进行的：中国人立即把俄国的要求通知了日本和英国。而日、英两国发现这些要求与门户开放原则相抵触，就建议中国加以拒绝。

② 见阿巴扎1903年6月11日发往旅顺口给别佐勃拉佐夫的电报，载《红皮书》（远东特别委员会办公厅"根据手稿权"出版的书，题为：《远东特别委员会办公厅所存1903—1904年对日谈判文件汇编》），第1集。并见别佐勃拉佐夫1903年8月2日和4日给尼古拉的信，载《日俄战争史料集》，第156页及以下各页。

至把新方针寄予主要希望的阿列克谢耶夫将军都弄得莫名其妙。不妨提一下，直到最后时刻他都"不相信他要当总督了"。① 俄历7月30日，尼古拉签署了一道成立远东总督府的上谕，它"不受""各部门管辖"，"与邻国的""外交往来"集中由总督"经管"。与此同时，尼古拉又终于就维特其人向别佐勃拉佐夫发布了一项"指示"，"认为他只是个昙花一现的活动家"，这一点是别佐勃拉佐夫盼望已久的。② 正是在7月的这些日子里，爆发了空前规模的罢工狂潮，它席卷了俄罗斯整个南部。在这种情况下，给维特"定的""三
444 条罪名"(说他"揽权过多"，在远东执行了"错误的"政策，最后一点，他是"赤色分子")按通常引爆的方法是很容易"发生爆炸"的。

为了防止发生爆炸，维特只好最后决定"何去何从了"，这就是同别佐勃拉佐夫"联合起来"，并"真诚地同驾一辕"。但维特"在公务上看风使舵的本领"是有限的。这次问题不在于要恭恭敬敬地说"皈依异教"，③ 承认"屏障"和"好好地看待鸭绿江上的企业"，亦即不拒绝再一次从国库中拨款，而在于要他亲手参加摧毁他自己的"在满洲的特别国家"。别佐勃拉佐夫通过成立总督府，把远东的外交联系和防务交与阿列克谢耶夫"负责"。紧接着，他又准备制订他"有条有理的总计划"，"扎扎实实地安排业务"，以便"联合""国营的工商企业"和"尽可能正确地吸引""我国有进取心的私人企业家和外国人来参加"。这一计划应在远东开创一个获取巨额盈利的新时代，以代替"财政大臣事业中的现行体制"，在这种体制下"任何有进取心的私人企业家要认真地从事工作都是不可能

① 见别佐勃拉佐夫1903年7—8月给尼古拉的信，载《日俄战争史料集》，第14—17号文件；别佐勃拉佐夫责备大臣们，说他们"按各自的想法炮制真理"，实际上把事情弄成这样：一旦发生战争，"就要丢掉整个南满，而在北满的泰加森林地带占领阵地"，他们想把朝鲜让给日本，实际上是让日本把朝鲜变为"在大陆上反俄行动的可靠据点"，以便"逐渐把我们从满洲挤出去"。

② 见《日俄战争史料集》，第16号文件，别佐勃拉佐夫1903年8月2日的信。

③ 原文为"filioque"。——译者

的。①

正如我们看到的，新旧经济方针之间不存在什么原则性的区 445
别。但对维特来说，这是可以摆脱正在沉没的船只的最后时刻了。7月30日(8月12日)，日本建议俄国承认并赞助在满洲"所有国家工商业利益均等的原则"。它在谈判的全过程中，坚持要求俄国完全承认列强在满洲的条约权利。正如大家正确指出的，尽管尼古拉在最后时刻同意接受日本对满洲要求的基本提法，日本还是使谈判破裂了。② 大家知道，维特曾劝尼古拉除朝鲜铁路与中东铁路和山海关—牛庄铁路相衔接这一点外，接受日本第一次7月提案的条件。③ 维特以此放弃了他的垄断政策和俄国资本在满洲的优越地位，实际上是同意外国人"大量涌入"满洲，这一次他是公开置身于新方针之外的。如果维特此时不作出这种选择，实际上他只能拥护别佐勃拉佐夫"朋党"，如同库罗帕特金和拉姆斯多尔弗那样，与"朋党"，亦即尼古拉政府的全体人员一起对这次战争承担正式的责任。

---

① 见库罗帕特金：《日记》，载《红档》杂志，第2卷，第60页；别佐勃拉佐夫早在8月2日已得到一种印象：维特不知道"何去何从"了（《日俄战争史料集》，第16号文件）。但他"非常清楚，维特永远不会真诚地和他同驾一辕"（同上，第17号文件）。早在8月12日，"外交界"就认为"维特已经和别佐勃拉佐夫联合起来了"（库罗帕特金：《日记》，第54页）。"别佐勃拉佐夫在维特去职之后，立即到维特那儿，并指责维特不愿意同他合作，因而垮了台"（同上，第81页）。"好好地看待鸭绿江上的企业"，这是别佐勃拉佐夫的公式（同上，第44页）。在"势力落入"别佐勃拉佐夫这一帮"坏蛋手中"后，普列维曾对库罗帕特金解释说，"一切问题都在于想在满洲建立一个特别的国家（当然是维特的特别国家）"（库罗帕特金：《日记》，第83页）。关于别佐勃拉佐夫的"有条有理的计划"，见《日俄战争史料集》，第17号文件和第14号文件第3部分。

② 见波克罗夫斯基：《日俄战争》，第604页。

③ 见《日俄战争的序幕》，第343页；库罗帕特金：《日记》，第98页；维特甚至在离职之后还希望"与日本人和平解决问题"，他相信，"我们将夹起尾巴，还要作出让步"。

VI

尼古拉终于在8月16日和维特分道扬镳了。看来，这决不是那样轻而易举的事情。尼古拉正是在了结了这件迁延日久的事情之后，8月19日，坦率地向库罗帕特金承认说，“当他在从自己听到的一切情况中选择他所需要的东西时，他深感苦恼”，“他不得不紧张地施展自己的全部才智”，并用库罗帕特金意想不到的形象解
446 释说，“他想，要是把这种精神上的力量用到一匹马身上，那马是要十分惊慌的”。① 尼古拉在心理上已经达到某种极点了：“对大臣们的某种根本上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是没有特别用意的）使他感到烦恼。在建立总督府的上谕发布以后，库罗帕特金于8月间请求辞职，并表示希望说，沙皇在他“不任大臣”期间对他的“信任”“只会加强”。这时尼古拉就回答说：“您知道，不管这是多么奇怪的事，可是心理上可能真是这样。”② 维特在这方面的情况是最糟的：他的确“揽权过多”，正如当时大家所说的那样，“使专制政体本身失去了它的特征”。

尼古拉在和维特分手时，并没有对他隐瞒关于分散权力的想法，他当时就说到了“要分散财政部的权力”。③ 然而尼古拉不仅同维特一个人谈过，那时他还和库罗帕特金说：“是否应该把陆军部”“分为两部分”？④ 尼古拉成立了远东总督府，它隶属于远东特别委员会，而沙皇是该委员会的主席。这样，尼古拉无疑转弯抹角地，在局部和有限的范围内满足了他自己的愿望——恢复“专制政体本来”的面貌。似乎现在内部的敌人已经彻底击败了，大臣之间反对新方针的“协议”也已“不复存在”。但是，这一切丝毫不能廓清

① 见库罗帕特金：《日记》，载《红档》杂志，第2卷，第58—59页。
② 见同上，第49页，8月4日所记。
③ 见同上，第60和55页。
④ 见同上第57页。

专制政体的视野，也很少改变新方针卫道者的处境。① 由于这个原因，“马”无论如何是不得安宁的，而俄国外交船只仍在搁浅着，不但丝毫动弹不得，而且在沙滩中越陷越深。

现在，除了在9月20日“中止”同中国有关保证条件的谈判，447
以及企图在对日谈判中通过外交途径来维护“俄国在满洲的绝对势力”之外，新方针是一筹莫展了（俄国对日本俄历7月30日提案的答复，已于俄历9月22日交给了小村）。② 这就意味着，俄国不顾3月条约规定的最后限期，在1903年9月26日以后仍要继续占领满洲。既然俄国的9月答复要求日本“承认”满洲“在各方面都不是（日本的）利益范围”，于是旅顺口的地方长官现在就不能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若日本把武装力量派到朝鲜北部，需要采取哪些军事措施？③ 阿列克谢耶夫在他6月的罪过之后，在委派他任远东总督以后，终于承认“别佐勃拉佐夫的林木企业”“理应大加庇护，有赖这种庇护它才有今天这样的发展”。④ 现在别佐勃拉佐夫的林木企业首先落入炮火射程之内了。对于阿列克谢耶夫这时直 448
接提出的如何阻止日军在鸭绿江附近的朝鲜沿岸上述各地登陆这

① 见库罗帕特金：《日记》，第60页。

② 见《红皮书》，第6、7、8号：阿列克谢耶夫1903年9月12、15和20日给尼古拉的电报；日本《白皮书》，第17号：小村在1903年9月22日（10月5日）给栗野的电报。尼古拉在9月20日准许停止同中国的谈判，这一“突然”破裂是“总督的一个巧妙的步骤。总督生怕中国人在最后时刻会同意我们的要求，因为这些要求对中国人太有利了，可以说，几乎把我们比其他外国人优先的地位都化为乌有了”〔见巴拉绍夫1903年11月12日给尼古拉的奏疏，载《内务大臣案卷》，第119/3号卷《关于远东》；该案卷曾于1904年7月29日夹在一捆“普列维书简”（与杜尔诺沃关系）中寄到远东特别委员会办公厅〕。巴拉绍夫认为阿列克谢耶夫担心外国人（“盟军”）会向中国提出类似的劝告。其实他们提出的当然是与此完全相反的劝告。

③ 见同上。阿列克谢耶夫在9月20日的电报中建议，要是日本“哪怕有一队人”在朝鲜湾沿岸登陆，就向日本政府提出警告，如继续登陆，“将导致我们同样采取军事措施”。这些措施是：“如在济物浦、镇南浦或鸭绿江口登陆，第一步，俄国公开在海上以武力阻止登陆，第二步，立即动员关东省驻军和满洲驻军。”

④ 见第107号卷，第2部分，阿列克谢耶夫1903年8月23日（9月5日）的电报，该电反对8月1日大臣会议的决议。

一问题，他竟从尼古拉那里收到了一个仓卒的答复（不是阿巴扎或别佐勃拉佐夫起草的，而是拉姆斯多尔弗起草的），坚决责成阿列克谢耶夫"采取措施避免战争"。① 不难设想，阿列克谢耶夫在得到这一答复时是何其沮丧！但是，直到最后都不知道哪些是避免战争的措施，同样愈来愈不清楚的是，若不是为公开合并满洲，"我们在满洲究竟想做什么？"② 当日本在 12 月 8 日坚决重申，它希望"把两国利益在远东相接触的一切地方（即除朝鲜外，还有满洲）都包括在协定之中"时，尼古拉在 12 月 15 日的会议上终于同意把"有关满洲这一条""列入"协定之中。于是从来不耍滑头，而又少言寡语的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大公就表示同意作此让步，以便"达成协议"。他直言不讳地说，"我们在满洲问题上扮演了狗占马槽的角色，自己不用，又不让别人用"。③

与此同时，正是在战争爆发之前的这几个月中，新方针在设法解决这样一个问题：怎样才能实际扭转满洲事态，"把它交给别
449 人"，而自己却能从工业垄断权中享受到某种创办人的利润。别佐勃拉佐夫"朋党"在他们私人经济实验的废墟上，不仅没有放弃经济上征服"远东的异国地区"的想法，而且摆脱了"过去活动家的""过时的活动办法"，凭借"一致同意的远东事务经济纲领"，"使业

① 见库罗帕特金：《日记》，第 78 和 80 页，以及《红皮书》，第 9 号文件，阿列克谢耶夫俄历 1903 年 9 月 25 日给尼古拉的电报，阿列克谢耶夫反对尼古拉的意见，认为"与中国完全达成协议""是不可能的，这已为今年春季以及最近同中国进行的谈判结果所证明"，"应当承认，要恢复中国人对我们的信任是完全办不到的，即使我们放弃付出如此重大牺牲而在满洲获得的一切也不可能"。

② 拉姆斯多尔弗在 1903 年 12 月 15 日向尼古拉问及此事（见库罗帕特金《日记》，第 95 页）。宫廷侍卫长格谢也向阿巴扎提出了这个问题，"但是他从阿巴扎长长的答复中，什么也没弄明白"（同上，第 93 页）。与别佐勃拉佐夫派关系最密切的普列维对库罗帕特金承认，他"不知道我们何去何从"（同上，第 83 页）。宾肯多尔弗对兰斯多恩所提的类似问题只能"避不作答"，就更不必说了（同上，第 102 页）。

③ 见日本《白皮书》，第 35 号文件，小村公历 12 月 21 日给栗野的电报；库罗帕特金：《日记》，第 94、95 页。

务摆脱了国营经济，摆脱最终落得巨额赤字的绝境”，“在劳动与资本个体化”情况下，走上了“普遍的经济繁荣”之路。① 在这一切后面，是合并满洲的念头。但是，别佐勃拉佐夫派在此问题上的绊脚石正是尼古拉本人及其“循序渐进的办法”。

很清楚，在维特离职以后，满洲矿业公司面临着倒闭的威胁。早在维特离职前，别佐勃拉佐夫就突然提出，要求“占有”抚顺煤矿的“最好地段”，维特在这位“半疯癫”的御前大臣面前看风使舵，不得不同意把满洲矿业公司租让企业中这一最有希望的企业转让给别佐勃拉佐夫。这次转让之所以没有办成，全系别佐勃拉佐夫的过错。② 从一开始就受到别佐勃拉佐夫的言谈、计划和各种“办法”攻击的普列斯克本人承认，他“命中注定是继维特之后的又一个灰溜溜的大臣”，他惧怕“严重的后果”，惧怕“我们（在维特在任时）从事的各种事情”“进展过快”，因而打算“中止这一进程”。③ 上面 450
已经提到，此事的结果是，从 8 月 16 日起“停止向满洲矿业公司继续提供款项”，于是公司董事会就放弃了关于执行预定投资二百五十万的工作计划的各种想法。为了支付工资，从罗特什捷英的华俄道胜银行贷了款，公司这才又苟延了一些日子。而到 1904 年 1 月初，公司董事会就提出了解除各董事“所承担”的义务问题。④

如果以为现在该是别佐勃拉佐夫转让给俄国木材公司的那些企业兴旺发达的时候，那就错了。根本不是那么回事，缺乏资金这一同样的灾难同时向这个“租让权贮存所”逼近。在旅顺口就地管

① 见别佐勃拉佐夫 1903 年 10 月 14 日给尼古拉的信，载《日俄战争史料集》，第 160 页及以下各页。

② 见第 106 号卷，第 1 部分，（Б），满洲矿业公司董事会 1904 年 1 月 2 日给财政部负责人的报告，据工程师卡利斯特拉托夫的勘察材料，“抚顺煤矿的煤层深度达六十俄丈（一俄丈等于二点一三四米——译者），储藏量约为六亿七千五百万普特”，也就是说，若每年开采二千五百万普特，可采二十五年。

③ 见库罗帕特金：《日记》，第 61 页。

④ 见前引满洲矿业公司董事会 1904 年 1 月 2 日的报告。

理该"贮存所"的巴拉绍夫也不想只限于得到已经拨给的二百万，仅发展林木事业这一项他就要求别佐勃拉佐夫"投下"六百万卢布。到1903年8月底，他完全明白了，"眼下经营这项业务不会有所收益"，为了"不危及1904年全年的业务"，现在必须"通过收买全部林木"使业务"成为垄断性的"，并要付出不少于三十万卢布的
451 定金。① 但是，我们知道，巴拉绍夫手中并不是只有林木事业，他还拥有抚顺东部的煤矿业，奉天的电业、教堂、学校和医院，以及辽河的航运业。加之正在这时，木材公司在朝鲜的要人金茨布尔格男爵又一次出场了，他建议收购法国原有的汉城到义州(在鸭绿江口)的铁路租让权。②

同时，到9月15日，巴拉绍夫在旅顺口一共只剩下五千卢布了。彼得堡并没有确定地答复巴拉绍夫，"何时"可以拨款"多少"，于是巴拉绍夫恳求"不管多少，赶快"寄些来，然而这也毫无结果。快到10月时，在当地银行界中盛传着"要停办"公司、"缩减开支"、裁减人员和变卖财产的谣言，说什么"决定放弃抚顺(不是强使我们这样做吗？)"、"正在寻求电业租让权的买主"，如此等等。③ 到

---

① 见远东特别委员会办公厅档案第119/3号卷，巴拉绍夫1903年9月6日给别佐勃拉佐夫的电报。这一卷是由普列维管辖的内务部收存的。卷中还搜集了我们下面将要引用的两组最珍贵的信件复制件，即巴拉绍夫和别佐勃拉佐夫从1903年8月25日到10月10日的通信，以及沃加克和别佐勃拉佐夫在1903年10月18日到11月3日间的通信。没有迹象说明这两组译解电报的复制件是怎样落入普列维手中的。但我们知道，阿巴扎和别佐勃拉佐夫在1904年夏季交换的信件是受暗中检查的。警察部门从中作了摘录，并报给了普列维。我们已把这些摘录登在《红档》杂志第17卷中。有趣的是，警察部门公文中保存的这一组信件摘录到1904年7月17日那封信就截止了。在这封信中阿巴扎哀悼自己这位"盟友"的死亡。在这里命运的戏弄到了这种程度，以致我们的这两位通信者"害怕邮局"，因为"什么人都能看到"，并且"敌人"(即维特)也能逐渐知道，"有哪些反对他的活动"(如见阿巴扎1904年5月26日和6月10日的两封信)，因此他们就到普列维那儿寻找能保守秘密的寄信"方法"；

② 见同上，巴拉绍夫1903年9月3日给别佐勃拉佐夫的电报。

③ 见同上，巴拉绍夫1903年9月16、17日给别佐勃拉佐夫的电报；并见第120号卷，德米特里耶夫—马蒙诺夫1903年10月2日和10月26日从奉天寄往北京给璞科第的电报与信。

11 月初，该公司在旅顺口已“钱柜空空”，简直就靠借贷度日了，同时继续请求“多少”寄些钱来，以作今后补偿债务之用。① 11 月初到了封航期，公司仓库里还有价值七十万卢布的原木尚未售出，这些木料的“规格尺寸哪儿也不适用”。所以在 10 月 22 日当公司面临崩溃时到旅顺口来的沃加克本人也不完全相信巴拉绍夫所说的，这些木料毕竟“预售了”三十万卢布，这笔款子确实快收回了。② 木材公司确确实实面临着“倒闭”③ 的危险。别佐勃拉佐夫恳请“延续等待时机的状态”而不降低“事业的信誉”，但巴拉绍夫 452
做不到这一点。④ 关于鸭绿江上的森林企业“倒闭”一事，在彼得堡也议论开了。别佐勃拉佐夫在 11 月末已经“称病”，按惯例到瑞士休养去了。而巴拉绍夫仍旧身无分文地继续混下去。直到 12 月 19 日尼古拉才吩咐给他汇去二十万卢布，这笔钱仅仅够他偿还债务。⑤

对事业如此重要的问题迟迟不予解决，这完全不是由于别佐勃拉佐夫的恶意或疏忽大意。他在此问题上是爱莫能助的。巴拉绍夫在“自己多次提出拨款要求时”，“完全忘记了”，别佐勃拉佐夫“不掌握无须经过报销的款项，凡二百万以上的新拨款都需要经过适当的手续”，此外“还必须取得总督权威性的赞同，不然”尼古拉

---

① 见远东特别委员会办公厅档案第 119/3 号卷，巴拉绍夫 1903 年 11 月 6 日给别佐勃拉佐夫的电报。

② 见同上，巴拉绍夫 1903 年 11 月 10 日电报，以及沃加克 1903 年 10 月 18 日从满洲里车站寄给别佐勃拉佐夫的信。

③ 原文为“Eclipse”——译者。

④ 见同上，别佐勃拉佐夫 1903 年 8 月 26 日给巴拉绍夫的电报；并见第 120 号卷，德米特里耶夫—马蒙诺夫 10 月 26 日给璞科第的信。

⑤ 见库罗帕特金：《日记》，第 86 页，11 月 26、27 日所记；以及远东特别委员会办公厅第 44/47 号卷，巴拉绍夫 1903 年 12 月 14 日给别佐勃拉佐夫的电报，其中威胁说“要停止一切活动”；阿巴扎在电报上的批注称，尼古拉“谕令”财政部汇去二十万卢布。那里还有财政部负责人罗曼诺夫 12 月 12 日关于执行情况的一封信。

就不会“批准”“任何事情”。① 在这种条件下，别佐勃拉佐夫只有指望拨给他御前大臣办公厅的那二十万卢布了。② 他觉得，“尽管沙皇谕令说得相当明白”（别佐勃拉佐夫向沙皇奏陈拨款事项，尼古拉告诉他“已有谕令”），但“普列斯克却一再拖延”拨出这笔款
453 项。③其实这位胆小怕事的普列斯克未必敢如此公开地违抗“明明白白的谕令”，在别佐勃拉佐夫派的事业问题上尤其如此。认真想一下，拖延的原因还在尼古拉本人。④ 关于“严重的舞弊行为损害着商号信誉的情报”可能使尼古拉惴惴不安，况且把这些消息带到彼得堡来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人旺利亚尔利亚尔斯基。⑤

有一个时候，别佐勃拉佐夫在这些消息影响下，“鉴于林木业机构业务上的弱点和代理人的不可信”，甚至认为“必须暂时停办林木业”，“为避免偷盗”，必须处罚罪犯以示惩戒，并“对事业进行改组”。⑥ 从纯商业方面来看，别佐勃拉佐夫清楚地看到，巴拉绍夫是胜任不了的，他“弄不清楚为什么货物成本比售价还高”，“而商业上的经营不当，无疑应由专家（某个日瓦托夫斯基和斯基杰利斯基）负主要责任”。以谢德林式的英雄的口吻说话，要上述“专家们”承担“行政管理上的责任”（这是轻而又轻的了，因为他们两人都是犹太人）；不求助于检察机关，仅凭“个人信念”，“自己负责对于舞弊罪犯执行判决（这种情况在远东是从未有过的）”；“使那些骗子手感到死亡的恐惧”，“不惜”“把任何欺骗我（别佐勃拉佐夫）——

① 见远东特别委员会办公厅第 119/3 号卷，别佐勃拉佐夫 1903 年 9 月 9 日、18 日给巴拉绍夫的电报。

② 见同上，9 月 18 日、10 月 2 日、22 日和 30 日的电报。

③ 见同上，10 月 22 日和 30 日的电报。“官场手续耽误了寄款”。而尼古拉这几天恰好在德国，因此别佐勃拉佐夫只好等他回来再说。

④ 在沙皇仿佛谕令普列斯克的同时，又“命令”别佐勃拉佐夫要“先奏后行”。见远东特别委员会办公厅第 119/3 号卷，别佐勃拉佐夫 11 月 7 日给巴拉绍夫的电报。

⑤ 见同上，别佐勃拉佐夫 9 月 21 日给巴拉绍夫的电报。别佐勃拉佐夫在电报中要求巴拉绍夫提供“必须上奏沙皇的本年林木交易资料”。

⑥ 见同上，别佐勃拉佐夫 1903 年 11 月 11 日给巴拉绍夫的电报。

沙皇决策的执行者——的人碾成齑粉”——所有这些都是别佐勃拉佐夫所乐于干的，然而也都是荒诞无稽，于事无补的。①

别佐勃拉佐夫在10月初听到有关林木业“舞弊”的消息后，亲 454
自派沃加克到了当地。沃加克劝他：不要“执行判决和碾成齑粉”，不要“考虑那些老办法”，要把事情的商业方面和政治方面分开，“停止”彼得堡对林木业的“领导”，把它交给“一位完全独立自主的、敢于负责又内行的人”去办理。② 只有实行一个“充分的、十分完整的行动计划”，使得“(在远东)不再处于经常性的、不断增加的财政赤字，以及经济发展上走投无路的状况之中”，其他问题才能迎刃而解。③ 不久前还非常激动的别佐勃拉佐夫竟如此容易地心平气和了。别佐勃拉佐夫在10月底“制订好了”这一“行动计划”，并把它作为某种新发现，通过沃加克告诉了阿列克谢耶夫。这一计划“来自一种简单而又健康的想法”。但是，就在这时，别佐勃拉佐夫可能由于过度疲劳，智力完全陷入一种病态之中，胡言乱语，以致熟悉他的、情同手足的亲密伙伴和志同道合者，都决不愿“弄明白”他那啰哩啰嗦的密码电报中的“矛盾百出的设想”，而请他“停止”拍发这些电报。别佐勃拉佐夫有他“独特的文风，惯用一些不常用的词汇来表达最普通的想法”，这不仅使巴拉绍夫和阿列克谢耶夫“摸不着头脑”，而且连比谁都熟悉别佐勃拉佐夫“文风”的沃加克也同样“莫名其妙”。④ 难怪别佐勃拉佐夫在这次电告他的 455

① 见远东特别委员会办公厅第119/3号卷，别佐勃拉佐夫1903年10月25日给沃加克的电报。

② 见同上，沃加克1903年10月27日给别佐勃拉佐夫的电报。

③ 见远东特别委员会办公厅119/3号卷，别佐勃拉佐夫1903年10月29日给沃加克的电报。参见他10月22日的电报。

④ 见同上，别佐勃拉佐夫10月29日给沃加克的电报和沃加克10月27日给别佐勃拉佐夫的电报，参见沃加克10月24日给别佐勃拉佐夫的信。沃加克在信中埋怨说，“整天”坐在那儿译别佐勃拉佐夫的电报。沃加克在10月18日的信中说，他希望他这封信“在国外”交到别佐勃拉佐夫手中，“您务必要休息一下，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

计划时，要沃加克“好好考虑一下”，若有“不明白之处”，“立即询问清楚”。①

然而，这回的计划却如此简单明了，因而无须再问了。“在俄国政府尚未确信其合法利益将取得充分保障前”，在不合并满洲的情况下，拟把“满洲的占领期和与此有关的对这一地区的军事管理体制”延续下去。“为了协调我们和他国人（在满洲）的利益”“在经济基础上”“正在建立一个专门的俄国公司，这个公司本身将不从事业务，但将拥有一切必要的手段成立许多活跃的分公司，外国的劳动与资本将在这些分公司里为自己找到广阔的活动场所，并得到保护”。“该公司将由那些经过精心遴选、对皇上本人直接负责的人员组成”，“公司将通过获得中东铁路的股票，并通过满洲矿业公司和木材公司的转让而取得租让权”，华俄道胜银行“要成为”该公司的“工业银行和发行银行”。俄国政府应“承认中东铁路在满洲拥有租让权的专属权”，应“力求（从中国）取得租让权的垄断权”（或“剥夺中国出让租让权的自由”）。最后这一点怎能行得通呢？但是，正象维特在最后时刻干过的那样，别佐勃拉佐夫在这一点上同样轻而易举地、奇迹般地迈过去了。别佐勃拉佐夫和维特在1903年6月27日奏折中的看法完全一致，他直截了当地断言，“有充分根据认为外国人将乐于容忍俄国在满洲垄断租让权”，到
456 那时“中国政府就不得不服从我们的不可变更的决定了”②。

有一个征象说明，别佐勃拉佐夫头脑中的这项计划，是同“我们整个帝国的新财政经济纲领的主要原则（即力求缩小国营经济）”相联系的。这个原则是沙皇“对财政部负责人预先指出的，它

① 见前引别佐勃拉佐夫1903年10月29日的电报。

② 见远东特别委员会办公厅119/3号卷，别佐勃拉佐夫1903年10月30日给沃加克的电报，并见第134号卷，御前大臣别佐勃拉佐夫1903年11月11日奏疏的摘抄。参见本书边码第440页。

同样适用于远东。[1] 无论怎样，别佐勃拉佐夫觉得，“普列斯克已开始明白，财政部无法通过国营经济建立实际的收益项目”；为了完全取得成功，别佐勃拉佐夫必须让阿列克谢耶夫也在现在“相当明白地”表示这一意思（赞成“必须采取根本措施”）。显然，尼古拉仍然固执地坚持，“不通过”总督，不能解决任何问题。[2]

沃加克这次旅顺口之行使命的奥妙之处就在于，不使阿列克谢耶夫“发觉”“打算教给他些什么”，而“要驱使他自己”向沃加克“提出那些需要提出的问题，以便（让沃加克）向他说出必须转告给他和向他解释的事情”。当沃加克好不容易这样作的时候，他发现阿列克谢耶夫虽然“承认”经济问题“无疑是重要的”，但他忽而“借口自己是个外行，回避讨论经济问题”，忽而又说，“在满洲问题尚未从整体上彻底解决之时”，要解决任何经济问题都“为时过早”。[3] 沃加克“觉得”阿列克谢耶夫的“情绪”总的说来是“很坚定的，不象会让步”。“毫无疑义”，他“坚持主张必须把包括营口在内 457
的整个满洲控制在我们手中”。但就是在政治问题上，阿列克谢耶夫也认为，“当我们在满洲的地位尚未最后明确之时，一切断然的措施都是不合时宜的”。[4]

不管沃加克怎样对他保证，说，“他可以指望”普列维、别佐勃拉佐夫和阿巴扎“最诚挚的帮助”，但阿列克谢耶夫始终坚持说，“他十分困难”，他“没有精力”。十分明显，阿列克谢耶夫不可能知道，尼古拉实际上到底要干什么，而别佐勃拉佐夫这一派对他的种种恳求使他感到，他们的基础不是那么十分坚固的。有一次阿列

---

① 见前引别佐勃拉佐夫 11 月 11 日的奏疏。

② 见远东特别委员会办公厅第 119/3 号卷，别佐勃拉佐夫 1903 年 10 月 22 日给沃加克的电报。

③ 见同上，沃加克 10 月 24 日和 28 日给别佐勃拉佐夫的信及电报。

④ 见同上，沃加克 1903 年 10 月 22 日和 23 日给别佐勃拉佐夫的信，以及 10 月 27 日给他的电报。

克谢耶夫直截了当地对沃加克说，“接到(尼古拉)上谕:望避免引起中国人对我们的经常性的敌视”,因而他就“更难”解决满洲问题了。[①] 他在 5 月份收到的关于“保护俄国人在满洲的利益”的上谕，要他警惕,勿使“允许外国人进入满洲的门户开得过大”。[②] 而在别佐勃拉佐夫的计划中，他感到恰恰存在着这种危险性。虽然另一方面，这个计划至少在口头上趋向于缩减“国库对远东企业的支出”。在这一点上，它和阿列克谢耶夫早在 6 月会议上所声明的，并且现在还继续坚持的，关于今后这类支出“是不可取的”这种意见是完全一致的。[③]

现在不管沃加克如何竭力“劝”他“相信”，这个计划的“原则”是“沙皇本人亲自拟定的”，阿列克谢耶夫就是不相信这一点。他坚持说,“无须采取任何措施,尤其不要从国库拨款给那些企业,必
458 须让华俄道胜银行照旧营业”。他如此固执己见,经过两三次强烈的劝说以后,“但愿他成为新经济纲领的拥护者的希望”破灭了,此后沃加克只好处于“沉默观望的状态”,“只是回答提出的问题”。[④] 尼古拉采纳“新经济纲领”一事在一段时间里就这样销声匿迹了。原来,弄走一个维特,还不足以使占据新的远东特别委员会的别佐勃拉佐夫派立即把他们的“政治经济”“思想”变为政府的纲领。正如阿列克谢耶夫指出的，在这条道路上确实首先有一个问题，即“用哪种更为牢固的形式来占领”满洲。

不言而喻，别佐勃拉佐夫派在这方面直接对阿列克谢耶夫施加的任何压力都不会收到效果,必须“从圣彼得堡”,亦即由尼古拉

---

① 见远东特别委员会办公厅第 119/3 号卷，沃加克 10 月 22 日的信和 10 月 28 日的电报。

② 见同上,沃加克 10 月 28 日的电报。参见本书边码第 409 和 430 页。

③ 见同上,沃加克 10 月 28 日的电报。

④ 见同上，沃加克 10 月 31 日、11 月 1 日和 3 日的电报，以及别佐勃拉佐夫 1903 年 11 月 1 日和 3 日的电报。

本人“对他下一道绝对命令”才行。[①] 阿列克谢耶夫认为自己只被迫作过一件事，就是向彼得堡承担俄军两次占领奉天的责任，这两次行动都是违反阿列克谢耶夫的命令，由军务委员克维增斯基作主的。[②] 虽然巴拉绍夫和别佐勃拉佐夫认为，为了他们“林木企业”的成功，把鸭绿江满洲一岸的“专属租让权”交给木材公司是十分 459
必要的，但是，在“满洲问题”悬而未决的情况下，他们又不可能郑重其事地要求阿列克谢耶夫“行使自己的权力，下达命令”把这种“专属租让权”交给木材公司。当巴拉绍夫确信别佐勃拉佐夫无力挽救林木企业的倒闭时，他就在11月 12 日从旅顺口向尼古拉提出了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案，此方案所指望的，正是要使林业在满洲当地有一个稳固的财政基础。别佐勃拉佐夫派的企业是巴拉绍夫直接领导的。如不采取紧急措施，在不久的将来，他个人必将和企业一起垮台，因此他要求坚决地、刻不容缓地采取如下行动：(1)公开合并满洲和蒙古；(2)撤销所有中国的地方行政机构，以俄国行政机构代替之，并直属总督管辖；(3)对“低级官职的任免”实行“选举制”，并施行连环保，“一切抢劫、偷盗”皆由中国居民负责；(4)实行两卢布人头税制度(总计约四千万卢布)，作为行政费用；(5)“总督下令”把鸭绿江一岸的森林垄断权交给木材公司；(6)总督同时下

---

① 见远东特别委员会办公厅第 119/3 号卷，巴拉绍夫 1903 年 10 月 19 日给别佐勃拉佐夫的电报。

② 见第 120 号卷，德米特里耶夫—马蒙诺夫 1903 年 10 月 26 日给璞科第的信，他“用极好的材料”详细叙述了占领奉天的情形。信中说：“总督大发雷霆，但是为了‘挽回俄国官员的面子’(确实如此)，他向彼得堡报告说，一切都是按他的命令办的。”沃加克恰好在发生此事的那几天里来到旅顺口。他考虑到要“使阿列克谢耶夫放心”，就先问别佐勃拉佐夫，彼得堡对占领奉天一事的印象如何。而别佐勃拉佐夫却突然在他一贯冗长的电报中回答说，他赞成这次事件，至于尼古拉的态度，他只字未提。见远东特别委员会办公厅档案第 119/3 号卷，沃加克 10 月 24 日的电报和别佐勃拉佐夫的回电以及沃加克 10 月 24 日的信，他在信中指责别佐勃拉佐夫没有提及尼古拉对事件的态度。

令将满洲的食盐专卖权给与木材公司，每年可收入三百万卢布。①

在这个狡猾的方案中，巴拉绍夫指望剥夺中国政府的收入来作为对公司的拨款，然而一开始他还不得不要求直接从国库拨出一百万卢布的津贴费，来设置专卖事业本身的行政机构。这就立即把整个方案变成了象当年别佐勃拉佐夫那样的令人可疑的吹嘘了。别佐勃拉佐夫曾大肆吹嘘，他 1903 年春季贸然着手开办的鸭绿江上的林木业将带来神话般的巨额收入，但当时拨给别佐勃拉
460 佐夫的二百万卢布的官币却付诸东流了。② 而且 12 月中旬送到尼古拉那里的巴拉绍夫方案所表现出的政治上的"勇敢"也完全不是时候。因为日本在巴拉绍夫之前就对"满洲条款"提出了坚决的要求，尼古拉也已于 12 月 15 日在这一点上对日本作了让步，因此尼古拉只好把这份合并满洲的诱人方案束之高阁了。③

这并不意味着别佐勃拉佐夫派不善于迎合他们的"主子"，而只是说明，战争堵死了尼古拉的"循序渐进"的道路。

尽管阿列克谢耶夫拒绝支持"新经济纲领"，而别佐勃拉佐夫本人在 11 月底又"称病"匆忙出了国，撇下身无分文的巴拉绍夫，他甚至没有把自己出国的事告诉巴拉绍夫，然而，到 1904 年 1 月，就在战争前夕，尼古拉本人重又提出要讨论经济纲领问题。④ 于是

① 见第 120 号卷，巴拉绍夫 1903 年 11 月 12 日奏疏副本。此奏疏写于旅顺口，如当时立即寄出，则至少要经过一个月，即在 12 月中旬才能送到彼得堡。

② 见第 107 号卷，第 2 部分，普罗塔西耶夫 1903 年 7 月 15 日发自旅顺口的电报，内称，中央政府不仅不能从吉林和黑龙江两省得到收入，反而每年要贴补每省三十万两。

③ 栗野于 12 月 10 日(23 日)口头照会拉姆斯多尔弗，要求"把两个帝国的利益在远东相接触的一切地区（即满洲）纳入这项协定范围之内"。他还威胁说，"在目前情况下，我们若不签署一项协定，便可能出现严重困难，甚至引起纠纷"(见日本《白皮书》，第 35、36 号)。

④ 见库罗帕特金：《日记》，载《红档》杂志，第 2 卷，第 86 页；巴拉绍夫 1903 年 12 月 14 日的电报要求给予"坚决答复"："11 月份答应的二十万卢布"是否照寄？电报是寄给别佐勃拉佐夫的，但由于他不在，由阿巴扎向尼古拉转奏(见远东特别委员会办公厅档案，1903 年第 44、47 号卷)。

由伊格纳季耶夫伯爵(他是别佐勃拉佐夫派公司的成员之一)主持召开了一个会议，“以便为俄国在远东异国各地的财政、工业和经济企业应讨论和解决的问题编纂一个纲要”。但是，这次会议一开始就叫作“预备性的”，可想而知，这些问题应当由远东特别委员会 461
去“解决”，因为当时已经研究制定了总督府的全部“章程”。① 从1月13日到2月10日共开了六次会，这些会上平平淡淡地逐条议论了别佐勃拉佐夫派计划的各点，由旺利亚尔利亚尔斯基叙述，他由于没有任何其他的“必要材料”，只是用问答的形式转述了计划的各点，于是会议决定，干脆请求“沙皇作进一步的指示”。② 2月27日，尼古拉让新任财政大臣科科夫佐夫也参加了会议，这时，对以前提出的各种问题向会议提供了详尽的实际材料，并作了说明，这一下“新经济纲领”就经受不住考验了。使别佐勃拉佐夫派出乎意料的是，“财政部”竟会“放弃原先切合实际的决定”，揭露了新纲领的新设想是虚构的，并提出了自己的、这次更适合新条件的纲领与之对抗。

“当着外国为殖民地宗主国的物质利益而寻找殖民地的时候，462
我们却把从本国居民身上搜集来的钱财用到殖民地上”，新经济派认为必须“终止”这一政策，必须“抛弃用官资建立工业企业的制

① 在财政部办公厅和远东特别委员会办公厅皆存有关于“预备会议等情况”的相同案卷。我们所用的是其中的第一个案卷，即第134号卷。远东管理的改革问题拖延下来了。战争爆发前只颁发了两道“上谕”：7月30日关于委任总督的上谕，以及9月30日关于成立远东特别委员会的上谕。制定总督府“章程”一事曾让普列维任主席的特别委员会负责办理，此事却迁延日久。远东特别委员会委员的任命是逐步进行的；别佐勃拉佐夫是委员，阿巴扎是办公厅主任，马丘宁任副主任。在沙皇任主席的情况下，只好派普列维担任副主席了。其余两位委员尚未委派。根据所保存的特别委员会办公厅的档案材料可以判断，特别委员会从未开过一次会。

② 见第134号卷，旺利亚尔利亚尔斯基1904年1月17日的奏疏，题目叫“对问题纲要等项的说明”及“问题纲要等项”。参加会议的有：国务会议成员切列凡斯基、农业部副大臣什瓦涅巴赫和阿巴扎。旺利亚尔利亚尔斯基和马丘宁也“应邀”参加了前几次会议。

度”。显然，这就是新经济派的出发点。“东亚工业公司”理应“调动私人的主动性，并吸引私人资本参加工作”，但它“法律上①是私人公司”，“实际上②却是政府机构”。公司基于严格的垄断权（“中国政府或朝鲜政府不得撇开公司把任何一项租让权给与第三者”），应当“把那些在远东经营的所有半官方公司和官方公司的活动统一起来，制止相互之间的竞争”，“然后再把（企业）转让给私人”——俄国人，“如俄国人不愿承办”，则转让给外国人，条件是“把部分利润交给”“俄国国库”。因为现在公司准备“完全由总督监管”，而“公司股东会议”是应由远东特别委员会指定的，公司股票又由政府认购四分之三，其余四分之一由“沙皇允准的私人”认购，因此，旺利亚尔利亚尔斯基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东亚工业公司是一个政府机构和远东特别委员会的必要补充呢，还是一个虚假的私人公司？”③此外，他还提出了一系列其他问题，“要求在专家们的参与下详细研究”。

但是，在旺利亚尔利亚尔斯基提出的以上两种情况下都很清楚，这整个企图的“新设想”是些什么东西：对现存的、似应弃之不用的满洲国营经济系统财政大臣已无须过问，代替他的是总督，由总督在指定参加公司委员会的官员（享有“国家职务的一切权利”）的帮助下完成统一的职能，其中一部分官员可能是利害相关的事业参加者（维特在任时通常就是这样对待“假私人”企业的职
463 员的）。④

正象什瓦涅巴赫所说，在六次会上尽是些“道道地地的胡言乱语”。当科科夫佐夫在5月10日会上把前几次会上从未见过的

① 原文为 de jure。——译者

② 原文为 de facto。——译者

③ 见第134号卷，旺利亚尔利亚尔斯基1904年1月17日的奏疏。

④ 见《红档》杂志，第17卷，第74页，阿巴扎1904年5月30日的信：科科夫佐夫就是这样对阿巴扎说，他“非常清楚地知道公司对于那些想多挣薪俸的人的好处”。

"材料"拿出来之后，那些胡言乱语就烟消云散了。最使别佐勃拉佐夫派垂涎的两个企业，华俄道胜银行和中东铁路公司立刻落空了。银行是动不得的，甚至不能象旺利亚尔利亚尔斯基最初赞成的那样派一名东亚公司的代表参加银行董事会。这不仅因为"银行百分之五十的股票掌握在外国持有者手中"，"在银行中的外国投资已达二千八百万卢布"，而且还因为刚刚达成的军事贷款恰恰就是"通过华俄道胜银行巴黎分行经理"才得以签订的。① 至于中东铁路，鉴于它的政治意义，它"(实际上)仍应由国家管理"，而它的形式上的地位不经中国政府同意是不能改变的。此外，科科夫佐夫既坚决地批驳了有可能消除远东赤字的想法（因为那里的支出"并不是由当地的需要"，而是由"俄国全国"的需要所引起的），又批驳了这样一种指望：即在试图取得华俄道胜银行的尝试失败之后希望从中国为计划中的公司得到垄断权。当时根据别佐勃拉佐夫派的整个设想，可能受到"一切必须通过"公司这一条束缚的不是外国人，而只是俄国私人资本。然而主要的是："我们在莫斯 464
科，不必特别张罗，也没有特别困难就可以得到百分之二十四的贴现，或在纺织品销售中获得百分之二十四的利润时"，"我们在我们的工业家中是找不到愿意去远东发财的人的"。"因此"没有国家投资，"这种工商业公司未必能成立起来"。而且，"也不能再自我安慰，希望对该公司只要再投资一百五十万至二百万卢布就够了"，因为"单是矿山企业一项就将需要巨额款项"。②

科科夫佐夫反对这种"独特的企业性"公司，"为了鼓励俄国的个人、公司，以及工人会社"，他建议：(1)"把我们在远东的财政政策"建立在"减轻关税、运费、税收、信贷利息等项的"原则上；(2)

① 见第134号卷，什瓦涅巴赫1904年3月16日给科科夫佐夫的信，以及转寄来的头几次会议文件和5月10日会议记录(2)，科科夫佐夫在这次会上作了第一次发言。据1902年统计，对华俄道胜银行投资总额为三千一百八十九万卢布。

② 科科夫佐夫借口说，在满洲的"所有企业都以乞援于国库而告终"。

"取消成立公司的某些手续"；(3)① "改变不容忍外国人和犹太人的态度"。"垄断公司"的存在只会破坏这种政策。阿巴扎非常生气，这一次他十分孤立，但仍赤裸裸地坚持要求国库"必须参加"私人垄断公司。结果在5月24日的下一次会上，"一致主张将来一切工业企业不再作为国营经济事业，如满洲矿业公司、狩猎官巴拉绍夫照管的租让权，以及中东铁路公司的某些附属设施"(即航运事业，如同摩根托拉斯那样使航运与铁路联成一体，这曾使维特心向神往)。除阿巴扎之外，与会者自然都十分"坚决地"反对成立东亚公
465 司，会议"认为，这种方针无异于把用官资开办的伪装的经济事业继续下去"，会议声明说，"吸引外国资本(以便'调动私人的进取心')应成为俄国在远东的财政政策的任务"。而"冥顽不灵的"阿巴扎却作了最后一次决战，他仍然坚持要"在国库参加的总公司的保护之下，把所有的单个公司联合起来"，因为只有这样，"外国企业和资本""才无法在该地取得优势"。

于是，另一个更新的经济纲领就与这个"新经济纲领"对立起来了。当然，这两种纲领都是打算留待战后再去实行的。只有科科夫佐夫在当时坦率声明说，"看来"，暂时"只能从"战后我们仍保持满洲战前的状态② 这样一种"假设出发"。正在这个时候，阿巴扎"准备""把中国官吏赶出满洲，造成中国正式破坏中立的局面"，以便在战胜日本之后能更容易地把满洲从中国合并过来。③ 这一"准备"拖延下来了，但并没有白费力气。我们看到，尼古拉在辽阳战事之后，于9月间就着手实现这种主张了。这使人想到，现在(在5月)尼古拉并没有放弃自己"新经济纲领"的主张，要是没有

① 此处原文缺上引号。——译者

② 原文为 status quo。——译者

③ 见阿巴扎1904年6月1日的信，载《红档》杂志，第17卷，第75页。

它，即将（适时地）采取的政治行动——“驱逐”满洲地方当局就没有多少意义了。①

① 甚至当东亚公司的设想在伊格纳季耶夫会议上也遭到完全失败以后，阿巴扎仍然没有灰心丧气，他沾沾自喜地料想，伊格纳季耶夫怎样“将被撤职”，“并将对他说，事情已让普列维去办了”。阿巴扎对普列维“是放心的，一切都会正常地进行”。只在普列维被杀害以后，阿巴扎才惊恐万状，他“甚至”都不知道，“所有这些事应该交给谁去办”（见阿巴扎 1904 年 6 月 1 日和 7 月 17 日的信，以及为这些信加的前言，载《红档》杂志，第 17 卷，第 75 页、72 页）。

第七章

战争时期俄国的国际财政关系

(1904—1906年)

I

466 俄国国库在对日战争中共消耗了六十五亿五千三百八十万卢布。其中大半(三十九亿四千三百六十万卢布)是用来支付俄国在国内和国外市场上为补偿军费而筹集的借款的利息的。从1904—1909年，为此目的欠下了二十一亿七千六百一十万卢布的巨额债务。因此，不论靠"闲置资金"，还是靠预算收入所支出的战费数字就小得微不足道了，只有四亿三千四百一十万卢布。[①] 就以战争开始后头几个星期(1904年1、2月)来说，俄国政府最初拥有
467 的"闲置资金"总共为一亿五千七百万卢布，并拥有二亿卢布纸币发行权的准备金。[②] 既然战争的财源本身直接取决于国外市场的

① 见Г. Д. 捷明切耶夫：《关于国库在日俄战争中的支出情况》，彼得堡1917年版，第32—33页，在1903—1904年及1905年中《日俄战争战备和军事行动费用综合报表》，以及根据1906年统计《(1906—1907年)日俄战争和战后开支拨款数字报表》(均存于国库司档案)，所载的费用数字如下：1903年为一千零六十五万卢布(其中陆军部三百万，海军部七百六十五万)；1904年战前为九百万卢布(其中陆军部1903年12月31日为五百万，1904年1月23日二百万，海军部1904年1月23日二百万)。1904年战争开始以后费用为六亿五千七百一十九万一千零五卢布，1905年为九亿八千五百三十四万八千七百五十卢布，1906年为四亿一千五百五十八万六千七百八十八卢布，总共二十亿零七千七百七十七万六千五百四十三卢布。

② 见我在文件汇编《俄国财政与欧洲交易所(1904—1906年)》(中央档案馆出版社莫斯科1925年版)中登载的第40号文件。以下简称《俄国财政》。

"援助",而且必须服从于日常外交机构的工作,因此,进行战争的问题从一开始就具有浓厚的国际性质。

当俄国遇到战争时,它既没有一个能从形式上保障另一大国直接的军事援助的同盟,也没有可以实际上保证财政援助的同盟,从而明显地暴露出它还缺乏起码的准备。在进行了十九个月战争后,当外部的财源一旦断绝,战争即告结束。[①] 因此,几乎是在战争爆发后的最初日子里,"就放出了借款的空气",也就不足为怪的了。[②] 在研究战争对俄国战时外交以及与战争有关的外交工作的影响时,在研究 1904—1906 年战争和革命的形势下所形成的俄国国际关系时,就不能不透过这些问题的财政背景的三棱镜来加以考察。

战争临开始前,外国持券者手中就有四十亿卢布的俄国债券,其中法国人手中有三十多亿。[③] 这就使得俄国必须不惜任何代价也要在巴黎市场上维持俄国债券的行情,因为俄国信用的未来命运,以及最大限度地利用这种信用去进行战争的可能性多半决定于巴黎市场。把这一方面的指望完全寄托在政治同盟的效力上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因为在法国市场上的俄国债券并不存放在银行家的皮包里,而是分散在众多的、强有力的大大小小的持券者手 468
中。所以一旦发生恐慌,就会象是一股"真正的巨流",什么东西也阻挡不了,政治同盟也会被它冲刷得一干二净。[④] 在俄国财政系统中,国外公债是一种双倍的重负。它每年从国家经济的纯收益中榨取一亿八千万卢布,同时,外债还使国家整个财政机构面临着厄

① 战争开始时,俄国政府还少一名财政大臣。自从维特解职后,1903 年 8 月 16 日曾任命普列斯克为财政大臣,他于同年 11 月 22 日因病离职,后由财政副大臣 П. М. 罗曼诺夫临时署理部务,这种状况一直拖到 1904 年 2 月 5 日任命科科夫佐夫为财政大臣时为止。

② 见《俄国财政》,第 1 号和第 2 号。

③ 见同上,第 3 号(第 33—34 页)和第 43—44 号(第 127—128 页)。

④ 见同上,第 44 号。

运：整个体制会由于外国领土上遥远的冲击而崩溃。想直接防止那里的这种冲击是不可能的，能否防止取决于整个国际形势，而冲击的威胁愈是临近，要想影响国际形势也就愈加困难。① 当前俄国政府在这方面只有一种直接可行的（虽则是无力的）加以遏止的办法，即以每天报刊对法国持券者的影响来吸引他们。至于报刊，它只能接受金钱的论据，而警察的手段对它无论如何是无能为力的。俄国政府不得不顺从地顾及到这一点，有时高价收购彼得堡交易所的俄国债券，有计划地向臭名远扬的巴黎《勒诺里社》一次又一次地提供费用，以"讨好"巴黎的报纸编辑。② 科科夫佐夫有一次曾伤心地说："法国报刊接受贿买这种可悲的现象，使俄国政府在整个战争时期光是"宣传费用"就花去了二百万法郎。③

然而，不仅是一个巴黎市场能给俄国信用带来危害，在柏林市
469 场上这种危险同样在暗中等待着俄国的信用。由于历史上形成的、当时尚保留着的良好传统，"敌对的投机活动"不仅会使巴黎的俄国债券价格下跌，而且会降低柏林的卢布行市。因此，为要维持卢布的行市和支持这场赌博，就需在柏林交易所购买一定数量的卢布，这与购买债券和津贴报纸一样，都是国库维护俄国信用紧迫的开支项目，仅在战前六个月的危机时期（1903 年 8 月 16 日—1904 年2 月 10 日），此项业务就用去了四百万卢布。④

1904 年 3 月，科科夫佐夫刚一接任财政大臣，就向财政委员会提出了自己关于当前财政状况和鉴于军事行动所必需的若干措施的想法。那时不仅柏林市场上纸卢布的行市明显波动，而且从11月起通过定期收购卢布和开展债券交易业务的办法付出的行市保

① 见《俄国财政》，第 3 号，第 34 页。

② 对外国记者采取行政措施，这即使在俄国境内也是毫无效果的。见《俄国财政》，第 238 页。

③ 见同上，第 63 号，第 172 页。

④ 见《俄国财政》，第 3 号，第 10 页。

险赔偿金也提高了，从国家银行黄金储备九亿零五百万卢布的总额中动用了三亿三千万卢布，而债券价格则从1月23日(战争爆发前夕)的九五点二五猛跌至1月28日（日本舰队进攻旅顺口俄国舰队的第二天)的九〇点五。科科夫佐夫，其次是审查其提案的财政委员会首先考虑通货和信用的问题，就是很自然的事了。①

当时的问题是十分严重的，能否在维持纸币兑换黄金的条件下，不冒动用和耗费黄金储备的危险去进行战争呢？即不停止兑换能否应付过去？科科夫佐夫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不仅可能，而且必须这样。因为目前的经济状况，总的来说还不致使人担心，还 470
用不着采用这种非常的办法，反之，一旦停止兑换，就会导致“影响国家繁荣的最严重和最可悲的后果”。科科夫佐夫认为，“还”没有任何东西证明此种办法是正确的，他认为自己最重要的一项任务，就在于将来也要能不采取这种办法。同时，他特别强调，只有当冲突局限于俄日两国时，他的全部设想才会被采纳。

维特完全支持科科夫佐夫的意见，而且更进了一步。他在委员会中将问题不祥地作了最大的发挥，预言可能爆发世界大战。在局部战争的情况下，即使战争延续，战费达到十亿卢布（照库罗帕特金的说法，政界认为一年半的战争就得耗费七亿到八亿卢布），② 在那时我们的货币流通也“应该而且完全可能维持下去”。维特强调，“如果指的是全欧的大战，其费用就无法计算了”，即便那时“也必须仔细权衡由于停止维持通货面值所引起的后果”，虽然“在这样的战争中没有一个国家能维持通货面值”。照维特的意见，俄国之所以必须“维持通货面值”，除了别的原因，还由于“我国债务的特殊性”：这些债务大部分以金本位计算，“因为我们国内资

① 见《俄国财政》，第3号和第4号；并参见《红档》杂志，第2卷，第99和105页，库罗帕特金：《日记》。

② 见第120号卷，1903年3月26日会议记录中库罗帕特金的声明。

金短缺”，所以这些债务几乎全部分散于国外。维特已经注意到，“如果现在把金子锁在银行的金库中”，俄国到头来还得全部拿出来，“最后的结果可能较之维持兑换拿出的数目还要大些，而且会
471 对国家的繁荣带来不可估量的巨大震荡”。这是因为，黄金外债照旧能对财政系统施加压力。由于必须补偿我们在结算平衡方面的差额，黄金外债将迫使我们用经常贬值的纸卢布购买外币。“而由于信用的动摇”，黄金溢价本身将加速使我国外债变为内债。

总之，不要因为害怕失去黄金储备而停止兑换，相反，为了维护黄金储备要不惜任何代价维持黄金流通。这就是根据俄国财政系统的基本“特点”得出的结论。俄国财政系统和法国金融市场有着最密切的关系，在那些年代里，它没有独立地、与世隔绝地存在过。战争开始时，俄国远未做好战争准备，但是，尼古拉仍有信心胜利结束战争。他把战争作为拯救专制政体，使之免遭革命的结局的一种手段。同时尼古拉还批准了专家们关于维持兑换的一致建议，这项建议就他而言是无可争议的。这样，尼古拉通过巴黎交易所，最终使自己完全依从于法国政府的意愿，并将俄国拖入了正在飞速发展中的欧洲帝国主义的基本冲突之中。专制政体所遭到的灾难性的军事失败和来自国内的打击，从实质上改变了法俄同盟的力量对比，并迫使尼古拉于战后在一切争议问题上无论与英国，还是与日本都达成了协议。俄国通过某种途径，在协约国为应付全欧战争而进行的力量配备中占据了自己的地位，虽然俄国并不是那末痛痛快快地去占据这种地位，而是企图加以抵制。现在，我们已有可能把这种途径相当精确地勾划出来了。

II

1894—1895 年的中日战争就已勾划出了日本在亚洲大陆上
472 的那个领土规划，即攫取南满，并使朝鲜完全脱离中国而纳入日本

势力范围。日本于 1905 年达到了这一目的。1895 年日本的胜利有可能从根本上破坏俄国政府在太平洋沿岸与建设西伯利亚铁路有关的政治计划，它使俄、法、德三国在远东的联合得以实现。其时，俄国正在加紧建设西伯利亚干线，顺便提一下，它也想得到上述那些领土。法国同俄国缔结有政治和军事协定(1891—1892年)，这就使俄国可以完全不受约束地去实现它的宏伟计划。而德国刚刚(1894 年)与俄国在缔结贸易条约中言归于好，并寻求俄国对自己向中国领土渗透(尚不算晚)的支持。这一三国联合在结束了自己的事情，迫使日本离开满洲和朝鲜之后，不仅无论如何没有巩固下来，而且再也没有出现过一次。中日战争表明，当时从数量上已经足以与俄国的军队相抗衡的日本军队，无疑作好了战斗的准备。也是这次战争使英国发现了它在陆上反对俄国的天然同盟者。而俄国外交界从自己方面所作的一切，均有助于英日实际上达成正式的同盟。随后，列强于 1897—1898 年展开了对中国领土为所欲为的侵占，颇有将整个中国割裂成若干互相隔绝的势力范围的危险。这种侵占也把美国引到帝国主义争斗的舞台上来了，它宣布了不瓜分中国和"门户开放"的原则。

维特的政策不仅是诱使俄国直接吞并整个满洲，而且，对美国资本更为重要的是完全关闭满洲，不许外国工业企业家在那里活动，并限制外国贸易。由于当时美国主要是和维特的政策发生了矛盾，所以它在有关满洲问题的一切外交活动中很快就站到了英日同盟一边。在战争爆发前夕，它和日本在同一天(1903 年 10 月 8 日)与中国缔结了通商条约，排除了俄国在以后继续独占满洲和在任何方面侵占中国主权的可能性，从而完全与日本联合行动了。[①] 战争一开始，罗斯福立即警告德国和法国，如果德、法还试图 473

① 海约翰就该项通商条约的批准"突然"发表了一项声明，内称，"美国政府平心静气地，但确定无疑地维护中国在满洲的主权"(见《德国外交文件》第 19 卷，第 1 分册，第 32 页，第 5941 号，霍尔斯泰因 1904 年公历 1 月 15 日的便函)。

象 1895 年那样站在俄国方面，美国就要站出来保护日本。① 无疑，正如罗斯福自己所说，他对已经开始的战争的真正希望是，使战争"拖延下去"，"使两国尽可能地虚弱衰败"，"以求缔结和约时仍保持他们的领土对立"。因此，罗斯福对战争的外交方针是："美国的同情完全在日本一边"，没有可能认真接受俄国关于在满洲"开放门户"的保证。②

但是，不论俄国外交界如何希望在远东恢复 1895 年那样的三国同盟，这样做已经毫无可能。在这方面对法国是完全不能抱希望了。当时法国和英国的对立正在不断加深，而 1892 年的军事协
474 定所联结起来的法俄同盟，从政治上为法国提供了大胆在非洲从事冒险活动的可能性，同时，这一同盟还以俄国在远东的某种程度的经济扩张使英国在远东受到限制。使俄国向远东的进展具有一定规模的、刻板地局限于垄断资本主义形式的那些最主要的企业产生于法俄同盟初创年代。向从乌拉尔直至太平洋沿岸这一地区无比巨大的资本输出的特点恰恰在于：法国私人资本和俄国国家资本一起向西伯利亚东部和中国发展，或者由俄国国家机构加以保障，或者与早在俄国领土上经营业务的国际银行资本结成联盟。在这两种情况下，法国私人资本并未要求起领导作用，而是在开始阶段服从于专制政府的总的政治领导。

法国和美国资本都想直接向西伯利亚铁路和中东铁路投资，

---

① 见丹涅特：《罗斯福与日俄战争》，纽约 1925 年版，第 2 页，罗斯福 1905 年 7 月 24 日给斯普林—赖斯的信："战争一爆发，我即以最有礼貌和最慎重的方式照会德、法两国，如果俄、德、法三国再象 1894 年那样（原文如此）试图联合起来反对日本，我将立即站在日本一边，并将为了日本的需要而不惜任何努力。"（引号中原文系英文——译者）看来，就是尼古拉本人对美国也未抱幻想，他承认，美国也使他感到不安（见《红档》杂志，第 2 卷，第 93 页，库罗帕特金：《日记》，1903 年 12 月 8 日所记）。

② 见《德国外交文件》，第 19 卷，第 1 分册，第 5992 号，施佩克·冯·施特恩贝格 1904 年 3 月 8 日（21 日）发自华盛顿的电报；以及第 5978 号，他 1904 年 1 月 24 日（2 月 6 日）的电报。

但是俄国政府既不允许法国，也不同意美国这样做。看来，俄国政府相信，新的军事—政治同盟将大大便于利用法国金融市场向这些宏大的战略工程投资，以便绝对自由地执行帝国的国家预算。①至于俄国的对华贷款，那是在俄国政府担保下完全由巴黎银行团 475
在法国市场上筹集的。否则，光靠俄国自己的资金，俄国政府就不可能向清王朝提供这种政治上的帮助。说到华俄道胜银行，由于其章程包括了广泛的内容，而且俄国政府在董事会中又占有优势，所以该银行就成了俄国政府在世界帝国主义舞台上，在重大的政治角逐中进行深入渗透的颇有弹性的得力工具。还因为华俄道胜银行在它的流动资本中将法国、德国和中国的股份合并起来，这就在某种程度上防止了使董事会的政策盲从于政府的商业利益政策。尤其对于法国股东是这样，他们不仅派代表参加了董事会，并且以最敏感的方式将这家俄国银行与整个巴黎的银行机构联结了起来。如果没有西伯利亚铁路和中东铁路，没有对华贷款，没有华俄道胜银行，如果没有这一切，就不可能想象专制政体会在远东执行

① 关于1891年法国的提议，见财政部办公厅二处1892年第24号卷；关于1896年美国的提议，见财政部办公厅三处第12号卷；又见 M.鲁特柯夫斯基1896年4月17日(29日)就克赖顿·韦伯的提议给 П.М. 罗曼诺夫的报告。这个提议与旺代比尔特的提议相似，它要求“依据合同将西伯利亚铁路的部分建筑工程交给一家美国辛迪加。1890年在巴黎由三名参议员（P.德韦斯、G.莱絮厄尔、P.德科维勒）和三名工程师承包商（A.库弗勒克斯、L.夸瑟奥克斯、E.莱泰利埃）组织了一个研究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的公司，法国的提议就是由这一公司首先提出的。公司准备从1892年起用六至八年的时间建成铁路线，其造价为三亿卢布。提议的财政方面是俄国政府应以利息三厘的债券，按略低于过去每季的平均行情（然而，这一平均行情不得高于最后一个月的行情），向公司偿清1891年的债款，而且还要和巴黎、阿姆斯特丹和柏林的行市相符。此外，俄国政府还要根据债券的票面价格（不是实际价格），付给公司一定比例的佣金。1891年2月25日(3月9日)和1892年1月29日(2月10日)，莱絮厄尔曾两次向俄国政府提出这个问题。最后，1892年2月16日(28日)亚历山大三世召见了他和德科维勒，并拒绝了他的提议。亚历山大三世当天在他的报告上批道：“我要向他们重申的，亦即您（指维什涅格拉茨基）已经告诉过他们的，让他们勿再指望此事，因为现已决定，将由国库出钱自修西伯利亚铁路。”至于是否和韦伯进行过谈判，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那样大胆的进攻性政策，在中国领土面临的争夺铁路、势力范围、专利权、行政部门、工业租让权、租界以及原料和商品销售市场的国际角逐中，去及时占领战略、政治和经济的必要的最初阵地。那时，俄国只和法国打交道，而当时法国无论是在对德关系或对英关
476 系中都是没有任何其他保障的。俄国政府在远东着手执行的计划的使命，和政府拥有的、或者可能吸引来受专制政体"庇护"的现款是不相称的。当时所有这种不相称都被对外政策的成就掩盖住了。当时，法俄同盟使法国外交界愿意在远东与俄国外交界一起前进。然而 1902 年 3 月 3 日(16 日)的法俄宣言，却是法俄同盟在远东事务中的最后一次表态。这是因为如今法国有可能与英国达成内容最广泛、前景最可观的协议了。

1903 年 3 月法国新任驻彼得堡大使博姆帕尔"上任伊始"，就"往我们园子里扔石子"，在《商业通报》① 上公开"低估西伯利亚铁路的意义"。也在这时，德尔卡赛也说出了类似的话："如能灵活对付英国"，他"可以比从我们朋友那里获得更多的东西。"而维特和拉法洛维奇由于尊重德尔卡赛的"亲英思想"，所以当国会议员德隆克勒打算"向国会建议，请求法国政府注意，必需从俄国横贯西伯利亚的大铁路中获取商业和工业利益"时，以及准备出版关于《俄国在远东做了些什么》的小册子，以便"分发给全体参议员和众议员"时，维特和拉法洛维奇竟不认为应当对德隆克勒给予任何协助。② 1903 年春天，英法谈判已在"全速进行"，如果相信德国外交界拥有的情报，那末当时巴黎金融巨头③ 正在寻找往后向俄国政

---

① 原文为 Moniteur Officiel de Commerce。——译者

② 见于财政部办公厅秘书处 1902 年第 2 号卷，拉法洛维奇 1903 年 3 月 15 日和 23 日给财政大臣的信(3 月 15 日的信谈到该小册子的准备工作，维特批道："勿管此事")。

③ 原文为 Haute Finance。——译者。

府投资的伙伴，从而开始为英俄接近打下基础。① 1903 年秋季前，477
巴黎普遍流传着一种猜疑，说俄国专制政体“将不得不向国外发动
侵攻，以便把注意力”从国内的困境“引开”。比如，拉法洛维奇就
不能对彼得堡的上司隐瞒巴黎“商业界和工业界”对“远东事务日
甚一日的惊恐心情”，而到了 10 月就已经用“俄国股票开盘的波
动”这种说法来表述这种惊恐心情了。对于英法谈判“进展顺利”
这一巧妙散布的传闻，拉法洛维奇本人也倾向于认为它是从海
峡② 彼岸来的“试探性谣言”，其目的在于“当远东事态可能恶化
时，麻痺法国的社会舆论”，并“阻止对英国的同盟者日本采取某种
示威行动”。

但是，不管他怎样认为，“有理智的人”“都会有一种感觉：最终
定能避免武装冲突”，而恰恰是在同俄国友好的实业界中人们普遍
确信，为了保卫新的属地，“我们对远东的占领将耗费巨额的金
钱”，而这一点正可能是使我国预算出现混乱的原因。至于“社会
思潮”，拉法洛维奇认为“是极不利于我们的”，而法国外交“实际上
是受驻伦敦的康邦和驻罗马的巴雷尔领导的”，③ 他们是最不亲俄
的。④ 据柏林从奥地利得到的消息看来，当时俄国方面从军事上给 478
法国参谋部带来了某种不安，即使不认为这一点有特别的意义，无

---

① 见《德国外交文件》，第 17 卷，第 5369 号，埃卡尔德斯泰因 1903 年公历 5 月 10 日的奏疏；及第 5374 号，拉多林同年 5 月 5 日(18 日)发自巴黎的电报。埃卡尔德斯泰因强调指出，他“明确”知道，金融巨头不仅劝说德尔卡赛实行英法亲善，而且也劝他实行英俄接近。拉多林则以罗士查尔德的代表别佐尔德的直接通知为根据。别佐尔德断言，伦敦的罗士查尔德受了巴黎罗士查尔德的信的影响，正与张伯伦一起对巴尔福施加影响，说服他，满洲问题不是英俄接近的障碍，爱德华七世“并不厌恶”俄国。诚然，别佐尔德没有预料到两年之内英国有可能借款给俄国，但他“认为有义务”将这些“未来的可能性”通知拉多林，以便德国“能够采取对策”。

② 指英吉利海峡。——译者

③ 康邦和巴雷尔分别为法国驻英、意大使。——译者

④ 见财政部办公厅秘书处第 3 号卷，А. Г. 拉法洛维奇 1903 年 8 月 9 日和 10 月 10 日给财政大臣的信；并见第 2 号卷，拉法洛维奇同年 10 月 14 日的信。

论如何如今在彼得堡恐怕不能再抱有这样的幻想：希望法国会对俄国在远东的企图给予任何军事援助。[①] 在这一方面，1903 年秋季拉姆斯多尔弗对巴黎的访问，也没有给彼得堡带来任何积极的成果，可能只是多少带来了一些请法国调停以便和平解决俄日冲突的希望。[②] 然而，这一通过巴黎的迂回试探，无论在伦敦和柏林都一无所获。因此，1904 年 1 月 26 日，当拉姆斯多尔弗向尼古拉提议公开请求调解时，尼古拉的见解是正确的，他说，为时已晚。[③] 战争的开端对俄国是不利的。这只是促使法国就有关殖民地的各项问题同英国缔结全面协定（1904 年 4 月 8 日）的最后一个推动力，假若还需要这种推动力的话。在俄英关系的当时状况下，这一协定很容易使法俄同盟的进一步存在发生问题。在整个战争过程中，法国最严格地保持中立，甚至没有敢于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企图削弱此种中立。俄国外交界觉得，它若提出在英国干涉战争的
479 情况下盟国将采取何种立场这一问题，就可能使同盟本身经受考验。[④] 果然，在 1902 年俄法宣言之后，法俄同盟虽然在表面上对远东事务发挥了一些作用，但是当日本的进攻眼看着就要成为履行条约的理由[⑤] 时，这个同盟却不起作用了。

在这种情况下，面对着日俄战争，德国在破坏法俄同盟并以德

---

① 见《德国外交文件》，第 18 卷，第 2 分册，第 5919 号，德国驻圣彼得堡代办罗姆贝格 1903 年公历 11 月 7 日的通知，其中说，庞德泽克将军怒不可遏地指责俄国，“修筑通往西部边界的战略铁路进展太慢，这条铁路是在法国最近贷款给俄国时，俄国答应法国进行修筑的”，还说，“仿佛法国方面已为此向圣彼得堡提出了行文”。

② 见同上，第 5917 号，拉多林 1903 年 10 月 16 日（29 日）给比洛的电报。拉姆斯多尔弗于同年 10 月 29 日（恐系 19 日之误——译者）（31 日）曾在巴黎。

③ 见同上，第 5944、5936、5931、5959、5948 号，特别是 5941 和 5917 号；并见《红档》杂志，第 2 卷，第 109 页，库罗帕特金：《日记》。

④ 见 A. M. 扎依昂奇科夫斯基：《1914 年大战前的法俄关系》（载论文集《谁是债务人？》，莫斯科 1926 年版，第 51 页，拉姆斯多尔弗 1904 年 10 月 20 日发往巴黎给涅利多夫的电报。

⑤ 原文为 casus foederis。——译者

俄同盟取而代之的把戏中，初看起来起先所处的地位较之俄国要有利得多。1905 年 7 月 11 日（24 日）威廉和尼古拉签订的《毕由克条约》[1] 就是这出把戏的最大成果。如果该条约生效，那末实际上作为从 1904 年的英法协定到世界大战开始这十年的基础的国际局势就会发生根本变化。《毕由克条约》是正当这次战争激烈进行时的一种公开产物，如今与这个名字相联系的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外交丑剧，俄国的大臣们大概是在某大公的协助之下才好不容易地结束了这场丑剧的。而在这场丑剧中，威廉则扮演了一个诱使对方在于己不利的文件上签字的狡猾诈骗者的角色。而尼古拉呢，他或者是一个对自己的行为也茫然无知的头脑简单的人，或者是自己"盟国"的阴险背叛者。在这两种情况下，他后来都不得不承认他是在没有弄清事情全貌的情况下签字的。《毕由克条约》是专制政体"天赋其才"的最后两名代表人物的个人政策的产物，但条约不仅是他们个人意志的偶然表现，而且是复杂形势的客观反映。这一条约是企图摆脱复杂形势的一种尝试，然而双方都同样遭到了不可避免的失败。

1895 年春天，威廉不仅通过外交途径坚决支持俄国反对日本侵占中国，而且准备同俄国采取共同的武装行动。从那时起，德国 480
在俄国远东政策中就一直起着火车头的作用。维特曾经多方设法，以便在他的《回忆录》中将德国的这种"致命的"作用说成是两年以后才开始的，即似乎由于德国占领胶州，才促使尼古拉二世转而采取侵占东方的侵略和"轻率"的政策。1895 年春季，当尼古拉的立场动摇不定时，是维特和威廉的手将 1904—1905 年战争所斩断的那个"致命的"纽结系紧的，对此，如今未必还有怀疑的余地。不是别人，正是维特，不惜以战争作代价，在直达的西伯利亚铁路

① 毕由克位于芬兰断崖，《毕由克条约》是由德国提议而签订的德俄同盟条约，后未生效。——译者

竣工之前，不准日本到满洲去；不是别的什么东西，正是德国那个无保留的决定使法国摆脱了不坚决的（看英国脸色办事的）状态，并促使它参与最后通牒，迫使日本改变同中国已经签订的《马关和约》的条款。既然没有任何根据可以设想，日本政府会如此轻易地、无缘故地放弃打开通往辽东南满部分的海上钥匙，而静待西伯利亚铁路的竣工（这条铁路的战略和政治意义是难以估量的，特别是由于在它通过满洲以后，俄国支线十分显然是不可避免地会通向任何方向的），既然如此，那末满洲问题在所难免的军事解决的日期也就直接取决于工程完工的期限了。日本会企图在此期
481 限之前进入满洲，这一点在1895年就已经为人所共知了。① 在这一方面，威廉（同他一起还有维特）在将近九年中（直到俄国远东政策遭到命中注定的结局为止），确实对这一政策起了"致命的作用"。不过，他们的作用并不比法国人大，法国人在着手采取武装干涉的初期虽不很坚决，但是不久，在发展已经取得的成果中，他们却对专制政体给予了最大援助。

当维特的帝国主义计划的命运处于千钧一发之际，德国外交上的友好行动很快就使德国成为瓜分政治利益的一个要求苛刻的参加者（因为从共同努力在北京造成的状况中取得这些政治利益

① 伊藤博文好象是最后赞成与俄国决裂的人。早在1903年3月初于甲府召开的党的会议上，他的演说就"为惊慌的传闻增添了不少养料"，他还顺便说道："天下大事每十年必有大变，连接东西两端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几乎已经完工。东西两端的距离现在不过两周就可以走完。不要忘记从国家安全的观点出发，这种距离的缩短要求我们给予严重注意。交通事业的最新改进正在引起各民族相对地位的彻底变化。举例来说，十年前任何一个西方大国都不能设想将十万大军派到远东。但从那时以来情况发生了如此的变化，甚至能在不过二三个月内就能将几十万部队调到东方。当然，所有国家都希望和平。但是，无论如何，任何一个国家也不会冒险地忘记，每时每刻都有不测之风云。这就是我所日夜焦虑的，也就是为什么我不放过任何机会提醒同胞精诚团结的原因〔见第79号卷，俄国驻日本财政代表拉斯波波夫1903年3月8日（21日）的报告〕。

已成为可能），并在某种程度上使俄国外交界感激它，这是很自然的。问题不仅在于威廉在彼得高府从尼古拉那里承担的义务（诚然，这些义务的手续是办得不够认真的），而对于维特来说，问题在于，他可以不把自己计划的进一步实现完全依赖于法国人。这是1896年初维特拒绝俄法再次贷款给中国的部分原因，因为他想把这个位置让给"友好的"德国。① 1895年通过巴黎的几家银行新输 482
入的法国资本，与通过俄国的圣彼得堡国际商业银行同德国贴现公司的资本在华俄道胜银行中合并起来，其意义也在于此。现在维特将圣彼得堡国际商业银行作为俄国方面新银行的发起人推上了远东国际舞台。② 圣彼得堡贴现贷款银行（它是在贴现公司参加下创建起来的）的生意人在巴黎筹集的资本与贴现贷款银行和圣彼得堡国际银行的资本也是这样结合起来，于1895年5月合资创办了俄国采金公司的。由于西伯利亚铁路接近完工，所以该公司可望在从乌拉尔到包括滨海地区在内的整个广阔地区进行活动，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该公司在1901年就已经对满洲的矿产地有所图谋了。③ 最后，1897年6月，由华俄道胜银行和俄国采金公司发起成立了中国矿藏勘查公司，圣彼得堡国际银行对其投资不少。1900年，这家公司又成立了蒙古土谢图汗盟和车臣汗盟矿业股份

① 见本书边码第96页。

② 见本书边码第91页，并见 E.格拉诺夫斯基：《俄国的垄断资本主义》，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杂志，第4期，第40页。

③ 该公司的正式发起人是大经纪人、贴现贷款银行的股东 Ф. И. 彼得罗科基诺和该银行副总裁 К. А. 瓦尔古宁。公司的创建资本为五百万卢布，分为五万股。在1895年5月26日的成立会之前，"外国股东"共入了一万六千五百六十一股，彼得罗科基诺以个人名义在外国股东名册中所认的二千二百五十三股尚不算在内，看来是打算日后将这些股份置于外国人手中的。外国股东中占首位的是巴黎荷兰银行（认了三千五百三十九股）和国际银行（认了二千五百股）。贴现贷款银行占四千一百一十三股，圣彼得堡国际银行总共才占一千八百七十五股。从1895年到1898年的历次会议中，国际银行的股票增加了，从二千五百股增至四千股、八千股到九千三百股。贴现贷款银行却减少为一千二百股、五百股、一百五十股、六百股。

公司，其中几乎一半股份是比利时财团的投资。①

如果将维特的全部外乌拉尔计划作为完整的统一的东西加以
483 研究，那就可以说，在 1895 年武装干涉以后，维特在其代理人罗特什捷英肯定无疑的参与下（他被指派在上述所有“机构”的董事会中任职），在俄国专制政体的“庇护”下，得以直接动员了大量的（在欧俄范围内的）各种民族资本，并使有垄断倾向的民族资本大大有利可图地在组织上统一了起来，与专制政体在远东的对外政策的成就利害相关。维特指望以盟国的身份，将铁路修建到中华帝国的京城，并且首先通过对清皇朝地位和中国原有政治制度的支持，巩固两个最大的大陆国家的同盟；指望依靠该同盟，用“和平征服文化落后国家”的“新方法”，悄悄地获得中国的“所有资源”。维特定能感到，当时他正完全处于资本主义的战备状态，而且已经完全意识到了他贸然开始的同无比强大的英国资本单独决斗的危险性，所以，1897 年夏季，他在彼得堡不失时机地向威廉描绘了一幅衰老的、被陆军军备所削弱的欧洲在与“海外”国家的斗争中注定失败的图景，并阐述了一项建立大陆同盟以反对英国的拯救性计划。②

当时，威廉对三国同盟这种想法置若罔闻，而且随即直接向尼古拉施加压力。他入侵山东，打乱了俄国的外交计划，对于维特关于放弃这种占领的天真号召，他同样充耳不闻。最后，当同英国进行协商的最后可能性已经丧失，英国方面转而采取了包围德国的政策（以及把俄国赶出满洲）的时候，威廉使用了“两位将军”
484 的提法，他将大西洋归属自己，而以太平洋来诱惑尼古拉（正如先前维特以“俄国舰队控制太平洋水域”的前景来引诱亚历山大三世

① 见本书附录二。

② 见维特：《回忆录》，第 1 卷，第 99—100 页。

一样),并对俄国采取促使俄军远离西部边境调往东方的政策。然而,所有这一切未能阻止维特的外交去清醒地估计同法国单独结盟可能带来的种种不便之处,而且也丝毫未能使他放弃这样一种想法,即对法国朋友日益增长的、逃避不了的要求,必须采取某种对策。

正如前面某处所指出的,维特一有机会甚至在自己人面前也不反对显示华俄道胜银行的法国性质,即自主性质,显示俄国政府甚至在其政策的基本路线方面也有重视脆弱的银行工具的义务。然而,法国股东们确实一开始就提出了参加银行管理的条件,这确实使维特本人大为作难,并且使他不仅必须考虑到外国股东的商业利益,而且也要顾及到法国政府从政治上对银行业务的干涉。法国股份在华俄道胜银行的资本中占八分之五,而董事会中法国股东的席位占八分之三,大家知道,在银行初创之际,法国的创建人就没有很快同意这种份额与席位相颠倒的比例关系,而在中国当地,在利害相关的法国银行界中则希望在新银行的事务中"起首要作用"。罗特什捷英在巴黎说服了法国人之后,不到两年,在上海分行的俄国成员和法国成员间的关系就紧张起来了,以致维特已经准备将银行按国籍分家。当然,这样做便会引起彼此无益的竞争。[①] 这时,巴黎的董事们看来要恢复自己的要求,他们认定要让 485
阿诺托干预此事。于是内斯兰在 1897 年 8 月仅作为中间人出来向维特转达"外交部长的希望":(1)银行名称上增添"法国"字样;(2)增加银行"行政部门中的法国成员";(3)随即"在中国南部"开设分行。[②] 所有这些"希望"均遭到在华的俄国经理们的坚决反对,

① 见本书边码第 91 页注。

② 见第 64 号卷,财政部办公厅主任 1897 年 8 月 13 日给璞科第的电报。

于是维特也就毫不犹豫地拒绝了。[①] 法国人这次让步了，但是重复出现这类事情的可能性却并未排除。于是维特在第二年就增加了俄国政府在银行资本中的股份，并在银行章程中增加了关于银行董事会本身的组成须经俄国财政大臣批准的条款。[②]

确实，当俄国的经济困难端倪初露的时候，1899 年 10 月，特奥普伊勒·德尔卡塞就重新提出在彼得堡银行董事会中增设一名法国董事的问题。他提出问题的形式表示，法国政府在此事中起着首倡作用。而由德尔卡塞提出的候选人的名字更无疑表明，如今问题的实质在于确立法国政府对银行董事会业务活动的直接控制。德尔卡塞提议由 M. 韦尔斯特拉特任银行董事，他是当时有名的法国驻彼得堡的商务委员，对俄国并无多大好感。但是，即使
486 有这样的保障，德尔卡塞仍然不仅不想重提将银行活动扩大到中国南部的问题，而且还提出了限制东方汇理银行和华俄道胜银行势力范围的问题，以便使华俄道胜银行“在上海以北活动”。[③] 就这样，维特在刚刚向自己的敌人英国人作了让步，同意限制俄国银行的铁路建筑活动范围以后，现在又认为不得不“讨好德尔卡塞”，而

① 见第 64 号卷，璞科第 1897 年 9 月 4 日和 9 月 12 日的电报。璞科第和维尔特两人都认为，在中国南部与东方汇理银行（法国银行）竞争，从而“分散银行力量”，是件愚蠢的事（维特批道：“如不利于银行，则不要去办”）。璞科第在电文中主张，如果法国人不赞成俄国经理的政策，就与他们分家。维特在电报的这几行字旁批道：“这点应予坚持。”参见同上案卷，财政部办公厅主任 1897 年 11 月 4 日给璞科第的复电。内称，维特“完全同意”璞科第的观点，“关于法方对银行的关系必须给法国人以坚决的答复”。

② 见本书边码第 236 页。

③ 见第 64 号卷，法拉洛维奇 1899 年 10 月 15 日（27 日）给维特的两封信。拉法洛维奇没有提到，华俄道胜银行的巴黎董事们为何参与此事。转达给彼得堡的建议是由德尔卡塞亲自交给拉法洛维奇的。这次谈话之后，又补充告知拉法洛维奇，似乎当时是罗特什捷英提议给法国人第四个董事席位的。当罗特什捷英被问及关于拉法洛维奇的通知时，他仅就划界问题作了解释。他说当时曾提到以扬子江为界的问题，上海应设两个银行的分行，“从法国政府的观点看来”，在此种情况下，华俄道胜银行在中国“北部所起的作用应与东方汇理银行在中国南部所起的作用相同”（见同上，罗特什捷英 1899 年俄历 10 月 27 日给希波夫的信）。

同意限制华俄道胜银行的范围和商业信贷活动，这是维特方面的又一让步。在作出此种让步的同时，维特没有对德尔卡塞掩饰自己的“疑虑”，这些疑虑归结为：“当其他欧洲国家，特别是英国的银行同法国和俄国银行竞争时，华俄道胜银行放弃了某些地区的业务活动，这与其说对东方汇理银行有利，不如说有利于英国的信贷机构。”

这回维特在第四位法国董事问题上也退让了，同意韦尔斯特拉特任董事。在由俄国国库包购1898年发行的第二次股票的同时，维特已将董事从九人增至十一人，派财政部的两名官员担任了董事。由于这个原因，维特就更不便在这第四位法国董事的问题上过于固执了。但当时维特并没有忘记去刺激一下自己的顽强的法国同仁，他认为“如果由银行的巴黎经理们提出这个问题更为得体”，于是只是在内斯兰和霍丁格尔（他们为俄国财政大臣的如此重视而“感动”）签字的、寄给俄国财政大臣的毕恭毕敬的感谢信 487
到圣彼得堡后，韦尔斯特拉特才于1899年12月就任新职。① 而再往后，维特就马上避开了德尔卡塞1900年夏天提出的那个“十分牢固的同盟”（而不管它是怎样的），在中国奉行了一种在财政和外交方面都可能使俄国和满洲拴在一起的单独政策。这一政策使法国政府对俄国在西方的活动能力产生了警惕，并且从以下两个方面影响了华俄道胜银行的命运：（1）将1902年发行的第三次股票全部收进俄国政府的皮包内，从而进一步实现银行“国有化”；（2）当着事情从中国政府承认银行的工业垄断权的一般外交公式，转到真正邀集银行资本积极参加创办企业的时候，以及转到向俄国那些私方人士甚至公司（他们准备将租让权投入自由市场并开放满洲，让别国人“大批涌现”其间，这种前途使俄国政府不寒而慄，

① 见第64号卷，维特1899年10月26日给拉法洛维奇的信，霍丁格尔和内斯兰同年12月9日（21日）的信，以及韦尔斯特拉特12月23日的信。

而从银行法国股东的观点来看这却至少反正是一样的）收购满洲的租让权的时候，才把在满洲的工业开业狂从银行的活动范围中排除出去。① 同时，内斯兰和霍丁格尔又是将俄国的公债引入法国市场的人。他们二人首先应当分担上面指出的巴黎金融巨头的忧
488 虑：即俄国预算肯定会失去平衡，而这一点又会危及俄国在远东地位的进一步巩固。

由于 1901 年法国贷款的条件过分苛刻，所以必须看到，尼古拉应 1901 年春柏林的殷切邀请于秋天到达但泽时，不仅出于尼古拉个人的意向，而且看来还带来了维特和拉姆斯多尔弗的劝告：将俄国拟同中国签订的单独条约的草案秘密通知德国，以吸引德国政府关心俄国的满洲政策。② 这时维特“为了使中国赔款变成现款”，不仅于 1902 年初在柏林得到了一笔贷款（虽则他在巴黎也可以毫不费力地做到这一点），而且拒绝了在“最近时期”考虑法国人的这类提议。③

可是到 1903 年春季，已经可以看出，门德尔松发行的俄国公债正在顺利地转到法国人手中，这时鲁维埃竟很不礼貌地对维特的“私人信件”六星期不作任何答复。维特的信请求“允许筹措俄国已在柏林、伦敦、纽约筹集的利息四厘的借款”。拉法洛维

---

① 见本书边码第 257—258、367 页，比如，俄国采金公司和 A.A. 特罗伊茨基 1901 年在满洲得到的租让权，于 1903 年之所以为满洲矿业公司所得，就是因为他们已向“别国人”表示可以提供此项租让权（见第 106 号卷，满洲矿业公司董事会 1904 年 1 月 2 日的报告）。

② 见《红档》杂志，第 3 卷，第 103 页，波洛夫佐夫：《日记》。

③ 见《德国外交文件》，第 18 卷，第 1 分册，第 5406 号，比洛 1902 年 3 月 5 日（18 日）给阿尔文斯勒本的电报；并见财政部办公厅秘书处 1903 年第 3 号卷，拉法洛维奇 1902 年 8 月 12 日给维特的信。信中说：“如果能让鲁维埃选择时机，他将十分赞助对俄贷款。”维特在此批道：“我最近不准备在巴黎成交任何借款。”比洛本已急躁地主张：如果维特对德国提高粮食进口税一事不作出俄国不提高关税的“书面保证”，就要迫使门德尔松拒绝对俄贷款。但是正因为维特有转向法国市场的可能，比洛的想法也就落空了（《德国外交文件》，第 18 卷，第 1 分册，第 5404、5405、5407 号）。

奇在为此事责备博姆帕尔的同时，竟然不加考虑地“暗示可能给铁路带来沉重打击，要不是我们的巴黎朋友们的坚决支持，我们是不能开始这些铁路的建筑工程的”。① 我们看到，法俄同盟内部之所以可能在当时发生如此尖酸的怪事，与其说是因为尼古拉受到了 489
大臣们和他自己皇帝本能的推动，走上了两大洋将军相接近的不可靠的道路，不如说是因为那时维特在将自己的信贷活动转到柏林的过程中，正开始寻求一种对抗法国朋友政治要求的抗毒素。如果维特指望以专制政体财政国际化的这种办法来使自己容易巧妙应付，以便“巩固欧洲的和平”，那末，当他沉溺于预先一举从法、德两国得到对他的满洲计划的支持的希望时，大家知道，他正在使自己的外交拚命地走向失败，正是这一失败促成了别佐勃拉佐夫派的胜利。②

1903 年春天，当别佐勃拉佐夫派开始转入“在朝”地位，并着手把维特独占满洲的计划实施到底的时候，他们就直接提出了必须为俄国选择目标的问题，或者认定德国，或者倒向英国，而将法国撂在一边，因为法国无论如何也不能有利于俄国推行远东计划。当然，对这一问题的决定是有利于德国的，所指望的是“威廉与俄国永远合作的愿望”。③ 但是，要想让德国外交界承担任何正式的义务，事情就不那样简单了。当时，除了答应在战时保持中立（对东京和彼得堡作相同的保证）这一点外，柏林方面是最不愿意用任何东西束缚自己的。柏林宁肯耐心等待俄国自己来向德国求援，相信时间会对德国有利。④ 德国外交界拒绝了用干涉俄日冲突 490

① 见财政部办公厅秘书处 1903 年第 3 号卷，拉法洛维奇 1902 年公历 12 月 1 日给维特的信；并见同上机关 1903 年第 2 号卷，拉法洛维奇 1903 年 5 月 10 日的信。

② 见《红档》杂志，第 3 卷，第 103 页，波洛夫佐夫：《日记》。

③ 见第 120 号卷，沃隆佐夫 1903 年 5 月 9 日给维特的信，信中说：“我们既然登上了世界政治舞台，我们就必须或与英国或与德国协调一致。”沃隆佐夫认为，“德国对我们更危险，但它更需要我们”。

④ 见《德国外交文件》，第 19 卷，第 1 分册，第 5920、5923、5927、5943、5950、5951 号；并见第 18 卷，第 1 分册，第 5421 号。

的办法防止战争的各种主张，它警惕地注视着，俄国外交界切莫因为恐惧，在软弱的时刻走向与日本、英国妥协的道路；另一方面，自己也不要流露出向"俄国求爱"的急迫心情。德国人在威斯巴登迫使尼古拉首先提出政治问题，甚至在那里不再向他重复"掩护后方"这类通常的保证。德国外交界满意地获悉，法国也不想对自己与俄国的同盟关系作广义解释，而兰斯多恩则保证说，英国和法国都将竭力限制战争，以此鼓励日本出兵。在这种时候，德国外交界深信，行将爆发的战争，"不论谁胜(不论是俄国还是日本)，在这两种情况下"，"都将提高德国的政治威力"，只要德国人"绝对镇静地袖手旁观"。①

491 实际上，1903 年春季俄国的政权开始转入公开的亲德派和反对在远东作任何让步政策的那一派的手中；俄奥之间在近东问题

① 见《德国外交文件》，第 18 卷，第 2 分册，第 5917 号，拉多林 1903 年 10 月 16 日(29 日)发自巴黎的电报，电文说，他曾同里昂信托银行的经理热尔曼谈过，热尔曼直截了当地指出，日俄冲突的和平解决完全取决于德国，德国可以"起主导作用"(威廉批道："我作梦也没有想到"，又道："法国人担心自己的金钱会丢失在远东的骚乱之中，因此，想让我们拖住俄国人，我对此事却从未想过")。并见第 19 卷，第 1 分册，第 5924 号，米尔贝格关于 1903 年 7 月 2 日(15 日)和奥斯坚-萨肯就满洲事态谈话的简要报告。奥斯坚-萨肯表现得十分"怯懦"，他希望俄国能得到德国的"支持"。比洛批道："为了不使它在任何条件下与日本妥协，我们不应该使俄国屈服于这种恐惧"；又见第 5943 号，比洛 1904 年 1 月 3 日(16 日)的备忘录，他在其中谈到，如果俄国向德国求援，德国可以反过来向俄国提出一些要求时，他主张在要求的提法上要特别谨慎，以便使"俄国政府在不久不致产生与日、英、美妥协的想法或进一步退让的想法"；又见第 18 卷，第 1 分册，第 5421 号，霍尔斯泰因 1903 年 4 月 3 日(16 日)给比洛的电报，电报详细论证了"等待政策"的必要性；又见第 5422 号，比洛 1903 年公历 11 月 7 日所作关于同月 4、5 两日举行的威斯巴登会见情形的报告，内称，威廉避而不谈"外交政策"，次日会晤时，尼古拉觉得自己"不得不""提出这个问题了"。比洛在这里强调指出，威廉没有就掩护后方作出任何"承诺"；并见第 19 卷，第 1 分册，第 5931 号，梅特涅公历 1 月 8 日发自伦敦的电报，内称，兰斯多恩向日本大使"坚决声明"，"今后英国将不在维持和平方面向日本施加任何压力，而且英国将最诚挚地履行自己的条约义务"，又说，"法国将保守中立"；并见第 5936 号，比洛公历 1 月 12 日的电报，内称，鲁维埃对卢扎提保证说，只有英国在欧洲水域进攻俄国的情况下，法国才有了履行条约的理由；并参见第 5945 号。

上达成了全面的协议，从而使俄国能在军事行动[①]之前从俄奥边境上抽调两个整军团的部队。[②] 由于以上原因和中俄谈判破裂以及俄国第二次占领奉天，俄国确实对任何人都摆出了一副强国的架势；又由于它在西部边境拥有确有保障的后方，而在东方则以战斗的色彩粗略地涂抹了门面，于是决定在战争面前不退却，不寻求和平的出路。战争爆发后，德国仍然只是采取了超友谊的中立政策，这一政策实际上把德国变成了俄国的唯一盟国；在外交上，德国又提到了"克里米亚"同盟，它抓住并夸大"克里米亚"同盟的蛛丝马迹，对法俄同盟进行旁敲侧击。

然而，上述俄国政府机构的修饰门面的工作，在战争开始时远未结束，而且它在只完成了远东管理机构的更换之后就半途停顿了——这恰好能防止外交上的惊慌逃跑，这种逃跑是旧政府的核心人物向尼古拉建议的（库罗帕特金关于将包括辽东在内的南满全部归还中国的奏疏就是一例）。不仅旧政府的要人，甚至尼古拉本人也处于十分沉重的经济锁链的压力之下，这种经济锁链巩固 492
了法俄同盟，战争期间，在财政上仍是要利用这一同盟的。可以说，既然俄国外交界继续挑着满洲这副重担，所以稳坐在法、德之间维持一种应有的平衡的可能性就更成问题了。因为在软弱无力的时刻，甚至维特也控制不住自己用阴谋手段去对付由俄法同盟的利益所支配的一条战略铁路。别佐勃拉佐夫则完全不能理解，在1903年秋季，当着日本正在狂热进行战备的时候，怎么可能花费时间和金钱在西部边境进行大规模的演习，[③] 从而在以战争解决满洲争端的情况下，随便地暴露这条战线。战争开始以后，拉姆斯多尔弗的外交公式是："丝毫不损伤我们同柏林的关系，同时也不要

① 指日俄战争。——译者

② 见《德国外交文件》，第19卷，第1分册，第5939号。

③ 见库罗帕特金：《日记》，载《红档》杂志，第2卷，第44、47、62页。有关1903年8月底华沙军区的大演习，见同上，第69页及以下各页。

放走巴黎”，因为“只有保持均衡，才能尽可能地从双方得到好处”。实际上，随着战争的发展，这一公式等于承认俄德同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愈往后便愈清楚，问题不在于“尽可能”地得到“好处”，而是必须满足俄国的要求。①

由于德、法、俄三国同盟是完全不能成立的，未来的前景便是分为两个既互相防御又互相矛盾的同盟。不管这种前景何等离奇，它在专制制度双重外交的典型诗篇中，却仍然可能发生，德俄同盟于是成了尼古拉个人政策的目标。

III

493 战争头一天，俄国舰队在旅顺口所遭受的损失使人毫不怀疑，已经开始的战争不是几个星期所能结束的。而就在1904年2月初，巴黎便谣传“最近”俄国就要借款。2月间，俄国政府立即“断然驳斥了”这个谣言。但是到了3月，我们知道，俄国政府已坚决决定保持兑换，并依靠外债进行战争，不管战争要延续多久。② 有一个想法，即“在本年(1904年)初”借款谈判首先不同巴黎，而同柏林进行，③ 是引人注意的。至少俄国驻巴黎大使涅利多夫一开始就如此明确地主张推迟在法国市场上筹措贷款，以致科科夫佐夫有些见怪地把他的这一意见当作是他拒绝支持在同法国人行将举行的谈判中达成借款。④ 但是同德国人的谈判决定，在柏林征集贷款必须延迟到关于缔结俄德贸易条约的会议结果已见分晓的时

① 见《红档》杂志，第5卷，第15页，拉姆斯多尔弗1904年10月28日给奥斯堡-萨肯的信。

② 见拉法洛维奇1904年2月10日（23日）给科科夫佐夫的电报和同月12日(25日)普季洛夫给拉法洛维奇的电报(《俄国财政》，第1号和第2号)。

③ 见科科夫佐夫1904年10月20日给涅利多夫的信(同上，第34号)。

④ 见涅利多夫1904年3月25日(4月7日)给科科夫佐夫的信(同上，第5号)。

候。[1] 于是形成了这样的状况，科科夫佐夫甚至只得瞒着自己人邀请法国银行家到彼得堡来，并装出他们是自告奋勇来的样子。[2] 但是，不仅涅利多夫建议暂缓向法国市场募集债款，就是财政部驻巴黎的代表拉法洛维奇（他知道事情的秘密所在）也警告说：（1）"愈晚点"借债，"愈有利于民族威望"；（2）借款总数超不过一亿五千万 494
到两亿法郎（折合五千万到七千万卢布）。科科夫佐夫正确地认为，这个数字对于战时说来，真如"杯水之于车薪"。实际上，为了保证将战争进行到本年（1904年）年底，就需要八亿到十亿法郎。[3]

科科夫佐夫认为，继续推迟借款是无从谈起的，这一意见完全正确。因为夏季将临，而夏季无论如何是不宜于征集大宗借款的，本国的资财只能用到8月。更重要的是，不能对"战争将发生有利于我们的转折"抱有任何希望，正如科科夫佐夫4月间所认为的，对战争转折的预测"非我们所能预料"。[4] 而与此同时，如今在1904年4月，当同法国人的谈判勉勉强强接近于良好结局时，甚至巴黎的亲俄报纸都预先谈到了旅顺口有失陷的可能，在法国明显地表示出了要与俄国断交的情绪，而阿尔图尔·拉法洛维奇本人也认为，唯一的希望是"祈祷上帝，竭尽一切努力，在最近数星期内，从战场上传来较为有利的消息"。[5] 在这种情况下，推迟借款就太冒险了。于是只得同意分明是不利的条件（实息六厘五），而且同时以俄国政府在国外订货问题上"给法国特惠的承诺"来束缚自己。

① 见前引科科夫佐夫1904年10月20日的信。

② 见科科夫佐夫1904年4月11日给拉姆斯多尔弗的信（«俄国财政»，第14号，第93页）。

③ 见拉法洛维奇1904年3月31日（4月13日）给科科夫佐夫的信和普季洛夫同年4月5日（18日）给拉法洛维奇的信（同上，第6号、第9号）。

④ 见科科夫佐夫1904年4月11日的信（«俄国财政»，第14号，第92、94页）。

⑤ 见拉法洛维奇1904年4月24日（5月7日）给科科夫佐夫的信（同上，第18号）。

最后这一点，自然是明显有损于俄国国库的。①

495 以后的事实只是证明，继续推迟借款确实是不行的。6月间，法国财政部信贷办公室经理言语间已“明确透露，希望我们将来能找到别的来源(以抵补战费)，比如说，找柏林”。② 这样说并不是很礼貌的，但是，这话在彼得堡却有良好的基础。因为这时维特正在柏林与比洛进行缔结俄德贸易条约的谈判，这次谈判不仅使两国在7月5日签订了条约，而且互换了文本。根据换文，俄国可以在1905年4月1日前在德国市场上征集贷款。③

---

① 4月29日颁布了关于发行公债的上谕，而4月30日法国大使博姆帕尔会见了科科夫佐夫，并提醒利用法国工业进行支援的问题。见博姆帕尔和科科夫佐夫1904年4月30日(5月13日)、5月1日(14日)、5月3日(16日)的互换信件（同上，第20—22号）。至于在法国的订货较之德国价格多付的款项，见科科夫佐夫1905年2月26日给涅利多夫的信(同上，第46号，第163—164页)。

② 见拉法洛维奇1904年6月19日(7月2日)给科科夫佐夫的信(«俄国财政»，第23号)。

③ 1894年1月29日(2月10日)的俄德贸易条约到1903年12月18日(31日)满期。1902年12月25日，德国国会通过了新的关税率和新的海关税法。俄国输入德国的小麦、二粒小麦、黑麦、燕麦和制作啤酒的大麦，根据新税则比过去都要增加进口税，从最低税率的七千八百万马克增加到最高税率的一亿一千万马克。俄国政府于1903年1月13日公布了自己的新税则作为报复。新税则规定对由陆路输入的货物(其中多半是从德国来的)比由海路输入的商品多征收百分之二十的关税，但是，双方都没有公布新税则的施行期限。1903年1月8日，德国建议以德国的新税则和俄国的旧税则作为基础进行谈判。俄国政府于1903年1月20日复照德国，表示同意进行谈判，但要以1903年1月13日匆忙公布的俄国新税则为谈判基础。谈判于1903年12月30日开始。根据俄方提出的条件，德国输入俄国的货物，每年应比原税则(status quo——译者)增加二千六百万马克的关税。根据德方提出的条件，俄国运往德国的货物，每年多征收三千三百五十万马克的关税。谈判在这个问题上卡住了。尼古拉根据威廉的坚决主张(见«威廉二世和尼古拉二世通信集»，第58页)，指定由维特担任主席的特别会议来重新审查此事，这才打破了僵局。1904年5月1日的会议决定，“可依据德国税则的最低关税实现俄德贸易协定”。7月间，维特前往德国直接与比洛谈判。据财政部计算，1904年7月15日德俄双方同意的对外贸易条约的补充条款，使俄国输出的农产品较前多征收了一千一百六十万零三千卢布，而德国输出的加工工业产品多收的关税为一千三百四十八万二千卢布(见财政部1905年1月22日的奏疏，第547号)。

由于 1904 年 4 月在巴黎所征集的债款足够保证到 1905 年初 496
的战费，如今俄国就在好几个月中摆脱了战时对强大的法国政府的不可克服的依附。须知法国政府不允许以后再在巴黎交易所开盘征集借款，也就是说，即便法国的银行界同意贷款，法国政府也要从中作梗。当着财源的选择在一个时期得到这种自由时，战争轴心还在旅顺口转动，战争形势本身促成了亲德方针。那时，1904 年 4 月的“英法协定有一个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在波罗的海舰队尚未抵达旅顺口时，妨碍法国将其舰队派往旅顺口来帮助”俄国（这是威廉在他 1904 年 6 月 5 日的信中挑唆尼古拉的一种提法）。那时，巴黎在 8 月就将旅顺口的失陷作为必将引起俄国交易所价格波动的理由。为了减轻这种波动，我国驻巴黎的代表们不断要求给法国报纸增加新津贴。同时，有消息称，俄国要成立第二支陆上部队，这是继续延长战争的标志。于是巴黎交易所中的俄国证券就江河日下，而在法国报纸上则有表示赞成俄国死敌美国银行家希夫所筹划的法国对日贷款的说法。[①] 就在此时，柏林方面不仅以波罗的海舰队“将把日本舰队赶回自己港口”，并“恢复你（尼古拉）在海上的控制”[②] 这种前景来满足尼古拉的想象，而且，实际上，德国还帮助俄国罗日杰斯特文斯基舰队启航，向它供给煤炭、并坚定地支持皇村宫殿中的乐观主义。甚至在辽阳战役之后，皇 497
村宫殿还继续生活在梦想之中，希望即将得到日本的赔款，并从中

---

① 见威廉 1904 年 6 月 6 日给尼古拉的信（«威廉二世和尼古拉二世通信集»，中央档案馆出版社，莫斯科 1923 年版，第 62 页）；并见涅利多夫 1904 年 8 月 10 日（23 日）和 9 月 16 日（29 日）的信和科科夫佐夫同年 8 月 26 日的信（«俄国财政»，第 27—29 号）。

② 见威廉 1904 年公历 8 月 19 日给尼古拉的信（«威廉二世和尼古拉通信集»，第 65 页）。

国并吞满洲，而且想入非非，要为此挑唆中国政府破坏中立。①

498 然而，在法德之间做出选择的时机，不是在1905年初，而是在1904年10月来到的，因为威廉担心日俄战争由于"衷心赞同"的倡议而"过早"结束，便对尼古拉进行了公开的抨击。10月初头，柏林获悉日本前驻彼得堡公使栗野到达巴黎，此人似乎是为了缔结有利于日本的和约而谋求法国和英国进行调停的特派代表。威廉立即就此事通知尼古拉，以证明"日本在人力和财力方面即将枯竭"，并表示深信，尼古拉"是任何时候也不会赞助此种诡计的"。

① 见A.M.阿巴扎1904年9月9日给阿列克谢耶夫将军的信（远东事务特别委员会办公厅档案，第114/95/c号卷）。尼古拉在通过阿巴扎向阿列克谢耶夫询问他对满洲问题的意见时，指出"下列几点"："应该注意：第一，不能指望从破产的日本实际获得足够的战争赔款；第二，注意到朝鲜在经济方面价值甚低，只有合并满洲，才是此次战争对俄国的唯一可以触摸到的报酬。如中国继续保持中立，不仅会导致不确定的和对我们不利的满洲现状的继续存在，甚至会使这种现状更加恶化，并使我们有义务对中国表示感激，似乎中国在战时维持中立是帮助了我们。因此，中国破坏中立对我们是有利的，所以也是我们所希望的。固然，在战争的现阶段，公开同中国断绝关系可能被认为为时过早，但是不能不承认，不应该坐失良机，以便在这一方面迈出重要的第一步，而且在我们继续增兵和取得最初一些胜利的情况下，中国就不大可能破坏中立了。有鉴于此，似乎可以利用红胡子经常的为非作歹和敌视行为，向北京政府提出声明，为了保障该地的安宁，我们要求那些不能维持治安，不能保障和平居民和铁路安全的所有将军和副都统在战时一律离开满洲。我们在接管了满洲的最高行政权之后，下级地方机关仍可照旧留任，但当然必须完全服从我们。"

阿列克谢耶夫答复（见同上，1904年10月7日从哈尔滨发给阿巴扎的信）说："现在我们尚未消灭最主要的敌人，我们无疑必须不让中国破坏中立，并必须避免任何挑衅性的行动，这些行动会使清帝政府决然公开站到日本方面"。阿列克谢耶夫的复信是远东总督府的外交官员普兰松起草的（见存于列宁格勒中央历史档案馆的普兰松《日记》，1904年10月10日所记。我之所以能利用日记的抄件，应当感谢П. А. 萨季科夫。他准备出版该日记，他热心地将自己的那份抄件提供给我）。阿列克谢耶夫9月份在哈尔滨时还不知道阿巴扎-尼古拉的方案，据普兰松日记记载，他对战争及其结局的考虑是悲观的："我们好象一辆破轱辘的旧马车在一颠一簸地行驶。我任职已四十年，我可以说，我们不能作战。我们应该设法结束战争，因为我看不到战争顺利结束的可能性，打得愈久，结局愈糟"（9月8日所记）。"至于满洲的未来命运，总督表示，即便我们战胜了日本，我们能否合并满洲，现在也很难断言"（9月13日所记）。普兰松劝说阿列克谢耶夫，"一定要拿下整个满洲，并竭力从满洲取得收益"，但是"将军说，我们不能这样做，因为我们没有人，也没有能力，我们只是说说而已"（9月19日所记）。

威廉这一通知取得了预期的结果：尼古拉面前再次出现了国际"和会"的幻觉，在这个和会上，"克里米亚同盟"被召来帮助似乎正在衰弱的日本，并根据"来自海峡彼岸"的建议，迫使俄国在没有打完他的王牌之前，停止其赌博。① 威廉自称是"可靠的信号器"，他发的信号不仅得到尼古拉的衷心答谢("感谢你诚挚的友谊，我对此 499
种友谊的信赖超过一切")，而且尼古拉还向他保证，战争将进行到把最后一个日本人赶出满洲为止。尼古拉转而确实正式和德国接近了，这种接近是事关重大的。②

由于一个偶然情况，这个转变带有特别急剧的性质。事情是这样的：在威廉的上述通知到达彼得堡的前两天，里昂信托银行的全权代表也到了彼得堡，而且带来了一项建议："勿将在巴黎市场上办理新贷款的事宜搁置到明年初，现在就开始考虑这项工作。"他警告科科夫佐夫说："巴黎目前银根很松，但在不久的将来，很容易为市场紧张所代替"，因为现在其他国家也准备在巴黎筹措外债；并使他相信，"在目前情况下，没有别的更正确的办法，只有利用当前的时机"，"因为再不借外债，我们就应付不过去了"。里昂

① 见《威廉二世和尼古拉二世通信集》，第68—69页，威廉1904年10月6日(19日)给尼古拉的电报。当时从日本驻斯德哥尔摩代表处传来的一则消息原来是不可靠的，德国驻东京公使阿尔科伯爵答复比洛的询问说，栗野在东京，根本没有听说他到欧洲去〔见《德国外交文件》，第19卷，第2分册，第6166号，阿尔科1904年10月12日(25日)的电报〕。这些天来，看样子林董企图信赖地通过调停人就和约问题与维特开始对话。维特自己认为，尼古拉是签订和约的唯一障碍，因为他还"相信"战争会以俄国的胜利而告终"(见同上，第6167号，第387页，门德尔松11月2日就维特的谈话给比洛的通知)。当时，甚至有消息传到了罗斯福那里，说是英、法两国打算向美国建议一起出面，按照日本的愿望，赞助和平调停(同上，见6271号，施特恩贝格1904年公历11月11日发自华盛顿的电报)。比洛准备参加调停，只要这符合俄国的愿望。德国人要知道拉姆斯多尔弗对该问题的意见，而拉姆斯多尔弗则回答说："战争的运气开始离开日本了"，又说，从俄国人的观点看，这时进行调停是不会有成效的〔同上，第6168和第6169号，比洛和罗姆贝格1904年10月30日(11月12日)的电报〕。

② 见尼古拉10月10日(23日)给威廉的电报，载E. B. 泰勒：《西方与俄国》，彼得堡1918年版，第204页。

信托银行的代表过了几天就走了，科科夫佐夫原则上同意"研究法国财团的建议"。科科夫佐夫并已和他约好"在最近几星期内"等候"相应的建议"。[①] 和法国人的谈判刚刚结束，恩·冯-门德尔松-巴托尔德俨然以大人物自居由柏林到了彼得堡，以"继续春季开始的谈判"。门德尔松并且提出一项先决条件，即同德国达成借款应
500 先于巴黎，但所提的贷款条件比里昂信托银行的较为有利。因为关于募集债款期限的要求表明，德国的对俄贷款实际上也要在巴黎筹措，只是德国人要的佣金较少，因此，在法国人看来，俄国人在法国人面前重视德国建议，主要是带有政治性质的。而正是"德国政府愿意促成拟议中的贷款"的政治意义促使尼古拉在最高一级解决问题时特别重视德国政府的这种愿望，并采纳了门德尔松的建议。科科夫佐夫在向俄国驻巴黎大使详细解释已经开始的对法谈判发生这种转变的原因时，不得不以沙皇的意志作挡箭牌。[②]

的确，很快就弄清了里昂信托银行的这次突然行动是自作主张的，并没有得到法国政府的同意，并且抢在了其他银行团的头里，所以上述整个事件没有引起十分严重的后果。但是，这件事情的意义是很清楚的。接着拉法洛维奇从巴黎发出警告"不要以显露对德国人过分友好……而伤害法国人的自尊心"，否则会促使他们同英国人接近。[③] 这时，拉法洛维奇还没有料到，与他在这里所说的在财政范围内的小小的表示同时，正在准备一次规模甚大的"友好"表示。

---

① 见科科夫佐夫 1904 年俄历 10 月 8 日发往巴黎给涅利多夫的信（《俄国财政》，第 33 号）。

② 见科科夫佐夫俄历 10 月 20 日给涅利多夫的信（《俄国财政》，第 34 号）。门德尔松离开彼得堡返回德国之后，"极其秘密地"通知比洛，俄国明年需要十亿马克，其中一半将在德国筹措，另一半在法国筹集〔见《德国外交文件》，第 19 卷，第 2 分册，第 388 页，比洛 1904 年 10 月 20 日（11 月 2 日）的报告〕。

③ 见涅利多夫 1904 年 10 月 25 日（11 月 7 日）给科科夫佐夫的信和拉法洛维奇 11 月 8 日（21 日）给科科夫佐夫的信（《俄国财政》，第 35、36 号）。

另外一起偶然的事，就是赫尔事件所掀起的轩然大波。其时，威廉利用了这次风波以促成俄德同盟的建立。威廉于 10 月 14 日 501
(27 日) 4 时 28 分发出的电报，使尼古拉“对英国的行为气愤填膺”，因为英国“发出的照会犹如晴天霹雳，提出了使人完全不能接受的条件”。威廉在电报中建议组织“三个最强大的大陆国家实力雄厚的同盟”(即俄、德、法三国)以对付英国，因为英国正以不准德国供给俄国舰队煤炭，因而就是阻止俄国舰队继续开往远东来进行威胁。威廉还声明，他“对(来自英国)的此种非正义的威胁”，“无论何时一分钟”也不退让。尼古拉立即作出了回答，建议“起草这个条约① 的草案”，并赞同说，俄国和德国“只要一同意这个草案”，“法国就会和自己的盟国(俄国)一致行动”〔尼古拉 10 月 16 日(29 日)的电报〕。10 月 17 日(30 日)，威廉随信附送了已经拟就的草案。它是威廉和比洛一起草拟的，甚至似乎连德国外交部都不知此事。②

根据不久前公布的文件看来，同盟条约问题绝不是两位皇帝个人秘密外交的产物。③ 在那些日子里(更准确些说比沙皇还早两天)，德国方面就曾和俄国驻柏林大使奥斯坚-萨肯男爵谈过此事，因为德国外交部参事弗里茨·霍尔斯泰因男爵已将类似的草案通知了奥斯坚-萨肯男爵。奥斯坚-萨肯在 10 月 14 日(27 日)的一封“务须亲启的”信中将此事通知了拉姆斯多尔弗，而且表示了自己的印象，即德国在此负有双重使命：或者“使我国与法国的同盟破裂”如果法国拒绝支持俄国反对英国；或者德国得到俄、法两国 502
关于支持反英的保证。但是，奥斯坚-萨肯建议不要把德国的提议

① 指三国同盟条约。——译者

② 见于《威廉二世和尼古拉二世通信集》，第 70—72 页。

③ 即对他们各自的外交大臣保密。见《1905 年毕由克缔结的俄德条约》(载《红档》杂志，1904 年，第 5 卷，第 6—49 页)；并见《德国外交文件》，第 19 卷，第 1 分册，第 135 章，第 300—350 页。

"当作一项寻常的诡计",而要认真利用柏林的此种情绪,因为在远东反对俄国的"英美联合""的目的是不让我们得到我们的胜利果实"。

拉姆斯多尔弗于10月16日(29日)将奥斯坚-萨肯的这封信呈送尼古拉,那时尼古拉已经收到了上述威廉的电报。当时,拉姆斯多尔弗"完全"承认"有必要同德国更加密切地接近",但他反对在以英国为一方和德、俄为另一方可能发生的冲突中就法国的态度问题对它提出某些"绝对的质询"。他立即从尼古拉的批示中得知,尼古拉"并不完全同意"他的主张。尼古拉写道:"你将从我给德皇的回电中看到,当前我竭力主张同德国和法国达成这样的协定,因为这将使欧洲摆脱英国过分的无耻行径,并将对未来极为有利。"这就是说,前面引用的沙皇10月16日(29日)给威廉的复电的原由,拉姆斯多尔弗是一清二楚的。在复电中,尼古拉认为,在德国和俄国接受条约后,法国随之必"将"参加这个条约。而拉姆斯多尔弗以后也被吸引到拟议中的协定中去了。

威廉10月17日(30日)由柏林寄给尼古拉的信中所附的条约草案是比洛起草的,尼古拉"读着就大笑起来",并电告威廉,"将于数日后答复"。[①] 为了草拟对案,尼古拉于10月20日将拉姆斯
503 多尔弗召到皇村,并指示他必须"维护自己的利益,但也不要损伤对方作者的自尊心"。使尼古拉发笑的是德国草案中的下列各点:(1)防御同盟条约只在日俄战争时期有效;(2)草案各处的用语只提到双方("缔约双方");(3)不是由俄国,而是由"两"国就"法俄同盟条约"的义务"提醒"法国,并且(仅仅)"在需要时"才这样做;(4)如果德国在战争期间的行动(亦即供给俄国舰队煤炭一事)成为发

① 见《红档》杂志,第5卷,第12页,尼古拉1904年10月20日给拉姆斯多尔弗的便函;并见《德国外交文件》,第19卷,第1分册,第6120号,比洛10月17日(30日)给威廉的奏疏,并附有给尼古拉的复信稿和条约文本。

生冲突的借口，那末，条约中的一项专门条款（第三条）使新同盟在俄日战争以后的时期依然有效。

拉姆斯多尔弗与此相应拟就了自己的条约草案：（1）泛提“缔约各方”，而不用“双方”；（2）删去了“由双方”“提醒”法国和“在需要时”等字样，而代之以俄国一方采取“必要步骤”，使法国“了解”条约，并“敦促”其参加；（3）增加了一条关于“倘若在俄日两国进行和谈时期发生困难”，协定有效期加以延长的条款。[①] 我们看到，拉姆斯多尔弗的对案把俄国方面参加谈判的总共三人的观点，很难得地归纳到一起了：全部删去了刚才指出的有关法国的那些笨拙提法（拉姆斯多尔弗的观点），注意到了在和日本缔结和约时“英美联合”的危险（奥斯坚-萨肯的看法），毕竟缔结了对德协定（尼古拉的主张）。俄国的对案就以这样的形式由尼古拉于10月25日（11月7日）附在一封“亲切的信”中寄到柏林。[②] 如果威廉同意这个草案，就只剩下签字了。接着就是履行条约的第一款，设法 504
使法国“了解”条约，并敦促其以“盟国的身份”参加进来。九个月后，1905年7月在毕由克发生的事（在俄国外交大臣没有参加并未曾得知的情况下达成了与俄法同盟条约平行的俄德同盟条约），几乎在1904年10月在拉姆斯多尔弗伯爵的参与和同意下就要发生。

但是，威廉又提出了修改意见，所以事情就挂起来了。根据我们所掌握的资料判断，修改意见本身没有引起直接的反对，但其意思看来使尼古拉犹豫起来，是否应当先给法国人看看草案。事情是这样的，威廉建议删去直接提到当对日和谈可能遇到“困难”时同盟条约继续有效的提法，代之以德国“不参与”可能隐藏着与俄

① 见《红档》杂志，第5卷，第12页。

② 在俄国的出版物中没有尼古拉的这封信。原文见《德国外交文件》，第19卷，第1分册，第6124号。引文摘自威廉11月4日（17日）的信（《红档》杂志，第5卷，第17页）。

敌对的意图的"任何行动"这一笼统含混的修改意见。威廉还主张删掉所有提及日俄战争之处，使条约无限期有效(在条约废除前一年预先通知)。正如威廉所解释的，如果不加上述修正，"全世界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说我们不是在建立防御同盟，而是在建立某种类似公司的东西以达到吞并的目的"(自然是在远东)。

结果，向尼古拉提出了这样的建议：(1)在未来的和会上，说不定还可能是在大会上，要准备愉快的孤立；(2)这个同盟不是以此次战争的困难时刻为对象的，而是用于一个原则上不确定的可长可短的时期，并是以欧洲本身形成的总局势为对象的。① 11 月 10
505 日(23 日)，尼古拉向威廉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作为答复：允许法国人在条约草案签字以前预先了解这份草案。根据已经发表的文件，目前还没有过硬的材料足以证明，这是根据拉姆斯多尔弗的坚决主张作出的，而不是尼古拉本人的主见。② 尼古拉于 11 月 13 日(26 日)又收到威廉的一份电报，其中提出，与其预先将条约通知法国，而法国再通知英国，因此招致"灾难"，还不如"不缔结任何条约"为好。只在这时，尼古拉才将这份电报和威廉的其他电报都交给拉姆斯多尔弗去"分析研究"。③ 拉姆斯多尔弗 11 月 15 日立即呈交了"研究结果"。这是一份不仅内容已准备就绪、而且辞句也经过润色的材料，它详尽地论证了要把"威廉皇上如此卓越地深思熟虑的"这个草案预先介绍给法国的问题。显然，尼古拉准备利用

① 见《红档》杂志，第 5 卷，第 17—21 页，威廉 11 月 4 日(17 日)的信和德国的对案。三个人都在这封信上花了极大的功夫：作者是比洛和霍尔斯泰因；翻成英语的译者是威廉(用了七小时)。见《德国外交文件》，第 19 卷，第 1 分册，第 313 页，威廉的批示及编者的注。

② 尼古拉 1904 年 11 月 10 日(23 日)给威廉的电报见 E. B. 泰勒：《西方与俄国》，第 207 页，(又见《威廉二世和尼古拉二世通信集》，中央档案馆出版社，第 83 页，这份电报未署日期)。

③ 见《威廉二世和尼古拉二世通信集》，第 83 页，威廉 1904 年 11 月 13 日(26 日)的电报；拉姆斯多尔弗的报告("研究结果")见《红档》杂志，第 5 卷，第 22—23 页。

这个研究结果，试图再次说服威廉。拉姆斯多尔弗在向沙皇呈送“研究结果”的同时，还呈递了一份“关于可以告知法国政府的绝密通知书”，以备在说服威廉的企图成功时用。这份备忘录是以第一人称，即以尼古拉本人的口气拟成的。①

这些文件在沙皇那里耽搁了十天，于11月25日才送还外交大臣。在此以前，11月24日(12月7日)，尼古拉已经准备将自己对法国人的通知书的草案附在一封亲笔信中寄给威廉，征求他的赞同。现在，我们只是从柏林档案馆中才得知这封信的。② 但是已经晚了，因为柏林根据尼古拉11月10日(23日)的第一次回电，506
认为事情靠不住，而且为时过早，于是决定，暂且缓慢地使关于同盟的谈判成为过眼烟云，“把未来俄德协定的可能性作为悬而未决的问题留给沙皇”。③

柏林提出了一个局部问题来代替关于同盟的问题，即一旦德国为煤的问题与英、日发生冲突，俄国可向德国作何种保证。威廉将有关这一内容的信发往圣彼得堡也是在11月24日(12月7日)，正是尼古拉随信发出关于“预先”通知的草案的日子，这两封信在道上错过了。威廉“并不想催促”尼古拉就共同“防御条约”作出答复，但他坚决警告，如果尼古拉不担保，当英国进攻德国时，俄国将与德国“真诚地并肩作战”，德国就将“立即”停止供应煤。④ 俄国在

① 见《红档》杂志，第23页。

② 见《德国外交文件》，第19卷，第1分册，第6131号，第322—324页，尼古拉1904年11月24日(12月7日)给威廉的信和《通知书》(它与刊载在《红档》杂志第5卷第23页的文本是完全吻合的)。如果威廉不同意以所建议的方式事先知照法国，尼古拉提出，将条约中所有提到法国的字样统统删去。

③ 见同上，第316—319页，威廉在收到尼古拉的电报后于11月10日(23日)给比洛的信，比洛11月11日(24日)呈给威廉的报告及所附的11月13日(26日)送往圣彼得堡的复电稿。

④ 见同上，第1分册，第6129号，比洛1904年11月23日(12月6日)给阿尔文斯勒本的信。威廉11月24日(12月7日)的信载《威廉二世和尼古拉二世通信集》，第85页。

11 月 29 日(12 月 12 日)的照会中作出了所要求的承诺，这时，比洛从英德关系的观点出发将有关共同防御条约的问题，提请德国驻伦敦大使审议。大使指出了签订该条约可能引起的种种危险性。只是在那时，威廉才答复了尼古拉 11 月 24 日(12 月 7 日)的来信。威廉的复信证明，他在法国问题上坚持自己的看法："在我们未达成最后协定之前，不将我们的谈判告诉法国"，否则，"参加
507 者倒不如照旧完全各干各的为好"。① 但是，尼古拉也同样坚持自己的主张。② 于是谈判就此中断，在半年中事情毫无进展。

"对德国过分友好的表示"，在 1904 年 12 月已最终结束，因为当时情况已经无论如何不适宜于做这种表示了。10月间，当俄国准备做出这种表示时，赌注还下在旅顺口，所指望的是罗日杰斯特文斯基舰队将给要塞带来优势地位，并希望，全部指挥权集中到库罗帕特金手中(阿列克谢耶夫于 10 月 12 日离职)，将从陆上缓和要塞的处境。那时，俄国人还在以下述想法安慰自己：把最后一个日本人从满洲赶出去之后将缔结胜利的和约，在取得胜利果实时，可用预先专门准备好的一支新的武装力量对抗"英美联合"。③ 如今在 12 月间，让要塞听其自然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和平退到了遥遥无期的将来，在国内又不得不做出某些让步(12 月 12 日的

---

① 见《德国外交文件》，第 19 卷，第 1 分册，第 6137 号，拉姆斯多尔弗 11 月 29 日(12 月 12 日)的照会；第 6139 号，比洛公历 12 月 16 日向德国驻伦敦大使梅特涅伯爵提出的问题清单，以及第 6140 号，梅特涅 12 月 18 日的奏疏；并见《威廉二世和尼古拉二世通信集》，第 87 页，威廉 1904 年公历 12 月 21 日给尼古拉的信。

② 见同上，第 6145 号上载有尼古拉 1904 年 12 月 12 日(25 日)的复信。信中只涉及有关"煤的声明"，意思是，它是"我们方面一项明确的保证，因而，德俄两国可以镇静自若地维持数月前所采取的行动方式"。关于共同的条约尼古拉却只字未提。威廉把这理解为是"明显地拒绝不预先通知法国的任何协定"。只有比洛安慰他说，俄国尚未就与德国结盟的可能性作出正确评价(见同上，第 346—347 页)。

③ 早在 1904 年 6 月，尼古拉就"安慰"阿巴扎说："俄国到 11 月前将在各地建立新部队，以抵补开往东方的部队，那时我们的军队就将达到战争开始前的数目"，见 Б.А.罗曼诺夫：《1904 年夏季的别佐勃拉佐夫派》，载《红档》杂志，第 17 卷第 76 页。

上谕)。而在国际关系方面,正如拉姆斯多尔弗所说的,"不得不使自己的欲望适应于"军事和财政现状的"可怕的警告"。

早在10月间,威廉、尼古拉和奥斯坚-萨肯都同时提出了在英美联合的情况下缔结和约的问题,在他们的撺掇之下,拉姆斯多尔 508
弗在 10 月 19 日的奏折中声言:"倘若我们现今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和自己的全部力量都集中于达到"彻底胜利的目的,"那将是一个无法补救的错误","我们忽略了……俄国将面临另外一项同样艰巨而意义重大的任务,这就是巩固以重大的牺牲为代价所得到的一切"。因此,他说,"关心在战场上集中大批陆海军以弥补损失是不够的,另外,还应当事先考虑和寻求在战争结束之前加强俄国总的战备的各种办法"。① 拉姆斯多尔弗的这个声明引起了对战争的第一年结束前国家所拥有的军事和财政方面的实际可能性的估计(科科夫佐夫 1904 年 11 月 19 日的奏折),这个估计使人无可怀疑,最高的和平纲领纯属空想。

在谈判之前加强俄国的战备是根本无从谈起的,理由是:(1)俄国 1905 年全年在它唯一可以利用的法国、德国和荷兰市场上,总共只能筹集到总数不超过五亿卢布的外债;(2)按每月六千万卢布计算,这笔款子勉强够用八个月;(3) 1905 年的日常预算将有四千万的赤字,亦应由这笔外债弥补;(4)增加现行的税收,可能勉强 509
抵补外债的利息,而科科夫佐夫认为现行税收已经达到最高限度,并有使国家经济遭到破产的危险。因此,"一旦与其他国家(日本除外),发生军事冲突,大量军备支出"的任何想法都是自然而然要落

① 见拉姆斯多尔弗 1904 年 10 月 28 日给科科夫佐夫的信,信中引用了他 10 月 19 日的奏折(《俄国财政》,第 39 号)。拉姆斯多尔弗在此提到了我们前面(第 306—307 页,第 312—313 页)已经谈到的 1901 年春季的事件,当时,鉴于俄国外交界在满洲问题上采取的决定性步骤,他同样提出了关于计算俄国在物质方面的可能性的问题。因此,可以设想如今拉姆斯多尔弗是否也打算利用这种大臣之间讨论问题的方式,对某些大臣的炽热幻想泼一瓢冷水,那些人竟以为俄国在这次战争中没有被束缚住手脚,而且战争的最终结局并非完全取决于世界范围内各国之间的复杂角逐。

空的。[①] 拉姆斯多尔弗在他 12 月 25 日给科科夫佐夫的最后一封信中写道，“这句坦率的话可以作为我们未来企求的尺度，也是对那些危险的欲望的严厉警告，当着俄国依靠上帝的帮助胜利地击溃自己的敌人时，这种欲望是随时可能产生的”。[②] 对于同 11 月间（其时财政大臣正在准备那道使人清醒的奏折）差点实现的方案[③] 相类似的那些外交方案，立刻就有了一个“尺度”，这就是：为了能在整整八个月中使战争持续下去，必须把三个金融市场统统保持住。

根据 1904 年 12 月 15 日的上谕，德国市场刚刚征集了二亿三千一百万卢布的贷款，并将于 1905 年全年内分批以小额款项交给俄国国库。该轮到巴黎市场了，据估计，它的份上不会少于二亿七千万卢布。法俄同盟又面临着第二次考验，而这次考验不是来自俄国方面的。

IV

510 1 月 9 日的事件和相继而来的 1905 年的革命运动急剧改变了战争的前景，并动摇了俄国稳定的国际地位。处于战争和革命夹攻之中的俄国，明显地失去了它作为一个强国和世界舞台上老资格成员的威信。此刻最重要的是俄国的信誉在法国遭到了不可弥补的打击，到 2 月中旬，这种不信任已具有了普遍性。[④] 巴黎

① 见《俄国财政》，第 40 号，科科夫佐夫 1904 年 11 月 19 日的奏折。

② 见同上，第 41 号。

③ 尼古拉建议将防御条约预先通知法国人，此项建议并“不”使威廉感到“惊讶”，正是在借债问题上尼古拉是没有任何理由反对法国人的〔见《德国外交文件》，第 19 卷，第 1 分册，第 6126 号，威廉 1904 年 11 月 10 日（23 日）给比洛的信〕。

④ 有趣的是，彼得堡工厂的运动是 1 月 3 日开始的，而巴黎市场从 1 月 5 日起就开始对“彼得堡事件”作出了反应：1 月 9 日下午 4 时 7 分，那个佩特罗科基诺从巴黎电告科科夫佐夫说：“四天来，许多预先认购了最近这次俄国债券的人都取消了他们的预约”，还说：“这使所有信贷机关的经理非常沮丧”〔见财政部办公厅秘书处 1904 年第 1 号卷，佩特罗科基诺 1905 年 1 月 9 日（22 日）的电报〕。

交易所经纪人的代理人韦纳伊拜访了俄国大使，并转告说，法国总统和内阁总理对“俄国事件可能在法国引起的反响”表示极度不安。在这些事件之前，俄国对于社会主义者的报纸和仇俄报纸对俄国信誉的攻击所造成的影响尚能进行斗争，但是，“现在一切都变了。迄今为止战争连续遭到了一系列的挫折。关于国内状况的报导使人惊恐万状”，又“没有任何道义上的办法能同报纸相对抗”，而报界则每天早晨都在群众中间散布令人惊慌的消息。持有我国公债券的人纷纷跑来向银行和交易所经纪人询问未来的情况和售出债券是否有利。“够了，事情已经开始，这将是一股真正的巨流”。“反对我们的将是所有的人，从最低下的仆役和工人到最富的阔老大亨，因为他们全都投资认购了俄国公债。对于当地政府来说，此事的结果必然是对内阁的猛烈攻击。鲁维埃和德尔卡赛都不能抵御这种打击，与俄国的同盟也将同他们一起每况愈下”。[①] 涅利多夫在报告这些情况时，正确地指出，在这种形势下，根本的办法就是恢复俄国治安，然而停止战争本身却根本不可能对此有任何帮助[②]。于是韦纳依（科科夫佐夫后来气愤地称他为 511
“官方人士”）“提出了一项要求”：按每年三百万法郎算，付出七十五万法郎作为最近三个月的报纸津贴，还说：“很难找到适当的语言表达这项要求的意义。”[③]

虽然发生了上述种种情况，但正是这时，当着门德尔松规定的法国市场两个月（1904 年 12 月 15 日到 1905 年 2 月 15 日）不发行俄国公债这一期限刚满时，法国银行家就来到彼得堡进行谈判，据此看来，可以认为在整个这阵喧嚣中，并非没有某种程度的预

① 见涅利多夫 1905 年 2 月 17 日(3 月 2 日)给拉姆斯多尔弗的信(«俄国财政»，第 44 号)。

② 参见«红档»杂志，第 19 卷，第 73 页，维特 1905 年 1 月 19 日给库罗帕特金的一封绝望的信。

③ 见科科夫佐夫 1905 年 3 月 4 日的信(«俄国财政»，第 49 号)。

谋。[1]科科夫佐夫甚至直接指出，在1904年12月的某些订货中，德国厂商较之法国厂商得到了特别的优待，所以除了报界外，法国工业界也不满意。现在科科夫佐夫准备象以前一样，多付一百五十万卢布给法国人来订购榴霰弹，只是要求在确定借款数额和价格的决定性时刻之前要有"好的舆论"。所以财政部在收到韦纳伊的要求后，立即从三个月报纸津贴费的帐上拨出二十三万五千法郎交给拉法洛维奇支配。[2]总之，不管韦纳伊如何叫苦，法国政府目前还不会直接禁止对俄贷款。

俄国政府与里昂信托银行的代表、巴黎霍丁格尔公司银行及巴黎荷兰银行的代表谈判之时，正是奉天战役进行之日。谈判延续了"相当之久"，因为银行家"每当收到战场上的新消息后，就认
512 为必须拍电报请示总行"。不管怎样，谈判还是进行到底了，2月27日前起草并审阅了合同（奉天失守的消息是2月25日传到彼得堡的），28日，内斯兰和霍丁格尔去见了财政委员会主席，并向他报告，事情已经顺利办成，随后在科科夫佐夫处共进晚餐。次日，3月1日，他们就应当在上午11时以前签署合同的文本。但是接着发生了一件前所未有的极不光彩的事：银行家们在约定的时刻没有露面，却送来了一份书面通知，说他们在28日至3月1日的夜间接到了拒签合同并返回巴黎的命令。[3]无须到以后的通信中去寻找提及此事的文字，便可断定，这一命令是按照法国政府的要求下达的。所发生的事情只有一个含义：法国决不贷款给俄国政府，因为俄国既在同革命作斗争，同时又在打仗，而在这两条战线上失败的征兆又都已显而易见。

早在1904年10月，在旅顺口陷落之前，门德尔松-巴托尔德

① 见《俄国财政》，第44号，第131页。

② 科科夫佐夫1905年2月26日的信（同上，第46号）。

③ 见科科夫佐夫1905年5月10日（23日）给涅利多夫的信（《俄国财政》，第58号）。

到彼得堡交涉对俄贷款的事宜时，曾周旋于当地的“银行界和商界”，他得到了这样的印象：在这里，在国家绝大多数居民之中，普遍有一种要求“立即实现和平”的愿望，只有宫廷、军人和“官方人士”固执“坚持”战争。当时科科夫佐夫也附和这些“官方人士”。①可是现在就连科科夫佐夫也不能不懂得，战争已经到了头，“在奉天败退之后”（现在可以看出，亦即在法国贷款问题上发生粗暴的转变之后），他向尼古拉呈递了一道“详细的奏折”，奏明不能再继续进行战争了。② 这道奏折在“3月初”在“一次由尼古拉·尼古拉 513
耶维奇大公主持的特别会议”上进行了研究，虽然奏折上所列举的“结论”都是财政性的，而且都是依据准确计算得来的，似乎无可争辩，但奏折的“结论”却没有为会议所肯定。科科夫佐夫指出，十三个月的战争已经花费了十亿卢布，如果战争再延续下去，还需要这样“巨额的支出”；又说，“准备用于战争的全部款项”，已经彻底“告罄”；若在国内征集信贷，势必引起“我们整个金融系统的彻底混乱”；最后，他说，“想靠借外债取得必需的资金或者完全不可能，或者会遇到近乎不可克服的困难”。③

我们看到，科科夫佐夫毕竟仍然保留有一线希望，认为在国外搞到钱不是绝对不可能的，从而削弱了自己的立场。而尼古拉显然正是钻了这个空子，决定无论如何要弄到钱，继续战争。科科夫佐夫于1905年4月初弄到了一笔钱，但这也是战争期间的最后一

① 见《德国外交文件》，第19卷，第2分册，第6167号，比洛1904年公历11月2日就门德尔松彼得堡之行后告知的情况所作的奏疏。

② 见《红档》杂志，第6卷，第14页，科科夫佐夫在1905年6月20日给拉姆斯多尔弗的信中提到，这道奏折是他（科科夫佐夫）呈递的。

③ 我们在财政部的档案中，还没有找到科科夫佐夫奏折的原件。但是保存有科科夫佐夫1905年3月13日给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的参谋长 Ф. Ф. 帕利增将军的信的抄件，随信附送了“您（帕利增）所知道的我对于进行战争的财源问题的意见的结论”，在抄件中还夹有一张信纸，上有科科夫佐夫用铅笔写的九点“结论”，署的日期是“3月13日”，承办特别事务的官员多尔利阿克注明“当天发出”。我们在《红档》杂志上，在题为《日俄战争的终结》一文中发表了“结论”全文。

笔外债了(而且，考虑到俄国国库的情况，是一笔短期贷款)，这次当然是柏林援救了尼古拉。① 只是贷款数额比应借的数字和 2 月
514 间指望从法国人那里得到的款数少了一半，不是三亿卢布，而只有一亿五千万卢布。这次借款实质上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只是延长了时间，足以在战斗中遭到新的失败。奉天战役以后，俄国在满洲战场上的陆军力量已经溃乱，为了要使这些部队重新具有足够的战备，这笔借款所能延长的时间就显得太短了。

门德尔松此次承担的贷款的绝对利息是如此之高，实息竟达七厘，致使法国银行家在一段时间内怎么也不能甘心，而且在以后的来往函电中一直谈论在巴黎借款这一话题。巴黎荷兰银行的负责人贝纳克在谈到门德尔松的胜利时并不掩饰自己的气愤，并劝拉法洛维奇必须让科科夫佐夫直接去找鲁维埃，因为只要他说一句话，"借款就将毫不费力地达成"。② 于是科科夫佐夫没有反对重开谈判，何况法国驻彼得堡大使返回巴黎之前也同他谈过 2 月的"挫折"。博姆帕尔捎回了一封叙述往事的特别信件，同时委托涅利多夫同鲁维埃晤谈，"以弄清法国政府的观点"，并向鲁维埃指
515 出，尽管 2 月事件对沙皇产生了"不良印象"，但是，恢复谈判从俄

① 奉天失利的第一个印象几乎使威廉采取一个错误的步骤：他认为俄国军队在不久的将来可能被"消灭"，并准备向日本人表示好感(答应不反对日本人占领旅顺口，甚至向天皇祝捷)。然而，比洛得以阻止了这一步骤。而另一种主张又在柏林占了上风，即"如果沙皇坚持"不同意维特同"一切自由派"立即媾和的主张，则"沙皇的境遇将会好转，而日本人的境况将会变坏"。坚持媾和的恰恰是"日本的朋友"和"沙皇制度"的敌人这一情况，使得比洛坚信，"时间将对俄国有利"，他怕立即媾和将导致尼古拉被刺和在维特积极参与下的米哈依尔的摄政，而这很容易使沙皇的君主国变为共和国，从而给德国带来"严重的危险"。威廉很快同意了这一意见，他决定对此不承担责任，并且不以调停的建议加以干涉，看来，当时罗斯福也不反对敦促德国去进行调停〔见《德国外交文件》，第 19 卷，第 2 分册，第 6187、6189、6191、6295 和 6296 号，1905 年 2 月 26 日(3 月 11 日)——3 月 17 日(30 日)的来往函电〕。关于奉天惨败在满洲俄军中的印象见利涅维奇日记(《日俄战争史料集》，第 90 页，2 月 28 日所记)："到处都在议论，2 月 28 日将要媾和"。

② 见拉法洛维奇 1905 年 5 月 2 日的信(《俄国财政》，第 52 号)。

国政府方面“是不会遇到障碍的”。①

过了六天，即5月16日，在对马海战的消息尚未公布时，拉法洛维奇已经从巴黎写信回来说，“又有了贷款的空气”，好象银行家的使者又被派到俄国去了。不但如此，而且在对马海峡战况公布以后，拉法洛维奇也不怀疑，“(银行家)希望与俄国开展巨额的信贷业务，以便利用金融市场的现状赚钱，这种愿望是由对门德尔松的成就的嫉妒而产生的”。而且“在所有这一切的后面还隐藏着和平不可避免的思想”。贝纳克直率地说：“即使你们在陆上打了败仗，你们仍能在这里找到钱”。拉法洛维奇认为，“法国公众”(不是银行家)对俄国只有一点“成见”，这就是“帝国的内部状况”。②同时，科科夫佐夫获悉，鲁维埃“表示了一种意见，为了在此事中取得成功，现在不要对银行家施加任何大的压力”。

这实质上是以委婉的方式拒绝了贷款，并要拉法洛维奇如今对银行家施加影响，以便让他们自己主动提出科科夫佐夫5月28日提出的事，这是从他这方面所作的闯入紧闭的大门的一种尝试。③实际上，涅利多夫5月28日所写的第二封信认为，不管为了继续战争，或是为了避免在和平谈判时陷入绝境，反正一样，希望得到法国的财政支持的尝试是完全没有希望的了。据涅利多夫说，鲁维埃装成很惊讶的样子：银行家怎么能责怪他不赞同2月贷款。鲁维埃“干脆地”表示，现在“就法国政府的观点看来”，未来的对俄贷款不会遇到“任何阻碍”。他甚至补充说，在门德尔松4月 516
贷款后，银行家曾在他面前抱怨俄国对法国市场的“忽视”，而他回答说：“这是他们自己的过错，他们应该自己努力补救”。这好象还是“对马海战之前”的事。鲁维埃令人沮丧地结束了他的解

① 见科科夫佐夫1905年5月10日〔29日(原文如此。——译者)〕日的信，信中提到“前几天启程的”博姆巴尔(《俄国财政》第53号)。

② 拉法洛维奇1905年5月25日(6月2日)的信(《俄国财政》，第55号)。

③ 普季洛夫1905年5月28日(6月10日)给拉法洛维奇的信(同上，第56号)。

释:“最近,银行家们不再来拜访他了。”①

俄国政府在签订对日和约之前,也不再企图利用法俄同盟了。

V

在当时的国内事态下,在对马海战之后再继续战争,直接从皇朝命运的观点看来,乃是件丧失理智的事。在彼得堡,这一点即使对那些在奉天战役之后还继续抱有希望的人,也变得清楚了。因此在一些日子里曾对开始和谈的问题作出了肯定的决定。威廉本人也急剧地改变了方针,如今他认认真真地谈起了和平的必要性,以防尼古拉横死,以防由此而来的(据他的看法)对于俄国的“灾难性”后果和对“其他国家”的“危险”。于是,他毫不费力地谈到了罗斯福的干预,而直到对马海战之前,罗斯福还认为延长战争从而使“两国”“两败俱伤”对其他大国在远东的“利益是有利的”。②

517 尼古拉当时正处于对他本人十分困难的境地,威廉 5 月 21 日

① 《俄国财政》,第 57 号,涅利多夫 1905 年 5 月 28 日的信。

② 早在 5 月初,比洛认真估计了“俄国在海上胜利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将确立美国所希望的俄日在远东的“均势”〔见《德国外交文件》,第 19 卷,第 2 分册,第 6306 号,比洛 1905 年 5 月 17 日(4 日)给德国驻华盛顿大使的电报〕。就在那时,罗斯福得悉德尔卡塞的调停意图后,便向日俄两国大使进行试探。两国大使都表示,“他们的政府坚决主张继续战争”:俄国寄希望于海战胜利,日本指望自己对哈尔滨和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决定性进攻〔这就使罗斯福有理由表示两败俱伤是有利的这样一种想法,见同上,第 6310 号,德国驻美国大使施佩克·冯·施特恩贝格同年 5 月 11 日(24 日)发自华盛顿的电报,其中叙述了罗斯福的谈话〕。美国驻柏林大使 5 月 22 日 (6 月 4 日)致电罗斯福,内称,威廉托他转告罗斯福,“他(威廉)认为俄国形势是如此严重,最近失败的真相一旦在彼得堡为人所了解,沙皇就有生命危险,所以威廉向沙皇建议,由大总统进行调停〔见泰勒·丹尼特:《罗斯福与日俄战争》,纽约 1925 年版,第 217—219 页,托尔 1905 年 5 月 22 日(6 月 4 日)的电报和同年 5 月 27 日 (6 月 9 日) 给罗斯福的信〕。罗斯福在收到美国驻柏林大使的电报后,5 月 23 日 (6 月 5 日),他就向冯·朗格尔克·迈耶发出了电报指令,命他向沙皇提出调停建议〔见《德国外交文件》, 第 19 卷, 第 2 分册,第 6314 号,罗斯福 5 月 23 日(6 月 5 日)给冯·朗格尔克·迈耶的电报, 迈耶应将此电转递给尼古拉〕。

(6 月 3 日)有关这一微妙问题的信发生了无与伦比的作用。[①] 这封信用通常的道理极其详尽地不仅论证了停止战争的必要性，而且说明必须这样做。威廉在信中还提议由他亲自出面调停，以使尼古拉无须有失尊严地去寻求调停。信的最末几行写得很清楚，"和平的基础"已经奠定，只要沙皇召见美国大使，谈判的机器就将适当地开动。最后，威廉和罗斯福之间的"友谊"在以后也会帮助尼古拉，这是一种影响谈判进程的对尼古拉自尊心伤害最少的途径。[②] 因为在法国拒绝贷款之后，谈判就会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俄国显然已经绝不可能在必要时中断谈判了。

至于谈到法国，它在中断了一段时间之后，当俄国全权大使启 518
程前往朴茨茅斯的前夕，又投到俄国财政活动中了；而与英国则实行了"克里米亚"式的结合。从俄国驻伦敦大使 6 月 29 日(7 月 12 日)的信中我们得知，在法国与俄国谈判中断的一个月里，法国银行家们同伦敦交涉了有关"和约签订后"伦敦参加对俄贷款的问题。同时规定不让犹太人罗士查尔德的银行参加，因为它在"犹太人问题"上制造了"困难"，而"巴林兄弟"的银行却出场了，并提出承担此事要有两个条件：(1) 如果俄国改变敌视英国的政治立场；

① 见《威廉二世和尼古拉二世通信集》，莫斯科 1923 年版，第 102 页及以下各页。

② 威廉 1905 年 5 月 21 日(6 月 3 日)的信在彼得堡是 5 月 23 日收到的，朗格尔克·迈耶在收到指令后"于次日"(即 5 月 24 日)请求觐见，尼古拉在 25 日接见了他。就这样，尼古拉无须如同威廉所建议的那样请求威廉"同罗斯福接触"，更无须"召见"美国大使。对于喀西尼关于美国建议调停的通知，拉姆斯多尔弗是 5 月 24 日回答的。答复声称，俄国"既不能请求和平，也不能请求调停"，还说，在不知道日本人的条件时，和平谈判是无从谈起的。拉姆斯多尔弗的答复与尼古拉接着于次日[5 月 25 日(6 月 7 日)]作出的同意采纳罗斯福提议的表示是不一致的，这种矛盾或许可以这样解释：拉姆斯多尔弗未被召请参加俄历 5 月 24 日尼古拉亲自主持下在宫廷召开的那次"军事会议"，在这次会上通过了呼吁调停的决定(与会者全是军人，其中有弗拉基米尔和阿列克谢耶夫大公。弗拉基米尔最坚决主张采取步骤进行媾和的尝试，尼古拉也同意他的主张。见《德国外交文件》，第 19 卷，第 2 分册，第 425 页和第 426 页；见前引泰勒·丹涅特的著作，第 223 页和第 192 页；《红档》杂志将登载 5 月 24 日的会议记录和速记的发言记录)。

(2)如果俄国国内将出现“令人信任的事态”。[①] 不用说，第二个条件当时是办不到的，因为，正如“巴林银行”代表雷维尔斯托克勋爵在一个月后用密码解释第二个条件的意思时所说的，恰恰相反可以认为，6 月 18、19 日所发生的《波将金》事件，只是一个开始，只是“自然会损害俄国信誉的那种突然的严重事件的”前兆。但就是如今，在 7 月中旬，雷维尔斯托克(宾肯多尔弗遵照彼得堡的直接嘱咐，向雷维尔斯托克进行了询问)还认为：“(正式谈判)的条件还不成熟。”[②]

同英国银行家相反，法国银行家在这整段时间里没有与俄国代表进行任何谈判。科科夫佐夫坚决主张，在经受了一次挫折之
519 后，不要主动去找法国人谈判。而且巴黎报纸因为 2 月津贴安静了一段时间之后，现在重又开始表现出“对俄国的冷淡了”，并“有意歪曲我们的情况”，尽管为了“讨好”法国报纸，二十三万五千法郎的按月津贴在 6、7 月份还是准时如数支付的。[③] 不论与英国，还是与法国，事情显然都在和平这一点上卡住了。[④] 但是，对于那些日子最为重要的，就还是那时俄国政府第一次面临的财政方面的严酷前景，即在和约签字之后，俄国为了“从财政险境中”拯救自己，只得付出改变对英国的“政治态度”的代价。而英国这时已打

① 见宾肯多尔弗 1905 年 6 月 29 日(7 月 12 日) 发自伦敦给拉姆斯多尔弗的信(《俄国财政》，第 58 号)。

② 见《俄国财政》，第 60 号，宾肯多尔弗 1905 年 7 月 18 日(31 日)给拉姆斯多尔弗的信。

③ 见同上，第 62 和第 63 号，拉姆斯多尔弗 1905 年 7 月 15 日给科科夫佐夫的信和科科夫佐夫同年 7 月给拉姆斯多尔弗的信。

④ 见《红档》杂志，第 19 卷，第 80 页，维特 1905 年 6 月 23 日给库罗帕特金的信，内称：“我们在国外的告贷门路已经完全堵死了。”并见《德国外交文件》，第 19 卷，第 2 分册，第 427 页、第 472—473 页，拉多林 1905 年 7 月 12 日 (25 日) 发自巴黎给比洛的电报，内称：“据传罗士查尔德及金融巨头(Haute Finance) 的其他代表正在与维特进行谈判，但是从各方面都肯定对我说，只有取得和平，才能得到大宗贷款”。并见同上，比洛 7 月 14 日(27 日)给威廉的电报，内称，鲁维埃告诉拉多林，“如果继续战争，在财政方面，俄国就绝无在法国筹款的希望”。

算要从朴茨茅斯会议上得到外交成果了。①

臭名昭著的《毕由克条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于 1905 年 7 月 11 日(24 日)签订的。这项条约似乎是威廉在《北极星》游艇上与尼古拉会晤时以准备就绪的形式向尼古拉"突然"提出的。② 从尼 520
古拉方面看,签订《毕由克条约》不是暂时困难的结果,这点从科科夫佐夫在一周后就该问题寄往朴茨茅斯给维特的通知中便可以看出。据科科夫佐夫的印象,尼古拉"对这次会晤极为满意,看来,他相信邻国的诚实态度"(7 月 19 日的信)。五天之后,7 月 23 日,他又写道:"皇上的情绪一直很好,看来,与德皇的会晤使他精神十分振奋。"③ 而且在公历 8 月 30 日前,尼古拉还将条约的签署绝对保守秘密,甚至瞒着自己的外交大臣。据拉姆斯多尔弗说,到

① 见科科夫佐夫 1905 年 7 月 19 日发往巴黎给维特的电报,电报请维特归国途中"在巴黎坚持申明借款的必要性,这是不致驱使我们陷入财政险境的唯一方法"(《红档》杂志,第 6 卷,第 23 页,我们发表的关于朴茨茅斯谈判的文件)。但是,甚至维特当时也不同意走"英国路线"〔见《德国外交文件》第 19 卷,第 2 分册,第 6198 号,第 427 页,拉多林 1905 年 7 月 12 日(25 日)的电报〕。

② 其目的正如比洛所说的,是要把尼古拉带到很远的地方去,以便在缔结和约以后,维特和拉姆斯多尔弗不能马上达成英、法、俄三国的协调一致(见《德国外交文件》,第 19 卷,第 2 分册,第 6202 号,比洛 1905 年 7 月 7 日(20 日)致霍尔斯泰因的电报)。

③ 见《红档》杂志,第 6 卷,第 22 和 24 页,科科夫佐夫 1905 年 7 月 19 日和 23 日给维特的两份电报。并不排除沙皇的"好情绪"也是由当时达尔姆斯塔特(父子)银行表示愿意贷款给俄国的建议造成的。但是,科科夫佐夫认为,所建议的四千七百万卢布的贷款,"全然不能满足"俄国的"需求",而为期九个月的短期贷款的条件,"只会使我们信誉扫地"。所以科科夫佐夫对此建议持"完全否定的"意见。允许达尔姆斯塔特银行参与对俄国贷款活动的问题由来已久,战争时期,尼古拉和某大公就这一问题曾有过"联系",对此科科夫佐夫一无所知。1905 年 1 月初,尼古拉曾向科科夫佐夫表示,"希望做一点对银行有好处的事",于是科科夫佐夫不得不由国家银行出钱在该银行开设信贷帐目,"并将该银行列入国家银行的代办行之中"。如今,在《毕由克条约》签字以后,达尔姆斯塔特银行希望俄国财政部"动员"门德尔松在即将对俄国贷款时吸收该银行加入他的银行团。但是,科科夫佐夫又坚决反对这点,原来,因为达尔姆斯塔特银行最近"积极参加了"签署对日贷款合同。关于此事,见财政部办公厅秘书处 1904 年第 1 号卷,科科夫佐夫 1905 年 7 月 25 日给拉姆斯多尔弗的信,这封信答复了拉姆斯多尔弗 7 月 20 日和 23 日关于达尔姆斯塔特银行提出的两项要求。

规定的日子，尼古拉才向他“承认了”（拉姆斯多尔弗的用语）“所有这一切”，因为往下再也瞒不住了，该条约在“对日和约签订之后”应即行生效。对日和约于俄历8月23日已在朴茨茅斯签字，现在
521 只待批准了。尼古拉向拉姆斯多尔弗公开了秘密，并解释了他沉默的原因。他说，似乎威廉取得了他的诺言，“只在日俄和约签字之后，才向大家公开”所签订的和已经生效的东西。①

就这样，事情刚转入拉姆斯多尔弗的手中，1904年10月所拟定的计划便立即付诸实施了：俄国在试探了法国参加反英的大陆协定的可能性，并得到否定的答复后，就向威廉提出了关于俄德同盟的义务对法国无效的补充声明，并声称，与法国的同盟是防御性的。根据我们现在所掌握的文件看来，这样一来，《毕由克条约》在形式上并没有取消，而在理论上却保持了针对所有国家（不包括法国，亦即针对英国）的防御意义，关于这一点，奥斯坚-萨肯在1905年11月16日的信中曾予指出，并且认为，这是最后两个半月所经历的外交“纠纷”中得到的积极成果。②

绝对没有任何根据设想，在1905年7月前，尼古拉会随便忘记1904年10月有拉姆斯多尔弗和奥斯坚-萨肯参与的《毕由克条约》的总预演。其中的微妙之处是，当时连尼古拉自己也拒绝法国随之参加这个条约。现在这一点又出现在条约之中，这是对威廉
522 的一个直接让步。关于该条约在签订对日和约以后生效，这一点

① 见《红档》杂志，第5卷，第36页，拉姆斯多尔弗1905年9月26日（10月9日）给涅利多夫的信。

② 见同上，第47页：“但是我们目前完全避免了有损我们利益的英德协定的可能性。”参见同上，第36页：据威廉的理解，“实际上”（thatsächlich）这不仅恢复了“原状”（status quo），而且还建立了“三国军事同盟”。现在对威廉来说，只剩下一个问题了，即尼古拉“是否完全明了这一点”。在形式上，例如甚至直到1907年7月，德国外交部还继续承认《毕由克条约》“在法律上是存在的”〔见《德国外交文件》，第19卷，第2分册，第6255号，威廉1905年11月13日（26日）给比洛的信，及同上，第528页注，1907年7月施维纳谬德会晤前呈给威廉的奏疏〕。

也是新的：1904年10月曾规定，条约"在和谈期间"有效。条约整个说来实质上是反英的，这不论是在1904年10月，还是在1905年7月，都是完全符合尼古拉的基本心愿的。条约生效期的"改动"使1905年7月的条约在有关法国问题上的直接冒险性大为减少了。在和谈尚未结束时，现在就解决法国问题，那是难以估计的冒险行为，简直是很危险的。

1905年9、10月间，外交机器不停地运转着，力图取消条约中有关法国的条款，这可能也不是出乎尼古拉意料的事。当时整个国际形势和7月大不相同了，以致人们很容易宽容地和同情地为这位"可怜皇帝的""无意识的""不慎"而叹息。① 对于7月的形势不得不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什么使尼古拉直接在当时，7月10日，在这个"不吉利"的条约上签字呢？在国际上完全孤立无援和国内政治上走投无路的形势下，尼古拉在《毕由克条约》中得到了一种心理上的（纵然是虚幻的）支持。② 相反，如果当时尼古拉拒绝在条约上签字，自愿拒绝唯一友好的、而且是再一次的建议，那岂不等 523
于和德国关系的破裂？这是在尚未确信和约将能缔结的情况下，亦即尚未确信有可能达成协议（而不是投降）的情况下的破裂。甚至维特自己对和约能否缔结也没有把握，何况，曾有一个时刻连他（当时已在朴茨茅斯）也觉得"不可能达成协议"。③ 如果同日本不

① 见《红档》杂志，第5卷，第30、35和43页，涅利多夫和拉姆斯多尔弗的说法。

② 弗里茨·霍尔斯泰因完全没有把威廉的企图设想得那样美妙，认为最好是威廉在会见时能等待尼古拉自己提出建立同盟的问题。他认为，俄国现在在财政上对法国的依赖比六个月前要大得多。他意识到，只有一个理由使俄国倾向于德国（他认为不是如同法国，以及维特、拉姆斯多尔弗和两位皇后所建议的应当倾向于英国），这一理由就是："德国'是在现在，签订和约之前'，就提出了同盟的建议，这就'在和谈中提高了俄国对于日本的地位；而英国则只可能在和约签订后与俄国联合，因而不可能对日本提出的和谈条件产生任何影响'"〔见《德国外交文件》，第19卷，第2分册，第6207号，霍尔斯泰因1905年7月9日（22日）给比洛的电报〕。

③ 见《红档》杂志，第6卷，第31页，维特1905年8月1日（14日）给拉姆斯多尔弗的电报。

能达成协议，怎么办呢？那只有在绝对的外交孤立中继续战争；在事情的这种转折下，尼古拉是不可能拒绝签订条约的。这不是因为他看重条约的这一稿本，而不是别的稿本（顺便提一句，比洛和霍尔斯泰因都认为，威廉所提的草案比他们原来所准备的更有利于俄国），[①] 而是因为，他不应该推开这位地域上最接近的邻邦。因为德国在战争期间，直到最终一直坚持友谊的立场，它切实促使了和谈的开始，如今它为所有这一切要求犒赏，而在俄国国内发生某种不可挽回的个人灾难，甚至皇朝灾难时，德国按其自己的性质又较之其他国家更能伸出援助之手。刚刚发生的海军叛乱是革命的第一个不祥之兆。面对着革命的来临，尼古拉同样不能不寄希望于外来的援助。[②]

524 尼古拉并没有恪守自己的诺言，不等《朴茨茅斯条约》批准〔10月1日（14日）方批准〕，他已将《毕由克条约》通知了拉姆斯多尔弗，但这一点还不是使我们对他产生下述怀疑的确实证据，似乎尼古拉在自觉地签署《毕由克条约》时，曾经埋下了"伏笔"，或者很明确地准备让协定因法国问题而破裂。不久前公布的文件证

① 条约草案第一条规定，两个盟国有义务"在欧洲"互相给予援助。比洛主张删去这一条。假使威廉不同意他的主张，他竟想辞职。据比洛和霍尔斯泰因的意见，在英德冲突的条件下，这一条使德俄同盟失去意义，因为在这一冲突中，他们想象俄国对德国的帮助是出兵印度，并一般地威胁英国的亚洲领地。俄历7月末，威廉准备向尼古拉提议修改有争议的条款。但是又怕俄方（拉姆斯多尔弗）利用此建议把条约修改得简直毫无内容，这一设想就此作罢（见《德国外交文件》，第19卷，第2分册，第450—501页）。

② 正是在这一点上德国人下了赌注。见霍尔斯泰因1905年7月13日（26日）给比洛的电报。电文说，"目前，在相反的情况尚未得到证实时，我认为，沙皇对于独自面对"英、法"感到可怕的政治原因国内的多于国外的"（《德国外交文件》，第19卷，第2分册，第6223号，第470页）。并见同上，第6208号，第445页，比洛1905年7月9日（22日）给威廉的电报，其中说"如果在行将举行的会晤中，陛下能对沙皇采用一种诚挚而热忱的调子（您在战争期间的一切行动始终贯穿了这种调子），那么，沙皇在如此困难的时刻将会十分愉快。陛下的主旨始终是：我们仅仅希望，俄国皇朝能够安然地度过眼下的危机，俄国的实力能不受损失"。

明，就是在对日和约签字以后，尼古拉也不认为(或者可能是故作姿态)法国加入大陆协定的主张是一种奇谈怪论。他仍然断言，如果事情办得巧妙，这一点是可以成功的。① 而几乎在整个 9 月份中拉姆斯多尔弗不得不通过外交途径来探明法国政府对这一问题的立场，直到最后，尼古拉决定亲自向威廉讲明同法国建立长期的预先联系的必要性时为止。

但是，大家知道，就在这时连维特也大肆宣扬"在毕由克宣布的英明原则"(正如他后来所表述的)。② 他不但在回彼得堡的途中在罗明滕发表了赞同这些原则的言论；而且在从美国归来的路上在同鲁维埃的谈话中也涉及到了这个问题，因而使得法国人颇为 525
窘迫和不满。在此他还对巴黎《时报》的一位编辑大大地颂扬了威廉。这时，维特接受了俄国必须打破法俄同盟狭隘框框的主张。这一主张既使最近日程上的大宗借贷活动，也使(可以认为)俄国国民经济以后的全部发展在财政方面向着广泛的国际性迈进了一大步。③

① 见《红档》杂志，第 5 卷，第 36 页。

② 见维特 1906 年 3 月 22 日(4 月 4 日)给门德尔松的电报(《俄国财政》，第 173 号)。参见涅利多夫 1905 年 9 月 22 日(10 月 5 日)给拉姆斯多尔弗的信，信中说，"维特在此地与我谈话时，好象同意与德国结盟，因为他说所有的国家都结盟了，唯独剩下我们一家"(《红档》杂志，第 5 卷，第 32 页)。维特 1905 年 8 月赴朴茨茅斯途中在巴黎与拉多林的谈话中，又回到了建立反对"海上"(überseeischen) 国家的三国大陆协定的"老"想法上。拉多林得出的印象是，"维特仍未走上英国路线"(见《德国外交文件》，第 19 卷，第 2 分册，第 6198 号，第 427 页，拉多林 1905 年 7 月 12 日〔25 日〕给比洛的信)。

③ 见〔《红档》杂志，第 5 卷，第 39 页，涅利多夫 1905 年 10 月 2 日(15 日)给拉姆斯多尔弗的信〕。维特在从朴茨茅斯归来的途中对拉多林说，他在"最后时刻"预防了出现英国和法国一起(不包括德国)向俄国提供巨额贷款的情况〔见《德国外交文件》，第 19 卷，第 2 分册，第 6241 号，拉多林 1905 年 9 月 10 日(23 日)给比洛的信；并见同上，第 6243 号，比洛 1905 年 9 月 12 日(25 日)给威廉的电报〕。维特在罗明滕的时候也对威廉说，他已拒绝了英法向俄国提出的贷款，因为他"希望美德两国能参加国际贷款"〔见同上，第 6359 号，第 663 页，威廉在贝尔恩斯托尔夫 9 月 12 日(25 日) 发自伦敦的报告上的批语〕。

VI

朴茨茅斯和约的签订立即为俄国政府在国外市场进行大规模财政活动打开了广阔的前景。于是法、美、英、德等国相继出场。实际上无须对任何人进行郑重的请求。鲁维埃首先同俄国大使谈起了这个问题，那时科科夫佐夫还没有给驻巴黎大使写以此为题的那封谨慎的试探性的长信。鲁维埃没有在细节上多费工夫，而是促成了一项巨额的"基本"借款，在他的提议中这项借款只是"旨在恢复国民经济生活的正常进程的以后一系列借款的开端"。① 就在同时，摩根给了维特一个借口，使维特与他谈起当前的借款事宜，并表示愿意和俄国政府就该问题举行初步谈判，只要俄国政府
526 不与希夫的犹太银行打交道，并给美国市场"一些特殊利益"。"巴林兄弟"在预先征得英国政府同意"不反对"俄国的财政活动的表态后，"表示自己完全接受"科科夫佐夫的"支配"，并且撇开罗士查尔德去参加贷款，"以使此次贷款和今后对俄国的贷款不依赖于犹太人。②

① 见涅利多夫 8 月 31 日(9 月 13 日)的信，此信通知了鲁维埃"近日"的建议；并见科科夫佐夫同日给涅利多夫的信(«俄国财政»，第 75 号和 74 号)。

② 见«红档»杂志，第 6 卷，第 46—47 页，维特于 8 月 27 日(9 月 9 日) 与摩根的谈话。并见«俄国财政»第 76 期，即鲁特科夫斯基 9 月 1 日(14 日) 关于巴林问题给科科夫佐夫的电报。8 月 29 日(9 月 11 日)，伦敦«泰晤士报»刊登了一篇巴黎通讯，题为«战后的俄国»。其中指出，俄国财政状况良好，还说"为了改组陆军和海军"，"俄国将毫不费力地求得财政援助以满足自己的需要"。根据彼得堡 10 月初得到的消息，在巴黎甚至流传着日本人参加对俄贷款的说法。并根据同一来源获悉，"只要（英、俄）关于波斯湾的协定一签订，只要兰斯多恩说一句话，英国公众就将象一个人一样，签署此次对俄贷款合同和未来所有的贷款"。而似乎罗士查尔德勋爵自己也说，如果俄国能确定"对待犹太人的坦率和慷慨的行动方式"，"他自己(即罗士查尔德)自不待言"，"就是全世界十万零九千个曾经相互保证阻碍俄国财政活动的所有犹太银行家，也乐于立即在俄国事务中同其他人的财政利益结合起来"〔见财政部办公厅秘书处档案，1903 年第 4 号卷，第 29 面及以下各面，美国人查尔斯·迈耶 1905 年 10 月 8 日(21 日)的两封信，查尔斯·迈耶是受科科夫佐夫的委托遍访欧洲各国首都就对俄贷款问题进行探询的〕。

因而，此刻根本无从谈到以这种广泛的国际性去换取对其具有毁灭性的、随7月11日(24日)俄德条约的公开实行而产生的纠葛。由于事情是极端新奇的，这种广泛的国际性本来就需要极其审慎地对待。相反，趁着由于停止战争而造成的“良好印象”尚未消失，趁着国内还没有爆发新的事件；并趁着（正如涅利多夫所指出的）确定借款的新的杜马机构此时尚未登场，当时是有理由尽快巩固如此迅速地形成的财政局势的。① 特别是由于美国采取了前 527
所未有的行动，这时，法国人没有力量公开反对贷款国际化。看来，法国人在最初的日子就醒悟到，事态的这种新变动将对法俄同盟造成怎样的威胁。鲁维埃于9月8日曾以《与御前大臣维特谈话印象记》为题发表文章（现在我们确实知道这篇文章是“十分不利的”），② 其中暗示，只有法国的那一部分贷款可以在巴黎交易所募集，并且合乎情理地解释说，“因此他从一开始就反对发行国际公债”，又说，德国人和美国人仅仅利用佣金，反正都可以在法国市场上倾销他们那部分债券。③ 假设能充分理解摩根第一次尝试的全部意义，那末在法俄关系财政结构发展的广阔前景中，正是美国资本的入侵会使这一结构逐渐遭到破坏。因此，在1905年10月2日召集伦敦、巴黎、纽约、柏林和阿姆斯特丹的银行家们到彼得堡开会以前，科科夫佐夫会认为，国际贷款活动的成功不仅“远没有保证”，而且还“值得怀疑”。④

① 见涅利多夫8月31日(9月13日)给科科夫佐夫的信(《俄国财政》，第75号)。

② 见《红档》杂志，第5卷，第39页，涅利多夫1905年10月2日(15日)给拉姆斯多尔弗的信。

③ 见涅利多夫1905年9月9日(22日)给科科夫佐夫的信（《俄国财政》，第82号)。10月间，迈耶觉得当时巴黎的状况是“十分复杂的”：一方面法国政府很想把法国的债券和其他参加者的债券印成不同的颜色，这些参加者应当在两年内保持自己的份额，并希望让俄国政府对法国的贸易给予特惠；另一方面在财界还没有一个“享有公众普遍信任”的“真正银行团”〔见前引迈耶1905年10月8日(21日)的信〕。

④ 见科科夫佐夫1905年9月16日(29日)发往伦敦给鲁特科夫斯基的电报(《俄国财政》，第83号，第223页注)。

不久前，我们幸运地偶然找到了一份材料。这份文件证明，在10月6日至17日在彼得堡召开的银行家会议上，科科夫佐夫是同“国际银行团的”全体“代表”进行洽谈的，其中，彼得堡各银行的代
528 表也参加了会议。[①] 在这些日子里，举行了“多次”会议，互换了宣言式的如下信件：银行团代表10月17日(30日)的联名信〔附有一份总结谈判的备忘录（原件我们尚未找到）〕、科科夫佐夫10月18日(31日)给各代表的信(此信我们现已发表)。从这封信中可以明显看出，十二亿五千万法郎的贷款总额已经完全商妥，只有债券的发行价格及何时完成发行尚未确定。银行团代表方面提出中断谈判，而重开谈判的日期，则由银行团成员们自己“依据俄国社会生活的内部条件”决定。因此，已经开始工作的国际贷款机构并没有散摊子，只是推迟了它今后的工作。科科夫佐夫的信记录了这个事实：即“这一情况的产生当然不是由于(他们——银行家)缺少诚意，或者是由于（他——科科夫佐夫）在接受对此问题的(他们的)共同见解方面缺乏准备”。俄国政府只得象此间约定的那样等待银行团愿意恢复贷款事宜的“通知”，这次贷款之事是不巧被10月罢工所中断的。

但是继之而来的革命事件却推迟了，并且最终取消了恢复谈判的可能性。当时正发生的国家银行金库黄金前所未有的大量外流，以及从储蓄银行中大量提取存款，到11月时已使货币流通处于“十分危急”的状态。[②] 而在12月，维特的政府为了免于破产，
529 不得不在没有等到别人的任何“通知”的情况下求救于国外市场，实际上重新开始了借款活动。那时的条件，不但总的说来更无可

① 见我们发表(«俄国财政»，第88号)的科科夫佐夫1905年10月18日(31日)给国际银行团代表们的信。这封信的底稿是我们在清理财政部档案时在零散的文件中找到的。

② 维特：«回忆录»，第2卷，第180页。

比拟地不利于俄国，而且将原先脆弱的国际贷款组织也改变了。为了向国外的有关人士“毫不掩饰地”“全面说明”“俄国的现状”，并达成贷款协议，决定由科科夫佐夫作一次出国访问。那时，一方面，莫斯科武装起义正热火朝天；另一方面，交易所的恐慌在不可遏止的增长。科科夫佐夫动身的那天，1905 年 12 月 17 日，国家银行已经无权发行纸币，黄金亏损则与日俱增（1905 年 12 月 23 日为四千七百万卢布，1906 年 1 月 1 日为八千万卢布）。[①] 我们看到，不论是国内事件的性质，还是速度，都使得建立类似 10 月的银行团那样庞大的财政联合组织的念头不能成立。但是不管怎样，过去的两个月已经把同最初设想的借款的国际性质相敌对的特征带到国际关系中来了。

摩根曾就俄国可否“在美国工业市场上”订购一些货物的问题 530
函询科科夫佐夫，结果被科科夫佐夫客气而婉转地拒绝了，以后，作为欧洲两个财团中间环节的美国人的参加就成了问题。[②] 事情就这样开始了。以后的情况又表明，一失掉工业订货这个诱饵，摩根对俄贷款的态度就冷淡了。[③] 至于德国也是这样的，前途从 11 月中旬起就已经确定了，因为当时尼古拉以一项我们已经知道的

① 见维特 1906 年 1 月 2 日（15 日）发往柏林给科科夫佐夫的电报（«俄国财政»，第 129 号）。参见国家银行总裁季马舍夫的信（该信既无上款，又无日期，看来是 12 月 23 日后不几天写的）。信中说：“12 月 23 日的决算表业已编成。情况糟透了。黄金储备减少了五千九百六十万卢布，而纸币却增发了二千万卢布，总计超出纸币发行权八千万卢布。违反纸币发行条例的款额达四亿六千八百万卢布。即使在巴黎能够得到黄金，12 月 23 日的决算表依然是违法的。我预料还得发行新钞票，根据西伯利亚和外高加索的材料看，那里的银行已经完全空虚，既没有金银，也没有纸币。从那里转来的帐目更使我们的现金消耗殆尽。不扩大纸币发行权，我们就无法应付。即使能从巴黎得到黄金，此事也势在必行。无论如何，12 月 23 日的决算表不能公布，而拖几天再公布又是不可思议的事，那将造成令人绝望的印象。C. 季马舍夫”（见国家银行档案，第 124 册，第 162 号卷）。

② 见科科夫佐夫 1905 年 10 月 18 日（31 日）给摩根的信（用黑铅笔写的英文信稿，我们已经译成俄文，发表于«俄国财政»，第 89 号）。

③ 见同上，第 171 号，涅利多夫 1906 年 3 月 22 日（4 月 4 日）给维特的信。

补充声明使《毕由克条约》中有关法国的部分失去了意义。[①] 最后，法德关系正是在这两个月中变得十分紧张，法国在边境上作了军事准备，"许多银行都将案卷和贵重物品从邻近德国边境的分行和代办所转移走了"，信贷业务突然大大缩减，法兰西银行再贴现的规模"以惊人的速度"增长起来。当时，私人银行也减少了主动性的业务，同时，柏林帝国银行的贴现率提到"空前未有的高度"——六厘。[②]

关于10月的银行团的事，现在甚至一次也没有再提起过，这是毫不奇怪的。维特曾经出面写信，说明科科夫佐夫被授予全权，请求听取科科夫佐夫的意见，并请求参与"帮助我国"。除了鲁维埃和比洛外，这信只寄给了伦敦和巴黎的罗士查尔德，而这两位犹太人不仅没有参加原先的银行团，而且是该银行团的主要反对者。[③]
531 维特这样做，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对伦敦的罗士查尔德的态度是特别说明问题的：这不仅是乞求敌人开恩（如同宾肯多尔弗刚刚所转述的），这个敌人还想在一定的政治条件下"管理俄国的事情"；而且是对巴林兄弟的背弃，维特明明知道，巴林兄弟是为了参加俄国银行团，才去与罗士查尔德进行危险的冲突的。[④] 但是，看来伦敦的罗士查尔德对这一请求却置之不理，于是对伦敦也就不抱什么希望了。科科夫佐夫在柏林没有停留，径直前往巴黎，他集中全力去和法国人达成单独借款。

科科夫佐夫 12 月的法国之行，是俄国经过财政道路直接通往三国协约的时机。俄国政策在英德冲突日益增长的过程中经过

① 声明的文本于 1905 年 11 月 10 日（23 日）送往柏林（见《红档》杂志，第 5 卷，第 44 页及以下各页）。见《德国外交文件》，第 19 卷，第 2 分册，第 6254 号，尼古拉 1905 年 11 月 10 日（23 日）的信，随信附寄了声明。

② 科科夫佐夫 1906 年 1 月 15 日所作的关于出国访问的报告（《俄国财政》，第 131 号）。

③ 见《俄国财政》，第 94 号，a—r。

④ 见同上，宾肯多尔弗 1905 年 12 月 2 日（15 日）给拉姆斯多尔弗的信。

长期摇摆之后，于 1905 年 10—11 月将所有的砝码都集中起来投到天平上，使协约国的天平盘以后一个劲儿地往下沉。1905 年 11 月，尼古拉曾答应威廉在摩洛哥事务中促使缔结“总的协定”，这个诺言现在具体化为向参加阿尔几西拉斯会议的俄国代表发布了一项“符合法国利益”的指令，此外，法国政府还得到俄国的保证，即“总的说来，皇帝陛下鉴于友谊和同盟关系，准备对法国政府给予援助”。① 这时鲁维埃也对银行家们（其中包括罗士查尔德）施加压力了，要他们“为了法国利益”，而立即办理对俄贷款。② 然而由于银行家们的“胆怯”和“极端缺乏财政知识”（科科夫佐夫后来在他的报告中对银行家们的这种特点不惜笔墨加以恶意渲染），致使鲁 532
维埃的努力，没有象科科夫佐夫想象的那样，取得应有的成功。③ 而银行家们最后只是在维特 12 月 25 日散布的停止兑换这一消息的直接威胁下，才拿出一亿卢布满足最低要求，并且是以短期年票的形式，以免直接向公众征募。

同 1905 年春季比较，情况似乎是不同了：那时银行家乐于贷款，而法国政府却冒着削弱政治同盟的危险，坚决反对贷款；反之，现在银行家们抱着狭隘的财政观点，固执地拒绝冒遭受财政损失的危险，而政府却从政治考虑出发，把赌注下在沙皇政体同革命的斗争中。俄国政府谋求两个月后达成一项“真正”的贷款，但是银行家如今自然不承担这项正式义务，于是未来的贷款仍是个悬而

---

① 见尼古拉 1905 年 11 月 19 日（12 月 2 日）给威廉的电报（《威廉二世和尼古拉二世通信集》，莫斯科 1923 年版，第 127 页，《通信集》中电报未署日期；并见 E.B. 泰勒：《西方与俄国》，彼得堡 1918 年版，第 217 页，该书中电报署有日期）；并见维特 1905 年 12 月 22 日（1906 年 1 月 4 日）发往巴黎给科科夫佐夫的电报（《俄国财政》，第 107 号）。

② 见同上，第 116 号，科科夫佐夫 1905 年 12 月 26 日（1906 年 1 月 8 日）发自巴黎的电报。

③ 见同上，第 109 号，科科夫佐夫 12 月 24 日（1 月 6 日）发自巴黎的电报。

未决的问题。[①] 但是，假设这笔贷款实现了，根据巴黎银行家们的看法，它也只能具有"部分的国际性"，因为他们重视英国金融市场参加贷款，而公开反对德国和美国的金融市场参加这次贷款。[②] 因为德美两国不管财力如何，它们的王牌实际上已经被俄国方面赢掉了一部分，因此，科科夫佐夫1月初由巴黎带回的贷款在国际上的预兆，并不是十分吉利的。

据现在发表的1906年1月到4月的来往信件看来，对于达成巨额贷款的问题，不论从俄国方面，还是法国方面，都没有任何担心
533 的迹象，不怕贷款会由于俄国革命运动的新高潮而延期或告吹。[③] 但是，另一方面，问题很清楚，就象拉姆斯多尔弗1906年2月10日写给奥斯坚-萨肯的那样，只有尽快地得到一笔自己能直接支配的足够款项，而且务必尽快地、在杜马召开之前得到，"俄国政府才有可能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最终铲除革命运动"。[④] 俄国政府的唯一障碍和使它惴惴不安的事，是这几个月中列强在阿尔几西拉斯关于摩洛哥今后命运问题的谈判，因为在阿尔几西拉斯会议取得良好的结局以前，法国人是根本不让提起对俄国的巨额贷款的。[⑤]俄国政府只能暗中为借款做些准备工作，并在法国财政部正式准许银行家开始谈判以前保守秘密。维特承担了秘密拟定借款方案的全部工作，他选择了巴黎荷兰银行的代表内斯兰作这件事。内斯兰与维特二人单独在皇村幽静的地方面对面地重新进行了这

① 见《俄国财政》，第117号，科科夫佐夫12月26日（1月8日）给希波夫的电报。

② 见同上，第131号，第263页，科科夫佐夫的报告。

③ 见同上，第132号—216号。

④ 拉姆斯多尔弗的电报，引自维特的《回忆录》，第2卷，第186页。

⑤ 见拉法洛维奇1906年1月26日（2月8日）给维特的电报（《俄国财政》，第132号）。维特准备在会议结束前取得贷款的种种尝试全都碰了壁（见同上，第134、141、148、153号）。维特建议2月底办理借款，但是普安卡雷到1906年3月18日（31日）才允许"和银行家开始交涉"（见同上，第159号）。

项工作，任何其他银行家都没有参加。不仅如此，而且在以后同其他各国银行家的交往中，内斯兰始终起着俄国的代理人的作用。[①] 这也是很自然的，因为这次贷款总数的一半是由法国财团承担的，而其他七国的财团分别担负了另一半的一小部分。 534

大家知道，因为美、德、意和瑞士等国银行家拒绝参加贷款活动，所以事实上这次贷款只有"部分"国际性。[②] 贷款总额为二十二亿五千万法郎，法国占十二亿法郎，英国占三亿三千万法郎，俄国银行占五亿法郎，荷兰占五千五百万法郎，这次贷款中协约国占了绝对优势。维特直到末了对贷款的协约国性质都十分担忧，奥地利银行微不足道的参加（一亿六千五百万法郎）得以多少掩盖了此种性质，而这还是以"一些特惠"为代价的。[③] 然而事情的政治方面，并不因这一细节而产生丝毫变化。俄国在阿尔几西拉斯会议上的立场明显地保持了法俄同盟的精神，并且在所有问题上都同英国站在一起。[④] 在阿尔几西拉斯谈判之后（俄历 3 月 23 日），德国立即拒绝对俄贷款，看来，其他一些国家是在它的影响下才相继拒绝贷款的，而德国的拒绝只是最终强调指出了所发生的事情。[⑤] 在德国政府下令禁止门德尔松参加对俄贷款的前一天，俄历 3 月 22 日，法国驻彼得堡大使已将法国参谋总部的一份会议纲要和问题

① 在维特与内斯兰 1906 年 2 月初的皇村谈判之后，就确立了这种地位。内斯兰到达之前，维特还想直接向银行家们，比如向罗士查尔德进行试探（见《俄国财政》，第 134 和 137 号）。

② 见《俄国财政》，第 189 号，科科夫佐夫 1906 年 3 月 30 日（4 月 12 日）的电报，其中说，在德国、"美国、意大利拒绝参加贷款，荷兰虽参加贷款，亦很有限的情况下，此次贷款的国际性几乎丧失了"。

③ 见同上，第 187 号，维特 1906 年 3 月 30 日（4 月 12 日）发往巴黎给科科夫佐夫的电报，电文说，"如果奥地利拒绝参加贷款，特别在政治方面是十分令人遗憾的"。并见科科夫佐夫 3 月 31 日（4 月 13 日）的电报，电文说，"经过极大的努力"，"在最后的时刻"，在"使用"他们那一部分贷款的"期限方面"给以"某些特惠"才保证了奥地利的参加"，"否则就有落空的危险"。

④ 见维特：《回忆录》，第 2 卷，第 185 页。

⑤ 见门德尔松 3 月 23 日（4 月 5 日）给维特的电报（同上，第 174 号）。

清单转交给俄国外交部。这些问题是法国参谋总部向俄国参谋长提出的，并应在即将召开的两盟国参谋部会议上加以讨论，以便根据比五年前更有利于法国的原则重新审查和恢复法俄军事专
535 约。[①] 尽管借款合同在俄历4月3日之前已准备就绪，法国人却坚持"一定"要延期到4月9日颁发关于发行公债的上谕，而刚刚提到的参谋部会议的议定书（它把军事专约的原稿本作了对法国有利的修改）也是在巴黎于前一天（4月8日）签字的。这种时间上的巧合也很难说是偶然的。[②] 最后，还有一件事情形成这种时间上的对比：在颁布关于公债的上谕后十一天，俄历4月20日，涅利多夫从巴黎发来了一份绝密的急电，根据法国外交部长的口述通知说，爱德华·格雷爵士由于德国重新提起了建筑巴格达铁路问题而提出了一项建议，这就是"与俄国政府就建筑一条从俄国经波斯通向底格里斯河谷和波斯湾的铁路一事达成协议"。莱昂·布尔热瓦在此将这一提案作为"英俄两国就彼此在波斯湾的地位和利益达成协议的出发点"介绍给俄国，并认为"波斯湾问题是当前英俄接近的一切课题中最困难的章节"。[③]

到1906年5月25日，法国政府以上述形式提出的英俄接近事宜，已进入有关双方直接谈判的阶段。这天，英国大使拜访了伊兹沃利斯基，并声称："他已被指派同帝国政府进行谈判，以便就英
536 俄两国共同关心的一系列问题达成正式协定"。还说："如果（俄国方面）同意，那他就要提出采用曾经导致缔结英法协定的那种办法"。大家知道，这种办法就是将"各个有关问题""逐一"加以审

① 见A.M.扎伊昂奇科夫斯基：《1914年大战前的法俄关系》，载于论文集《谁是债务人》，莫斯科1926年版，第29页；并见同上作者：《俄国对世界战争的国际准备》，列宁格勒1926年版，第117—124页。

② "银行家们坚持""一定"得在4月9日"公布发行公债的上谕"，"不能早也不能晚"（见《俄国财政》，第196、201和204号，科科夫佐夫俄历4月3日和4日的电报）。并见前引A.M.扎伊昂奇科夫斯基的论文，第30页。

③ 见工商业部办公厅档案，1910年，第4号卷，第1部分。

议，“可是不对这些问题分别作出最后决定”，然后，“等到表明有可能达成完全一致时”，再缔结“一项涉及一切问题的总协定”。[①] 举法国为例，便使人毫不怀疑，这里所说的正是两年前在英法关系中所确立的那种完全的“协调一致”。

就这样，为了打一场“小规模的胜仗”而“向国外的佯攻”，不仅没有导致胜利，而且有可能“驱使”专制政体陷入灾难性的“财政险境”。这一“佯攻”迫使尼古拉在广泛的政治协商道路上寻求“巨额”贷款。

俄国是在硬通货储备非常少的情况下开始战争的，以致当时俄国政府面临着可能停止兑换的问题。俄国政府坚持不惜任何代价维持兑换，就只得借助外债进行战争。这就使战争的进行、它的继续和胜利的可能完全取决于国际金融市场。法国金融市场从1904年春季起离开俄国，肯定是因为那年4月间英法达成了政治协定。早在战争开始时，俄国就曾向德国金融市场做过试探，但是只有在俄国向德国作出我们已经知道的、俄国在1894年贸易条约的7月补充协定中所作的那些让步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取得贷款。1904年10月，有一家法国银行企图抢在柏林金融市场的前头，尼 537
古拉为了讨好德国和有利于德国贷款曾予拒绝（德国贷款在1904年12月公布）。就在10月间，威廉试图诱使俄国同德国结盟。由于英俄两国因北海事件关系紧张，由于法国在日俄战争中一般说来采取了消极态度，威廉的上述企图差一点在尼古拉那里获得成功。但是德国的这一尝试最终被拒绝了，因为它明显地危及法俄同盟。当时俄国有一笔简单的帐：随着旅顺口的失陷（1904年12月），继续进行战争到了最困难的地步，而要继续作战，只有德国一

① 见工商业部办公厅档案，拉姆斯多尔弗1906年5月27日的奏折。

国的金融市场是不行的。这种计算迫使俄国在国际关系方面不仅维持了法俄同盟，而且还保住了所有可能的金融市场，只有当时还明显地怀着敌对情绪的英美两国除外。

1905 年 1 月“爆发的”革命使 1 月间的对日战争遭受决定性的打击。这一来继续战争的可能性完全并仅仅取决于德国了，因为法国政府禁止法国银行发放贷款给俄国进行战争。奉天战役之后，正是因为法国拒绝贷款，所以科科夫佐夫在彼得堡曾直截了当地提出停止战争的问题。但当时已经决定再充分运用德国的财政可能性（1905 年 4 月的借款）。对马海峡的失败使俄国再也不能继续战争了。尼古拉同意举行和谈，这立即为俄国政府开辟了不单是法国，而是英法联合贷款的前景。但是，这时两个银行家集团（即两国政府）并不是简单地将开始和谈作为先决条件的，因为开始和谈从俄方来说可以用因惧怕革命而产生的压力来进行解释。而等内部的危险一过去，和谈并没有使俄国到最后实质上承
538 担任何义务，只有确实缔结和约，才是贷款的条件。这样一来，俄国政府就真正陷入了接受最后通牒的处境，处于夹攻之中，它不可能拒绝任何和平条件，并注定得接受别人向它提出的任何条件。于是尼古拉本人在毕由克面对威廉的压力就支持不住了。他面对“克里米亚同盟”不敢拒绝德国第二次提出的关于同盟的建议，因为“克里米亚同盟”在俄国皇朝命运如此危急的时刻没有表现出任何同情。

和约缔结后，维特的任务是：不仅要摆脱同德国的同盟（这一同盟由于和约的缔结已经丧失了自己的意义，虽则这种意义本来就是微不足道的），而且要从单方面的英法财政结合体中脱身，因为它正诱使俄国参加在西方业已酝酿成熟的帝国主义冲突。但是，已经完全商定谈妥的八国国际银行团被10月的罢工吓跑了，继之而来的国内事件使俄国政府直接面临破产的灾难。尼古拉和维

特各人以不同的形式想使俄国避开正是在此时紧张起来的帝国主义冲突，但是这一幻想却在科科夫佐夫 12 月的巴黎谈判中破灭了，而在 1906 年 1 月到 2 月的阿尔几西拉斯会议上这一幻想更是被踩得粉碎。俄国即便作出巨大的让步（对于当时那个前所未有的境遇来说这些让步完全是商业上所必需的）也应当争取到美国的支持，但在这一方面俄国却漫不经心，在阿尔几西拉斯俄国又不得不支持法国，这样就使俄国走上了协约国的轨道。在这条道路上俄国政府不但找到了贷款，而且它的"朋友"这次正准备加强俄国的"君"权以对付"国会"。然而俄国政府必须预先在法俄军事专约有利于法国的修改本上签字，而在实现这笔绝对数目十分巨大，相对而言却甚为可怜的贷款时，俄国又同英国签订了政治 539
协定。

日俄战争的结果在远东给俄国形成的条件和它在西方的处境不仅不矛盾，而且促使俄国和日本达成了协议，这些协议使俄国完全进入了协约国的圈子。

第八章

战后满洲的“大型企业”

I

540 在俄国筹得“巨额”“善后”借款之前修改了法俄军事协定，借款后英国紧接着又向俄国提出了两国达成广泛协议的建议，该项协议实际上使俄国在近东和中东都与英、法两国双重“真诚协调一致”地投入帝国主义的利益角逐之中。然而，这笔善后借款只能用来紧急弥补革命和战争所造成的预算亏损。借款“最终结果”为整数六亿七千七百万卢布。然而仅 1906 年的收支就亏损了四亿八千一百一十万卢布。1905 年未抵补的开支尚有一亿八千万卢布。还得偿还德国 1905 年的短期贷款一亿五千万卢布。这样，在“巨额”借款合同签字前，赤字总数已达八亿一千一百万卢布，因此虽然得到了贷款也还是入不敷出。到 1906 年 9 月总算找到了出路，因为进款多收了一亿卢布，又能从各储蓄银行借到三千四百万卢布，恰好把亏空如数补上。就在这时，对财政部又纷纷提出了达一亿五千五百万卢布的新的要求（其中八百万卢布供部队在国内进行镇压之用，每月二百万卢布）。科科夫佐夫于 1906 年 9 月 6 日给
541 斯托雷平写了一封悲观失望的密信，信中说，现在我们需要借债，但又告贷无门，这种状况是无法维持的。不知怎的，这封信在法国《时报》上登了出来，上述数字一泄露出去，自然在欧洲新闻界引起了一片喧闹。①

① 见《俄国财政》，第 222 号。

不止维特一个人预见到，这笔“巨额”借款实际上是很可怜的，而且实际支付又要严格地分期进行，一年多才能付清，因而“国家仍将一直处于严重的金融危机状态之中”。1906 年 4 月，科科夫佐夫在巴黎又“一再”从“金融家们口中”听到这种“肯定的说法”，他“就在年内”“将被迫再次向国外借款”。① 而鲁维埃在《朴茨茅斯条约》签字的第二天，当同俄国大使谈及此次借款问题时，直率地指出，俄国“在战后数年内”，“必然要多次借债，使贷款延续数年”。② 法国新任财政部长普安卡雷在达成借款的最后时刻从法国政府方面提出的一项附加条件的意思，现在看来就更清楚了。他说，如果科科夫佐夫不以俄国政府的名义作出“至少在两年之内不再向法国借款”的书面担保，那末这项借款就“不能达成”。后来，法国方面又企图扩大对这个条件的解释以牵制俄国，意即“俄国在这两年内必须借外债”，“即使俄国政府不准备向法国市场借 542
款”，它也应当“通知法国政府”。③ 当然，法国政府只是企图将这个条件作为一种“政治手腕”，以应付对本政府批准贷款的激烈抨击。④ 然而，实际上它却给沙皇政府加上了一条财政禁令，这是在

① 见《俄国财政》，第 197 号。外国债主从 1906 年 5 月 2 日（15 日）到 1907 年 5 月 24 日（6 月 6 日）分八期将贷款交付俄国政府使用（见同上，第 397 页）。这实际上只限制了俄国在国外的支付，“形式上”并没有剥夺与借款总数相等的“纸币扩大发行权”（见同上，第 198 号）。关于巴黎的“悲观派”，见财政部办公厅秘书处关于达成 1909 年借款的案卷，科科夫佐夫 1907 年 7 月 2 日（15 日）给韦纳伊的信。

② 见同上，第 75 号。

③ 见同上，第 197 号和第 198 号。在科科夫佐夫 1906 年公历 4 月 16 日给普安卡雷的信中，已经答应承担这项义务。普安卡雷在 4 月 19 日的复信对此条件作了扩大的解释。但内斯兰在转交这封信时，却口头表示说，这里所指的是“俄国甚至可能在两年之内向法国市场借款”才照此办理。但在博姆帕尔 1906 年 6 月 16 日（29 日）的“口头照会”中，对俄国这项扩大了的义务，却没有类似的注解，这项义务的“精确含义”就是在整整两年内限制俄国选择国外市场的自由（见科科夫佐夫 1906 年 6 月 16 日（29 日）给普安卡雷的信，信中坚决不同意对俄国义务进行这种解释，声称，俄国政府如向其他国家，而不向法国借款，它就有完全的自由（财政部办公厅秘书处 1903 年第 4 号卷）。

④ 见科科夫佐夫 1906 年 4 月 3 日（16 日）发自巴黎的电报（《俄国财政》，第 198 号）。

法俄同盟的实践中从未有过的。

善后借款充其量不过维持了1906年的预算平衡和币制稳定，这对恢复正常的经济生活仅仅创造了表面的、最起码的、就其本身而言极不充足的条件。而恢复正常的经济生活也只不过能使国家在这经受考验的两年中恢复信誉罢了。由于1905年和1906年连年歉收，金融市场极度紧张，加之国内政治前景远未明朗，所以善后借款无论如何不能解决复兴受到革命和战争冲击的国家工业的
543 问题。面对着经济持续萧条的可怕征兆，俄国财政部在达成这次借款后，目前面临的一个突出任务，就是大量吸引新的外国资本专门用于工业的复兴。同时，正如此时充任俄国财政大臣的常设代理人的内斯兰所写的，正是在法国，“权威人士已经开始意识到”“世界银行家的”地位要求法国对信贷机关及交易所本身都要进行一系列“改造”。巴黎荷兰银行从它四十年前创建至今第一次着手扩充其固定资本，并提出了在巴黎建立一家“拥有五千万法郎资本的大型私人银行”的方案，以便在“商业和工业方面”均与北美合众国协作共事（纽约的库恩—罗比公司，“我们的伦敦朋友”等等）。[①] 因为这家法美银行是以内斯兰为首的，因此，虽然他保证说，这样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了俄国的事务，科科夫佐夫在给他的祝贺信中还是向他表示了“某种遗憾”，说：“该企业是专为和一个外国（对他科科夫佐夫说来是外国）合作共事的”，“然而，我的国家却比其他各国都更需要游资；倘有这种妥善的组织，并有精悍能干、精力充沛的人领导这一机构，那俄国就是进行生产活动的广阔天地”。科科夫佐夫同时强调，他之所以遗憾，与其说是由于国家财政和借贷问题，不如说是因为工业利益。因为恰恰当时俄国的工业利益是应当引起巴黎这一“世界财富的真正源泉的特别重视的”。科

① 见《俄国财政》，第225号，内斯兰1906年11月7日（20日）给科科夫佐夫的信。

科夫佐夫在信的末尾实质上总结了自己的建议，他说："希望大西洋彼岸的共和国仍然能给沙皇的帝国留出地位，那样，我们就不会迫不得已地去利用与你们无关的资本了"。① 544

总共不到两星期，科科夫佐夫的桌上就已经摆着一封给他的切切实实的复信了，单凭这一点即可看出，俄国方面的这一请求是多么投合巴黎金融巨头的心意。在此之前一个月，当巴黎交易所经纪人的首领韦纳伊答复科科夫佐夫抱怨法国报刊行为的又一封诉苦信时，他还冷漠无情地拒绝给俄国以任何援助，这次他却提出了一项在巴黎建立一个"实力雄厚的财团"的方案，以便"研究那些在法国资助下能得到广泛发展的俄国商业和工业企业"。他认为，现在"日俄战争刚刚结束，这正是在有利条件下加入这些企业的大好时机"。这些有利条件"可以使与这些企业有切身利害关系的资本得到很大的犒赏"。在这里"俄国各家最大的银行"加入拟议中的"组织"是"完全必要的"，它将是财团取得成功的"精神和物质上的"保障。不言而喻，只要俄国财政大臣绝对保证俄国政府将给予支持，② 就可以着手筹备这个组织。该组织正由于有俄国银行参加，方能考虑利用国内造成的那种破坏，并用垄断的方式掌握最有

① 见《俄国财政》，第228号，科科夫佐夫 1906 年11月14日(27 日)给内斯兰的信。

② 见同上，第 230 号和第 231 号，韦纳伊 1906 年 11 月 30 日（12 月 13日）给科科夫佐夫的信和科科夫佐夫同年 12 月 8 日（21 日）给韦纳伊的信。C.罗宁在莫斯科 1926 年出版的《外国资本和俄国银行》一书中（第 54 页和第 55 页上）把这两封信错当成是 1907 年写的。信的原件已送往信贷处特别办公室，我们发表的是留在财政部总务厅的副本，原件是附在特别事务官员多尔利阿克 1907 年 1 月 6 日第 13 号信后送走的，多尔利阿克信的底稿仍存总务厅。在多尔利阿克指出了内容和日期的信中列举了两封信(注有 1906 年) 和"今天收到的"多里宗 1907 年公历 1 月 18 日给科科夫佐夫的电报，他在信中要求接纳北方银行参加银行团，"这一请求得到俄国代表们的赞同"。我们根据总务厅 1907 年的原始记录，查了多尔利阿克信的日期，确实是 1 月 6 日，第 13 号。我们这两封信的日期，同科科夫佐夫俄历 11 月 14 日给内斯兰的信是有直接关系的。内斯兰"给为数不多的知名人士中的一些人""看了"这封信，信中关于 1907 年俄国财政预算的资料给这些读者留下了"极好的印象"。无庸置疑，韦纳伊就是这些"知名"人士之一(见《俄国财政》第 229 号)。

545 前途的那些企业。当然，彼得堡一天也没有拖延，立即作出了绝对肯定的答复，“答应”给予最广泛的支持。而在 1907 年 1 月初头，准备参加这个拟议中的银行团的俄国各银行代表均已在巴黎了。我们看到，这里所说的已经不是通过银行认购俄国公债券的途径，把法国众多存户的款项交给俄国政府不受监督地支配，而是法国金融资本通过设在彼得堡的银行机构，有计划地直接扎根于俄国的国民经济之中。现在俄国财政大臣招引法国资本就是要“在精悍能干、精力充沛的人员的领导下”“组织”“生产活动”。看来，这时科科夫佐夫不敢向法国人少提供东西，但要再多些，他还有什么可提供的呢？

在科科夫佐夫这一步骤中可以看到，他准备为今后法国资本有可能掌握和承担俄国大工业的领导权开辟道路，之所以如此，首 (85)
先是出于俄国政府当前的急迫需要。现在，俄国政府对于今后的预算惶恐不安，毫无信心，但又绝对必须提高和保持俄国政府在国际市场上的信誉，而且无论如何要在还清法国 1904 年的三亿军事债款之前，即在 1909 年春季前，尽快在这一方面取得牢靠的成绩。
546 因为俄国政府这时必须在新条件下重新审查自己的对外政策纲领，使其与国家的现有财力相符，所以现在俄国政府所能谈到的只不过是“保存力量以解决欧洲的重大问题”，也就再“不能在远东耗费钱财了”。① 在 1907 年 1 月 3 日的军事会议上，伊兹沃利斯基表示坚决反对在阿穆尔地区增兵，他提出的这个纲领无异于放弃俄国在远东的积极政策。而在这次会议之前，关于清理俄国在满洲创办的一些事业（这些事业曾使俄国在过去一个阶段成了侵略国）的问题，已经闹得沸沸扬扬了。

① 见阿·阿·波利瓦诺夫：《回忆录》，莫斯科 1924 年版，第 16 页。

II

俄国失败后，外国资本形式上可以不受日本希望用以巩固其胜利的国际法律条款的约束，单凭这一点，外国资本就应当出现于俄国在远东的利益范围之中。举例说，正是出于这个想法，产生了一个吸收美国人克拉克森来谋求“经营萨哈林岛的全部渔业、矿产、林业和毛皮业的”租让权方案，因为在奉天败北之后，俄国严峻地预料到，日本人会“在公历4月初”在萨哈林岛登陆。① 这个方案是俄国驻朝鲜武官涅奇沃洛多夫上校于1905年3日中旬提出的。他已同美国人克拉克森谈妥了下列条件：(1)美国人“提供经营所需的全部资本”；(2)以克拉克森和涅奇沃洛多夫的名义取得租让权，今后全部收入两人平分；(3)如果萨哈林岛仍归俄国，则可收回租让权，条件是克拉克森将享有“在萨哈林岛谋求一般的租 547
赁和租让权的优先权”，并将在滨海省的企业中享有同俄国臣民同等的权利；(4)如萨哈林岛转归日本，俄国政府有权将应归它得的那一半收入转变为资本(租让期为五十年，按“美国交易所”的行情估计其价值为一亿卢布)。俄国在此的全部盘算是：“倘若日本”对美国承租者的“权益提出异议，美国政府是会给予应有的支持的”。所以当拉姆斯多尔弗奏明此事时，尼古拉对这一方案“极表赞同”。但是后来他又对这个滑头的方案能否实现产生了怀疑，甚至担心这个美国人会“滥用”俄国政府的“信任”，干出不好的事情来，所以这个方案就告吹了。② 与打算“保证”萨哈林岛各种企业的利益同

① 见国家稽查局民政统计司1897年档案，«本司秘密公文»，陆军中将安德烈耶夫（阿穆尔军区副司令）1905年3月20日由尼科尔斯克-乌苏里斯克发给E. H. 阿列克谢耶夫的电报。

② 见远东特别委员会办公厅档案第121号卷，阿列克谢耶夫1905年3月某日的奏折，其中陈述了该方案和大臣们对方案的意见。其中科科夫佐夫表示同意采纳这个方案，只是有一个条件，即租让条约以“战前”某时作为签署日期，“以便使这笔交易正式具有更大的效力”。司法大臣当时就指出，“克拉克森如从日本方面得到更有利的提议”，他将会滥用俄国对他的信任，“而他的这种行为将损害俄国政府的威信”。尼古拉批道：“不如拒绝为好。”

时，也是在3月间，彼得堡又打算就满洲矿业公司租让权问题同比利时资本家作类似的交易。当时该公司最有价值的一部分已在日军占领范围。但由于当时局势十分动荡不定，因而还不是达成这笔交易的适宜时刻。①

但是，一等对日和谈代表团最终组成，俄国木材公司中的别佐
548 勃拉佐夫派就首先不安起来了。当时除阿巴扎和马丘宁外，所有实际上徒有其名的股东都通过公证手续退出了公司。阿巴扎本人也声言，该公司预期应得到的进款（四十一万九千零八十七卢布）“是很成问题的”；而据彼得堡所掌握的债款资料，该公司为了顾全体面必须偿付的债款为二十六万五千九百五十二卢布，阿巴扎承认这是“缩小了的”数字。看来这个公司是要彻底垮台了。②阿巴扎想把这个公司完全交给财政大臣照管，但是科科夫佐夫“为了珍惜自己的声誉”，坚决拒绝承担公司的“善后工作”，并竭力主张让尼古拉把这项工作交给阿巴扎和巴拉绍夫去做。③但是尼古拉仍然坚持主张“把迄今为止属于公司的一切权益和租让权统统”“移交”给财政部，“并推断，财政部会想方设法将这些租让权同在满洲归其管辖的其他企业联合经营”，于是关于权益和租让权的各种文

---

① 见第106号卷，比利时人武塔尔斯1905年3月25日给维斯涅格拉茨基的电报，内称，他认为满洲矿业公司的企业总的说来是有吸引力的，但事先还需进行研究。

② 要是相信旺利亚尔利亚尔斯基的说法（《日俄战争起因资料集》，第198页及以下各页），那末，1905年3月23日曾由А.И.伊格纳季耶夫发难在“格谢的宅邸”举行了一次木材公司股东会议。格谢、根德里科夫、旺利亚尔利亚尔斯基、尤苏波夫和谢列勃里亚科夫等人在1903年5月31日的合同停止有效的议定书上签了字，并在合同上加了一段按语，证明他们已退出公司，承认合同停止生效，公司同人彼此间没有提出什么要求，并使阿巴扎和马丘宁“有权在远东使用俄国木材公司的牌号，并有权成立新公司”。

③ 见Б.А.罗曼诺夫：《维特与鸭绿江上的租让权》，载《纪念С.Ф.普拉托诺夫论文集》，圣彼得堡1923年版，第453—457页；并见第213号卷，阿巴扎1905年7月2日给科科夫佐夫的信，科科夫佐夫7月7日的奏折，阿巴扎7月15日给科科夫佐夫的信，科科夫佐夫8月4日的奏折。

件全都送到了财政部。① 这时，阿巴扎急于在和约签字之前正式移交“权益”，同时，他又用奇怪的方式解释自己的这一坚决主张，声称，只有私人财产才可望免受“日本人的觊觎”，并马上强调说，“公 549
司的权益具有私人资产的性质”。② 因此把权益移交给任何人都可以，就是不能给财政部。于是就自然而然地想到了满洲矿业公司。但是这家“私人企业”当时的景况并不比它昔日的竞争者③强。三项最有价值的租让企业中有两项（抚顺和夹皮沟）“已经落入敌人手中”，而“观音山金矿屡遭红胡子的骚扰”，以致任何防范措施都无济于事了。于是，科科夫佐夫效法阿巴扎，于 1905 年 8 月 4 日向尼古拉提出了“暂停满洲矿业公司活动”的问题，要求拨出十七万五千卢布以“清理全部欠帐”，这笔款子正好是木材公司清理费用的一半。④ 这当然并不说明科科夫佐夫认为自己的国营公司就这样寿终正寝了。但如果公司维持迄今为止的老样子，那末在同日本外交界作斗争时，光靠否定公司国营性质的办法是绝对保不住公司的。⑤ 单凭这一点，科科夫佐夫就无须急于接管别佐勃拉佐夫派的那些企业。

起先，早在 1905 年 6 月，就闪现过这样的念头：在即将同日本人发生的争吵中，“以华俄道胜银行的名义发表关于满洲矿业公司权益的声明”。但是随即认为最可靠的办法还是“要使法国”与满洲矿业公司“利害相关”。这就是约请内斯兰“任公司董事，接替已故的罗特什捷英”（死于 1905 年初），而拉姆斯多尔弗则去同法国

① 见第 213 号卷，科科夫佐夫 1905 年 8 月 4 日的奏折和阿巴扎同年 7 月 18 日和 8 月 18 日的信。

② 见同上，阿巴扎 1905 年 8 月 18 日的两封信。

③ 指木材公司。——译者

④ 见科科夫佐夫 1905 年 8 月 4 日“关于满洲矿业公司暂停活动以办理清理事宜”的奏折。阿巴扎得到了三十五万卢布的“清理”费。

⑤ 见第 106 号卷，第 1 部分（Б），璞科第 1905 年 7 月 29 日给拉姆斯多尔弗的信。

550 政府谈判，要求支持俄国外交界，并商讨“倘能维护公司租让权的私营性质”，确实“吸收法国资本使用这些租让权”的可能性问题。① 结果内斯兰自己提出，“除将原属罗特什捷英所有的”股票“名义上转让”给他外，还希望将满洲矿业公司的十万卢布的股票归他“完全所有”，他还要求“以纯私人的方式从银行界上层人士② 中吸收两三个他的代理人参加这桩交易”，其条件与过去关于萨哈林岛的条件一样。③ 接着，我们知道，彼得堡接受了内斯兰的条件，并预定在 1905 年 10 月内斯兰去俄国谈判“国际贷款”时办理这笔交易的正式手续。可以料到，这笔交易没有达成的原因，与国际银行团拒绝贷款给政府是一个理由，当时政府由于10月的罢工被困扰在京城。最后于 1905 年 11 月 18 日给公司董事会派了一名华俄道胜银行的董事博克，才算了结了这桩事。关于此人可以断定，他实际上是美国臣民。④

当 10 月内阁成立时，希波夫接替了科科夫佐夫的职位。这时阿巴扎企图重提旧事，他开了一份木材公司财产细目（价值一百五十六万七千一百七十八卢布），要求保护这份财产免被日本人抢
551 去，“这份财产法律上是私有财产，实际上是国家财产，因为在整个事业中没有私人参与”。⑤ 希波夫试图向华俄道胜银行提出此

① 见第 106 号卷，第 1 部分（Б），维什涅格拉斯基 1905 年 7 月 22 日（8 月 4 日）与内斯兰同年 7 月 28 日（8 月 10 日）的通信，及科科夫佐夫 1905 年 8 月 1 日给拉姆斯多尔弗的信。

② 原文为Haute Banque。——译者

③ 见第 106 号卷，第 1 部分（Б），满矿公司董事会 1905 年 8 月 10 日的报告（科科夫佐夫批道：“同意”）。内斯兰提议：（1）将此事安排在“奉天战役之前”进行，因为那时抚顺还未落入日本人之手；（2）定下一条“非正式”的义务，即俄国政府有权以“两倍于票面的价格”购买法国人的股票。而此外从俄国方面又提出：（1）给内斯兰五厘的利息“以酬谢其帮助”；若公司变为股份公司，则无偿给他百分之五的固定资本；（2）在其他股票分红之前，对他付钱认购的股票加算五厘的红利。

④ 见同上，希波夫 1905 年 11 月 18 日的奏折。

⑤ 见第 213 号卷，阿巴扎 1905 年 11 月 28 日给希波夫的两封信和巴拉绍夫同年 11 月 18 日给阿巴扎的信，内附财产细目。

事，却碰了壁。不仅华俄道胜银行（以А.И.维什涅格拉茨基为代表）坚决拒绝对别佐勃拉佐夫的租让权的命运加以任何干预，而且就是这个现在满洲矿业公司任职的维什涅格拉茨基代表公司声明说，对别佐勃拉佐夫派事务的干涉只会给满洲矿业公司的权益问题"带来不良影响"。① 但希波夫在 1906 年 2 月间还是开始写信商谈木材公司的财产保护乃至恢复其权益的问题，仿佛木材公司还能继续存在（从未有一份正式文据宣告公司最终倒闭），就在这时，尼古拉却亲自干预此事了，这是完全出人意料的事。1906 年 3 月 14 日，财政大臣收到了用一张小信纸写的便条，上面写道："将财政部所存关于木材公司租让权的文件（计六十件）交给宫廷狩猎官伊凡·彼得罗维奇·巴拉绍夫。这些文件是 1905 年由海军少将阿巴扎交给御前大臣科科夫佐夫的。尼"。3 月 5 日，这些文件就同这批"官办"企业一起离开了财政大臣之手。直到半年之后，当巴拉绍夫请伊兹沃利斯基不用"设法保护俄国木材公司在抚顺矿区的权益"，告知他说，"蒙皇上恩准，我们已将全部林木业转让给美国人"时，尼古拉秘密提取文件和攫取木材公司权益一事的原由才得到了解释。②实际上，1906 年 7 月 6 日，阿巴扎和马丘宁在圣彼得堡公证人扎别尔斯基处同美国公民威廉·史密斯签订了出售抚顺煤矿权益的公证合同，售价二百万卢布，并附有一项条 552
件，"如果到 1908 年 7 月 1 日未将条约就矿区议定的款项交给公司，则矿区一切权益仍归公司所有"。但是，这条狡猾的路没有走通，因为日本人牢牢地占据着抚顺。据巴拉绍夫证实说，史密斯"不仅在 1908 年 7 月 1 日之前，而且至今（1914）"他"也没有向公司付

① 见第 213 号卷，А. И. 维什涅格拉茨基 1905 年 12 月 30 日给 Е. Д. 利沃夫的信。

② 见 Б.А.罗曼诺夫：《维特与鸭绿江上的租让权》，第 445—456 页。

过一次钱”，允许他延期付款的期限也早已过了。①

满洲矿业公司各企业的命运终究未见好转，虽然为了拯救这个“皇帝”政策的产儿，把政府所拥有的力量全部动员起来了。公司的“国际化”甚至是在两股力量的推动下进行的。要不是内斯兰退出了公司，到 1906 年公司看起来就完全是一家外国公司了，因为除了美国人博克（普季洛夫的股票转让给他了）外，现在国际银行的一名董事、“巴伐利亚人”韦贝尔也进入了该公司顶替罗特什捷英。② 与此同时，与蒙古矿业公司的比利时股东团的谈判正通过维什涅格拉茨基和武塔尔斯继续进行着，交涉的内容不仅是用他国的旗号掩盖俄国的租让权，而且要他们切实投资以广泛经营这些租让权。满洲矿业公司所有租让企业中对比利时人最有诱惑力的
553 自然是抚顺煤矿，它立刻能确有把握地带来收益。但是，人们所能设想的最大的实际困难也正是这个煤矿，在日本人占领该矿之前，矿区实际上是由中东铁路管理部门经营的，这正是煤矿以后受《朴茨茅斯条约》第六条约束的一个前兆。③

然而在条约尚未公布时，俄方已经完全说服了比利时人“立即以一百万卢布”购买“整个满洲矿业公司”，“倘使日本人不愿交还抚顺”，则比利时人甘愿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维什涅格拉

① 见宫廷事务部办公厅档案第 103 号卷（目录号 194/2682），关于朝鲜问题的来往函件，斯托雷平 1907 年 11 月 22 日给 Н. Д. 奥鲍连斯基的信和 Н. П. 巴拉绍夫 1914 年 6 月 16 日给 С.Д. 萨佐诺夫的信（存巴拉绍夫卷 v1/8）。巴拉绍夫请萨佐诺夫将归还矿区和赔偿 1904 年以来的损失的要求“通知日本政府”。另参见《日俄战争起因资料集》，第 201 页，旺利亚尔利亚尔斯基认为，“我从别佐勃拉佐夫的话中得知，与日本签订和约之后，他有可能因出售在朝鲜及满洲获得的全部租让权而有利可图，并收回他过去所花的全部费用。”但是，就算这里有一部分是实话，那就有一个问题：收回的款项往哪里送？无论如何是不会交国库的（见 Б. А. 罗曼诺夫：《维特与鸭绿江上的租让权》（载《纪念 С.Ф. 普拉托诺夫论文集》，圣彼得堡 1923 年版，第 456—457 页）。

② 见科科夫佐夫 1906 年 7 月 14 日的奏折。

③ 根据这一条，在让与日本的南满支线区域内凡属中东铁路所有或归其经营的所有煤矿，均应转归日本。

茨基于«朴茨茅斯条约»签字前夕在巴黎进行该项交涉，事情进展很迅速。这笔交涉的实质是：比利时人虽要冒风险，但他们无须向俄国政府支付现款，而只付蒙古矿业公司的特优股票即可。但"只有在抚顺问题明朗之前立即达成(交易)"方能照此办理，否则，比利时人就得拿出一百万现款。① 当 10 月 1 日和约批准时，整个实业界都和俄国政府断绝了往来，当时我们尚不清楚，俄国政府将如何摆脱革命和财政危机，这笔交易也就不可能再照原先确定的条件进行了。

1906 年 7 月，在巴拉绍夫将抚顺的自己那部分产业附有条件地卖给美国人史密斯之后一星期，满洲矿业公司的租让企业售与比利时人也只能是有条件的了。现在看得很清楚，"俄国目前的财政状况使它未必能在不久的将来使用国家资金去开发满洲的矿业"。而俄国政府不得不接受蒙古矿业公司的一项附带条件：在两 554
年之内，日本和中国如不承认蒙古矿业公司对抚顺的权益，蒙古矿业公司有权收回"一切让与的权益"。② 同时，中国政府如今断然拒绝承认 1900 年以后俄国占领满洲期间俄国人所得到的租让权有任何效力，因此，满洲矿业公司的唯一无疑不会受到日本方面觊觎的租让权（观音山）也只得归还给中国人。② 公司的所有其他租让权都分布在拟议中的俄日势力范围的分界线以南。关于势力范围分界线的谈判导致 1907 年 7 月签署公开的和秘密的俄日条约。③ 结果，到 1907 年 5 月，财政部认为同蒙古矿业公司的那笔交易已毫无实现的希望了，今后只能设法通过外交途径使中国政府满足俄国六十四万二千卢布的"要求"，以补偿满洲矿业公司为它归还

① 见第 157 号卷，А. И. 维什涅格拉茨基 1905 年 8 月 23 日（9 月 5 日）由巴黎寄给 А. И. 普齐洛夫的私函。

② 见科科夫佐夫 1906 年 7 月 14 日的奏折，并见蒙古矿业公司档案第 4 号卷，蒙古矿业公司和满洲矿业公司同年 8 月 9 日与 8 月 17 日签订的合同。

③ 见第 51 号卷，第 4 部分，财政部办公厅主任 1907 年 5 月 23 日的奏疏。

给中国的那些租让权所花的费用。①但是，1915 年编的满洲矿业公司帐务报告表明，俄国的这一要求并未实现，公司本身也没有进行清理，而国家银行当初以公司股票作抵押给的“贷款”亦未归还。②自然，因抚顺而向日本人提某种要求的问题满洲矿业公司根本没
555 有谈到过，而这一点却是巴拉绍夫曾以木材公司的名义异想天开地提出过的。

III

朴茨茅斯条约切断了中东铁路，留归俄国的是一条干线和从哈尔滨到宽城子这一段南满支线。铁路的清理问题牵涉到一桩极大的财政交易，它要求动员不少于五亿卢布的外国资本，③单凭这一条，铁路的清理问题就是个无比复杂的问题。诚然，早在 1905 年，英国人和美国人都曾在北京提出过“提前赎买”中东铁路的问题，他们愿意为此目的向中国政府提供资金。④但是彼得堡当时就

---

① 见第 106 号卷，第 1 部分，科科夫佐夫 1909 年 9 月 27 日给萨佐诺夫的信。观音山租让权（十一万四千卢布）和三姓租让权（十万零一千卢布）“未抵偿的费用”已包括在上述数目之中，而抚顺的开支则不在其内。

② 见同上，满洲矿业公司代表格劳曼签署的帐务报告。到 1915 年 1 月 1 日，公司在彼得堡俄亚银行中的存款为四万一千五百零九卢布，而华兴利公司在那里的存款为十八万五千二百三十四卢布五十戈比（1906 年帐务报告的同一项目内标明的数字为三万八千六百七十卢布和十六万一千零一十六卢布，见第 157 号卷中的帐务报告）。

③ 1909 年 1 月 1 日中东铁路公司欠俄国政府的债款累计已达五亿五千零五十七万七千三百八十六卢布，其中用债券方式借的债款为二亿七千五百四十一万四千零二十五卢布，1903—1909 年贷款为八千一百九十八万八千零一十卢布，补贴 1903—1904 年及 1907—1908 年营业的费用为五千四百一十一万二千四百九十五卢布，补贴 1904—1906 年营业的费用为六千六百一十一万五千八百二十九卢布。

④ 见第 214 号卷，达维多夫 1905 年 6 月 23 日发自北京给财政大臣的电报，内称，英国人沃尔特·希利尔已与中国政府就赎买中东铁路的借款问题初步从“原则上交换了意见”。并见第 105 号卷，第II部分，璞科第 1905 年 10 月 18 日给外交大臣的急电，内称，“美国资本家”已向南洋大臣建议“贷给中国一笔赎回满洲铁路所必需的款项”。

此事仅仅有所风闻，据我们所知，当时在这方面没有向俄国政府提出过任何建议。外国资本（及其各自政府从政治角度出发）最感兴趣的是南满铁路，这一点是容易理解的。而这个问题在与俄国交涉前，必须先同日本谈妥，其实，“早在1 906 年，在朴茨茅斯条约签字后不久”，美国联合太平洋公司和南太平洋公司① 的经理，拥有 556
铁路股票一亿五千四百万美金的美国铁路大王哈里曼，已经与日本人进行了洽谈。但当时谈判毫无结果。而俄国则被撇在一边。②

即使把出售中东铁路看作一项纯粹的商业业务，假如当时主动在国际市场上提出类似建议，它对俄国政府说来也显然意味着，不是走向完全破产，就是去做一笔赔本的买卖。中东铁路不管多么容易被“切断”，但它毕竟是将帝国在太平洋区域的领地与帝国相连结的唯一“纽带”，即使单凭这一点，停办中东铁路的问题当时对俄国政府说来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因此，在西伯利亚铁路的阿穆尔段线路筑成之前，停办中东铁路的问题是无从谈起的。早在战前，库罗帕特金就曾劝说尼古拉，“我们必须把铁路从斯列坚斯克延伸到哈巴罗夫斯克”；所以在 1905 年的年度预算中就已经拨出七十万卢布，作为初步勘查阿穆尔线路的费用。诚然，1905 年秋季，由于缩减预算而取消了这笔拨款，但在 1906 年春季关于迅即进行勘查工作的问题又急迫地提上了日程，又因为俄国毫无资金，所以便想吸引外国人来承租，其中包括美国人参加承办筑路工程。然而，由于筑路的“私营公司”未能成立，筑路也就成了遥遥无期的

---

① 原文为 Union Pacific, Southern Pacific。——译者

② 见第 214 号卷，Г. 维连金 1909 年 2 月 9 日（22 日）给科科夫佐夫的信。当时提出的问题是“由日本及美国辛迪加共同监督并管理南满铁路”。伊藤博文和桂太郎已赞同这一方案，但事情却因小村寿太郎反对而告吹（见同上案卷，希夫 1908 年 12 月 4 日给维连金的信）。

事了。①这项筑路工程估计要用五年时间完成，需用资金一亿三千
557 万卢布。而俄国外交界在远东则不得不考虑到，由于俄国继续控制北满的战略铁路以及在俄国武力保护下铁路租界地日益扩大这一事实本身所引起的一切后果。②

起先，彼得堡还在装模作样，似乎没有发生任何特别的事情。在中东铁路上也只不过发生了俄、日两国在《朴茨茅斯条约》中明确规定的那些变化，即缩小铁路的规模，并禁止用于战略目的这两点。在同中国的关系方面，预料可能恢复 1896 年的“和平”原则，并打算把这家“私营”铁路公司和中国政府签订的基本合同及此后签订的各项补充协定作为中东铁路今后政策的基础。
558 1906 年在彼得堡组织了一个“审查与中东铁路公司活动有关的各种问题的特别会议”，并着手制定了一些法规条例，这些条例虽未“公布于众”，但其内容不外乎通过明显损害中国主权来对俄国租

① 见《红档》杂志，第 2 卷，第 50 页，库罗帕特金《日记》，尼古拉 1903 年 8 月 5 日“同意了”库罗帕特金的意见：“我们必须将铁路从斯列坚斯克延伸到哈巴罗夫斯克。”参见财政部办公厅秘书处 1903 年第 4 号卷，美国人查尔斯·迈耶 1905 年 10 月 8 日(21 日)及 1906 年 3 月 16 日(29 日)给多尔利阿克的两封信及多尔利阿克 1906 年 5 月 18 日(30 日)和 9 月 1 日(14 日)给迈耶的两封信。查尔斯·迈耶表示不仅希望“尽快动工建筑阿穆尔铁路”，定期五年完成，而且“愿意参加”俄国的“五年发展计划”。因此，1906 年春季，他对“圣彼得堡一些重大企业顺利发展的前景”表示关心，他准备 1906 年 6 月去彼得堡。而多尔利阿克则不仅把阿穆尔铁路问题详细告诉了迈耶，而且使他对彼得堡急待外资的那几家“重大企业”(例如刻赤的工厂，涅瓦工厂)也详知底里，甚至还告诉他许多能引起美国人嫉妒心的谣传〔1906 年 9 月 1 日(14 日)的信中说，“城里议论说，在柏林正在组织一家英、法、比三国联合的辛迪加以收购波兰的全部冶金企业”〕。据多尔利阿克的说法，1906 年春季俄国政府与 M. W. 杰克逊就波罗的海和黑海的连接问题以及阿穆尔铁路问题进行了谈判。但是杰克逊在一项条件中要求划拨给他的“铁路两旁的地段过大”，于是他的建议遭到了拒绝。1906 年秋天，迈耶得知，外国人已经就成立建筑阿穆尔铁路的“私营公司”问题提出了四项建议，其中有两项提议是与美国资本有联系的（即哈里森-古尔德公司和洛伊克·德·洛贝尔的美国辛迪加提的建议）。

② 日俄战争结束后，中东铁路的地方当局已于 1906 年恢复了在铁路区域的购地工作，仅在一年内就得以购置了十四万俄亩的土地（见科科夫佐夫 1909 年秋季关于巡视远东的奏折）。

界地的状况加以调整。① 但是，俄国在这一方面的第一个尝试(在路界内设置民政管理机关）便遭到了中国政府的抗议，列强方面对此亦不予承认，因为这样一来便触犯了外国人的利益，他们当然是希望在俄国铁路区域内如同在中国其他地方那样，以相同的原则保持其治外法权的。俄国政府的上述危险意图一经暴露，围绕着中东铁路的俄中关系就陷入了持续的日趋尖锐的冲突状态之中了。这种冲突每天都阻碍着铁路的商业发展，并促使俄国外交界采取一些软弱无力的步骤，而这些步骤却只使铁路的处境更趋于复杂化。② 一般说来，俄国的军事地位，特别是在远东的军事地位愈是削弱，中国的民族运动以及包括满洲在内的军队改组的征兆愈是明显，俄国外交界的"担心"也更近于事实，即"不冒战争的 559
风险，就不可能保护中东铁路公司在其铁路地带内的行政管理权"。③

① 见大臣会议档案，1906年7月25日"特别会议记录"(关于中东铁路护路军的组织和成分问题，其中包括把名额缩减到朴茨茅斯条约规定的定员，即每公里十五人的问题)；1906年10月17日的会议记录(关于中东铁路沿线建立邮务的问题)；1906年10月17日和24日的会议记录(关于中东铁路区域内设置民政机构的问题，其中包括关于"按俄国和外国在远东的租界地的模式"对铁路沿线居民点实行社会管理的问题)；1907年3月20日会议记录(关于中东铁路的商业和运价政策："无论如何不赞助满洲的加工工业的发展"，并采取一切措施奖励俄国货物输入满洲)；1907年3月20日的会议记录(关于中东铁路沿线组织警察监督的问题，他们"以公司名义活动"，而其"公务活动"则"隶属"内务大臣"领导")等等。

② 见1909年7月28日特别会议记录，美、英、德三国代表"对私营公司享有国际性质的全权是否合法表示怀疑"。于是，俄国外交界"就试图(在北京)加以说明，可以把1896年给予中东铁路公司的租让权转换成给予政府的租让权"，如同中东铁路"建筑初期所设想的那样"。"然而，诚如所料，这一打算遭到了中国政府的坚决反对，与此同时，中国当局的行为开始带有与日俱增的敌视我们的性质，其表现是与中东铁路管理部门发生了一系列冲突"。

③ 当时，外交部"在和财政部讨论该问题的来往信件中不止一次地指出，中东铁路是同中国及'其他外国'产生误会的根源"。见1909年7月28日的特别会议记录。到1909年初，中国军队已经改编完毕，"新军"达十个镇和十六个协，编制为十七万五千人。预计到1913—1914年可达四十万人(见大臣会议办公厅档案，第106号卷，冯·戈伊叶尔1909年5月28日给财政大臣的关于他1909年4月日本之行的报告)。

其实，在这一方面坚持下去是毫无意义的这一点本来就已经日益明显。俄国驻华使团指出："中国人通过不断地找碴纠缠、小规模地侵犯我们的权利范围、想方设法地进行报复和其他各种有组织的进攻性的仇俄行为，无疑对于我们有着不小的影响，使我们在北满的工商业发展停滞，中东铁路货运额不能增加，俄国向边区移民的工作停顿了下来"。俄国使团还指出（正象科科夫佐夫所抱怨的），因此"正在造成了一种困难的局面，在这种局面下中东铁路公司的各种设想都在破灭，公司也不能从本企业中得到什么好处"。不仅如此，铁路管理局长霍尔瓦特还断言，"我们虽然很难
560 准确估计中国人在北满行动的后果，但无论如何将遭到巨大的损失"。① 维特在职时所设计和建成的中东铁路，在日俄战争后已成为俄国各个方面的极其沉重的负担。即使在战后中国人也还"丝毫"不懂得俄国的"全部行动方式"，不了解"我们现在已经放弃了以前关于侵占北满的想法"，在北京的俄国外交官们在任何问题上都只得软弱无力地无可奈何地对待"中国人的成见"②："中东铁路侵犯了中国的主权"。③ 继续推行尼古拉所希望的"独立于其他国家"、自己作主、自担风险的政策是不可能了，④ 这尤其因为战后日本在亚洲大陆上所占的地位，实质上已经使俄国绝无可能推行独立自主的积极政策了。

诚然，如果把俄日两国 1907 年 7 月 17 日（30 日）缔结的秘密政治协定同 1905 年 7 月 30 日（8 月 12 日）的英日同盟条约和 1907 年 6 月 10 日的法日协定结合起来看，似乎秘密政治协定明确地使俄日两国彼此在满洲、朝鲜和蒙古的相互利益及权利取得

① 见驻华使团一等秘书 Б. 阿尔先耶夫 1908 年 12 月 22 日《关于中东铁路的政治权益及状况》的奏疏（我们所用的奏疏副本存普兰松卷）。

② 原文为 idée fixe。——译者

③ 见同上奏疏。

④ 参见本书边码第 29 页注。

了协调，并规定，日本对于珲春、镜泊湖、松花江、嫩江河口一线以北的北满地区完全不得染指。但是，俄国外交代表从朝鲜、东京和北京发来的所有报告一致证实，日本正在火速进行系统的战争准备，正在把南满和朝鲜作为它的战略基地和后方，准备能用于向北方进攻的铁路线、军火库、兵工厂和军营等等。① 到 1909 年春季，561
已形成这样一种局面：日本在战争爆发后的头两个星期内能以十一个师团的兵力在阿穆尔省对俄作战，并能于数日内攻陷水陆两路皆无防御设备的符拉迪沃斯托克。② 俄国外交家清楚地认识到，在这种局势下，日本在俄中纠纷中之所以采取亲俄态度，这并不意味着别的，而只是实行日本政治纲领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纲领旨在挑唆俄国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以便让日本能轻而易举地得到一个借口，使俄国完全离开大洋沿岸。③ 俄国使节们接着指出"日本人的态度极其客气、殷勤和热忱"，"他们和过去一样不惜付出很大努力以讨好俄国人"，但是当这些外交代表将他们和"加紧武装以反对俄国"的情形两相对照时，便意识到，"这种乔装的亲善正开始显示出它是瞬息即逝的"。④

在这种情况下，有人主张，趁现在还不能造成物质损失，不失时机"体面地"撤离满洲，并愈来愈强烈地要求在俄国政府的政治纲领中纳入这种主张，这就不足为怪了。1908 年 6 月，杜马通过了以国库资金动工修建阿穆尔铁路的法案，同时与法国和伦敦的银行家们关于法英新贷款的交涉也在开足马力进行。这笔贷款不

① 见大臣会议办公厅档案，第 106 号卷，其中多处存有俄国驻汉城、东京、北京的使节 1907—1909 年的来往函电。

② 见 1909 年 4 月 14 日特别会议记录，翁捷尔别尔格尔的声明，日本于 1909 年已经拥有"将近一百万军队"（见大臣会议办公厅档案，第 106 号卷，驻日武官 1909 年 10 月 9 日的报告）。

③ 见前引Б.阿尔先耶夫 1908 年 12 月 22 日的奏疏。

④ 如：索莫夫 1909 年 8 月 29 日发自汉城的急电（见大臣会议办公厅档案，第 106 号卷）。

562 仅可以偿还 1904 年的全部短期债款，而且还能剩余实数为一亿三千六百万卢布的款项供俄国政府自由支配。这才使得在中东铁路问题上实行退却的主张具有某种程度的现实性。如果我们没有弄错的话，科科夫佐夫在这方面曾经作出了第一个胆怯的尝试，即缩减铁路线上护路军名额，以此使中国人了解俄国并无侵略满洲的企图。①这一建议以后得到驻北京使团的全力支持（见前引阿尔先耶夫的奏疏），阿尔先耶夫并补充建议，立即向中国声明，"俄国决定在一定期限内清理我们在满洲的企业"。② 同时在彼得堡，连俄国外交部也在就是否提出下述建议进行酝酿讨论："与美、中两国就涉及满洲、乃至太平洋总事态的各项问题缔结一项三国协定"，这项协定的原则是："中东铁路管理当局对路界内出现的城镇的行政管理完全不加干预，而按照外国租界条例，它是理应进行这种管理的。"③ 而在 1909 年 1 月 17 日（30 日），外务大臣梁敦彦经海关税务司英国人裴式楷在北京向科罗斯托维茨转交了一份
563 赎回中东铁路的建议，这使科罗托维茨"极为吃惊"。④最后，1 月 19 日，科罗斯托维茨接到庆亲王的一份照会，其中正式提出了赎回铁路的建议，表示相信，俄国政府会给以同意的答复，并说："这就可以解决有关铁路的一切问题，并使两国的友谊得以巩固"。⑤

毫无疑问，中国政府提出这一建议是以美国资本家为其后台的。但是有迹象说明，美国资本家是俄国政府自己招来的。1908

① 见第 708 号卷，科科夫佐夫 1908 年 10 月 30 日给斯托雷平的信。该信只是在 1909 年 4 月 14 日的特别会议上进行了讨论，科科夫佐夫的提议遭到了否决——"待阿穆尔铁路筑成后再议"。

② 见前引阿尔先耶夫 1908 年 12 月 22 日的奏疏，尼古拉在上面批道"应迅即着手解决这一重要问题。奏疏写得很好"。

③ 见外交部 1908 年 12 月 14 日的奏疏（未署名）（副本存普兰松卷中）。

④ 见第 214 号卷，科罗斯托维茨 1909 年 1 月 17 日（30 日）的电报。

⑤ 见同上，科罗斯托维茨 1909 年 1 月 21 日的电报。参见《宣统朝外交史料》，第一卷，第八——九页，《外交部致俄使廓东省铁路辏辖不清拟赎回自办照会》："俾凡有关系铁路各案皆得一并解释两国交谊益臻稳固。"——译者

年夏季，俄国财政部驻华盛顿代表维连金回到彼得堡。他通过他的美国妻子同美国银行界建立了联系。可能根据他的倡议，他同科科夫佐夫讨论了两个问题：关于吸收犹太银行（库恩—罗比公司银行）参加俄国的财政事务问题，以及就将南满铁路和中东铁路同时出售给"一家国际辛迪加"同日本达成一致意见的问题。伊兹沃利斯基也参预了此事，而以后维连金的活动则是得到两位大臣"赞许"的。维连金返回纽约后，"与库恩—罗比公司银行首脑雅格布·希夫会见过两次"，他"认为希夫对俄国犹太问题的了解是片面的"，于是说服了希夫亲自赴彼得堡，以便"全面了解使他感兴趣的问题的状况"。希夫甚至书面答应说，如果科科夫佐夫邀请他，他就到彼得堡"共同讨论"开放美国金融市场为俄国筹款的问题，"但有一个条件，即俄国政府须同意讨论取消对俄国犹太人的限制问题，使他们同其他居民享受平等权利。①

看来，希夫出访一事后来未见行动。科科夫佐夫也没有向他 564
发出邀请。但是过不多久，在 1908 年 11 月底，希夫被吸引参预了俄国政府的财政事务，"诱惑"他的不仅是"工业订货"（如果俄国在 1905 年不拒绝给摩根以这一"诱饵"，那他在当时就几乎得到了工业订货），也不单是使犹太人享有平等权利（没有这一点，希夫似乎根本不想给沙皇政府以财政援助），而且是在规模极大、投资极多的铁路企业，及与其有关的广泛的商业，财政和政治前景方面作出的让步。维连金正是向希夫提议，"由他倡议"，以发行有担保的债券的方式"实现"赎买满洲铁路的"方案"，亦即希夫所说的，"两条满洲铁路国际化的方案"。维连金和希夫两人都认为，"日本同意参与此事并同意出售南满铁路"是"该方案成功的首要条件"。

① 见第 214 号卷，维连金 1908 年 9 月 15 日（28 日）发自纽约和同年 11 月 21 日（12 月 4 日）发自伦敦给科科夫佐夫的信件，及希夫同年公历 10 月 8 日给维连金信的抄件。

只有在这一情况下，亦即“俄国和日本共同行动”，希夫才同意发起组织“这个至少名义上在美国手中的辛迪加”，“只要条件合理的话”。在1908年12月进行这一谈判时，对日本方面所指望的是日本递信大臣后藤男爵（早在7月间维连金就同他开始了洽谈）和
565 日本银行总裁高桥①（他曾答应帮助希夫）。②因此就开始了三方谈判，而只有美方能够（而且应该）在谈判同时与中国政府进行接洽。但中国政府却未等交涉结束，就急急忙忙地在1909年1月19日向俄国政府正式提出了提前赎回中东铁路的建议。

正当俄国方面已接近于顺利解决出售铁路的问题时，事情却由于日本坚决拒绝“对满洲铁路采取任何措施”而发生了突然变化。这时，日本已经乘这一间隙在伦敦市场上征集了二百万英磅的南满贷款，因此它也就大可“不必着急了”。而这时在中国发生了慈禧太后死去（11月15日）和袁世凯下台（1月2日）这样的政治事件。这两件事促使东京政府“耐心等待今后事态的发展”。③诚然，希夫及其伙伴哈里曼照旧准备“就中国得到中东铁路问题（与俄国）进行谈判”，而不管南满铁路一事的结局如何。但是，彼得堡也学着日本的样子，看来决定不仓卒从事，并“严守观望态度，决不由俄国政府或其任何代表主动提起这桩交易”。于是，维连金接到指示：“暂停与美国资本家的任何谈判，而听其自然，以等待外国资本家或中国政府自己向我们提出合理建议。”④同时暂且给中

① 高桥（是清）应为Takaxacu，本书误为Тагаками。——译者

② 见第214号卷，维连金1908年11月21日（12月4日）和12月1日（14日）给科科夫佐夫的信件，以及希夫同年12月4日给维连金的信和他12月8日的电报。维连金强调指出，“这将是库恩-罗比公司银行参与俄国财政事务的第一步”，并说，这“将使迄今为止认为自己在道义上受到约束的犹太商号不再受到束缚”，“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吸收这些商号参与俄国财政事务，而无须带有涉及俄国犹太问题的任何条件”。

③ 见同上，维连金1909年2月9日（22日）发自东京给科科夫佐夫的信。

④ 见同上，科科夫佐夫1909年3月9日给维连金的信。

国一个“良好的答复”，说俄国“原则上不拒绝它的提议，但是认为，566
该项提议不可能先于阿穆尔铁路的建成而实现”。①

当时，日本不仅不想放弃南满支线属于它的那一部分，而且在1909年夏季在南满表现得如此积极（7月30日给中国的最后通牒，8月22日关于安奉铁路和吉会铁路、关于间岛领土以及关于抚顺、烟台煤矿归日本人的诸项协定），以致使利害相关的美国各界怒不可遏，并提出了一个主张：“鉴于日本违背协定而威胁到中国的独立，所以有必要同俄国达成协议。”② 1909年11月初，美国外交界在彼得堡表示确信，“俄国必需在满洲事务中与美利坚合众国携手前进”，柔克义向伊兹沃利斯基建议实行两国“联合”，从而“最终从国际上制止日本方面以后的侵占行径”，这也仍然是维连金一年前提出的那个“满洲铁路网商业中立化”的方案。

但是，即使如同柔克义向伊兹沃利斯基提议的那样，满洲中立化就是在“军事方面”也“正式”予以实现，那也解决不了俄国太平洋沿岸领地不受日本侵犯的问题。反之，“甚至要担心”日本“在外部压力下失去了在南满的优势地位之后”，会到俄国的滨海省“靠损害我们寻求补偿”。伊兹沃利斯基向美国大使指出了这一点。③“在柔克义的拜访之后”，本野当天“立即”会晤了伊兹沃利斯基，他建议将日、俄之间的现存关系改变为“正式的同盟”（“在该同盟面 567
前不仅中国，而且各大国都将俯首听命”），目的是使俄国能以“日本为靠山，根据1896年的合同勇敢地维护属于中东铁路公司的权益”。因此，俄国外交界对我国远东政策的路线就“必须”“立即作出最后抉择，对尼古拉本人说来，俄国应当选择的路线是十分清楚的，这就是同日本达成最亲密的协议”。正如伊兹沃利斯基所指出

① 见1909年7月28日特别会议记录。

② 见索莫夫1909年8月29日（9月11日）发自汉城的电报，尼古拉在上面批道：“终于等到了！”（莫斯科革命和外交政策档案，1909年的奏折）。

③ 见同上，伊兹沃利斯基1909年11月8日的奏折。

的，这条路线以后确实导致了“俄、日共同保护满洲乃至整个中国的局面，这同美国和西欧各国的愿望是背道而驰的”。① 在不久的将来，此种协议首先在全欧大战时使俄国的后方得到了保障。

柔克义所指出的另一条道路，不仅可以导致“在美国和西欧各国的保护下实行满洲中立化”，而且最终能为沙俄政府开辟通往美国金融市场的道路。1908 年夏季，科科夫佐夫在这方面向希夫作了谨慎的试探，其时，俄国为偿付军事债款和修建阿穆尔铁路，正在又一次与协约国进行借款谈判。科科夫佐夫的这一尝试似乎证实了专制政体扩大其财政基础的意向，以免使俄国的财政活动和政策必须绝对依附于英法银行资本。正当维连金在纽约进行委托给他的谈判时，法国政府的苛刻态度“有时”使科科夫佐夫感到：“法国认为自己富有，而且认定，俄国离了它的黄金就过不下去，于
568 是（在法国政界）就产生了一种奇怪的看法，即俄国不应该做对自己最有益、最有利的事，而应该预先通知法国，看作为当时法国政治生活中影响最大的因素的这个或那个财团，是否赞同纯属俄国内部事务的这种或那种措施。”而科科夫佐夫“尽管十分冷静和心平气和”，但也不得不正式提醒巴黎，“同盟与友谊不是束缚与奴役的同义语”。② 当这幕难演的“喜剧”——票面价值为五亿二千五百万卢布的贷款协议顺利达成时，当农业获得丰收和渴望已久的工业高涨已经有了迹象时，尼古拉政府作出了与日本达成“最亲密的协议”的决定，从而再一次错过了同美国财阀建立业务关系的机

① 见莫斯科革命和外交政策档案，1909 年的奏折，11 月 8 日的奏折和尼古拉在奏折上的批语。

② 见财政部办公厅秘书处档案 1908 年第 1 号卷，科科夫佐夫 1908 年 8 月 31 日（9 月 13 日）给拉法洛维奇的信。科科夫佐夫这里指的是法国政府首脑就俄国向德国订购军舰的谣传给伊兹沃利斯基的行文。

会。[1] 接受日本一味强加的同盟并恢复积极的远东政策的诱惑力在皇村占了上风，虽然这种政策此时都不能超越其帝国主义“朋友”的银行团为俄国所划定的范围。

① 见财政部办公厅秘书处档案 1908 年第 1 号卷，科科夫佐夫 1908 年 8 月 22 日(9 月 4 日)给列维利斯托克的信，内称，“费了很大的劲”才使法国政府同意这种看法，“俄国信誉目前所处的条件与 1906 年 4 月的情况是大不相同的”，信中并谈到巴黎谈判这幕“喜剧”的经过情况。

附　录

1897年的辛迪加和蒙古矿业公司①

中国矿藏勘查公司是于1897年6月14日按照参加者所订的
599 条约创立起来的，资金为五十万卢布，分为一百股，其红利分配如下：辛迪加成员得百分之五十，华俄道胜银行得百分之二十二点五，俄国采金公司得百分之二十二点五，委员会成员得百分之五。委员会成员有：Ф. И. 彼特罗科基诺，A. Ю. 罗特什捷英，A. И. 涅尔平，Н. И. 菲利皮耶夫，Д. Д. 璞科第和В. Ю. 柯乐德。

在条约上签字的辛迪加参加者有：(1)Ф. И. 彼特罗科基诺(10股)；(2)圣彼得堡国际银行(10股)；(3)И. 戈利德什坦德(3股)；(4)A. 罗特什捷英(4股)；(5)A. 科克斯(4股)；(6)C. 帕拉什科夫斯基(1股)；(7)Г. 瓦维利别尔格(3股)；(8)Д. И. 彼特罗科基诺(2股)；(9)Я. 乌京(1股)；(10)P. 沙尔利(1股)；(11)A. A. 波麦兰采夫(2股)；(12)A. И. 涅尔平(2股)；(13) H. H. 鲍格丹诺夫(2股)；(14)И. В. 尤恩克尔公司(2股)；(15)И. 克斯特林(2股)；(16)H. 科斯蒂列夫(1股)；(17)H. 菲利皮耶夫(3股)；(18)C. 克尔别兹(1股)；(19)Ю. 罗特什捷英(1股)；(20)A. 坎(2股)；(21)Д. 舍列舍夫斯基(1股)；(22)埃夫莫尔福普洛(2股)；(23)Ф. 普费伊费尔(半股)；(24)K. 诺特加弗特(1股)；(25)O. 韦贝尔(半股)；(26)齐格列尔·冯·沙弗加乌津(1股)；(27)K. A. 瓦尔古宁(1股)；(28)Э. 乌赫托姆斯基(1股)；(29)B. Ю. 柯乐德(1股)。

① 此件所用资料取自财政部办公厅第三处第23号卷，以及蒙古矿业公司第24、19、11、15、6、4和8号卷。

书面通知华俄道胜银行同意参加辛迪加者有:(30)Ф. И. 彼特罗科基诺;(31)门德尔松,柏林;(32)埃恩·梅,巴黎;(33)贾姆加罗夫兄弟,莫斯科;(34)Э. 内斯兰;(35)Л. 勃罗茨基,基辅;(36)俄国工业合股公司①,巴黎;(37)圣彼得堡国际银行莫斯科分行。

为了经营柯乐德从中国政府获得的在蒙古土谢图汗盟和车臣汗盟境内(沿克鲁伦河及其支流)开发金矿的租让权,辛迪加委员会于1900年1月26日决定成立一家股份公司,资金为三百万卢布,分作一万二千股,每股二百五十卢布(公司章程于1900年4月4日获准)。资金中一百万卢布由"比利时帮"承担。公司董事有:乌赫托姆斯基,A. 布朗·德·蒂埃热,柯乐德,罗特什捷英和A. A. 达维多夫。柯乐德是经理兼公司驻蒙古的全权代表。 600

1899年5月,乌里雅苏台将军向柯乐德颁发了«执照»,准其在辽阔的金矿产地采金二十五年。但若干迹象表明,公司从一开始就不打算把自己的活动仅限于此。② 就在1900年春,华俄道胜银行及其代理机构也已在库伦和乌里雅苏台跟随公司进行活动了。华俄道胜银行的代理机构是交由柯乐德去组织的。他直接提出,"以后"要在蒙古成立一家"与采金公司有关的"蒙古银行。③ 不仅如此,柯乐德在得到自己的这项租让权后,立即于1899年7月在彼得堡见到了维特,维特"原则上同意""他(柯乐德)获取通往张家口的铁路的租让权",即沿着通往北京的那个方向。如同本书前面(边码第237页及以下各页)所述,就在这些日子里,维特正通过向英国人赎购用于山海关铁路的贷款的途径想方设法接近北京。而当1900年春天,早在义和团事件发生之前,当柯乐德对此事的张罗开始松劲时,格尔思就提醒他说,"为此事张罗"

① 原文为Société Générale pour L'Industrie en Russie。——译者

② 见第23号卷,第1部分,«执照»的译文。

③ 见同上,柯乐德1900年8月18日(31日)给罗特什捷英的电报。

"是可取的"。①1901 年 1 月，柯乐德与罗特什捷英进行了商谈，然后又见到了维特。维特此次也"祝他万事成功"。此后，1901 年春（此时义和团事件业已过去），他终于派了两个瑞典工程师"去勘查北京到张家口的距离"，同时，他又派人到张家口去开设华俄道胜银行的分行。他坚信，"他的活动是得到我国政府完全赞同的"。②因此，毫不奇怪，不仅柯乐德本人，甚至如璞科第这样一位了解事态状况、从来都是维特的无可指摘的机敏代理人的人，也根本没有料到，俄国驻库伦领事 1901 年夏季关于上述拟议的工程师之行的报告会在彼得堡引起轩然大波。根据维特的坚决要求，柯乐德立即被解除了华俄道胜银行的职务，关于北京——张家口铁路的任何想法也就同他一起被埋葬了，整个事件则呈现了这样一种状态，仿佛先前彼得堡从未有过类似的考虑。1901 年夏季与 1899 年 7 月确实截然不同，现今的"经济时局"是极为"糟糕的"，满洲这个绞索拉得愈来愈紧了，用于中东铁路的花费无休无止，而同时，上千俄里的新铁路如今显然也同样需要用国库的资金来承建。比利时帮对矿业公司的一百万投资到 1901 年秋已全部告罄，连公司采金企业本身也立即面临破产的危险。③

① 见第 23 号卷，璞科第 1902 年 1 月 16 日给希波夫的私人信。

② 见同上，驻库伦领事希什马廖夫 1901 年 5 月 4 日的报告和上引璞科第的信。

③ 柯乐德遭遇的急遽变化不仅要以事情的本质和新的铁路主张的荒谬来解释，而且还要以纯属个人秉性的某些情况来作解释。当拉姆斯多尔弗就柯乐德派工程师进行勘察一事询问维特时，维特回答说，他"甚至"连张家口铁路的"建筑方案本身也一无所知"。于是，拉姆斯多尔弗就把希什马廖夫报告的一段摘录告诉了维特，这段摘录的意思是维特无论如何不会批准的，这就是：公司"由于参加者的成分"（摘录中列举了这些参加者）与财政大臣的"活动具有最直接的关系"，"财政大臣是公司与银行的主要参加者和领导者，虽然是不公开的"（见第 23 号卷，第 1 部分，拉姆斯多尔弗 1901 年 8 月 8 日的信和维特同年同月 5 日的信）。骤然看来，这一传闻不是别人，而正是柯乐德捅出来的，这可把维特气炸了。参见他在希什马廖夫的报告摘录上关于柯乐德的批语："狗崽子"，和他在拉姆斯多尔弗信上的批语："答复外交部，请该部采取措施，使中国政府不让进行勘查。请告知希什马廖夫，财政部任何人（1 ）也没有参与此事，这是那些与此事有切身利害关系的人们散布的谎言。财政部对柯乐德的活动一无所知（1），

根据我们掌握的各种资料看来，柯乐德并无“任何恶意”，他 601
“是根据自己极端化的理解行事的”。他“办事极为轻率和笨拙”。不到两年，他就把“提供他支配的全部资金花得精光，而且几乎毫无成果，这些钱主要用于不合理地购买美国的各种机器”。然后，他仍然不能“合理经营”已经探明的矿产地。他部分依靠华俄道胜银行的贷款，部分依靠当地的中国人支撑了一段时间。最后，1903年秋季，公司董事会决定同柯乐德断绝关系，并指派了一名专家（工程师）接替柯乐德的职务，而柯乐德本人则“身无分文地”到美国去了，到加利福尼亚矿区“当普通工人”去了。这时，公司欠中国人的债务已达将近十二万卢布，欠银行大约五十万卢布，而根据1904年10月1日的收支结算表，亏损数字为六十六万六千八百八十九卢布。1904年11月，“比利时股东的一位代表”来到彼得堡。他“了解了该项事业的状况后，打算建议自己的委托者再往该项事业投资五十到六十万卢布，企图使整个企业能够自立”。但到12月底，彼得堡获悉，这个比利时人的打算落空了。“其中主要的障碍是极为不利的既成的政治状况”。于是，华俄道胜银行董事会提出了“结束整个事业”的问题。① 然而，科科夫佐夫认为，“从政治角度看来”，“恰恰现在来停办俄国在蒙古的唯一的一项大型工业企业是不合适的，因为随着达赖喇嘛来到库伦，蒙古对我们正具

与此人毫无[!]关系。与此同时我命令，勿使柯乐德参加华俄道胜银行的活动。转告格尔思、达维多夫和希波夫，就说我不同意让柯乐德参加华俄道胜银行的任何活动，我认为他在银行兼职是不合适的。我要求立即执行此事。等罗特什捷英回来后，请转告他，我对柯乐德的任意妄为极为不满，由于罗特什捷英先生的行为而经常令人不愉快，我已对此感到厌烦。如果这种情况仍将重复出现，我将不得不采取措施。致办公厅主任，嘱切实照办”。

① 见第23号卷，第2部分，刘巴1904年7月23日发自库伦的报告和多尔别热夫同年3月26日发自库伦的报告，璞科第1904年9月2日的简要报告和华俄道胜银行董事会同年12月29日给财政大臣的信。并参见蒙古土谢图汗盟和车臣汗盟矿业股份公司1901年和1902—1904年的年度报告。

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于是，又贷给了公司五万卢布的贷款，这笔钱应当使公司“有可能在将近一年之中在较小范围内维持业务，以
602 待在此期间远东的政治局势将能廓清，同时比利时股东对继续公司活动问题的态度也将最终确定”。[①] 我们已经知道，战争刚一结束，把俄国政府在满洲拥有的各种煤矿和金矿租让权统统转交蒙古矿业公司这种诱惑，就在肯定意义上“确定了”“比利时股东的态度”（见本书边码第 552 页及以下各页）。

（以下系股东名单和股份数目，此处从略。——译者）

① 见第 23 号卷，第 2 部分，财政大臣 1905 年 1 月 7 日的奏折。

索　引

1. 人名索引

А

Абаза А, М., 阿巴扎 23, 24, 46, 51, 385, 389, 392, 397, 407, 411, 432, 433, 436, 437, 442, 443, 448, 450, 452, 457, 460,461,463—465, 497, 507, 548—551.

Александр III, 亚历山大三世 52, 53, 56, 62, 63, 64, 475, 484.

Александ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в. кн., 亚历山大·米海洛维奇大公 384, 385, 386, 389, 394, 396, 397, 399.

Алексеев Е. И., Е. И. 阿列克谢耶夫 24, 37, 38, 46, 51, 249, 252—254, 258, 264, 266—268, 272, 314, 347, 371, 406, 408, 409, 421, 423, 429—431,433,435, 437, 439, 441—443, 447, 448, 454, 456—460, 497, 507, 546, 547.

Алексеев К. А., К. А. 阿列克谢耶夫 152, 155, 156, 159, 177, 178, 179, 207, 208, 331, 333, 337, 339, 342, 343, 347, 364, 424.

Алексеев Я. Г., Я. Г. 阿列克谢耶夫 162.

Алексе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в. кн., 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大公 69, 71, 72, 74, 76, 77, 407, 436, 448, 518.

Альберт М.О. 阿利别尔特 386, 389, 397.

Альвенслебен Г., гр., 阿尔文斯勒本伯爵 333, 338, 347, 353, 356—358, 360, 488, 506.

Андреев ген., 安德烈耶夫将军 546.

Аоки, 青木 421.

Апраксин, гр., 阿普拉克辛伯爵 372.

Арко, гр., 阿尔科伯爵 498.

Арсеньев Б. К., 阿尔先耶夫 560—562, 564.

Асташев Н.В., 阿斯塔舍夫 372, 376, 380.

Б

Бадмаев П. А., 巴德马耶夫 61—64, 82—84, 108.

Балашов И. П., 巴拉绍夫 23, 389, 405, 432, 447, 450—454, 458—460, 464, 477, 548, 550—553, 555.

Балмашов С. В., 巴尔马绍夫 403.

Бальфур Артур-Джемс, 巴尔

福，阿瑟—詹姆斯 477.
Баррер Камилл, 巴雷尔，卡米耶 477.
Баш (Bush), 布什 84, 102—104, 137, 138, 211.
Безобразов А. М., 别佐勃拉佐夫 18, 20—24, 44, 46, 51, 178, 362, 385, 387, 388, 391—411, 428—433, 437—439, 442—444, 448—461, 492, 551.
Беляев Я. П., 别利亚耶夫 389.
Бенак (Benac), 贝纳克 514, 515.
Бенкендорф А. К. гр., 宾肯多尔弗伯爵 426, 427, 448, 518, 531.
Берг К. В. 别尔克 382.
Бернсторф, гр., 贝尔恩斯托尔夫伯爵 525.
Бецольд, 别佐尔德 477.
Богданов Н. Н., 鲍格丹诺夫 591, 599.
Бок П. А., 博克 382, 550, 552.
Бомпар М., 博姆帕尔 476, 488, 484, 514, 515, 542.
Бридон Роберт (Bredon), 裴式楷 562.
Бринер Ю. И., 勃里涅尔 178, 385, 386.
Брис Ренэ, 布里斯，勒内 89.
Бродский Л., 勃罗茨基 599.
Броун Леви, 柏卓安 141, 155, 177, 178, 179.
Броун де Тьеж А., 布朗·德·蒂埃热 599.
Буржуа Леон, 布尔热瓦，莱昂 535.
Бутирон, 比蒂龙 331.
Бюлов, Бернг., гр., 比洛伯爵 181, 188, 210. 256, 282, 308, 352, 357, 358, 360, 361, 363, 478, 488, 490, 491, 495—502, 504, 506, 507, 509, 512—514, 516, 519—525, 530.

В

Вальдерзе Альфр., гр., 瓦德西伯爵 258—260, 278.
Вандербильт Корнелий, 旺代比尔特 474.
Ванновский П. С., 瓦诺弗斯基 67, 68, 72, 74, 76.
Вань Вэньшао, 王文韶 329, 341, 345, 348, 381.
Варгунин К. А., 瓦尔古宁 482, 591, 593, 599.
Вебер К. И., 韦贝 149. 159.
Вебер О. О., 韦贝尔 552, 599.
Вернейль (Verneuille), 韦纳伊 510, 511, 541, 544, 545.
Верстрат М., 韦尔斯特拉特 485—487.
Верт А., 维尔特 91, 178, 485.
Виленкин Гр. А., 维连金 556, 563—566.
Вильгельм II, 威廉二世 11, 15, 60, 79, 80, 81, 180—186, 210, 213, 253, 255, 259, 261, 294, 338, 352, 356—362, 364, 479—481, 483,

489, 490, 495, 499, 501—509, 513, 516, 517, 519—525, 531, 537, 538.
Витте С. Ю., 维特 4, 12, 18, 20—24, 37, 39—51, 54—68, 72—80, 82—85, 87—92, 94, 96—101, 103, 106, 108—119, 122—126, 128, 131—135, 138, 144, 146—161, 167—179, 186—208, 210, 211, 216—239, 243—253, 257—267, 271—294, 296—303, 309, 312—350, 352, 354, 357, 359, 361—363, 366—379, 382—388, 390—419, 424, 425, 428—440, 443—446, 449, 450, 455, 458, 463, 464, 467, 470, 472, 476, 480—489, 492, 495, 498, 511, 514, 519, 520, 523—534, 538, 541, 560, 600, 601.
Владими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в. кн.,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大公 518.
Владимиров, 弗拉基米罗夫 91.
Вогак К. И., 沃加克 66, 143, 152, 262, 410, 429, 451, 453—458.
Вонлярлярский В. М., 旺利亚尔利亚尔斯基 385, 389, 397, 399, 406, 432, 453, 461—463, 548.
Воронцов-Дашков И. И., гр., 沃隆佐夫—达什科夫伯爵 385, 387, 389—394, 399, 411, 412, 489.
Вуильемон (Vouillemon), 武伊勒蒙 91.
Вутерс (Wouters d'oplinter), 武塔尔斯 547, 552.
Вышнеградский А. И., А. И. 维什涅格拉茨基 547, 550—553.
Вышнеградский И. А., И. А. 维什涅格拉茨基 52—55, 475.
Вэнь, 文(韫) 375.

Г

Ганото Габр. (Hanotaux), 阿诺托 184, 200, 485.
Гарриман Эдвард-Генри (Harriman), 哈里曼，爱德华—亨利 555, 565.
Гацфельдт, гр. (Hatzfeldt), 赫茨费尔德伯爵 185, 200, 308, 309, 310.
Гаяси Т., 林(董)伯爵 147, 308, 309, 311, 312, 316, 317, 330, 338, 498.
Гейкинг, бар., 海靖男爵 182, 185, 191.
Гендриков В. А., гр., 根德里科夫伯爵 389, 397, 548.
Генрих, принц Прусский, 亨利，普鲁士亲王 254, 255, 358, 362.
Гернгросс А. А., 格尔恩格罗斯 280.
Гессе П. П., 格谢 405, 548.
Гинцбург Г. Г., бар., Г. Г. 金茨布尔格男爵 399, 401, 451.
Гинцбург Г. Е., бар., Г. Е. 金茨布尔格男爵 591.
Гирс М. Н., М. Н. 格尔思 248, 262, 264, 273, 277, 278, 282, 283,

301, 302, 317—321, 324, 325, 600, 601.
Гирс Н. К., Н. К. 基尔斯 53, 66.
Гиршман Г. Е. 基尔什曼 267.
Гогенлоэ Хлодвиг, кн. (Hohenlohe), 霍恩洛厄, 路德维希公爵 88, 181—186.
ф.-Гойер Л. В., 冯·戈伊叶尔 34, 559.
Гольдштанд И., 戈利德什坦德 599.
Гольштейн Фриц (Holstein), 霍尔斯泰因, 弗里茨 310, 473, 490, 501, 504, 520, 522, 523.
Госкье (Hoskier), 奥斯基埃 89.
Гото, бар., 后藤男爵 564.
Готтингер Жозеф (Hottinguer), 霍丁格尔, 约瑟夫 89, 91, 487, 511, 512.
Грауман Л. Ф., 格劳曼 382, 554.
Гриль, франц инж., 格里勒, 法国工程师 151.
Гродеков Н. И., 格罗杰科夫 272.
ф.-Грот В. Ю., 柯乐德 108, 110, 117, 118, 149, 193, 239, 599—601.
Грэй Эдвард, 格雷, 爱德华 535.
Гэй Джон (Hay), 海约翰 16, 19, 304, 343, 345, 352, 422, 473.
ф.-Гюббенет А. Я., 冯·丘别涅特 54, 82.

Д

Давидов А. А., А. А. 达维多夫 382, 593, 599.
Давыдов Л. Ф., Л. Ф. 达维多夫 377, 555, 601.
Дашков П. Я. 达什科夫 389.
Дековиль П. (Decauville), 德科维勒 474—475.
Делонкль Франсуа, 德隆克勒, 弗朗塞瓦 476.
Делькассэ Т., 德尔卡塞 257, 258, 331, 476, 477, 485—487, 510—516.
Ден А. Е., 坚 381.
Джаксон (M. W. Jackcon), 杰克逊 557.
Дидерихс, герм. адм., 迪德里希斯, 德国海军大将 183.
Дмитриев-Мамонов А. Э., 德米特里耶夫—马蒙诺夫 451, 452, 458.
Доризон (Dovizon), 多里宗 545.
Дорлиак Л. Ф., 多尔利阿克 513, 544, 557.
Дреземейер, агент Р.-Кит. б. в Манчжурии 德列泽麦伊耶尔, 华俄道胜银行驻满洲的代理人 373.
Дуань, принц., 端王 247, 264.
Дурново П. Н., 杜尔诺沃 447.
Духовской С. М., 杜霍夫斯科伊 97—100, 103, 131, 137.
Дэв П. (Deves), 德韦 474.

Дюбайль Жорж, 吕班 91.

Е

Емельянов, золотопром., 叶米里扬诺夫，采金企业家 372.

Ж

Жерар Огюст, 施阿兰 93, 102, 120.

Жермен (Germain), 热尔曼 490.

Живатовский, подрядчик, 日瓦托夫斯基，承包商 453.

Жуйань, 瑞安 267.

З

Забельский, нотариус, 扎别尔斯基，公证人 551.

И

Игнатьев А. П., гр., 伊格纳季耶夫伯爵 460, 465, 548.

Игнациус С. В., 伊格纳齐乌斯 162, 163, 280.

Извольский А. П., 伊兹沃利斯基 33, 302, 306, 322, 342, 343, 347, 356, 364, 535, 536, 546, 551, 563, 566.

Иогансон К. М., 约甘松 382.

Ирвинг, доктор, 伊尔文，医生 108.

Ито Хирубими, кн., 伊藤博文公爵 316, 330—340, 343, 351, 398, 480, 556.

К

Казарин А. И., 卡扎林 381.

Калистратов А. Е., 卡利斯特拉托夫 449.

Камбон Пьер, 康邦，皮埃尔 359, 477.

Кан А., 坎 599.

Каннист Д. А., гр., 卡普尼斯特伯爵 68, 97—99.

Кассини А. П., гр., 喀西尼伯爵 84, 95, 99, 101—105, 108, 109, 138, 150, 180, 243, 244, 302, 304, 305, 342, 343, 346, 422, 517.

Кацура Тароо, кн., 桂太郎公爵 316, 556.

Квецинский, воен. ком. в Мукдене, 克维增斯基，驻奉天的军务委员 458.

Кербедз С. И., 克尔别兹 162, 163, 166, 178, 246, 280, 599.

Кестлин И., 克斯特林 599.

ф.-Кеттлер, 冯·克林德 248, 255.

Кимберлэй, лорд., 金伯雷勋爵 11, 69.

Киндер, англ. инж., 金达，英国工程师 99, 100, 173.

Кларксон, 克拉克森 546, 547.

Козловский В. И., кн. 科兹洛夫斯基公爵 389.

Коковцов В. Н., 科科夫佐夫 27, 49, 461, 463—470, 493, 494, 496, 499, 500, 508, 509, 511—515, 519,

520, 525—532, 534, 535,537,538, 541—545, 547—554, 556, 557, 559, 562, 563, 565, 601.
Комура Ютаро, бар., 小村寿太郎男爵 322, 328, 424, 425, 448, 556.
Конджер Эдвин (Conger), 康格 30, 259, 422.
Копытов Н. В., 科佩托夫 82.
Коростовец И. Я., 科罗斯托维茨 267, 268, 562, 563.
Костылев Н., 科斯蒂列夫 599.
Кох А. Ф., 科克斯 178, 237, 238, 599.
Кремер О. К., 克列麦尔 69.
Кристи Г. И., 克里斯季 389.
Кротков Н. Н., 克罗特科夫 372.
Крузе Ф. М., 克鲁泽 397.
Крэнборн, лорд, 克兰伯恩勋爵 426.
Куазо Л. (Coiseaux), 库瓦索 474.
Куврё А. (Couvreux), 库弗勒 474.
Курино, 栗野 426, 448,460,498.
Куропаткин А. Н., 库罗帕特金 20, 23, 37—39, 42—44, 46, 47, 51, 80, 226, 252—259, 266—273, 278, 280, 283, 289, 293, 301, 315, 320, 321, 342, 347, 394, 397, 406, 408, 409, 414—419, 425, 429, 431—433, 437, 439, 444—448, 470, 491, 507, 511, 519, 556.
Кутузов Л. М., 库图佐夫 381.

Л

Ламсдорф В. Н., гр., 拉姆斯多尔弗伯爵 20, 37, 40, 42, 66, 143, 150, 176, 183, 202, 203, 207, 211, 214—218, 244, 247, 249, 252—259, 261, 262, 264, 267, 273, 278, 279, 282—284, 288, 292, 294—297, 301—307, 312—325, 328—339, 341, 345—348, 350,352,353, 356—364, 368, 369, 383,384,398, 406, 415—422, 426, 428,429,431, 433—436, 439, 445, 448,460,478, 479, 492, 493, 499, 501—512, 517—525, 529, 533, 536, 547, 549, 600, 601.
ф.-Лангерке-Мейер, 冯·朗格尔克—迈耶 517.
Лауенштейн, 劳恩施泰因 254.
Лессар П. М., 雷萨尔 213, 321—323, 332, 340, 342, 345—347, 384, 416, 420, 425, 434, 435, 437—439.
Лесюёр Ж. (Lesueur), 勒絮尔 474, 475.
Летельэ Е. (Letelier), 勒泰利埃 474.
Ливачан (Лянь Чженчэн), 李华昌(梁显诚) 374.
Линевич Н. П., 利涅维奇 259, 514.
Литтауер С. И., 利陶耶尔 382, 593.
Ли Хунчжан 李鸿章 13, 17, 48,

49, 69, 103, 105—118, 120, 122, 124, 133—135, 161, 163, 170, 171, 173, 175, 180, 182, 190—192, 194, 196, 197, 199, 201, 205, 207, 210, 234, 239, 246, 250, 251, 253, 257, 260—265, 273—277, 281, 287, 288, 292, 301, 304, 305, 314, 317—332, 341, 349—351, 361, 396.

Ли Цзинмай, 李经迈 325.

Ли Цзинфан, 李经方 107, 263—266.

Лобанов-Ростовский А. Б., кн., 洛巴洛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 69—77, 83, 84, 88, 90, 92, 98, 101, 105, 106, 108, 109, 111, 113, 135, 142—149, 189, 203, 313.

Ло Фынлу, 罗丰禄 107.

Луццати, 卢扎提 491.

Львов Е. Д., Е. Д. 利沃夫 551.

Львов Ф. А., Ф. А. 利沃夫 402.

Лэнсдоун Генри-Чарльз, маркиз, 兰斯多恩, 亨利·查尔斯侯爵 19, 303, 305—310, 317, 319, 330, 338, 426, 427, 448, 490, 491, 526.

Люба В. Ф., 刘巴 371—373, 601.

Лянь Дуниен, 梁敦彦 562.

Лянь Фан, 联芳 341, 347, 421.

M

M. граф (японец), M. 伯爵(日本人) 424.

Макеев, 马克耶夫 83, 85.

Матюнин Н. Г., 马丘宁 383—386, 389, 401, 402, 405, 461, 548, 551.

Мейер Чарльз, 迈耶, 查尔斯 526, 527, 557.

ф.-Мендельсон-Бартольди Эрнст, 冯·门德尔松—巴托尔德, 恩斯特 87, 488, 498—500, 511, 512, 514—516, 520, 524, 534.

Меттерних, гр., 梅特涅伯爵 355, 360, 361, 490, 506.

Мещерский В. П., кн., 麦谢尔斯基公爵 411.

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в. кн., 米海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大公 514.

Моллендорф, 穆麟德 8, 151, 152.

Монтебелло, гр., 蒙泰伯洛伯爵 75, 258.

Морган Пирпонт, 摩根, 皮尔庞特 525—527, 529, 530, 564.

Морган Причард, 摩根, 普里查德 176, 224.

Моренгейм Арт. П., бар., 莫连盖姆男爵 199.

Мотоно Ичиро, 本野一郎 33, 567.

Муравьев М. Н., гр., 穆拉维约夫伯爵 90, 114, 132, 153—156, 160, 168, 172—176, 178—191, 193, 195, 196—201, 203—206, 210, 213, 215—232, 234, 235,

243—250, 252, 291, 348, 383, 385, 393.
ф.-Мюльберг, 冯·米尔贝格 490.

Н

Нагель А. Б., 纳格利 381.
Незабытовский И. А., 涅扎贝托夫斯基 373.
Нелидов А. И., 涅利多夫 479, 493, 494, 496, 499, 500, 510, 512, 514—516, 521, 522, 524—527, 535.
Непорожнев Н. И. 涅波罗日涅夫 386.
Нератов Д. А., 涅拉托夫 386.
Нерпин А. И., 涅尔平 193, 591, 599.
Нецлин Э., 内斯兰 89, 91, 94, 485. 487, 512, 530, 533, 542—545, 549, 550, 552, 599.
Нечволодов полковник, 涅奇沃洛多夫上校 546.
Николай II., 尼古拉二世 12, 15, 18, 21, 29, 37, 40, 42, 46—50, 56, 60, 70—83, 95, 99, 119, 132—134, 143, 144, 168, 178—189, 191, 193, 195, 201, 205, 213, 226, 248—259, 264—267, 275, 278, 282—284, 293, 294, 303, 307, 314, 323, 324, 355—364, 368, 377, 384—392, 396—412, 415, 416, 419, 421, 424, 428—433, 436—449, 452, 453, 456—461, 465, 471, 473, 478—484, 488—492, 495—509, 512—524, 530, 531, 536—538, 547—549, 551, 556, 560, 566, 567.
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в. кн.,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 385, 513.
Никольсон Артур, 尼科利松·阿尔图尔 535, 536.
Ноайль, маркиз, 诺埃莱侯爵 363.
Нокс (Phil. C. Knox), 诺克斯 30, 34.
Ностиц Г. И., гр., 诺斯季茨伯爵 389.
Нотгафт Ф. К., 诺特加弗特 91, 178, 599.

О

Оболенский Н. Д., кн., 奥鲍连斯基公爵 552.
Оболенский-Нелединский-Мелецкий, В. С., кн., 奥鲍连斯基—涅列金斯基—美列茨基公爵 357.
Обручев Н. Н., 奥勃鲁切夫 68, 74, 76, 77.
Орлов-Давыдов, гр., 奥尔洛夫—达维多夫伯爵 389.
Остен-Сакен Н. Д., гр., 奥斯坚—萨肯伯爵 186, 206, 210, 253, 255, 282, 294, 357, 359, 360, 490, 492, 501—503, 508, 521, 533.

П

Павлов А. И., 帕夫洛夫 194,

196, 197, 190, 203, 211, 399, 416, 418, 419.
Палашковский С. Е., 帕拉什科夫斯基 599.
Палицын Ф. Ф., 帕利增 513.
Пендезек (Pendezek), 庞德泽克 357, 478.
Петров А., 佩特罗夫 412.
Петрококино Д. И., Д. И. 佩特罗科基诺 591, 599.
Петрококино Ф. И., Ф. И. 佩特罗科基诺 599.
Петрококино фем. И., Ф. И. 佩特罗科基诺 193, 482, 510, 591, 599.
Плансон Г. А., 普兰松 420—422, 439, 497, 498, 560, 562.
Плеве В. К., 普列维 18, 21, 24, 403, 407, 410, 432, 446—448, 450, 457, 461, 465.
Плеске Э. Д., 普列斯克 449, 452, 453, 456, 467.
Победоносцев К. П., 波别多诺斯采夫 52.
Позднеев Д. М., 波兹德涅耶夫 235, 237, 317, 318, 323—332, 340, 341.
Покотилов Д. Д., 璞科第 29, 53, 91, 101—108, 120, 134, 148—156, 171—173, 175, 176, 178, 190—201, 203—205, 215, 216, 218, 237, 238, 245, 262—264, 266, 267, 273—277, 289, 301—303, 306, 314, 342, 344—348, 364, 369, 370, 373—375, 379, 381, 382, 384, 402, 405, 421, 430, 438, 452, 458, 485, 549, 555, 599—601.
Половцов А. А., 波洛夫佐夫 43.
Поляков Л. С., 波利亚科夫 397.
Померанцев А. А., 波麦兰采夫 591, 599.
Попов золотопромышл., 波波夫, 采金企业家 372.
Посьет К. Н., 波谢特 51.
Протасьев И. Н., 普罗塔西耶夫 430, 431.
Пуанкарэ Р., 普安卡雷 533, 541, 542.
Путилов А. И., 普季洛夫 377, 381, 382, 493, 515, 552, 553.
Пфаффиус А. Е., А. Е. 普法菲乌斯 381.
Пфаффиус К. Е., К. Е. 普法菲乌斯 380, 381.
Пфейфер Ф., 普费伊费尔 599.

Р

Радолин, кн., 拉多林公爵 88, 94, 180—182, 188, 206, 256, 261, 294, 476—478, 490, 524, 525.
Распопов Н. А., 拉斯波波夫 441, 481.
Рафалович Артур Л., 拉法洛维奇, 阿尔图尔 87, 88, 96, 476, 477, 486—488, 493, 494, 500, 511, 514, 515, 533.
Ревельсток, лорд, 雷维尔斯托克

勋爵 518.
Ристельгюбер, 里斯捷利丘别尔 94.
ф.-Рихтгофен, 冯·里希特霍芬 254, 255, 360.
Рихтер О. Б., 里赫捷尔 132.
Родзянко М. В., 罗江科 389.
Рождественский З. П., 罗日杰斯特文斯基 496, 507.
Розен Р. Р., бер., 罗津男爵 416—419, 435, 436.
Розенфельд А. Ю., 罗津费利特 382.
Рокхиль Уильям, 柔克义 566.
Романов П. М., 罗曼诺夫 91, 101, 114, 116, 150, 157, 158, 162—165, 168—171, 177, 178, 207, 210, 215—218, 267, 277, 284, 377, 452, 467, 474.
Ромберг, 罗姆贝格 499.
Росс, 罗斯 375.
Ротшильд, лорд (лондонский), 罗士查尔德勋爵(伦敦的) 477, 518, 526, 530, 531.
Ротшильд (парижский), 罗士查尔德(巴黎的) 398, 477, 519, 530, 531, 533.
Ротштейн А. Ю., 罗特什捷英 89, 91, 94, 108, 110, 116, 117, 120, 121, 123, 134, 155—158, 168—170, 178, 193, 238, 239, 377—379, 385, 388, 450, 483, 484, 486, 549, 550, 552, 591, 593, 599—601.
Рувье, 鲁维埃 491, 510, 514—516, 519, 525, 527, 530—532, 541.
Рузвельт Т., 罗斯福 30, 31, 473, 498, 514, 516, 517.
Русин А. И., 鲁辛 306, 442.
Рутковский М. В., 鲁特科夫斯基 474, 526, 527.

С

Сазонов С. Д., 萨佐诺夫 552, 554.
Сатоу Эрнест, 萨道义 305, 319.
Сахаров В. В., 萨哈罗夫 432, 433.
Сеймур, адм., 西摩海军上将 248.
Серебряков М. Аполл., 谢列勃里亚科夫 389, 397, 548.
Сипягин Д. С., 西皮亚金 252, 257—260, 293, 360, 362, 398, 400.
Скидельский, подрядчик, 斯基杰利斯基, 承包商 453.
Скотт Чарльз, 斯科特, 查尔斯 215, 220, 221, 225, 229, 230, 303, 305, 306, 363, 364, 426.
Смит Уильям, 史密斯, 威廉 551—553.
Соловейчик А. Э., 索洛维伊奇克 382.
Сольсбэри Роберт-Артур, маркиз, 索尔兹伯里, 罗伯特—阿瑟, 侯爵 197, 200, 212, 220, 229, 253, 309, 316, 318.

Сомов А. С., 索莫夫 561, 566.
Спринг-Райс Сесиль, 斯普林—赖斯, 塞西尔 473.
Стааль Е. Е., 斯塔阿利 199, 200, 226.
Старцев, 斯塔尔采夫 85, 91.
Столыпин П. А., 斯托雷平 27, 541, 552, 562.
Суботич Д. И., 苏鲍季切 21, 38, 39.
Сузуки, 铃木 333.
Сумароков-Эльстон Ф. Ф., гр., 苏马罗科夫—埃里斯顿伯爵 389.
Сутэми, 须出 316.
Сюй Цзинчэн, 许景澄 117, 126, 199, 238, 329.

Т

Такахаси, дир. Япон. банка, 高桥, 日本银行总裁 564.
Такшин 塔克什讷 341
Тимашев С. И., 季马舍夫 529.
Толстой Л. Н., гр., 托尔斯泰伯爵 361.
Тоуер Р. (Tower), 托尔 517.
Троицкий А. А., 特罗伊茨基 374, 381, 487.
Тыртов П. П., 蒂尔托夫 416.

У

Унтербергер, П., 翁捷尔别尔格尔 561.
Уольслэй, лорд, 沃尔斯利勋爵 199.
Утин Я. И., 乌京 599.
Ухтомский Э. Э., кн., 乌赫托姆斯基公爵 61, 105, 108, 109, 116—118, 121, 149, 161—163, 168—178, 188, 192, 250—253, 257—260, 263—267, 273—278, 304, 326, 327, 599.
Уэбб (Creighton Webb), 韦伯, 克赖顿 474, 475.

Ф

Федоров Н. Н., 费多罗夫 389.
Филипьев Н. И., 菲利皮耶夫 193, 599.
Фредерикс В. Б., бар., 弗列杰里克斯男爵 386, 389—391.

Х

Харт Роберт, 赫德, 罗伯特 7, 8, 178, 416.
Хикс-Бич, 希克斯—比奇 200.
Хилков М. И., кн., 希尔科夫 84.
Хиллиер Вальтер, 希利尔, 沃尔特 555.
Хорват Д. Л., 霍尔瓦特 559.
Ху Юйфын, 胡燏棻 173, 175.
Хэнт (Hunt), 亨特 375, 401.

Ц

Цзы Си, 慈禧 17, 117, 163, 170, 246, 250, 421, 565.
Цзэн, 增(祺) 267.
Цзяньвеньси, 蒋文熙 267.

Циглер ф.-Шафгаузен Э. К., 齐格列尔，冯·沙弗加乌岑 162, 164, 165, 170, 237, 238, 599.
Цин, кн., 庆亲王 264, 277, 321, 324, 328, 329, 340—347, 381, 420—423, 563.

Ч

Чарыков Н. В.,恰雷科夫 86—88.
Чемберлен О., 张伯伦 359, 477.
Череванский В. П., 切列凡斯基 132, 461.
Чжан Иньхуань, 张荫桓 48, 107.
Чжоумянь, 周冕 267.
ф.-Чиршский, 冯·契尔希基 182—184.
Чихачев Н. М., 奇哈切夫 68, 74.

Ш

Шабриер, 夏布里埃 91.
Шанявский А. Л., 沙尼亚夫斯基 372.
Шарлье Р., 沙尔利 591, 599.
Шванебах П. Х., 什凡涅巴赫 461, 463.
Шенк ф.-Швейнсберг, 申克·冯·施文施贝格 94.
Шипов И. П., 希波夫 112, 113, 257, 284, 326, 328, 486, 532, 550, 551, 600, 601.
Шифф Якоб 希夫, 雅各布 496, 526, 556, 563—565.
Шишкин Н. П., 希什金 67, 152.
Шоклэй, амер. инж., 肖克利，美国工程师 176, 177.
Шпейер А. Н., 什佩伊耶尔 179, 219.
Шпек ф.-Штернбург, 施佩克·冯·施特恩贝格 473, 498, 517.
Штейн Е. Ф., 什捷英 364.

Щ

Щербатов П. Б., кн., 谢尔巴托夫公爵 389.

Э

Эвморфопуло Г. И., 埃夫莫尔福普洛 599.
Эдуард VII, 爱德华七世 317, 362, 477.
Экардштейн, 埃卡尔德施泰因 308—312, 316, 363, 476.

Ю

Юань Шикай, 袁世凯 329, 344, 421, 565.
Югович А. И., 尤戈维奇 162, 166, 251, 280, 322, 370, 413.
Юсупов, кн., 尤苏波夫 389, 397, 548.

Я

Ягодин Г. И., 亚戈金 382.
Ямагата, 山县 142, 144.
Ямамото, 山本 364.
Ян Ю, 杨儒 284, 303.

2. 内容和地名索引

A

Австрия, 奥地利 491, 534.

Ажехэ, р. и г., 阿什河 372.

Айгунь, 瑷珲 34, 136, 252.

Акционерные компании и Товарищества: 股份公司和公司

Акционерное Общество Цзяпигоуских Рудников, 夹皮沟金矿股份公司 382.

American China Development C-o 华美启兴公司 102.

Амур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Пароходства и Торговли, 阿穆尔轮运和贸易公司 83.

Англо-Русская Компания (Anglo-Russian Exploration C-ny), 英俄开拓公司 375, 378, 381, 382.

Англо-Франко-Бельгийский синдикат для скупки польских предприятий (проект 1906 г.), 收购波兰企业的英法比联合公司 (1906 年方案) 556.

Верхне-Амурская Золотопромышленная Компания, 黑龙江上游金矿公司 372.

Восточно-Азиатская Промышленная Компания, 东亚工业公司 387, 388, 391, 392, 395, 396, 399, 400, 405, 410, 455, 462—465.

Harrison, Gould and C-o (амер.) 哈里森—古尔德公司 (美) 556.

Zee Pau Mining Company (анг.-рус.) 济宝矿业公司(英俄) 382.

Ильберт и К-о (англ.), 吉尔伯特公司(英) 375.

Ишэнсин (Мукденьская Горнопромышленная К-о, рус.-кит.), 义胜鑫(中俄奉天矿业公司) 379, 381, 402.

Компания золотопромышленников гр. Апраксина, Попова и Емельянова, 阿普拉克辛伯爵、波波夫和叶米里扬诺夫合伙的采金公司 372.

Loicq de Lobel's American syndicate «洛伊克·德·洛贝尔的美国辛迪加» 556.

Манчжурское Горнопромышленное Т-во, 满洲矿业公司 24, 377—383, 401, 402, 405—407, 432, 449, 450, 455, 464, 487, 547—554, 602.

Монголор (Акционерное Общество Рудного Дела Тушетухановского и Цецехановского Аймаков в

Монголии), 蒙古矿业公司(蒙古土谢图汗盟和车臣汗盟矿业股份公司) 14, 193, 482, 552—554, 599 сл.
Приамурское Золотопромышленное Т-во, 黑龙江沿岸采金公司 593.
Российское Золотопромышленное Общество, 俄国采金公司 193, 380, 482, 487, 591—598, 599, 604 сл.
Русское Лесопромышленное Т-во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俄国远东木材公司 432, 444, 447, 450—455, 458, 459, 464, 548—555.
Синдикат для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рудных богатств Китая 1897 г., 中国矿藏勘查公司 14, 193, 482, 599 сл.
Соединенная Акционерная Золотопромышленная Компания, 采金联合股份公司 372.
Southern Pacific (амер.) 南太平洋公司(美) 556.
Fives-Lille (фр.) 费务林公司(法) 94, 149.
Хуасинли (рус.-кит.), 华兴利(中俄) 381, 382, 554.
Union Pacific (амер.) 联合太平洋公司(美) 556.
Алжезирас, см. Конференция в А. 阿尔几西拉斯(见阿尔几西拉斯会议)
Аляска, 阿拉斯加 7.
Амой, 厦门 180, 394.
Амур 阿穆尔河 39, 51, 84, 98, 372, 380, 418, 425, 441.
Амурская ж. д. (проект 1906—1908 гг.), 阿穆尔铁路 (1906—1908年方案) 5, 27, 28, 32, 556, 557, 563.
Амурский участок Сибирского пути 1895 г., 1895年西伯利亚铁路的阿穆尔段 65, 83, 84, 556.
Англия: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英国(政府) 7—16, 19, 21—27, 33, 59, 61, 65—71, 75, 85, 87, 97, 146, 151, 174, 177—181, 185, 186, 189, 195, 197, 199—209, 212—215, 218—229, 231, 232, 235, 241, 245, 246, 287, 291, 294, 295, 306—312, 314, 316, 318, 319, 328, 330—333, 339—345, 349—352, 355, 356, 360, 363—365, 394, 398, 422, 423, 425, 430, 471—478, 480, 486, 489, 490, 498, 501, 505—507, 518, 519, 522, 523, 534, 535, 558; (капитал) 资本 6, 7, 9, 17, 26, 52, 55, 59, 61, 85—89, 96, 99, 134, 150, 173, 175—177, 194, 195, 198, 203, 210—212, 214, 216, 224, 225, 230, 232, 237, 241, 243, 246, 374, 410, 483, 486, 518, 525, 531, 532, 534, 537, 555.
Аннам, 安南 7, 94.
Антанта, 协约国 5, 26, 32, 471,

498, 531, 536, 538—540.
Аньдун, 安东 22, 207.
Аргунь, 额尔古纳河 372.
Асахи, яп. газ., «朝日新闻», 日本报纸 424.
Африка, 非州 309, 474.

Б

Багдадская ж. д., 巴格达铁路 535.
Байкал 贝加尔湖 18, 20, 52, 62, 65, 82, 366.
Балтийское море, 波罗的海 556.
Банки: 银行
Бр. Бэринг, 巴林兄弟银行 518, 526.
Вавельберг (банк. д.), 瓦维利别尔格(银行行长) 593, 599, 602.
Варшавский Коммерческий банк, 华沙商业银行 594.
Волжско-Камский Коммерческий, 沃尔日—卡姆银行 90.
Главное общество для содействия развитию торговли и промышлености во Франции, 法国振兴工商业合股公司 90.
Главное Общество Промышленного и Торгового Кредита (фр.), 工商信托银行(法) 90.
Гонконг-Шанхайский, 汇丰银行 96, 149, 150, 173, 175, 194, 203, 211, 213, 214, 218, 229, 230, 237, 281.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Банк (Российский), (俄国) 国家银行 65, 118, 119, 122, 126, 286, 377—379, 382, 397, 402, 450, 469, 528, 529, 554, 593.
Готтингер и К-о, 巴黎霍丁格尔公司银行 90, 91, 511, 592.
Дармштадтский, 达姆施塔特(父子)银行 520.
бр. Джамгаровы (банк. д.), 贾姆加罗夫兄弟银行 599, 603.
Disconto Gesellschaft 贴现公司 482.
Имперский Банк в Берлине (Reichs-bank), 柏林帝国银行 530.
Индо-Китайский, 东方汇理银行 485, 486.
Консорциум французских и русских банков (проект 1906 г.), 法俄银行团(1906 年方案) 544, 545.
Корейский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проект), 朝鲜国立银行(方案) 149, 150.
Кун, Лэб и К-о (амер.), 库恩—罗比公司(美) 543, 563, 564.
Лионский Кредит, 里昂信托银行 90, 91, 490, 500, 511.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в Париже, 巴黎国际银行 482, 592.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консорциум 1905 г., 1905年的国际银行团 527—530, 550.
Мейер Э. М. (банк. д.), 迈耶(银行行长) 596, 604.
Мендельсон (банк. д.), 门德尔松(银行行长) 488, 499, 500, 511, 514—516, 520, 534, 599, 604.
Монгольский (проект 1906 г.), 蒙古银行(1906年方案) 600.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Учетная Контора в Париже, 巴黎国家贴现银行 90, 91; (Шанхайское отделение) 上海分行 91, 228.
Немецко-Азиатский, 德华银行 96, 204.
Парижско-Нидерландский, 巴黎荷兰银行 87, 90, 91, 482, 511, 514, 533, 543, 592, 593, 596.
Поляковские банки, 波利亚科夫银行 397.
Русский для внешней торговли, 俄罗斯对外贸易银行 90.
Русский Торгово-Промышленный, 俄罗斯工商银行 597.
Русско-Азиатский, 俄亚银行 554.
Русско-Корейский, 俄朝银行 150, 151, 157—159, 167, 169, 178, 186, 378, 386.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华俄道胜银行 13, 14, 49, 90—94, 106, 108, 111—113, 116—126, 149, 150, 153, 156, 168, 170, 174, 175, 193, 210, 215—217, 219, 221, 225—228, 230, 233, 235—237, 241, 275, 296, 299, 323—330, 340, 343, 344, 346, 369—385, 388, 391, 393, 395, 400—405, 410, 420, 424, 442, 450, 455, 457, 463, 475, 482, 484—487, 549—551, 599—601, 604; (Шанхайское Отделение) 上海分行 91; (командитный капитал Кит. пр-ва), 中国政府资本 125.
С.-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Коммерческий, 圣彼得堡国际商业银行 90, 91, 193, 237, 482, 552, 592, 593, 597, 604.
С.-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й Учётный и Ссудный 圣彼得堡贴现贷款银行 90, 482, 592, 597.
Северный, 北方银行 545.
Société Générale pour l'Industrie en Russie 俄国工业合股公司 599, 604.
Фран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й (проект 1906 г.), 法美银行(1906年方案) 543.
Французский Банк (Banque de France), 法兰西银行 530.

Шерешевский Г. и К-о (банк. д.), 舍列舍夫斯基总公司(银行经理) 592, 599.
Юнкер (банк. д.), 尤恩克尔(银行行长) 592, 593, 599, 605.
Японский банк, 日本银行 155, 564.
Японские банки в Корее, 在朝鲜的日本银行 178.
Барлыкские горы, 巴尔里克山 95.
Бельгия (капитал) 比利时(资本) 6, 216, 482, 547, 552, 553, 599—602.
Биньчжоу, 宾州 372.
Бирма, 缅甸 7, 202.
Биртэн, оз., 镜泊湖 561.
Благовещенск, 布拉戈维申斯克 34, 41, 83, 92, 95, 97, 98, 252, 425, 428, 441.
Ближний Восток, 近东 25, 33, 52, 540.
Бобр-Наревская ж. д., 鲍勃尔—那累夫铁路 432, 492.
Бодунэ, 伯都讷 136, 158 (ж. д.), 161, 188, 320, 372, 415.
Боксерское вознаграждение, 庚子赔款 17, 35, 261, 262, 280, 281, 285, 299, 300, 349, 350, 417.
Боксерское восстание, 义和团暴动 17, 131, 235, 239, 240, 247—263, 291, 311, 348, 359, 392, 393, 440, 600.
Броутона пролив, 朝鲜海峡 68.
Бюро Ленуар в Париже, 巴黎勒诺里社 468.

В

Вай-ву-бу, 外务部 422.
Вафандян (каменноугольные копи), 瓦房店(煤矿) 241.
Вашингтон, см. Конференция в В. 华盛顿(见华盛顿会议)
Великая Стена, 长城 15, 80, 209, 215, 218, 231, 233, 246.
Вичжу, см. Ийчжу. 见义州
Владивосток, 符拉迪沃斯托克 3, 5, 9, 13, 27, 38, 53, 57, 62, 63, 80, 84, 92, 97—100, 103, 113, 129, 136, 146, 186, 240, 254, 279, 288, 393, 414, 436, 516, 562.
Военные комиссары русские в Манчжурии, 俄国驻满洲的军务委员 270, 289, 295.
Войны: 战争
Англо-китайская 1839-42гг., 1839—42 年的中英战争 6.
Англо-китайская 1858—1860гг., 1858—1860 年的中英战争 7.
Русско-турецкая 1877-78гг., 1877—78 年的俄土战争 52.
Японо-китайская 1894-95 гг., 1894—95 年的中日战争 10, 11, 65—79, 82, 83, 85, 114, 139, 140, 241, 334, 471, 472.
Испано-американская 1897-98 гг., 1897—98 年的美西战争

16, 242.
Англо-бурская, 英布战争 14, 245, 309, 358.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1904-1905 гг. (и ее подготовка), 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及其准备) 5, 19, 20—25, 27, 28, 30,43,46, 50, 130, 131, 188, 207,293,307, 310, 312, 313, 330, 333, 348, 351, 352, 354, 356, 364, 365, 367, 389, 403, 407, 424, 442, 443, 445, 448, 460, 465, 466, 467, 469—471, 473, 479, 480, 489, 490—492, 493, 496—499, 503, 504, 508—510, 512, 513, 516, 517, 519, 523, 524, 536, 537, 540—542, 544, 546, 560; (Ляоян) 辽阳 23, 465, 496; (Порт-Артур) 旅顺口 494, 512, 513, 537; (Мукден) 奉天 511—514, 537, 546, 550; (Цусима) 对马 515, 516, 537; (вопрос о мире) 关于和谈问题 26, 31, 498, 504, 507, 508, 512, 515—517, 519—523, 525, 537.
Мировая 1914 сл. гг. 1914年爆发的世界大战 34, 35, 479.
Вокэнхэ, см. Давокэн. 见倭肯河
Волга, 伏尔加河 51.
Вооруженные силы: 武装力量
России 俄国: (флот) 海军 4, 27, 38, 60, 61, 68, 69, 73, 74, 79, 113, 137, 184—187, 189, 190, 192—194, 206, 355, 362, 364, 409, 412, 429, 432, 484, 493, 496, 501, 503, 507, 508, 526; (сухопутные войска) 陆军 27, 67, 74, 113,364,433, 436, 472, 484, 496, 507, 508, 513, 514, 526, 540, 546; (то же в Манчжурии в 1900-1903 гг.) 1900—1903年驻满洲的陆军 136, 137, 248—250, 252—255, 260, 268—270, 279, 280, 288—292, 295—297, 301, 306, 314, 315, 317, 319, 320, 322, 323, 329, 334, 340, 349, 354, 355, 367, 376, 409, 412—414, 417, 418, 425, 427—429, 432, 438, 439, 441, 447.
Японии 日本: (флот) 海军 308, 310, 354, 355, 362, 364, 412, 442, 469, 496; (сухопутные войска) 陆军 10, 73, 307, 308, 310, 336, 354, 412, 442, 447, 472, 547, 562.
Китая 中国: (регулярные войска в Манчжурии в 1901-03 гг.) 1901—1903年驻满洲的正规军 268, 270, 273, 279, 288, 292, 295, 297, 300, 302, 320—322, 340, 342, 361, 415; (полицейская стража в Манчжурии в 1901-03 гг.) 1901—1903 年满洲的巡捕 270, 279, 289, 341, 342.

Вэйхайвэй, 威海卫 15, 67, 68, 200, 209, 210.

Г

Гавайские о. о., 夏威夷群岛 14.
Гамильтона порт, 巨文岛 8, 195.
Ганьсу, 甘肃 62, 298.
Генан, о., см. Хайнань. 见海南岛
Гензан, 元山 142, 178, 364.
Германия 德国: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政府 8, 12—15, 19, 24, 25, 35, 70, 71, 78, 80, 81, 86, 93, 94, 96, 132, 155, 180—191, 199, 201, 205, 206, 209, 241, 253—256, 291, 294, 295, 306—312,338,349, 351—359, 362, 365, 396,473,475, 478, 479, 481, 483, 489, 490, 492, 496, 498—502, 506, 519—524, 530, 534, 537, 558; (капитал) 资本 6, 86—89, 91, 94, 96, 99, 194, 216, 241, 246, 359, 469, 475, 489, 493, 495, 500, 508, 509, 512, 513, 516, 525, 532, 534, 536.
Гималаи, 喜马拉雅山 63.
Гиринь, 吉林 103, 136, 158 (ж. д. 铁路), 160, 161, 168 (ж. д. 铁路.) 211, 241, 279, 280, 320, 370, 373, 393, 394, 413.
Гириньская провинция, 吉林省 112, 137, 241, 270, 286, 320, 370—372, 375, 380, 381, 405, 415, 418, 419, 441, 460.
Голландия (капитал), 荷兰(资本) 6, 534.
Гонконг, 香港 243.
Горные правила 4/17марта 1902 г. в Китае, 中国 1902 年 3 月 4 日(17 日)颁布的开矿条例 373, 376.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Дума, 国家杜马 25, 27, 28, 526, 533, 538, 563.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Казначейство Российское (расходы), 俄国国库(支出) 5, 21, 26, 28, 37, 39, 42—45, 50, 53—56, 64, 65, 84, 116, 118, 119, 121, 124, 125, 130, 157, 158, 169, 236—239,241,242, 244, 245, 251, 257, 262, 286, 287, 299, 312, 349, 352, 355, 365, 371, 376, 378, 379, 399, 402—408, 410—412, 414, 438, 444, 449, 450, 452, 454, 456, 457, 459, 460, 462—466, 468, 469, 470, 474, 477, 486, 487, 494—496, 508,509,511, 513, 540, 549, 553, 556, 563, 600, 601.
Гуандун, 广东 94, 246.
Гуанси, 广西 94, 100, 197.
Гуанчжоувань, 广州湾 15, 16.
Гуаньшаньский округ Хэйлунцз. про.,(золотопром. концессия), 黑龙江省观音山地区(金矿租让权) 380, 549, 554, 555.
Гулльский инцидент, 赫尔事件

500, 537.

Д

Давокэн (Вокэнхэ), р. в Манчжурии, 满洲的倭肯河 372, 381.

Дагу, см. Таку. 见大沽

Дагушань, 大孤山 422.

Дадунгоу, 大东沟 22.

Дажелет, о. в Японском море (концессия Бринера), 达热列特岛,在日本海(勃里涅尔的租让权) 389.

Далай-Лама, 达赖—喇嘛 601.

Далайнор, 呼伦池 372.

Дальний, 大连 37, 44, 210, 240, 243, 313, 410.

Даляньвань, 大连湾 130, 132, 136, 187, 188, 191, 193, 195—198, 200—203, 207, 208.

Дания (капитал), 丹麦(资本) 6.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е акты (и их проекты) 外交文件(及其草案):

Ливадийский договор 1879 г., 1879 年的里瓦几亚条约 85.

С.-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й договор 1881 г., 1881 年圣彼得堡条约 32, 95.

Японо-китайский договор о Корее 1885 г., 1885 年关于朝鲜问题的中日条约 8, 9, 52.

Франко-русские соглашения 1891—1892 гг., 1891—1892 年法俄协定 55, 472, 534, 535, 538, 540.

Русско-германский торговый договор 1894 г., 1894 年俄德贸易条约 19, 472.

Японо-китайский мирный договор, подписанный в Симоносеки 5/17 апреля 1895 г., 1895 年 4 月 5 日(17 日)在马关签订的中日和约 10—11, 21, 69, 70, 75, 79, 86, 131, 139, 191, 354, 480.

Ультиматум России, Германии и Франции о возвращении Ляодуна Китаю, апрель-октябрь 1895 г., 俄、德、法三国 1895 年 4—10 月间有关辽东半岛归还中国的最后通牒 12, 23, 77, 79, 84, 133, 140, 180, 359, 480, 483.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ий торговый договор 27 мая/8июня 1895 г., 1895 年 5 月 27 日(6 月 8 日)俄日商约 13.

Франко-китайские соглашения 8/20 июня 1895 г., 1895 年 6 月 8 日 (20日) 中法协定 93, 94.

Японо-китайское соглашение 27 окт./8 ноября 1895 г., 1895 年 10 月 27 日(11 月8日) 中日协定 79.

Сеульский меморандум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ий), 2/14 мая

1896 г., 1896 年 5 月 2 日(14 日)(俄日)汉城备忘录 141, 142.

Московский договор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22 мая 1896 г., 1896 年 5 月 22 日(中俄)莫斯科条约 13, 14, 24, 29, 47, 110, 111 (текст), 文本 117, 127, 129, 131, 134, 135, 188, 203, 312, 313.

Московский протокол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ий) 28 мая/9 июня 1898 г., 1898 年5月28日(6月9日)(俄日)莫斯科议定书 142—144, 147, 155, 179.

«Ответные пункты (русског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корейскому послу», июнь 1896 г., 1896 年6月(俄国政府)«对朝鲜大使的几点答复» 144—146, 155.

Англо-китайское соглашение 4 февраля 1897 г. о Бирме и Тибете, 1897年2月4日中英关于缅甸和西藏问题的协定 180.

Франко-китайская декларация 15 марта 1897 г. о неотчуждении о. Хайнаня, 1897 年3月15日中法关于不割让海南岛的声明 180.

Англо-китайская декларация о неотчуждении района Янцзы 11 февраля 1898 г., 1898 年 2 月 11 日中英关于不割让扬子江地区的声明 202, 203.

То же об английском инспекторате Китайских Таможен 13 февраля 1898 г., 1898 年 2 月 13 日中英关于英人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问题的声明 7, 202, 203.

Германо-китайское соглашение об аренде Цзяочжоу 6 марта 1898 г., 1898 年 3 月 6 日中德关于租借胶州的协定 201.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ая конвенция об аренде Ляодуна 15/27 марта 1898 г., 1898 年 3 月 15 日(27 日)中俄关于租借辽东的专约 15, 24, 48, 204, 208, 209, 244, 298.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ый протокол 25 апреля/7 мая 1898 г., 1898 年 4 月 25 日(5 月 7 日)中俄续订条约 209—211, 231, 290, 298.

Японо-китайское соглашение 26 апреля 1898 г. о неотчуждении Фуцзяня, 1898 年 4 月26 日中日关于不割让福建的协定 10, 15.

Англо-китайское соглашение об аренде Вэйхайвэй 19 июня/1 июля 1898 г., 1898 年 6 月 19 日(7 月 1 日)中英关于租借威海卫的协定 209.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ий договор о Корее 13/26 апреля 1898 г., 1898 年 4 月 13 日(26 日)俄日关于朝鲜问题的条约 15, 206—208, 222.

Американо-испанский договор 10 декабря 1898 г., 1898 年 12 月 10 日美西条约 242.

Русско-английское соглашение 16/28 апреля 1899 г., 1899 年 4 月 16 日 (28 日) 俄英协定 15, 24, 214—239, 314, 486.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ое соглащение о жел. дор. линии к Пекину 20 мая—5 июня 1899 г., 1899 年 5 月 20 日—6 月 5 日中俄关于修筑通向北京的铁路的协定 234, 238, 299.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соглашения 1899 г. о Цзяо-шэ-цзюй, 1899 年中俄关于交涉局的协定 241.

Нота США 6/18 сентября 1899 г. о сферах влияния в Китае, 1899年9月6日 (18 日) 美国关于在华势力范围的照会 16, 242, 243.

Русская ответная нота пр-ву США 18/30 декабря 1899 г., 1899年12月18日(30日)俄国给美国政府的复照 244.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ое «предварительное соглашение» 27 октября—13 ноября 1900 г., 1900年10月27日—11月13日中俄《初步协定》 267, 268 (текст), 272, 277, 289, 295, 305, 349.

Англо-германское «соглашение о Янцзы» 3/16 октября 1900 г., 1900 年 10 月 3 日(16 日)英德《扬子江协定》 294, 311.

Коллективная нота держав Китаю 9 декабря 1900 г., 1900 年 12 月9日列强给中国的联衔公书 282, 283.

Заключительный протокол 25 августа/7 сентября 1901 г., 1901 年 8 月25日(9月7日)签订的《辛丑条约》 17, 261, 318, 321.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ое «сепаратное соглашение» о Манчжурии (переговоры о нем, проекты) 1901—1902 г., 1901—1902 年中俄关于满洲问题的《单独协定》,(谈判与草案) 17, 264, 266, 269, 272, 273, 276, 278, 280, 282, 287—295, 296—299 (тексты), 文本 300—307, 310—312, 315, 317—325, 328, 329, 332, 341, 342, 345—347, 349, 350, 357, 396, 488.

Проект соглашения кит. пр-ва с об-вом К. В. ж. д. 1901

г., 1901年中国政府与中东铁路公司的协定草案 284—288, 296, 299, 300.

Проект соглашения кит. пр-ва с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м банком 1901 г., 1901年中国政府与华俄道胜银行的协定草案 24, 323—325, 326; (текст), 文本 327—330, 340—343, 344, (текст), 文本 345, 346, 351, 368, 373, 401.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ое соглашение по манчжурскому и корейскому вопросам (проекты и переговоры 1901—1904 гг.), 俄日关于满洲和朝鲜问题的协定 (1901—1904年的谈判和草案) 306, 313, 316, 318; (Ито) 伊藤 330—339, 343, 350—352, 356, 365, 396, 402, 417—419, 426, 435—437, 445, 447, 448, 460, 490.

Англо-японский договор 17/30 января 1902 г., 1902年1月17日(30日)的英日条约 18, 19, 32, 311, 312, 316—318, 330, 331, 339, 340, 347, 351, 352, 354, 356, 358, 362, 363, 365, 367, 401, 472, 477, 491.

Нота США 3 февраля 1902 г. по поводу проекта соглашения Кит. пр-ва с Русско-Кит. банком, 1902年2月3日美国就中国政府和华俄道胜银行协定草案提出的照会 18, 345.

Русско-германская декларация по поводу англо-японского союзного договора (проект 1902 г.), 俄德关于英日同盟条约的宣言 (1902年方案) 352, 353, 356, 359.

Франко-русская декларация 3/16 марта 1902 г., 1902年3月3日 (16日) 的法俄宣言 362, 476, 479.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договор 26 марта 1902 г., 1902年3月26日的中俄条约 18, 21, 22, 41, 291, 292, 348, 354, 355, 361, 363, 364, 367, 368, 370, 405, 409, 412, 414, 415, 417, 419, 421, 425, 429, 430, 436, 437, 439, 441, 447;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ое к нему соглашение о «гарантиях» (проекты, переговоры 1903 г.), 关于保证条件的补充协定(草案,1903年的谈判) 24, 38, 417—421, 427, 429, 431, 433, 435, 437—442, 447, 491.

Итало-французское соглашение 1902 г. о взаимном ненападении, 1902年意法互不侵犯协定 355.

Мюрцштегская программа 20 сентября 1903 г., 1903年9月20日的缪尔茨士台哥纲领

24, 491.

Торговые договоры США и Японии с Китаем 8 октября 1903 г., 1903年10月8日美、日同中国签订的商约 22, 422, 423, 473.

Японская нота русскому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у 23 января/5 февраля 1904 г., 1904年1月23日(2月5日)日本给俄国政府的照会 420.

Англо-французское соглашение 8 апреля 1904 г., 1904年4月8日英法协定 25, 359, 360, 364, 476—479, 496, 500, 536.

Торговый договор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Германией 15 июля 1904 г., 1904年7月15日的俄德贸易条约 19, 25, 488, 493, 495, 536.

Русско-германский договор, подписанный в Бьорке 11/24 июля 1905 г., 1905年7月11日(24日)在毕由克签订的俄德条约 479, 504, 519—526, 530, 538.

Портсмутский договор 23 августа/5 сентября 1905 г., 1905年8月23日(9月5日)朴茨茅斯条约 5, 10, 26—33, 520, 524, 525, 538, 541, 548, 553, 555, 557, 558.

Японо-китайское соглашение 9/22 декабря 1905 г., 1905年12月9日(22日)中日协定 27.

Франко-японское соглашение 10 июня 1907 г., 1907年6月10日法日协定 560.

Вербальная нота Бомпара 16/29 июня 1906 г., 1906年6月16日(29日)邦帕尔的口头照会 542.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о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соглашение 1907 г., 1907年俄日政治协定 27, 554, 560.

Англо-русское соглашение 1907 г., 1907年的英俄协定 26, 29, 535, 540.

Обмен нот Рут-Такахира 30 ноября 1908 г., 1908年11月30日罗得—高平换文 31.

«Проект Нокса» (1909 г.), «诺克斯方案» (1909年) 30, 31, 34, 245.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ое соглашение 21 июня/4 июля 1910 г., 1910年6月21日 (7月4日) 俄日协定 32—34.

Русский ультиматум Китаю 30 января 1911 г., 1911年1月30日俄国给中国的最后通牒 32.

Русские соглашения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Монголии 1912 сл. гг., 1912年以来俄国有关蒙

古问题的协定 34.
Англо и франко-русские соглашения 1914 г. о К. В. ж. д., 1914年英法俄关于中东铁路的协定 27.
Японо-китайское соглашение 1915 г. о Фуцзяне, 1915年中日关于福建的协定 10.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ое соглашение 20 июня 1916 г., 1916年6月20日的俄日协定 35.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ое соглашение 31 мая 1924 г., 1924年5月31日中苏协定 35.
Советско-японское соглашение 20 января 1925 г., 1925年1月20日苏日协定 36.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е чиновники русские в Манчжурии, 俄国在满洲的外交官 270, 271, 289.
Добровольный флот, 义勇船队 52.
Дулухэ, р. в Манчжурии (золотопром. концессия), 满洲的都鲁河(采金业租让权) 372, 380.
Дунхуасянь, г. в Мукденьской пров., 盛京省的敦化县 177, 374.
Дунхуасяньский округ Гириньской пров. (золотопром. концессия), 吉林省的敦化县地区(采金业租让权) 372.
Дэли Телеграф (The Daily Telegraph), «每日电讯报» 135.

Е

Европа, 欧洲 4, 6, 16, 25, 26, 29, 33, 46, 57—60, 63, 73, 80, 109, 241, 343, 354, 355, 357, 359, 360, 365, 366, 483, 523, 546.
Египет, 埃及 87.

Ж

Железные дороги в Китае и в Корее 中国和朝鲜境内的铁路:
Айгунь-Цицикар-Бодунэ-Гиринь («конв. Кассини» 1896 г.), 瑷珲—齐齐哈尔—伯都讷—吉林铁路 («喀西尼条约», 1896年) 136.
Аньдун-Мукдень (япон. проект 1909 г.), 安东—奉天铁路 (日本1909年方案) 31, 566.
Бирма-Юньнань (англ. проект 1897 г.), 缅甸—云南铁路 (英国1897年方案) 100, 180, 202.
Бодунэ-Гиринь-порт в Корее (русский проект 1897 г.), 伯都讷—吉林—朝鲜某港口铁路 (俄国1897年方案) 158, 159, 171, 172, 197.
Владивосток-Хуньчунь-Гиринь («конв. Кассини», 1896 г.), 符拉迪沃斯托克—珲春—吉林铁路 («喀西尼条

约»,1896 年) 136.
Гиринь-Пектусан-Ийчжу-Порт-Артур (проект Вонлярлярского 1899 г.), 吉林—白头山—义州—旅顺口铁路(旺利亚尔利亚尔斯基 1899 年的方案) 393, 394.
Иркутск-Ланьчжоуфу (проект Бадмаева, 1893 г.), 依尔库次克—兰州府 (巴德马耶夫方案,1893 年) 62, 83.
Ичжоу-Чжэньцзян (герм. проект 1898 г.), 沂州—镇江铁路(德国 1898 年方案) 216.
Кайпин-Тяньцзинь, 开平—天津铁路 53.
Куаньчэнцзы-Гиринь (русский проект 1903 г.), 宽城子—吉林铁路 (俄国 1903 年方案) 413.
Инкоу-Мукдень (кит. проект 1898 г., с уч. англ.), 营口—奉天铁路 (中国和英国工程师 1898 年方案) 211.
Люлиньпу-Тайюаньфу (проект, при уч. Р.-Кит. б., 1897 г.), 柳林铺—太原府铁路 (有华俄道胜银行参与的 1897 年方案) 216, 237, 238.
Мукдень-корейская граница (ам. проект, 1896 г.), 奉天—朝鲜边界铁路(美国 1896 年方案) 103.
Мукденьская ветвь К. В. ж. д. (рус. проект, 1897 г.), 中东铁路奉天支线 (俄国 1897 年方案) 14, 15, 166, 171.
Никольск-Уссурийский-Нингута-Бодунэ (проект Духовского 1896 г.), 尼科尔斯克—乌苏里斯克—宁古塔—伯都讷铁路(杜霍夫斯科伊 1896 年方案) 98.
Пекинская ветвь К. В. ж. д. (проект 1897—1902 гг.), 中东铁路北京支线 (1897—1902 年方案) 17, 100, 140, 146, 170—174, 205, 232, 234, 238, 239, 281, 284, 287, 292, 299, 300, 302, 303, 314, 321, 350, 398, 480, 483, 600.
Пекин-Калган-Урга-Кяхта: (амер. проект, 1910 г.), 北京—张家口—库伦—恰克图铁路 (美国 1910 年方案) 34, (рус. проект 1899 г.) (俄国 1899 年方案) 600, 601.
Пекин-Ханькоу (амер. проект 1896 г., франц. 1897 г.), 北京—汉口铁路(美国 1896 年方案, 法国 1897 年方案) 102, 103, 216.
Сеул-Ийчжу (фр. проект 1896 г.), 汉城—义州铁路 (法国 1896 年方案) 151, 192, 164, 451.
Сеул-Чемульпо (амер. проект 1896 г.), 汉城—济物浦铁路

(美国 1896 年方案) 148, 151, 152, 164.

Сретенск-Мергень-Благовещенск (рус. проект 1895—1896 гг.), 斯列坚斯克—墨尔根—布拉戈维申斯克铁路 (俄国 1895—1896 年方案) 41, 83, 92, 97, 98.

Синьминьтин-Гоубаньцзы, 新民厅—沟帮子铁路 230, 232.

Тонкин-Лунчжоу-Наньнинфу (фр. проект 1895 г.), 东京(越)—龙州—南宁府铁路 (法国 1895 年方案) 94.

Тяньцзинь-Цзинаньфу (герм. проект 1897 г.), 天津—济南府铁路 (德国 1897 年方案) 216.

Фузан-Нйчжу (яп. проект 1895 г.), 釜山—义州铁路(日本 1895 年方案) 140.

Ханькоу-Кантон (амер. проект 1896 г), 汉口—广州铁路 (美国 1896 年方案) 102, 103, 245.

Цзиньчжоу-Айгунь-Благовещенск (амер. проект 1910 г.), 锦州—瑷珲—布拉戈维申斯克铁路(美国 1910 年方案) 34.

Цзиньчжоу-Ючжуан-Мукдень (яп. проект 1895 г.), 锦州—牛庄—奉天铁路 (日本 1895 年方案) 140.

Цицикар-Гиринь-Мукдень-Ючжуан-Ляодун (амер. проект 1896 г.), 齐齐哈尔—吉林—奉天—牛庄—辽东铁路 (美国 1896 年方案) 103.

Шанхай-Сучжоу (англ. проект 1896 г.), 上海—苏州铁路(英国 1896 年方案) 100.

Шаньхайгуан-Пекин, 山海关—北京铁路 53, 100, 101, 136, 238.

Шаньхайгуань-Ючжуан, 山海关—牛庄铁路 102, 175, 210—214, 218, 222, 224, 229—232, 238, 282, 292, 299, 314, 410, 427, 445, 600.

Шаньхайгуань-Гиринь (кит. проект 1896 г.), 山海关—吉林铁路 (中国 1896 年方案) 98, 136.

(«конв. Кассини», с уч. России), («喀西尼条约», 有俄国参加) 160, 173, 211.

(кит. проект 1898 г., с уч. амер.). (中国 1898 年方案, 有美国参加)

Шаньхайгуань-Мукдень (предыдущ., с уч. Р.-Кит. банка, проект 1897 г.), 山海关—奉天铁路 (前述华俄道胜银行参加的 1897 年方案) 170.

Шаньхайгуань-Цзиньчжоу (кит. и рус. проекты 1896—1898 гг.), 山海关—锦州铁路 (中俄 1896—1898 年方案)

101, 169, 211.
Желтое море, 黄海 97, 99, 100, 133, 209; (ж. д. ветвь к нему) 通向黄海的支线 14, 114, 115, 133, 146, 162—169, 194, 196, 197, 201, 205, 207, 480; (порт на берегу) 沿岸的一个港口 14, 115, 169, 186, 192, 194, 201, 205.

З

Забайкалье, 外贝加尔地区 15, 98, 100, 436.
Забайкальская ж. д., 外贝加尔铁路 52, 83.
Займы 借款:
Русский 3% 1891 г., 俄国 1891 年年息三厘的借款 474.
Китайские в Англии 1894 г., 中国 1894 年向英国借款 85, 86.
Корейский в Японии 1894 г. 朝鲜 1894 年向日本借款 140, 149, 153, 155.
Китайский во Франции 1895 г., 中国 1895 年向法国借款 13, 86—90, 94, 96, 281, 290, 474, 481.
Китайский в Англии и Германии 1896 г., 中国 1896 年向英、德借款 96, 101, 481.
Корейский в России (проект 1896—1897 гг.), 朝鲜向俄国借款(1896—97 年方案) 145, 150, 151, 153—157, 159.
Японский в Англии 1897 г., 日本 1897 年向英国借款 19.
Китайский в Англии или России (переговоры 1897—1898 гг.), 中国向英国或俄国借款(1897—1898 年交涉) 16, 191, 192, 195—206, 218, 233.
Китайский в Англии 1899 г. (для сооружения ж. д. в Ю. Манчжурии), 中国 1899 年向英国借款 (用于修建南满铁路) 210—214, 218, 222, 229, 230, 232, 237, 238, 314.
Русский во Франции 1901 г., 俄国 1901 年向法国借款 357, 398, 479, 488.
Японский во Франции (переговоры 1901 г.), 日本向法国借款(1901 年交涉) 316, 331, 332, 340.
Гириньского цзян-цзюня в Рус.-Кит. банке 1901 г., 吉林将军 1901 年向华俄道胜银行借款 371.
Русский в Германии 1902 г., 俄国 1902 年向德国借款 359, 488.
Русский во Франции 1904 г., 俄国 1904 年向法国借款 25, 28, 463, 493, 494, 496, 545, 562.
Японский во Франции (про-

ект 1904 г.), 日本向法国借款(1904年方案) 496.
Русский в Германии 15 декабря 1904 г., 俄国1904年12月15日向德国借款 495, 500, 511, 512, 537.
Русский во Франции (февральские переговоры 1905 г.), 俄国向法国借款(1905年2月交涉) 511, 512.
Русский в Германии 1905 г., 俄国1905年向德国借款 514, 516, 537, 540.
Китайский в Англии 1905 г. для выкупа К. В. ж. д. (проект), 中国为赎回中东铁路1905年向英国借款(方案) 554.
Китайский в Америке 1905 г. для того же (проект), 中国为赎回中东铁路1905年向美国借款(方案) 554.
Русский (ликвидационный) н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м рынке 1906 г., 俄国1906年在国际市场上的善后借款 26, 28, 518, 519, 525—529, 531—538, 540—543.
Русский во Франции 1909 г., 俄国1909年向法国借款 28, 31, 542, 562.
Китайский «реорганизационный» (проект 1911 г.), 中国的"善后"借款(1911年方案) 33.
Закавказье (денежный кризис 1905 г.), 外高加索(1905年货币危机) 529.
Золотой запас (русский), 黄金储备(俄国的) 469—471, 528, 529, 533, 536.
Зубатовщина, 祖巴托夫组织 403.

И

Ийчжу (Вичжу), 义州 140, 179, 207, 393.
Илийский край, 伊犁地区 7, 281, 298.
Илу (кам. уголь), 懿路(煤矿区) 374.
Империализм, 帝国主义 4, 5, 7, 13, 14, 17, 32, 46, 80, 233, 354, 365, 383, 387, 403, 471, 472, 474, 475, 481, 483, 538, 540, 544, 545.
Индия, 印度 59, 295, 523.
Инкоу, 营口 11, 24, 136, 192, 201, 208, 211, 254, 268, 286, 287, 299, 314, 350, 375, 410, 420, 424, 435, 442, 457.
Инцзы, см. Инкоу. 见营口
Иркутск, 伊尔库次克 13, 52, 83.
Испания, 西班牙 14, 242.
Италия, 意大利 8, 14, 291, 534.
Ичжоу, 沂州 216.
Ишль, 伊什利 238, 239.

К

Кабинет е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皇帝秘书厅 385, 386, 388—390, 392,

396, 399, 401.
Кайпин, 开平 53, 136, 285.
Калган, 张家口 34, 600.
Канадская ж. д., 加拿大铁路 57, 58.
Кантон, 广州 10, 250.
Капитал 资本:
русский: (в Китае) 俄国(在中国的) 87, 90, 91, 99, 193, 214, 243, 286, 365, 486; (в Манчжурии) (在满洲的) 100, 216, 246, 290, 334, 344, 368, 369, 371, 373, 375—377, 379, 383, 384, 391, 399, 400, 404, 409, 417, 434, 436, 437, 444, 450, 455, 462—464, 487; (монополии в Китае) (在中国的垄断权) 192, 200, 209, 263, 265, 275—277, 281, 282, 286, 291, 298, 321, 323—325, 327, 330, 340, 343, 345, 346, 351, 371, 401, 438, 440, 445, 449, 455, 458, 459, 462—464, 487, 489.
иностранный 外国资本: (в Китае) (在中国的) 6, 58, 60, 102, 365, 368, 388; (в Манчжурии) (在满洲的) 21, 27, 100, 104, 281, 290, 324, 325, 351, 361, 368, 369, 373, 376, 379, 395, 404, 406, 407, 409, 410, 412, 417, 430, 434, 435, 437, 444, 445, 455, 457, 463—465, 472, 487, 546; (в России) (在俄国的) 89, 355, 398, 400, 467, 468, 470, 474, 475, 482, 483, 493, 508, 509, 513, 515, 517, 519, 525, 526, 532, 536, 541—546, 554—556, 592 сл.
Каргодо, о., 巨济岛 68.
Кашгар, 喀什噶尔 263, 265, 274, 277, 281, 286, 298, 302.
Квантун, см. Ляодун. 关东见辽东
Киаочао, см. Цзяочжоу. 见胶州
Китайская Восточная ж. д.: 中东铁路:
Соглашение русског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с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м банком 18 мая 1896 г., 1896 年 5 月 18 日俄国政府和华俄道胜银行的协定 119—121, 126.
Протокол Правления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ого банка 23 мая 1896 г., 1896 年 5 月 23 日华俄道胜银行董事会议定书 116 (текст 文本) 117, 118, 134, 246, 265.
Контракт на сооружение Китайской Восточной ж. д. 27 августа 1896 г., 1896 年 8 月 27 日修建中东铁路的合同 29, 41, 47, 101, 104—117, 121, 123—129, 131, 134, 149, 160, 161, 169, 209, 224, 242, 244, 262, 285, 287, 291, 295, 297, 557.
Общество К. В. ж. д., 中东铁

路公司 35, 44, 49, 116—127, 157, 160, 162—174, 190, 192, 201, 224, 233, 237—244, 262, 267, 271, 276, 280, 281, 284—288, 291, 296, 299, 302, 303, 313, 314, 321, 322, 334, 350, 366, 370, 371, 386, 398, 402, 412, 425, 455, 463, 553, 557.

Устав Об-во К. В. ж. д., 中东铁路公司章程 29, 119, 121, 122, 125, 127, 128, 135, 139, 160.

Соглашение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ого банка с Госуд. банком о ссуде под акции К. В. ж. д. 1896 г., 华俄道胜银行和国家银行1896年关于以中东铁路股票作抵押的贷款协定 126.

Акционерный капитал об-ва К. В. ж. д., 中东铁路公司的股本 119—121, 123, 124, 455.

Облигационный капитал об-ва К. В. ж. д., 中东铁路公司的债券资本 118, 124, 125, 169.

Магистраль К. В. ж. д., 中东铁路干线 5, 26, 29, 41, 42, 46, 48, 84, 95, 97, 99, 100, 105, 106, 110, 113, 114, 126, 130, 139, 149, 160, 161, 163—165, 193, 209, 211, 236, 315, 414, 417, 418, 555, 556.

Южно-манчжурская линия, 南满支线 15, 26, 31, 37, 40, 114, 130, 134, 166, 170, 174, 196, 201, 204, 205, 208, 214, 252, 270, 281, 287, 299, 313, 334, 361, 386, 393, 394, 427, 553, 555, 556.

Железная линия в целом, 铁路全线 5, 13, 14, 17, 18, 20, 26—32, 45, 128, 169, 188, 218, 222, 231, 232, 245, 247, 249, 252, 259, 263, 268, 274, 281, 285, 300, 320, 334, 338, 342, 349, 367, 393, 394, 412, 413, 425, 439, 441, 445, 462, 474, 555, 556, 600.

Охранная стража (Отдельный корпус Пограничной стражи), 护路军 (边防军独立军团) 26, 45, 240, 251, 271, 279, 295, 297, 315, 342, 351, 367, 413, 418, 424, 425, 557.

Таможни, 海关 197, 274, 281, 288, 416, 440.

Морское пароходство К. В. ж. д., 中东铁路公司海运局 44, 130, 465.

Досрочный выкуп К. В. ж. д., 先期赎回中东铁路 30, 31, 123, 124, 128, 245, 285, 286, 555, 556, 562—566.

Задолженность Об-ва К. В. ж. д. русскому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у, 中东铁路公司欠俄国政府的债务 124, 555.

Кобэ, 神户 67.

Комитет Сибирской ж. д., 西伯利亚铁路委员会 56.
«Конвенция Кассини» 1896 г., 1896年«喀西尼条约» 135—139, 160, 186.
Конференция в Аджезирасе 1906 г., 1906年的阿尔几西拉斯会议 531, 533, 534, 538.
Конференция в Вашингтоне 1921 г., 1921年华盛顿会议 15.
Концессии в Манчжурии, 满洲的租让权 17, 23, 24, 209, 281, 284, 299, 300, 302, 321, 325—327, 330, 340, 341, 345, 346, 368—377, 380, 381, 383, 400, 402, 405, 420, 435, 438, 440, 449, 451, 455, 463, 475, 482, 487, 548—554; соглашение Любы о Гириньской пров. 1901 г., 1901年刘巴关于吉林省的协定 371, 372; соглашение Кроткова о Хэйлунцзянской пров. 1901 г., 1901年关于黑龙江省的克罗特科夫协定 372; золото, 金矿 286, 369, 371, 372, 374—376, 380—382; каменный уголь, 煤矿 286, 369—371, 374, 449, 451; леса, 森林 286, 369, 370, 410; железо, 铁路 374, 379; медь, 铜 374; нефть, 石油 286, 369; никкель, 镍 286, 369; серебро, 银 370, 374; пароходство по Ляохэ, 辽河航运 405, 451; электрическое освещение в Мукдене, 奉天的电灯照明 405, 451.
Корейский залив, 朝鲜湾 11, 99, 196, 205, 209, 393, 447.
Корейский пролив, 朝鲜海峡 8, 335, 337.
Корея, 朝鲜 7—15, 20, 22, 24, 28, 30, 31, 33, 38, 46, 52, 55, 61, 65—70, 72—74, 77, 79—81, 85, 111, 112, 115, 131, 139—156, 159, 160, 169, 177—179, 187—189, 194, 205—208, 218, 293, 308, 313, 316, 333—340, 343, 350—352, 359, 361, 362, 385—389, 393—395, 398—402, 409, 412, 419, 424, 427, 435—437, 442, 443, 447, 448, 497, 560, 561; незамерзающий порт, 不冻港 71, 72, 75, 78, 79, 103, 133, 157, 167, 169, 170—172, 180, 197; дворцовый переворот 1895 г., 1895年宫廷政变 141; русская экспедиция в К. в 1898 г., 1898年俄国对朝鲜的考察 387, 390.
Коулунский п. о., 九龙半岛 15.
Кохинхина, 交趾支那 7.
Кризис в России 1899 сл. гг., 1899年以来俄国的危机 18, 45, 245, 309, 357, 365, 366, 397, 485, 600.
Кронштадт, 喀琅施塔得港 38, 362.
Кругобайкальская ж. д., 环贝加尔湖铁路 20, 366.

Куанхэ (золотопр. концессия), 宽河(采金业租让权) 372.
Куанчэнцзы (Чанчунь), 宽城子(长春) 26, 280, 555.
Куба, 古巴 14.
Курильские о. о., 千岛群岛 7.
Кэрийский округ (концессии), 于田(租让权) 286, 298, 302.
Кяхта, 恰克图 6, 34.

Л

Лазарев порт, 永兴湾 8, 70.
Ланчжоуфу (жел. дор. на Л.), 兰州府(通向兰州的铁路) 62, 83.
«Лихунчангский фонд», «李鸿章基金» 49—51, 115, 122 (указ) 上谕, 124, 199, 246, 247, 265, 301, 324, 328, 329, 348, 361, 371.
Лунчжоу, 龙州 94.
Ляодунский залив, 辽东湾 103, 205, 209.
Ляодунский п. о., 辽东半岛 10, 15, 20, 24, 30, 37—40, 42, 46, 70, 77, 79, 92, 93, 99, 130, 132, 134, 140, 146, 187, 189, 204, 207, 209, 210, 219, 241, 262, 272, 281, 283, 298, 334, 348, 438, 439, 441, 447, 480, 491; порт на нем, 辽东半岛上的港口 157, 158, 170.
Ляохэ, 辽河 285, 314, 320, 405, 415, 451.
Ляоян, 辽阳 177, 250, 280.

М

Малая Азия (жел. дор.), 小亚细亚(铁路) 350.
Малый Хинган, 小兴安岭 286.
Мамахоло (концессии), 妈妈伙洛(租让权) 374.
Манчжурия 满洲: Северная, 北满 23, 26, 37—42, 95, 98, 129, 135, 137, 138, 146, 157, 159, 161, 172, 315, 320, 394, 414, 415, 418, 425, 437, 557, 559, 561; Южная 南满 10, 12, 20, 23, 26, 31, 38—40, 46, 52, 71, 74, 115, 129, 133, 139, 146, 158, 167, 168, 170, 173, 176, 177, 205, 211, 212, 237, 250, 268, 314, 361, 427, 443, 472, 480, 491, 561.
Манчжурия, ст. К. В. ж. д., 满洲里, 中东铁路车站 288.
Марокко, 摩洛哥 312, 531, 533.
Марсель, 马赛 109.
Масампо, 马山浦 337.
Мергень, 墨尔根 83, 98.
Монголия, 蒙古 14, 32, 34, 36, 103, 192, 193, 196, 198, 200, 206, 215, 221, 228, 233, 263, 265, 274, 275, 277, 281, 286, 298, 302, 303, 459, 560, 599, 600.
Морские таможни в Китае, 中国的海关 7, 8, 87, 90, 96, 126, 197, 202, 416.
Москва, 莫斯科 9, 112, 113, 116, 120, 129, 133, 144, 149.

Московское вооруженное восстание 1905 г., 1905年莫斯科武装起义 529.
Муданьцзян, 牡丹江 372, 381.
Мукден, 奉天 22, 103, 136, 140, 166, 170, 177, 211, 230, 241, 268, 269, 275, 279, 280, 295, 299, 370, 373, 393, 420, 422, 451, 458, 491; ж. д. через М., 经过奉天的铁路 14, 167, 168, 187.
Мукденьская провинция, 盛京省 161, 166, 266, 268, 270, 286, 320, 370, 374, 376, 380—382, 405, 415, 418, 441.

Н

Нагасаки, 长崎 196.
Наместничество на Д. Востоке, 远东总督府 38, 44, 408, 409, 443, 444, 446, 461, 462.
Наньнинфу, 南宁府 94, 202.
Незамерзающий порт на 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м побережьи, 太平洋沿岸的一个不冻港 79, 80, 105, 106, 114, 146, 170, 190, 192, 219, 384, 385.
Никольск-Уссурийский, 尼科尔斯克—乌苏里斯克 84, 98, 160, 240, 546.
Нингута, 宁古塔 84, 161, 188, 280, 372, 425, 428.
Ниньюаньский округ Мукд. пров. (концессии), 盛京省宁远地区(租让权) 382.
Ново-Цурухайтуйский караул, 新祖鲁海图卡伦 83, 85, 98.
Нонни, 嫩江 415, 561.
The North China Herald «北华捷报» 135, 137, 139.
Нючжуан, 牛庄 100, 103, 140, 218, 240, 241, 298, 347, 426.

О

Одесса, 敖德萨 105, 106, 109.
Омск, 鄂木斯克 10.
Орхон, 克鲁伦河 599.
Особое Совещание для рассмотрения вопросов, касающихс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об-ва КВжд. 1906 сл. гг., 研究中东铁路公司1906年以来的活动问题的特别会议 558.
Особый комитет Д. Востока, 远东特别委员会 44, 446, 458, 461, 462.
«Основания русског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нного надзора в Манчжурии» 1900 г., 1900年«俄国政府监理满洲原则» 266, 269—273, 278, 280, 289, 297, 414.
«Открытые двери» в Китае, 中国的"门户开放" 16, 17, 21, 26, 30, 35, 212, 214, 219, 221, 222, 233, 242, 243, 290, 304, 305, 311, 334, 339, 345, 350, 352, 363, 367, 410, 422, 423, 425, 433, 435, 437, 438, 442, 472, 473.

П

Пекин, 北京 10, 15, 17, 20, 98, 101, 105, 106, 169, 171, 175, 215, 226, 238, 264, 266, 283, 365; (русские и иностранные войска в П. в 1900—1901 гг.), (1900—1901 年驻北京的俄国军队和外国军队) 248, 251—260, 263, 293, 294, 318, 321, 322, 349.

Пектусан (ж. д. через П.), 白头山(经过白头山的铁路) 393.

Пеньян, П. провинция, 平壤, 平安道 337, 401.

Персия, 波斯 350, 526, 535.

Пескадорские о. о., 澎湖列岛 72, 74, 93.

Петербург, 彼得堡 48, 104—107, 109, 118, 133.

Печилийский залив, 北直隶湾 133, 172, 174, 175, 196, 205, 209, 239.

Пограничная ст. К. В. ж. д., 中东铁路边境站 288.

Подушный сбор в Манчжурии, 满洲的人头税 459.

Порт-Артур, 旅顺口 15, 20, 22, 37, 41, 42, 46—51, 67—71, 74, 130—132, 136, 148, 179, 186, 191, 193—198, 200—208, 210—212, 219, 240, 241, 248, 254, 266, 267, 270, 279, 288, 302, 313, 334, 337, 348, 355, 361, 364, 384, 386, 394, 405, 412, 420, 439, 447, 450, 451, 455, 458, 493, 494, 496, 507, 512, 513, 537.

Порт-Саид, 塞得港 106, 109.

Порто-Рико, 波多黎各 14.

Португалия (капитал), 葡萄牙(资本) 6.

Потемкин (восстание на П.), 波将金号(波将金号起义) 518, 523.

Приамурский край, 阿穆尔边区 7, 27, 51, 69, 98, 100, 251, 270, 419, 437—439, 546, 562.

Приморская область, 滨海省 7, 8, 15, 27, 36, 482, 547.

Р

Размен кред. билетов на золото в России, 在俄国纸币兑换黄金 469—471, 493, 532, 536, 538.

Рангун, (жел. дор, в Р.), 仰光, (仰光的铁路) 100.

Революция в России, 俄国的革命 5, 20, 25, 358, 360, 366, 404, 471, 510, 512, 515, 523, 528, 532, 533, 537, 540, 542, 550, 553.

Риу-Киу, 琉球群岛 7.

С

Самодержавие, 专制政体 368, 383, 397, 401, 403, 404, 411, 446, 471, 474—477, 479, 481, 483, 489, 532, 536.

Саньсинский округ Гиринск.

пров., 吉林省三姓地区 372, 381, 554.
Сахалин, 萨哈林岛 7, 26, 36, 546, 547, 550.
Свидания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政治性会晤:
Петергоф (Вильгельм—Николай, 1897 г.), 彼得高府(威廉—尼古拉, 1897年) 180—184, 481.
Данциг (Вильгельм—Николай, 1901 г.), 但泽(威廉—尼古拉, 1901年) 356—360, 488.
Спала (Николай—Генрих Прусский, 1901 г.), 斯帕拉(尼古拉—普鲁士亲王亨利, 1901年) 358—362, 398.
Ревель (Вильгельм—Николай, 1902 г.), 勒维尔(威廉—尼古拉, 1902年) 360, 362, 404.
Висбаден (Вильгельм—Николай, 1903 г.), 威斯巴登(威廉—尼古拉, 1903年) 364, 452, 490.
Роминтен (Вильгельм—Витте, 1905 г.), 罗明滕(威廉—维特, 1905年) 524.
Свинемюнде (Вильгельм—Николай, 1907 г.), 施维纳谬德(威廉—尼古拉, 1907年) 521.
Священная дружина, 神圣团 387.
Седлец-Бологовская ж. д., 谢德列茨—博洛哥耶铁路 357.
Семипалатинская область, 塞米巴拉金斯克省 95.
Семиреченская область, 谢米列奇耶省 95.
Сеул, 汉城 7, 8, 10, 65, 141—145, 149—151, 153, 159, 164, 179. 385.
Сианьфу, 西安府 264, 277, 302, 303.
Сибирская ж. д., 西伯利亚铁路 3—5, 9, 10, 13, 18, 20, 28, 41, 42, 51—64, 68, 71—73, 77, 79, 82, 83, 85, 92, 97—99, 101—103, 108, 115, 129, 133, 136, 138, 146, 187, 200, 207, 252, 367, 474—476, 480, 481.
Сибирь, 西伯利亚 3, 4, 27, 56—58, 364, 529.
Сикким, 锡金 7.
Син-вэнь-бао, газ., 新闻报 106,
Синьминьтин, 新民厅 230, 232,
Совещания о японо-китайской войне 1894—1895 г., 关于1894—1895年中日战争的会议 66—81, 131, 138.
Совещание 31 октября 1900 г. о Манчжурии, 1900年10月31日研究满洲问题的会议 269, 273.
Совещание 28 июня 1901 г. о Манчжурии, 1901年6月28日研究满洲问题的会议 314, 321.

Совещание по Манчжурскому вопросу 1903—1904 гг.; 1903—1904年研究满洲问题的会议; 11 января 1903 г. 1903年1月11日,416—418; 25 января 1903 г. 1903年1月25日, 416—420, 436; 26 марта 1903 г. 1903年3月26日, 406—408, 411, 421, 470; 13 апреля 1903 г. 1903年4月13日, 425, 427; 7 мая 1903 г. 1903年5月7日, 410, 411, 429, 431, 432; Порт-Артурские в июне 1903 г. 1903年6月旅顺口会议, 22, 423, 429, 433, 435, 437—439, 442, 447, 457; 1 августа 1903 г. 1903年8月1日, 22, 440, 441, 442, 447; 15 декабря 1903 г. 1903年12月15日, 448, 460; 26 января 1904 г. 1904年1月26日, 478; «Предварительное» 10 января—30 мая 1904 г. 1904年1月10日—5月30日«预备性会议», 33, 460—465.

Соединенные Штаты Америки 美国: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政府 8, 9, 12, 14, 16—26, 30, 31, 33—35, 60, 65, 212, 241, 242, 245, 291, 295, 304, 306, 315, 342—346, 350, 352, 359, 422, 423, 472, 473, 490, 498, 507, 516, 517, 547; (капитал) 资本 6, 7, 9, 16, 17, 21, 30, 31, 33, 84, 86, 102—104, 148, 152, 153, 211, 212, 242, 243, 304, 370, 374, 375, 401, 407, 472, 474, 475, 525, 527, 529, 530, 532, 534, 537, 546, 547, 551, 553, 555, 556, 558, 563—565.

Соляной откуп в Манчжурии, 满洲的食盐专卖权 197, 459.

Сончжинпо, 松珍浦 337.

Союзы (и проекты с. с.) 同盟(及同盟方案):

Франко-русский, 法俄同盟 19, 26, 257, 258, 349, 355, 362—364, 467, 471, 474, 476, 478, 479, 484, 487, 488, 490—492, 501, 503, 504, 509, 510, 521, 525, 527, 532, 534, 537, 542.

Тройственный (итало-австро-германский), 三国同盟(意—奥—德) 310, 311, 351, 362.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ий, 俄日同盟 23 (проект Безобразова), (别佐勃拉佐夫方案) 31, 33, 34.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中俄同盟 13, 29, 46, 47, 59, 61, 85, 111, 114, 117, 129, 130, 134, 483.

Русско-германский (проект), 俄德同盟(方案) 19, 25, 353, 357, 358, 361, 479, 492, 501—504, 506, 507, 519—522, 524, 537, 538.

Франко-германо-русский (проект), 法—德—俄同盟(方案) 46, 394, 396, 483, 492, 501, 502, 505, 521.

Англо-японо-германский

(проект), 英—日—德同盟(方案) 307—308.
Англо-японский, см. дипломатич. акты. 英日同盟,见外交文件
Сретенск, 斯列坚斯克 41, 52, 92, 83, 95, 98, 414, 556.
Стачки 1903 г. в России, 俄国1903年的罢工 443.
Сунгари, 松花江 95, 240, 280, 288, 372, 380, 415, 418, 425, 428, 441, 561.
Сучанский лес, 苏昌森林 396, 399.
Сучжоу, 苏州 100.
Суэц, 苏伊士 57, 58, 109.
Сянтан, 湘潭 202.
Сянцзян, 湘江 197.

Т

Таймс (The Times), «泰晤士报» 88, 295, 526.
Тайюаньфу, 太原府 226, 264.
Таку (Дагу), 大沽 248,250,257, 258, 260, 261, 315, 525, 541.
Танхезе (минер. воды), 汤河子(矿泉水) 405.
Тарбогатайский округ, 塔尔巴哈台地区 298.
Тихий океан, 太平洋 4, 10, 27, 31, 38, 52, 57, 63, 68, 71,133,143, 170, 186, 187, 190, 205, 219, 359, 362, 364, 415, 472, 474, 484, 556.
Тонкин, 东京(越) 93, 94.
Тонкинский залив, 东京湾(北部湾) 180.
Тумень, р., 图们江 178, 385, 415, 436.
Туннель Хинганский (К. В. ж. д.), (中东铁路的)兴安岭隧道 367.
Туркестан (Китайский), (中国)土尔克斯坦 282.
Турция, 土耳其 87.
Тэлин, 铁岭 280, 382.
Тяньцзинь, 天津 53, 94, 169,216, 247, 248, 254, 257, 263, 266.

У

Уйхэ, 乌伊河 380.
Улясутай, 乌里雅苏台 600.
Уницзян, 乌泥江 197.
Управление императорских китайских ж. д., 北洋官铁路局 53.
Урал, 乌拉尔 12, 51, 474, 482.
Урга, 库伦 34, 600, 601.
Уссурийская ж. д., 乌苏里铁路 39, 52—54.

Ф

Фашода, 法绍达 14, 227.
Филиппины, 菲律宾 14, 30, 242.
Финансовый советник в Корее, 驻朝鲜的财政顾问 8, 14, 15, 145—147, 149, 150, 153—156, 158, 159, 177, 179, 206, 207, 316.

Формоза, 福摩萨(台湾) 10, 74.
Формозский пролив, 福摩萨海峡(台湾海峡) 93.
Франция 法国: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政府 7, 8, 12, 14—16, 19, 24—27, 33, 65, 75, 78, 93, 94, 102, 155, 180, 198—200, 202, 205, 227, 257, 260, 310, 330, 331, 343, 349, 355, 358—360, 362—365, 471, 473—476, 478, 480, 481, 484, 485, 487, 489—492, 496, 498, 500—502, 504—506, 507, 509, 511, 512, 514, 517—519, 521—524, 526, 532, 534, 535, 540—542, 549; (капитал) 资本 6, 9, 12, 13, 28, 56, 69, 70, 72, 86—92, 94, 96, 99, 120, 121, 149, 216, 217, 226, 227, 233, 235, 236, 241, 243, 349, 357—359, 407, 451, 467—469, 471, 474—477, 481—489, 493—496, 499, 500, 508—510, 512, 514, 516—518, 525—527, 532, 536, 541—544, 549, 550; (акционеры Рос. Зол. Об-ва) 俄国采金工业公司股东 592; (пресса) 报刊 468, 469, 494, 496, 510, 511, 519, 544.
Фудутуны в Манчжурии, 满洲的副都统 270, 272, 289, 298, 497.
Фузан, 釜山 140, 142, 178, 187.
Фулярди, 富拉尔基 425, 428.
Фуцзянь, 福建 15.
Фушунь (каменноугольные копи), 抚顺(煤矿) 26, 31, 166, 381, 382, 405, 432, 449, 451, 549—555.
Фынхуанчэн, 凤凰城 177.

Х

Хабаровск, 哈巴罗夫斯克 82, 83, 414, 556.
Хайлар, 海拉尔 425, 428.
Хайнань, о., 海南岛 75, 180.
Хайчэн, 海城 11.
Хамкионская провинция в Корее, 朝鲜咸镜道 401.
Ханькоу, 汉口 94, 226.
Харбин, 哈尔滨 160, 240, 241, 279, 288, 425, 428, 497, 516, 555.
Хотанский округ, 和田地区 286, 298, 302.
Хуанхэ, 黄河 216.
Хуланьхэ, 呼兰河 372.
Хуланьчэн, 呼兰城 161.
Хунань, 湖南 197,
Хунхузы, 红胡子 131, 406, 497, 549.
Хуньчунь, 珲春 52, 320, 372, 375, 425, 428, 441; ж. д. к Х., 通珲春的铁路 131, 160.
Хэйлунцзянская провинция, 黑龙江省 112, 137, 241, 270, 286, 372, 375, 380, 418, 441, 460.
Хэнань, 河南 217.

Ц

Цейлон, 锡兰 59.

Цзинаньфу, 济南府 216.
Цзиньчжоу, 锦州 34, 101, 140, 169, 173, 211.
Цзиньчжоутин, 金州厅 281, 290, 298, 421.
Цзун-ли-ямынь, 总理衙门 94, 104, 106, 138, 171, 176, 180, 182, 185, 190, 195, 196, 198, 199.
Цзян-цзюни манчжурские, 满洲的将军 172, 190, 264, 266—268, 270, 272, 273, 276, 280, 289, 292, 295, 297, 298, 322, 348, 370, 379, 381, 384, 402, 497.
Цзяочжоу (Киао-Чао), 胶州 15, 47, 106, 132, 133, 136, 139, 170, 180—190, 193, 201, 480.
Цзяо-шэ-цзюй, 交涉局 127, 240.
Цзяпигоу (концессия), 夹皮沟 (租让权) 376, 380, 382, 549.
Цзяшань (концессия), 夹山(租让权) 382.
Цинампо, 镇南浦 447.
Циндао, 青岛 184.
Циньвандао, 秦皇岛 286, 315.
Цицикар, 齐齐哈尔 84, 103, 136, 160, 161, 279, 280, 425, 428, 441.
Цусима, 对马 130, 195.

Ч

Челябинск, 切利亚宾斯克 53, 54.
Чемульпо, 济物浦 151, 152, 155, 164, 178, 364, 447.
Черное море, 黑海 52, 109, 556.
Чжендинфу, 正定府 226.
Чжилийская провинция, 直隶省 139, 210, 215, 253, 256, 261, 282, 283, 285, 314, 321.
Чжэньцзян, 镇江 216, 226.
Чжэцзян, пров. 浙江省 217.
Чита, 赤塔 5, 85, 288.

Ш

Шанхай, 上海 10, 58, 85, 100, 106, 109, 118, 159, 170, 176, 263, 264, 369, 486.
Шаньдун, 山东 15, 35, 177, 183, 194, 205, 206, 209, 241, 483.
Шаньхайгуань, 山海关 53, 101, 136, 175, 211, 215, 232, 299, 315, 375.
Швеция (капитал), 瑞士(资本) 6.
Шестакова порт, 新浦 394.
Шимяоцзыгоу, 石庙子沟 374, 375.

Ю

Юньнань, 云南 94, 100, 180, 205.
Юлиньпу, см. Люлиньпу. 柳林铺

Я

Ялуцзян, 鸭绿江 11, 201, 207, 208, 286, 350, 374, 384, 393, 399, 405, 407, 447, 448, 451; заслон, 屏障 20, 47, 407; лесная концессия в Корее, 朝鲜的森林

租让企业 20, 178, 350, 383—386, 389, 390, 395, 399, 405, 406, 436, 437; лесная концесси в Манчжурии, 满洲的森林租让企业 20, 286, 369, 383, 384, 402, 405, 406, 408, 421, 436, 458, 459.
Янцзы, 扬子江 16, 80, 197, 202, 212, 213, 216, 225, 226, 228, 231, 233, 236, 246, 261, 426, 486.
Яньтай (каменноугольные копи), 烟台(煤矿) 31, 241.
Япония 日本: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政府 5, 7, 8, 10—15, 19—37, 46, 47, 61, 65—79, 86, 93, 104, 114, 133, 140—148, 150, 151, 153, 155, 156, 179, 187, 189, 196, 200, 204, 206—208, 219, 222, 246, 253, 291, 293—295, 302, 303, 306—319, 328, 330—339, 342, 343, 345, 347, 350—352, 354, 361, 363—366, 412, 417, 422, 423, 426, 427, 429, 441, 442, 460, 470—473, 479, 480, 489, 490, 498, 506, 509, 522, 539, 546—549, 551, 553—557; (капитал) 资本 9, 58, 61, 65, 99, 140, 148, 178, 200, 243, 369.
Японское море, 日本海 3, 152.
Яркендский округ (концессии), 叶尔羌地区(租让权) 286, 298, 302.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俄国在满洲（1892-1906年）　（专制政体在帝国主义时代的对外政策史纲）
作者=（苏）　鲍里斯·罗曼诺夫
页数=529
SS号=10237278
DX号=
出版日期=1980年04月第1版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页
目录页
原书出版说明
原书前言
导言 俄国远东政策的基本点（1892—1917年）
第一章 满洲问题的由来（1892—1895年）
第二章 俄国对满洲的“和平”渗透（1895—1896年）
第三章 对中国南满领土的“侵占”（1896—1898年）
第四章 向长城以北对英国的“极有害”的退让（1898—1899年）
第五章 对满洲全境的“临时”占领（1900—1902年）
第六章 战前的最后阶段（1902—1904年）
第七章 战争时期俄国的国际财政关系（1904—1906年）
第八章 战后满洲的“大型企业”
附录 1897年的辛迪加和蒙古矿业公司
索引 1．人名索引
2．内容和地名索引
附录页